王康文集



王康文集目录

自序 1

王康小传 2

最新上網 3

二〇一〇年新年致意 4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序《艺术帝国》 5

俄羅斯 7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 8

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 25

老索，是时候了 29

俄羅斯道路 33

我的精神麦加 58

俄罗斯的启示 66

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特性 116

欧洲思想 124

他们的悲剧，我们的宿命——《匈牙利在哭喊！——1956 年匈牙利起义》译序 125

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 132

中國精神元年：陪都抗戰 142

告语马英九 143

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 150

祭祀時代：祭文布奠 183

四川：中国的盐——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 184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总神位 210

遥祭林昭 238

从血到血，从心到心，不能再从罪到罪 242

戊子清明祭文 244

咏而归--父母临终记忆 247

返本開新：新儒家 283

余英时的意义：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王康、陈奎德访谈录(注 1）.......... 284
一元初透，魂兮归来.. 308
存亡繼絕：先賢往圣.. 311
苍黄不易圣贤心——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 312
正声何微茫——追悼李慎之先生.................................. 413
刘宾雁的遗产.. 419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487
俯仰天地.. 574
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附萨哈洛夫纪念诺贝尔演说）.................... 575
他們的悲劇，我們的宿命...................................... 614
七八一届，归去来兮.. 621
我们的精神坎陷.. 622
“一錢不值、使我厭惡的東西”.................................. 627
惟有太息，惟有沉吟，惟有祈祷.................................. 642
心中的苍穹.. 648
沉思西部.. 651
通信.. 666
中国问题－－王康与刘宾雁通信录................................ 667
關于作者及其作品.. 673
北明：布衣孤筆說老康.. 674
北明：王康赴美签证经历纪实.................................... 679
余世存：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 688
梁珍：让江泽民害怕的凤凰女主持和民间学者........................ 693
余世存：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696
崔卫平：距离，距离.. 703
马云龙：我读《６０》.. 710
野夫:六十年必有王者兴——为王康先生花甲大寿及《王康文杂》付梓而贺..... 714
余世存:剥极复见天地心——为王康六十大寿而作........................ 716
毛喻原:感谢王康.. 719

自序

生于一九四九，忽焉一甲。止于何时，天知道。

本欲仿夫子，述而不作。不虞二十年前风雨大作，难忍参文与时，遂入文字外狱十年。东壁西壁，又应景十载，留下拉杂文字数篇。不思自珍，上网，刊行，言说，居然流传。

转眼一甲，尚思尚行尚在，如此帝国。也就临此京都，与之共度本命年。

黄珂有常犒天下之志，以盐喻之。《马太福音》有云：你们是天下的盐……。现在轮到“我们”作化解暴雪之氯化钠，残雪消融也就破晓推窗时分。于是，蒙珂兄美意，承帝京友朋才俊荟萃之盛，与马云龙兄共以 125 岁名义暨天下皆有生，感戴天恩地德，贺此吉日。

一百五十年前今日，新大陆圣者约翰•布朗走上绞架，为四百万黑奴之自由殉身。云龙兄与我或为转世布朗，欲替亿兆黄奴寻觅哈利路亚，亦未可知。

经毛喻源兄拣选、编辑，吾文平添意味。如此，鄙人也有书卷馈友，或置高阁。无意属集，更不称选。天下滔滔，既已沉潜磨练，早已腥浸秽涤，因名之“文杂”。他年有时，坐定著述，或集或选，当念今日座中，气运思临，为吾正式书册之始也。

曾为友人序，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今为己序，言吝字涩。因拜北明、世存、野夫、喻源赐文以壮行，图远且久矣。

2009 年 12 月 2 日

（2010/04/01 发表）

王康小传



图片摄于 2006 年 1 月

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 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 1957 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 50 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 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此文于 2006 年 04 月 13 日做了修改

最新上網

二〇一〇年新年致意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可阻挡地来到了。

我心中充满感念，祝福，却忧患日重，宿命弥深。但决不放弃，决不自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负担，为祸为福，是否是泰，主要取决我们自己。

这是前所未有的抉择：邪恶帝国还是文明共和，历史破晓还是长夜难明！

玉石俱焚的沉船，还是自由与奇迹凯旋的方舟？

我不相信，产生了孔老孟庄无数圣哲天才的神州，会殒灭于秦火毛坑，

能感通耶释康爱的华夏，竟将沦为万劫不复的物类，

随俄罗斯先知诗人临近弥赛亚的中国，肯忍狼奶蛇汁毒化久远！

我们是在浩瀚寰宇中孤独运行了千世万祀唯一被赐神恩与灵性的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

我们不稀罕成为让世界侧目、蔑视、厌恨、畏惧、费解、头疼的暴发户强者，

仁慈，悲悯、宽厚、同情、理性、谦恭远胜最强大的物质帝国，

真诚，善良、美丽、信仰、希望、博爱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原则和基石，

中国没有剧本，何去何从，请自今日始，请从足下起。

天风地气，乾旋坤转，沉钟盈耳，一元初透。新年好，新的悲伤好，新的尚未飞临的雏雁好……

2010 年 1 月 1 日王康拱手重庆

此文于 2010 年 04 月 03 日做了修改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序《艺术帝国》

世界的殒灭和万物的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人类并不因为科学史观的这一理性推导而放弃生命，放弃浩瀚环宇中这一最悲怆最壮丽的精神日出。

如果世界末日果真来临，在洪水、火山、地震、海啸恣意肆虐之后，在太阳率领众星突然逼近或陡然远逝、天地霎时炫目灼热或黯寂酷寒之际，那最后一名存活者，当他向这个曾经美丽如画的荒芜星球投去最后一瞥、跪下来为人类的大限和造物的无常祈祷时，法力无边的大自然也许会突然停止那毁灭性的工作，——它真的忍心毁灭这穿越千秋万载、按照它的旨意和尺寸建立起来的艺术帝国吗？它真的敢于无情地熄灭这薪传于它、比它更灿烂辉煌的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吗？

上帝也无权违约。人类诞生于世，并不仅仅为了受难和死亡。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但他们从未完全背逆与上帝之间那份庄严的约定，用源诞于宇宙深处、流布万方、使生命之花绽开芬芳的创造精神来赞颂并照亮万物，来点燃最寂寞最孤苦的或遗世独立的高蹈之士、或断绝抚慰的弃婴心中那早已幽闭或从未敞开的世界。

人类的真正危险是悖逆自然。惟有艺术——我们与自然母亲万古不涸的脐带——能确保充溢大千世界的光彩、节奏、速率、天真、善意、美丽、爱恋、欢乐和神圣常在我们心中奔泻；惟有艺术，能使我们不致彻底堕落为物类，能使我们无论如何不离弃人之为人的本源；惟有艺术，能鼓舞我们在洞悉人世的苦难和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坚持讴歌人类生命的绚烂和精神的永恒；惟有艺术，我们才有望乘上拯救之舟，纵览沧桑流程的惊涛骇浪，驶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次开端的伟大彼岸。

将一套沐浴着希腊、罗马的古典光辉、基督教及其嬗变形态的沉思氛围和欧洲文艺复兴云蒸霞蔚的建筑和雕塑艺术画册标榜为“艺术帝国”，反映了编者对西方艺术精神的偏好。就严肃的学术眼光而言，这种偏好已不是西方艺术史家的主流。事实上，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阿巴特•兰齐的《意大利绘画史》、雅各布•比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伊波利特•泰纳的《艺术哲学》、约瑟夫•斯齐古夫斯基的《东方还是罗马》到札洛蒙•赖纳赫的《阿波罗艺术史》、贡布里奇的《艺术的故事》、艾黎•福尔的《世界艺术史》、热尔曼•巴赞的《艺术史》以及为数更多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史家都早已超越西方的狭隘，而从席卷世界的诸种文明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艺术浪潮中去憬悟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在此意义上，古往今来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艺术家

早已实践和表现了“四海一家”的人类情怀，他们比其他发明创造者更深地诉求于人类灵魂和自然万物的无穷形式，他们是已知世界中最早致力于“全球化”的先驱，他们缔造了一个最庞大最古老的帝国，它几乎是唯一可以体现人类共同本质、增进人类彼此发现、彼此依恋、彼此激赏、彼此启示而消解人类猜疑、忌恨、仇杀和征服的原始本性的精神家园。它的不朽原则是：和谐；它的世袭精神是：自由；它的不二法门是：创造；它的终极彼岸目标是：拯救；它的天然寇仇是：专断；它的万古合法性是：仁爱。在此意义上，“艺术帝国”是一个人类自我认同、互相净化、不断超越、臻于不朽的伟大时空。

有些民族，天生不会计算日月星辰运行方程式，不擅思辨和推演；另一些民族，则世世代代恪守着各种禁忌，耽溺于把生命提炼成证明宇宙伟大定律的范本。然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没有一种伟大文明，它所哺育的艺术家，不同时是大千世界的伟大解读者，又是人类情感使徒般的忠诚门人。

高度入世、讲求效益、深谙实用之道的当代中国人正在物质和经济发展方面斩露头角，中国独特的形上哲学似乎在继续式微，西方宗教关怀的积极内蕴至今无法在东方得到回应，而真正令人焦虑的是，体现生命本色、激情和过程的艺术创造力，使一个民族愉悦、惊讶、高贵、神圣的生命自身的艺术升华，让每一个人充量实现其个性、证明他本人就是宇宙间最大的不可或缺的奇迹之一而令他感动不已、幸福不已的艺术体验、冲动和创造，还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愿意生死与之并重新焕发原创活力的内在母题。

公元前 776 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诞生。各城邦签订了“神圣休战”协定，庄严宣告：奥林匹克是和平圣地，禁止任何暴力进入。从此，每当奥运会开幕，都有三名竞技者在万神之王——宙斯祭坛前点燃圣火，四处传谕，停止一切杀伐征战。

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已经燃烧了无数个世纪，中国的天才、大师和巨匠曾以夺目的光华烛照东方。中国又在全力申报奥运会，谨借《艺术帝国》面世之际祝愿：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日，便是中国伟大的人文精神开始复兴并与人类精神的奥林匹克圣火交响辉映之时。

大迟 2000 年 10 月 18 日

（2010/04/03 发表）

俄羅斯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

編者按：

本文就是據 2008 年 3 月香港媒體報道引起江澤民先生震怒的那個演講文本。據悉，江先生將這次演講從頭看到尾，深受震撼。這位自以為了解蘇聯的共產黨人無法認可蘇俄時期的烏托邦面紗之下的真實狀況，他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言論管制和偏執獨裁卻令人不齒：僅僅因為直言道出他所不了解的蘇俄真實歷史，就下令不許演講人再踏足"鳳凰衛視"，而這個電視臺"世紀大講堂"的主持人曾子墨女士也遭受牽連，被迫撤換。據知，演講人王康先生於 2006 年起曾三度應邀做客鳳凰"世紀大講堂"，就蘇俄問題發表長篇演講，（其中兩次根據演講整理的文字稿，已先後以"俄羅斯道路"和"俄羅斯知識分子給人類啟示"為題，在這個作者的文集中刊出）。據坊間傳聞，鳳凰高層管理人員因此曾經反復遭到"上方批評"。本次演講與 2007 年播出後，接到上方直接批評和明確指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作罷。本次刊出的這一被禁演講文稿依據原始錄音整理，基本無修訂。唯一不同者是，鳳凰衛視在後期制作中所刪除的演講內容，在這篇文稿中全部加上了。

==

一，公开信时代

2006 年冬，英国捷克裔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乌托邦彼岸》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上演，场场爆满，历史数月不衰。描写了十九世纪激荡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上空的革命风云。全剧时间绵延，从 1833 年直到 1868 年；场景辽阔，莫斯科、巴黎、德累斯顿、尼斯、伦敦、日内瓦等名城相继展现；人物众多，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格、科苏科、琼斯，马克思最后出场，他对赫尔岑、屠洛涅夫不屑一顾，以独白的方式预言俄国的未来："会出现最后的大搏斗，历史的车轮的将最后一次转动，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在俄国流行，几百万人被中断的生命和并不伟大的死亡将被理解是一个更高等级的现实、一种更优越的道德的一部分，想要阻挡它是没有理性的。我能看到涅瓦河被火光照亮，河水变红，从喀琅施塔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滨，到处是挂着尸体的大树。"赫尔岑抗议道："这个对人类祭品欲壑难填的辩证主义怪物是谁？是历史没有目的！没有剧本。历史每一刻敲响上千扇门，看门人都是机会。除了艺术和个人幸福的夏日闪电，没有别的安慰可以指

望……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有可能，就是这一点，给了我们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马克思已经兀自走开了，撇下赫尔岑，他的妻子纳塔莉最后以女性的直觉惊呼：暴风雨就要来了！对俄国向来漠不关心的美国公众四处抢购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

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500年前，托马斯•莫尔发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鼓吹乌托邦人三大法规：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对权力和财富的蔑视。1533年7月7日，莫尔被英王亨利八世定为判国罪，英国法律史和文明史最丑恶的判词。“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353 年后，1886 年，天主教会为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把他列入“殉道者”，追封为圣徒。

从《圣经旧约》开始，到柏拉图《理想国》、圣奥古斯丁《上帝城》、康帕内拉《太阳城》、培根《太西洋岛》，从大同世界到王道乐土到桃花源到太虚幻景到太平天国，古今中外乌托邦方案不胜枚举。乌托邦总与鲜血相连，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基督教耶酥十字架。

乌托邦是一种极为虚幻、巨大、无形，无数人参予的神秘秘存在，公开信（有时是书简、传单、演讲）则是一种十分具体，个人化的，可以触摸、展读、收藏的文字形式。两者之间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当一个社会终于出现历史破晓时分的黎明，或当一个国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热和浩劫时，当乌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时就是公开信应运而生的时刻。

当自由久久不能降临，正义迟迟不能伸张时，公开信成为社会良知和历史正义的特殊使者。

当自由还没有君临欧洲时，但丁、拜伦、弥尔顿、伏尔泰、雨果作为时代的良心和乌托邦理想的代言人，不断以公开信的方式抨击专制黑暗，呼唤理发和人道，左拉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1897年，左拉在法庭面对骄横的法国总参谋部和整个军界

以及狂想的爱国主义者，为德雷福斯辩护。他的誓言早已成为法兰西世世代代引为骄傲的历史回响：

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及信誉作保证！面对代表人类正义和国家具体化身的裁判席，面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以我40年工作的经验和所换取来的信誉，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假如德雷福斯不是无辜的，愿世界万物化为乌有，愿我的作品腐朽。我现在仅有的只是崇尚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我相信我能克服这个难关，我决心不使我的国家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在这里，我可以被判罪，但是我相信法车感谢我曾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

当种族歧视折磨着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之邦时，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前对美国贡献了他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甚至现是不平等的密西西比，也能变为自由与平等的绿州。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仍然对黑人活动横加干涉的阿拉巴马州，就在其统治者拒不取消种族歧视政策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将能够与白人儿童如兄弟姊妹一般携起手来。

当世界各大国陷入核军备竞赛，人类在核阴云笼罩下面临集体毁灭的时候，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罗素向美、苏、英、法、中、加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中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最适合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

普希金在阅读《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上帝一直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评论说，这是整个 19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俄罗斯在20世纪的叹息和祈祷。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是比 988 年基督教传入俄国更重大的事件，1492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都主教左西马致信伊凡三世称，莫斯科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东正教帝国的新首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宣布莫斯科是新的罗马，是罗马和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莫斯科王公们从此被赋于一个崭新的使命，把俄罗斯建成新的基督教帝国，新的黄金时代从此属于俄罗斯，上帝的意志从此降落在莫斯科。伊凡三世征服喀山后正式自封为“沙皇”，即把罗马凯撒和蒙古大汗结合起来的世界新兴国家最高统治者称号。

但是，俄国的历史现实每天都在玷污这一使命。征服、战争、入侵、暴力一千年来一直主宰和塑着俄罗斯。

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十二月党人后，广施暴政，利用警察、宪兵、禁卫军和官僚机器把俄国变成一个戒备森严的大兵营，对外与波斯和土耳其交战，又出兵华沙，扼杀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跻身于欧洲列强之林。俄国御用文人陶醉于这个貌似强大的祖国及其统治者，鼓吹俄国的盛世已经到来，连普希金和别林斯基也一度失察，认为俄国中兴有望，尼古拉幸臣本肯多夫把官方的观点概括为三句话：俄国的过去令人惊叹，它的现在无比辉煌，它的未来必将使最大胆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 年 9 月 30 日，《远望镜》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刊登《哲学通信》第一封。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封公开信，拉开了长达二十年的关于俄国历史性质、道路和命运的大辩论的序幕。这封信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对俄国历史、民族命运、宗教和现状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抨击，自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来郁积在俄国精英内的苦痛和愤懑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泄。恰达耶夫的原则是：我宁愿鞭鞑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让她蒙羞，——只要不说假话。

恰达耶夫这封用法文写成、由别林斯基译成俄文的书信体文章指出，俄国的历史最初是残暴野蛮，然后是愚昧无知，接着是令人屈辱的异族统治，这种统治精神又由我们民族当局沿袭下来，这就是俄国青春期的辛酸史。

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

这个民族中有过一个精力充沛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我们来到世间好像一群私生子，没有家世，没有遗产，同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毫无关系。俄国文明最可悲的地方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国度、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不如我们的民族中间，早已成为老生常谈”。

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的存在仅仅为了给世界提供教训。”他提出了著名的俄国“不言症”，“俄罗斯在道德上出现了空白，人类的普遍法则对我们是不适用的，除了奴役其他民族外，就是自我奴役，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

恰达耶夫盛赞西方，从某种程度上，天国已在西方世界成为现实，因为西方意味着无限发展的可能，凡是为最终建立人间天国所需要的一切，西方无不具备。

恰达耶夫这段雄辩却夸大的对俄国的控拆，是俄国漫长黑夜中放出的第一枪，恰达耶夫对俄国深深的失望痛苦和强烈的自我否定，获得了俄罗斯真实而宝贵的自我意识，是俄罗斯思想发展的独特辩证法，俄国的全部历史哲学都将回答恰达耶夫的问题，正是这种绝望和忧伤，孕育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罗蒙诺索夫的智慧和普希金的天才。

恰达耶夫被斯拉夫派定为俄罗斯祖国的叛徒，正是这名俄国叛徒不仅表达了一半俄国真理，而且刺激了斯拉夫派的灵感和意志。他在《狂人的辩护中》公然挑战俄国人的爱国主义：

“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不是经过祖国，而是经过真理走向天堂。

《哲学通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连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被遮蔽了。俄国上下不分贵贱、贫富、智愚、僧俗、老少，同声诅咒唾弃这个胆敢亵渎俄国的狂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官方组织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地暴力惩罚，俄国文坛和思想界的权威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纷纷撰文谴责恰达耶夫。1836 年 10 月 21 日，外国宗教事务司司长上书指控作者罪不容赦，尼古拉一世直接干预，《望远镜》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流刑，审查官被撤职，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监管，并且勒令他“永不写作”（以这种办法对待持不同政见人士，

开俄国和世界历史先河）。

对俄罗斯人的命运深怀忧虑、甚至预言俄国将在 20 世纪被魔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了大俄罗斯主义特别代表的角色。陀氏的公开信，是他的感动和震撼了无数俄国人的长篇小说。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请不要误会，陀氏是俄罗斯弥赛亚意识最卓越的表述者，同时他也借卡拉马佐夫之口，表达了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复杂关系："一个俄罗斯人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思想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活着，这事实就是：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是不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和世界。""我想去一趟欧洲，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墓地，但却是最宝贵的墓地。有价值的死者躺在那里，墓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载明过去那炽烈的生活，载明他们对自己的功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斗争和自己的科学的热情信念。我知道，我将吻那些石头，并在它面前流泪。"

无论西化派或斯拉夫派，都是俄国最优秀、最有教养的精英，他们对俄国的感情和拯救热忱，都充满着殉道者般的虔诚和彻底。两派都热爱自由，富有人道精神，热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派把俄国当成母亲，而西化派把俄国当成孩子。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虽然激烈，但并不带有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性质，双方也没有闹到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而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赫尔岑曾把他们比作是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共有一颗心脏，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

然而，俄国统治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

俄国民粹派在"到民间去"失败后，走向个人牺牲和恐怖暗杀，同时散发了大量

的传单。“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民竟报》宣言，他们对工人阶级、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农民、马克思，对俄国所有重大问题都以传单和公开信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原则。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致亚历山三大三世皇帝》公开信，原信印在羊皮纸上，投在涅瓦大街邮筒里，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公开信要求一，大赦政治犯，二，由全体人民重新审查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公开信“向祖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旦新沙皇独裁和镇压，民意党人就立即放弃暴力，绝对服从由自由选举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坚持对刺杀其父的民意党人执行绞刑。托尔斯泰夜不能寐，他立即致信沙皇，“在上帝和祖国面前，新沙皇站在十字路口，假如你不宽恕这些罪犯，而处死他们，你只不过在成百的罪犯里连根拔除了三、四个，可是罪恶繁殖罪恶，代替那三、四个的，将是三十个或四十个，而你却要永远失去这个时刻——你将永远离开你本来可以在那里选择善，而不选择恶的十字路口，永远陷入为那叫做“国家利益”的罪恶服务之中。

宽恕！以善报恶，那么，一百个作恶的人当中，成打的人会从魔鬼那里转到上帝这边来，看见一个被谋杀的父亲的独生子在如此可怕的时刻，从宝座上表现出的善的榜样，千万颗心会因快乐和感动而颤动！

皇上！假如你愿意这样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钱，把他们送到美洲某个地方去，然后用“只是我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几个字作标题写一篇宣言，假如你这样做，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可是我，可怜的臣民，愿意做你的狗和你的奴隶！每次听见的你的名字，我都会感动得哭泣，像我现在正在哭泣一样。可是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我知道一听见那几个字，慈悲和爱将像洪水一样涌出，流遍俄罗斯。

亚历山大三世对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置若罔闻，五名刺客被判绞刑，不难推测，作为弟弟的列宁在 1918 年捕获尼古拉二世后，为何要把沙皇全家处死。

后来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

与 1887 年 3 月 1 号被捕，5 月 8 号被绞死。

俄罗斯弥赛亚救世精神在 20 世纪初被彻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乌托邦永远成为历史，同时，一种新的，据称是真正神圣的弥赛亚主义、真正伟大的乌托邦，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在我的历史视野中，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是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上在俄罗斯进行的，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一半人类都深深地卷了进去，其中包括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 年的十月革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并且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了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人们料想不到，到了 20 世纪末，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新俄国的新弥赛亚主义与旧俄国一样，甚至更是一场血腥的乌托邦。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面临内战、饥荒和西方国家武装干涉，同时面临来自共产主义者内部的置疑。

1918 年，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发表《论俄国革命》指出，“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怖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干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列宁对卢森堡的回答是，所有欧洲革命家在俄国革命面前都还是小学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921 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 9 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

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 9 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 9 日已不远了。

列宁的回答众所周知，考茨基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列宁在苏联创建“第三国际”。

列宁最恼怒的，是被孟什维克抨击为“乌托邦”，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与老战友索罗蒙发生过一次经典的“乌托邦辩论”。索罗蒙对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给俄国造成的和将要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列宁以他特有的雄辩回答：

这里没有任何乌托邦，而是正在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俄罗斯将是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啊，你在耸肩膀！不过你会更加吃惊的！问题还不在于俄罗斯，对俄罗斯我并不在乎，这仅仅是一个阶段，我们正在通过这个阶段走向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以公开信方式对俄罗斯未来表示担忧的，正是列宁本人。1922 年 12 月 23 日，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系列信件，提出，为了防止布尔什维克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列宁是先知），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为什么没有办到？），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岂止于此!），“又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莫名其妙!），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对于整个国家呢？）。列宁认为，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岂止于此!）。第二年 3 月 5 日，列宁还给斯大林一封私人信件，要求他就辱骂克鲁普斯卡娅一事进行歉，否则断绝个人关系。

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无法推论，如果不是斯大林，而是一个如列宁所愿，一个“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布哈林，俄国革命的前途会是什么样。

列宁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他肯定想不到，斯大林的统治，把俄国带进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苏共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写下《让历史来审判》，副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83 年 1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订价 3.75 元，内部发行。2005 年 12 月，东方出版社再度过出版公开发行，订价 72 元。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启蒙书之一。

我是一个十分健忘的人，但《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关于俄国苦难和罪恶、尤其关于天文数字般死亡的数字，仍然使我难以忘怀。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 27 名中央委员，约 20 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 7 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连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政府”）15 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 5 人过早故去外，其余 9 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从 1919 年到 1934 年全部 31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 20 多人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捕，139 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110 名被处决或自杀；俄罗斯各州执行委员会 90%遭到破坏；1934 年乌克兰 45 万党员到 1938 年减少到 28 万；格鲁吉亚共产党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 644 名代表中有 245 人被捕；白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决。

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 4 名一级指挥员中的 3 名、16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5 名、12 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 12 名、57 名军长中的 50 名、28 名军政委中的 25 名、64 名师长中的 64 名、97 名师政委中的 79 名、397 名旅长中的 220 名、456 名团长中的 401 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 35000 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灭了。无论哪

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众多在莫斯科避难、受训、工作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们是：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贝拉•库恩、波兰共产党总书记万里昂•列申斯基、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贝格利曼•安维尔特、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别尔津•伦茨马尼斯、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阿•苏尔坦、墨西哥共产党领袖戈佩斯、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印度共产党领导人穆克尔德日、恰托帕德赫亚，大批意大利、土耳其、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荷兰、美国、巴西等国的共产党干部都被镇压身亡。1939 年 9 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条约之后，斯大林把被盖世太保追捕逃到苏联避难的约六百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交给了希特勒。（其中一部分竟幸存到战后，而留在莫斯科的近二百名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却全部被处决。）

1917 年曾在拉兹里夫的草棚中掩护过列宁的彼得堡工人叶梅利扬诺夫、同年护送列宁从德国转移到俄国并为掩护列宁生命负伤的瑞典共产党著名活动家普拉廷也未能逃脱逮捕，后者坐过沙皇俄国和贵族罗马尼亚的监狱，在佩特留拉的刑讯室受过刑，关过科夫诺的苦役要塞，还被关押在柏林的矛比特和瑞士的牢房。但是，这位有大功于俄国革命、久经考验的欧洲革命家却死于苏联卡尔戈波尔集中营，他在这里锯板条和编筐子，并忍受严刑拷打，直至咽气。

请允许我把作者在 1989 年再版前言的话引用如下：

伊•爱伦堡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到伤害的是思想还是人？不，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是我这一代的人。"

这个说法不对。斯大林时代的违法行为既对人也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给以沉重的打击。凡是珍惜这一思想的人，凡是不愿意看到牺牲于残暴专横下的千百万人的死亡在我国历史上仍只是一场无谓的悲剧的人，都应当克服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后果之一——害怕说出真相。

麦德维杰夫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斯大林暴政对俄国一个世纪的理想和欧洲几百年的乌托邦的理想的毁灭性打击，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遭到沉重打击。

在斯大林主义最残暴的 1937 年，不断有党内高层人士以公开信方式与斯大林绝裂，虽然绝对不能阻挡俄国悲剧，但仍有特别的历史文献价值和道义价值。

1919 年入党、红军最高军事指挥中枢负责人之一——军事工业研究所所长、1937

年在欧洲负责办理苏联军事订货的克利维茨基将军在巴黎发表《公开信》，声明：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秀代表被作为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暗探”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和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像对付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的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的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巴尔明致信给《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声明：

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为了那些至少至今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对那些假造出来的，卑鄙的指控表示抗议。现在我在想，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天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

1937 年 7 月，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英雄、191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海军副人民委员、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员、苏共著名政论家、外交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获知他已被宣布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后，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声明：

斯大林，你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

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转木马上转圈……

乌托邦的降临总伴随着无尽的期待，欢呼，激情，勇气，牺牲，乌托邦的消失则留给世界长久的沉默、衰恸和失望。

列宾的《不期而至》曾经让无数俄国人热泪盈眶，但是当几百万斯大林的牺牲品从监狱释放回来时，前苏联竟然再也画不出一幅可以接近列宾的作品。

请以列宁在其遗嘱中称誉过的俄国最大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布哈林为例。

布哈林，这位苏联十月革命最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首席发言人，苏联党、政府主要决议和正式声明的权威起草者，《真理报》、《消息报》主编，苏联科学院创始人，苏联宪法主要撰稿人，苏联共产党的权威经济家，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卓有见树的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派的领袖，能深研康德和歌德的德文原著、能用法文直接朗诵莫里哀和孟德斯鸠、能以拉丁语解读荷马和凯撒、还能借助古希腊语欣赏埃斯库罗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博学多才的旷世奇才和大知识分子，这位曾多次坐过沙俄监狱、在欧美各国流亡多年的革命家，这位亲近自然、热爱生活，在博物学、昆虫学和绘画艺术上造诣颇深，在早期革命家中，除列宁外，最有人文修养、最有人情味、最富人道精神的“全党所喜欢的人”，竟然惨死在鞋匠酒鬼出生、只读过几年神学院、犯有刑事前科、只短暂地出过一次国门、不懂一门外语、对欧洲文明和人类社会几乎惘然无知的斯大林手里。

1938 年 3 月 15 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布哈林与其他 17 名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内务部地下室被枪杀，他们是挺着胸脯，站着死的。临刑前的布哈林早已对年轻的妻子口授了他的最后遗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这部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

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呼吁，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中还应包括这一项义务：

驱散滔天罪恶的乌云，它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越来越嚣张，象火焰一样越烧越旺，以致窒息着党的生命。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消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我的党籍。

布哈林死后，他的遗孀安娜•拉林娜在水牢里被关押了六个月，然后在劳改营和流放地呆了 18 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惨遭杀害、被毁尸灭迹 23 年后，拉林娜和离散多年的儿子尤里才首次向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申请，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赫鲁晓夫屈服于国内外压力，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位良知未泯的苏共总书记晚年曾为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过后，1977 年，他们再次向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请，再次被拒绝（1965 年，列宁的战友和秘书斯塔索娃和另外几名老布尔什维克曾致信苏共中央，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们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复）。

1978 年 3 月，布哈林惨死 40 周年前夕，绝望中的拉林娜让儿子转向意大林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请求这位欧洲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英国“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很快收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一场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开始了。欧、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为他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苏联当局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又过了 11 年，1988 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后一次向苏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最后一任总书记）致信：“…我提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时，他已预感到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知’。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的力量，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

1988 年 6 月，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之，该学期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出版的《消息报》热烈赞扬该项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1988 年 2 月 4 日，布哈林诞辰 100 周年、蒙难 50 周年之际，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 月 10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 月 21 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党籍。

1987 年 11 月 7 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1989 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试验已告失败。

在无尽的惊愕、茫然、惆怅、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遗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两幅油画，克里米亚的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积雪的群峰。将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难、期待，将近一百年的奋斗、牺牲、悲剧，到来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再请以一桩与末代沙皇和列宁本人有关的历史为例。

1918 年 7 月 16 日，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向乌拉尔叶卡捷琳堡苏维埃和赤卫队下令，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们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长女奥丽加、二女达吉亚娜、三女玛利亚、小女阿纳斯塔西娅、幼子阿列克赛以及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诺夫。

1918 年 7 月 16 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ー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

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在斯大林死后，到苏联解体的 48 年中，俄国最有良知、勇气和智慧的人士，一再以公开信方式，对苏联最高当局和整个国家，提出告诫，发出预言。

1971 年 3 月 5 日，苏联氢弹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致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客观精神，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原则性意见，最后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 20 世纪整个世界危机的一些方面密切相关，这些危机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不久以前的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等等。基于我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1973 年 9 月 5 日，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公开信，这位从古拉格群岛奇迹般生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与中国的战争、文明的绝境、俄国的东北部、意识形态、出路等重大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从十九世纪传入俄国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让它继续向东方吹吧（他不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俄国人为此付出了 6,600 万人的生命！他告诫说，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要遭殃，大帝国的自己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他最后说，"我今年也 55 岁了，我所走过的许多道路证明：我不重视物质享受，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生活感受对你们来说是不寻常的，你们可以观察。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更大了。

从历史的进程看，苏联解体后的危机比 1917 年的危机更加深刻，更加严重。九十年前的俄罗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一个多民族国家还能够维系，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特性、宗教和社会生活、信仰、伦理和传统还存在，东正教还有力地寄托着亿万俄国人民的灵魂，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正从专制主义的枷锁下挣脱，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和道德上还非常纯洁、高尚，拥有巨大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农民、市民、商人和工业家还保持着纯朴、同情心和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俄国的军人还准备为祖国上帝而战。74 年的血腥乌托邦，实际上把曾为世界贡献了无数天才和大师，为弥赛亚救世主义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俄罗斯连根拔除了。

像苏联这样一个拥有毁灭世界的核武库的专制国家，它的崩溃，竟然没有带来世界性的震荡和末日般的大战，我们只能认为，几百年间俄罗斯对真理、正义、善和救赎的精神存在。俄国的先知、圣徒们共同书写的公开信，无论是丢在邮筒里的羊皮纸，还是地下状态的手抄本，还是在外国发表的印刷体，无论是传单、通信、口授、心口相传还是那些被查抄，被焚烧，甚至只在喃喃私语和半夜梦话中对俄国的忧伤、失望、期盼、祈祷、祝福，无形而有力地支撑着俄国，孕育着新的俄罗斯。

乌托邦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中，不会因为蒙受血污而殒灭，只要良知、性灵、勇气和智慧尚存，公开信就永远会出现。

1989 年，萨哈罗夫去世，1994 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久别二十年的祖国，他们的警告和预言一一应验了。索尔仁尼琴最后公开提出的希望是：

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然而，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闪耀着真正的光辉，千万别让它消失……

（原載《人與人權》2007 年 4 月）

（乌托邦与公开信——俄罗斯弥塞亚救世精神的另类解读全文完博讯 www.peacehall.com)

老索，中国的精神盟友？

近 40 年，索尔仁尼琴一直是对中国精神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同时，老索也是两百年来对中国最隔膜，最冷漠，乃至最反感的俄国文豪。在中俄两国九十年间因地缘和历史误读造成的世纪宿命中，老索与中国在精神上的特殊联系，随着他的去世，已经成为一则永远的孤例。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自由精神代表人士都对东方报以欧洲式的好奇、同情乃至神往。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精神巨人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古老也更文明的国度。尤其在托翁的世界视野中，中国是一个保持着淳厚道德和善良风俗并蕴藏着人类拯救契机的伟大时空。孔子、老子与佛陀的相互尊重和融合，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兄弟之爱。这位“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著名信徒，花费了相当精力直接阅读和翻译孔、老，寄寓着俄国面向西方的迷惘之后精神上的另一种转向。

十月革命在改变俄国自身命运及其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大幅改变了俄国的中国视野。十九世纪俄国的西化派自由知识界曾把中国看成是比俄国社会更落后、更野蛮的国家。认为在西方面前，俄国是被启蒙、被提升者；在中国面前，俄国则是前驱和拯救者。因为革命、战争以及诸种历史错位、尤其《凡尔赛合约》对俄、中两国发生的截然不同的影响，俄国真正成为了中国的精神导师和历史榜样，并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宿命式的影响至今犹存。老索作为中国的特殊精神盟友，只有在两国命运的大背景下才能大体看清。

现在，连最顽固的毛派人士都不否认，毛主义在源头上出自斯大林主义，远甚于对秦始皇的继承。斯大林主义在空间和气质上本来属于俄国历史本性的亚洲部分，本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西化派的全盘反动，也是对俄国与西欧主流历史的叛逆与否弃，是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与亚细亚专制主义和马基雅维里暴民政治恶性结合的新型列维坦怪物。其历史脾性和精神气质正好投合于近代以来更为黑暗、走投无路的中国。俄、中两个最后解体的欧亚大帝国都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以面对西方的挑战，并维护自身文明的常道。在某种意义上，俄中两大民族只能借助出自西方、又属于西方主流正脉文明异端的思想体系，——历史正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场空前的革命、篡夺和复辟来换取自身存在的權利。

当老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东普鲁士战壕里开始怀疑约瑟夫的指挥才能时，毛泽东还在延安窑洞里，筹谋对国民党的僭越；当老索因其最初的怀疑而身陷囹圄时，中国左翼知识界正把毛泽东当成大救星；当老索身罹绝症并进入对斯大林暴政的正式抗衡时期，中国知识界却因一场现代焚书坑儒而遭犁庭扫穴之灾；当老索继承十九世纪俄国天才和圣徒的衣钵公然以笔为帜，向整个苏俄集中营制度宣战时，中国知识界及其子息一代更悲惨而可耻地沦为毛泽东暴政的牺牲品和工具；当老索流亡西方，更深地进入俄国十九、二十世纪命运的精神激流时，中国知识界终于挨到毛泽东殒毙，才迎来某种程度的解冻，却远远未能为中国和世界贡献出一部东方的《古拉格群岛》。1989 年及嗣后的演变证实，老索一个人的作品对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命运的影响，为整个中国文学和思想界望尘莫及。

中国知识界由此陷入一种奇特而可悲的境况。

一方面，老索和萨哈洛夫、阿玛里利克、阿赫玛托娃、麦德维杰夫等人组成的苏联持不同政见阵营以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后不绝如缕的自由精神和反抗姿态与苏俄帝国公开抗衡，鼓舞了整个苏俄社会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国家争取自由的运动，或暗或明地成了中国知识界人士改善自身处境、萌生反抗、追求精神自由的先驱。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和整个西方知识界对老索的特别关注，由于老索从强老营归来后不屈不挠的战士风骨，由于老索巨大的文学才华，以及由于他先知式的流放与孤独，包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惊人相似的面容、眼神和风格，他在中国两代知识人心目中，早已成为一座道德、精神和文学的丰碑。他的作品在无数中国读者的心中激发的共鸣、震撼和启示，甚至超过了全部西方文学大师和中国现代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程度。

作为苏俄“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作为集中营文学的代表，作为与苏俄帝国长期对峙的精神巨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谱系中最具先知和圣徒形象的俄国文豪，对于中国，老索犹如高远雄伟的珠穆朗玛峰。除了官方御用文奴和腐败堕落的文坛群小，中国独立和良知知识界，无人能回避老索巨大而久远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位大耄之年溘然长逝的俄国作家乃是中国最黑暗、最恐怖、最彷徨的六十年间最英勇、最亲切、最伟大的精神盟友。

另一方面，老索至死也没有对中国流露过一丝好意。在他浩瀚的文字、思绪和言论中，中国只是一个庞大而近乎虚无的国度。在老索的中国视野里，毛泽东主义一刻没有离开这片土地。而毛主义正是老索终身警觉、厌恶和否弃的斯大林主义的东方再

版。1973 年在《致苏联领导人》那封代表了老索历史、祖国、命运观的公开信中，他曾专列一部分文字，与其俄国统治者同胞讨论“与中国的关系”。他建议，让马克思主义这股十九世纪从西方刮来的黑风继续吹向东方，巨人般的俄国拥有一千年的东正教，马克思主义使俄国丧失了六千六百万条生命。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虽然老索强调，他并不希望中国在精神上毁灭，但是他毕竟是俄国人，他只能首先为自己的祖国考虑。他还建议苏俄统治集团，无论如何要避免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所有的优势：不怕死，吃苦耐劳，服从命令，数量巨大的军队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民战争，都不在苏俄一边。与中国开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

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会感到轻松。但是，老索道出了一个十分阴郁、也十分真实的历史秘密。深知斯大林主义残忍本性的老索，比所有西方知识分子更能直觉地预感到东方的危险。他对中国的恐惧，是真实不虚的中国现实，且一再被历史证实。尽管老索的中国直觉丝毫不能缓解中国的悲剧，他却成为中国自我认识的罕见的他山之石。

事实上，从 1974 年到 1994 年的 20 年间，俄国与中国都发生了历史性、戏剧性地演化。不难理解，老索一如既往甚而更加紧张而焦虑地关注着俄国。作为二十世纪苦难俄国的代言人，老索天然属于大俄罗斯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与陀氏和托翁一样，在老索身上，对俄国的爱、关怀和希望，同时也是对世界的爱、关怀和希望。毫无疑问，俄国的崩解不符合老索的俄罗斯理想，他的心灵充满迷惘、痛苦甚至愤怒。他对叶利钦本人的责难、对普京的赞誉不一定为西方所称道，在中国人听来则难置可否，但肯定体现了老索一以贯之的俄国情怀。

不能设想，老索对中国二十余年的变化完全没有兴趣；更不能判定，这位终身反抗极权专制和人性之恶的老战士，已经失去观察和思考中国命运的能力。人们也许无法深入到他内心，了解他对俄国以外的当代世界的真实看法，但根据他一生的著述和命运可知，他对中国的演变，绝对没有中国官方知识界和西方左派那种乐观的结论。身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和珍视人类心灵自由的先知，老索不可能对专制依然而徒有经济增长却普遍腐败堕落的中国报以认同和希望。相反，以其对人类秉性独特的洞察，对专制主义的厌恶，他会一如既往，为中国在精神上的黯淡和灵魂上的麻木而忧心忡忡。

中国在其多难而悲剧史诗般的现代历史中，曾有不少精神上的盟友：托尔斯泰、

罗素、爱因斯坦、杜威、泰戈尔、萧伯纳、费正清、李约瑟、雷鸣远、马悦然……，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结论未必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他们都是中国当代自我认识的异域因缘。他们那份中国感情本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美丽果实，他们与生俱来的善意、同情心、客观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为自由、信仰和博爱垂降于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所作的努力，乃是世界对中国的恩赐，远比中国统治者及其奴仆对本国同胞施予的野蛮统治高尚、伟大得多。

中国在面对这些精神盟友时，应该反忖。我们自己对得起他们的良苦用心吗？我们在精神上也同样逾越了种族、国家和狭隘、冷漠、仇恨吗？我们曾经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接纳并回报过那些不带偏见的谠论和体现人类神圣之爱的伟大精神吗？

老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中国人民反抗极权主义和精神黑暗，走向自由和光明的苦难历程中，老索的沉默和冷漠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对中国如此，对他本人则是几乎难以理喻的失职。但是，即或没有一句对中国自由运动的赞誉之词，他仍然是中国伟大的精神盟友。在面对共同的邪恶和黑暗的前所未有的较量中，老索及其他俄国先驱所跋涉的路径，将长久地成为中国走向自由和拯救的并行之道。中国众多精神盟友中，老索的身影永远属于先知、圣徒和殉道者之列。

据说，他在流亡时期，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学习中文。也许，他把对中国的理解和希望托付给了年轻的一代。

2008 年 8 月 26 号华盛顿近郊

（原载：《民主中国》）

老索，是时候了

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今天在宾夕法尼亚采访两位二战老兵，一位 87 岁，一位 88 岁，都耳聪目明，应答如流，且衣履规整，一派绅风采。其间又到一家基督教现代建筑，参与有两千信众的礼拜祈祷。不时想起《红轮》的字句：

一切都是为了站在上帝面前的最后一刻。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撇下他的同时代人，割舍了近九十年的俄国，走了。

够意思了。对于时代和祖国，该承受的、该记下的、该说的，他都一一谨办了。还没有一位作家，与自己所属的时空和精神世界，发生过如此紧张而充满诗意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历了死亡、人性之恶和整个俄罗斯被魔化的虚无主义恐惧，他由此预见到俄国乃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堕落，同时也从上帝垂降于俄国的性灵中保藏了弥赛亚救世的秘密。托尔斯泰终身追寻他的“绿枝”，要像哥伯尼和哥伦布一样，企图在沙皇、教会、贵族、战争和一切既定秩序之外去追寻他的上帝之道，他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自己的理想，近代俄国的不幸内化为他个人的“危机”，人的行为与上帝的目的之间，虽然还隔着一道鸿沟，但托翁以其高龄出走的危险，证明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早一位清醒的遁世者，从而为自己漫长而不寻常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索尔仁尼琴是陀氏和托翁的综合，正如苏联是沙俄在新时代新时代的孳变一样，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时除了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就是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

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有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好，神说，您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他们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您站在最前面，您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灵魂并不赞同您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您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您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十九世纪从西欧刮来的“黑风”——马克思主义，最终不能征服巨人般的俄国，俄国有自己一千年的东正教，是它唯一可能治疗苦难的精神秘方；无论如何，俄国理应历史性地回避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一旦爆发，

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浩劫，让中共领袖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吧，让他们去拯救人类吧；最重要的是，您在俄国历史和命运面前，无所作为是最大的犯罪，您在签下自己的名字时说，我对这封信承担所有责任。

1979 年苏联强硬势力企图以纪念老暴君 100 周年为名卷土重来的努力，被俄国良心界击退，乃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事例。您虽然已被驱逐，但克里姆林宫内外到处有您的身影。

自伏尔泰、雨果、佐拉被迎进先贤祠后，欧洲流亡时代宣告结束。俄国在二十世纪创下了政治流亡的世界纪录，众多显赫人物托洛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普宁、茨维塔耶娃……而您是所有苏俄流亡者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人物。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苏联极权主义不妥协的抗议者，您在伯尔尼的空降，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还在继续。

二十年流亡的生涯，您创造了数个奇迹。您在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至今回荡在东西方天空的结合部，美国人民第一次聆听到来自“古拉格群岛”的声音，第一次从一位苏联作家那里，明白了美国自由的世界责任。

您对西方的失望和批评，无法让自由主义人士满意，但您生来不是为了让某些派别满意的。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您对美国的观察。事实上，近二十年在佛蒙特的隐居式生活，您证明自己无力、也无心进入美国这片年轻的新大陆，美国人民对自由和真理的捍卫，没有激发您对人类文明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没有激发您对这片收留并提供了自由和安宁的土地的感戴和回报，您也没有在 1989 年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国家命运表达过应有的关切，这都令人遗憾。如果您读到中国流亡作家郑义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一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您也许会重新思索东方……。

最大的奇迹，您竟然在生前回到魂牵梦绕的俄罗斯。您的回归虽非雨果对巴黎的凯旋，却别具俄国风味。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将长久留下您的热吻。您对专制帝国坍塌后的祖国发出的声音，仍旧充满先知式的睿智：俄国一再陷入泥潭，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国才有希望。也许还要等上几十年、一百年，俄罗斯命运的两大支柱、两大遗产、两大宿命式的负荷：大俄罗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才能被新的民族精神所取代。

俄国在近一千年中衍化的土地境界，俄国三百年来全部雄心壮志建构的庞大国

家，土崩瓦解了。历史对俄国所开的玩笑，前所未有。八十九岁的您，已无力面对，更无力影响劫后余生的俄国。俄国的演变，汇聚着太纷繁太庞杂的因缘，您唯一能做的，正如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更远如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一样，只能为这片盛产天才、先知、圣徒和暴君、刽子手的土地，献上安魂曲和弥撒曲，除了祈祷，您也只能听从至高的主宰。戏演完了，台词和剧本总有落幕的那一页。您起身走了，把空间和未来留给年轻的一代，您比谁都明白，您不能代表没有降生的人们立法。您不能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见证苏俄帝国，为它送终。

无论如何，这是人类现代命运最沉重的一页，您在上面签下名字，这就够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几次差点启程，前往俄国拜见您，多少请您发表对于东方、对于中国的高见。您在美国与刘宾雁们失之交臂，您们有六个年头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拥有相似的背景、命运、话题，您们竟然连招呼都没有打过。

自您返回，又是 14 个年头过去，您对中国不置一词。中国书摊上偶尔有您的消息，都是那么零碎、无谓。

如今，您终于撒手尘寰，造访永不可能。会到墓地与您对视，献上花束。老索，再见。

2008 年 8 月 4 日与华盛顿近郊

（原载《民主中国》）

此文于 2008 年 09 月 20 日做了修改

俄羅斯道路

編者按：

2006 年 4 月 7 王康應香港鳳凰衛視之邀，赴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庁”，以“俄羅斯道路”為題，就俄羅斯地理、政治、歷史、宗教、文學和民族性等話題發表演說。鳳凰衛視在內陸、香港兩度易地審稿，謹慎權衡刪減後，于 6 月 24 日，在“世紀大講堂”欄目對大陸和全球播出。演講雖然作了大量刪減，播出後仍然引起強烈反響。

這裡首次以文字形式發表的，是王康在北大演講的原初版本。本篇文字內容已經作者本人略微充實。文內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為方便閱讀，文字分“演講”與“問答”兩部分刊出。前者是演講內容，作爲正文刊出；後者是演講前後，電視主持人及聽衆與演講者的問答，以《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為標題，以附錄形式，在正文後刊出。

重新解讀俄羅斯的近代史與現實，還原半個世紀以來在大陸遭到誤讀、誤導、誤入的俄羅斯道路，探究蘇聯解體、蘇共下台的深層原因，了解真正的俄羅斯精神與思想特徵，對於中國不言而喻意義重大。大陸翻譯出版界近十年來爲此做了大量的努力。素有“民間思想家”之稱的一介布衣王康先生的這次演講，可以看作是中國民間思想界探究俄羅斯啓示的一次非凡嘗試。其內容之彌舊返新、意義之薹味深長，毋庸贅言，讀者閱後自明。

————————————————————————————————————

一，蘇俄近代狀況略述

1，俄羅斯的世界地位：冷戰時期唯一與美國叫板的國家

1844 年，俄國和美國，還有 20 年時間才能廢除奴隸制，法國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就預言說，將來有兩大民族，美利堅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它們的出發點不一樣，道路各異，但是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最終它們要分別地主宰人類的一半。20 世紀以罕見的曆史規模和清晰的世界圖景驗證了這一非凡的預言。俄國和美國在 20 世紀，它們確實（各自）主宰了人類的一半。

俄羅斯比美利堅更富有戲劇性，更使世界震驚，更值得咱們中國來關注它。俄國一直是人類的希望，在 20 世紀，尤其後半葉。俄國的曆史成就，舉世皆知，它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它把一種新的人類拯救的意識帶給世界，它用 30 年的

時間完成了西方兩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它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太空，它的核武器足以毀滅人類 50 次，它的國家元首可以在聯合國的大廳把皮鞋脫下來，敲打桌面，和美國叫板，它可以把導彈直接運到美國的後院——古巴，它的醫療保險，它的退休養老，它的國民教育，它的奧運金牌，它的芭蕾舞，它的電影，讓整個西方黯然失色。蘇聯，前蘇聯，它是人類的希望，它不僅僅吸引了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而且它吸引了西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英國的戲劇大師簫伯納，科幻小說的鼻祖威爾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鼻祖約翰.杜威，大作家德萊塞，法國科學家若裏奧•居裏夫婦，包括愛因斯坦，畢加索，他們都對俄國神往，有些還前往俄國，像朝聖一樣。

俄國在精神上、道義上、思想上戰勝西方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70 年，蘇俄五大航母集群同時在世界五大洋巡弋，以紀念蘇聯締造者誕辰 100 周年。這樣一個光芒四射、以解放人類爲己任的國家，這樣一種開創著人類新文明、代表著新世界理想的制度，其壽命怎麼也不會比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贊庭帝國和奧匈帝國更短暫。但是前蘇聯沒有被 14 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圍剿扼殺于襁褓之中，沒有在希特勒德國巨大的戰爭機器面前崩潰，而是在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幾乎處于巔峰狀態時候，幾乎在一夜之間戲劇般地崩潰了。蘇俄再次轉向，再次改變了世界曆史進程。在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間，無論怎樣估計蘇俄興亡造成了世界性影響，都不爲過。

2，二十世紀：蘇俄史上需要懺悔的世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蘇聯的變化令人眼花缭亂。從 1988 年開始，大規模地爲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數百萬死于斯大林及其同夥之手的老布爾什維克平反昭雪；1994 年在二十年流亡之後，俄羅斯唯一活著的文豪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回到祖國；1998 年 7 月 16 日，在烏拉爾葉卡捷琳堡興建了又一座東正教“鮮血耶酥基督教堂”。第二天，在聖彼得堡彼得－保羅大教堂，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亞曆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及其全家的葬禮，在莊嚴的聖歌和肅穆的祈禱式中隆重舉行。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葉利欽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靈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爲“俄國曆史上這極不光彩的一頁、這一無恥的、毫無意義的暴行”忏悔。這位十年前還位居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市委書記之尊的“民主俄羅斯之父”向曆經磨難的俄國社會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強調，安葬犧牲者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

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爲共同參與的暴行贖罪；二十世紀是俄國失去和諧的世紀，血腥的世紀，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羅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種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寬容和融合，才能終結這個世紀。必須把曆史真相告訴後代，讓他們自己去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1993 年 11 月 30 日，俄羅斯決定采用五百年前伊凡雷帝時代的雙頭鷹爲國徽，取締十月革命的鐮刀斧頭型國徽。同日，俄羅斯采用了新國歌，在“神聖俄羅斯”後，再次出現“俄羅斯，我們神聖的祖國”。結束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這個沒有土地、民族和祖國概念的國家稱謂。象征著俄國正式退回到曆史、地緣和民族的軌道。

3，蘇聯解體的內在邏輯：歷史命運與民族精神

對俄國的崩潰，蘇聯的解體，有不同的說法。簡單來說就是兩種，一種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長期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那些共産主義的叛徒們出賣了蘇聯。我認爲不是。有一種更爲深層的、更爲強勁的、更爲堅韌的力量使前蘇聯解體，使蘇共下台，這就是俄羅斯的曆史命運，俄羅斯的精神，它們的靈魂。我們必須要回到俄羅斯的道路上來看，俄羅斯這個民族，它的命運，它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解體這 74 年的前後是怎麼一回事情？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深受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但是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這樣受到它的地理環境的致命的影響，這是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幾乎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擴張同時，俄羅斯人開始了建立統一國家並向東推進的曆程。他們用了近五個世紀，翻越烏拉爾山、喀爾巴阡山，沿著伏爾加河，跨過鄂畢河、葉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亞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後抵達隔著白令海峽與北美大陸對峙的楚科奇半島、虎視東北亞的堪察加半島，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亞。俄國的地理疆界是如此的遼闊，當波羅的海的聖彼得堡夜幕降臨的時候，在太平洋西岸的伏拉迪沃斯托克，黎明才剛剛開始。這種地理環境永久性地決定了俄羅斯 300 年以來、500 年以來的命運。俄國一直徘徊在東西方之間。它不是純粹的亞細亞，它也不是典型的歐羅巴，它既是亞洲，它又是歐洲，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亞細亞和歐羅巴之間，俄國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曆史定位，自己的曆史道路。跟這個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共同推進了俄國曆史的是它的曆史事件。公元 988 年，第一個基督教千禧年之末，俄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基輔羅斯弗拉基

米爾大公和拜占庭帝國聯姻，接受了基督教，把基督教定爲俄羅斯的國教。從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就自命爲第三羅馬。俄羅斯便被某種天命的光芒所籠罩，俄羅斯人開始以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意識去看取東方和西方。1241 年蒙古鐵騎征服俄羅斯，以伏爾加河爲中心，建立了金帳漢國，開始了長達 240 年高度中央集權的兵營式統治，爲俄羅斯打下深深的東方專制烙印。

自從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壽終正寢，莫斯科從此開始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國。1510 年，修道院院長菲洛費夫致書瓦西裏三世，聲稱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莫斯科，宣稱莫斯科已經成爲“羅馬與拜占庭精神和物質遺產的繼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羅馬皇帝的直接後裔，正在實現上帝的絕對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擔任基督教帝國的領袖”。莫斯科的王公貴族、僧侶、外交官和一般民衆，從此開始把俄羅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 年，伊凡開始使用沙皇稱號，這一稱號早已是蒙古“大汗”的同義語。從此，俄羅斯帝國統治者作爲羅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西推進，作爲蒙古帝國皇帝的神聖繼承人向東擴張，就成爲伊凡使用雙頭鷹國徽的天命所在；從此，俄國開始自稱“神聖俄羅斯”。

二，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勝利的人文---歷史環境：

1，俄羅斯的民粹主義與西方主義

A，斯拉夫情結與西方情結

和這種曆史、地理相關的是俄羅斯在 19 世紀，更早，應該說彼得大帝對西開放之後，俄羅斯的思想界，精神界，文化界開始分化成兩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一派是西歐派。斯拉夫派認爲，俄國的文化異于也優于西方的文化，俄羅斯的土地，俄羅斯的村舍，俄羅斯的東正教，它們是真正體現了基督教的兄弟之情的那種淳樸的美德。西歐派剛好相反。西歐派認爲俄羅斯的本土文化是完全過時的，完全落後和反動的，俄國的得救必須要向西方學習，必須要經過類似西方的文藝複興，工業革命，啓蒙運動，俄國才能夠擺脫它的沙皇專制和農奴制。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一直維持了 20 年，後來才演變出民意黨人、社會民主派，最後到了布爾什維克。馬克思主義對俄國來說，它具有雙重意義。對西歐派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産生于比俄羅斯文化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的産物。對于斯拉夫派，馬克思主義也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激烈地批判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在適應俄羅斯的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

共同要求上是一個奇迹。

B，極端對立的俄羅斯民族性格--行爲模式

俄羅斯精神與它的地理空間一樣，最顯著的特征是它的兩極化，兩種對立面、對立的力量的奇特融合。斯拉夫派的早期發言人霍米亞科夫認爲，俄羅斯民族既能使人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從它那裏永遠可以期待奇迹發生，激起最狂熱的理想和愛，也最能激起同樣的狂熱的絕望和仇恨。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民族優越、俄羅斯偉大與普濟主義、全人類性；經世熱情、正義感和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和貴族氣質。這是一個以其在兩種極端力量之間攪得自己和世界不安的民族。這種禀性導源于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曆史潮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既不是純粹的亞洲人，也不是典型的歐洲人，在最好的情況下，俄羅斯就是世界的完整部分，是世界本身，東方與西方在俄羅斯合流，結合成一個世界。在最壞的情況下，東方與西方在這裏沖突，演繹著啓示錄般的悲劇。

C，19 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與革命衝動

馬克思在俄國的成功，還有第三個因素，就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們。整整一個世紀裏，他們一直在准備著、期待著、也在制造著俄國的共産主義。

俄羅斯精神的締造者和擔戴者是俄羅斯知識人。俄國知識人的最大特征是，它永遠與現實保持距離，永遠思考與現實不相關的大問題，永遠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階級。他們迷戀理想，並准備爲理想付出一切，包括流放、苦役、絞刑，他們是那樣傾心于思想和精神本身，那樣傾慕黑格爾、謝林、聖西門、費爾巴哈、傅立葉、馬克思，這些思想家即使在自己的祖國、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享受過這種殊榮。俄羅斯人不是懷疑主義者，而是天生的虔信派，教條主義者，並且把一切問題都上升到宗教性質和終極價值上。達爾文主義在西方不過是生物學命題，俄國知識人卻把它上升到關于生命拯救的追問。

俄國知識人的始祖拉吉舍夫曾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我的靈魂將只因爲人類的苦難而受傷”。他們是天生的良心體現者和道德至上者，並且把人民看成上帝的直接顯身。拉吉舍夫是農奴制的第一個揭發者，他不倦地抨擊一切專制和暴力，被處以死刑，後代之以流放西伯利亞。他的名言爲整個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人所謹記：“如果帝王，或者任何地球上的某種強權迫使你屈服于不正義，迫使你違背良心，你就要成爲不屈不撓的戰士。無論淩辱，無論痛苦，無論受難，包括死亡本身，都不

會令你畏懼。”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個地主，在十九世紀 40 年代在自己家裏召集了一個小組，討論俄羅斯的命運和重建人類生活。這個小組從不進行革命活動，一切都僅僅在思想領域發生，但卻是最激進最偉大也是最危險的思想。他說：“我沒有找到任何值得眷戀的事物，無論在女人身上，還是在男人身上。我把自己奉獻給爲人類服務之中。”他按傅立葉的方式，以自己的名義建立了法朗吉。但農民卻焚燒了這個烏托邦象征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和平聚會的終結是悲劇性的，全部成員都被逮捕，21 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

別林斯基曾斷言，俄羅斯民族是無神論的民族，但他本人卻對窮人和不幸者懷有基督之愛。別林斯基在俄羅斯共産主義思想譜系裏，居于特別的地位。他是平民出生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和信仰的狂熱分子，真理和正義的狂熱追求者，社會現實狂熱的關注者，也是俄羅斯黑格爾派辯證法的革命狂熱分子。別林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意識到有關嬰孩淚水的問題，很早就體驗過理性主義破滅後的失望和憤怒，他轉向革命者的戰鬥的無神論，其根源卻是對人的基督般的同情，以及因現實的邪惡與黑暗而與上帝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別林斯基與所有俄國人一樣，不可能不崇拜某個東西！正是出于對人的同情，他試圖宣揚殘暴、冷酷與流血。爲了人的幸福，寧願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他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道德先驅，他說，人是如此自私和愚蠢，必須以暴力把他們推向幸福。假如他是沙皇，他就會成爲一名爲正義而奮鬥的暴君。

車爾尼雪夫斯基不僅是 60 年代激進知識分子的思想領袖，而且還是下一代人的思想領袖。流放、服苦役，給他的名字罩上了光環，提高了他的聲譽。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指控起草發給農民的傳單。他被判流放 7 年，並且，在刑滿之後，還送到更爲嚴酷的東西伯利亞度過 12 年。他像一個真正的苦修士一樣，經受了西伯利亞的苦役的考驗。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位非常溫和的人，他有基督徒的心靈。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殘酷虐待是舊制度的俄羅斯政府最可恥的行徑之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作了烏托幫長篇小說《怎麼辦？》，它成爲俄羅斯虛無主義的基本教義，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藝術方面，這部長篇小說相當薄弱和無趣，然而，它對于俄羅斯知識分子曆史來說是很有意味的。小說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躺在鐵釘床上，目的是鍛煉自己的毅力，使自己能忍受苦難和磨難。車爾尼雪夫斯基的

社會主義還帶有一部分民粹主義思想，一部分烏托邦特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 60 年代的共産主義的先驅者之一。馬克思爲了閱讀《怎麼辦？》而下決心在六十歲上學習俄語。

赫爾岑是西歐派的領軍人物，他在沙龍裏與斯拉夫派通宵爭論。他長期僑居西歐，是第一批俄國僑民。他對西方的傾慕和失望都是典型的俄羅斯式的。1848 年歐洲革命的失敗使赫爾岑産生了悲觀主義的曆史哲學，他認爲被曆史巨輪碾碎的人性具有最高價值。無論尼古拉一世的政治專制制度、農奴制多麼可怕、野蠻，但正是在俄羅斯、在俄羅斯人民中間潛藏著新的、優良的、非小市民、非資産階級的潛力。赫爾岑從俄羅斯的莊稼漢身上、從莊稼漢灰色的大皮襖裏面、從農民村社中看到了這一潛能。在俄羅斯農民世界中潛藏著和諧地糅合個性原則與社會性、普遍性原則的可能性。對俄羅斯人民的信心，對莊稼漢身上所包含的真理的信心，是他最後的指望。他被剝奪了死前返回祖國的權利，只能以精神的方式回到祖國。

他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寫道：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爲了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前進不息。真理、科學、藝術和人道的利益壓倒了一切。試問，在現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們會見到這麼一群思想界的隱修士，精神界的苦行僧，這種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發皓首的狂熱信徒嗎？

60 年代末，對于過于極端的、激進的革命潮流而言，讓人激動的，是涅恰耶夫形象，這是極富俄羅斯特征的形象。他是革命團體“斧頭或人民鎮壓”組織的創建者。涅恰耶夫編輯了《革命者手冊》。這是一部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掌握的規章。涅恰耶夫是一個徹底真誠的有信仰的但是非常殘忍的狂熱分子，他准備燃燒別人，但也隨時准備在任何情況下自己一同化爲灰燼。涅恰耶夫使所有的人害怕，各種各樣的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都離開了他。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的事業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魔鬼》提供了素材。在涅恰耶夫的《手冊》裏有某些神秘主義因素，他在許多地方預示了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極端極權的專制的典型。涅恰耶夫想象用鐵的紀律的革命支部覆蓋全俄羅斯，對于它們來說，爲了實現革命目的，所有的一切都被允許。涅恰耶夫鄙視人民群衆，想從上而下領導他們革命。他否定民主，涅恰耶夫怎樣描繪革命者呢？

“革命者是命運決定的人。他沒有個人利益、個人事業，沒有感情、依戀、財産，甚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種唯一的利益、一種思想、一種戀情所灌注：革命。”

革命者割斷了與公民法律，與這個世界的道德的關系。他生活在這個世界，爲的是推翻這一世界。他不應該熱愛這個世界的道德。他只知道一種道德——破壞。對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都服務于革命。這是列寧後來重複過的話。革命者消滅所有妨礙它達到目的的人。誰還珍惜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誰就不是革命者。革命者甚至要潛入秘密警察局，到處都有自己的同伴，必須增加苦難和暴力，爲的是喚起群衆起來，必須和強盜聯合起來，他們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把這個世界凝固成一種足以摧毀一切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俄國的這一幫人，在整個 19 世紀，按照後來索羅維約夫和布爾加科夫的總結，他們都在准備著，在期待著，在制造著俄國的一場革命。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不管是斯拉夫派還是西歐派，它們從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黨派鬥爭的異端懲罰的性質。赫爾岑把它們比作具有兩副面孔的斯芬克斯和東盼西顧的雙頭鷹，它們共有一顆心髒，湧動其中的是對俄羅斯的愛。

2，共產主義革命在蘇俄勝利的社會基礎：

A,資本不足，中產階級力量薄弱

到了 20 世紀之初的年代，沙皇帝國 300 年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了。俄國往什麼方向走，不外兩條道路。一條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另外一條，走向後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關注俄羅斯的命運，他們一再強調俄國已經走到世界革命的門檻前，俄國革命可能成爲整個歐洲革命的一個信號，一個前奏。但是他們擔心，他們在晚期已經發現俄國的專制傳統，俄國的半亞細亞的社會結構，如果來一場歐洲式的革命，或者他們所期待的革命，（俄國）可能走向一種全面的複辟，建立一種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全能的一種東方的可詛咒的專制社會。

不管怎樣，俄國後來走的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我覺得，爲什麼不是發達的、大工業生産的資産階級的歐洲，而是一個基本是農業社會的專制的俄國，發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就是因爲資産階級特別強大，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可以共同分享（利益和現代文明）。資産階級上升時期，利用技術發明，利用科學技術生産力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加上西方資産階級向全球擴

過程中，利用非西方國家的資源、人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來緩解本國的階級對抗。在這一點上，西方資産階級非常成功，我覺得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歐洲社會主義革命遲遲沒有爆發更沒有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時，西方資本主義也證明了，它的經濟、法律制度比一場災難性的革命，不僅更符合基本人性，而且有利于文明本身。這也證明了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缺乏曆史的真實，由此推演的共産主義革命並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和世界的真實前景。俄國情況不一樣，列寧很早就認識到，俄國恰恰因爲它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資産階級力量不夠強大，所以俄國可以盡早建立一個工人的國家，用這個國家的力量，反過來按照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生産力。

B，猶太血統與猶太教傳承

我們（還）不要忘了，俄國的革命有深深的猶太烙印。俄國的共産主義之父普烈漢諾夫，他的夫人是一個猶太人，俄國的紅軍之父，托洛茨基是猶太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諾夫是猶太人，蘇聯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仁斯基是猶太人，共産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是猶太人，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猶太人。列寧也有八分之一的猶太血統。我們更不要忘了，馬克思本人是猶太人，盡管他青年時代就放棄了猶太教。但是猶太、猶太的經典《舊約》關于創世紀，關于人類拯救，關于真理，關于彌賽亞將會出現（的思想），對馬克思，對這幫俄國猶太血統的革命家，我相信有一種非常深刻的影響。

C,俄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情節和共産主義理念

第三個原因，剛才我說了，整個 19 世紀，俄國的，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結論，俄國的專制制度已經該到壽終正寢的地步了，他們將毫不留戀地抛棄它，打碎它。俄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生具有一種共産主義的情結，比如，俄國的農民，俄國的民粹派，他們的財富觀完全不一樣，俄國的貴族，俄國的知識分子，跟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都完全不一樣。第一，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優越感，所有的俄國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一種罪孽感。在人民面前的罪孽感。知識分子在人民面前永遠負債，它應該償還自己的負債。在自己創作道路的高峰階段，俄羅斯的天才們尖銳地感到自己的孤獨，意識到與土壤的脫離，意識到自己的罪孽，並投身于下層，想貼近土地，貼近人民。著名的民粹派小說家格列勃•烏斯賓斯基說，民粹派知識分子反對脫離土地，想回到土地懷抱。（第二），他們認爲俄國真正的、上帝的真谛、真

理所在、俄國的未來所在是在農民，在黑黝黝的潮呼呼的俄國的土地上。托爾斯泰到了晚年，他已經響滿全球了，以 83 歲的高齡，他非得把他的財產全部分給農民，索尼亞，他的妻子不同意，這樣兩夫婦產生根本的矛盾，（托爾斯泰最後只身）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車站上。像托爾斯泰這種知識分子，他必須把全部財產分給土地，分給農民們，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他必須堅持，他的一切成就和財產，都是“全人類的”，對他而言，它們只是累贅，是罪孽的象征。這種民粹主義的情結，這種財富的觀念，是俄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天然土壤。即使沒有馬克思、恩格斯這兩個普魯士哲學家，我相信俄國走向俄國式的共產主義（仍然）是必然的。

三，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失敗的原因

1,列寧的錯誤：流放知識分子，導致俄羅斯共產主義反思和新精神宗教運動流產

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是必然的，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的失敗，不一定是必然的。

列寧利用了很多東方的、亞細亞的、俄羅斯本土的方式，比如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民粹黨人的個人英雄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鐵一般的紀律，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馬克思的，這是列寧獨創的，這是來自于俄羅斯的傳統，俄羅斯土壤中的力量。列寧（曾經）對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當年和他們並肩作戰的那些人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懲罰。

1922 年。布爾什維克把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一百余名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驅逐出境。曆史表明，這是俄國革命犯下的一個異常嚴重的精神錯誤。正是這批被稱爲俄國世紀之交最有思想、最有良知、最負盛名、最有可能在精神和道德上把俄國帶向一個既合于俄羅斯民族、又合于人類本性和世界意志的哲學家，正在接近于完成俄國一個世紀精神發展的任務。

這場運動的重要主題是反思俄羅斯共產主義。對于他們而言，共產主義不僅是一個現實選擇，更是一個曆史追尋，是俄羅斯一千年來探索真理世界的大夢，是這個民族賴以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脈。它也是一個攸關未來命運的問題。別爾嘉耶夫指出，共產主義在俄國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羅斯的精神現代主義。從拉吉舍夫、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奧加遼夫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柳波夫、皮薩列夫、巴枯寧•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魯泡特金，以及霍米亞科夫、索洛維約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托爾斯泰…，都在思索“共產主義”這個詞裏

的精神內涵和社會理想。

列寧還下令把 200 多名妓女槍斃掉，他還幹過一件特別血腥、荒唐的事情，把尼古拉二世，已經遜位的、放下武器的末代沙皇全家處決掉。列寧本性上是一個非常善良和高尚的人，他特別喜歡小孩子，喜歡小動物，他在家裏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一個非常好的弟弟，非常有人道主義。列寧使用那些迫不得已的殘忍手段，按照他的說法，是俄國的曆史和現實逼迫出來的，是敵人強加給革命的，他許諾說，一旦革命轉入正軌，一切暴力和激烈手段就會永遠廢止。

如果列寧繼續活下去，再活十年，二十年，我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可惜曆史沒有給俄國這麼一個機會。

1，布哈林堅持探索的“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被斯大林斷送

現在我要談談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寧晚期新經濟政策的捍衛者和執行人。列寧在晚期發現，戰時共産主義已經不能維持下去了，必須根本地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他到晚年緊張地思索，在 1923 年 1 月 23 號，蘇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列寧抱病參加，也是最後一次參加，他對布爾什維克告誡說，他們的成就還微不足道，俄國革命必須經過俄國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嚴峻考驗，他說俄國（的革命前途）取決于兩個結合，一個取決于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新的進步的東西的結合，（一個）取決于和俄國的農民的結合。他提出了著名的公式，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等于普魯士鐵路制度，加上美國技術，加上托拉斯組織，加上美國國民教育。如果列寧繼續走下去，他可能把東西方的正面的積極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但是非常不幸，他去世了。他晚年推行新經濟政策，由布哈林來繼續，布哈林認識到，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不再是誰戰勝誰，而是誰聯合誰的問題，俄國是太窮，資本主義太不發達，這個痛苦太深。因此俄國的任務是，必須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對俄國農民的口號是，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布哈林最擔心的是，俄國革命可能走上一條背叛它的理想的道路，建立起一個高度統一的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建立起一個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國家“利維坦”，建立起一個成吉思汗東方式的兵營社會。非常可惜，布哈林堅持列寧晚期的新經濟政策，這種探索，這種奮鬥被打斷了。從 1928 年開始到 1938 年十年時間，斯大林用一系列陰謀政治和權力鬥爭，把布哈林和一批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開始了一場空前的曆史倒退和專制複辟。

2，斯大林的暴政：

A，強制集體化經濟：農業破產

我簡單地概述一下。兩千五百萬戶農民被強行拖進集體化的濁浪狂潮，他們除了面臨強制性的財政、行政和司法措施外，還被城市工作隊、農村幹部、警察甚至軍隊一遍又一遍地沒收財産，被大規模逮捕、放逐、驅趕、圍剿。俄羅斯、烏克蘭、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流域這些傳統的“歐洲糧倉”田園荒蕪、村舍毀棄；成千上萬成群結隊、衣衫襤褛的農民顛沛流離在俄羅斯遼闊的土地上；集中營囚滿了大批被判苦役的農民，“國内護照制度”無情地阻止了饑餓的農民流入城市，到處都可看到農民流著眼淚宰殺自己的牲畜，農民的口號是：殺吧，這些不再是我們的了！

一億二千萬農民被卷入到“集體化”的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萬農民和三百萬兒童直接死于災荒和饑餓。盡管施行了若幹改革措施，蘇聯農業不僅長期無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而且大大低于一般發展中國家。1934 年，俄國 3300 萬匹馬的一半以上、7000 萬頭牛、2600 萬頭豬以及 14600 萬只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掉了。一個國家農村社會所能蒙受的災難，很少會比這更大了。一直到斯大林本人去世，1953 年，甚至一直到現在，蘇聯，俄羅斯，居然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到 60、70 年代，一直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口面粉，從（歐洲）共同市場進口黃油，從美國進口大豆。

B，清除異己：老布爾什維克全軍覆沒

從 1936 年開始，斯大林開始對老布爾什維克發難。1936 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審判案，幾萬人被卷進來，然後 37 年是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審判案，幾十萬人含冤而死，然後 38 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審判案，幾百萬人牽扯進來。

“列寧近衛軍”、領導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中，約三分之二被處決或暗殺；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 27 名中央委員，約 20 名被處決或暗殺；列寧去世後第一黨代會（十五大）的 7 名政漢局委員，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處決或暗殺；以列寧爲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 15 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 5 人過早故去外，其余 9 名人民委員全部被處決。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捕，139 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 110 名被處決或自殺。

在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被清洗同時，以“紅色拿破侖”、蘇聯國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員、傑出的戰略軍事家米•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軍政治部主任、副國防人民委員加馬爾尼克元帥、紅軍總參謀長、副國防人民委員亞•伊•葉戈羅夫元

帥、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副國防人民委員、列寧格勒衛戍區司令雅基爾元帥爲首的紅軍將帥和衛國戰爭英雄被大批地處決了，他們包括：陸軍 4 名一級指揮員中的 3 名、16 名集團軍司令中的 15 名、12 名一級集團軍司令中的 12 名、57 名軍長中的 50 名、28 名軍政委中的 25 名、64 名師長中的 64 名、97 名師政委中的 79 名、397 名旅長中的 220 名、456 名團長中的 401 名，以及幾乎全部海軍最高指揮員共 35000 多名紅軍高級指揮員。德國軍事當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進攻蘇聯，這名納粹領袖回答說，蘇聯高級軍事幹部最優秀的部分已于 1937 年被斯大林消滅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無論哪一次戰爭，無論哪一國軍隊，都沒有像蘇聯軍隊那樣，在與法西斯德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前夕，遭到如此慘重的打擊。

C，對人民實行專政：兩千萬到六千萬人死於非命

從 1928 年開始，以“人民”、“革命”、“曆史真理”、“祖國安全”、“人類理想”的名義，一場整整持續了十年的政治鎮壓血腥登場了。“沙特赫案件”、“烏克蘭解放聯盟”、“勞動農民黨”、“工業黨”、“聯盟局”、“斯拉夫學家”、“三十三人案”、“拉姆辛案”、“軍人案件”、“民族主義傾向派”、“右——左集團”、“留京小組”、“孟什維主義反革命魯賓派”、“波格丹諾夫機械主義理論”、“萊科夫思想”、“沃龍思想”、“彼列維澤夫思想”……，斯大林開始爲蘇聯各階層、各民族人民編織各種名目的絞索。

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哲學家、發明家、工程師、藝術家、戲劇家、作家、畫家、詩人、演員、電影導演，成千上萬名區委書記、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站長、車間主任和普通教師、普通宗教信徒被關進集中營，死于非命。斯大林建立了一個什麽樣的模式呢？第一就是高度集權的絕對專制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權。在他統治時期，蘇聯政治局的會議，蘇聯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代表大會常年不召開，和列寧在（世時）形成強烈的反差。列寧在 1924 年去世之前，是在 14 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包圍的情況下，每一年的全國代表大會照樣召開。然後在整個蘇聯是斯大林和他的一夥幫凶說了算。這夥幫凶裏邊，像雅戈達，像葉若夫，像貝利亞，這些都是心裏非常陰暗的、非常殘忍的劊子手。第二個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是完全服務于斯大林個人和蘇聯的世界戰略的經濟，第四是一種以控制思想爲能事的意識形態體系。

中國古代臭名昭著的首任暴君秦始皇曾經焚書坑儒，活埋了四百個儒生。古羅馬的三個暴君，尼祿，提庇留和蘇拉，曾經把兩萬羅馬人殺死。據說最殘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長托馬斯•托爾奎馬達曾活活燒死一萬零二百二十人，並燒掉六千八百六

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異教徒的模擬像，此外還判處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終身監禁、沒收財産和穿一種名叫“聖賓尼陀”的恥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轄區制度使幾十萬人喪命，在這一制度最猖獗的時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處死。在雅各賓恐怖時期，由革命法庭判決而上斷頭台的共一萬七千人，大約還有同樣數量的人未經法庭審訊即被定罪或屈死獄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賓派關到監獄中的人數就不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計爲七萬人。但在整個 19 世紀，因爲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羅斯人才不到 20 個人，被流放，被監獄關死的，也就幾百人，頂多幾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我本人對數字並不敏感，但下面這些數字實在給人太深印象，過目難忘。1990 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了一個數字，從 1930 年到 1953 年期間，蘇聯有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 1991 年，蘇聯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個數字，從 1928 年到 1953 年，斯大林主掌大權的 25 年期間，蘇聯有 450 萬人死于非命。曆史的記錄更爲駭人，在斯大林大權獨攬的 25 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國人總數，下限是 2,200 萬，上限是 6,600 萬。從 1937 年到 1938 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獄到審判處決的幾百個日日夜夜中，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槍斃。莫斯科火葬場的焚屍爐烈焰滾滾，不分晝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斷的血肉模糊的屍體。

這已不是鮮血彙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皚皚的荒原了！曆史上任何暴君都沒有鎮壓和虐殺過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國家的棟梁！

四，民族厄運中的俄羅斯精神

1，俄羅斯內地作家直面苦難

A，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二十世紀的憂患預感

但是俄國的精神，俄國的靈魂並沒有屈服，這裏我短暫地回到俄國的文學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羅斯精神對世界的意義時堅信，俄羅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徹底地摒棄了一切蒙昧主義和偶像崇拜，發展出更爲深刻而獨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難的智慧。

盡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開了帝國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惡的深淵，發現了能“超逾善惡”的拉斯格爾尼科夫的可怕性，盡管托爾斯泰很早就轉向宗教和人的得救問題，但是他們都無法預見二十世紀俄國精神遭逢的更爲殘酷而複雜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舊俄國”對他那個時代的他所預感到的世界性演變與恐怖，對即將來臨的全人類的生命流失和價值傾覆，對他所憂心如焚的一億俄羅斯人被魔化的未來世紀

問道：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俄羅斯作家對這一切都作出了承擔和回應。

B，帕斯捷爾納克：舊俄羅斯價值觀必定復活

大家知道，俄國有五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普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在 1958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獲獎的小說叫《日瓦戈醫生》，他在臨死前說，我爲什麼要寫這本小說，我對我們這一代人，對我們的父輩，對俄國的曆史負有重大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祖輩和父輩，他們已經長眠，但是我相信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希望一定會複活。他寫《日瓦戈醫生》的目的，就是贊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就想恢複真的俄羅斯精神。

C，阿赫瑪托娃：苦難中蔑視帝國堅守善念的繆斯

帕斯捷爾納克的終生摯友，直接被帝國文藝總監日丹諾夫“點命”的阿赫瑪托娃這位俄國“悲泣的繆斯”，便是用詩歌把苦難內在化的傑出代表。

在世界詩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詩人自願地把愛情詩讓位給悼亡詩。死亡——持續的、真實的死亡——成了她詩作的最後依據。布羅茨基寫到：“她創作《死者的花環》這一組詩，就是讓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詩歌。她在努力應付一種空虛的生活，它的意義遭到突然毀滅而變得空虛”。

當阿赫瑪托娃轉向獄中的兒子時，被無情踐踏的母性的絕望、對帝國虛假永恒的蔑視以及對善的最終勝利的信仰，彙合成二十世紀苦難俄國一部無與倫比的史詩般的聖母頌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爲全蘇聯和全世界噙著眼淚傳誦。

布羅茨基明確地指出，《安魂曲》中衆多的聲音流露出來的同情，只能用詩人東正教的信仰來解釋；其中的理解以及賦予作者辛酸的、幾乎難以承受的抒情曲調的寬容，則只能用詩人獨特的心靈，自我以及自我對時間的感受來解釋。我們這一代人在某些曆史時刻，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在曆史發展的特殊階段，唯有詩歌可以應付現實，它將現實緊縮爲可以懷抱、可以傾聽的某種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國家舉起了阿赫瑪托娃這支筆，更重要的是，這使詩人能爲全民族說話，並啓示給它一時尚難理解的東西。

D，索爾仁尼琴：深化俄羅斯懺悔意識

索爾仁尼琴，現在還活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詞的標題叫“爲人類而藝

術”，在寫到古拉格群島和俄國文學的關系時，索爾仁尼琴提出了一種新的寫作觀，他指出：“正是群島給我們的文學，也許還給世界文學，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二十世紀昌盛時期的空前未有的農奴制，爲作家們開辟了富有成果的雖然是毀滅性的道路”。索爾仁尼琴由此設想可以“鬥膽”預期産生四個領域的世界文學：第一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上層人；第二個領域：上層人描繪下層人；第三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上層人；第四個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實現了“設身處地”地爲下層人——人民——這一轉變的。索爾仁尼琴強調，“在古拉格群島則是一下子在幾百萬人的頭腦和心靈上真地而且永遠地陷于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曆史上第一次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裏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

俄羅斯偉大忏悔精神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裏支撐著俄國詩人的生命，使他們從內心認識到罪惡和邪惡的根源，從而祛除狼種。索爾仁尼琴作爲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爾納克等純詩人更爲純正、優秀的俄國知識界無可爭辯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島的苦難中心把十九世紀俄國忏悔精神提升了一個世紀的水平，他發現：

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占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鏟除的惡的角落。

自那以後我終于懂得了世間一切宗教的真谛：它們是與存在于（每一個）人內心的惡作鬥爭的。世界上的惡不可能除盡，但每個人心中的惡卻可以壓縮。

2，俄羅斯流亡知識分子反思十月革命

俄國的彌賽亞情結，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俄國的忠實于真理的這種奮鬥（精神），作家們一直在堅持。在海外，一大幫俄國知識分子，他們的書開始翻譯成中文了，就是白銀時代（開始）的，後來的新精神（哲學）運動，俄國宗教唯心主義爲代表的這幫知識分子們，他們的思想一直堅持到二戰之後。俄國社會主義爲什麼失敗，梅烈日科夫斯基，索洛維約夫，布爾加科夫，他們總結了幾點基本的東西，第一，俄國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俄羅斯人民兄弟般友愛的這個神聖的原理，但是在斯大林時期，俄國人

怒目相向。1939 年，全俄監獄在押犯人達到九百萬人，比 1929 年多了三百倍，每兩個俄羅斯家庭就有一個成員在服刑。第二，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必須實現人的高度尊嚴，高度自治。第三，這場革命必須建成一個正義的、和諧的、文明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結構，一個社會制度。第四，這幫知識分子認爲，俄國革命必須要使整個俄羅斯人都變成精神上的貴族，（具備）俄羅斯貴族的全部美德，而沒有他們那些劣行，那些缺點。顯然，列寧去世之後，布哈林被槍斃之後，這一切都沒有實現。

五，廢墟上的勝利：布哈林蒙難五十年終獲“平反”

我還必須提到一位俄羅斯婦女，布哈林的遺孀安拉•拉林娜。布哈林死後，拉林娜在水牢裏被關押了六個月，然後在勞改營和流放地呆了 18 年。

1961 年初，布哈林慘遭殺害、被毀屍滅迹 23 年後，拉林娜和離散多年的兒子尤裏才首次向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提出申請，要求爲布哈林恢複名譽。他們沒有得到任何答複。赫魯曉夫屈服于國內外壓力，拒絕了這一要求。這位良知未泯的蘇共總書記晚年曾爲此而“深感愧疚”。十六年過後，1977 年，他們再次向蘇共二十五大和蘇共總書記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請，再次被拒絕。1965 年，列寧的戰友和秘書斯塔索娃和另外幾名老布爾什維克曾致信蘇共中央，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們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複。

1978 年 3 月，布哈林慘死 40 周年前夕，絕望中的拉林娜讓兒子轉向意大林共產黨總書記恩裏科•貝林格，請求這位歐洲最大共產黨的領導人“參加爲我父親恢複名譽的運動”。英國“貝特朗•羅素和平基金會”很快收到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一場爲布哈林恢複名譽的運動在蘇聯之外的世界開始了。歐、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蘇聯政府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重新審理布哈林案件，爲他恢複名譽，並公開說明當時造成他的冤案的情況”。蘇聯當局對此繼續保持沈默。

又過了 11 年，1988 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後一次向蘇共二十七大，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也是最後一任總書記，致信。原信如下：“…我提出這一申訴不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囑托。…1937 年 2—3 月中央全會時，他已預感到不能再回來了，他考慮到我那時還年輕，求我爲他死後平反昭雪而奮鬥。…我發了誓。違背這個誓言就是違背我的良心。”

她請求戈爾巴喬夫：“在您的黨證上寫著列寧的話：‘黨是我們時代的光榮和良知’。請按照這種品性辦事吧！…在長期的監獄、流放和集中營生活中，我費了很大

的力量，記住了布哈林《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我願意相信，您就是這一代的領導人。”

1988 年 2 月 4 日，布哈林誕辰 100 周年、蒙難 50 周年之際，蘇聯最高法院作出決議，爲布哈林徹底平反；5 月 10 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稱號；6 月 21 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決定，恢複布哈林黨籍。

1987 年 11 月 7 日，謝•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中指出，斯大林對成千上萬共産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幹部和軍事幹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圍的親信爲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爲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1989 年，蘇聯共産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蘇聯政府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向世界宣布：解散蘇聯共産黨，十月革命在俄國的試驗已告失敗。

在無盡的驚愕、茫然、惆怅、沈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區一幢普通的樓房裏，布哈林的遺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遺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兩幅油畫，布哈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知識分子，克裏米亞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積雪的群峰。將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難、期待，將近一百年的奮鬥、犧牲、悲劇，到來的竟是這樣一種結局。

六，結語

俄羅斯道路不僅僅是俄羅斯民族，一個民族的事情。

如果西方富有遠見，不那麼自私，沒有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拿破侖和希特勒沒有入侵蘇聯，俄羅斯在接受西方正面文明時，將沒有那麼強烈的敵視，那麼強大的障礙，可能選擇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

如果東方、亞洲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現代意識，有更多的關于人的普適價值，俄羅斯自身的專制傳統和極權根源，也許會大大得到消解，從而走上不同的道路。

俄羅斯的失敗絕對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敗，俄羅斯在 20 世紀是一場整個人類共同的試驗。我相信像俄羅斯這樣一個精神上的巨人，曆史中的巨人，它絕對不會讓目前這種非常尷尬、非常困難的時期維持很長時間。從 1861 年廢除農奴制到 1917 年，俄國徘徊了將近 60 年。從 1917 年到 1991 年，俄國掙紮了 74 個年頭。從 1991 年到現在，也不過就十五六個年頭而已。我在這裏預言，像當年托克維爾一樣，俄國不會在 20 年之外才重新崛起。20 年左右，俄羅斯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于世）。

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俄羅斯的靈魂，俄羅斯的精神裏，他們（將）重新去吸取（屬于）他們的那種力量、智慧和勇氣。作爲我們永遠的北方大國，我們中國太有理由關注俄羅斯，勝過關注西方。

謝謝。

附錄：

王康“俄羅斯道路”演講答主持、聽衆問

主持人：曾子墨

時間：2006 年 4 月 7 日晚

地點：北京大學四季演講廳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裏是思想的盛宴，這裏是學術的殿堂。

在今年的 3 月 21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起在北京出席了俄羅斯年的開幕式，由此也拉開了俄羅斯年在中國的一系列活動。而在這之後，我們看到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成爲了大家所關注的焦點。那麼俄羅斯到底曾經走過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他們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俄羅斯這個民族又有著什麼樣的精神？有關這些問題，今天的《世紀大講堂》，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的文化學者王康先生。歡迎您。請坐。首先呢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過大屏幕來認識一下王康先生。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王康先生：

Vo：王康生于中國現代曆史一個最關鍵的年頭：1949 年。這個年頭使他成爲一個宿命論者和天生的理想主義者。

大學期間他以獨具的風骨和才華成爲西南最高師範學府自 1957 年來第一個學生文學社社長，並因此自決于中國式經濟仕途、學院翰林之外。耿于沈思，疏于著述，不求聞達，不意被封“民間思想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王康以布衣之身撰寫“中國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爲題，撰寫叩問“中國往何處去”五集政論片。抗戰勝利 50 周年以九集電視片《抗戰陪都》傾服衆多業內人士。對中美關系、台灣懸案、中日現狀以及馬克思主義、港台新儒家皆有獨到心得，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命”已略知。

主持人：其實我跟王康先生見面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相信每次大家如果見到王

康先生，一定會對他的這個形象印象特別地深刻。有人就說這個聰明絕頂放到你身上特別合適。

王：謝謝。

主持人：你覺得是嗎？

王：是。

主持人：很少會有這人這麼坦誠了。

王：光頭的人啊一般比較聰明，而且也比較善良，曆史上很多光頭的人很善良，大家記住，比如列寧，非常聰明，在整個蘇聯共產主義譜系裏邊，也是一個最善良的人。

主持人：覺得自己聰明和善良在哪些地方呢？

王：我拒絕了學術道路，早就拒絕了政治道路，也拒絕出國，但是我換來了內心的充實，高度的獨立性。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了解到王康先生，知道王康這個名字，更多的是從抗戰那段曆史了解到的，因爲王康先生自己曾經做過一些陪都文化的研究在重慶，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對俄羅斯，您還有這麼濃厚的情結。

王：對，我對世界所有國家最濃厚的、揮之不去的是俄羅斯情結。

主持人：這個俄羅斯情結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產生的呢？

王：我們這一代，我們的父輩，甚至祖輩，深受俄羅斯的影響，可以說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國家。剛才你說，今年是俄羅斯年，其實整個 20 世紀都是俄羅斯世紀，對中國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跟俄羅斯相比，對中國的影響如此地深刻，我們看看所有現代中國，我們的憲法，我們的整個國家制度，我們的基本的世界觀，我們的哲學，基本上是俄羅斯式的，前蘇聯的盡管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但是我們這深層的結構上的東西來自蘇聯。

主持人：提到俄羅斯呢，可能很多中國人都會熟悉它的比如說一些著名的文學家，一些文學巨著，還有一些俄羅斯的音樂，包括繪畫等等。有哪些作品是對您影響特別大的嗎，能跟我們講講嗎？

王：普希金的《致大海》，我們那代都能背誦那些詩。

主持人：現在還記得嗎，能現場給我們背誦一兩段嗎？

王：再見吧，自由的元素！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

閃耀著驕傲的美色……。

主持人：嗯。好，看得出呢，只要談到俄羅斯，王康先生就會滔滔不絕，一直地說下去，那麽對于俄羅斯，王康先生到底有著什麽樣的了解，從他的眼光來看，俄羅斯曾經走過一條什麽樣的道路？我想下面呢就讓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王康先生給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俄羅斯的道路》。

王：謝謝子墨小姐，大家好。俄羅斯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話題，也是一個很沈重的話題，今天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俄羅斯，我感到很榮幸。（演講內容略，請見正文----編者）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給我們進行的這場演講。剛才呢您也提到了 20 世紀的俄羅斯，特別提到了一個人，斯大林。那我就想請問您，斯大林這個人在俄羅斯的出現，在當時的蘇聯產生了那麽大的影響，他的出現，它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必然？他和俄羅斯這個民族性格之間，有著什麽樣的關系？

王：是必然。因爲列寧的俄國社會主義就預示了斯大林的可能性。剛才我說過，列寧是一個天才，他把兩種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俄國知識分子對自由的向往，俄國專制社會的傳統結合了起來，而且異常成功。從斯大林個人來看，他的父親是個鞋匠，是個酒鬼，他完全沒有父愛，他是在母親呵護下長大，他只有六年的神學院（學曆），他基本上沒有出過國，不懂一門外語。而俄國那幫領袖，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會用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文，（閱讀歐洲原著），俄國革命一些上層的領導人，全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只有斯大林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文化的人，他的出現更多代表了一種俄國的東方遺產，俄國的專制傳統。

主持人：您在演講當中，剛才也提到，如果說列寧再多活 20 年的話，那麽社會主義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的發展，可能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所以我們還想知道，爲什麽說這個社會主義在俄羅斯的發展，要依靠某一個人的壽命，而我們傳統當中的印象是說，在西方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它的政治發展，它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更多的是依靠制度？

王：沒有誰會簡單漠視制度的力量，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造成的。強調人的作用和意義，其中包括人的責任和創造性，尤其是責任，其中也包括罪行和審判。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進化論和絕對論基礎上。俄國一幫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要求首先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大工業生產，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孕育現代無產

階級，然後再進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但是俄國的曆史條件沒有提供這種機會，俄國後來更多的帶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個人英雄主義，領袖決定一切的力量，這是東方的、俄羅斯本土資源特色，而不是西方、也不是馬克思預期的東西。

主持人：那如果它一種制度的發展，只是取決于某一個領袖，某一個個人的話，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說它在未來的發展，比如說它如果能夠走上一條，社會主義走上一條順暢發展的道路，可能存在了太大的偶然性，而不是說我們將會看到的一個必然結果呢？

王：我在青年時代曾經曆了世界一分爲二的現實，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大有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趨勢，而東方各國最大的明星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似乎就是曆史本身。非常遺憾，他們確實曾經主宰過億萬人的生命。衆多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修養，道德，心胸，甚至他的脾性，他的愛好，在那個國家裏常常是決定性的，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這是曆史巨大的局限性。我們還沒有到達一個完全按照一種理性的，一種帶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現在沒有認識它，然後來理解，來實現這個社會主義。也許永遠沒有那種理性和規律性，因此我才被迫回過頭來強調個人的責任。

主持人：好，謝謝。我們這邊呢，還有一些網友啊想跟王康先生來做一些交流。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呢叫做我不想煉鋼鐵，他說，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啊，他說我們這代年輕人是不會排著長隊去購買那些，比如說俄羅斯的電影的海報，包括是說俄國的一些小說，他說我們可能去關注的，愛看的，是一些日本和韓國的小說。所以他認爲，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可能是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和背景下被擡升了，被提高了它們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那不知道您對這個想法怎麽看？

王：所有的精神活動，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的産物。但是有些作品，有些精神，它會長久地存在下去。日本，韓國，包括港台消費性、感官刺激式的文學，在我看來，一點價值都沒有，它純粹是消費社會，休閑時代的産物，它和人類的巨大命運、將來人類還會出現的命運沒有什麽聯系。它們與俄羅斯的文學藝術，根本就沒法相比，俄羅斯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它的藝術和精神攸關正義、真理、永恒，它對苦難和罪惡的承擔和洞察，是中國當下最欠缺的能力。它們所深入到的人性的深度，人類的本性，人類的道路和終極的關懷，與剛才你說的，網友說的東西，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表面的歌舞升平最多是羅馬帝國晚期頹廢社會的一種翻版，充斥社會的除了

權力崇拜、金錢至上，還有虛無主義和末世感。中國有太多軟不拉唧的東西，我們太需要一種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道德追求的文學作品。

主持人：好，謝謝。還有一個網友的名字，他這個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伏特加，一杯就倒，說的是這個酒。他想問您的問題就是說這個俄羅斯人，他的性格和這個伏特加酒之間有什麼樣的關系？因爲我們都知道，一提到伏特加，我們肯定就想到這個俄羅斯人愛喝這種酒。

王：俄羅斯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國家，喝酒當然很正常。俄羅斯民族經曆的磨難，它的苦難曆程在世界各國裏非常罕見，也許我們中國人可以和它比較一下。俄羅斯人的命運，就像法國文學史家勃蘭兌斯說的，俄羅斯天生是一個憂郁的民族，是一個苦難叢生的民族。當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跟靈魂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伏特加酒是他們莫大的安慰。我如果是俄羅斯人，我也會成爲一個伏特加的愛好者。

主持人：好，謝謝。接下來呢，我想請我們在座的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提問。這邊。

聽衆提問 1：主持人，王老師，您好。我是咱們哲學系的一個學生。我想問一下王老師，您通過對俄羅斯的這個研究，就說反思一下中國爲什麼說古代還有那麼多思想，然後到近代，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現在是這麼落後？就問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謝謝。

王：俄羅斯的東方傳統，應該嚴格地區分。它的所謂東方傳統、那種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傳統，我認爲主要是以成吉思汗爲代表的蒙古的軍事專制主義，絕對不是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的人文主義。盡管儒家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過失，但是它的核心理念有永恒性。比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點，比如世界大同的觀點，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沒有西方基督教和俄國東正教的背景下創立的關于人的命運、人的本性、人的目的的一種東方式的非常高明的哲學。我覺得我們應該恢複它們。中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一個小康社會，那麼孔子爲代表的先秦儒家，宋明理學和當代的新儒家，它們應該進入中華民族的心靈，這是中國，我們自己自救，自強所必須要走的一步，就像俄國人一樣。謝謝你。

聽衆提問 2：你好，王老師，主持人好。我非常榮幸能聽到你今天的演說。然後剛剛你講，在演說當中你提到說俄羅斯的文化和精神特別，就是讓你特別崇拜，另外你還記得俄羅斯民族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民族。但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趣的一個現

象是，俄羅斯上至政府，下至民衆，他們都非常希望能夠融入歐洲，特別是他們把融入歐洲當作，上升成爲一種國家戰略地位，他們把聖彼得堡，然後作爲融入歐洲的一個橋頭堡，包括特別是包括普京總統上台後，他也是，就是說然後對西方國家，對歐洲國家頻頻發出一些善意的信息，但是西方國家並不太領情。你覺得這種現象如何解釋？謝謝。

王：俄國當代曆史學家特卡喬夫認爲，俄羅斯從來不屬于東方。我認爲俄國的專制傳統主要是東方的遺産，順便說一句，二十世紀俄羅斯、蘇聯回饋給中國的正是這一筆東方的遺産。俄國的曆史選擇，已經出現大的端倪，繼續彼得大帝西化之路，難道還有其它道路嗎？俄國人精神核心、東正教本來就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倒是中國應當自問：何去何從？我願再次預言，不出二十年，俄羅斯將加入北約、歐盟，與西歐、北歐、東歐、南歐共同組成一個大歐洲聯邦，俄國最困難的是它的東方遺産、亞洲部分，但無論如何，俄羅斯重建帝國的夢想恐怕永遠不存在了。在一個全球化越來越快速的時代，俄國不管是向東方還是向西方靠攏，它最終要向一個根本靠攏，向世界和人類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靠攏。如果要總結俄羅斯三百多年或者蘇聯 74 年的曆史經驗，俄國的命運就在于不能簡單地區分西方或者東方，而是盡量全面地、積極地、有效地來結合東西方先進的、優秀的部分，這是俄國真正的前途所在。

主持人：謝謝。

聽衆提問 3：王老師，您好，主持人，您好。衆所周知，目前中俄兩國都在進行一場大的社會變革。你怎麽看待這個兩國改革？而且你認爲哪個國家的改革對社會震動更小，更符合本國的民族個性？謝謝。

王：俄羅斯的和中國的改革是它們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達。俄國民族，他們總是讓世界震驚，他們在骨子裏面是非常浪漫，非常神秘的。他們不太現實，他們的那種急救法叫什麽休克療法，完全合乎俄羅斯的天性，他們不希望平庸地、慢慢地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希望有一種史詩般的、甚至是一種比較苦難的方式來凸顯他們的命運。中國不一樣，中國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林語堂早就說過，中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走極端，不狂妄，這種民族性格、民族傳統和文化決定中國改革的基本的風格，但是極端、狂妄、非理性已經開始毒化中國，君不見，中國要不惜一切與美國來一場核大戰嗎？中國普遍的禮崩樂壞，再加上巨大的物質財富，已經讓包括俄羅斯人在內的許多民族感到憂慮了，那將給中國和全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

災難。我覺得這是天理昭昭，不存在高下、對錯的問題。另外俄國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它們基本的目標和方向，我認爲沒有太大差別，除了西方那一套普適價值之外，它們必須滿足本民族精神上、靈魂上的需要，這是中俄改革必須要面對的，而不僅僅是西方的，比如市場化，法治社會這一套，這套其實很淺薄，也很簡單，人的基本權利，財富等等，要做到並不難。但是怎麼能夠滿足中華民族或者俄羅斯民族的天性，只屬于這個民族的天性，從而來豐富人類的人類性、共同性，這是更爲困難的事情，這只能由俄國和中國人自己去完成，這是不可推槊、不可轉讓的責任。

主持人：最後呢我還想請您用一兩句非常簡單的話來給我們概括一下，俄羅斯精神，它到底是什麼？

王：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著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著拯救的信心。我呼籲年輕一代，千萬不要忘記俄羅斯，我們應該用有特殊的理由和責任，比對西方更關注的心情、更同情的心情來關注和同情俄羅斯，我們應該爲俄羅斯祈禱，爲他們祝福。

主持人：那在您看來，中華民族，它的精神又是什麼呢？

王：中華民族精神就是那句老話，君子自強不息，這是正面的。中國人有兩種傳統，一個是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一個是秦始皇到毛澤東的傳統。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相信文化可以改變和提升人，可以拯救人，——用現在的術語來說。而秦始皇和毛澤東不相信這個，他們相信權力，權力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東西，沒有權力一切事情都做不成。

主持人：好，謝謝王康，謝謝王康先生。非常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抱病專程地飛到北京，來到我們的《世紀大講堂》。的確，俄羅斯呢是我們最大的鄰國，而且正如王康先生所說的那樣，俄羅斯對于我們這個國家曾經産生過巨大的影響。對于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的父輩那一代人來說，俄羅斯這三個字，它是一種情結，它是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所以今天呢在這裏，我們和王康先生一起來回顧俄羅斯它所走過的道路，去理解它的民族性格，去了解它的精神，我想對于我們同樣有著很好的啓迪作用。那再一次感謝王康先生今天呢是給我們進行了一場很精彩的演講。同時呢，我們也感謝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

（原载《民主中国》）

我的精神麦加

王康 2007 年 9 月

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

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

——普希金

章诒和从俄国回来，在电话中盛赞俄罗斯，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形容那里的原野、河流、教堂、涅瓦大街、冬宫、皇村……，特地举台湾女名嘴陈文茜之口说，跑遍世界，最神往难忘者，惟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眼神迷离的国度，诒和近乎地唠叨地叮嘱：康兄，你可得去一趟！

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早已是他们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学恢宏的廊柱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尔大道的驿站口，在近卫兵临行的早上，在茨维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个小镇，在只有俄国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开的精神集市中……，这些俄国人的眼光多么奇妙！充满忧伤但决不黯澹，耽于深思又如冰凝雪积，他们似乎看到了世界的尽头，却一代接一代搀扶着走进骷髅地，穿越无边无际的苦难"瀚海"，我多么熟悉他们的表情，手势，用语，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们额角的转折面直接闪烁着从古代希腊神庙放射出的光辉，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瘦削的脸颊比黑格尔、谢林还适宜登台宣讲，托尔斯泰如果愿意，他足有三十年时间走遍俄罗斯，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我洞悉列宾创作《伏尔加纤夫》、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时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国天才、先知和圣徒们心脏收紧，血脉贲张，瞳孔扩大时的速度、力量……，不过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

我太了解，为何章诒和、陈文茜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无数中国人，共同经历了与那个国家有染的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一旦踏上那片土地时的感受为何如此强烈。我自己曾经三次应邀去凤凰卫视讲俄罗斯，讲它的历史、悲剧、艺术、宗教、地理。我比谁都清楚，包括我在内，所有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都多么浅、多么少、多么苍白。有明眼人在网上揭发，此人从未去过俄国，不懂俄语，他那点关于俄罗斯的知识全靠剽窃我国俄文翻译界的辛勤劳作所获。

此言不虚。何止于王康，多少中国人迷上俄国，甚而当作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

通过他人的译笔、眼光和尺度？“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0 世纪上半叶，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张闻天、王明、康生、高岗、毛泽东们，不约而同地弃德日、拒英美，走上“以俄为师”道路，给中国引入全新的世界观、国家观、历史观，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一百余年的历史轨迹统通改向，创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新中国，其名份、合法性、它宗奉的天条，立于天地间的目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宇宙、物质、宗教、精神、文化、艺术、精神、心灵无不烙下鲜红的俄国印痕，这个新中国的国徽、国号、国旗，国都的主要建筑以及流行数代人的旋律、色彩、爱恨模式，统通来自俄国。

在中国和世界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变。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有焚心剔骨之感的中国人，怎么会忘掉俄罗斯？

若非几十年后反目反唇，反手反心，早就应该有一部现代汉语经典堂皇问世，其标题是：我的祖国——俄罗斯。事实上，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中国亲苏激进革命派一直视俄罗斯为人类共同祖国，莫斯科为世界唯一首都，并无赧颜愧意或丝毫不妥不安。

据说现代精神的原则之一是多元选择和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我不接受这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发明，只因为它们不过是继续维持谎言的说辞，它们那番功利哲学和机会主义只会继续误导国人，继续遮蔽俄国，让中国继续坎陷于俄国悲剧性的遗产造成的历史废墟中无力自拔。

十六、七年前，从莫斯科到华沙到柏林，从布加勒斯特到索菲亚到布达佩斯、布拉格和他拉那，悬挂了半个多世纪的铁幕轰然坠地，中国一度惊愣不置，忧心如焚，如丧考妣，如崩祖坟，惶惶不可终日。直到韬晦功夫和权衡法术占了上风，中国才发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未必是末日来临的序幕，中国人极其聪明地收起几十年间最热衷最拿手的“意识形态倒计时牌”挂起“各扫门前雪”的小市民旗幡。俄国从此从中国人眼里消失，昔日父兄恩主般的威仪尊荣，降尊纡贵后魔鬼式的狰狞邪恶统通不复存在，俄国成为一片虚无。

无论这种东方式的势利眼为中国带来了多么丰厚的历史红利，无论中国由此摆脱某种历史包袱从而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多么令国人庆幸有加，无论时下国人以何种怜悯、嘲笑、轻篾的口吻看取俄国，我都把目光投向莫斯科，那里发

生的一切更使我陶醉、神往，俄罗斯成为我的精神麦加。

一个浑身破烂，在寒风中颤栗的流浪汉，一个守不住家产却敢于重新上路的朝圣者，一个即使跌倒在地也举首望天的巨人，正是我的俄罗斯。俄国没有遵循他人的法则，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独裁者还是小市民，都纠缠不了俄国人疲惫而坚定的步伐。俄国在自己家里破产了，但是比一切新老显贵更有尊严。俄国在全世界面前摔倒在地，狼狈不堪，但他站起来了，颤颤巍巍，一脸苍白衰弱不堪的俄国，高贵地微笑着，绅士般地拾起帽子，背好行囊，皮巧林式地瞥瞥那些兴高采烈的围观者，迈开步子……。

俄国依然是世界的重心，就像三百年来一样，它再次把世界带到一个新天地，把自己放到约伯的天秤上，世界再次目睹了一出真正的史诗正剧。

尼古拉二世全家遗骸“连一根肋骨也不少”地从叶卡捷琳堡运抵彼得堡，安葬在历代沙皇陵寝中间。无论罗曼诺夫王朝欠了俄国人民多少宿债，俄国都有气量接受牺牲者亡灵的归来，俄国分辨和判别善恶的底线宽广而深邃，忏悔和宽恕总会像伏特加和黑面包一样，成为俄国灵筵最珍贵的佳肴。俄国人用一句“苦啊!”，用额上和胸前的十字比划这样简单的仪式，就可以超逾极恶与至善，俄罗斯面对自己罪孽表现的圣徒情怀，总是让自己噙满热泪，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遗骸前的悼辞所言，安葬牺牲者“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俄国有勇气面对自己，“20 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罗马教廷为托马斯•莫尔、布鲁诺等欧洲良知恢复名誉，花了几个世纪。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们和几百万冤死者在 50 年后，就从地狱式的魔山噩海中抬起被“历史过滤器”洗去血污的头颅；与此同时，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们永远被宣判为暴君和刽子手，俄罗斯的历史－精神天秤奇迹般地达到平衡。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二十多年后，归返俄罗斯。俄罗斯母亲有足够辽阔的土地欢迎所有游子的归来。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表现了真正的俄罗斯儿子的忠诚：“俄国一再陷入可怕的状态，俄国必须摆脱帝国的狂妄和专制的深渊，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才能复活，指引俄罗斯灵魂的星星还在闪耀，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由于俄国的牺牲精神，由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良知高度，东西方冷战未经任何磨人的谈判嘎然终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突然分享到多么巨大的恩惠啊。

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一种虽然尚不系统完整，然而已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所取代。全球产业分工、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

柏林墙一夜之间坍塌，最浪漫的德国人也不敢奢望的统一由上帝之手完成了。东欧诸国回归一千多年中孕育的欧洲文明，欧元、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把欧罗巴推到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们依靠武力从未达到的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大厦门口，欧洲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智慧、活力、创造天才开始复活。

这一切都是在历史成本极低的基础上出现的，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为此独自承担了主要责任。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基督教、希腊精神、伏尔泰、启蒙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十月革命……，俄国再次作出选择，这次它选择了自由、民主、宪政和上帝。三个世纪以来，俄国总是面对自己的黑暗、愚昧、专制、不幸、苦难、罪恶，以一代又一代的鲜血、悲伤、迷惘和祈祷走向救赎。

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俄国人从不被世俗最高权力眩惑，从不满足于拥有全世界最辽阔最丰饶最美丽的土地，它以数以万计的教堂、修道院、要塞和古堡，以全世界最触目惊心的朝圣队伍走向弥塞亚降临时分。在俄国无数“弗拉基米尔大道”上，总是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住战士的肩膀，整个俄国可以在一个男孩的眼泪前潸然哭泣，在一名妓女前忏悔，在大地解冻冰凌噼啪作响的早春像婴儿一样接受新生的洗礼。只有俄罗斯，并不以强大、富有、美丽自诩，而以神圣自命，弱者、罪人和天底下不幸的人，会优先蒙受俄罗斯上帝的垂爱。罗马式的贵族、美国式的资本家和中国式的暴发户都只会引起嫌恶和怜悯。只有在俄国，即使最彻底的战斗的无神论者，骨子里都是寻神派，俄国人要么信仰上帝，要么反叛上帝，但不能没有上帝。犹太民族以其独具的使命成为上帝的选族，但它与人类大家庭似乎天然隔着一条无形的沟壑，它属于这个星球，更属于那个彼岸世界。惟有俄罗斯，即使满怀绝望，即使所有天使下来接引，也不忍离弃自己的苦难土地。

俄国的一切都是真正独特、唯一、不可重复的。俄国的敌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

最强大、最可怕的征服者和暴君：蒙古－鞑靼铁蹄、拿破仑、希特勒。彼得一世在芬兰湾涅瓦河口一望无垠的沼泽河湾上建筑起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都城，几乎整个欧洲城市的精华都被移植到波罗的海梦幻般的夜空之下。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在几乎荒芜的俄国文苑里开出让世界眼花缭乱的奇葩异花，俄国十九世纪的夜空一时群星辉耀；只有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伊们才敢于告别学院和前程，以俄国大地为背景，以俄国命运为题材，以俄国苦难和希望为模特，巡回漫游，睥睨东西画廊；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才能把一个伟大民族行将地到来的灾难和使徒般的勇气写在俄罗斯音乐的殿堂里；只有普烈汉诺夫，只有《路标》作者们，才敢在灾难尚未演变成浩劫之前，起身斥责未来的暴政，沉痛检讨俄国知识阶层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放纵和教唆；只有萨哈罗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才会在功成名就、誉满全球时坚守自由原则和良心高度，慨然与帝国分道扬镳，甘愿被放逐流放；只有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们，才能如赴幽会地回归弥塞亚精神，把红色十字架涂在 20 世纪俄国封面上；只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全世界率先执掌亿万人生死大权的老布尔什维克，始终葆有某种人性和理想，拥有被放逐、暗杀和枪决的命运；只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类君临天下的共产党领袖，才敢于鞭尸暴君，为了正义和真理，不惜让一个邪恶制度提前寿终正寝；而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遵循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动用武力轻而易举地镇压自由精神和民主要求，“旗帜鲜明”地捍卫苏俄政权和意识形态法统，勿需承担任何叛逆与异端罪责，勿需目睹俄国人五百年来缔造的欧亚大帝国土崩瓦解而无所作为的千古恶名；驱使他们参予并完成大幅改变人类命运的世界性转向的，竟是极其朴素的感情和最不起眼的良知力量，是与全世界无与伦比的统治权力极不对称的仁爱之心和自由精神。这种权力哲学和统治原则，不仅从来没有在中国和东方出现，也不曾在西方政治史上找到。甚至只有维辛斯基、叶若夫、雅戈达、贝利亚等俄国式的刽子手，才会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请求上帝宽恕；只有俄国暴君及其同伙的后才人有勇气逃离专制祖国，谴责父辈们的不义和罪愆；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别尔明、克利维茨基一类藐视帝国的叛逆者，公开与暴君决裂的独立特行者……。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俄国，在历史天秤上，良心比权力更重，救赎战胜罪性，并不是贵族、知识人和社会精英的特权。无论蒙受多么漫长、深重的苦难，俄国人民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被彻底败坏，甚至俄国统治者也始终残存着人性的底线，亚力山大二世在生死之际搀扶

他人而到卧血泊的形象多少摇弋着十字架的启示……。只有在俄国，仅仅因为道德缘故，人民一旦看清真相，就会任由一个令世界畏惧、令俄国“自豪”的超级大国毁于一旦而决不为它再流一滴血。试问，当今世界上，哪个民族仅仅因为精神的纯洁和道德的高尚，就可以让一个不可一世的政权无助地垮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它打破了西方三个世纪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之一的世界陆地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国家，它代表了人类解放的新希望，声称将把全世界的穷人和劳苦大众带到永远解放的道路上，它用 30 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它的养老、住房、教育制度，它的芭蕾舞、电影、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实现了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它的国防力量和核武库让西方心惊胆颤，苏俄缔造者一百周年诞辰时，它的五大航母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戈。约翰•里德九十年前写下《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患伤寒死在莫斯科，这名美国记者临终时为自己将葬在红场而无限欣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时为他的书作序，称“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了俄国革命捐躯者的葬仪的人，理应分得这分光荣”。一些名声更大的西方人罗曼•罗兰、杜威、肖伯纳、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威尔斯等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言辞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和向往；尽管有更多数量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俄国发生的一切正是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不是通过公众支持，而是通过暴力、狡诈和谎言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维持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实行否认财产私有制和法制原则，摧毁宗教信仰并强行无神论，他们造成的恐怖和文明的溃退将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它是一口沸腾着专制与暴力、仇恨和迫害的红色火炉，苏维埃俄国比沙俄帝国对西方的威胁更直接，更难以避免，俄罗斯将是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尽管俄国后来的历程比西方最阴暗的预言还恐怖，但俄国人民与这个红色帝国分手，仍然需要罕见的道德勇气，精神上的升华和超逾自己祖国历史的非凡毅力，——这远不是哪个民族都具备的。

没有谁能预告俄罗斯的未来，走出苦难和黑暗的民族不一定必然走向幸福和光明。但是，俄罗斯，连同它的悲剧和罪孽，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阴霾，不可告人的肮脏纪录，难以掩蔽的罪行，它那充满战争、征服、奴役的史绩，那举世侧目的秘密警察系统，臭名昭著的书刊检查制度，可诅咒的苦役和流刑制度，充斥阴谋和杀戮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及它那极端、矛盾、绝对和末世主义的天性，它那亚细亚专制主义毒根与欧罗巴自由花朵之间的古

怪嫁接，它那不时搅得邻人和全世界不安的神经痉挛性的历史发作，都使这个拥有双头鹰的雅努斯神，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人们震惊。

我们应该真正庆幸的是，不是希特勒、东条英机，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动辄"不惜发动核大战"的独夫民贼和战争狂人，而是苏俄统治集团紧随美国之后，掌握了能毁灭世界的巨大核力量，即使在冷战最令世人绝望的时候，苏俄核电纽也从来没有被恐怖原则和邪恶指头掌控过。

克里姆林宫一度成为世界的希望，成为半个人类的祖国，不是没有缘由的。即使遭到重大的扭曲，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俄国的救世精神仍然拥有特殊的启示意义。俄国的经验本来就由两个源头汇合冲撞而成，西方基督教、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以任何人也难于逆料的方式进入俄国，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是西方文明最自觉最宏大的中转地和实验场，俄国的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何其难以相容，俄罗斯要越逾、战胜的，乃是世界上最难消解的悖论，最难抗拒的宿命。

但俄罗斯仍然是我的精神麦加。

俄国是奇迹丛生的地方，俄国让一切人类经验教训都黯然失色，当西方惊魂甫定，感谢上帝终于让俄国这个西方三百年来的最大威胁成为历史陈迹时，俄国仍然维持着基本的尊严。它那布满血丝的眼睁充满痛苦、迷茫，但仍然放射着光芒，那是几百年间俄国人在清水、碱水、血水中浸泡，在西伯利亚和古拉格群岛上磨砺出来的光芒。没有玉石俱焚的怨毒，以牙还牙的仇恨，俄国表现出真正男子汉的高贵，自己的伤口自己舔，牙齿掉了和血吞下，肋骨断了用手撑住。没有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给俄国一丝同情，让这个饱经磨难、自化脓血的巨人有所支撑仰息，世界在目击俄罗斯倒下去的时候，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却没有留意到，这位巨人即使肢离体解，还是那么庞大、倔强，显示出超世的力量、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是，俄罗斯并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一个民族面对如此深巨的旷世劫变，表现得如此从容，庄严，甚至优雅浪漫……，这正是神圣俄罗斯的本色！君不见，俄罗斯母亲，高加索的英雄，伏尔加纤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幽灵都在一一复活，在专制暴政和红色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自由、民主、多元和神圣的俄罗斯开始诞生。俄国正在领受新的天命，创造新的奇迹，它沉重的喘息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倾听。在人类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悲怆而壮丽的方死方生，敢恨敢爱，予取予弃！势利的人类至今不能洞察俄国的转向对世

界的意义，是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领悟和表达伟大史诗的能力，那曾是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罗斯天才们最擅长最倾心的活计。只要俄罗斯原野墓地上空的流云还在飘荡，无数教堂还在敲响悠远的钟声，白嘴鸦还在春天某个时分如约归巢，只要冬宫、夏宫、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的雕塑、柱头、壁画、吊灯、陵寝和无数明亮清澈的眼光还在闪耀着光辉，俄罗斯就会上升起照耀世界的星辰，俄国可能再度让世界不安，俄国更可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虽然没有去过，但俄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亲近，就像一位远行的兄长，老朋友，有时甚至就是另一个我。俄国曾把我们带入泥淖、血路、深渊，但谁也无权谴责俄国。相反，中国本来就满怀功利之心追随其后，阿谀奉承，“一边倒”，言犹在耳；一朝反目，立成寇雠，不共戴天。在人家困厄纷至时，我们何曾表露出寻常的同情和起码的关切，直到互为“关系年”的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对俄国表达过真诚的敬意和祝福，不过沿袭毛泽东们的积习，除了利害、算计和“战略合作”而外，中国何曾去到俄国那些巍峨宏伟、金碧辉煌的教堂、宫殿中，倾听一下俄国世世代代如聆天堂之音的钟声，何曾在那些荨麻地和柏桦林间的十字架前驻足深思，何曾在那些青铜、花岗岩、大理石和黄金白银镌刻的雕像前脱帽致敬！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知就表达过寻找精神祖国的世间原则：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西方的自由、多元、富足固然令人向往，中国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感官享乐的世俗狂欢未必毫无意义，但我只选择俄罗斯，勿需安魂诗、“白痴”般的圣者、高加索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几首俄罗斯民歌，几句阿赫玛托娃的诗行，几本《往事与回忆》，就足以教我心向往之了。俄罗斯，就在窗外歌乐山那边，同样的秋光下，不一样的月色中。

我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一篇题为《俄罗斯启示》的文章里写下“圣地不空”几个字。近二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想得起写下这几个字心中的感受。现在，它们大概已经融进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浩大弥撒曲里。不敢自称为俄罗斯命运的东方祝福者，至少，在它空前困窘尴尬时，我没有报之以冷漠和鄙夷。因此，哪一天踏上俄罗斯土地时，我会怀着对一名不曾谋面却心仪已久的老友的倾慕说，你好我的麦加，我的俄罗斯！

（原载《民主中国》）

俄罗斯的启示

編者 2006 年 5 月 17 日按：

有關此文的寫作源起及意義，可參閱余世存先生的“王康作‘俄羅斯的啟示’記”一文。不求聞達，八九之後更一度發誓不與官方合作、不與自甘墮落的文壇同流合污的王康，一鼓作氣將此文完成之後就束之高閣了。此文原作十四余萬字。作者流亡期間多處輾轉，手稿遺失泰半。與作者的其他文章的命運大同小異，遺失之後的殘稿，先在他的友人中復印傳閱，繼而變成電子版文本在電子信箱裡傳閱，最後不期然被捅上大陸各別網站。上網時，殘稿中論及中國文學現狀的部分，再被刪節。——這仍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半個世紀以來，唯一一篇針對中國文學現狀的俄羅斯文學綜述之力作，在中國文學領域無立錐之地；在網上被貼出的時候，還得將相關部分刪除干淨。——不過，即便又殘又刪，這篇文字“足以改寫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余世存引單正平語），對於 49 年之後喧騰之中幾近荒蕪的中國當代文學，仍是一個絕無僅有的貢獻。15 年後的今天，爭得作者同意，將此命運乖蹇的文稿殘部發布于此（文內殘缺處以括號文字標出），以饗讀者，留諸後世。

——————————————————

致启者：

“帝国”是最有力、最危险、最无耻的诱惑。僧侣、独裁者、贵族、君主、第三等级、酋长、革命党、无产阶级、专家、现代派以及蚁蜂蝗蚂，都赴之蹈之死之，不绝如缕。从罗马帝国到拜古廷帝国到第三帝国到苏俄帝国，这些一度如日中天又轰然坍塌的庞然大物，已如烟逝去。

大洋彼岸金元帝国由于年轻,由于得天独厚,由于福音未绝，依然轧轧有生气。

现在轮到东方这块土地这伙人君了。

一个大帝国正在笼罩，它可利用的物事太多，它的借口，它的创伤，它的劫难，它的经历、智慧、危难……都足以建造一个新的帝国；忌恨、复杂、逞凶、肆虐等一切人类最低级野蛮的秉性都在聚集,帝国绝对不缺少它的将相兵卒。它已不需要包装,只等机缘四起！

只有一个因素令它颤栗,那是一个问题,一个似乎论定的问题：建立一个帝国并不比完成一个童话、一首诗、甚至一次彻底释然的回忆更困难，而在它以后呢？

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终于迎来大帝国的旭日，我作为它的预言者和目击者，将不会省却言辞去正视和面对它，而我却首先要诅咒它，首先预告它的崩溃。

俄国伟大，单凭其道德和良心力量就摧毁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我写下这篇散文，祭奠和凭悼俄国的苦难先驱，追视他们七十年的十字架，赞颂他们心中那盏摇弋了七十年的烛光，并为全体俄国继续承受的不幸祈祷。

俄国有权力拥有未来，他们既然能最终超越一个冷酷的帝国，也最终能超越一个贫乏的帝国。

我们呢，有人已写下《黄祸》，无数人拼死离开这个国度，只因为大厦将倾；另一批人正蓄势待发，更多的人则重新归于动物般的沈默。只有我，念着祭文和悼词，既为昨日，更为明天。

我是死者，死而复生的行吟死者。戳破所有伎俩，心怀最大的耐心和善意，在无数次的沦落中为每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信、望、爱鼓舞。

我写下这些文字，即随意又严肃。我切望读者关注俄罗斯，我们那真正伟大而苦难的邻人；我更深盼诸君关怀我们自己这块土地，关怀这颗星球上失去方向、失去信仰、失去光明的最大的人群。

老康 91.2.5 北京

俄罗斯的启示（上）

——兼论王家新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九一年八月重庆

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象飞行员，象星星。

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

抵押给了时间。

[俄]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夜》

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 年 2 月 10 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会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在一年前将 1990 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俄苏著名诗人沃滋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 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突破，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 195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1970 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 1974 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察官对峙。1987 年，出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讲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得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帝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威胁人类文明的苏联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

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在这与人类命运和诗歌本质攸关的空前的精神聚会中，一次并非偶然的缺席被严重忽略了：无一中国诗人到场。

几个月后，在日益沉寂而遥远的东方，中国诗人终于对此作出了反应：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查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露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天空更高远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弥漫我的一生

（王家新：《最后的营地•帕斯捷尔纳克》《花城》1990年第6期）

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以下简称《帕》）的发表只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微弱回应，在现时中国无力引发任何轰动，算不上新的诗群的“崛起”。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诗歌视野和诗歌立场已被采取；意味着中国诗人对世界历史进程和精神时空秩序的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换：从西方返还东方，从斯德哥尔摩返还彼得堡，从诗歌本体返还诗人生命，从玫瑰返还火焰与冰雪，意味着如同历代诗歌先驱一样，对永远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进行彻底的还原；意味着历经喧哗与虚幻之后，姗姗来迟，却分外深广的精神离析现象正在诗人的内心策动：面对人类第三个文明千年的临近袭来的那浩

大、神秘、奇迹般的气息，面对世纪末日益紧迫严峻的总结一切的律令，让诗和诗人重返事实与价值王国，以彻底的语言立场坚持对世界的衡量、作证、安慰和拯救，并预示未来笼罩的规模，最终在沦丧和救赎之间作出抉择。

这一切有权引起极大的关注。

让诗人站到帝国面前，把命运和使命托付给诗人，解除中国诗歌的老残困厄，为十数亿生灵的存在与命运的言说事业效力，已是不为任何暗示所惑的中国读者的义务。

笔者与王家新素无交往，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但还有六名诗人因一盒名为《安魂》的录像带，从 1990 年 3 月中旬遭“收审”、 至今在押的事件（令人联想起苏联 1964 年对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65 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的“审判”。它们在苏联国内在全世界都遭到强烈抗议——帝国对诗人的迫害最终损害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表明，“俄罗斯的永恒矛盾”至今仍然支配着中国诗人的命运,从而成为写作本文的直接原因。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本文与本雅明“收藏家”的读解不谋而合，而引文极有限，只是按一个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随意地阐述。至于《帕》诗学价值的探讨，不在本文范围。

笔者相信：诗源于拯救。在当今中国，漠视或否定拯救对诗的首要性，是诗人失落过早，读者最为欠缺的文化品格。

(第 10 页缺)

……选择帕斯捷尔纳克所要解决的“诗人——帝国”矛盾。这就赋予对话相当确定的范围，使阅读从标题（诗人柏桦告诉笔者，“帕斯捷尔纳克”是中国诗人近年共有的对象）开始就进入无法规避的严肃场景，——要么拒绝（当然不是拒绝帕氏的艺术和殊荣）这一场景，要么与王家新一道与墓中诗人进行一次亚细亚式冗长而沉重的对话。

诗人之间的对话，常始于诗人与世界对话的终结。《帕》始于墓中诗人放弃的选择：流亡。正是对流亡的放弃使帕氏以《帕》的形象与中国诗人对话成为可能。而我们却必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屏风。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

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或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

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到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回到过去的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勃兰兑斯就此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地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 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

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 9 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 9 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 9 日已不远了。

70 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倾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象都黯然无光。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

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 1922 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伤感地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残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构成的现实压力及其对流亡作家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只是更复杂紧张。西尼亚夫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一文，拒绝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它有力量切断这个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者，并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甫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

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 20 至 40 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 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除俄文外,它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文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尔多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度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 1917 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变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地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

上。

《帕》第一行诗句所试图抵达的，正是那个巨大的景观，所提出的，正是这一景观与中国诗人的关系。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此处缺页)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

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个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 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 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 30 岁，古米廖夫 24 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娜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15 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娜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

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1921 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了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 年 12 月 27 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 1963 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为“海参威”)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 1142。

1941 年 8 月 31 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耶娃， 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 1960 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娜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肩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憾着幅员辽阔的俄苏帝国，并且远远越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子代替父亲前往斯德歌尔摩接受迟到 30 年的荣誉之前两年，布罗茨基已经在那个讲坛上宣告了俄罗斯古老圣地的新生：

这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正是奥斯威辛的焚化炉烈焰滚滚，正是斯大林象上帝一样处于仿佛是自然母亲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峰巅之时——这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继续那些被焚化炉和斯大林那些为群岛般众多的无名坟墓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至少在俄国是如此。这一事实应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因从属于这一代而感到的骄傲丝毫不下于我此刻站在这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这讲坛上这一事实即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所提供的服务的承认。我想起曼杰施塔姆的一个概念，愿意补充说，（俄罗斯诗歌的任务）是对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务。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块空白的——真正可怕地荒凉的——地方，我们凭着自己的新的，在我们看来是当代的内容来填充它

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毁坏的形式。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似乎还暗示着中国诗歌自身的一种难言处境。

“不能”一词可能有某些实指：1958 年，墓中诗人由于其“出世、生平和工作都与俄罗斯连在一起”，都与它的人民、它的过去、它的光荣的现在和它的未来连在一起，“不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据称，王家新本人也因诗歌以外的缘故，“不能”到阿姆斯特丹参加 1990 年世界诗歌节。

“墓”取代北欧都市，突使“不能”划分的世界隔阂几乎深不可测，其途程比从彼得堡到斯德歌尔摩更为迢遥而崎岖：这是一种精神日历和诗歌极地上某种本质性的差异。由于抽身过快，逃隐和藏匿成癖，由于剽窃与摹仿过度，由于某种男性元素的生物性置换，中国诗人已经丧失了、甚或从未建立起一种基本品质，赢得一项权利，秉有一次资格，开辟一种状态，真正显示不朽与永恒。“不能”，就是欠缺、丧失、沦落，一种绝境。

自从中国诗人以“不信”、“不满”争辩、抗议、期待以来，“不信”、“不满”的对象依然只出售垄断与粗暴。《崛起的诗群》曾判断道：“……他们甚至将自己无法战胜的艺术创新拿到了政治法庭上去参与审判。艺术和时间双重地戏谑了他们。朦胧诗从它数年经久不息的存在和基因繁衍，标志了多元对一元的胜利”。坦克和诗的肃杀、秘笈状况对此作出了回答。接着，中国诗人宣称一种“不认”的哲学，一种任性的赌气，帝国却“认”他们。随着一阵短暂的打情骂俏式的内战，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吵吵嚷嚷地“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人领头的大规模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崛起的诗群》以唯一者的口吻写道：

今天中国诗的主潮，无论如何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无法不把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诗坛的最高点，作为自己的理想参照。

于是，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利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中飘泊的占星方士，等等。此外，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诗人都在或隐秘或公开地做着诺贝

尔之梦。从帕斯捷尔纳克以来不到33年时光，已有约20位诗人获得此奖，那种炫目的刺激和成功已构成中国部分诗人的最大情结，成为共同幻觉的根据和归档。《今天》在西方复刊后，近日将其编辑部从挪威奥斯陆迁至瑞典斯德歌尔摩，这种地理位移毕竟透露出一种心态。而当笔者移动地球仪时，分明感到两地离中国都同样遥远。《今天》那种经济上的拮据实该同情，然而其精神上的寒酸和小丈夫气，只能再次招致失望。

而我们不奢望中国流亡文学（精神和存在状态）达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罗斯流亡文学的高度和成就，不指望连自身基本问题都未解决的人们之中能产生真正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俄国式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蒲宁、雷米佐夫、库普宁、梅烈日科夫斯基、胡达赛维奇、茨维塔耶娃、纳波科夫、赫烈勃尼科夫、斯特拉文斯基、拉赫曼尼诺夫、康定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和布罗茨基……

严酷的事实在于，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其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的流失或随意的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它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歧误。它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附高处；它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即轻易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它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不能”一词近乎谦卑地陈述了这一现实，它标志着那个虚拟的流亡神话的终结。“玛利娜的诗常常从高音C开始”，阿赫玛托娃评论茨维塔耶娃说。《帕》则是从低音C开始，以适应诗人返身、下降、沉潜和还原的趋向，这种境况较近于古米廖夫的《永恒》：

他教我沉默，教我斗争，

教我世间所有古老的智慧——

然后他放下拐杖，转身

简单地宣告：我们已经来到这里。

在流亡和自残之外，在首次意识到自身“不能”所包含的屈辱之后，中国诗人终于站到了普希金拒往希腊和英国的那块礁石上：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牺牲的时候，／诗人……怯懦而虚荣……／也许他是最空虚的儿童／然而，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他的灵魂立刻颤动起来，／象是一头惊醒的鹫鹰。

中国诗人“在毁灭和烈火中轮回”的艺术,“在时间的打击下,最终站稳脚跟……”的困守姿态。“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令身居中国的读者不难感到，一个正在启程的当代朝圣者正在诞生，这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独具的拯救原型。

每一名诗人心中都有一座坟墓，一枚十字架，一片圣地。所有的朝圣者都冒有缴付自身精神独立和完满感观的风险。而对于已退守到最后的营地，除守望和倾注外已无物可恃的中国诗人，他的唯一风险就是半途而废。

在这茫茫人寰，俄罗斯诗人墓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朝圣之地。也许，它们是特意留待中国诗人穿越千里风雪去探望的：

但生命的书已翻到最珍贵的一页，

这一页比什么都神圣。

已经写下的就应该实现，

就让它应验吧。阿门。

你看，时代的流逝象寓言，

在流逝中会化为火焰。

为了证明其博大深远，

我将甘愿受苦，走进坟墓。

我走进坟墓，三天后复活，

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

象木排，象商队的木船，

依次拥来，接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的诗•客西马花园》

圣地不空。这就是俄罗斯的启示。

(此处缺页)

世界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到了二十世纪才结束帝制；俄国有“第三厅”（秘密警察）和书报检查制度，中国有明代特务机构“东厂”和“文字狱”；两国都采用

了德国激进社会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是这两个亚细亚、半亚细亚式东方大帝国，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此处缺页)

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正好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要尺度之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王权精神垄断的残余的真正终结，是由 1644 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著名历史文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完成的。T•杰斐逊在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此处缺页)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1967 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20 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娜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真正败坏道德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

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指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斯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记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 5 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家”时，竟惹得审讯者哄堂大笑。

象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裁）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诗人的处境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中兀然不动的人。”他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

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发生的一切。”

在俄国，“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成为“生”与“死”的选择。当王家新喊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时，这是别具勇气的认同意识。但中国诗人和读者是否应该一起心口苦涩？

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的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自觉和坚定的高度。

正是把生活与写作上升到生存与死亡残废这一人类基本问题的立场，使俄国诗人从整体上远在中国诗人之上。对于俄罗斯诗人，唯一阻止他们写作的，只是他们有愧于上一世纪的先驱诗人，只是他们的生命尚未抵达黑暗的尽头，只是他们的语言尚未建立能够覆盖遍布帝国的古拉格群岛，尚未穷尽人类命运在俄国的独特道路的艺术形式，也只是他们个人的精神尚未突破恐惧和内心危机而震憾世界。

面对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命运，俄罗斯诗人坚持住三种主要的伦理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命运的控制和矫正：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激情，对祖国和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

帕斯捷尔纳克衷心推崇茨维塔耶娃，认为她比阿赫玛托娃“更伟大”，“在虚伪做作的年代里，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道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声音”，这位女诗人“具有男子的魂魄”，能忍受最彻底的寂寞，“她与日常生活的搏斗，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她奋力追求并最终达到了完美的纯净”。

俄国文学史家马克•斯洛宁用了最美好的不适宜于文学史的字眼盛赞茨维塔耶娃。他描写了女诗人优美绝伦的高贵仪表和气质，她的悲惨遭遇、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和诗歌技巧、她对普希金的钟爱和与帕斯捷尔纳克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她身上最令人震慑的，却是心灵深处的激情，“她从来没有保持中立或冷漠的态度，而总是似痴似狂热爱或憎恶某件艺术作品或某个人。她特别喜欢的格言之一是：‘文学是靠激情、

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似乎要体现和表达运动着的永不宁静的自然力，一股冲破人世牢笼永远向上的浪潮。她常常把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变为激动人心的、强烈非凡的诗意，“她意识到，自己过分的热情和憎恨使她必然走向生命的极限，”在这个锱铢必较的世界上，“我对我过分的感情激动该怎么办呢？”她很早就看到自己诗歌中那高贵死亡的形态：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正是这种激情，把茨维塔耶娃推向生活的绝境和写作的巅峰。布罗茨基指出，在“唯有通过文学才能了解自己”的俄国，对茨维塔耶娃的作品“采取扼杀、打击或是不闻不问不承认的态度，这简直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犯罪！”（1928 年，女诗人曾在巴黎出版了诗集《离别俄罗斯后》，这是她生前发表的最一部作品，而俄国侨民文学界对此却只字未提，在苏联，她的作品被禁止发表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向世界为女诗人大声辩护：

她不是怪戾的诗人——20 世纪的俄国诗歌里听不见比她更富激情的声音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严格限定了写作范围，“我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到这里为止。我不是把它拦腰截断，而是有意不将它写完。我把句点正好写在我当初想写的地方。……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他感到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他相信，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帕斯捷尔纳克表面的沉默只是因为“写下去过于艰难”。要写的是一个过去时代诗人未曾预言和想象过的、对人的坚韧、尊严、勤劳有着严峻考验的世界，只是因为：

写它，应当使心停止跳动，让毛骨悚然。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下作，厚颜无耻。

我们离理想还差得很远。

而这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他正临近完成《日瓦戈医生》。他在逝世前一年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来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借哈姆莱特之口，道出俄国诗人作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的艰难的幸运：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象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此处缺页)

茨维塔耶娃“最终脱离了俄国文学的主流”, 她和时代失之交臂, 而这并不是她自己“深思熟虑的追求, 而是迫不得已, 由外界的因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堡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驶诗歌并遵循共产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姗姗来迟的礼物必须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一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1961 年，诗人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死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 1937 年致信帝国元勋丧妻慰问其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为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和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

到了索尔仁尼琴身上，按内心生活、写作，达到了新的明晰和广阔。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毫无个人目的，把文学看成俄罗斯和人类的共同事业。《古拉格群岛》就是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对生者应负的责任”，“对死者应尽的义务”，在若干岁月里成为他的写作动力。他在这部旷世奇书最终完稿时写道：“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多次想过：不会让我写完的。”

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伏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

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阿赫玛托娃和札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

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恶？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

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 1974 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基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早在五十年代，苏联老暴君刚刚去世，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冻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作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的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敏慧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即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这样，我们来到了俄罗斯启示的殿堂。

笔者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亚细亚式的冗长而沉重的对话。“亚细亚”在这里完全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那个“俄罗斯的永恒矛盾”所覆盖的精神空间。而在王家新诗本身，发动对话的一极仍具备完整的亚细亚地域形态。第一，诗人在冬日北京公共汽车上读帕斯捷尔纳克，并推演出一首诗所必需的空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仅存的亚细亚风俗；第二，只有在亚细亚的中心，诗人的“自我”才能与“一次次劫难”、与只能“在心中呼喊”的那“一切”共同构成一首诗，这是在俄罗斯诗歌圣地的审视中，一位诗歌朝圣者内心信念的独白。

帝国首都在诗人视野中从来不是普通的风景。荷马赞颂过雅典，但丁诅咒过罗马，瓦格纳表达过柏林，艾略特和乔伊斯都曾企图诋毁“不朽的伦敦”，波特莱尔和庞德都分别影射过所属帝国首都的麻木和幼稚。只有俄罗斯诗人，对其帝国首都的变迁迷惘不已。

在十九世纪俄国人眼里，彼得堡那些宏伟的建筑，总令他们看到雅典、罗马、柏林和巴黎的影子，帝国京都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向西方世界的“加列纳亚拱门”，“俄国版希腊文化崇拜的纵隔腔”，是俄国精神现代化的年轻的心脏，而莫斯科则代表着东方君士坦丁堡和鞑靼金帐帝国遥远而屈辱的往昔。帝国首都的西迁标明了整个俄国精神的流向——于是彼得堡成为俄罗斯诗歌而且是诗体学的摇篮，孕育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曼杰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一座殚精竭虑发明的城市”。布罗茨基称曼杰施塔姆的诗是“彼得堡式”的诗。曼杰施塔姆在本世纪中看到“几股精神流派在彼得堡合为一股”，他在旧俄国的京城已看出罗马古都解体的远影：

我们会在彼得堡重逢，

我们似乎已经把太阳埋葬在那里。

二十世纪的俄国诗人再也发不出普希金“我爱你，彼得的作品！”那种少年般的赞辞。由于二十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的猜疑、恐惧和狂热被引向一条特别激烈、残酷的道路，帝国中心已重新返回彼得大帝之前的东方的莫斯科，这迅速筑垒起来的权力大厦注定要使彼得堡燃烧了几百年的精神光辉黯淡一个世纪！阿赫玛托娃借“纪念……围困期间死于列宁格勒的我的朋友和同胞”，在一个“隐蔽的合唱队”中从深

处，从内部目送了俄罗斯命运的重要篇章：

俄罗斯被死亡的恐惧

夺去了理智，心怀复仇的日期，

垂下了枯干的双眼，

极度地伤心，在我的前面，

从变成了灰烬的地方

走向了东方。

在亚细亚的中心，北京弥合了莫斯科（权力中心）与彼得堡（精神中心）的差异，它是当代中国所有欲望和可能性的独一无二的主顾。中国另一个大城市上海，代表南方抒情风格和趋近西方文化的一度是中国现代化的某种标本的大都市，已沦落为一座创造利润的大工场，文化界至多能拿出精致无力的《围城》，象鲁迅那种照亮甚至点燃一个时代的作品已不复存在。只有垂老的巴金在漫长的挣扎中呼唤帝国给予最起码的"真实"。中国当代文化重心随着权力结构的改换，再现出俄国在本世纪的全局性退潮——从海岸退回大陆，从年轻的开放的南方，退回呆板、保守的北部古都。

这使得居住在北京的诗人具有某种诗人——帝国概念，虽然还不成形，作为一种诗体。北京诗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风格。

同时——也正因为这一概念的日益内在化——诗人从内心指出了帝国首都的宿命：当它不仅吞噬了南方和西部寥阔的空间，而且在精神上阻断了它们的出口时,北京自身就必然重现俄罗斯帝国在本世纪发生的启示录般的史诗演变，即那古老罗马的主题、庞大帝国的原型困境：幅员辽阔、头重脚轻的强大帝国，其精神、锐气、理想和活力都不可挽回要被自身的一成不变的时空轧碎，诗人会成为这一切的证人，正如彼得堡在俄国诗人心目中，成为"如眼泪般熟悉的审判"。

北京是明清以来历代王朝的权力范本，其纬度介于雅典与罗马、华盛顿和纽约之间，但真正集中地展示其现代精神结构的，却是从莫斯科移植过来的斯大林式俄国伪古典主义的作品，其中奢侈不当的空间、庭柱、石阶和窗户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通过苏俄帝国表露的恢宏而虚浮的历史观。它们只是炫耀两个词：帝国、权力。它无时不刻不在宣扬一种绝对的自恋狂，在权力结构和精神结构上它都不允许有任何对称或辩证存在的可能。这是一种危险的独白，在历史上，它已以两个日子（"四•五"、"六•四"）发出警告。

王家新指出了另一个北京的存在。“轰响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这是与帝国大厦、深宅高院、四隅埋伏的现代卫队潜存对称的空间。诗人在一场弥天大雪中丧失了对帝国京城的意趣，只凸存了“使生命骤然疼痛”的“一次次劫难”。“北京”一词，在这里只为一种“心中呼喊”而有意义。“轰响泥泞”，是诗人眼中帝国的旋律和形态，这与帝国发言人和社论撰稿人宣称的“稳定、繁荣”不仅是对时局不同的感受，而且是更为基本的分野。

帝国既然执意要垄断、控制、掠夺和改造一切现时存在，并动用了武装力量禁止任何言说，诗人就只好率先、彻底地回到内心。但这绝不再是帝国元首所喜欢的那种远离世界的渺小的“个我”的归返，不再是动物式的精神沉默，而是一场在帝国及其中心，在它最想抵达而又最难进入的疆域——人的心灵的“革命”。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要面对和抗衡的，首先是内心的阴暗、怯懦、自私和一切生物本能，帝国的同盟军、密探和卫道士就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和最后的斗争，就在这里，只有在内心，我们才是整体，帝国才是碎片。一场帝国倾听不到、无由打探、无力控制的“内心革命”，已被表达：

苦难中，我们总是不能得到安睡。这仿佛是钟表嗒嗒行走的声音，不，是冰块在开裂、流动。你抑制着，唯恐又是幻觉，但在寂静里它发出的声音却——那样奇异！你甚至可以触到它那闪耀的光芒了。整个冬天倾听着。你感到这声音就要消失时，它又从另一个方向流来。现在，它再次响起。它在加速。它似乎执意地要把你彻底弄醒。这还是冬眠的日子啊，你想，却有什么不让我们安睡。你这样想时，一瞬，化雪的日子来了……

以中国之大、之复杂、之激荡不宁，要使中国成为人类文明正面的、健康的、积极的继承和光大者，中国人必须有一个精神、道德和灵魂重建更新的革命，舍此，我们就挣不到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成就和复活，并很可能永远丧失言说一切的资格，因为精神的沦丧而永远被拒斥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

真正的危机和希望永远来自人生的内在审定。诗人——正是诗人、尤其是当代中国诗人——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接受“检验”，接受悲剧、恐怖、寂寥、贫穷的“检验”，接受谎证、虚无、焦灼、颓唐和末世精神的“检验”，用那“不安、高亢、纯净的声音——也许还是一个颤抖的声音，宛若劲风中燃点着而且绝对不可能扑灭的火炬”的声音来发言，用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引用其亡夫的话，就是“不是强制，不

是宿命论的诅咒，而是不同时代间的连接环节，如果从先辈手中接过的火炬尚未被扑灭的话”。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诗人象俄国诗人一样，把自己交出来，放到约伯的天秤上！

(此处缺页)

作为一名朝圣者，他只能在“劫难”和“疼痛”中去呼喊：这就是你！

这是一种新的精神离析过程。给灵魂一个真正独立的时间，超越帝国权力的空间结构，在内心颠覆帝国的精神形式。（政治人士王军涛今年二月在给其律师的信中，痛感一代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可悲，“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贵族格调——一种高贵纯正的心灵……据我所知，在一场象 89 年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然只有那样少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良心的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考虑到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岐视这类辩护，这就更让我汗颜惭愧了——为我的同胞渐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仅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辈。我并不很重视政见分岐，政见总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是经常变化的，我最看重虔敬真诚的追求精神，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多少有系于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主宰文化的知识分子更有出息!）

1876 年 10 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 大调如歌的行板”时， 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㈠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㈡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俄罗斯伟大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诛过的俄国人血液中的“奴性”以及“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足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劫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的无谓的“个人化”，仍然

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而我们，又以什么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正、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

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是“对的。”因为那位十九世纪的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索尔仁尼琴在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毫不犹豫地写道：

祝福你，监狱！

可以设想，那场不寻常的大雪直接降落到诗人内心：他以亚细亚帝国首都诗人独有的情怀撞上了亚细亚式的悖论：你在生命时空中与你的同胞同在，你竭力去分担和减缓或升华他们的不幸，却在精神一美学领域不惜穿越风雪去呼喊异族的“高贵”而陌生的名字。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有益有、明亮而悲壮的悖反，一种真实纯正的孤傲从内心涌出的企望融合生命潮流的诗人的痛苦，一种超出语言和形式的期待：

实际上，有时全部时代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必要的人，一个肩头着火，身怀绝技，在沉默中向我们逼近的人。

它的来、出现。他的脚步在我们这里回响时，在哪一个城市、哪一张

(73 页完，此处缺页)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

按勃兰克斯在《俄国印象记》(1888)中所说，俄国诗人的气质是“伟大的、愁郁的、富于极端性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 1453 年拜占廷垮台以后，

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遗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邱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倒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和近代民主政治被普遍接受以来，在俄国却发展出另一种独特的世纪主义和未来图式，即俄罗斯的特殊命运和使命。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和西欧通，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这种受伤害的民族自尊心也来自俄国社会内部受西方文明影响、认为俄国的得救在于接受西方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 1826 年到 1850 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但是，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 1848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救世主义迅速占了上风并激化成亲斯拉

夫主义。这种亲斯拉夫主义一开始就面对着在历史进程中难于把基督教救世论和俄罗斯帝国命运截然分开的矛盾。亲斯拉夫主义从俄国东正教传统出发，认为俄国精神的谦逊和公共性、强调集体、社会高居个人之上以及兄弟和睦友爱，比起折磨西方世界的利己心和物质主义更能在精神和灵魂上革新俄国和世界，更符合基督教关于真理、慈爱和精神自由的圣训。

康士坦丁•阿克萨科夫甚至把俄国公社（村社）看成上帝之城的雏型，“一个公社是那些已经放弃利己心和个性的人们的联合，这些人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愿；这是一种挚爱的行为，即基督教用它的其它多种言行多少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行为。因此，一个公社象征了一个正义的教堂合唱队，正象在歌唱队里一样，个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按照共同的音调让人们听到所有人的和声；所以个人在公社中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放弃他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赞成共同的心愿——于是有理性的人们（自觉）的和睦共同存在的高尚现象应运而生，一种兄弟关系即一个公社出现了——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成功。”

车辆拉特格斯大学“东欧和苏联地区研究计划”指导塔雷斯•亨札克在《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一文中写道：“这些浪漫主义的思考把俄国的整体看成是渗透俄国各阶层生活的固有准则的产物，有助于预示俄国救世主思想的出现。这种救世主思想为黑格尔关于文明史发展的协调性观念所补充，即在不同时期，某个民族在文明发展方面被赋予了揭示绝对精神的使命。亲斯拉夫派认为拯救世界是俄国的命运。这种宇宙神教对无论何种救世主的抱负均可适用，它却由于亲斯拉夫派要把俄国和东正教教会、它的组织以及复兴人类的理想等同起来而被制造得适合需要。”

自从普希金在 1831 年写了《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后，俄国诗人就深深地卷入俄国命运的旋涡之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亲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欲不过是俄国的习欲而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出：“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理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

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

然而，对帝国缔造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俄国诗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这样的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种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开始，俄国诗人与帝国在精神上的离异就开始了，准确地说，俄罗斯诗人与帝国的决裂始于 1839 年。别林斯基在《鲍罗廷诺纪念日》中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虽然半年后，别林斯基“撤回”了那篇文章，并对自己写下把“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当成一种绝对权利”深感失悔，还是导致了赫尔岑和他的断交。1855 年，当果戈里在法国撰文称颂帝国时，别林斯基发表了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斥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了那个时代俄国作家的使命：

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比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

(此处缺页)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地“绿枝”的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处，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中与魔鬼真正对峙的索妮亚、帕斯捷尔纳克的拉丽萨、格罗斯曼的叶尼娅所标识的俄国斯灵魂的核心——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它所

坚守的是理性、规律、权力和“轰响泥泞”的一切妄图粉碎的僭越的爱、善良和对启示的祈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难的智慧，“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它的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

尽管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诗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的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对这个充满谎言、不幸和死难的世界，他的梅思金公爵、德米特里、伊凡和索妮亚作了回答：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的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要受人发扬光大的”。

(此处缺页)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1852 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萨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象处于‘前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 1917 年 11 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

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与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欲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毁他的“大自然母亲”，他的诗人本性“没法使自己念上哪怕五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不是人‘新人’，我一只脚踏在过去……”

1921 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他。”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遣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全俄作家的“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 G•霍斯金在《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鄙的人物，也扮演过一个暧昧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为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时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

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协从二十世纪俄国独特罪恶的俄国诗人，同时也彻底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 1937 年到 1939 年的政治清洗中，“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羊的血泊。阿•雷马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在俄罗斯，作家永远被看作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国青睐，“他甚至还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 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的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院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尽管如此，“每当他试图进行说教而越出一名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依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凡雷帝》，1943 年），他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最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以及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沉默的鄙夷态度。1966 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邱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出了问题，1943 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与自杀者、丧失本性者、误入岐途者者和卖身投靠者不同的，是另一类俄国诗人，二十世纪俄罗斯启示的主要体现者。他们面对的困境带有更为全局和根本性质：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在二十世纪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可不可能重新坚持和推进这一精神。

无论人们对于 1917 年以来的俄国历史作如何评价，下述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俄国十几个世纪蓄积起来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弥赛亚精神，尤其是其中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平等观念和人类理想，确实在文化内层结构和民族伦理基础和传统心理系统方面为新帝国所声称的作为帝国学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俄国的特殊劫难，（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人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2000 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 20 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了 6600 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 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应当客观地说，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变化不定的问题，俄国诗人对七十年新帝国的反思也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关于俄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的关系和在这片欧亚大陆上生息的各个民族的依存形式的讨论。由于苏俄帝国的疆域和实力，和它那正在激变的社会必将深刻地、甚至永远地改变人类命运。与西方诗人不同的是，俄罗斯诗人在俄国命运的演变中一直是潜在和公开的强大声音，这一声音和整个苏俄社会交织在一起，分担和影响着俄国与世界的命运。

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

直接与帝国抗衡。

1881 年和 1901 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警告新帝国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曹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致信新帝国，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国际裁军和外交等问题阐述了与帝国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唯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对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的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

我与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阔的故土，你们不是不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渴求的弥赛亚主义走向岐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量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深的源头。

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艾吕雅、聂鲁达、庞特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帝国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对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期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

索尔仁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 20 年的历史了，在别的共产党国家里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云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人间的耻辱了。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 1937 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能否把希望放在“善”上面，人类本性中的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称颂的“善”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二十世纪集中在俄国和德国出现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本身的国家化的恶，从古希腊和基督教以来的欧洲文明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确实既是二十世纪独特的难题，也是被二十世纪继承的全部欧洲文明的难题，也是二十一世纪亟需解决——否则仍然面临人类集体毁灭之虞——的难题。

英国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从纳粹德国的教训中提出了与格罗斯曼同样的问题：

历史进程中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反对暴力的斗争起初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失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彻底失败了，但我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我们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这时希特勒主义的精神无疑赢得了对我们的最大胜利。

俄国诗人完全有理由因为斯大林在道德上对俄国人民造成的损害，降低或取缔自己的弥赛亚主义，或者如萨特一类西方（尤其是当代法国）诗人那样，不分善恶是非，对人类采取一种旁观诅咒的姿态。正是这世纪性和全球性的、紧接在暴政和帝国的崩溃和末世的、由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虚无主义学说的洪水面前，俄罗斯诗人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一切拯救精神一样，内含着乌托邦盲信的力量。一旦历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将来自西方的另一种激进、理性、独断的救世主义传入俄罗斯，它的弥赛亚热情一旦转向，就会产生毁灭性的悲剧。在拉甫洛夫、特卡乔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亚•伊•乌里扬诺夫和约•维•朱加施维里把各种对立的西方观念引入俄国后，俄罗斯弥赛亚精神被不同的历史力量驱赶，其肆虐暴烈是何等空前！

俄罗斯诗人对这一切都作出了承担和回应。

在“除了灰烬还是灰烬”的新纪元，俄国诗人的成就与他们的精神自治和悲剧命运成比例发展。帕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

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她创作《死者的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不是企图使他们‘不朽’，他们多数人已经是俄国文学的骄傲，已为自己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英名。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女诗人恪守着自己时代的诗歌信条：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沦为嚎叫的唯一途径。

诗人头上只有“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具有“远射程的心”，屈辱而死的天才密如“阴沉的有麻瘢的碎石屑”。纯正的俄国诗人自然向苦难的最大和最后应承者——俄国伟大的拯救精神皈依。

1943 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女诗人执行了她的诺言。这就是二十世纪俄国催人泪下的伟大诗作《挽歌》最后问世的由来：

冥辰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

血迹斑斑的铁蹄下，他们要踩死她，

行列中停着囚车。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对帝国虚假永恒的蔑视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我恳求了整整十七个月，

我的哭声把你召唤回家，

我跪倒在刽子手面前为你求情，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我的亲骨肉！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替代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在弥赛亚精神沦丧的空前危局中，诗人最先到场，以一首共同的诗把拯救精神凝结和升华为一个誓约，一项许诺，一个承担和一个秘密，借以和遥远的未来相遇。

在卡卢马集中营，很可能是出于死所必至的预感，曼杰施塔姆以天鹅将死的声音发出绝唱：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是不狼！

……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露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支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辩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的使徒。

(此处缺页)

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于 1913 年脱离马克思主义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

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

别尔嘉耶夫坚信："二十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神贬值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亲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已建立了奠基于俄国东正教传统的信仰哲学，并与德国理性哲学和唯心论相对抗。赫尔岑

把这种信仰主义与法国启蒙哲学对比后认定，亲斯拉夫派的信仰主义不仅深植于俄罗斯民族历史中，而且对缓解西方理性至上所带来的普遍精神危机有着“将来意义”。戈戈茨基和尤尔克维奇把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部分结合进斯拉夫主义的信仰哲学，认为“内在的经验，即信仰，才能解决生命的最高目的。人类认识除了低级的、运用理性和经验逻辑规则获得真理一途外，还有高级的、唯有借助信仰和内在精神才能获创造性与掌握世界的强大力量的道路。在托尔斯泰处于精神危机的同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斯拉夫哲学传统基础上，广泛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派和教父学哲学，推进了俄国东正教神学。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原始含义是对上帝人——基督——的信仰。一切生命都期待着复活和复兴，即物质的充量精神化和精神的充量化，他贴近的十九世纪哲学是介导象征为世界本源的弗洛连斯基。宇宙及其象征便是全部实存之物，世界只是二而一的现象——本体的无限结合，它的中介和所有形式便是象征。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确实是沿着一条与西方理性（非理性）哲学全然不同的路向，并在牵涉俄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对人与上帝，精神、灵魂与尘世使命，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把基督教的信、望、爱与希腊、罗马真、善、美一体融为自己的弥赛亚主义。

无疑，无论这种粗劣勾勒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如何带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和乌托邦精神，却能为苦难中的俄国诗人提供一种深厚的历史和精神基础。（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自十八世纪以来通过俄国西化派的努力，当然也是俄国诗人抵御和抗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旧、新帝国的另一基础。此属另一个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

(此处缺页)

作为看重精神独立的诗人，王家新感到自己需要、也只能在心中“呼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使人强烈地感到中国当代诗人与这个民族已睽隔多年，同时也感到诗人对民族生命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回归。据讯,1990 年在奥斯陆大学、斯德歌尔摩大学召开的“海外中国作家讨论会”上，文艺批评家李陀认为，根本触动帝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在语言上是以‘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挑战”的朦胧诗——寻根小说——实验小说，“他们在语言上建立了与古代汉语的联系，中国人反而觉得看不懂，他们把创作看作是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编码过程。他们对残忍进行了不动声色的冷酷的叙述，甚至运用汉语的可视性特点把死亡描述到令人毛骨悚然”，至于那些

“已养成一种对崇高感和道德感的期待的中国的早期读者”，李陀的诗人们是无法让他们满意的。

笔者不与这位批评家心目中的中国先锋、实验文学的成就争辩：“对探索的热烈反响大大超过了‘五•四’时期，使现代汉语又达到了古代汉语时期那种丰富多彩的面貌”，“对语言运用的探索导致了观念上的变化，从而动摇了几十年来共产党对文坛的一统天下，而文坛上的新局面又必然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域”。

布罗茨基的一段话似乎是专为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帝国内的语言和形式偶像崇拜者准备的：

比起自诩为俄国象征主义的一群既不朦胧更不自在的玄学派诗人来，曼杰施塔姆用一模一样不起眼的工具，却能将读者载向更遥远的地方。象征主义的诗作……这股澎湃的潮流因为无须丰实的根基，于是吸引了学校毕业生、军校士官生和小职员，到上一世纪末，这流派几乎被贬价到“文字垃圾”的田地，那情形与今天自由诗体在美国泛滥成灾颇为相似。物极必反，反拨象征主义的未来主义、结构主义、意象主义等等应运而生。不过，这只是主义反对主义，技巧抵抗技巧。唯有两位诗人，曼杰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从实质内容上别树一帜。他们的悲惨命运反过来证明了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

李陀在北欧发言说,在共产党的价值系统中,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人民”,“这个概念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已经受到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如朦胧诗人们的挑战。”

而我们知道，诗人既是天生的自由之子，也是天生的人民之子。尤其是俄罗斯诗人，他的重大使命就是“为全民族服务，使用民族的语言”。阿赫玛托娃的诗始终倾向于运用方言，她认为自己与其他推行文学或其它什么纲领的人物不同，她直接是人民的一分子：她完全能识别时代精神，识别痛苦和人民目光中的忧伤。俄罗斯诗人，历来鄙视“诗人”这个称号中包含的优越成分。倘若阿赫玛托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之声，那是因为人民从来不用一种声音说话。

茨维塔耶娃和许多同龄俄罗斯诗人都能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写作，但她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她珍爱的艺术对象是爱情、艺术、悼挽、大自然和生命奥秘，但都是“按俄罗斯人的方式处理”的。

勃兰兑斯曾高度称赞俄国作家真正的贵族精神：他们都爱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觉得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对“人民”的观念发生了比十九世纪更为本质的深化。

在写到古拉格群岛和俄国文学的关系时，索尔仁尼琴写道：“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领域”由于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由于怜悯下层。

(此处缺页)

俄罗斯诗人在二十世纪与新帝国的抗衡中，无论在难度、规模和所付代价的高昂上，还是在其内心的焦虑和影响上，都超过了十九世纪。

首先碰到的是，新帝国大规模的恐怖加上从下层通过阴谋方式上升到最高位置的期大林个人独裁本性，使受害者遍及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性黑暗。在骇人听闻的罪行、战争和苦难面前，纪念、缅怀、哀悼、祈祷，已成为俄国社会经久不息的全社会仪式，除了法西斯德国外，究竟谁是罪人，难道斯大林、雅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等真正的“一小摄”就能把整个俄国踩在脚下吗？这既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问题，（在俄国）又是一个异常严肃的历史和文化问题。但无论如何，揭露帝国及其元凶的罪行，是给每一位无辜死者以正义的安慰的无法省略的前提。

苏俄诗人与新帝国的抗衡是力量悬殊而又势均力敌的历史性较量。就后者而言，诗人们拥有全俄境内（包括帝国权力内部的开明派）要求真理和正义最终获胜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在二十世纪常常被人过于忽略或低估。实际上，由于工业、科学技术、民主思潮、民族自决以及对极权统治的恐惧和厌倦，道德需求有更急迫的性质和广阔的形式，尤其对于俄国人民而言，处理和消解其他欧洲人民早已脱离的人为不幸，道

德几乎是唯一的武器；可以从上一世纪和本世纪的殉道者们身上直接汲取。

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对美国工人阶级说：

象我这样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织，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 50 年的经历。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能够站起来的，并且能够站得稳，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有了刚毅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站住脚根了，坚强的意志是在我国艰苦的岁月里锻炼出来的。

苏俄诗人在独裁者死去和试图死灰复燃的年代里，曾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会的倒退潮流。当苏俄社会由于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论陷于空前的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词。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六十年代初，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诗人“不顾检查制度、强大的对手、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及其遗产挑起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影响之深远，超过 20 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当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搬出后，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起了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

斯蒂芬•科恩也曾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于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科恩认为，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法规限制的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一定责任的想法所加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后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后的德国。“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后 30 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私下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的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于他手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的帝国权贵、军界首脑、警方代表人物、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再次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当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以及布洛茨基被作为新斯大

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和诗人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卡波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卡塔耶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科尔内•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奥列格•叶弗列莫夫、科林、涅缅斯基、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有力地击退了元帅和将军以及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科恩认为，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如安德烈•萨哈罗夫、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彼得•亚基尔、列夫•科佩列夫等。

(此处缺页)

1994 年 6 月。

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在海参威参观了古拉格极地后说：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的状况。

然而，在我们精神世界中领导我们的那颗星，仍是闪耀着光辉的真正的星，千万别让它消失。

这是索氏对新俄罗斯的第一眼观察。

“俄国只有从帝国主义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羅斯知識份子的特性

（演講稿，根據2007年秋10月在廣州的演講整理）

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得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

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吃公家的饭，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好，我们今天的演讲就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讲座主要是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但是我想仅仅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难免有一点枯燥和单调，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历史使命、俄罗斯国

家的道路有太密切的联系，我们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性放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命运、道路方面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讲得深刻到位一些。

1 乌托邦的理想自古有之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 1513 年一本书，关于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简称乌托邦。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到后来亨利八世把这本书定为最危险的书。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初期，让整个西方突然发现关于旧约、关于人间天堂的界定、关于人间十字架的界定，是可能做到的。乌托邦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感。乌托邦有神奇的伴生力量，总有一种力量来监督它和校正它，这种方式最带个人色彩，可以触摸，可以听和感受的，就是公开发出声音。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公开发声的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我们要真正实现乌托邦，要达到真正理想的彼岸。

欧洲有三百年时间处于公开发声的时代，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最精彩、最富戏剧

性的应该是法国作家左拉，左拉要为德雷弗斯辩护。法国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们要打倒德雷弗斯，把这个法国叛徒、法国军队的污点清除出去，而且事实上他已经被关押在大西洋一个岛上。当时左拉已经是一个誉满全球的名人，他无意中看到材料，他决心站出来为德雷弗斯辩护，而且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法国的正义和良心的问题。

公开发声表现在左拉身上为一次演讲，后来成为法国世世代代骄傲的福音。他说我现在站在国家正义的法庭上，以我四十年的工作和誉满全球的声誉，我发誓德雷弗斯是无罪的，如果他是有罪的，我宁愿世界化为乌有，我相信法国感谢我挽回它荣誉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他在流亡伦敦时，就不停地收到法国总参谋部内部发出关于重新为德雷弗斯翻案的信息。大家知道，左拉后来被隆重接待，进了法国的先贤祠，应该说他是不愧于此的。西方到六十年代，都没有完全兑现西方资产阶级所承诺的自由、博爱、平等，到了马丁?路德?金，他在林肯纪念堂发出声音，《我的梦想》。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还很盛行。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在种族歧视的密西西比成为种族自由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将来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们可以携起手来”。无论是左拉还是马丁?路德?金，他们的公开发声将乌托邦的承诺一步步地兑现。

爱因斯坦临死前两天，曾经在罗素倡导的一份宣言上签字。罗素集中了当时 12 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向六国政府发了一份宣言，要求六国政府承诺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而且分阶段、持续地削减，最后消灭核武器。这份宣言我认为到现在都没有过时，后来叫《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情倾向，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相信如果要解决当时东西方的矛盾，绝对不能采取战争的办法，所有权威的科学家都意识到核战争完全可能毁灭全人类，知道越多的人越忧心忡忡。最后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放弃一切吧。

这份宣言的水平达到了人类知识分子共同的立场，这是人类上世纪的伟大宣言，这份宣言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美苏中程大规模运载火箭的削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

2 最深刻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往往决定一个时代

一直到 1836 年之前，整个俄国就是一个沙俄专制制度的盛世，尼古拉一世出兵

波兰，绞杀波兰革命运动，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普希金等，都严重失察，认为俄国的盛世即将到来。尼古拉一世认为，俄国的历史无比辉煌，俄国的现实无比辉煌，未来的俄国将让一切都黯然失色。

1836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一本著名的杂志《望远镜》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文写成的，后来，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之后被总结为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的第一声枪响。作者恰拉耶夫曾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就是因为远征法国，到了西欧，看到西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深感俄国的落后、愚昧和反动。在这篇文章里，他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我宁愿伤害俄国，我宁愿让它伤心，让俄罗斯蒙羞，我也绝对不说一句谎言，我必须把真理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他用横扫一切的气魄，对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来没有让精力充沛和高尚品德发挥作用的时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激动人心的人物，没有优美的形象，人类先进的思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是孤儿一样活在这个大地上，和这个土地上的先人、祖宗没有什么联系。

这篇文章，拉开了持续 25 年的关于俄国命运大辩论的序幕，严重地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感情，但是因为这样夸大的抗议，产生了俄罗斯自我的认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痛苦的辩证法，产生了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大辩论。

在参与的两大派中，斯拉夫派完全是捍卫俄国的传统、历史的，但是斯拉夫派最优秀的分子，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绝望地发现恰拉耶夫是对的，俄国历史上所赋予的对伟大神圣的使命和俄罗斯的现状完全不匹配。斯拉夫激进代表发现，俄国基督教的相爱和拯救精神从来没有兑现，在俄国充满战争和奴役，沙皇专制、农奴制等等。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都是热爱俄罗斯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希拉夫派，他们就像是俄国的双头鹰，他们有共同的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但是恰恰在俄国，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超越了斯拉夫派和希拉夫派的争论，这就是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是否体现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义，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拯救意识。

俄国十九世纪整个过程，就是反复地向王朝、向沙皇政权挑战的过程，之所以挑战，就是因为有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于从四十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到六十年代的

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到以后兴起的民粹派。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但是被人刺杀了，刺杀的过程非常有戏剧性，第一颗炸弹扔过去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居然从他的车上走下来，没有被炸死和炸伤，他弯下身去搀扶其他人，这时民意党人的第二颗炸弹又响了。

这个事件使俄国处于关键关头：

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该怎么办？俄国该怎么办？民意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信不长，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是大赦政治犯，第二是召开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国民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信的结尾，民意党人在俄国、全世界面前发誓，他们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放弃镇压、放弃专制，那么俄国民意党人立即放弃恐怖行为。

这时俄国就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了，托尔斯泰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了他五十岁的内心危机。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一位特殊代表，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就是一个罪人，他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

托尔斯泰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民意党人称呼亚历山大三世为皇帝，但是托尔斯泰写的是“我的兄弟”，显然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写的这份信。他说，如果你把这五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五百个人替补他们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陷入血泊中。

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俄罗斯。

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俄国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我稍微岔开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世界的命运，其实系于一念之间。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矛盾、斗争不是利益决定的，最根本由人类意识决定的，当年亚历山大三世如果这样决定了，他是俄国最高统治者，没有人会反对他，他作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独生子，如果

放了这些杀人犯，赦免了他们的罪名，我们可以想像，在世界的历史上，不管是法律、道德还是宗教、灵魂方面，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 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完全可以延续到上世纪。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历史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聪明与否，他们统治的艺术高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深刻、最先进、最无私的知识分子的语言。俄国革命之后，旧的沙俄帝国的乌托邦完全被粉碎掉，一种新的、一劳永逸地指明俄国历史命运和道路、乃至全人类解放方向的救世主义诞生在俄国，那就是十月革命的到来。

3 以敬畏和谦虚之心看待历史

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最后的斗争，人类的真理将全部实现。我们在童年、少年，甚至是中年时代，是相信这个时代的，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个最后的真理。苏联，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下台？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普通党员，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人为苏联的解体，为苏共的下台，流一滴血，如果这个制度、这个党还代表着俄罗斯的利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那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肯定会起来捍卫它，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世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种逻辑。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整个西方的武装干涉，同时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责备和怀疑，尤其是第二国际的批评。德国的共产党领袖、烈士罗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这本书早被翻译成中文，里面说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公民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那么一切社会生活都会沉默，都会死寂；最后出现一些精力充沛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制度建立起来，有一个强大的逻辑，必然要反对一切反对派，不能容忍其他的一切意见，这是一个强大的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避免。

列宁本来很欣赏她的，但是不能接受这个批评。其实对俄国革命真正担忧的恰恰是列宁本人。列宁 1922 年 12 月 23 日在重病当中写了几篇文章，被称为是列宁的遗嘱。其中一篇是关于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行，关于党的团结和关于党的未来，这篇

文章公开提出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位置上撤下来，因为这个人太粗暴，而且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列宁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以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深刻洞察，他应该知道限制无限的权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列宁在 1923 年 3 月 5 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个人私信，要求他对列宁夫人赔礼道歉，否则就断绝个人关系。但是列宁这封信，始终没有成为苏联共产党往前走、成为改善自己的公开的声音，这是天大的遗憾。如果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我相信俄国的道路会不一样。

对苏联问题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个人认为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是死在斯大林的手里。斯大林的父亲是一个酗酒如命的人，斯大林念了六年的神学院，完全不懂外语，短期地出过一次国门，这样的一个人把布哈林送进监狱。

布哈林是 1938 年 3 月 14 日和其他 17 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未来党的领导人会为他平反昭雪。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 18 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

这封信穿越历史的隧道，那真的是太艰辛了。1988 年 2 月 4 日，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 月 10 日，苏联科学院正式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的称谓，苏共检察院为他正式恢复党籍。

1989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面向全世界的宣告，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安娜，布哈林的遗孀，已经 84 岁了，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了六十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在精神上有一点，他们

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

我们可以看出来，俄国那些公开发声的人很天真，但是他们很深刻，他们两手空空，他们很无助，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很坚强，他们代表了真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西方资产阶级聪明，西方资本主义没有被摧毁，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制度，可以倾听不同的制度。

下面我们要走到谜底看一看。如此强大、光芒四射的、全世界无与伦比的苏联，为什么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突然戏剧般地坍塌了？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作过一个演讲，有一个对比。有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列宁曾经有一幅画《不期而至》，构图很简单，黄昏时分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做饭，两个小孩在做作业，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男人，他就是十二月党人，他刑期满了回来了。真的是满脸沧桑，背着一个包袱，但是他的眼光里传达出来的，绝对是一个十二月党人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他的理想仍然保存着。

是什么力量让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不仅没有造成灾难，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这十几年里人类 GDP 的增长是 1.8 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对全世界、欧洲意味着什么？还有北约的东扩，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都是拜苏联解体所赐啊。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

我觉得从精神上看，就是苏联人民在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驱们，殉道者和圣徒们那里，所得到的对正义的追求、对良知的坚持、对爱的坚守没有放弃掉，就是俄国的那些先知、圣徒们他们所书写的文章，他们对俄国的关心、俄国的忧虑、对俄国的祈祷和忧虑，这些东西让俄国人在精神上坚不可摧。

俄国的乌托邦惨败，它的启示是全世界的。成吉思汗的军事专制主义在俄罗斯统治了 240 年，并给俄国带来了深厚的、致命的、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这也是斯大林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源泉。俄国受东方的影响，这个东方绝对不是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愚昧传统，从来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正面的东西。苏联乌托邦的失败是全人类的失败，苏联乌托邦的悲剧是全人类的悲剧，苏联的启示是全人类的启示，我们应该以敬畏和谦虚的心看苏联，苏联是西方必须认真对待的真正

的独一无二的对手。

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1994 年苏联一个作家，在被驱逐二十年之后回到苏联，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跪下来亲吻俄罗斯的土地。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俄国上世纪是失去平衡的世纪，是非常可怕的世纪，但是指引我们民族心灵的那颗星星还在，还在闪耀着高贵的光辉，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2007 年 10 月在廣州的演講)

欧洲思想

他们的悲剧，我们的宿命——《匈牙利在哭喊！——1956 年匈牙利起义》译序

1989 年后，职褫家弃，借助大学参加比赛获奖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时代出版社 1965 年版），译完此书。是年，个人与国家一起遭逢大变故，视野里筛除了不少捞什子，滤进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苏俄与东欧诸国突然接近了，那里上演的历史悲喜剧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 年由英国 Butter 和 Tanner 有限公司出版、美国国会出版目录资料丛书收藏的《匈牙利在哭喊!》摄影文集也许是迄今为止那次悲剧最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研究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冷战、尤其东欧诸国半个世纪中历史演变的珍贵史料，应当说，还是 20 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域外因素，中国 1989 年悲剧的一个惊人的预兆。

该摄影集由英国作家、记者理格•加德尼编辑，由 BBC 电视台驻东欧首席撰稿人乔治•麦克思作序，所收摄影作品由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时留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所摄；此外，我又从其它渠道觅得有关照片若干，于是归类合并，共计 250 余幅。

影集以时间为序，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到 12 月 4 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 1956 年月 10 月那 13 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 50 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11月2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 年 11 月 4 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0 月底，苏彝士运河危机爆发，法共作家萨特发表《我弹劾》，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演说，法共历史学家罗兰发表《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东西方人士对波匈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纷纷发表看法。从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

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7 年 1 月 7 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训说，1956 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 20 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到 1957 年 5 月，毛泽东变“引蚂蚁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 1957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考虑到主要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二十世纪中国，本在续行玄奘旧路，往更远的西方取经，只是心情更危迫，经历更艰险，后果迥然大异。正当中国欲与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西方接近时，欧洲却自相残杀起来，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苏俄共产极权祸水，间接截断了中国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终演绎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宿命，——俄国反西方反现代的革命，阻遏并劫持了中国，真理、希望和救赎之于中国，被限于苏俄帝国的势力范围及其历史经验之内，最终凝固在斯大林主义

历史僵尸上。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 500 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 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 1956 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 1956 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1989 年 7 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10 月 26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1993 年、2006 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义责任”。

1958 年 6 月 14 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纳吉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

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 年 11 月 1 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 1956 年匈牙利事变以来 32 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从 1956 年匈牙利事变到 1989 年“六•四”事件，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异己力量手中，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内部异族统治，一直构成当代中国铁一般的最深“潜规则”。

对中国的劫数已经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术题：俄国革命比中国革命早发生 32 年，斯大林比毛泽东早死 23 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门事件早爆发 33 年；苏俄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义，煎熬了 45 年，匈牙利人民为纳吉“平反昭雪”，挣扎了 32 年，……。历史对中国异常苛刻，但并没有完全离谱。我们本来是迟来者，这种身份所固有的全部无奈，我们一分也少不了。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剧连续剧，一条轨迹清晰的地理分界线一直在由西向东延伸，直到最后的高潮出现，或者嘎然中断。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但历史宿命却是可以被戳破、被超逾的。

马扎尔人曾有匈奴的血缘传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埋葬了汉民族的精魂，而且给俄罗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诸国带去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的野蛮奴役，斯大林主义分明染有鞑靼主义的血统，匈牙利悲剧也闪烁着蒙古铁骑的寒光。这个历史联想启示我们，一切悲剧都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1975 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 年后，“中国的纳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应该承认，从 1956 年到 1989 年，历史给中国

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义 50 周年，中国反右运动 50 周年，俄国十月革命 90 周年，我们开始以“十”为单位来量度自己的命运，已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与对苦难根源的体认之间，还是如此不成比例。苦难和罪行本身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之中，不足为奇。要紧的是，与俄罗斯、匈牙利人同属天地间唯一的高级灵性物种，蒙受了同样性质和更大规模的不幸和悲剧的我们，却始终缺少辩认苦难和罪行的能力，我们也就始终不能学会担戴苦难、战胜罪行的本事。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15 年前翻译此书时，未曾想到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开出版的一天，不过冥冥中也不想摆脱一个念头：既是历史上一段真实事件，中国人曾以诡谲的方式卷入然后又深罹其害，中国人自然有义务和权利真实地了解它。在四海为家的岁月里，偶尔翻检一番，每每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受：我们在时间上所受本国传统的影响，日益远去，而在空间上遭逢异域事件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外来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种吊诡的形态进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大难就要临头了。我至今无法理喻其中的宿命意味。

曾托人设法联系原出版机构，都不成功。两名西方记者当年进入布达佩斯，冒险拍摄除了专业习惯外，其动机显然出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对极权主义的厌恶。事实上，这两种高尚品质贯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决定置版权一类正当权益于不顾，让它早一天成为我的中国同胞的正式读物。至于我自己，除了感谢命运的赐予外，无所私利可言。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英文水平，译文错讹不少，尚需专家指正。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北明以其富于感染力的译文，为本书平添了可以触摸的历史感。谨致谢意！

王康 2007 年 3 月 24 日

此文于 2010 年 04 月 03 日做了修改

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

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人一样，把当年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者曾分别是法国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一夜之间，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马罗人时代以来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被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被从什切青海到亚德里亚海垂降的铁幕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不同帝国、基督教、拉丁语、十字军、世俗王权、工业革命、殖民体系、启蒙哲学、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种体系、条约、同盟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主张组成有十五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让一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十九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一类传统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三千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赔偿成为欧洲和解和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早在希特勒所向披靡的巅峰时代，在纳粹分子高喊“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使欧洲和全世界颤栗的黑暗时代，以隆美尔元帅、勃洛姆堡元帅、德国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及其继任者哈尔德将军、维茨勒本将军、阿尔菲尔德将军、霍普纳将军、斯道芬堡伯爵、毛奇伯爵、伯恩斯多夫伯爵、古登堡男爵、波霍弗牧师、莱比锡市长戈台勒、普鲁士财政部长波比茨、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反抗报》主编涅克希、律师施拉勃伦道夫、工会主席莱伯以及秘密警察官员奈比等为中坚的德国仁人志士便开始了漫长而顽强的刺杀希特勒、“拯救德国和欧洲”的英勇斗争。

早在纽伦堡绞刑架上，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就发出了第一声忏悔：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历史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历史更会记住自由德国洗心革面的动人历程。

1945 年 5 月 5 日零点，第三帝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550 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去，1,500 万德国人无家可归，德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战胜国手中。

纳粹工程师们发明和制造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虎式”巨型坦克、88 毫米全能大炮和正在发展的核武器装备，都落到盟军手里。德国的军舰和潜艇成为堵塞港口的废钢铁，齐格菲防线已沦为无数残破的钢筋水泥碉堡。几百万身着丧服的妇女再也抚摸不到她们丈夫的墓地，那数以百万计德国士兵的坟茔已没有标记、没有姓氏，更没有鲜花和安魂曲，它们分散在德国以外，从北非到斯大林格勒，从纳尔维克到卡塔拉洼地……

据专家估算，每天用十列 50 节车厢的火车运输，柏林的废墟需 16 年才能运完，法兰克福的瓦砾要到 1978 年才能清理干净，需要 33 年。

1949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罗尔•豪斯在谈到对犹太人的屠杀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1951 年 9 月 27 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在宣誓就任时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罪恶深重，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

1970 年 12 月，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跪倒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台阶上，身为反法西斯老战士，这名德国政治家“替所有必需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德国人彻夜不眠，80%以上的德国人被强烈震撼了，产生了深沉的集体负罪感。1971 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4 年 8 月，统一后的德国首任总统赫尔佐克在华沙起义 50 周年纪念会上再次请求波兰人民“宽恕德国人犯下的罪行”。

1995 年 8 月，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 40 周年大会上，再次代表德国人民表示，“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5 年 6 月，德国总理科尔继勃兰特 25 年后，在以色列德国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再次震撼了德国和世界。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七十三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使希特勒的纳粹经济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同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五十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1946 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当代德国历史主义首席发言人、87 岁高龄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Kirche）的旗帜下，在善、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德国的历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到二十世纪末，德国已经向以色列、波兰、俄罗斯、法国、希腊等二十四个欧洲国家赔付一千多亿美元。

谁都可以看到，正是德国的痛改前非，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和统一，恢复了产生过康德、歌德、贝多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德意志民族的荣誉和活力，而且使欧洲和全世界的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连希特勒德国的追随者也真诚地进行了忏悔。

瑞士在二战中袖手旁观，拒绝救援前来避难的犹太人。外长科蒂说，瑞士犯下了“难以名状的冷酷与野蛮的错误”；

匈牙利曾参加轴心国军事行动，迫害过本国犹太人和反法西斯战士。总理霍恩•久洛代表全民族向受到法西斯迫害的人们“谢罪”，请求宽宥；

奥地利曾站在纳粹一边，助纣为虐。总统克莱斯蒂尔明确地说：“奥地利是站在希特勒第三帝国一方参加战争的”，奥地利“不能推卸责任”。

1995 年 7 月 16 日，希拉克总统在塞纳河畔犹太人纪念碑前承认了法国一直不愿意承认的史实——二战时维希傀儡政府与纳粹共同迫害过犹太人。希拉克说：“那些

黑暗的时刻玷污了我们的历史，是对我们过去和传统的羞辱。占领者的疯狂得到了法国人、法兰西国家的支持……我们对犹太人欠下了难以勾销的债。”

2004 年 6 月 6 日，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再次表示德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战争罪行”时，德国在上帝和世界面前获得了的已不仅仅是原宥和宽恕，而是敬意和尊严。德国与欧洲共同赢得的是人类最崇高最珍贵的胜利：和平。

所有这些言论行动，都源于德国和欧洲良知的复活。德国的忏悔和赔偿已超逾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体欧洲受难民族对法西斯的仇恨、诅咒、审判和清算。一个民族从空前的迷狂和邪恶中如此彻底快速地归返文明大道，堪称英勇，堪称伟大。

欧洲的生存哲学和关系规则由此发生了史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人类文明的黎明再次君临欧罗巴。

在东方，历史在沉寂停滞中充满不祥、焦虑和危机，似乎有一种恶意的宿命，一种与诺曼底精神抗衡的法则，一种与欧罗巴黎明对峙的阴云，在亚细亚上空游荡。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 年，自由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亚洲价值观”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自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难堪的分裂里，在一种外来的哲学和世界意识里怒目相向，完全无法从德国统一的启示里汲取任何灵感，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大宗军火昂贵倾销的市场。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并未同时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有其来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孙中山两位亚细亚文明的代表人物，曾直接究诘日本：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日本嗣后的行径远远超逾了他们的疑惧。七十年前，胡适曾正告日本，不要再提“中日亲善”，那不啻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

张伯仑、达拉弟曾经梦想以绥靖主义（丘吉尔曾认为这是“第一等的大祸”）将纳粹德国这般祸水引向苏联。斯大林也曾企图用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希特勒瓜分欧洲。西方列强又联手在亚细亚推行“东方慕里黑”。他们都曾经玩弄了历史，历史也无情地予以回敬。这一教训至今没有过时。

七、八十年后的中国，既丧失了亚细亚先贤们的道德高度，又沾染了绥靖主义的余毒。鼓吹“联日抗美”的何新们和贩卖“对日外交新思维”的时殷红、马立诚们，都在继续着一个当年近卫、东条们的迷梦：大东亚共荣、大亚细亚主义。

当年日本法西斯军人以 180 万武士道军人的生命没有实现的噩梦，今天的中国战略家们更不可能实现。

君不见，在几乎所有方面，中日之间的鸿沟都如此深巨。一个不愿忏悔和赔偿而空前强大的日本，已经重新成为中国和亚洲的最大隐患，——这是中国最严重的误判和失职。

有一种逻辑暗中一直主宰着许多国人的头脑：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贯穿于慈禧太后、义和团直到“冷战”和“文革”的畸型危机感，把日本的实力和威胁地都归到美国名下。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不是本文断想的对象。但怨天尤人的小人作风根本缺乏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前提。美国对日本的贡献和责任都为中国所不可比拟，中国应当自问：我们对日本做了什么？历史甚至会问：是谁使中国失去了日本，至少失去了一个折服和尊重中国的日本？

稍事清点一下六十年来的大帐，国人当可明白自己的来路、处境与去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死亡数字大体如下：苏联 2,000 万，美国 24.8 万，英国 33.6 万，犹太人 600 万，波兰人 650 万，日本 180 万，德国 550 万。中国因各种原因迄无确切数字，但总数应在 3,000 万上下，高居世界之首。

中国是最早发生最后结束战争的国家。为守土卫国，为独撑东亚战局，中国军队参予了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中国军队共有 340 万军人喋血沙场，其中包括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戴安澜、李

家钰等200余名将领，中国军队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其英勇壮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挽回的酬答，是如此不对称，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仍叫国人难以释怀。

中国的土地没有增加一寸，国民政府信誓旦旦欲以捍卫的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却被苏俄以"独立"、"自决"名义丢弃了一大块；中国在抗战胜利在望时被肢解的雅尔塔密约，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东北亚发生剧烈震荡的最深恶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东方惟一大国，到现在还被拒斥在世界七大"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

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最大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最大内因。抗战甫定，中国迅即成为惟一一个走向同胞自残、全面内战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国，又有几百万中国人的血流在抗日旧战场。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政府竟然仅仅宥于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须知：

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上，任何政党、政府、个人都绝对无权单独正式（外交、国际惯例、书面）放弃人类历史上最大一笔战争赔偿；

日本仅1894－5年甲午战争一役对中国勒索的"赔款"（连带嗣后的"赎辽费"）就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为日本当年岁入四倍），且无论日本对中国是完全的侵略；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清算和审判，无异于追认日本侵略的某种“合法性”，某种“进步性”，某种值得中国人“感谢”的“历史正义性”；

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无异于放弃了中国人作为受害方和胜利者的双重权利和尊严，无异于放弃中国人理应得到的忏悔、认罪、服输、敬畏、尊重，无异于放弃中国人可以施予日本的审判、惩罚、教化、宽恕和永久性的防范与控制。

现在，历史已经表明，大错已经铸成，历史的惩罚总会落在那些企图玩弄历史的民族头上。

曾是一片废墟、被人占领的日本，领土不加多（由于“北方四岛”被俄国占领），人口不加少（比战时多出二千余万），其 GDP 至今仍是中国的四倍，其国防开支仍是中国的两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中日两国都与甲午海战和中日第二次战争时期大致相当。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然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文革”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日本正在“第三次开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单以国家口号、纲领相比，中国又比日本逊一筹。日本保持着民族和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生命的隐秘而神圣的命运感，可以为每一个大和民族子孙心领神会甚至赴汤蹈火的庄严悲弘。中国虽然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光环，使用了曲意示好的概念，但始终缺乏在抗日战争中一度焕发、喷礴而出的坚忍不拔、艰苦卓绝、成功成仁、担负天下兴亡的民族精神与气象。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教训、审判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无法处置的尴尬因缘，中国也都难辞其咎。其中最难让无数亡灵瞑目、让亿万国人释然的，是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

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和改造（包括纽伦堡审判、德国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以及“马歇尔计划”等等），协助德国走出废墟，埋葬纳粹主义，实现统一，堪称战后最成功的欧洲重建。这一切归根结蒂植根于大西洋两岸所渊源的西方主流文明，植根于西方从战争中总结、转化而出的积极成果，植根于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绝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惨痛记忆，一言以蔽之，植根于西方文明和历史的多元和一本性。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韩战、越战，能使日本角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完全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最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诺曼底登陆 60 年纪念，本是欧罗巴的家庭事务，中国和亚细亚的缺席（一个中国人赠送的“和平女神”除了表现当代国人的作秀癖外，什么也不表明）并不格外让人意外。但中国在时代精神上的制度却令人沮丧。如果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能在抗战和二战结束 60 周年（2005 年）之际主持（哪怕参予）亚细亚的纪念盛典，也可差强人意。勿需什么历史眼光的人都会断言，这种前景完全不存在。

一个历史、民族和世界意识都可悲地被虚无主义俘虏的国家，大概只能又一次怀着忌羡与落寞，眼看世界历史精神壮丽而浩大的创新在异邦降临，而望洋兴叹。

一名欧洲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以“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为题，试图揭示世界历史的新趋势。直到诺曼底登陆 60 周年纪念之前，这种判断确有其天才性。但时代风云变幻无常，欧洲已经穿越漫漫黑夜迎来新的黎明，亚洲却很可能还来不及辉煌就已经黯淡了。

除非我们能击退虚无主义，除非我们在世界意识和历史哲学上有一次真正的革

命。

2004年8月8日

(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此文于2010年04月03日做了修改

中國精神元年：陪都抗戰

告语马英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

明天，公元二００八年五月二十日，马英九先生在台北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发生的特殊的事件，不仅对于台湾，而且对于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台湾的自由、民主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其宪政理想和政党轮替制度再次获得历史性的认同和巩固。

理性、现实考虑再次君临台湾，民进党的权力哲学和历史抉择已被台湾主流民意否弃，由族群、党派、历史恩怨和统独之争导向的台湾内在分裂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大幅减小，虽然无人可以逆料台湾未来命运的图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五十年日据统治、四十三年蒋氏父子威权时代，和二十年困厄嬗变，以马英九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东山再起，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命运展开了新的一页。

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关系和中国整体命运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演变。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将被重新总结，意味着被战乱、割据、革命、造反、复辟、外族入侵和异域思想征服所反复中断、扭曲、撕裂的中国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可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复活，意味着在演化日亟、吉凶未卜的全球化当世，中国在道德、智慧、胸襟和选择上可能发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从而给东方和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１８９４年《兴中会宣言》首次所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革命理想，将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近代以降，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重新成为十五亿中国人的共同天职。意味著作为西方十九世纪中叶激进主义一支的马克思主义和“半亚细亚普遍专制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及其东方变种毛泽东思想，已不能解释、更无资格“指导”拥有五千年文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文明－生命共同体的现代选择。中国对自身历史、种族、文明、地缘、命运、使命的认同，已使大陆宗奉的一党专制和意识形态偏见成为累赘和障碍，孙中山先生倡行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无可比拟地比一切外来思想和任何专制主义更合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面临一次新的反思与总结。其中辛亥革命、

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继绝，求取独立、自由、尊严和强盛的三次民族战争，应当获得真实、客观、公正和正史式的首肯、颂扬与修复。

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契机。台湾区别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更有别于作为西方激进主义实验场的大陆而最可引为未来中国的借鉴之处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新的综合。这一综合，一旦与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大陆正面遇合，其前景实在未可限量。

命运青睐于马英九，历史垂顾于斯人之处甚伙。作为哈佛高材生之前，他已饱读中华诗书，且从父母身上内在领略到“中国”二字蕴藏的丰富含义。生于资本主义的自由飞地香港，天然拥有一种历史悲情血脉，更让历史感叹的是，蒋经国先生慧眼独俱，为未来中国的重建选培了栋梁之材，真可谓得天独厚，高蹈前修，一枝独秀。马英九虽身历国民党衰颓、台岛乱相环生，以及个我人生的沉潜磨洗，透识人世天道的变化无常，却秉持做人行事、为官勤政的仁者立场、君子风范，决不随波逐流，苟且投机，一反中国权力世界的油滑、世故、卑污、邪恶、狡诈，更不专权牟利，结党营私。如此得中西文化之精萃，外秀内中，俊美而朴拙，知所感恩、敬畏、谦卑的政治家，实是天下至宝，中国之幸。

公正而言，马英九上台，与胡锦涛数请连战不无关联，台湾大选前后，大陆涉台言行可称适度。若干年中屡见不鲜的颐指气使，霸道蛮横基本被克制，在经贸、三通、直航、熊猫等“民生”议题上，其直接呈现者，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当然，大陆几十年混淆手段与目的的“统战”法术，仍然远未消散。

同时，大陆宣传部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艺术作品，仍然充斥内战思维和党派恩怨，就在台湾大选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重庆”和“西安事变”等反映国共关系的大型影视片，仍然颠倒是非，诋毁蒋中正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丑化“旧中国”，对毛泽东们极尽歌功颂德，显示大陆以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在政治、历史、精神制造中国人之间的对峙、隔阂和你死我活的分裂陈法，并无改观。

胡锦涛与连战等台湾“泛蓝”人士握手言欢的事实，与中共宣传部门的相反作为，凸显出大陆“对台政策”的内在矛盾，让世人费解。

无论马英九出于何种动机，其所申言“不统，不独，不武”，以及以台湾人民福祉为重，以台湾命运为主的思维，都有其正当意义。作为台湾社会执政党领袖，马英九当然应该首先对台湾负责，在任何情况下，不出卖台湾人民利益，不谋求与台湾的

自由、民主、多元、宪政价值冲突的目的，不以台湾作为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和手段，更不能与大陆中共私相授受，达成任何秘密交易。世人有足够的证据相信，马英九属于对权力与个人私欲之间的关系有清醒体认的政治大家。

同时，包括台湾岛内，不少中国人对马英九抱持轻蔑、“超然”甚至冷漠的姿态。

君不见，马英九两度置身检察院，台湾部分精英都以看客的姿态冷眼旁观，一些自诩为马英九友人、同僚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同情关切。

君不见，大选前夕，在传媒公开露面的台湾知情、资深人士，大都热嘲冷讽，旁敲侧击，模棱两可，其目光之诡谲，言辞之无谓，居心之不轨，更甚于陈水扁之属。

君不见，即或马英九以真正压倒性优势获胜后，台湾精英们还酸腐庸俗地指责他狂妄、缺乏魄力，直到马英九在人事布局上让庸人惊愕不已时，台湾精英还在油言润舌，虚光盈目。

我们却要以另一种名义，另一种声音，告语马英九，那就是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使命。

前面提到，马英九上台，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再反思、再讨论、再总结，意味着中国精神的复活，而这一切，都只能在一个前提下，即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向终极统一和现代复兴的伟大使命开始成为现实。

马英九作为台湾民选领导人，必须对台湾人民负责。但马英九毕竟不是陈水扁，国民党毕竟不是民进党。知晓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者都清楚，如果蒋经国再活十年（甚至五年），如果大陆没有发生“六•四”血案，没有出现严重倒退，中国统一已经可能在二十年前正式展开。

历史无法倒退，从更大的尺度看，即使蒋经国与邓小平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能够主导两岸和谈，也只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格局。天意如此，只有在马英九上台后，历史才能把国家终极统一这一伟大使命垂降于世。

马英九幼承庭训，饱读中华经典，大学期间又为“保钓运动”理论家。其父马鹤凌临终前曾嘱咐：化独渐统。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父生前对他的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相信，深挚的家国情怀，深藏的天下意识，乃是马英九铭记于五内的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马英九比任何人都清楚，台湾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可能脱离大陆，历史虽然给予台湾太多悲情和失意，但这一切都将转化和升华为民族生命的新生，而得

到历史的补偿。马英九一定清楚，大陆数以亿计的同胞几十年间承受的苦难和不幸，不仅在规模、时间上远远超逾台湾，而且在性质上更非台湾人民所能完全了然。马英九此种“一身而二任”的处境与使命，应成为世人观察其举措言行的“不二法门”。

真正让我们可以抱某种乐观心情的是，毕竟冷战已经结束近二十年，造成中国分裂的内战也已在无形中结束三十余年，笼罩中国几代人的内战阴云已渐消散，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人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的悲惨结论，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支持。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更需要重新恢复民族自信，没有任何力量有理由维持在中国人之间强分阶级、强行斗争的哲学和制度。同时，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历史结局，同样存在，同样让中国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从１９９９年“九•一一”事件开始，直到眼下的奥运“圣火”和四川大地震，在中共“冷战”和“内战”思维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大陆青年一代，已经再三表现了狂热、偏激、拒斥现代普世文明的病态民族主义。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痛感此种由官方悉心培养和导引的民族主义，一旦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融为一体，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双面刃”效应——民族主义既为专制所用、也为自由所需的惯例——将在未来若干年“一边倒”为专制主义最强大的基础力量。如果这种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西方出现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将成为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浩劫的预演。

能制止中国专制主义导引的民族主义走向完全失控境地的重要途径，便是重建中正、刚健、合乎中华精神与世界普世文明之道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新民族主义必须有一种相应的历史载体。只有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能满足并升华地球上最大规模、也最非理性、最可能酿成空前浩劫的民族主义的正面需求。

应当异常清醒地看到，如果任由中国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结合分孽出新的扩张性力量，台湾很可能首当其冲。如果采取鸵鸟政策，未来二十年左右，台海之间所谓的现状维持，将被我们无法想象的危局所取代。无论台湾岛内还是来自包括美国方面，企图以海峡、商贸、功利和交易等现实功利目的来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局面，都是机会主义的选择，最终都可能导向对抗和战争，而不可能达成真正持久的和平和双赢的局面。

大陆不能容忍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同样不能容忍国民党维持现状的政策，其中隐藏不露的民族主义，一旦被公开鼓励，两岸关系将在一夜之间滑向对抗。

如果台湾国民党当局试图以任何功利性质和投机心理，让台湾陷于维持现状的虚拟状态中，它不啻在台湾预设下人造地震的导火索。

马英九上台，使上述阴郁的宿命式的可能性不会变成现实。事实上，历史留给他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开阔。

他只要在尊重台湾民意基础上，接过大陆中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庄重承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运用现代文明工具，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以正式、公开、对等、不设限、无条件的方式，与大陆展开接触、交流、谈判；只要大陆不因为突发事件或难以逾越的阻碍和困难，放弃“和平统一”和“一个中国”原则，马英九就可能成为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物。

签署停战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战争状态，这是大陆已经释放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善意，也是马英九当下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有理由期待，从明天开始，在二００八年年内，国共两党作为两岸执政党，代表两岸政府和人民签署此项协议。如果这个期待变成现实，那将意味着，导致中国从领土到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的可悲历史，将到此终结。不难推测，两岸中国人和全球华人世界将以前所未有的欣慰和祝愿为之庆贺，国际社会也将以同情理解对待之，中国将诞生一种新的历史感，中国人六十年间的对立、仇恨和战争状态累积起来的历史鸿沟将开始弥合。届时，签署和平协议的双方获得类似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荣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两岸走向对话、和解，势必导致中美、中日关系的变化。美国从威尔逊总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和盟邦，尤其在攸关中国命运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中美之间并肩作战，中国为美国争取到宝贵的战略转机，也接受了美国真诚的援助，中国从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始创联合国，中国民族精神达到峰极，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

中美如果在冷战终结二十年后，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关于中国终极统一与东亚及亚太地区长期稳定与繁荣，达成真正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共识，那将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最大利益与愿望所在。简言之，美国深度理解“中国几千年来在文化、政治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汤因比语），这一历史结论，同情并支持中国按照其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和现代世界普世原则推进国家统一；同时，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承诺，中国现代统一不以扩张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目标，相反，中国现代统一沿袭中国古代“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直到孙中山“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以建共和，以进大同”，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世界渐趋大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1.1）。

无疑，台湾不可能重蹈一党专制和威权社会复辙，台湾数十年间经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土地改革、经济起飞到开放党禁、解除报禁，以至当下日趋成熟巩固的宪政制度，应是大陆进行全面制度变革、创新的最重要借鉴。中共若真以国家民族为重，就应以谦虚和兼善的心胸，认真看取台湾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上的成就。

两岸两党一旦正式公开谈判，中国的整体格局和气象当为之一新。大陆几十年噤若寒蝉、谈之色变的诸多事宜将立即蜕掉其党派偏见、独断和意识形态包袱。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天然利益和历史逻辑出发，一切举凡国家统一者，举凡国体、政体、国家主要概念、范畴、结构都应一一得以重新审查、辨析、厘定、认同。诸如政治、法律、外交、国防、货币、教育、文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统一，其实质乃是中国再造之过程，全体国人无分党派、阶级、民族、性别、贫富、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皆可发表国是谠论；新闻、出版、言论、结社诸项现代民权、人权皆不言自明，而受到法律保障。

谁也无法预言中国现代统一的进程、事象、影响、成果。中国统一作为中国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的正面实现，它呈现的是方向、道路、目标，而并无剧本和任何固定的模式。它的性质、方式、参与人士以及各种不可预料的偶然性，都将使中国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选择和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也许是某种天意，中国在公元前 221 年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统一。此后两千余年，中国长期处于王朝更替循徊的停滞社会，而欧洲正由于其分裂状态，导致各种竞争和文明演变。同时，欧洲的分裂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战争可能性，已经难以为继。联合与统一已成为欧洲和人类新文明的新形式。中国既已付出两千多年专制停滞社会的高昂代价，就不必重蹈欧洲分裂旧路。而苏俄通过解体结束 74 年专制痛史、走向自由新生给予的启示，对于中国也许正好呈现出相反的形态。由于民族、历史、文化、地缘、命运的特性，中国将经过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统一，结束一切专制制度，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发，综合大陆、台湾、西方、苏俄

的经验、教训，开出中国与世界的新路。

中国需要马英九式的君子风范，中国还期待一种圣贤气象。，毕竟，中国还有那么多夙愿未了，那么多壮志未酬。

马英九，加油！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上午王康于望京西

(原载《民主中国》2008 年 5 月 19 日）

超越宿命，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6）

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的杀戮（1931—1945）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

这一罪恶已被制止了整整六十年，但它的国家责任和历史后果并未得到应有清算，它的思想源流和精神谱系更没有寿终正寝，它们还在世上徘徊留连，不时分孽出新的变种，——我们远远还没有在思想上击败这一罪恶。

赢得和平不仅比赢得战争更高尚，而且更艰难。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所累积的文明和幸福，经常在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花果飘零，香销玉殒。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战胜战争，和平将变成下一次战争到来之前的休止符号。战争之所以如影随形，一个宿命般的原因在于，战争的思想几乎不可避免地依附着战争投降协定被胜利者接受。战争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和历史之中，没有任何民族享有铲除战争思想根源的豁免权，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民族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痛切而严肃地反思六十年前终结的那场梦魇以及嗣后六十年来的坎陷歧误时，中国的道路峻急而艰险。

没有哪个民族天生残忍、邪恶，怙恶不悛，也没有哪个国家绝对无辜，永远纯洁。“战争”这一人类最可悲的现象、最恐怖的狂欢、最让天地蒙羞的“恶之花”，竟然常常以最高尚、最伟大、最神圣的名义，由最优秀、最正直、最英勇、最富献精神和殉道热情的男女完成。最让人类困惑不已的是，战争的惨烈和毁灭力量总与文明的进步和突破正成比。最“优秀”的民族、最“强大”的国家、最“先进”的文化，总是面临着最强烈的战争诱惑。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阴郁悲观的宿命。

人类受同类戕害法则驱遣的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了。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代人都遵循着某种旨意，践行赋予他们一生以价值和意义的天命。然而，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但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极而言之，我们也许是在浩瀚宇宙中孤寂飘泊了亿万年的惟一的高等性灵物种无比奇妙、悲怆、绮丽、漫长命运的最后一批

见证人，抑或是这个物种盼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的第一代幸运儿。如此沉重的抉择，有时就在一念之间。

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希特勒及其党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已成为德国民族永难完全洗涤的罪愆和西方文明永远的污点。但作为战争发动和失败一方的德国，如果要为自己辩护（当然不包括希特勒在其遗嘱中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国际犹太人集团及其支持者”那类辩护），并非毫无说辞。

1946 年，86 岁高龄的弗里德利希•梅尼克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始写作德国战后第一部反思史著《德国的浩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奠基人，完全承认德国民族传统中存在某种“原始的黑暗基础”，承认德国国家权力的“恶魔”成分，但拒绝承认战后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流行观点：希特勒主义及其历史浩劫，乃是德国近代历史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必然产物。他在呼吁占领者给予德国普通人以“严格的公道”和“人性的谅解”，以免“再次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同时，尖锐地问道：“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中，难道不是有可能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高级的原则和低级的原则、神明的和恶魔的两者，是那么难分彼此地互相转化，——这不正是歌德在他的《神明颂》的颂歌里咏叹的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吗？”这位“从一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老人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肆虐，乃是由于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公民理想之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权利”的群众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关于人类千年福王国正在临近的神圣福音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严重受挫的代价，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交相激荡的恶果，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一种“恐怖反应”，是西方近代文明整体危机的产物。这位呼吁自己的同胞“在祖国最艰难的时刻”也要保持“尊严和自信”的德国史学泰斗，“纯粹出于高傲和幽默”，只字不提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刺激和伤害，更没有提及几乎充斥了欧洲全部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可悲传统：反犹、虐犹、排犹和迫犹。

日本虽与德国、意大利同被归为“法西斯轴心国”，但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的罪行要严重得多。日本的形象是世上丑陋、凶残、野蛮、邪恶的集大成者，“日本鬼子”是天地间侏儒、禽兽加魔鬼的化身，日本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厌恶、最仇恨、最鄙夷、最不屑的天敌，日本的侵略，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死罪。

中国横亘于最雄浑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间，与地球一样古老。上苍赐予的这片神州赤县尽管历尽沧桑，但其天纵式的辽阔、威仪、尊严、气象却不容世界任何力量触犯凌截。日本只是在中国近海悄悄隆起的一串岛屿，从来不是可以萌生巨大希望和簇新文明的“新大陆”。神州大陆和蕞尔岛国从造物主那里领受的世界份额和使命负荷，乃是天意所在，充满永恒不变的启示。

无论日本民族的起源多么扑朔迷离，无论徐福率三千童男玉女分乘五十艘楼船东渡岛国的史载多么神秘浪漫，华夏血脉肯定比通古斯人、马来人、蒙古人更有利于日本民族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嬗变演化。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得现代中国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日本有“同文同种”的文化血缘关系。

世所共知，数千年间中国独步东亚，慷慨大度地将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输赠日本，并赐给那片孤悬汪洋的岛国三个佳名：“扶桑”、“东瀛”、“日本”，其间寄寓的像想与祝福，美好圣洁，不染纤尘。

双目失明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携带的不是刀剑枪炮鸦片，而是佛学、中医、建筑、绘画。这名身披袈裟的文明使者带给日本的，分明是父母般的仁慈关爱，兄长式的提携扶掖。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到农耕时代的“弥生文化”，从“大化革新”到“建武中兴”，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中国的周孔之教、禅宗宝鉴、朱子哲训、阳明学说几乎单独铺就了日本一千余年文明开化的路途。

“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日本蒙受中华文明恩惠之深，莫过于日本天皇制与中国的渊源。自公元 645 年孝德天皇首次改元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总计 247 个，全部出自中国典籍，达 106 部之多。“大化”即取自《尚书•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日本近代“开国之父”明治天皇年号取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对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年号则取自《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直到现代，日本有识之士都不敢忘怀中国的文明教化之恩。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以感戴的心情写道：“日本社会就是这样：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吉田茂在其《激荡的百年史》里也以庆幸的笔调指出，“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

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两个民间之间，大与小、强与弱、文明与野蛮，慷慨惠施与衷心蒙受，无私馈赠与全盘师法之间，有如此清晰、单纯、健康而美好的关系。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曾两度发兵渡海，欲“通好”日本，皆因风阻受挫。那是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未遂攻伐，与中华本色文明无涉。《尚书•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纯系一个地理名词，不带丝毫贬意。至于日本南北朝间的武士、浪人、商贾到中国沿海抢掠走私，被中国指为“倭寇”，倒是名符其实的称谓。

中国人不持“原罪”说，不在“最后审判”划分“天堂”和“地狱”，裁定“永生”与“永劫”，也不在“轮回”与“涅槃”之间安置生命的归宿，明定善恶。中国的精神和道德立于“人生”这一有限而无穷的形下—形上过程，人的拯救与受罚全在己身，不待外求。中国看重环绕“人”的“人生”与“人间”，看重人之为人的仁爱、忠信、慈悲、羞恶、恻隐、同情、辞让、是非……一言以蔽之“人性”，胜过一切。

日本正是在中国最看重、最珍视、最维护的道德大限上，空前冒犯了中国的尊严，玷污了中国的荣誉，羞辱了中国的感情，亵渎了中国的灵魂，——全面地逾越了中国所能承载和忍受的极限，铸成空前的道德犯罪。

日本侵略中国，首在大逆不道，近乎弑父戳母。

若无这一最基本的知罪觉悟，形式上的“亲善”、“友好”、“和睦”（即使来自中国方面），任何经贸、“互利”、“双赢”、“共荣”，任何外交“新思维”、战略“互动”、联×抗×，任何罔顾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深创巨痛的“方便巧善”、“灵活变通”、“现实主义”，都是对中国心灵的蔑视，都无补于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再次走向对抗。

即使具备比德国还充足的理由，即使中国与日本无故无恩，即使中国曾经有负于日本，即使按照一般战争（包括侵略战争）的惯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堪称伤天害理的暴行。

一战以来，为防止战争对文明和人道的过度毁灭，节制人类自相残杀的暴烈程度，先后制定了多部国际公法，对侵略性质作出明确的界定，严格禁止对城市和平民的空中轰炸，限制和禁止使用毒气，禁止残杀俘虏，禁止奸淫掳掠，禁止残杀政府代表及外交人员。日本侵略中国，公然地、全面地、豪不犹豫地践踏了所有国际公法，超逾了人类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线。

德国占领巴黎，除了把纳粹旗帜挂上埃菲尔铁塔，也就在当年法国曾经羞辱德国

的贡比臬森林施以报复，让法国人在那里签署投降书，此外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屠杀、暴行、强奸。巴黎上流社会生活几乎照常进行，“自由法国”地下抵抗战士可以很方便、甚至很舒适浪漫地抗击德国占领军。

日本攻陷南京后宣称：“占领中国首都是有史以来盛事，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为使中国军民敬仰皇军之威武而归服之”，决定施行“屠城”。最为后世怵目惊心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 1940 年 6 月到 1945 年 1 月之间，平均每天有 879 人遇害；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里，平均每天有 8,794 人被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入城式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恐怖的一幕，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中华门后，满眼是血肉模糊的中国人尸首。

从全面侵华开始，日本就在中国半壁河山对二万万中国人展开细菌战：1938、39、40、41、43、44 年先后在华北各地投放霍乱菌，1940、41、42 年先后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浙赣铁路播撒鼠疫、霍乱，1942 年在广州投放副伤寒菌，同年在云南西部大量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作战…，构成“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日本甚至曾经准备用飞机将 300 万只疫鼠同时撒布在亚洲各地。

自从一战以来，各国军事当局慑于细菌战的可怖后果，在多个国际公约约束下，基本放弃了毒气弹。即便在怨毒甚深的苏德之间，无论是德国兵临莫斯科，还是苏军突入柏林，也没有大规模发动毒气战的记录。而日本军队罔顾国际视听和基本人道，从百万大军对峙的会战，到寥寥数名散兵游勇，从八路军游击区到国民党正面战场，从中国正规作战部队到躲在地道、防空洞里的老弱妇孺，一律施放毒气。日本却从不对美国军队发动毒气战，——非不能也，不能为也，不敢为也。

天底下最痛苦的是作日本军队的俘虏。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长朝香宫鸠彦 1937 年 12 月 5 日接替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发出的第一道盖有他私人印鉴的命令即是“杀掉所有俘虏”。根据这道命令，约十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倒在血泊中。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俘获 132,134 名盟军，其中 35,756 人被虐死亡，死亡率达 27%，创下人类俘虏死亡空前绝后的纪录。

1943 年，99 名美国海军军航空飞行员被俘，送克爱西林日军海军司令部处刑，由日本军人施行活体解剖，若干尸体被日军煮吃。

在马尼拉、婆罗洲，日本军将盟军俘虏绑在椰子树上，先刺死，再割下生殖器，并把阴茎塞在死者口中，拍下照片，寄到西方新闻社。几位受难士兵的母亲向罗斯福

总统哭泣：孩子为国殉难，但总不忍看到这种惨剧！

1941 年 4 月 17 日，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注、领事莫介恩、朱少屏、随习领事肖东明、杨庆寿、甲种学习员王恭玮、主事卢秉把八人被日军拘捕，身遭严刑折磨，被日本宪兵秘密押至华侨义山残杀。

虽然没有明文限制交战各方消灭敌国领袖，事实上刺杀最高当局的事例史所不断。但二战时期，惟有日本反复使用轰炸、暗害、枪击等各种行径谋害中国国家元首。将蒋介石远在宁静小镇溪口的发妻炸得血肉横飞一事，是日本战争行为最为人不耻的一个纪录。

日本军人在侵华战争全过程中，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分尸、钉挂、沉水、火燎、毒室、活埋、强奸、砍头等人类邪恶兽性所能想到所能施行的野蛮方式残杀暴虐屠戮奸淫中国同胞，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征服之蹂躏之奴役之宰杀之而后快！1939 年，温文尔雅的林语堂在巴黎写道："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一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更证明自己不适于统治别人。"

……

与世界各个民族一样，中国有自己的缺陷、过错、罪责和劣根性，中国的历史曾经长期被专制主义毒害，中国近代以来确实落伍了。对于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的生命的肯定和坚守，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远远没有达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那种令人激动、向往的高度，中国要全幅实现自己和人类的理想还有漫长的路程。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做一件对不起日本的缺德事，从来没有占领过一寸日本领土，从来没有残杀过一个日本国民，从来没有阻挠日本民族属于自己的正常道路。

日本加诸中国的暴行和伤害，却比中国漫长历史累积的苦难总和还要深重，比所有西方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和不幸还要巨大。中国承受和消解日本造成的痛苦和耻辱，中国医治和抚平日本带来的创伤和怨仇，需要漫长的时光和极度的道德磨砺。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如果一个政权崩溃了，谓之"亡国"；如果文化、礼俗被消灭了，谓之"亡天下"；在日本侵略之前，中国人还没有遭遇过"亡种"的灭顶之灾。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彻底践踏了全部国际公法，大大突破了人类战争罪行的边界，

而且空前蹂躏了人类的良知和人道，成为中国长久不散的噩梦，地狱般的记忆。

1935年，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公开要求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他直截了当地说，从日本人嘴里说出这两个字，无异于在精神上侮辱中国。那时日本的主要暴行还没有降临，那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成员，被认为是中国“理智派”和“温和派”的代表。

在日本暴行早已大白于天下却远没有受到应有的正义裁判、更没有作出像样的认输、悔罪和赔偿的六十年后，再有涵养再有气量再有耐性的中国人，都会像胡适七十年前那样，请日本不要再提“亲善”二字。

日本应当有最起码的知性能力，如果不能在它的灵魂深处萌生真诚的谢罪明耻意识，如果不愿坦诚面对中国的痛苦和怨愤，如果真的以为六十年的阴差阳错（包括中国人自己的迷误），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甚至图谋再次阻遏中国，那么日本将置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调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对简单的工作。审视、批判日本的战争思想，也许是更为艰难、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如果缺乏基本的洞察力，对日本战争思想采取漫画和孩童式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自称真正赢得了战争，更不能自称完全赢得了和平。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五千年未有之大创局”（曾纪泽）、“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自1840年以来，“西夷”、“西洋”纷至沓来，中国迭遭败绩，丧权辱国。但天朝上国虽然内忧外患，“大清龙脉”尚存，且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术严阵以待。孰料堂堂中华竟惨败于“一衣带水”的“蕞尔东洋”，一纸《马关条约》，又大大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味口，中国真正到了“世界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的绝境。

中国的仁人志士在震惊、悲戚之余，却异常冷静、理性地发现了一个虽然凶恶贪婪却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新日本，一个变革图强的榜样，一名可资取经求道的老师。

紧接甲午战败，从1896年起，一反千年传统，大量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十年后的1906年达到近万人规模，形成二十世纪初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运动。除了毛泽东等极少人外，对二十世纪中国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各界精英，几乎都曾满怀“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周恩来）

的救国救民志向东渡日本。

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宗教、医学、艺术、文艺等大量西方近代知识由日文译为汉文，达 2,712 种，同期译为日文的汉文著作却不到 30 本。大量新名词也由日文译介到中国：哲学、经济学、权力、宗旨、义务、旨趣、公敌、世界、契约、文凭、卫生、同化、法人、大律师、必要性、具体、抽象、手续、继承、原素、要素、偶素、常素、让渡、代价、亲属，债权人、债务人、重婚罪、野蛮、积极、消极、取缔、第三者、强制执行、压力、排外、政治、当事者、权力、义务、动员会、宪兵、警察、代表、干部……

绝不仅是种族血缘和地缘关系，甲午之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亲善”超乎任何第三国，简直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许多中国精英不仅在日本寻求真理，而且寻求了情爱和姻缘，康有为、孙中山、李叔同、吴鼎昌、冯自由、殷汝耕、周作人、郭沫若、汤尔和、林长民、宋教仁、蒋百里、张宗昌等人与日本女子结为秦晋之好。

最富民族意识的中国精英甚至对日本心怀感激。甲午海战与其说是中国（汉民族为主体和正统）的耻辱，莫如说是中国的幸事，在排满反清的志士眼中，北洋水师的覆灭对推翻满清统治，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中日之间强弱优劣之势，完全改观。

1904—05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对沙皇俄国的胜利，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不亚于甲午战争。1905 年 9 月 5 日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库克岛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在朝鲜的特殊权益）标志着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破天荒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一个亚洲新兴国家战胜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大帝国。“这对于整个亚洲均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非神圣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①这场战争的一个结果是，日本迅速形成了自己新的使命意识，而中国的日本观也发生了不可谓不小的变化。

从 1895 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中间经过 1905 年日俄战争）到 1945 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投降五十年间，日本几代思想界领袖和国家精英福泽谕吉（1835—1901）、大隈重信（1838—1922）、内林鉴三（1861—1930）、内藤湖南（1866—1934）、

幸德秋水（1871—1911）、宫崎滔天（1871—1922）、内田良平（1874—1937）、吉野作造（1878—1933）、橘朴（1881—1945）、北一辉（1886—1955）、芥川龙之介（1892—1927）、尾崎秀实（1901—1944）等人提供了一整套词语、概念、逻辑、理论和信念。他们或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家，或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或是民间法西斯主义鼻祖，或是世界革命的狂热信奉者，或是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殉道者，他们更是“日本使命”的揭示人和信奉者。日本民众和军队从他们那里聆听到的教诲所焕发的力量与激情，丝毫不压于从天皇、政客、军阀、外交官和财界巨头那里受到的压力和利诱。

经过三十年维新变法，日本在全世界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彻底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又在十年之内战胜了最古老最庞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和最辽阔最强大的欧洲帝国俄国。日本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象一轮太阳在东方升起，被赋予了一个神圣而崭新的使命。

对东方，日本是西方文明的引介者；对西方，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者。更重要的是，日本还是东方的拯救者、西方的挑战者，并且终将“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化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大隈）。

由于日本的崛起，世界历史发生了偏转。现代文明给所有国家带来的都不只是物质形态的改变，在所有因现代化发生变化的国家中，日本的自我意识乃至世界意识的突变，恐怕最为剧烈。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他者认识”更是逆转得让人匪夷所思。甲午一战，“日支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内村这位日本近代“绝对非战主义”代表人物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义战”，正如希腊与波斯一样，日本与中国分别代表了“自由与压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两者不可能“和平共存”，“日、支之冲突”不可避免。“如是日本败北，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

日本绝不能满足于做东方的代表。日本的使命首先是“支那及其他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者、指导者，是亚细亚之盟主”。率先提出“黄种人的使命”、坚定主张日本彻底法西斯化的北一辉鲜明地希望日本代表“东方之魂”，以与西方进行武力斗争的“亚洲门罗主义之盟主”的身份“击破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让日本之旭日旗给全人类以光芒，…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最终建立一个“革命之大帝国主义、使后世叹赏的黄种人罗马帝国”。如果这种“世界正义”被斥

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则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欢呼声中，将之作为黄金之冠，加于自己头上!”

日本大正二年、中国辛亥二年，黑龙会主干内田写下《支那论》。“世界之国民中，共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己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绝不限于最早主张“使朝鲜从中国之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之解脱”的内田，侮蔑中国为“畸型之国”，侮蔑一般中国人“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的“支那观”，长时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

与孙中山等中国人有特殊而深入关系的“支那学”权威内藤也于当年写出《支那论》。在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的书中，内藤咒骂中国民族“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国家“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矣。”日本“若真下决心欲使支那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亦无敢有指手划脚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

1924 年，在中国实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内藤又撰写下《新支那论》。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十三年后，在发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杰出支那学者”仍然断然否认中国能靠自己力量建设成为“普通国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终裁决的口吻宣判了中国的命运：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是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

日本第一部大型综合杂志《大阳》创刊于中日开战之年（1894）。该杂志连续多年刊载第一流学者的文章，不厌其烦地探讨日本与中国“国民性”的差异，描摹出大量“中国表象”。

日本早已具备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川崎三郎）的形象：

第一，有国家独立的历史

第二，国民富于勤俭尚武的气象

第三，国民富于廉耻节义的精神

第四，政治家重视公德

第五，有经济上的要素

第六，有兵备上的要素

第七，有教育上的要素

第八，有宗教上的要素

第九，有便利的交通运输

第十，不丧失文学、工艺、美术、语言上的独立

与此相对应是日本国民的十大特质（贺芳矢一）：

第一，忠君爱国

第二，崇敬祖先、重视家誉

第三，现世、实际

第四，喜欢草木、热爱自然

第五，乐天洒脱

第六，淡泊潇洒

第七，美丽纤巧

第八，清净洁白

第九，彬彬有礼

第十，温和宽恕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非仅东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拥有强烈、高尚、纯正的国家观念，以致“日本人一闻日本之名，便萌生为其而死之感情，而支那国民绝无此种观念”（中西牛郎）。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

中国这么一个“野蛮之国、非理之国、丑陋之国、堕落之国”有日本这样一个“一等国来开化”，实在是它的大幸。总而言之，“如今之计，唯有日本充当先导，以教导彼大国之四亿万人民。若此，则日本须作老师，作兄长，对方须作小弟、弟子也”。

甚至连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也远比日本低劣丑陋。日本著名画家志贺重昂在《日本风景论》中形容日本“山川逸美，风景警拔俊秀”，而中国“风景单一雷同，少巨木高树之幽邃，徒可‘卧游’而聊以自慰。”

没有必要再逐个征引这些把日本引向了战争之路的“思想精粹”。人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无论这些战争思想的营造者，还是执行者，其中许多不乏虔诚的佛教徒、热情的革命家、德行高尚的绅士、视死如归的理想主义者。更不能忽略的是，所有这些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无限荒唐、阴险、可憎的“思想”，不仅曾经为日本狂热而真诚地信奉遵循，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而且得到了同一时期若干中国人——绝非等闲之辈——的认同、呼应和发挥。

1899 年以后，梁启超先后撰文，论列中国国民性，提出四条特质：“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这名“新民”运动倡导者经过“穷思极想”，推究中国人“风格积弱根源者，举其荦荦大端者”：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

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特质”达 26 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 Q 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而鲁迅近七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

孙中山曾把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看成“亚洲复兴的起点”，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孙中山从反满抗清立场出发，又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曾经特别在《孙文学说》中加进一段案语：“国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1905 年同

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黄兴等所拟政纲中即有“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的条款。此后，宫崎滔天、内藤湖南、大隈重信、犬养毅、萱野长如、北一辉、平山周、山田良政等日本人士先后长期直接投身中国革命。囿于时代局限，孙中山对“日本的使命”、尤其是日本作为中国和亚洲拯救者的使命缺乏深刻的洞察和足够的警觉。在与日本人士交往的漫长岁月中，孙中山从中日之间特殊的关系也走到了“大亚洲主义”。虽然孙中山关于亚洲文化和民族的思想至今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不失为中国和亚洲近代以来最有历史眼光的思维，但在他逝世前后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思想却一度蜕化为妨碍中国民族自救的思想藩篱。

1913 年 2 月，孙中山在东京两度发表“中日提携”演说，强调“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中之兄弟也。日本为亚细亚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相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维持。……日本与中国为唇齿之邦，同种同文，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今日我中华民国既成立，亚东大局我中国可以负维持之责，毋需日本担心了。”虽然孙中山因日本与袁世凯勾结以及二十一条而对日本产生警惕，但他最后一次（1924 年 11 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说《大亚洲主义》，仍然流露出这名伟大政治家似乎与生俱来的天真。然而，与日本隐蔽于“大亚洲主义”后面的阴森前景相比，孙中山的亚洲意识毕竟真正代表了亚洲人民的正当愿望。孙中山这次演说中那段先知般的总结陈词，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近来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连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知之不多的毛泽东，也一度对日本颇怀佳感。1936 年，他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起长沙中学时代一位日本教员教唱的日本歌，他还清楚地记得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原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出一幅新图画。这首歌描绘的正是《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举国欢庆春节的情景。毛泽东说：“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也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受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至如汪精卫、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褚民谊等汉奸人士，除了私欲、野心和个人恩怨外，更是“日本的使命”、“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天职”和“支那

观”、“中国国民性”、“中国表象”的全盘信奉者。

“大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黄种人的命运和使命”本是人类近代历史出现的重大思想现象，欧洲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社会政治革命在东方引起的巨大反应，一场类似地质年代中造山运动般的文明冲突、融合进程，其地震海啸般激荡突进的力量和影响，至今犹存。甘地、尼赫鲁、凯末尔、真纳、沙里尔、塔鲁克等无数亚洲人士虽然具有千差万别的种族、宗教、文化、语言、风俗和地理背景，但与孙中山、梁启超、鲁迅等中国人一样，都不仅是己身民族、国家独立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亚洲独立、解放和强大运动的倡导者、拥戴者和参予者。

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引起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性主题之一，并且早已率先被西方人“解读”和预见过了。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

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婢，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甚至中国将来的实际结局和出路，马克思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预言过了："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必定要在一场殊死的斗争中被打垮。"马克思进一步预见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历史之手将通过"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使中国整个传统制度完全崩溃"。而"古老中国的终结"，却会使中国全面觉醒，并产生"全面的革命"。

在东方，一位诗人以其灵心善感的直觉表达了类似的忧虑。1916 年，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在横滨告诫日本：

日本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从东方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日本，这个古代东方之子，正在为它自己争取一切现代的衣物。在亚洲所有国家中，只有日本拥有这样的自由；因此，你们的责任比谁都大，亚洲将用你们的声音回答欧洲向人类提出的问题。

我们感谢这个日出之国，并且郑重地要求它记住它需要完成的东方使命。它应当将更充实的人性的汁液注入到现代文明的心脏，它应当永不允许现代文明在阴暗的乱树丛中受到窒息，而要引导它走向光明和自由。

全世界都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了机会和责任以后准备做什么。如果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

向中国和世界发出明确警诫讯号的是约翰•杜威。1919 年 5 月这名美国哲学家在北京公开指出："在中国，第一感受就是日本的势力无处不在，这种势力正在奔向那命定的终点——统治中国的政治与产业，直到最终彻底吞并中国。……如果所有列强都如此畏惧日本，对它的每一个要求都给以下满足。那么，中国又有何种办法来逃避已经给她准备好的厄运呢？这是笼罩中国的绝望信号。"

历史的天秤明显地倾向日本。无论西方、日本、整个亚洲甚至中国自己都在承认、等待、接受一场由"中国最邻近的对手"日本通过一场战争来加速中国的"崩溃"和"终结"。这场战争不仅是势所必至的，而且代表着正义、进步、规律，代表着亚细亚的意志、黄种人的前途，代表着吸纳了西方、又超越并最终战胜了西方从而建立起史无前例的皇道乐土帝国的历史真理。日本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委任者和执行人。中国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无条件地服从这一使命。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亡之局，中国笼罩在似乎难以抵御的浓黑的、充满血腥味的巨大宿命阴影之中。

中国抗日战争及其胜利突破并超逾了这一宿命。

首先是日本，然后几乎全世界都低估、误读、谬待了中国。中国也许不是在为伟大理想、正义事业和神圣原则而战，中国不过是在为尊严（面子）、存亡（活着）而战。正是为“最后一口气”而战，“在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为最庸常最平凡的“天理人性”而战的中国，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不败精神，排演着一场不逊于任何宗教圣战的民族解放之战。

中国百姓，在近一代人时间里，“凡大河南北，大湖南北，大江南北，并五岭之间，百越之外，居民之转徙流离，身家荡然，而不知其死所者，动以亿万计。更进而观沦陷区域之同胞，在绵延岁月之中，当敌人铁蹄之下，田园不保，庐舍为墟，少壮散之，四方老弱，转于沟壑，奸淫掠夺，屠杀焚烧，其身受之惨戚情形，虽人间地狱，不足以喻其万一也!”（蒋兆和）②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多次惊叹，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流亡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

七十年前，林语堂就悲愤而乐观地指出：“中国再生为现代民族的历程，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只有这时，中国才能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国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自立于世，他们发展为现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于一个幻想破灭的痛苦教训所使然。……即使是曾经只身维护 1933 年的塘沽协定的和平主义者胡适，也变成了抵抗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也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以抗日为唯一的条件，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了。……日本的武装战略使得中国变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林语堂这名高度西方化的学者、“旧式经院派学者”（鲁迅）以完全不同于一味抨击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人士的文字，还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 1940 年，就热切地讴歌了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外界压力下，我们的团结一致变得更加紧密协调；如果我们看到蒋介石个人的死对头，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们的全部武装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并肩战斗；如果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将军们出于同样的爱国动机支持蒋介石；如果我们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们都以各

种形式投入了战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顽强地抵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空军、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们看到后方人民的士气——约翰•根瑟说这种士气除了用“magnificent（高涨，宏大）来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词；如果我们看到年轻的女大学生们领着千百个由战争造成的孤儿走上了扬子江上的汽船，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而自己却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乞丐们把讨来的钱投进献金台上的钱箱里作为战争捐款；如果我们看到为越冬的士兵和难民捐赠九百万件棉背心的号召在几天内就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原定计划超额完成；如果我们看到难童们组织起来的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以唤起民众进行抵抗；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现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成了既成事实，中国已经团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坚强的决心，要共同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哪怕这个胜利要许多年之后才能到来。

日本侵略中国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中国国民性”，日本“进入”中国，是要救亿兆中国人于道德和制度的“倒悬”之中，根本改造中国人腐朽愚昧的国民性。

古老而仁慈的中国性格最厌恶不屑的，就是乖张怪戾，好走极端。中国人由于过于谦让、含蓄、善良而善于隐忍，以至被人认为缺乏精彩，没有锋芒。但他们在行为和道德上却比从“狂人”到“阿 Q”所锁定的人格世界远为深厚宽广，并且丰富美好得多。中国人无论有多少不足，但永远拒绝患上日本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仇恨和狂妄。

没有仰仗谁人的启蒙、呐喊、改造，中国人在同一场战争中不仅维护了国家尊严，而且证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国民性”，乃是天地间最正常而高尚、朴素而非凡、纯洁而伟大的道德。

日本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最没有料到的是，正是中国这种深藏不露、不轻易示于人的“国民性”，变成他们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生死亦大”。（孔子）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杜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则同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孙中山）

中国抗战军人统称国民革命军。他们之间曾是同床异梦的对手，或不共戴天的夙敌，但是他们甚至勿需前贤往哲的豪言壮语，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古训就足以让他们深明大义而同仇敌忾。

中国军队曾有200余名将领殉国，高居世界各国阵亡将领榜首，一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剧传统。而几百万穿草鞋、吸旱烟水烟，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中国士兵，胸怀混沌而坚定的生死观、忠烈观、家国观，“枪口对外”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衡湘大地、滇西缅北，在“我们生长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与日本军队展开了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正是这些“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更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花或给他们香烟，连姓名都很少流传下来的无名战士们”（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举世无双的忍耐、无可超越的毅力”（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卡尔逊）证明自己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感的军队。

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个中国士兵的背后都裸露着他们被洗劫过的故土，都站着他们被杀害的白发双亲，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还有被烧焦被挑死被开膛破肚的婴儿们。这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回过神来，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从来没有从他们心中消失。而一旦敌人无耻地践踏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便会证明自己是最无畏最英勇的战士。孔子虽然终身教人以圣贤之道、君子之风，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他的弟子子贡继承其师对邪恶作了如下判决：“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中日战争之间优劣胜败之分晓，不单在战场，也在两国精神和文化的较量。在这个战场上，中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钱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图；如孔子之至圣，而此下遂有儒林传道学传。此始是中国人所谓之文化。自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亦中国人所谓之文化。”揆诸二战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教授、艺术家、诗人、演员、记者，那么多泰山北斗级的鸿儒硕学，那么多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那么多风华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于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蛮和毁灭的民族解放圣战之中。八十余所高等院校、八十余万师生颠沛转徙，跨越千山万水，踏上

了孔子以来中国知识文化重心由东向西历史大转移的烽火征程。中国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他们世代传承的天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萃”是他们至死不渝的修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至高的幸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永恒的誓约。

抗战军兴，孙陵、李初犁等发起“投笔从戎”运动，郭沫若等六十余名作家签名响应，誓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死战”。

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不顾佛门成法，对弟子概然发愿：“吾人吃的是中华民族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自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再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日本曾抱怨，为何中国留英学生皆亲英，留美学人皆亲美，留法勤工俭学者皆亲法，惟有留日生绝大多数皆反日？

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炼狱中，一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的晦涩柔靡迷乱浮嚣之气，直承春秋气象、汉唐雄风，为中国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复兴垒筑起凤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岗，葆育、锤炼、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民族危机，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终于超越了风雨如磐的历史宿命。

1935 年，中国诗人就以《自由神》（施谊词，吕骥曲）为名宣告：

工农商学兵，

大家一条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

我们不要忘了救亡的使命，

我们是中国的主人！

莫依恋你那破碎的家乡，

莫珍惜你那空虚的梦想，

按住你的创伤！

挺起你的胸膛！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穿上意志的武装，

踏上人生的战场，

擎起自卫的刀枪，

制止敌人的猖狂，

争回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

中国已经突了它的黑夜茫茫，

人民已经锻炼了他的意志成钢！

中国在十四个年头 5,107 天时间里，以三千五百万生命的伤亡代价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驱赶出去，取得了有史以来攸关民族存亡和文明续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第一次最惨烈、最悲壮、最英勇、最伟大的胜利，是中国洗雪百年晦气、忧患、耻辱和历史宿命的民族解放圣战性质的胜利。中国以其空前的牺牲、卓绝的奋斗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争取了至为重要的战略准备、喘息、转折和反攻的时机。“如果没有中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作战？他们将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绝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在两线作战。”（斯大林）。

如果中国妥协投降了，日本将按照传统的历史方向，根据陆军而非海军的意图“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更可能的是，遵循“大东亚共荣圈”和“黄种人共同意识”，以日本的工业实力、技术和军事化程度与中国的国土、资源、人力相融合，缔造出一个令西方白种人颤栗恐惧的黄种人大帝国，其威慑力量将远远超过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大大刷新曾经让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黄祸”的恐怖纪录。无论中国战败还是投降，都将是人类文明的梦魇。

中国虽然获得了盟国的援助，有像雷鸣远、魏特琳、白求恩、陈纳德、拉贝、库里申科等兄弟姐妹式的西方人士使徒般的仁爱与友情，但中国也反复领教了盟国政客们的冷漠、欺侮、势利和背弃，其间的无奈、心酸、愤懑和绝望有时甚至超过了日本

所施加的单纯的战争灾难。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遭人凌辱的国家，一举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并跻身世界四强，成为联合国缔约国。没有中国的苦撑和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与上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仍旧是旧式的列强之争，帝国之战，所有非西方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肯定没有那样宽广。——中华民族满身血污、衣衫褴褛、步履沉重而坚定地屹立在东方，恰似一只涅槃凤凰浴火重生。

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所做坏事的影响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中日战争结束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两个东亚民族相互认识的处境和角度及其结论再次发生转换。

轮到中国以胜利者的身份评判日本了。

日本的残忍无道最有力地证明了它作为“代表者”、“拯救者”的“使命”角色已荡然无存。日本宣称和实行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黄种人的超国家集团”不仅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一场比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加诸亚洲各国的苦难更野蛮、暴虐、恐怖的噩梦。日本军人、政客、外交官、财阀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人类文明史上道德沦丧的恶性案例。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它的战争罪行向东西方都清楚地表明，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了“现代化”的民族，它的经验和下场是何等的残败、可耻；它那曾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寄托了太多希望的模式、道路，是何等的畸型、荆棘丛生；而它的学者、精英创立的“伟大思想”，又是何等的荒诞不经、血腥恐怖！

日本以擅长学习、借鉴、摹仿著称于世。作为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甚而跻身西方列强的亚洲民族，日本的经验和成就，日本的教训和失败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共同历史课题。

日本可以将中国的围棋、饮茶、插花、书法、武术精研细磨，发展到“道”的层级，可以将中国唐代的建筑和服饰、宋朝的山水画和陶瓷完好地保留至今，可以将中国的文字、禅宗和若干礼仪典籍“日本化”，但是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真传日本始终冥愚不解，中国文明的真精神真生命从未真正进入日本的灵魂。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最大失败在于，它擅自将中国文化的核心美德“仁慈”（仁）替换成“忠顺”（忠）。无论是为日本史家称道的圣德太子发布的十七条宪法（公元604年）还是明治天皇颁行的《军人赖谕》（公元 1882 年），日本都将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置于一切价值的首位。在被誉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中，日本中世纪大诗人大伴家持那首“表忠心”的诗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武士为天皇尽忠：

在海洋里，我的躯体在水中沐浴，

在陆地上，我的躯体与丛生的青草为伴。

让我死在我的君主身旁，

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

日本始终未能识别和接纳中国在“上帝缺席”的寥阔时空中感受、体证、参悟、涵泳、哺育、锤炼出来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境界，这是日本民族的大不幸。

八十年前，辜鸿铭这名中国近代的真正先知曾不厌其烦地提醒日本，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中国的精神“大部失传了”，惟有日本保留了“中国文明的精华”。日本掌握了“现代欧洲文明利器”之后，必须“能够正确地使用文明利器”，必须“有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如果日本只是为了保持本国以及从中国继承的民族精神而采用西方现代文明的利器，那么，不仅不会使日本西化，而且也能够防止中国西化，并最终依靠日本的努力将明治以前日本保存着的纯正的中国古代文明带回给今日的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日本的使命”。③——日本以自己的昭昭劣迹表明，它不配这一使命。

日本二十世纪初在东方的崛起，主要是西方文明刺激和影响的结果。这个声称“脱亚入欧”的国家最终走上穷兵黩武、征服扩张之路，是一个东方民族精神澹妄迷狂的显例，也是东西方文明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可悲显例。当年的日本不可能听取辜鸿铭满怀真诚和期待的呼吁，因为它在西方那里得到的除了“文明利器”之外，还有一套“文明利器”背后的思想体系。

日本崛起和灾难的源泉和渊薮都来自西方。

1871 年 12 月，“东方世界第一次向西方取经的伟大征程”从日本发轫。遵照明治天皇“敕谕”，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派全权大使，木户孝允、伊滕博文等四人为全权副使，组成包括 48 名皇室贵胄、军界和财界人士以及 59 名留学生的大型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法、比、荷、德、意、奥、瑞士、丹麦、瑞典等欧美国家，考察了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日本精英从令他们目眩的物质技术成就背后，还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整军经武、发展国防；他们还看到了西方流行于世的“物力之学”：科学技术主义、社会进化学说、种族优越论、历史决定论……；他们还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导师：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尼采、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霍布斯……

在“日清战争”（甲午海战）和“日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之间成长起来的

日本精英，从欧洲先驱那里观察和接受的思想比他们的先辈更具灾难性。他们有机会更仔细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军事工业，尤其对后来居上的“欧洲领跑者”德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他们朝拜了德国总参谋部，实地考察了它的钢铁、蒸汽机、发动机、AV7型坦克、马克沁机枪、“哥达”式重型轰炸机、“拿骚”级战列舰以及芥子气毒气弹的实验车间和生产流水线。他们直接目睹了自称人类文明先驱的欧洲大国的自相残杀，见证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崩溃，他们为自己找到新的精神理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死亡本能理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与其前辈一样，一直在究诘在思忖在嘀咕在谋划，为什么欧洲殖民主义者可以把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掳掠到了美洲、可以屠杀印第安人而问心无愧，而日本征服朝鲜、中国就是大逆不道？为什么英国、法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新加坡、香港和印度支那而不受惩罚，而日本统治远东和整个亚洲就要遭到调查、谴责？为什么俄罗斯摇身一变而为苏联，就有权宣称自己拥有“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权力，而日本指挥建立东方黄种人帝国推翻西方白种人的全球统治就不可思议？！

六十年后，西方已经突破了它的历史宿命，日本当何以往之？

2004年6月6日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人一样，把当年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者曾分别是法国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一夜之间，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马罗人时代以来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被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被从什切青海到亚德里亚海垂降的铁幕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

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不同帝国、基督教、拉丁语、十字军、世俗王权、工业革命、殖民体系、启蒙哲学、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种体系、条约、同盟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主张组成有十五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让一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十九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一类传统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三千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新生成为欧洲和解并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七十三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使希特勒的纳粹经济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同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五十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Kirche）的旗帜下，在善、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德国的历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自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难堪的分裂里，在一种外来的哲学和世界意识里怒目相向，无法从德国统一的启示里汲取任何灵感，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大宗军火昂贵倾销的市场。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并未同时

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有其来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第二次中日战争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按中国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端者理应清点检视一番，以便从历史中真正汲取教训、智慧和勇气，以便重新领受天意，在又一个历史关头看清我们的来路与去向，以便我们比前人少一些遗恨，少一些宿命。

历史已经表明，与中国抗战对人类的自由、文明、光明和和平事业作出的非凡贡献相比，历史给予中国的回报实在太不对称。最让中国匪夷所思的是，我们难于逆料、无法抵御的外来偶然性，再次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公，中国再次受制于一个新的宿命。

1945 年 4 月 14 日，一直为签署《雅尔塔协定》后悔不已、在反法西斯盟国中真正同情、支持中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逝了。深谋远虑又欲壑难填的苏俄人却根据这一使中国蒙受了最大民族创伤的协定，在日本投降两天之前出兵中国东北，接受八十万关东军的投降。1946 年 2 月 9 日、22 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好战言辞，“冷战”的铁幕在亚欧大陆同时降下，中国灾难性地成为这场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冷战”的最大战场。

无论因为何种坎陷、荒诞、吊诡，走向全面内战这一急遽转向乃是中国战后最大的悲剧。历史表明，由于这一转向，中国抗日战争史诗式的成就和意义，几乎从此丧失殆尽，中国再次付出难以尽述的沉痛代价，再次笼罩在又一次历史宿命之中。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阵线惟一的非西方大国，中国本来不仅已经收回全部民族尊严和权益，而已经成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楷模和精神榜样。中国在战时最大的外交成就和国际战略抉择是与美英苏结为盟友。尤其与美国的结盟，最充分地显示了中国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大国智慧。保持、恐固这些抗战胜利遗产的可能转眼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土地非但没有增加一寸（连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日本投降后才出兵的国家，也在战后拿走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中国浴血死战欲以捍卫的1，140 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 960 万平方公里——却被苏俄以“独立”、“自决”

名义割去了一大块；尖图群岛、钓鱼岛迄今被日本占据，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动荡不宁的战缘所在。

这一新宿命的另一个不幸结果是，直接中断了中美两国共同占领、制裁、改造和教化日本的珍贵契机和重大责任。取代这一来之不易的契机和责任的，竟然是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教化日本的机缘与义务，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精神的历史哲学和战略思想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战后日本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感情……）的场合，中国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这一新宿命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背景、过程、结果和意义都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历史尺度之下，予以全然不同的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然神圣性和史诗价值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基本的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意志、精神道德基础、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历程、深远而巨大的世界意义，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的极端重要性，鉴于这场战争对中国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极端神圣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都无异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中国此后经历的所有曲折，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竟沦为党派恩怨和偏见的黯澹时空，甚至成为中国人自相贬损、污蔑、迫害、剿灭的荆棘丛生之地。300 余万抗日英烈至今没有瞑目安息之地。1943 年建成的湖南南岳衡山“英烈祠”和“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作为“反动遗迹”被铲除一空，文化大革命又与整个国家一道遭“浩劫”。一本由武汉军司令部 1972 年 10 月编的《历代中原战犯记》中写道：“蒋军第三十三集轩军总司令张自忠被日军击毙。”张自忠不仅是中国抗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军阶最高的阵亡将领，1940 年 8 月 6 日，延安各界曾在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殉国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书挽词：“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1943 年 5 月 16 日张将军殉国三周年，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追悼张荩忱上将》，称颂“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

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重庆南山一片荒草荒冢中，曾掩埋了近200名为国捐躯的中国飞行员，他们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他们的墓碑、棺柩连同残骸如今早已荡然无存。该山是重庆著名旅游景点和泉水鸡一条街，成千上万红男绿女在此咀嚼佳肴，流连风景，几乎无人光顾那座近在咫尺的“空军坟”。

中国人应当永远严词抗议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也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每当清明时节，年轻一代到哪里去祭奠他们的抗日民族先烈？

中国人，应当不断地谴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蒙蔽日本年青一代，我们也应当自问，那么，我们有一本抗日战争的信史吗？我们几十年来表现的抗日战争都是真实而客观，有益于中国青年清楚了解中日战争并从中萌发天然、自豪、高尚的民族主义吗？

当日本二战老兵划着太阳旗、身着当年军装、呲牙咧齿列队在东京大街走过时，当势力极大的“遗族会”头目被日本青年人用敬爱的目光环绕时，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上诉一次次败下阵来时，中国的抗日老战士和他们喋血沙场的亡友们情何以堪？

最让中国人痛感世事荒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法纪荡然无存的“浩劫”里，中国竟然仅仅宥于时世变异和改善国际外交处境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偿。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对三千万亡灵的祭奠，无异于无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蒙受的十四年奇耻大辱，无异于罔顾“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而正义的原则;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中国作为受害者和胜利者的双重权利，无异于放弃中国理应得到的忏悔、认罪、服输、敬畏和尊重，无异于放弃中国应当能够施予日本的罚治、改造、教化。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大道、人性，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无异于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人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交易。

放弃战争赔偿，必然衍出一个可怕的后果：一个强大而从未洗心革面的日本重新出现在东方。这个新日本犹如一场新宿命，又在中国对面，永远不会挪开。

放弃战争赔偿，决不是“不念旧恶”、“以德报怨”伟大道德精神的继承，而是对这种道德的亵渎和滥用。

六十年前，在一艘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的船上，贴有一张公告。没有要求所有日本人去阅读，但所有看过这份公告的日本人都产生过一种不只是震动和感激的心情：

这次日本侵略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民，虽然随着战败而成为战俘、敌侨，而中国方面仍然一本传统的精神，没有给你们丝毫侮辱和危害。你们想想中国人民由于日本侵略中国，八年苦战的结果，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急待拯救的凄惨情形，你们不能不深深痛苦反省，彻底觉悟！中华民族，由于崇高的文化熏陶，只感到人类是应该同样的发展，同样的有生存权利，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固有的德行，她从不卖弄小恩小惠、浅薄幼稚的伎俩，或是什么阴谋诡计。……并不是要你们对中国感恩，而是要你们彻底反省，认清过去的错误。没有一个杀人以逞任性恣欲的人，或是一个专横跋扈、强取豪夺来兼并的国家能够生存于世界。这是历史上无可逃遁的史例。谁违反它，谁便会招致失败和覆亡的教训。

中国曾经奇迹般地从抵御了“以暴易暴”的邪恶诱惑，没有取而代之作亚洲新盟主的念头。——历史并非没有提供这种机会。曾经真正让世界惊讶、钦佩的，还不是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武力中国，而是取得了道德胜利的文明中国。在废墟般的世界上，战后各国——无论失败的轴心国还是胜利的同盟国——都在劫后余生的地球上喘息挣扎，都在开始划分、争夺新的势力范围。胜利者虽然对战后世界作出了全球安排，——历史以再快不过的速度证明了那些安排是多么脆弱，残缺不全。惟有中国对日本提出了“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道德原则。中国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新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优先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礼送回国，中国为朝鲜、越南、印度、新加坡等国的独立与美英苏等白人盟国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中国没有虐待一个日本俘虏和投降军人，没有占领一寸日本国土。中国曾经把日本带上文明之道，日本又从西方那里接受了毁灭之途。面对日本的成就，中国从无施恩图报之意，面对日本的浩劫，中国除了失望、痛心之外，只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令人扼腕长叹的是，这惟一可能救助日本脱胎换骨、立地成佛的历史可能，很快被泛滥而来的新的战争思想淹没了。如果至今还把这一道德看成是当年中国执政当局别有用心的策略，那就全然贬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胸襟和道德担当，丝毫没有摆脱当年战争思想的流毒，在精神上继续否定中国文明已经走向她伟大复兴的不朽史实。

1947 年，卓越的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就指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彻底击败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

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当今世界甚至存在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十年更难容忍的暴力和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宣称已经在思想上完成战胜了日本。虽然没有谁再提出过“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黄种人帝国”一类“使命观”，没有谁制造出新的种族理论和国民性优劣比较，但我们在抗战胜利后三十年余年间，曾在自己内部公开实行了新的尊卑贵贱身份等级，并且以“伟大”、“英明”、“进步”的名义把它们变成“运动”和“制度”。在两代人崇尚暴力和倡导斗争的表演中，是否渗透和掺杂着当年日本的思想精英们幽灵般的宿命呢？我们在反常而艰难的历史环境中显示给世界的，不也有当年导演了战争悲剧、煽动起一个民族走向深渊的非理性、激进言辞、狂热和极端思想吗？

中国人曾经把世界从真正的“黄祸”中拯救出来，遏制了日本排斥白种人的变态狂，拖垮和打败了在东西方都恶名昭著的邪恶国家。一个像中国这样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庞大国家，又身受了无数的苦难和不公，以她饱受创伤的心灵和潜藏的无限力量，如果被某种貌似“伟大”实则野蛮、号称“神圣”实则恐怖的思想所俘虏，那末她所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只是一场真正浩劫的序幕。幸运的是，中国乃是世界上最看重“仁慈”、“信义”、“和平”的民族，中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闯入任何极端，中国对“人性常理”的尊重，确保她永远不会走上疯狂和毁灭的道路。

第二次中日战争给后世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得到拯救。凡是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援助、恩赐、赞誉，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让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上帝还没有赐给哪个民族以救助中国的神力。一旦中国回到了它的正道，找着了它的力量，复活了它的精神，它就会给自己和世界同时带来福音。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遵从自己善良、纯朴的本性，扫除一切狂热和野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向白色、黄色和红色列强反复求教，结果是创伤多于友谊，失败甚于成功。这样一种遭遇，使中国不可能不敏感多虑，恩怨在心。但豁达通脱，慷慨大度始终是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在刺激—反应的历史宿命

中被动地存在，历史从来没有给中国一个正面机会，让中国从容自信地遵循自己悠久的理性道德和醇厚的人文精神，以“人者天地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一家”的不朽思想正面遇合西方，为人类开出新路。

重温中华文明古老而伟大的传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台湾国民党人终于在五十多年的阕隔后，参访大陆。中国人有权利要求这两个在中国二十世纪中承担了重大民族和历史责任的政党，真正回到六十年前抗战胜利时的历史哲学和民族精神上去。

这一切虽然姗姗来迟，却毕竟是转向历史正道的开始。“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历史期待着中国人在回归民族本性的同时，更自觉而忠诚地领受天意。

六十五年前，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花鸟画家张书旂受国民政府委托，在防空洞里绘制了“百鸽图”，中国国家元首在上面书写了“信义和平”四个字。十年之后，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画下了那只著名的鸽子，人类开始以鸽子象征和平。

1955 年 4 月 11 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名，两天后，这名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宇宙奥秘探寻者、人道主义者便溘然长逝。笔者在当年第一次读到这份宣言时，曾深受震撼。二十多年后再读，所受启发如同昨日，而更添一种亲切熟悉的感念，其中的文字、情怀与中国古圣贤“生于忧患”、“天下一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眼光、心迹，何等的相通：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核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

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

作为人，我们向要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④

2005年4月5日重庆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89页。

②蒋兆和：《后流民图作者自序胜利之日》，人民美术出版社《蒋兆和论艺术》，1994年4月第1版第6页。

③《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80—281页。

④《爱国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务馆1979年10月第1版第340—343页。

祭祀時代：祭文布奠

四川：中国的盐——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一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让世人领教了这两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类从上苍那里领受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挣扎在蛮荒、贫穷和战乱中，有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占据着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于冒险进取精神，同时对大海与星空的深邃浩瀚满怀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内心苦修，衷心企慕来世与天国；东方、中国，似乎注定了须历经灾难、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奥义，才能领略冥冥之中隐而不显却无时无地不在的天意，谓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如同犹太人这支上帝选民也必是世上的盐一样，四川也是中国的盐。不仅在修辞学的隐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朴的存在意义上，将四川当成中国的盐，都是恰切的陈述。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只有在四川，李白这样灵心特异的诗仙，才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种苍茫的命数笼罩在这沧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亿万年间，经寒武纪、志留纪、震旦纪、三叠纪、白垩纪等动以千万年为计的地质年代，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等亚洲地壳沉浮和气象万千的造山运动合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持续升高，像一位君临万物的万神之神，居高临下俯瞰尘寰，四川万千水流则合力切穿巫山万壑，汇成三峡长江水系东奔太平洋，四川终于完成其惊天动地的沧桑之变：由海洋盆地演变成湖泊盆地最后固化成养育了亿万生灵的陆地盆地。

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点，在于它处于中国第一、二、三台阶分际处，这片由四条长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质结晶，由世界屋脊向东或急剧倾斜或绵亘迭宕的地理界线，正好也是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与“蛮夷狄戎”阡陌交错、中原儒家轴心文化念兹在兹必行“华夷之辩”的文明冲突－融合带。这种地理－文明界线的重叠契合，

赋予四川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顺天应人、贡献其不朽的“非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于天下之后，四川便成千里沃野，号称“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称美“天府”，同时成为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兵燹要地。张良、诸葛亮曾将四川作为进退有据的基业之地，唐玄宗、僖宗先后避乱成都，最为后世乐道的“三国”蜀中故事，诸葛亮在其《隆中对》对四川的定位，都记载了“天府之国”对于“天下”日益紧密的关系：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业。

从地理－历史－文化沿革看，与北方中原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和湖湘荆楚巫道逍遥之风不同，四川自成一统的格局和独具的气象，空间的阻隔和时代的差序，使这片与法国同大的土地，常在浑然不觉中扮演某种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历史学家诧愕不已，几度演绎了难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历史大剧。

公元 1259 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规模、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撤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方得以按后来的轨迹发展。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发生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其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 40 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四川在内的整个世界。

四川不过因应形势，耗费二十年光明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合川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卫战”，虽然没有扭转蒙元最后征服中国的大危局，却在浑然不觉中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四川，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四川。天意从来高难问，四川的全部荣耀和悲情，都不会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赛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来没有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的盐”依然陌生、苦涩、神秘。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风美雨东渐，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东西部文明距离日益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后不开化也日益明显，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 1840 年以来受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才渐为东来岛国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气象的盆地历史也才告终结。

1895 年甲午战败，三年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迁都”之议。他声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这位维新领袖虽为广东人，却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国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开始为东南新派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蜂起。1911 年 11 月 23 日，川东重镇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指出，“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盛赞“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中国近代风雨如晦，充扩不开，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现代工业化造成的新的国族观、亚洲观和世界观。对于日本，侵略并征服支那（中国）乃是日本实现其“大亚洲主义”，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的题中首义。对于中国，这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危机，仍是“亡国灭种”至于斯文扫地，率兽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国若不愿臣服日本帝国从而永久丧失其国家和文明，就只有一种抉择，举国举族举土之力以抗日。对于四川，则意味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伐东征诸历史大事中因为地缘关系而基本置身局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四川“天府之国”、“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独立王国”，历史之手冲决自然屏障，四川从此开始成为“中国的盐”。

二

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中国抗战最高当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民革命根据地。蒋中正为浙江人氏，在民国初年就提出“蜀粤并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据地”，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感情，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

从 1934 年 10 月始，专负国防和军事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以“追剿红军”为张本，巡视了西南西北十余省，策定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的抗战方略。

1935 年，蒋中正在重庆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题作公开演讲，“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

同年 8 月 11 日，蒋氏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再次强调：“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

同年 10 月 6 日，蒋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演讲，再次强调四川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特殊关系，再次强调“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同年 10 月 8 日，蒋氏又在重庆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公开声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和根基在长江流域，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中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治乱。他公开指出，在与日本大战爆发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现伪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设，中国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复兴！他明白无误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什么乱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即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1936 年，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方略在中国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得以明确表达：“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从此，四川正式成为“抗战中国的盐”。

自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轴、重庆建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目标，便是攻略四川、占领重庆，彻底结束“中国事变”，再根据亚、欧战局演变，决定“南进”、与美英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开战，还是“北进”、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俄。

1942 年 5 月 19 日，日本南方军团顺利攻取东南亚与西太平洋诸战略目标后，曾禀报日本大本营，称“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大本营接受“中国派遣军”意见，制定进攻四川的大战略，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拟在日本国内征派 23 万后备军，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日军第一战将冢田攻中将，担任攻略四川先锋指挥官。

日军拟特别组建“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二、七、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后，其锋芒向东旋转，越过秦岭、巴山，沿蒙古军队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汉十一军五个师团，从宜昌溯江西上，强力突破华军三峡防线，直接攻占重庆。一旦四川失陷，国民政府要么再向西康、西藏一带撤退，沦为地方游击政府，要么向日本投降。

日本在二战所犯最大错误之一，便是因 1942 年夏季美军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开始强力反击日军，冢田攻中将坐机 1942 年 12 月初在安徽上空被中国空军击落身亡，而停顿以至完全放弃“第五号作战计划”。直到 1944 年再度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打通亚洲大陆战略交通，将“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以及“南方军”结为一体，最后压制并攻略四川，与盟军进行战略决战，皆因欧亚战局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演变，而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

中国若无东三省，华北五省，江南沿海各省，尚可维持抗日复国基局，但若失去四川，若使重庆沦陷，就一定亡都至于亡国。八年抗战历史早已坐实，四川乃是日本帝国无法逾越的中国现代万里长城。

附带一句，日本长期占据东北、华北，竟然连攻取延安的象样的作战计划也不曾制定，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曾对四川进行过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日本曾在随枣会战后攻陷宜昌，在豫湘桂大战后兵至贵州独山，但除了俘虏，就没有一个日本兵、一辆日本坦克染指巴蜀大地。日本只能望蜀兴叹，刹羽而败了。

抗战期间，一首名为《四川的儿女》的歌曲曾在四川广为传唱：

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站到长江的前哨！我们的心是火焰！

我们的血要交流在一道！我们的臂膀是钢铁，我们手要拿起杀敌的枪刀！保卫大四川，保卫大中华，冲过长江下游的城堡！大时代到了，大时代到了！四川的儿女们，快拿起我们的枪刀！

不妨略举数例，当可见四川之于抗战中国的特殊价值。

“七•七事变”次日，刘湘即以四川省主席身份电呈蒋中正，同时通报全国，呼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 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抗战，四川可出兵百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在场蒋中正以下诸军事要人皆受其感染，会议最后以起立与否决定抗战与否，与会者皆齐刷刷一致起立。在中国及世界战争史上，如此行动空前绝后。只有深刻了解一盘散沙、军阀拥兵自重的中国的人们才清楚，这种古代盟誓式规仪，对于中国战时军事领袖们所具有的特殊含义。

8 月 25 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承担较其他各省都更重大的责任。各路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刘湘本人于 1938 年 1 月殉国，死前留下遗嘱，语不及私，“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段遗嘱，很长一段时间在前线川军每天升旗仪式中被官兵同声诵读。

抗战八年，日本军队从未踏上四川土地，川军足迹却遍及中日战场，淞沪、徐州、武汉、南昌、随枣、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湘西诸会战以及滇西、缅北、印东战场，都有身材矮小却异常能吃苦死战的川军。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指出，西方军队常见的军事美观装饰，中国军队完全没有，没有乐队、鼓手，更没有少女向他们献花和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纳尔逊认为，中国军队的毅力无可超越，他们的忍耐举世无双，如果得到足够的粮食和精神的鼓励，他们将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战士。脚穿草鞋、装备陈旧的川军乃是最典型的中国军队。四川曾将 300 余万子弟送上前线，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都曾流遍四川“壮丁”血汗。中国诗人和歌者曾为这些身壮如铁而目不识丁的川娃儿献上过衷心的礼赞。在此且略引几首壮丁之歌，以飨今人：

壮丁上前线

常任侠词张曙曲

东洋强盗野心狂，奸淫妇女抢钱粮，

占我们的田地，烧我们的村庄，

杀我们的父母，炸我们的工厂。

我们要拿起锄头镰刀，拿起炸药钢枪，

一齐杀上前去，把日本强盗都杀完！

我们是健壮的壮丁，满身有紫色的光芒，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田地，保我们的村庄。

我们要打东洋，保我们的妻子，保我们的爷娘。

打东洋！打东洋！杀尽强盗回家乡，杀尽强盗回家乡！

壮丁歌

欧阳山词贺绿汀曲

胸膛阔，胳膊粗，天生一付好身手，男儿志气高！

不做亡国奴！编成先锋队，边疆去守土，枪在肩，刀在手，杀尽敌人方罢手！

壮丁队歌

蒲风词居田曲

一二三四！一二一二三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团结得像铁的洪流，我们都预备向前线冲。冲，冲，冲，冲出山海关，跨过大海东；我们，我们壮丁是民族解放的先锋！

国民革命军第 41 军 122 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徐州会战滕县保卫战中自戕殉国，所率将士五千余人在 108 小时激战中几乎全部阵亡，滕县阵地化为灰烬。1938 年 6 月 15 日，成都十万民众在牛市口迎灵，8 月 30 日移至新都安葬。成都少城公园建有王将军骑马铜像。

四川诗人徐士豪当年在《抗战日报》上写道：

现在再不用问谁的首领姓刘或姓孙……，

“百家姓”已给战火融成了一条心！

昔日相打的手现在握得紧紧，

全四川的枪尖只共支住这一个战争！

啊，战争！你们是为了战争才出川！

四川健儿生命的源流没有止穷！

流血吗，四川健儿可以不挂念，

这血的雨将要浇息敌人的凶焰！

死亡吗，这是四川健儿的家常便饭，

四川健儿的英灵还要保卫这江山！

四川健儿今天寻得最伟大的死！

四川健儿今天给四川留下最光荣的史！

四川健儿今天给国家做道最紧要的事！

四川健儿今天给人类写了最悲壮的诗！

不管我们的战争打到十年或八年，

不管我们的人马只剩一万或八千，

我们的四川健儿永远记住这誓言：强敌未灭，永不重返四川！

川军以阵亡 263,991 人、负伤 356,267 人、失踪 26,025 人，以刘湘、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将领的殉国证明，他们是抗战中国不可或缺的盐。

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小民王者成，为其出征儿子王健堂送行时，竟在白布锦旗正中写下大大的“死”字，左上方写有：“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1943 年，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国民政府军委会督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万五千名优秀青年学生远赴缅甸补充远征军，四川数百所大中学生“泣请从军”，十万青年远征军如期奔赴前线，留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不朽壮词。

抗战八年，中国共支出战争费用 14,640 亿元（法币），四川负担约 4,400 亿元，约占全国军费三分之一。1941 年至 1945 年，四川所收谷麦占全国征粮三分之一以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兵工厂，先后为前线生产并输送了 320 万条步枪、8 万余门火炮、8 亿 5 千万发枪弹、370 万个炸药包，75 万吨各类军用器材，四川生产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大量出口，换取中国急需的军事贷款。

1940、41 年后，四川各地展开献粮献金献机运动，社会各界、三教九流涌现大量动人故事。负责此项工作的安徽人氏冯玉祥将军多次由衷感动，称：“抗战以来，川省出钱、出兵、出粮、出力甚多。本人数月经所各地，不论男女老幼，莫不热烈响应，人人自动献金，爱国但恐后人，令人钦佩感动。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蒋中正在《四川与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川省同胞，遵奉国家至上，军事第一之要旨，忠诚奋发，同心戮力，以收动员人力财力之功。每年粮政兵力所负担之数

量均属甲于各省。输将慷慨，缴纳必先，丁选从戎，踊跃恐后。推而至于增产、运输、募债、献金等一切有关抗战之工作，莫不有优良之表现。”

为配合盟国空军，先后在重庆、成都附近九龙坡、广阳坝、菜园坝、双流、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修筑和扩建了轰炸、驱逐、运输机场，近 200 万民工参予了极为浩大艰巨的工程。数以万计的石匠、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及担负炊事、运输、后勤、缝补、医疗的老人、妇孺，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肩挑背磨，用最原始的工具，最土俗的办法，一锤一撬、一磨一碾、一手一脚、一吭一唷、一汗一血打、炸、挖、辟、填出十数个军用机场。其规模之巨大，场景之壮烈，足追两千年前秦汉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四川以古代奴隶劳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中国和远东战场的文明胜利举行了让历史学家至今失语的奠基仪式。

1944 年 6 月 16 日，首批 60 架 B29 远程重型轰炸机从成都郊县各机场起飞，穿行整个中国战场，横越黄海、日本海直接轰炸日本钢铁中心八幡，日本帝国第一次经受来自中国本土的远程轰炸。此后半年间，从四川各机场起飞的 B29 轰炸机向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投下 3,623 吨高爆炸药。

三

自贡盐场历时千年，为中国著名盐都，是中国最大井矿盐生产基地。其产量自晚清以来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以上。竺可桢曾亲临考察，“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绵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日本先后占领华北和沿海产盐区后，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四川井盐产销量迅猛提升，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管辖地区人口约二亿，按战时配给规定，每人每年用盐 10 斤，共需 2,000 万担。自贡及四川各地产盐则达 600 万担，占全国盐需求量近三分之一。自贡盐税计达 21 亿元，占全国盐税四分之一，为国民政府最大税收之一。按当时最低税率计，自贡每年征收盐税达 4,800 万元，若将此款项购黄谷，可购 1350 万石（每石 150 市斤），折合碛米 14 亿 54 万斤，可以支持 40 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军饷，可供 270 军队一年军粮之需。

日本本土海岸曲折，盐产严重不足。明治以后，日本成为盐进口大国，日军对盐资源的战略价值具有独特的体认。1940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决定对以重庆为陪都的四川抗日大后方“实行长期大持久战”，实施远程战略轰炸。1941 年 5 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门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内地轰炸，第二期目

标即对四川“自流井制盐所”实施“盐遮断”专题目标轰炸。

1939 年 10 月 10 日，日军 27 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 113 枚，炸死 101 人，炸伤 125 人，炸毁房屋 185 间。国民政府为改善自贡地区防空力量，1940 年初从重庆调出装备德式 75 口径高炮的高炮营，取代捷克造高炮营，直接驻防自流井盐场磨子井附近山上。

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成为四川抗战大后方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排排盐井支架如同誓死如归的士兵，透显出独特的气概。1942 年、43 年，自贡盐业投资购造“盐 2 号”、“盐船号”飞机二架，学生购“青年号”飞机一架，1944 年，西场盐商余述怀捐资 1000 万元，东场盐商投资 600 万元，蜀光中学师生捐款 17 万元，该年献金总计达 1.2 亿元，金戒指 800 枚，金手镯 100 枚，布鞋一万双，按当时城市人口 23 万计，人均捐资 500 元，相当于八口之家的盐工家庭一月的收入，为全国最高纪录。

重庆本是四川省乙级市，南京沦陷后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中国抗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后又成为反法西斯盟军暨世界民主统一战线东方指挥中枢。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 241 号”、“大陆令第 345 号”、“大陆令第 925 号”、“大陆令第 1252 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五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以“消灭敌国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轰炸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投降，以尽快解决“中国事变”。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 年 5 月 3、4 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前 4 个月，63 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 176 枚、燃烧弹 116 枚，炸死 3,991 人，炸伤 2,287 人，炸毁房屋 4,871 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逾 5,000 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目睹了这场空前屠杀后，写下《惨目吟》：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老舍与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地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 年 5 月 9 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 35 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议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

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国民政府再次起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重庆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议决，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化代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四川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人力之物力，咸幅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1941 年 6 月 5 日，德国入侵苏联前 17 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 300 余分钟之久，

酿成死伤人数逾 3,000 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1941 年 8 月 30 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 27 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介石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 年 12 月 30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22 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义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 年 8 月 19 日、20 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 2001 年 9 月 11 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实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是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1946 年 4 月 30 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 5 月 5 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1946 年 10 月 10 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政府“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 年至 1941 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 年 6 月 15 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

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 年 7 月 7 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 年 6 月 20 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 年 4 月 25 日，蒋中正在成都军校告别四川各界代表，并即席发表讲话：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装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以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以后，政府建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位浙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与川省各界依依惜别时，强调“一定要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把握目前大好的建设时机，发挥我们伟大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的模范省”。

四

包括蒋中正在内，包括 7,000 万四川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领导并坚持了八年抗战的国民政府竟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苏俄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等国际事变），成为国共内战的输家，四川成为中国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最后“苴国”。四川军事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罗广文、陈克非等人纷纷弃国民党投共产党，向新党新领袖新政权输诚。短短一百余天，维持了中国抗战基局的四川，改天换

日，江山易帜，又一种命运降临其上，四川仍然要作中国的盐。

1949 年 12 月 10 日，蒋中正与蒋经国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腾空起飞，永远离开大陆，在巴蜀大地上空留下两行文字：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

巨大的历史反吊接踵而至。

正因为四川是抗战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正因为蒋中正和国民党赋予四川以“抗战建国复兴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四川在中国抗战与世界二战中有如此显赫如此凝重如此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作为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的死对头并在苏俄扶持下夺取了全国最高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要以同等的力量、相反的意欲和对立的目的，尘封、铲除、毁灭抗战四川的一切痕迹，赋予另一种景象、符号和象征物。这种隳坏前朝衣冠宗庙的手法未必代表中国先秦以来尊重“黍离之悲”和“兴灭继绝”、“补敝起废”的儒家道统，却符合中国历史“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法家惯例，尤其符合来自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输送的“新”的国家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是无情却难予抵御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世界性新型历史铁则的逻辑，这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亟欲避免却最终坎陷于斯的浩劫式宿命，这是中国现代命运犁庭扫穴式的变形记，——四川继续成为中国的盐，而其味已苦涩不堪。

▲194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唯一一座全国性“抗战胜利纪功碑”在重庆民权路广场原“精神堡垒”旧址动工，其碑文由四川省长张群撰写：西南古为神州奥区，四川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力量之中坚。……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家繁荣。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后世史家，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兴之故，将知四川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于八年之献效已也！

1950 年，“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这一涂改式“行为艺术”标志着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总根据地的历史开始被另一种历史观遮蔽。

▲1944 年 7 月 7 日，“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日，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成都市民称之为“无名英雄铜像”，一名年轻川军，草鞋、绑腿、短裤，胸前悬挂两枚木柄手榴弹，背上插着一把大刀、一只竹编斗笠，斜挎军用背包，手中紧握一支亮开刺刀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身躯前倾，正出征冲锋……。这尊象征 300 万川军保家卫国的铜像在天下易手之际作为“国

民党兵痞”的“反动遗迹”被销毁。

▲宜宾小镇“李庄”曾以三千居民之力，容纳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共一万二千流亡师生，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李济、陶孟如等著名学者云集于斯，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1950 年，主持这项抗战学术、教育迁驻事宜的罗南垓（国民党南溪区党部书记）、张官周（南溪区区长）和杨遂辉（李庄镇镇长）在“土改”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镇压。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43 年因公殉职后，国民政府曾举行国葬，延安中共中央曾发表唁电，称这位年高德劭的“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1946 年 4 月 21 日，著名雕塑家王临乙主持塑造的林森铜像在重庆荷花池落成。1958 年，该铜像在“大炼钢运动中”中被销融。1966 年，林森墓被炸开，其遗骸遗物被焚烧洗劫一空。

▲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中国空军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血洒碧空，重庆南山曾辟地安葬 200 余名空军阵亡飞行员。历经韩战、肃反运动、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空军坟”的抗战圣地，所有墓碑、棺木、遗骸、坟茔早已茫然无存，惟荆棘丛生、荒冢垒垒、满目萧睹……。

▲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四川文艺单位创作了《抓壮丁》，专拣四川方言的滑稽、尖酸、刻薄，对 300 万四川抗战壮丁极尽丑化、挖苦、侮蔑之能事；四川美术学院则创作了大型泥雕《收租院》，把四川抗战地方实力派描绘成恶魔式的反动派，地狱般的“地主庄园”的吸血鬼。

▲韩战初期，二十余万国民党“起义”川军首批开赴北朝鲜，承担最苦最累最危险的运输辎重任务，近四万川籍“志愿军”喋血异国，再次高居中国阵亡军人之首。最负盛名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黄继光即是新中国川军的代表。其后 1962 年的中印之战、1979 年的中越之战，四川军人都是战争第一线的主力。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曾为国民政府、工厂、学校、新闻机构西迁作出巨大贡献，先后将六十余万川军和大量物资送上前线，在“宜昌大撤退”中，曾演出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悲壮史诗，120 余名船工为国殉难。1952 年 2 月 8 日，卢作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黯然遁世，其骸骨长年埋在南岸一处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之中。

▲1943 年 1 月中美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经罗斯福总统和蒋中正先生批准，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和中国军统局长戴笠分任主任。设有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建立了 165 座气象台、通讯电台和观测哨，为美军在太平洋轰炸日本本土提供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气象和军事情报。二战结束，美军方在一份报告中称中美合作所“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日本海军唯一的情报来源”。1946 年 1 月，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即行解散。

1950 年韩战爆发后，新政权组织创作《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文艺宣传品，煽动抗美、反美、仇美，以服务于“冷战”时期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和中共向世界输出地下斗争和武器起义革命的需要。中美合作所被定为“美蒋罪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展览馆。

▲1960 年 7 月 1 日，中共四川省委一纸命令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四川老百姓节衣缩食积攒的 4,800 万斤粮食化为乌有。其中大部分上调北京，宝成铁路通车前边远地区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 18 万民工肩挑背扛运出去的。1960 年底四川人口为 6,236 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 1957 年四川人口为 71215.7 万，加上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长数字，四川在 1960 年饿死人数达 1,000 万以上。从 1961 年到 1962 年，四川发动“新三反”运动，又饿死 200 多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未因此受到任何法律惩处，从 1958 年开始即跻身中共政治局，与上海柯庆施同为文革前最令人瞩目的政治人物，最后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死后被封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重庆、成都、宜宾、泸州、万县、涪陵、自贡等地发生大规模造反派武斗，除飞机外，坦克、大炮、军舰、高射机枪等重型常规武器都被使用。重庆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文革墓”一处就埋葬“8•15”派武斗死难者 411 人。四川武斗之惨烈残酷，规模范围之广泛，时间之持久，足可称为一场“内战”。其主要原因在一，四川一直被当作国民党“老巢”，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根据地”，在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反复清算、批判、镇压，各种冲突、仇恨、冤屈极为深重；二，作为中国主要粮仓的“天府之国”，竟然由于一名江西人的野蛮统治饿殍遍野，这种饥饿和死亡记忆总会以某种方式变形为暴力和杀戮；三，李井泉主政期间，四川作为“三线建议”重点省区，接纳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核工业项目。这些负有神秘使命的项目，布局

于远离“美帝”、“苏修”、幅员辽远、资源雄厚的四川，使之成为“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些项目除加剧了四川人民各种负担外，还留下巨大的隐患。

五

当年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毛泽东们依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因为另样的战略需要，再次将这“天府之国”辟为他们更为“伟大”、“神圣”的战略后方。

有两座雕像立在成都城内，象征着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离奇而荒唐的现代历史。刘开渠 1943 年设计的孙中山铜像座落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衢春熙路中间，四周色泽浮艳不堪。这名中华民国缔造者绝对想不到，他会坐在川西平原一条全是红男绿女、烟花柳巷般的市井中。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健身广告，一家名为“洋葱头”的“快餐店”和“韵露美发”发廊直接横在塑像上方。孙中山神情凝重，手执《建国大纲》，万般无奈地坐在那里，像早已掉价的古墓一样落寞。

毛泽东巨大的水泥塑像则占据着成都老皇城的中心，依然挥手而立，不可一世。文革结束，各地毛像毁存与否，多少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四川虽曾有赵紫阳主事，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名谣，但其前任与后续皆为庸人，根本缺乏拉倒毛像的勇气。

孙与毛两尊雕像，真实不虚地象征着四川在精神上的变形沉沦，象征着天府之国与整个中国一样，还在历史破晓之前的黑暗中，同时指证着四川在二十世纪两种身份荒诞交织、善恶纠缠的命运。

稍具历史感的人们都不难看出，在孙、毛之外，真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四川命运、赋予四川以天下兴亡使命的人物，连同他所领导的抗战及其遗迹、符号、废墟，至今从成都和全四川消失殆尽。从孙到毛之间一个巨大的存在的消失，意味着八年抗战的虚无化，这与广州“黄埔军校”、南京“总统府”至今基本完好且恢复旧制，形成古怪的对照。其原因不过在于，毛可以在孙那里获得某种含混的合法性和继承权，却不可能在蒋这里获得其所需之物。蒋一生反苏反共，其抗日目标之一，即在于避免使中国沦为任何外国、尤其苏俄帝国的附庸、尤其是精神、道德、意识形态上的附庸。孙的某种乌托邦建国理想，可为毛式专制独裁提供历史根据，而蒋比孙更偏重中华固有传统、尤其中华道德、伦理对于现代中国的首要意义，这也为毛式无法无天的唯物主义所拒斥。

四川的命运是中国二十世纪整体命运一个悲剧性的缩影。中共这一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形态集团具有历代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与从孙中山到蒋中正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道路也大相径庭。对于中共政权，中国所有人民、土地、资源统统都是工具，在毛时代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工具，在邓时代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式市场经济的工具，四川与其他省份一样，不过是有其特殊功用的工具而已。

请注意，恶性统治四川多年的李井泉，其主要政绩便是“积极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大搞水利建设，重修都江堰，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事实上，四川是历次政治运动为害最烈的省区。六十年代，四川成为所谓“三线建设”的大后方，即竭国之力以逞毛泽东们“反帝反修”、“世界革命”、“世界大战”的好战本性，充当其穷兵黩武的战争工具。“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川为东部沿海各省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国内市场。1989 年“六•四血案”后，三峡水利工程强行上马；1997 年，重庆从四川剥离，另成“直辖市”，以确保三峡工程各种需求。2,000 年后，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四川成为中国的能源基地，以李鹏为首的中国水利强势集团名正言顺地对四川巨大的水利资源开始实行垄断－掠夺式开发。

2000 年 10 月 20 日在成都召开“中国西部论坛”，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对“极具创新精神、富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要们”保证，“中国西部必将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所有西部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关注和支持”。“西部大开发”从此正式成为江式“新政”盛极一时的宏大叙事。岷江首当其冲。“中国华能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众多反对、抗议，悍然在举世无双的都江堰上方破土动工，其蛮横、邪性、野蛮和无耻，标志着东方最雄险最激湍的山水开始遭受噩运。在这片云横雾纵、天地氤氲的山水之间，另一套旗幡，另一类角色，另一类哲学开始入侵，这是毛式天字第一号的气概、雄心、宏图，这是邓式天字第一号的硬道理、黑猫白猫、翻几番，这是江李天字第一号的规划、预算、钢筋、水泥、高堤、大坝，这是征服了中国人并且要继续征服中国自然山水所仗恃的“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东方彻底唯物主义无神论狂徒们的天字第一号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想的狂想曲……

他们在岷江主流一口气修筑近十座大型水库，又在其支流一口气修筑几十座中型

水库，他们同时要在金沙江、雅龙江、嘉陵江修筑更多大坝。参予这项“二十一世纪历史性创举”的高官、经济学家、战略设计师、财界巨子、金融大亨和智囊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开悟到李冰父子两千两百多年前那万古流芳的伟大哲思：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没有一个人心怀对西部河山的敬畏和谦卑发出过值得一听的告诫；更没有一次属于东方、属于中国、属于这片壮丽河山的仪式，以祭祀天地，禀报祖灵，昭告天下，让原本深谙天人感应之道的国人重新领略一次参天地、通人神、贯古今的苍茫体验，让狂傲、虚骄、利欲熏心、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迷狂者们参悟一个亘古不易的常理：你们都是自然之子，在无限而永恒的自然法力面前，包括毛泽东一类敢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又唯恐神女有恙的狂人们，连同他们“当惊世界殊”的丰功伟业，都是极其渺小短暂的海海一粟，都注定要湮灭在我们不朽的行吟诗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赞颂不已的创造大法中：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事实上，从 1949 年开始，在新政权新统治集团的国家意识中，四川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一个因其土地、人口、资源的巨量份额而可以充任某种国家性、世界性战略工具的省份，——除了继续作“中国的盐”，四川不可能有另外的命运。

六

公元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地震，再次凸显了四川作为“中国的盐”的真实身份。

即使缺少现代地质学、地震学的专业监测技术，仅仅凭直观就可知，这一片孕育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空间，苍海桑田的节律演变从来没有被任何恒定不动的停滞状态所取代。在世界各大河域中，只有这一片土地，同时奔流出两条大水，落差如此之高，沿途高山峡谷，气象万千。它们唤起的感受，自古以来就为中国诗人、歌者、画匠外师造化的万古泉源。李冰父子创造的不可思议的世界水利奇观及其高深哲思乃是中国人与这片神奇山水之间唯一契合不悖的感应之道。

从 1949 年以来，受新政权新制度改造中国以作世界革命工具这一根本狂谬战略思想刺激，从毛泽东“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到华国锋“洋跃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指导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反思、清算和矫正。三十年经济建设并没有否弃毛式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观，而是更带灾难性地不仅在统治集团、而且在整个民族

和全社会中，推行唯物论，刺激物质、肉身欲望，实行竭泽而渔的现代化。四川西部拥有的巨大水利资源自然成为攫取巨大利润的对象。从制度到内心的任何约束、戒惕都早已被驱除，民间各种环保机构的能耐和声音如此微茫，亿万年天造地设的河岳川流，亿万年栖息于斯的无量生命，以我们永难知悉的感受和姿态，开始变形，沉潜，发作，惩罚。

一位安徽闻人问我，这次地震要是发生在京津或江浙上海一带，将是什么景象？实话说，无法想像，那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江南水乡，虽也有“扬州十屠”和“南京大屠杀”，到底出于异族入侵，乃是赤裸裸的战争之祸。不能想像，风流温柔、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莺歌燕舞、语软色艳的锦天绣地，一旦天崩地裂，会是一幅何等香销玉殒的凄凉世界。

不，上苍损补毁成，自有其意。如前所述，四川地处青藏高原、秦岭巴山、云贵高原，长江天堑合抱之中，汶川、北川所居的龙门山是早有 1933 年有案可查的地震断裂带，川西众多“海子”、瀑布的绝美景观，正是地壳造山运动的作品。此处发生八级地震，乃是地质演变之必然，不足为奇。

众多海内外专家已反复认证，四川地震固因自然变迁所致，但数十年间在长江中上游“改天换地”，大量修筑足以影响和改变地质结构的基本设施、国防基地和水利工程，大量污染、亵渎、侵蚀和破坏自然环境，不知节制地垄断、侵凌、掠夺和蹂躏自然资源，也是引发这次天灾的不可推卸的人祸。

从长江三峡大坝到紫坪铺水库，从“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毛式狂妄，到不顾生态、环境、地质后果和国防安全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数亿民众生死存亡的李氏集团“功在当代，利被万世”的好大喜功，四川从东徂西，千里川江大坝横行，水库高悬，纵有黄万里、李锐、王维洛等有识之士的谲谏抗议警告，仍然我行我素，而亿万川渝父老，竟完全无力无权无缘对此攸关其祸福生死的功罪利弊置喙。

让国人难于承受的，是成千上万中小学生葬身“豆腐渣”工程，这些初长成的“人芽芽”以如此成建制的规模，以如此惨绝人寰的形态，以如此忤逆天道人性的结局，蹈破了盛世的神话。这是《启示录》都未曾记载的凶兆否象，人类死亡谱系中未曾镌刻的哀恸至极的篇什，饱经浩劫奇变的中国未曾遭逢的苦难。这成千上万在几十秒钟同时进入黑暗的花朵般的眼睛和心脏，将永远逼视中国，永远叩问中国。穷尽一切汉语词汇，中国在这成千上万稚嫩美丽的生命之丧面前，将永远失语。

不，四川大地震若发生在东部沿海，其情形和后果将大不相同。也许会有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生命消失，也许会让帝国的精华地域和精英人群遭遇前所未有的震摄，也许导致某些直接的社会突变甚至最高权力格局的消长演变，但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西部边陲的四川大地震所已经垂降的意蕴，仍然如同七十年前四川忝为中国抗战总根据地一样，远非钟鸣鼎食的东部中国可能发生的启示所可比拟。

天使般的少年幼童在一刹那间的集体殒灭，其直接肇因，极为粗鄙简括：校舍工程发放、承建和中间方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及各种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手法。无论以良心、道德、法律、经济、社会的名义，无论需要多少环节，都一眼可以望穿这旷世未有的罪孽那极其邪恶而露骨的源头：当一个民族先被政治搅肉机、后被摇钱树征服后，天下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了。

经历了那么多不幸、苦难和罪孽后，中国仍然远远没有告别荒诞和悲剧。君不见，犯下如此令人失语罪恶的人们，不过是地方建设、教育当局的腐败小官吏，四处受盘剥敲诈的小包工头和建筑商，他们不过是这个庞大等级社会和官僚帝国里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与死难者们本有世代难分的乡亲血缘关系，如今他们成了人神共愤十恶不赦的罪犯。而数十年来领导、管理、教化他们的大人物们，绝对干净安逸尊严地生活在从小人物们直接造就的废墟到帝国首都之间大大小小的繁华都市里，没有任何良心不妥，更无任何麻烦责任临门。

让国人难于释怀的是，由毛泽东、李井泉、邓小平、李鹏们在四川不受任何置疑谋划布置的核设施、水利工程，一旦发生泄漏或坍塌，其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所作昆仑一词，“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人或为鱼鳖”，所指不正在四川大地震一带！

都江堰等两千两百七十余年的建筑被损，强烈地象征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引发的震撼直达半个亚洲这一纪录表明，由于 1949 年后公然推行无神论和唯物论而造就的虚骄狂妄，由于亿兆人众在精神上的贫乏和物质上的唯一活路，由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政权以“赶超”、“强盛”、“世界第一”、“东方崛起”为宗旨的现代化国家哲学，由于内战、冷战以来上升为国家制度核心价值的“世界革命”、“世界大战”和改革开放以来拒斥现代普世价值的专制主义与民族排外主义的联姻，由于 1989 年“六•四”以来专制之局顽固拒绝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而僭取巨大经济红利所引发的礼崩乐坏和人伦道丧，中国正面临空前危殆而峻急的又一次浩劫。

汶川、北川、映秀、青川、都江堰等处校舍坍塌，何止是不法官员、承包商和修筑公司天良所丧（就连如此天理难容的劣迹，还有建设、教育、民政等主事机构为之开脱），人心至此，犹三尺冰冻，从毛到邓到江，视人类良知若粪土、诲权诲利，为政不廉，为富不仁，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地震豆腐渣工程，其道德源泉概从中南海出，其卑劣污秽，早遍于九州大地。质言之，此次地震伤天害理的小官小商小吏，与京、沪衮衮高官权贵巨贪之间，实在小巫见大巫。我们将又一次目睹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专制表演。

四川地震，远非三十二年前唐山地震可比。以死亡人数比，唐山地震数倍于四川地震，前者在毛式暴政下，其真相至今不为人知，并将永远尘封。那次集体死亡，迹近一次暴秦式人殉陪葬的现代版，人们甚至津津乐道，毕竟以数十万生命的丧失换得了暴君的丧命，中国似乎由此结束了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中国之悲，至此无涯可寻。

这是一种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生死悲欣史观。我们终于被告知，历史是因为不堪忍受的牺牲才得以进步的，社会之所以需要“以人为本”，文明之所以“与时俱进”，是因为非如此我们就无从在苦难、不幸、罪孽中去发现工作的乐趣，校正事业的方向，进而证明那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伟大、光荣、正确。

在毛时代，中国一切理想、愿望、利益、意志统统都成为达到只有伟大领袖才洞察并把握的目标的工具，无论愧之恨之已晚抑或无愧无怨，不过是觉醒的奴隶和执迷不悟的奴才们的劫后状态。三十年后，又一种哲学笼罩中国，罪过、卑鄙乃至不幸和死亡本身都不足畏，相反，它们（当然最好是自己的罪孽和他人的死难）成了国家伟大和民族不朽的血肉文本，死了，成佛变仙，灭了，化鬼装神，一样可以体证美妙伟大的盛世，更能感戴党国的浩荡恩典！

若是京畿辅域发生此难，帝国贵嗣妃嫔王公子息葬身豆腐渣（虽称豆腐，却足以压破头颅，挤断脊柱，窒息生命！）工程，余秋雨，王兆山等无行文人，还敢教训数万白发爷娘，还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虎伥式的鬼字吗？

我们所处的国度和时代，很多因缘都会消散，甚至可以让几千万死亡消散于无形。但是，四川大地震像一柄十字架，矗立不动。不仅因为其间罪恶深藏，还因为其时空形式的特异，让国人很难再以纯然看客的姿态麻木不动了。

再势利冷漠的人们，再俗不可耐的市井无赖，也突然明白其权利、财产乃至身家性命，都是脆弱渺小的，天地间比他们昏庸无聊的人生更久远更强大的物事举目可见，

六十年来不知同情、恻隐、怜悯、敬畏、谦卑、惶恐、感恩为何物的中国社会，终于出现了某种发乎本能的“不忍其觳觫”的良心复苏。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被四川大地震一分为二。中国良知社会（包括数以万计的自愿者，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传媒界、海内外无数珍爱生命和中国的人士……）第一次以流泪、疼心、失眠、祈祷，以焚香燃烛，诵经超度，以呻吟、呼吁、呐喊……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叩问苍天，质询当道，一股睽违已久的道德源泉开始奔涌。在巨大而难于面对的死亡面前，多年被踏践被嘲弄被侮蔑的人性开始复活。四十天来，中国出现某种角力和对峙，一方是国家主义旗号下的歌功颂德，因为太不合时宜而显得格外无耻；另一方是发自个体生命最柔软最隐秘最珍贵的天良。这是前所未有的较量，专制主义占有压倒性的空间优势，但是人性一旦被天良所触动，神意一旦从废墟和十字架上升起，再强大的帝国也会暴露出它们由于拒斥良善和人道而面临被审判的困境。

温家宝先生三赴灾区，固其贵为国家总理所当行，但若把他在 1989 年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之行联系观之，我们多少可以窥察到这位曾反复引述康德、冰心、爱因斯坦、巴金等文明君子的共产党高官，奇迹般地葆有某种天良和操守。正是他在废墟和难民前那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语言，让这个政权和人民之间冰炭难容的局面，有了一丝人气和希望。我希望温家宝先生重温胡耀邦、赵紫阳两先生的鉴训，以更为彻底的人生立场，更为恢宏的历史精神，更为坚毅的道德承担，站在人民、民族、国家、自由、文明一边，效法历史圣贤豪杰，为真理殉，为生民立。

死亡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向世界最顽固最强大的专制传递了一份特殊的宣战书。所有的死亡都是丑陋、邪性、不可接受的，惟有这次死亡，美丽得令人心碎，圣洁得令人无力捶胸顿足，梦魇般地成为我们永远的共同负担。

将会以法律、建筑学、金钱和人性的名义追究几千间教室承包商建筑队和贪渎官员，将会在某处废墟上耸立起又一座纪念碑，将会重建家园，校园，更年轻的一代十几年后又会在阳光下绽放天使般的笑容。但是，这一次，这未曾出现过的死亡不会被忘记，超逾，置换。这是在天底下已无新鲜事和新悲剧的当代中国撕开的一道裂口，那里同时殒灭的成千上万年轻生命将以东方血色朝霞般十字架的景观，在漠视生命的帝国边陲永远耸立。所有的青丝、明眸、笑靥、小手、书包，欢声笑语，无忧无虑，所有含苞欲放的童贞、憧憬、惊喜、希望和爱，所有的惊悸、恐怖、痛楚、粉身碎骨

和黑暗，都将汇成帝国全体宫庭倡优和御用文奴再也无法尘封和粉饰的血渊骨岳，从天府之国俯视尘寰。

同为中国的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领受天意，悲壮而伟烈，历史报之以殊荣；五十年代至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部沿海繁荣昌盛，每一幢高楼，每一张人民币上，不知有多少四川民工和川妹子的血汗眼泪。

东方式的专制帝国，亚细亚式的治水社会，庞大骄横不可一世，如同四川大地震中千万水泥建筑，如同三峡大坝，一旦遭遇自然变迁（它总是要遭遇的!），便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偌大四川，屈身为盐，固然可叹可悲，一旦殒灭，顿成乃中华三千年未见之红黑“启示录”。

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中国抗战殉国将领总神位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自 1931 年至 1945 年，中国与日本展开 22 次大型会战，1,117 次中型战役，38,931 次小型战斗。其中 21 名上将、72 名中将、167 名少将喋血殒身，往复冲杀肉搏成仁者 82 人，身陷绝境自戕报国者 25 人，身陷囹圄气节如虹视死如归者 14 人。陆军阵亡、负伤、失踪 3,21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几近覆没。

中国以其血肉长城，不仅捍卫中华锦绣河山社稷宗庙，而且维护世界公理人类文明，中国因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强，参予始创联合国，成为东亚自由、民主、文明与和平之伟大国邦。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统计数字或可商榷，青史传录或将补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会湮灭枯栏，惟天地浩气，不曾瞬断息绝。后世国人族裔，循流溯源，当知中华复兴其来有自，冥冥中天佑中华之归趋凭依，中华使命悠远博大庄严神圣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传承，知所垂命。

上将(21 人)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高阳县人。陆军第 29 军中将副军长。七月奉令于南苑、团河阻敌。时父病重，佟挥泪曰：“事急矣！此移孝作忠之时，吾不能将侍老父矣。”二十八日晨腿部中弹头部炸伤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五。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荷泽县人。陆军第 29 军 132 师中将师长。武艺高强，曾以长城抗战喜峰口一役率大刀队奇袭闻名。七月奉令由河北河间县驰援北平南宛阻敌。七月二十八日于大红门地区身中数弹殉国。葬卢沟桥畔。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三十九。

秦霖（1900－1937）原名同观，字松涛，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7 军 171 师 511 旅少将旅长。十月二十三日奉令于蕴藻浜南岸一线阻敌。曰：“军人持干戈以卫国家，临难岂可苟安耶？”与敌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三十七。

郝梦麟（1898－1937）字锡九，河北藁城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陆军第

9 军中将军长。十月四日奉令出黔北上任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于忻口车站至南怀化镇一线阻敌。十月十六日凌晨中弹殉国。葬武昌卓刀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三十九。

饶国华（1894－1937）字弼臣，号退思，四川资阳人。陆军第 2 军 145 师中将师长。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令于浙江长兴阻敌。绝命书曰："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阵陷，焚广德机场，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三。

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四川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 23 集团军二级上将总司令。鏖战于泗安、广德战场上。淞沪战役失败后，奉令守卫南京。反攻芜湖战役开始不久，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因病于汉口殉国。国民政府予以国葬，追赠一级上将。年四十八。

王铭章（1893－1938）字之中、之钟，四川新都人。毕业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三期、陆军大学。陆军第 22 集团军 41 军 122 师中将师长。奉令于滕县阻敌。三月十七日晨"决以死拼，以报国家"。巷战中腹部中弹，举枪自戕殉国。葬四川新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五。

冯安邦（1885－1938）字化民，又名景树，山东无棣县人。陆军第 2 集团军 42 军中将军长。继三月台儿庄会战之后，九月扼守大别山血战五十余日，又转战鄂北襄樊、襄阳一带。十一月三日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葬襄阳南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三。

陈安宝（1891－1939）字善夫，浙江黄岩县横街马乡村人。保定军校三期。陆军第 32 集团军 29 军中将军长。五月奉令于南昌阻敌。五月六日敌我白刃格斗死伤枕籍，身中敌机枪数弹殉国。葬黄岩横街山岗，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八。

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毕业济南法政学堂。陆军第 33 集团军中将加上将衔总司令。奉令于湖北宜城阻敌。五月十六日于南瓜店肉搏殉国。曾手谕："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葬重庆北碚梅花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九。

唐淮源（1884－1941）字佛川，云南江川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3 军中将军长。五月奉令于夏县境内阻敌。背水苦战多日，曰："誓与中条山共存亡！"战

至十二日所部弹尽援绝，唐拔枪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七。

李家钰（1890－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人。毕业四川陆军军官学堂。陆军第 36 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兼 47 军军长。奉令任豫中会战第一战区后卫总指挥。誓言："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疆场是善终。"五月二十一日于陕县境内秦家坡中伏，头腹中弹殉国。葬成都南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四。

张谞行（1905－1939）字春生，浙江杭州人。毕业北京大学、保定军校九期、陆军大学十期、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一战区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三月七日奉令执行公务时于西安遇敌轰炸窒息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三十四。

唐聚五（1892－1939）原名福隆，字甲洲，黑龙江双城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东北中将游击总司令。五月奉令于河北迁安县平台山击敌。转战中负重伤，垂危之际曰："团结所有抗日力量，挺进东北。"伤重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七。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曾留学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日本人》、《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国防论》。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三八年任代理陆军大学中将校长，十一月于任上于广西宜山因病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六。

廖磊（1890－1939）初名梦祥，字燕农、元戎，别号伯符，广西陆川人。保定陆军学校二期毕业。国民革命军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武汉、随枣会战，奉令建立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三八年任安徽省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三九年于任上于安徽因脑溢血殉国。国民政府追赠追赠陆军上将。年四十九。

陈季良（1883－1945）原名陈世英，福建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人。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毕业。曾留学英国。任职海军第一舰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负伤指挥江阴海空战。四五年于重庆旧伤复发殉国。国民政府追赠海军上将。年六十三。

方振武（1887－1945）字定中，黄岩县中巷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是年三月，日军发起豫南、鄂北战役。任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赴前线督战。病重至西安，于十月病逝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年五十八。

陈训泳（1886－1944），字道培，福建闽县人。福建船政学堂十六届毕业。历任

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马尾要塞司令。海军部中将常务次长。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作战教训研究会主任委员。四四年卒于任上。国民政府追晋海军上将。年五十八。

宋哲元（1885－1940 年）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29 军军长。三二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三三年获喜峰口大捷而震动全国。因之《大刀进行曲》唱遍全国。三八年任一战区上将副司令，不久染上肝病。于四 0 年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回其夫人故乡四川绵阳疗养。四月五日病逝殉国。年五十五。

鄒洪（1897-1945）名若虛(原名德寶)，台湾芎林鄉鹿寮坑人，原籍廣東省五華縣華陽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八期。。陆军第 35 集團軍中将副總司令、桂邊區指揮。三九年四月邑江會之役、六月潮汕之役，四一年奉令馳援長沙。四四年廣州日軍陷清遠，終予克復。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於任所伤病殉国。国民政府追贈陆军上将。年四十八。

中将(72 人)

黄梅兴（1897－1937）字敬中，广东梅县人（一说广东平远县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江湾前线阻敌。八月十四日连克敌十数堡垒，下午三时许攻击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盘据之爱国女校时，被敌炮弹击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

蔡炳炎（1902－1937）字洁宜，安徽合肥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18 军 67 师 201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罗店阻敌。曰：“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进生退死，不得畏避！吾辈有两条路，敌生我死，我生敌死!”八月二十五日身中数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庞汉桢（1899－1937）字胤宋，广西靖西县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7 军 170 师 510 旅少将旅长。十月二十二日奉令于陈家行阵地阻敌。阵地几易，与敌几经冲杀夺回。二十三日下午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朱耀华（1891－1951）字强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保定军官学校三期。陆军第 22 军 18 师中将师长。十月二十六日奉令坚守大场阵地。阵地几易其手，死伤枕籍，全师将士伤亡殆尽，阵地失陷，遂举枪自戕殉国。(重伤被救。于 1951 年土改后被枪毙。)

吴克仁（1894－1937）字静山，满族，黑龙江宁安县人。保定军校五期。陆军第 67 军中将军长。转战于平津及平汉线等地。十一月初奉令死守松江县城三天，掩护上

海守军撤退，九日完成任务，于突围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三。

吴继光（1903－1937）江苏盱眙县人。黄埔二期。陆军第 74 军 58 师 174 旅少将旅长。曾于罗店重创日军。十一月初奉令赴青浦阻敌。血战四昼夜继而转守白鹤港。战至九日所部几无，吴亦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四。

夏国璋（1894－1937）字超然，广西容县人。毕业湖北法政大学、保定军校九期。陆军第 7 军 175 师少将副师长。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令于太湖南岸吴兴县阻敌。掩护大军撤退，肉搏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三。

吴国璋（－1937）陆军第 75 师中将副师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26 日于浙江湖州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姜玉桢（1893－1937）字连壁，山东荷泽人。毕业中央陆军军官高教班。陆军第 34 军 66 师 196 旅少将旅长。九月二十九日奉令死守崞县原平七天。七日后，奉令再守三天。突围时被炮弹击断一腿，又中一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四。

刘家麒（1894－1937）字铮磊，号锡侯，湖北武汉人。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毕业。陆军第 9 军 54 师少将师长。奉令于中央主阵地南怀化镇及关子村南高地阻敌。阵地数易，往复冲杀。十月十六日中弹殉国。葬武昌。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三。

郑廷珍（1893－1937）河南柘城人。陆军第 25 军独立 5 旅少将旅长。行前向母亲发誓不打败日军誓不生还。奉令配属第 9 军开赴晋北前线阻敌。于忻口南怀化东北高地，与敌短兵相接。十月十六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四。

赵锡章（1901－1938）字劳三，河北河间人。毕业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军校九期。陆军第 19 军 70 师 215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阴县阻敌。二月二十一日肉搏重伤。曰："我之衣衾早已备安，此即我葬身之地，今日有死无生。"伤重殉国。葬山西石楼东部。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

吕晓韬（1893－1938）河北河间人。庐山军官训练团三期。陆军第 17 军 84 师 501 团少将团长。奉令于山西安泽县阻敌。于宝盆村与敌遭遇。以寡敌众，伤亡甚巨。四月十一日被敌机炸伤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张培梅（1885－1938）字鹤峰。崞县人。毕业保定陆军学堂。第二战区中将执法总监。认为罚不严，赏不明，无颜再见军中将士。2 月 25 日中午给阎锡山写告诫信后服毒自戕。年五十三。

萧山令（1892－1937）字铁依，湖南益阳人。保定军校三期。宪兵少将副司令兼警备司令。十一月底兵临城下，再兼任首都警察厅长及南京市市长。十二月十二日城陷后，奉令掩护部队渡江突围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高致嵩（1900－1937）字子晋，广西岑溪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2 军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雨花台。十二日拂晓激励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拼死抵抗，直至阵地全毁。高同全体将士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

刘震东（1893－1938）字曦洲，山东沂南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第 5 战区长官司令部高参兼第 2 路游击少将司令。游击武装遍及胶东、苏北、鲁南、鲁北，“游击刘司令”威名远震。二月二十八日奉令前往莒县阻敌。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陈钟书（1891－1938）字树藩，云南安宁县人。陆军第 60 军 183 师 543 旅少将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运动。奉令出滇阻敌。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于台儿庄与敌肉搏。激战中炮弹片击中头面部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七。

周元（1894－1938）字凯之，广西宁明县人，壮族。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官学校南宁分校高级班。陆军第 48 军 173 师中将副师长。奉令于蒙城阻敌。五月九日拂晓弹尽援绝。除二十余名突围外，周与全部将士殉国。葬蒙城。年四十四。

李必蕃（1892－1938）字子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一期，陆军第 27 军 23 师少将师长。是年春奉令于山东郓城至荷泽一带阻敌。五月十四日与敌肉搏负伤，提笔遗言：“误国之罪，死何足惜，愿我同胞，努力杀敌。”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方叔洪（1906－1938）山东历城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第 51 军 114 师中将师长。曾任十九路军旅长。是年春奉令于鲁南山地游击，卓有战绩。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于六月鲁南冯家场战役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陈德馨（1904－1938）字惟吾，河南鄢陵人。陆军第 29 师 86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武汉阻敌。九月于湖北黄梅凤凰岭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四。

范荩（1899－1938）原名孟声，字致博，江西丰城淘沙后坊村人。毕业保定军校八期、加武汉珞珈山将校训练班。陆军第 198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武汉阻敌。九月

于湖北黄陂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江煌（－1938）安徽婺源人。日本士官学校七期。武汉行营政治部中将主任。奉令于武汉阻敌。10 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朱炎晖（1901－1938）又名桂林，瑞安城关人。黄埔高教班三期。陆军第 94 军 85 师 546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湖北金牛区阻敌。时在病中，遂于担架上指挥，十一月三日激战时，中弹殉国。被日军开棺鞭尸。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

钟毅（1900－1940）字天任，广西扶绥人。毕业师范学校、韶关讲武堂二期。陆军第 84 军 173 师师长。奉令于湖北枣阳、宜昌一带阻敌。五月九日仅四十余人。曰："吾等身为军人…当留一弹自戕，勿为敌得，遗羞华胄。"自戕殉国。葬广西桂林。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

戴民权（1892－1940）名正，字瑞甫，河南汝州人。陆军第 39 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一战区豫南第 5 游击纵队司令。五月奉令于河南遂平境内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八。

郑作民（1902－1940）湖南新田县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2 军少将副军长兼 9 师师长。一月，奉令于贵州都均驰援南宁。行前遗嘱：誓与敌血战到底。二月三日于广西昆仑关阵地突围时，肉搏殉国。葬湖南南岳忠烈祠烈士公墓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朱鸿勋（－1941）辽宁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53 军少将副军长。是年初奉令于湘西拒敌。转战途中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李翰卿（1895－1941）字墨林，河南范县（一说山东濮县）人。毕业福建随营军校、庐山军官训练团。陆军第 74 军 57 师少将指挥官。九月二十七日奉令于长沙北郊捞刀河拒敌。九月二十五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赖传湘（1904－1941）字镇之，江西南康人。黄埔四期、陆军军校高级班四期。陆军第 10 军 190 师少将副师长。九月奉令于长沙城拒敌。二十四日于长沙北郊金井双方拼死厮杀，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七岁。

王竣（1902－1941）原名俊，字杰三，陕西蒲城县东乡绕堡人。毕业同州师范、黄埔三期。陆军第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师长。五月九日奉令于运城东部之张店拒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寸性奇（1895－1941）字念洁，云南腾冲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3 军

12 师少将师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为解救军长唐中将维源复杀入重围。十三日与敌肉搏时胸中一弹右腿炸断乃举剑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金崇印（1890－1941）河北通县人。陆军第 17 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西境内拒敌。五月于中条山区受伤被俘，任敌软硬兼施，终威武不屈。七月十六日于绛县横水镇被杀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五十一。

刘克信（1893－1941）字彰民，河北石家庄人。保定军校六期。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少将总参议兼参谋长。七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突围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八。

石作衡（1905－1941）字子玉，山西浑源人。陆军第 43 军 70 师少将师长。九月奉令于中条山拒敌。血战数日，白刃肉搏。被敌炮击中。曰："协同一致，亲爱团结，以铁血保卫祖国，完成复国大业，吾死亦无撼矣！"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六。

武士敏（1892－1941）字勉之，河北怀安人。毕业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陆军第 98 军中将军长。九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二十八日于沁水县境内武亲临马头山前线，阵地数易。武三次负伤。二十九日突围时头部中弹与全军将士殉国。年四十九。

邢清忠（1899－1941）乳名印、字良臣，嵩县田湖街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15 军 64 师 15 军 64 师中将师长。调防中条山垣曲、绛县一带，于绛县前线与日军呈胶着战状态。四一年春，肺结核病重，鉴于中条山战事紧迫而拒绝治疗。后，军长强令赴洛就诊，途经渑池，不治殉国。年四十二。

戴安澜（1904－1942）号海欧，字衍功，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5 军 200 师少将师长。三月奉令赴缅拒敌。五月二十六日于缅甸北部之郎科中弹殉国。葬广西全州湘山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并获同盟军颁发"懋绩"勋章。年三十八。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化学兵中将总队长。曾指挥炮轰虹口敌海军司令部弹无虚发。是年秋前往印度检阅所部受训情况，返国时，因飞机失事殉国。年四十。

齐学启（1900－1945）号梦赍，字敦庸，湖南宁乡人。毕业清华大学、美国诺维琪军校。陆军新 38 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四二年三月奉令入缅于仁安恙解救英军数千人。五月二十三日重伤被俘。四五年三月十三日被刺殉国。葬长沙岳麓山。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洪行（－1944）湖南宁乡人。陆军第 6 军新编 39 师少将副师长。外号“洪湖子”。奉令移防腾北。12 月 17 日于云南龙陵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彭士量（1904－1943）号秋湖，湖南浏阳人。毕业湖北明德大学、黄埔四期、陆军大学十一期。陆军 73 军暂编第 5 师少将师长。十一月奉令于石门拒敌。逆袭时中弹，曰：“大丈夫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伤重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许国璋（1898－1943）字宪廷，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150 师师长。十一月奉令于常德西北之太浮山拒敌。二十日晨重伤休克。部属误已阵亡，至移至沅江南岸。苏醒急呼：“我是军人，应战死沙场，运我过河害了我！”举枪自戕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孙明瑾（1905－1943）号玉斩，江苏宿迁县人。黄埔六期、陆军大学十四期、陆大研究院毕业。陆军预备第 10 师少将师长。十一月奉令常德拒敌。十二月一日于赵家桥中数弹殉国。葬南岳忠烈祠公墓区。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柴意新（1898－1943）字泽高，号若愚，四川南部人。黄埔毕业。陆军第 74 军 58 师少将参谋长兼 169 团少将团长。奉令于湖南常德府坪街春申墓阻敌。十二月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五。

吕公良（1903－1944）浙江开化人。毕业衢州省立第八师范、黄埔六期。陆军暂编第 15 军新编 29 师中将师长兼河南许昌守备司令。奉令于许昌击敌。四月二十九日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一。

王甲本（1901－1944）字立基，云南富源人。云南陆军讲武堂十四期、陆军大学将官班。陆军第 79 军军长。九月七日奉令于湖南东安县冷水滩击敌，与敌激战两日。九日与敌肉搏而至头、颈、胸、腹中数刀殉国。葬东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三。

阚维雍（1900－1944）原名庆福，号伯涵，广西柳州人。毕业广州医科学校、广西陆军讲武堂、南京工兵学校、陆军大学二级将官班。陆军第 131 师少将师长。九月中旬奉令于七星岩击敌。十一月十日伤亡殆尽遂举枪自戕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四。

陈济桓（1893－1944）号昆山，广西岑溪人。桂林防守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十一月九日突围时受伤，遗嘱：“职右臂受伤…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遂举枪

自戕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五十一。

刘桂五（1902－1938）字馨山，辽宁朝阳人。庐山军官训练团三期。陆军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四月二十二日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百灵庙）阻敌。与敌千余人及装甲车七十余辆遭遇，伤重殉国。葬西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六。

李国良（1896－1939）字兆彬，湖南长沙人。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九年任军训部辎重兵监兼天水行营中将处长。曾任国民革命军 17 师少将副师长，辎重兵学校教育长，三六年加中将衔。三月七日奉令执行公务时于西安遇敌机轰炸中弹殉国。年四十三。

蒋志英（1902－1941）号志槎，字伯清，浙江诸暨县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一期。浙东沿海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守备司令。奉令驻防浙江海门阻敌。四月十九日于海门西南率预备队与敌肉搏，被敌刺穿胸部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九。

王风山（1906－1942）字鸣岐，山西五台县人。太原学兵团（北方军官学校一期）第四期毕业。陆军第 34 军暂编 45 师少将师长、代军长。六月奉令于临汾万泉张瓮村拒敌。军长负伤后王代理军长，亲率预备队反击，身中数弹，肠流腹外，壮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六。

陈芝馨（－1938）广东罗定人。中央军校第 4 分校中将主任。十月六日于广州三水马口河，沉船殉国。

俞星槎（－1940）浙江东阳人。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吕继周（－1944）云南安宁人。陆军第 3 军副军长。六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

郁仁治（1905－1938）江苏海门人。毕业上海大同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十一期。山东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军事特派员。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令于肥城击敌。突围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三。

赵侗（1911－1939）辽宁岫岩人。冀察边区第 1 游击纵队司令。奉令从重庆北上抗日，至河北陈庄阻敌。三月八日遇突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二十八。

马玉仁（1875－1940）原名日仁，字伯良，江苏建湖人。三 0 年首任陆军第 16 路军部指挥兼 27 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于家乡不惜毁家纾难组织抗日武装任苏鲁战区第 1 路抗日游击总司令。一月三日于江苏阜宁击敌。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

中将。年六十五。

丁炳权（1899－1940）字御伯，湖北云梦县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8 军 197 师中将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奉令于江西武宁等地阻敌。于激战中病逝。年四十一。

陈中柱（1906－1941）原名浪，又名斌，字退之，江苏建湖人。黄埔六期。鲁苏皖边区游击第 4 纵队少将司令。七月一日奉令于江苏泰县境内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泰州市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朱世勤（1904－1942）字俭堂，山东单县人。陆军暂编第 30 师少将师长。奉令于单县潘庄（一曰王寨）拒敌。五月四日激战时中弹殉国。葬单县城郊。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八。

周复（1901－1943）字旭人，江西临川人。黄埔三期、先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二月二十一日奉令于山东安丘城项山拒敌。数度冲杀几易阵地，肉搏时中弹殉国。葬安丘近郊。年四十二。

谢升标（1903－1938）字若鹏。临海市邵家渡人。毕业中央军校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中央防空学校。苏、浙、皖少将游击司令。二月奉令于江苏宜兴、安徽广德凤凰山击敌。弹尽缓绝，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三十五。

章亮基（1893－1941）字伯炎，湖南长沙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陆军第 18 军中将副军长、第 9 战区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四一年八月于江西宜春检查抗日防护工程时，以身殉国。葬南岳忠烈祠。年四十八。

陈烈（1903-1940）广西柳城凤山人。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第 92 师师长、第 54 军中将军长等职。参加淞沪抗战之后，四 0 年率部驻防广西靖西一线。同年十月三十一日于任上病逝殉国。年三十六。

王赓（1895－1942）字受庆，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毕业、游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一八年西点军校毕业。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曾作为税务总团少将团长参战“一•二八”沪战。四二年作为政府赴美中将军事代表成员，于开罗因旧疾猝发殉国。葬开罗市英军公墓。西点军校评价：“Hewasacredittowestpoint.”年四十七。

黄维纲（1897－1943）字振三，号雨辰，河南项城市人。陆军第 59 军军长。曾参加喜峰口战役、项城沂河战役、随枣战役、收复南阳。四三年三月三日于湖北南漳前线病逝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年四十六。

高双成（1882-1945）陕西渭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 22 军中将军长。抗日战争期间率部驻守陕北榆林，收复偏关、河曲、保德,粉碎日寇西侵陕、甘、宁的阴谋。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因伤病殉国。年六十三。

常恩多（1885－1942）字荻三，海城西东三台子村人，满族。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57 军军 111 师中将师长。曾参加扬州战役、台儿庄大战、徐州战役。 4 2 年 8 月 4 日因病殉国。年五十七。

韩文英（1893－1944）字杰岑，河南嵩县田湖镇毛村人。陆军第 100 军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光复诏安。奉令先后于泉州、同安、厦门、漳浦、云霄、福州、赣东，江西膺潭、贵溪、进贤、东乡等地阻敌。44 年 4 月 28 日于光泽伤病殉国。年五十。

少将(167 人)

滕久寿（1899－1932）贵州都江人。毕业贵州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19 路军上海吴淞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2 月 4 日敌来袭。滕负伤，警卫劝退，滕曰:“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中炮殉国。年三十三。

王润波（1905—1933）重庆开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17 军 25 师 149 团上校团长。年初，奉令由徐州北上右北口抗日。3 月 12 日攻占潮河北岸高地。与敌短兵肉搏被炸殉国。国民政府举行“国殇”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八。

曾宪邦（1903－1937）字雨初，湖南桃江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83 师 498 团团长。七月八日奉令于宛平县阻敌。十三日于辽冀山之激战中身负数伤，伤重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张树桢（1898－1937）字启大，河北人。陆军第 72 师 416 团团长。八月奉令增援河北怀柔县骡子圈守军第 4 师阵地，白刃搏斗，堵敌突破口。张腿部受伤仍激战至深夜，终与所率官兵全体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九。

张本禹（1900－1937）字文衷，安徽巢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13 军 4 师 12 旅少将副旅长。八月奉令前往太原催运军火并负责押运。抵南口站时突遇敌机轰炸。张不避危险继续指挥卸运，被敌弹命中车厢，与卸车官兵被炸殉国。葬巢县南乡。年三十七。

尉迟凤岗（1903－1937）字毓鸣，山西朔县人。毕业步兵专校。陆军第 7 师 21 旅少将副旅长兼 41 团团长。奉令增援河北涿州阻敌。九月二十二日经保定董村突遇敌袭。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终完成掩护部队转移之任务。伤重殉国。年三十四。

秦庆武（1903－1937）湖南浏阳人。毕业黄埔军校。陆军第 70 军 19 师 113 团团长。九月奉令于大场以北蕴藻浜以南之万家牌楼一带阻敌。十月三日起战至十七日，全团仅余十数人，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路景荣（1902－1937）江苏武进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98 师少将参谋长兼 583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宝山及狮子林炮台一线阻敌。是役该师官兵伤亡四千九百六十余，其营、连、排长达二百余人，路亦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杨杰（1896－1937）字子莫，河北容城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 军 1 师 1 旅少将副旅长。八月奉令于蕴藻浜和纪家桥一线阻敌。十月十一日晚，我阵地被敌突破。杨亲率预备队肉搏，伤亡山积，身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一。

官惠民（1906－1937）字剑豪，广东曲江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4 军 90 师 270 旅少将旅长。十月奉令于嘉定县清水头一带拒敌。官负伤，左右劝退。曰：“敌我胜负，已取决于顷刻，何能因余伤而败全局？”二十八日午后三时官中弹殉国。年三十六。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蕉岭人。毕业中山大学、黄埔四期、庐山军训团二期。陆军第 88 师 262 旅 524 团团长。奉令坚守四行仓库。租界当局诱其缴械羁禁于沪西“孤军营”。四月二十四日被刺殉国。葬沪西。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李伯蛟（1897－1937）湖南邵阳人。早岁从军。陆军第 28 军 63 师 187 旅少将旅长。十一月奉令于金山卫阻敌。与登陆之敌激战，阵地几经争夺，伤亡山积，所率将士大部殉国。李亦中弹殉国。年四十。

睦宗熙（1904－1937）江苏丹阳人。黄埔一期。陆军第 54 军 98 师少将政训处处长。奉令于上海罗店阻敌。8 月 17 日与敌激战时，遇袭中弹一殉国。年三十三。

丘之纪（1902－1937）广东揭阳人。黄埔三期。税警总团第 2 总队副总队长。奉令于上海刘家宅阻敌。11 月 2 日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吴桐岗（－1937）陆军第 67 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8 日于松江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刘启文（－1937）陆军第 67 军 108 师 322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8 日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唐惠洽（—1937）广东万宁人。上海国民军事训练所副总队长。奉令于上海阻敌。11 月 11 日于江苏昆山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

曾庆敏（1898—1937）又名泽寰，字渡生，广东东莞人。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六期。陆军第 66 军 159 师 457 旅副旅长。奉令于上海阻敌。8 月 17 日于江苏江阴与敌激敌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年三十九。

李友梅（1908—1937）字竹三，广东五华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 军 1 师 4 团团长。曰：“吾肩有担当，国耻不可忘；誓把满腔血，遍洒太平洋。”别新婚娇妻，奉令于东王宅阻敌。9 月 17 日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九。

梁鉴堂（1897—1937）字镜斋，河北蠡县人。毕业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三期。陆军第 34 军 69 师 203 旅少将旅长。奉令开赴雁门关茹越口一线阻敌。梁部激战三昼夜弹尽粮绝。九月二十八日与敌肉搏十余次。头部受伤殉国。年四十。

刘眉生（1903—1937）字天嘏，贵州遵义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5 师 510 团团长。奉令于十月北上忻口镇阻敌。与敌争夺洪山阵地，全团伤亡甚众而斗志不减。二十八日身中数弹殉国。葬遵义。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李树棠（1886—1939）山西中阳人。太原绥署少将谘议。太原沦陷后敌伪威逼利诱其出任伪维持会长，李严词拒绝，誓不附逆。被敌劫持后，仍大义凛然，终不屈服。于二月十四日服毒殉国。年五十三。

张廷玉（1906—1938）原名声桥，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历任至师政训处长。二月奉令于山西阻敌。二月十九日于山西沁源遇敌机轰炸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二。

庞泰峰（—1937）陆军第 63 军 91 师 22 旅少将副旅长。奉令于河北宁晋阻敌。10 月 12 日与敌肉搏时负伤自戕殉国。

朱赤（1900—1937）字幼卿，号新民，江西修水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2 军 88 师 262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命于十二月退守南京雨花台。十二日晨日军再次攻击，我军阵地全毁。与敌肉搏，朱并全体将士殉国。年三十七。

易安华（1900—1937）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71 军 87 师 259 旅少将旅长。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十二月九日与侵入光华门之敌肉搏，全歼入城之敌。十二日于光华门外指挥时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七。

姚中英（1898－1937）字若珠，广西平远人。黄埔二期、陆军大学八期。陆军第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上海沦陷之后奉令于十二月初退守南京太平门。十二日姚身陷重围与敌肉搏，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九。

李兰池（1898－1937）字锦卿，辽宁锦西人。东北陆军讲武堂七期。陆军第57军112师57旅少将旅长。于东北军中历任至团长。曾参加长城抗战。十一月淞沪会战之后奉令退守南京太平门。十二月十二日与敌肉博中弹殉国。年三十九。

司徒非（1893－1937）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一说平远）人。毕业保定军校。陆军第66军160师少将参谋长。曾率部于淞沪战场刘家行罗店及蕴藻浜一带阻敌。上海沦陷后奉令退守南京。十二月十二日于紫金山与敌军激战中弹殉国。年四十四。

李绍嘉（－1937）广西玉林人。陆军第83军156师468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南京城阻敌。十二月十二日城陷，激战时中弹殉国。

罗策群（1893－1937）广东兴宁人。保定军校六期。陆军66军159师少将副师长。奉令退守南京之汤山阻敌。血战两昼夜之后，十二月十二日城陷，于突围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四。

黄纪福（1902－1937）广东梅县人。陆军第66军159师477旅副旅长。奉令于南京汤山阻敌。经麒麟门退守大水关，后策应增援光华门。12月12日突围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少将。年三十五。

韩宪元（1902－1937）广东文昌人。黄埔三期。陆军第72军88师524团团长。奉令于南京雨花台阻敌。12月12日与敌激战，与全团官兵俱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刘国用（1898－1937）号剑豪，广东梅县人。黄埔三期。陆军第74军58师147旅少将副旅长。曾率领部转战江苏太仓各处，连战皆捷。奉令于南京牛首山阻敌。激战三日退守水西门外。12日13日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九。

雷震（1901－1937）原名汝勤，四川蒲江人。黄埔二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3旅上校副旅长。12月奉令于南京紫金山阻敌。13日掩护军民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突围，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华品章（1902－1937）字荣衮，后改希平，四川西昌人。黄埔四期。第88师262旅副旅长兼野战补充兵团团长。奉令于雨花台阻敌。12日下午激战时，中弹殉国。国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谢承瑞（1905－1937）江西西康人。毕业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导总队第 1 旅 2 团团长。奉令于南京抱病阻敌。9 日，退入光华门。13 日于挹江门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二。

万全策（1902－1937）广西苍梧人。毕业广东西江讲武堂、中训团研究班。教导总队第 1 旅少将参谋长。12 月奉令于南京紫金山南阻敌。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蓝运东（1899－1937）字阜伯，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陆军预备第 10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南京阻敌。12 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八。

陈节（－1937）广东梅县人。陆军第 66 军 159 师参谋处长。奉令于南京阻敌。12 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蔡如柏（1899－1937），广东邕宁人。陆军第 66 军 160 师 956 团上校团长。毕业广西陆军干部养成所。奉令于汤山阻敌。十二月十三日率部突围至汤山时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赵渭宾（1894－1938）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22 集团军 41 军 122 师参谋长。随川军出川抗战。奉令于山东滕县阻敌。三月十七日激战中随师长王铭章一同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四。

邹慕陶（1893－1938）号绍孟。四川仪陇县人。陆军第 41 军 124 师师参谋长。三月十七日奉令于山东滕县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五。

范庭兰（1903－1938）字雅轩，河南温县人。豫北别动第五总队少将总队长。三月二十八日奉令于河南修武县境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杨怀（1897－1938）字绍卿，重庆綦江人。陆军第 60 师 180 旅 359 团团长。奉令于江苏溧阳戴埠阻敌。连破敌三道封锁线，夺得敌军旗一面。于纵深推进时，胸、头连中数弹殉国。葬重庆綦江县。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一。

罗芳珪（1907－1938）号建唐，湖南衡东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13 军 89 师 529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固守南口阻敌。血战一周死守不退，往复冲杀肉搏。终与全团将士殉国。葬衡东家乡杨泗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一。

扈先梅（1895－1938）字仲卿，河南安阳人。东北陆军讲武堂六期。陆军第 51

军 114 师 34 旅少将旅长。曾长期在东北军中任职。数次请缨杀敌，转战苏皖，屡建战功。四月奉令于淮河北岸阻敌。激战时中数弹殉国。年四十三。

黄启东（1891－1938）字霞鹤，湖南平江人。保定军校一期。陆军第 27 军直属 23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荷泽阻敌。五月十四日敌攻入荷泽城内，其 23 师司令部被围。黄坠城殉国。年四十七。

邓佐虞（1914－1938）河北高阳县人。毕业中央陆军大学。陆军第 139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东萧县阻敌。五月十八日敌于城北突入。邓率督战队二十余人赴北城督战。北城守军已大半伤亡，敌亦死伤枕籍。邓率督战队与敌肉搏殉国。年二十四。

马威龙（－1938）字云飞，广西人。黄埔四期。陆军第 27 军 46 师 136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河南兰封阻敌。于第一线督率所部将士浴血冲锋，五月二十四日于河南兰考西部罗王寨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陈蕴瑜（1900－1938）字怀珍，贵州安平平坝人。毕业贵州省师范学校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8 军 102 师 304 团团长。五月奉令于兰封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毛麟义（1903－1938）字运生，江西兴国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四期。某部团长。五月奉令于河南开封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彭璋（1891－1938）毕业广西陆军讲武堂。陆军第 50 师少将副师长。五月奉令于安徽宿县阻敌。突围抵达尹集，突遭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众寡悬殊，官兵伤亡几尽。彭身负数伤殉国。年四十七。

江帷仁（－1938）安徽庐江上。江苏绥靖公署参议。奉令于安徽蒙城阻敌。4 月 8 日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友于（－1938）陕西扶风人。陆军第 85 军 89 师 528 团团长。奉令于台儿庄阻敌。4 月与敌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马骥德（－1938）陆军第 2 军 139 师 2 旅副旅长。奉令于安徽萧县阻敌。5 月 18 日与敌激战时，腹部不幸中弹。日军攻入城内，临近身边，他拉响两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自杀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毛岱钧（1902－1938）字重威，湖南湘潭人。毕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预备第 9 师 35 团团长。七月奉令于庐山以西南浔线北段拒敌。激战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毛亦重伤昏迷被敌俘获，宁死不屈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杨家骝（1904－1938）字季良，贵州荔波人。毕业黄埔五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陆军第 37 军 60 师 306 旅 360 团团长兼第 4 支队指挥官。九月二十五日奉令于南浔线北段马回岭阻敌，弹贯胸膛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雷忠（1901－1938）字霆钧，湖南嘉禾人。毕业北京大学、黄埔六期。曾任军事委员会游击第 1 支队少将司令，后任皖北军事联络员兼游击总指挥。九月二十八日奉令于安徽霍邱县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一说为十月十五日殉国）。年三十七。

傅忠贵（1885－1938）山东人。鲁北少将游击司令。九月二十三日阻敌。激战时殉国。年五十三。

李秉君（1904－1938）湖南耒阳人。中央军校特训班第四期。陆军第 87 军 198 师 572 旅团长。年春奉令于大别山一带阻敌。9 月于圆峰山耀影岭一带血战两昼夜，阵地数易，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王桢祥（－1938）湖南醴陵人。陆军第 12 军 20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武汉阻敌。是年夏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蔡劭（1902－1938）湖北黄陂人。陆军预备第 10 师补充旅副旅长。奉令于武汉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田耘（1906－1938）湖南乾城人。陆军第 75 军 13 师 37 旅 73 团团长。奉令于湖北蒲垢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二。

张镜亮（－1938）安徽含山人。陆军新编第 3 军旅长。奉令于湖北岳阳阻敌。是年十一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大中（1908－1938）别名子和，山东滕县人。黄埔三期步科。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十期、峨嵋山中央军官训练团战术研究班第三期毕业。山东军管区少将副司令。历任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团长、参谋处长。奉令于武汉阻敌。10 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梅一平（－1938）海军守备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湖北田家镇要塞阻敌。9 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曾万里（1902－1944）字鹏飞，号玉生，福建长乐人。烟台海军军校十七期。四二年一月一日任海军总司令部派驻东南亚盟军总部海军联络官。七月兼任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四四年四月十四日于印度孟买遇轰炸遇难。国民政府追赠海军少将。年四十二。

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人。曾为私塾先生，后毕业中央陆军军校。陆军

第79军76师226旅副旅长兼军部参谋处长。奉令转战苏、浙、皖广大边区地带。三月二十七日奉令于江西高安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高安伍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七。

张敬（1908－1940）福州人。陆军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五月奉令于宜城拒敌。激战中司令部被围，仍随总司令张上将自忠与敌死拼。终于南瓜店血战时中数弹殉国。年三十二。

邵一之（－1939）字镇堃，湖南湘阴人。黄埔六期。陆军第200师600团团长。十一月下旬奉令于昆仑关阻敌。邵部奉令增援二塘。激战中邵身中两弹仍指挥部队肉搏，又中一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韦灿（1898－1940）字至祥，广西容县人。毕业中央军校南宁分校、中央军校高级班。陆军第131师782团团长。曾参加徐州会战及太湖战役。二月二十四日奉令于广西上思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二。

杨生（1906－1941）江西南昌人。黄埔五期。第九战区南浔挺进纵队少将参谋长兼游击第2支队司令。游击于上高等地。七月十三日奉令于南昌外围拒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罗启疆（1903－1941）贵州松桃人。陆军第79军82师少将师长。于长沙会战时病逝于阵地。葬于衡山。年三十七。

刘世焱（1899－1941）字耿光，广东始兴人。黄埔二期。陆军暂编第 8 师 15 团团长（原广东财政厅税警团团长）。九月奉令于双溪桥龙头铺一线拒敌。于石门东流与敌激战时刘左臂负伤。血战至深夜，再次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二。

黄红（－1941）湖南邵阳人。黄埔五期。陆军第95师284团团长。九月奉令于岳阳新开拒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蓝挺（1904-1940）名和春，字清光，武平大禾乡人，黄埔三期步科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49 师参谋处主任兼第四团上校团长，四 0 年六月八日，于湖北南漳之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六。

梁希贤（1898－1941）字哲生，陕西同官（铜川）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副师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附近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阻敌。九日退至台寨村激战至全师伤亡山积，弹尽粮绝。遂投黄河殉国。年四十三。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参谋长。五月奉令于中条山阻敌。敌施放毒气，九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激战。陈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余部与敌肉搏中刀殉国。年三十七。

张雅韵（1898－1941）四川成都人。陆军第 72 军新编 15 师 44 团团长。三月二十四日奉令于江西上高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修水南姑桥畔。薛岳将军特在长沙岳麓山建"雅韵亭"以资纪念。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三。

艾亚春（1899－1941）陕西米脂人。陆军第 17 军 84 师补充团团长。奉令于中条山阻敌。七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二。

胡义宾（1907－1942）号履冰，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陆军第 5 军 96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入缅于平满纳、孟拱等地拒敌。六月二十七日，于埋通遇敌伏击，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五。

闵季连（-1942）重庆奉节人。黄埔五期毕业。陆军第三十六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四二年奉令于于云南保山视察前线，途中不幸遇敌机扫射遇难。年冬，灵柩由云南运回奉节，于协台坝举行国葬公祭追悼会后，葬于李家坝。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黄德兴（－1943）河南永城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陆军第 51 军 114 师师长，。曾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四三年十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田温其（－1940）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九期。陆军第 68 军 119 师少将师长。三八年为代理 68 军副军长。转战数年。四 0 年旧伤复发因病殉国。

李竹林（1906－1943）字华侬，湖北长阳人，土家族。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期。滇缅少将警备司令兼远征军兵站参谋长。是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拒敌。是年夏于缅北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七。

董瀚（1908－1943）河北大名人。陆军第 200 师少将团长。该师屡次攻坚克险，颇有战功。董于空运还师之际，因飞机失事，于滇西芒市殉国。年三十五。

凌则民（1911－1942）湖南平江县城关镇人。黄埔六期。陆军第 96 师 288 团少将团长兼腊戌警备副司令。是年春奉令入缅击敌。四月抵平满纳。所部英勇苦战八日之久，伤亡山积。敌援兵将该团阵地包围。凌率余部与敌肉搏殉国。年三十一。

柳树人（－1942）贵州安顺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5 军 200 师 599 团团长。奉令

于入缅拒敌。五月于细摩公路闻师长戴安澜负伤，遂前往营救，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陈范（－1944）另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是年一月三十一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颐（－1944）湖南醴陵人。黄埔六期。远征军第 6 军预备 2 师 5 团上校团长。奉令与 116 师合攻腾冲，与日军巷战。9 月 14 日克复腾冲全歼守敌。被敌冷枪击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覃子斌（－1944）陆军远征军 198 师 594 团上校团长。曾建“华夏敢死队”与日军 148 联队第一大队长吉原少佐“战神冲锋队”于高黎贡山冷水沟对决。44 年 5 月 11 日大反攻。渡江后助攻北斋公房时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张惠民（1905－1943）陕西平利人。陆军第 10 军 3 师 9 团团长。奉令于常德城郊拒敌。十二月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陶绍唐（－1943）字恒、尧青，河南西陕人。陆军第 3 师副师长。奉令于湖南桃源阻敌。是年秋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黄永淮（1902－1943）号泗光，别名黄石夫，四川安岳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31 集团军少将高参、29 师副师长。誓言“踏平三岛方雪恨，罢官归耕夙愿成”。是年冬，奉令于河南许昌阻敌。是役全师阵亡，遂举枪饮弹自戕殉国。年四十一。

王家让（1912－1944）四川渠县人。毕业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士兵官学校、陆军大学十六期。陆军第 13 军辎重团少将团长。五月奉令于河南临汝县凤穴寺附近击敌。于马背中弹殉国。灵位安放成都忠烈祠。年三十二。

陈绍堂（－1944）四川邻水人。历任至陆军第 104 师少将指挥官。五月十二日奉令于河南陕县秦家坡拒敌。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周鼎铭（－1944）四川蒲江人。陆军第 36 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官处长。奉令于河南陕县秦家坡阻敌。于五月二十一日激战时中弹殉国。

王剑岳（1906－1944）原名师，湖南澧县人。黄埔五期。陆军第 57 军 8 师副师长。六月奉令驻守河南灵宝一带击敌。十日晨毕家砦阵地被突破，他左肩被弹片炸伤仍高呼：“杀敌！杀敌!”又连中两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八。

吴展（1909－1944）字镜清，广西恭城人。毕业中央军校第一分校、中央军校高教班。陆军第 31 军 131 师 392 团团长。八月奉令于桂林城北门至甲山口一带击敌。

十月十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吕旃蒙（1905—1944）字伯民，湖南零陵县人。黄埔五期、陆军大学将官班十三期。陆军第10集团军31军参谋长。九月奉令于桂林拒敌。敌施放毒气攻入市内，吕奉令与敌肉搏。十一月十日中弹殉国。葬桂林霸王坪。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九。

史蔚馥（1891—1944）字从吾，江苏溧阳人。保定军校三期。广西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十一月于永福被敌俘虏，宁死不屈，被害殉国。年五十三。

徐亚杰（—1944）河北蠡县人。陆军暂编第6军少将参谋长。奉令于湖南雪峰山阻敌。五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余子武（—1944）陆军第62军151师副师长。奉令于湖南衡阳阻敌。八月三日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易凤翔（—1944）江西宜春人。陆军第97军196师588团团长。奉令于广西阻敌。九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胡厚基（—1944）广西人。陆军第7军170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广西桂林阻敌。十一月十三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杨尚武（—1944）陆军暂编第15军新编第29师85团团长。奉令于许昌击敌。四月二十九日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国。是年十一月七日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李培芹（—1944）陆军暂编第15军新编第29师87团团长。奉令于许昌击敌。四月二十九日城破。五月一日突围至城郊于庄、苏沟村之间遇敌伏兵阻击，中数弹殉国。是年十一月七日，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王宇震（—1945）陆军第64师参谋长。奉令带领师部和65师特务连一个排、军直属搜索连两个排与190团两个连增援洛阳守军。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钟济凡(1902～1944)别名季藩，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炮科毕业。44年9月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陈涉藩（-1943）陆军第15师45团团长。鄂西会战时，奉令坚守湖南南县以北四十里麓湖山阵地。五月六日，腿部被敌弹射穿。部下劝其退下，他厉声说："湖山不守，誓不生还!"特务排官兵伤亡殆尽。用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殉国。国

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高志航（1908－1937）名铭九，字子恒，吉林通化人。毕业东北陆军军官学校、法国莫拉诺高等航空学校、义斯特陆军航空战斗学校。空军第 4 大队大队长。八月十四日于笕桥击毁敌机六架。十一月二十一日遇敌机空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空军少将。年二十九。

徐积璋（1905－1938）山西襄汾人，字耀堂。毕业于山西陆军军校、中央陆军大学。陆军第 205 旅少将旅长兼晋南十八县保安司令。二月奉令于闻喜稷王山阻敌。伤亡甚众，阵地危急。徐率预备队冲入阵地肉搏，头部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林英灿（1898－1939）字子文，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第 152 师少将副师长。驻守海南琼崖。三八年奉令回师粤北阻敌。一月十三日于广东清远县与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一。

陈世潘（1889－1939）江西都昌人。保定军校三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三期。江西省浮梁县团管区司令。奉令于该区景德镇驻防阻敌。八月十八日于景德镇之办公室遇敌轰炸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五十。

朱实夫（－1941）陆军新 3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甘肃阻敌。九月二十五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挺（1908－1942）字忠弼，江西九江人。黄埔六期。陆军第 10 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浙江省桐乡县（总部所在地）县长。四月十四日奉令于桐乡县境阻敌。中弹殉国。年三十四。

王立业（－1943）山西安邑人。陆军第 70 师少将副师长。抗战开始后，曾参加忻口、柳林等战役。二月奉令于稷山县三交村拒敌。敌步、骑、炮兵合围，激战数小时。与敌巷战中身负重伤殉国。

杨世立（1903－1943）陕西延川人。陆军第 84 师 251 团团长。四月奉令于山西垣曲拒敌。激战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

卢广伟（1903－1944）字济吾，辽宁凤城人。毕业东北陆军讲武堂、庐山军官训练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骑兵训练班。陆军骑兵第 8 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五月五日奉令赴安徽颍上击敌。被炸弹击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一。

钟芳峻（－1938）字秀峰，广东河源人。陆军第 153 师 459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广东福田阻敌。十月十八日所部两面受击伤亡惨重。拔枪击毙三名日军，遂举枪自戕。

翌日殉国。

邵令江（－1938）号景群，浙江余姚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毕业。中央军校第 4 分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十一月六日于广州三水马口河，沉船殉国。

周卓然（1904－1938）湖北钟祥丰乐人。黄埔六期。陆军骑兵第 7 师师长。是年夏于五原战役中再次负伤，被送回后方医院。年秋于山西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四。

龚选登（－1939）广东乐会人。陆军第 76 师参谋长。奉令于江西修水阻敌。三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潘滨（－1939）江西广丰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专员。于江西广丰激战时，中弹殉国。

柳漱风（－1939）湖南醴陵人。陆军新编第 6 军少将高参。奉令于湖南桃源阻敌。五月二十七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马秉忠（1910－1939）青海人。陆军暂编骑兵编第 1 师 2 旅旅长。奉令于河南淮阳南刘新庄一带阻敌。九月十二日将十二王店村收复，迫使日军退至淮阳近郊，午后，日军增援反攻，并施放毒气。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二十九。

黄光炎（1903－1942）字强恕，广东省和平人。毕业云南陆军讲武堂 18 期、黄埔军校高级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暂编第二军少将参谋长。十二期三日于广东乳源因车祸殉职。年三十九。

刘星南（－1942）陆军暂编第 30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东单县阻敌。五月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陈飞龙（－1943）广东新会人。陆军新编第 10 师代理师长。奉令于安徽凤台阻敌。十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张剑虹（－1944）陆军中国远征军第 5 军军中少将高参。一月三十一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肖孝泽（1912－1944）四川富顺人。毕业中央军校高校班。陆军第 36 集团军少将高参兼代理参谋处长。奉令于河南陕县阻敌。是年夏，掩护友军西撤。部队行至陕县秦家坡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二。

张治平（－1945）四川蓬溪人。陆军第 21 军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奉令于湖北

阻敌。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胡文臣（1888－1938）字相卿，河北静海县人。陆军第 8 军 33 师 3 团团长。武艺高强。是年春，奉令于江苏宿迁一带击敌。于宿迁一役中反复冲杀，白刃相搏，巷战中头部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五十。

武汉卿（1890－1939）字中原，北平市人。东北陆军讲武堂一期。陆军骑兵少将师长、忠义救国军第十路司令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事通讯员。八月奉令于河北安次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九。

韩炳宸（－1939）字星垣，山东金乡人。山东第 13 区保安副司令兼保安 24 旅少将旅长。十一月十二日奉令于山东莱阳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

吴赓恕（1908－1940）别号默谦，湖南长沙人。毕业岭南大学。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少将主任。三九年十月奉令赴上海制裁附逆之丁默村，事泄被俘。四 0 年三月二日于上海被枪杀殉国。年三十二。

燕鼎九（1894－1941）原名寿琪，又名定九，河南新蔡人。毕业黄埔四期、陆军军官学校研究班。河南第 8 军分区保安副司令兼第 1 战区游击挺进军 22 纵队副司令。奉令于一月二十八日汝南城郊击敌。受伤被俘宁死不屈殉国。葬新蔡。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四十七。

郭子斌（－1942）陆军暂编 30 师少将副师长。奉令于山东潘庄拒敌。五月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岑家焯（1901－1942）海南文昌人。黄埔三期。军统驻新加坡站少将站长。曾任军校区队长，虎门炮台总台长、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股长、行动组长等职。奉令于新加坡展开情报工作，六月十二日于新加坡被捕被敌杀害殉国。年四十一。

张庆澍（1895－1942）字雨村，山东东阿人。毕业保定军校，苏鲁战区少将高参。八月奉令于莒县唐王山拒敌。中弹殉国。年四十七。

窦来庚（1896－1942）字峰山，山东临朐人。山东保安第 17 旅少将旅长。曾任山东国术馆副馆长，武艺高强。抗战爆发后，国术馆成员组编成抗日战士队，任队长。八月三十日奉令于莒县唐王山拒敌。弹尽援绝，自戕殉国。年四十六。

张少舫（－1943）江西瑞金（一曰湖南零陵县）人。第 51 军 113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张家骝拒敌。二月二日旦安丘城项山激战时中弹殉国。

高道光（－1943）山东省德县人。山东铁道破坏少将总队长。五月奉令于山东某

地执行铁道破坏任务时被敌俘获，坚贞不屈。终被杀害殉国。

江春炎（－1943）陆军第 51 军 114 师少将参谋长。奉令于山东省邹县拒敌。七月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曹向经（1900－1945）字月锄，湖南资兴人。中央军校高教班一期。曾任某部团长及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抗战爆发后，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任湖南游击区少将副总指挥。是年春于击敌时中弹被俘，被害殉国。年四十五。

萧健九（1912－1945）山东清平人。民国大学毕业。挺进军第 2、第 3 纵队少将司令。三月一日于临清境内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三。

王自衡（－1939）山东省保安第 24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境内阻敌。三月十八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少初（－1944）安徽蒙城怀宁人。黄埔三期。鄂赣皖第三战区皖南济南纵队少将副司令。一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朱毅先（－1939）河南襄城人。毕业中央军校高教班、步兵学校校官研究班。第 1 战区第 7 游击纵队少将副司令。奉令于河南新乡阻敌。中弹，左右劝退，朱曰：“此正我杀敌报国之时，不可复失!”三月二十一日于激战时再次中弹殉国。

卢尚秀（－1939）冀察战区第 2 路 5 支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河北隆平阻敌。一月三十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袁聘之（1903－1940）字诏三，山东平县人。黄埔五期。山东省保安第 22 旅旅少将旅长。奉令于河南宁陵阻敌。三月二十八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七。

夏杨寿先（－1940）河南安阳人。河南省第 2 保安纵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河南安阳阻敌。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程啸平（1903－1941）江西乐平人。毕业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金华警备区少将副指挥官。奉令于浙江绍兴阻敌。是年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三十八。

梅明章（－1941）第三战区中义救国军第 2 教导总队总队长，奉令于安徽阻敌。曾只身赴无锡、武进策反伪军，两度被俘均脱离危难。八月于江阴县利港东北戴家甸与日军遭遇。激战时，中弹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丁立群（1901－1944）字力人，安徽怀宁人。黄埔三期。第 3 战区皖南游击纵队少将副司令。奉令于苏北阻敌。一月于激战时，中弹殉国。年四十三。

王成桂（1902－1944）号成贵，四川成都人。黄埔二期。重庆卫戍司令部第 3 区

少将副司令，四川省国民军训委员会委员，。二月于重庆中炸弹殉国。。

张景南（－1944）山东人。山东省保安第 11 旅少将旅长。曾率部在鲁、豫等地抗击日军，奉令于山东邹平阻敌。五月于激战时弹尽援绝，肉搏殉国。

薛如兰（－1942）陕西渭南人。陕西省保安第 4 区副司令。奉令于陕西阻敌。十月于激战时，肉搏殉国。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周致中（－1943）山东省保安第 22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惠县阻敌。二月五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王魁一（－1943）山东人。山东省保安第 8 旅少将旅长。奉令于山东阳瑴一带阻敌。二月二十四日于激战时，中弹殉国。

李石安（－1941）湖南醴陵人。中央陆军军营学校毕业。陆军第 12 师政治部少将主任。移驻山西坦曲五福涧、蔡家庄遭日军突袭被俘，日戏其妻。李夺斧杀死两名守卫。日军涌至，乱刀砍向李，襁褓中的女儿亦被日军用石头砸死。

王成桂（1902-1944）又名成贵，四川成都人。黄埔二期步科、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毕业。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议，四川省国民军训委员会委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三区少将副司令。四四年二月在日军空袭中遇难。年四十二。

林谋盛（1909－1944）福建南安人。新加坡华侨。中英政府签订协定被派往印度及锡兰受训，参加“一三六”部队“龙组任马来西亚华人正区长。六月二十九日被捕殉国。葬新加坡麦利芝。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年三十五。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幼名自林，号叔仁，湖南醴陵人。毕业黄埔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陆军第 18 集团军少将副参谋长。五月奉令于山西辽县麻田镇拒敌。二十五日掩护后方机关突围，中敌炮弹殉国。年三十七。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新 4 军第 4 师师长。是年九月十一日于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战斗中，被流弹击中，殉国。年三十七。

胡旭盱（1915－1945）别名勖予，湖南长沙人。中央军校八期、陆军大学十六期。陆军第 3 战区第 1 突击队少将司令。奉令于浙江孝丰击敌。激战时，中弹殉国。葬长沙近郊。年三十。

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 2007 年 12 月 26 日整理 2008 年 1 月 7 日更新

补充：

严家训：(—1938）云南富民人。滇军 60 军少将团长。前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卫士

大队长。抗战期间，坚决要求上前线。获准。随后不久在台儿庄大战中阵亡。死后追认为中将。

注：

1，本名单包括下列将领：

a，在抗日战争中战死和战败自杀的将领（即阵亡将领）；

b，为抗战而伤逝、病逝的将领；

c，战败自杀，却因偶然获救而未果。事后病逝或“解放后”被中共镇压的将领。

2，一些殉国将领，因资料不全，生年一时无法确证，故缺位待补。

3，中国将来若修建“抗战忠烈堂”，应由有关权威人士和法律机构并征询人民意愿后庄严推进。本名单决非完整无误，仅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中华历史精神，尽心竭力而为。伫候方家和来者指正。

遥祭林昭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 35 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 5 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 GDP 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一小撮”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 1968 年 4 月 29 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祇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 35 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 年 4 月 5 日

从血到血，从心到心，不能再从罪到罪

我们一直在流血，先知的血，仁者的血，青年的血，少年的血，无辜者的血，百姓的血，这些血构成我们 60 年来最大最腥红最恐怖的血写的事实。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流血，却不知那每一滴血都是不可流的。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流血的历史。但 60 年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规模的无端的肆意的流血，基本停止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古拉格群岛的铁丝网不再有一个活人进去不能活着出来……，唯有我们，同类、同胞甚至“同志”间的残杀却刚刚开始。“镇压”、“打倒”、“枪毙”、“专政”、“消灭”这些血腥的字眼堂而皇之地写在中国土地上，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竟然在一代人时间里匍匐在以戕害同类为事业的哲学和制度前，在黄河、长江以外，中国挖掘了另一条江河，千万人的血汇成一条滔滔的血河。我们怎么造下这样的孽？！

请睁眼看，许许多多支流注入这条血河，其中最汹涌的两条，一条来自中国第一个集大成的暴政秦朝，它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始皇帝发明了最大规模的人殉陪葬制度，兵马俑乃是中国不把人当人最可鄙的杰作，古往今来教人流血者无不尊秦，而把“焚书坑儒”奉为天条，却是毛泽东时代公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创新；另一条则来自俄罗斯，从 1977 年 11 月 7 日开掘的那条人血之河，那条穿越欧亚大陆和西伯利亚、横空而出的人血运河，它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把刀子架在亿万中国人头之上，其刀刃之锋利残忍，更超逾暴秦不下百倍。两条穿越了漫长辽远时空、冲决一切仁慈爱怜和一切文明堤坝而来的血流，乃是中华在劫难逃的红色宿命，我们从血到血的现代命数。

虽然寥如晨星，我们还是有警省的烛火，英勇的先驱，高翔于血腥荒野的历史候鸟。几乎每一天，都有冤魂在悲泣，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有亡灵掩面走过，几乎每次季节变换，都有雷霆滚动。整个中国，越来越象一个大祭坛，暴风雪呼啸而过，岂止气候异常；沙尘暴遮天蔽日，难道只是北方荒漠化的明证？越来越密集的征候，越来越显明的示警，越来越临近的启示录式的景象，不都是中国从心到心的抽紧、焦虑、茫然、绝望？不都是无数鬼魂用我们暂时听不懂的语言，发出最后的通告？

这是一个不走极端的民族，它最畏惧的就是发泄和失去理性。上苍和孔夫子深知东方命运的微危叵测，温和与中庸是几千年智慧与道德在中国人心中培植的文明的

根。但是，一旦这个民族被虚妄、欺骗、暴力和恐怖逼上绝路，他们将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复仇者。千万不要永远玩弄权谋，如果以为依靠谎言和腐败就真能永远统治中国，报应就会在某一天早上到来。所有的圣贤都说过，人同此心。当今中国，已积累了足够的危机、压力、怨恨、绝望，也出现了 1989 年、1966 年、1957 年、1949 年以来未曾有过的觉醒，要求，希望。中国已经站在历史破晓处，走向光明还是退回黑暗，就在一念之间。

最高的旨意、最深的启示，刚刚过去二十余天。四川大地震以其异乎寻常的形态、烈度、象征意义和天谴式的警戒，把人类最大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到了悬崖。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狂妄和虚无主义劫持数以亿计的灵魂，使我们远离忏悔、敬畏、谦卑和感恩这些人类最高贵、最奇妙、最神圣的德性。最让世人失望、揪心至于愤怒的是欠下中国无数孽债的共产党当局，始终缺少连古代专制皇帝也不敢掩饰的“罪己”品性，始终无力焕发对其历史罪性的起码知觉，始终企图以手段对抗目的，以物质赎买对抗精神拯救，以社会腐败对抗道德担当，以不断推迟的大崩溃对抗民族新生的最必需的自由奋斗。

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才承认“生命至尊”的国度，我们生于这个直到最近还以十万生命的殒灭证明专制合理强大与必需的社会，但我们并不止于这一切，即或面对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帝国，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只要我们不对未来绝望，只要我们不拒绝救赎，耸然而立的庞大专制帝国就只是废墟一堆，即使身后黑夜无边，我们也知道光明在何方，道路在哪里，我们就终能在最大的专制废墟上，迎来自由的曙光。

王康 2008 年 6 月 4 日

(原载《民主中国》2008 年 6 月 4 日)

戊子清明祭文

王康 2008 年 4 月 3 日

际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地苍黄翻覆，九州陆沉沦丧，六合黯澹肃杀，四海泛滥浮嚣，贞下难起元，否极泰未来。混一神魔，吉凶难卜，岁事忽焉清明，祖宗位列，先贤垂顾，谨焚香燃烛，祭祝如仪。

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中华以人立国，以史垂法，以人生度量宇宙，以历史充实世界。无求基督教之天堂与永恒，不待佛教之涅槃与轮回，人生乃中华之宗教，历史即中华之上帝，故周庙序三代之盛，鲁殿列兴废之事，凌阁绘功业之状，史记载古今之变，故中国祭祀隆典，五千年不变，史乘彪炳，七大洲无双。兴灭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亘古维新，上通千古下开万世，浩然与天地并生。

中华曾经恢复，乾坤本已正位。满清末造，革命党人踬踣驱驰，一仆百作。黄花岗一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色变。爰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自由高标，民权是举，民国肇始。然专制既久，积毒既广，积弱积贫积私积愚既深，先烈血土终湮于荒烟蓑草间，难成息壤。中国出幽谷，迁乔木，尚为遥远之图。前清权贵遗老，假共和之名，咸与维新，盗权窃国，复辟帝制，拥兵割据，重投黎民于水火。旋起国民革命军，集结转徙，北伐东征，指天盟誓，不惮艰危，不避死生，志在铲军阀倒列强，护共和保民权，存亡绝续，惊天动地。

中国未始统一，民众仍系倒悬，而内忧弥深，外患日亟。东邻蕞尔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军国主义主宰朝野，法西斯蒂毒化岛国。野蛮之根本未除，狂妄之心滋炽，东方仁爱慈悲之怀空蚀，西洋人道自由之意浇薄。一旦以征服为使命，以侵略为国策，必成虎狼之国，战祸之薮，必然为祸东方，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为保我列祖列宗坟茔庙堂，为保我世代经营之故土家园，为保我独立自由之国族尊严，为保我永续无穷之历史文化，一千二百万中国军人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歃血喋血，苦战死战，踔厉纵横，为国驱驰，时时不忘为国家雪耻，念念在兹为民族牺牲。凡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碧云怒涛，一寸河山一寸血，万里烽烟万里城。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上膛、剑出鞘，家可破、国须保，身可灭、志不挠，竖发裂眦、血似狂潮。以草履对铁蹄，以筋骨抗枪炮，以持久决速胜，以空间换时间，以一己必死之生命树民族亿万年不毁之根基。

中国军队与日本虎狼之师展开二十二次会战，一千一百一十七次战役，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战斗，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三百四十万热血男儿血沃沙场，二百六十余名英年将领从容殉国。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华而永垂不朽。后世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派，皆应馨香俎豆，鞠躬长揖；皆应肃雍钟鼓，顶礼膜拜。千秋万祀，血食天下，永祭无替。

更有庞然俄苏，横跨欧亚。十月革命，变大战为内战，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广推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十数年间，建成空前红色帝国。既失西欧革命奥援，遂建第三国际，以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相号召，以解放普罗大众相鼓吹，以归还失地、馈赠卢布军火相引诱，以输入学说理论纲领，创党建军相扶持，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相会誓。其锋芒所向，半世影从，而中国首当其冲焉。

既登天安门楼，西来幽灵徘徊笼罩，两千年秦火坑灰复燃，一朝授受结合，而变本加厉，集大成焉。天下卷甲，神州遽成鬼域，日升天而地暗，江东去而岸裂。浩劫奇变，史无前例。

五千年中华文明，匍匐西来之马列主义，分析之批判之否定之灭绝之，进化论、无神论，唯物史观君临，矛盾斗争奉成天宪，必以中国全部时空为试验背景，以所有人民为革命工具，以万象万灵万物为改造对象。于是革命神圣，造反有理，破坏无罪，砸烂旧世界，甚嚣尘上。凡中华神祇远祖，炎帝黄帝，大舜大禹，圣贤明哲，孔颜老周，彻隐高蹈，崇僧大德，英勇豪杰至于走街贩卖江湖郎中，皆在亵渎之列，扫荡之列，蹂躏之列，破灭之列。

君不见，泰山之侧，会稽山下，西子湖畔，天涯海角，一时阁堕基毁，花果飘零，茫茫神州，黯兮惨悼，风悲日曛，飞鸟不下，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君不见，凡辛亥遗址，北伐战场，抗战碑碣，皆成反动遗迹，无不搅捣焚烈，镐凿斧削，顿成垒垒丘墟森森空穴。骸骨拆而颅悬挂，铭文铲以足污践，天阴鸦昏，荆裂棘断，烟凝风滞，敻不见人，但闻鬼哭。

君不见，本党缔造者，开国元勋，竟以邻为壑，先后落网，蒙耻攸同，陷无端之审判，挂牌游街，阴阳剃头，亲戚背叛，其耻辱之深重，罪性之莫名，更远逾欧西中世纪之宗教裁判。

君不见，胡耀邦天良可鉴，断不见容庙堂；赵紫阳晚年彻悟，格禁终不稍赦；王

若水倡人道，革出教门；李慎之发五十年浩叹，青灯孤老；刘宾雁忠诚不二，客死他乡；何家栋白头忧思，生死书禁。党同伐异，手足相残，长使天下齿冷心寒。

君不见，林昭天真圣洁，枷锁交集，血痕斑驳；张志新存惑问道，酷刑煎逼，割喉吞声；百万右派，蛇行龙诱，蒙垢含冤，二十二年；至若老舍未名而溺，傅雷悬梁以遁，十力呼天而悲绝，寅恪枯眼惟待九泉，皆孝女贤母忠诚耿介，蔼然白发中华文化托命直选，可怜尸毁骨殒，荒野无际，寂寞绝望，天地为愁，而吊祭不至。

君不见，万家墨面，强入公社，奴隶苦役，空前试验。哀鸿遍野，饿殍盈国。苍苍蒸民，不犯不越，日出日落，生也何恩，灭之何咎？

岂谓易姓改号，分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史书惨烈之最，莫此为甚！文明倒退之最，莫此为甚！

君不见，爱国青年，学生运动，绝食于暴日下，屈膝于高台前，所犯者几，所求者何，竟蹈死地！二十年过，碧血日晒而未凝，黑发旷夜以犹新。

悠悠苍天，漠漠大块，生死存亡，无尽量也。呜呼，黄泉道上，幽明所通，熙来攘往，不绝于途。又到清明时节，宜肃岁时之祀，用申祭吊之诚。春光荏苒，映涟涟未瞑之目；青山葱笼，慰拳拳不泯之心。山色南来莽苍苍，江奔东去流汩汩。一切都有因缘，万物都将复活，善恶都将报应。载陈尊簋，来格几筵。尚飨。

（原载《黄花岗》第二十三期）

咏而归--父母临终记忆

編者 2006 年 5 月 11 日按：

多年不見這樣氣象蒼遠、蕩氣回腸的文章了。這些文字不象這個時代的手筆，象是半個世紀以來文化斷層那一端的傳世之作。作者的敘述，一洗時下哪怕是最出色的中文中的纖巧奸猾与空灵貧瘠，將一百多天之內，雙親相繼離去期間其後，心中沉鬱悲涼、闊莽浩瀚的大江大流，沉入質樸、高古凝重的中國祖先文脈，呈現給了我們。這說的是“詠而歸”的“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最高人文境界中，人之精神永遠與其文字相通。于是再說“質”：

公元前五百年，孔子就嗟歎天下無清明之望了。自古聖者敏于世道興衰沈浮，不奇怪。其實當時及至後來很久，中國社會仍舊“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終歸沒差到哪去。兩千五百年一路走來，二十世紀下半葉始，毛澤東先生先是將中國之根一樣的各類民間形態犁庭掃穴，斬除幹淨，再將革命弄到文化的頭上，五千年史無前例。這一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中國人文生態全面荒蕪化的事實，比任何聖者的感慨更說明問題：中國文化傳統在自己的“神州”斷了活路，真正是“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了。風骨、浩氣、仁義、忠信、慈惠、寬厚、誠實……這些精神品質，在當今器物人格叮當作響的大陸，已成罕世珍品。常常是，而且常常僅僅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一些人，雖屢經階級鬥爭摧殘，仍保有與生俱在的高尚德行。然而曆史漸行漸遠，我們的父輩祖輩，現今八十九十的一代老人，紛紛辭世，眼看就要帶走那個舊時代，高尚的時代。他們寂然消失中的背影，已然構成中國最後耶路撒冷。

作者出身儒教世家而生在 49 年的新中國，長于文化生態荒蕪之地卻浸染儒教命脈，所描寫的是一對老人的歸程，也是那一代高尚舊人的歸程；所記述的是個人父母臨終的記憶，也代表現今中年一代對父輩的祭奠；所傳達的不僅是中年喪失雙親城池的深淵，簡直就是為這斷去歷史傳承的時代豎起的一面哭墻。這面哭墻的存在說明，我們被截斷來路的時代縱然朝夕、終年載歌載舞，畢竟去意彷徨。在它的深處尚有歷史的自覺意識。這意識也許有一天能重新承載過去、接通未來。

此文取“紀念”的諧聲，以“季年”為筆名，作于七年前，是作者為家族後人而寫的，原本無意發表。不料少數友人傳來閱去，已經流傳上網。既然如此，爭得作者同意，于母親節后，發佈于此。

==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熟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

最后一次送母亲去北京时，父亲照例走到阳台上。公司的车一直开到门口，文级、育仁、逢春、慰荣忙着把母亲搀扶进车门。只有我，知道老父一定会走到阳台上。杂乱的树叶中，父亲瘦削地扶着栏杆，坚定而衰老地举起右手。举手挥别已成为父亲生命的节日。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招呼和检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早已洞悉却始终拒绝又必须承受的东西几乎伴随了他一生，挥手代表了他的全部言辞，这是送别、祝福和祈祷，也是他的孤独宣示。

这次是生离死别的挥手。尽管无人理会，尽管枝叶重遮，甚至终身相伴的白发妻子似乎也没有抬头看见。

———————

我在北京呆得太久了，有不少冠冕堂皇的创意，有许多能言善辩的精英，让我远离父亲。就在这一个多月中，父亲二度中风。那天家中无人，他战战兢兢，摔在地上，头撞在茶几角上，血流满面。文级上街回来，父亲已在冷硬的水泥地板上躺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八十岁的父亲蜷缩在地板上任由自己头上的血流慢慢地凝结，心里在想什么。

我从北京赶到家中，父亲已换了一人。他躺在那张老式木头床上，已经形销骨瘦，奄奄一息。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父亲干涸凹陷的眼睛深处还有光辉，但很遥远，很微弱，依然澄明，毫无怨恨，那是烛照他一生的生命之光，就要燃尽了。

妈妈呢？他突然问。在小宁那里，小宁，我大声地重复。小宁是谁？是你女儿呀！她在哪里？北京，北京！北京是什么？

————————

父亲曾独自一人去过长城，爬到最高处。不到长城非好汉，修长城的人就是大混蛋，他对这座中国首任暴君的作品无甚好感。就是在长城，他更真切地体验了陈子昂那首千古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他去过天安门，了无感觉，除了陌生。这座城市与我无关。父亲对北京不置一词，他心中无北京。

父亲与我最后的对话到此结束。

文级来为父亲喂麦片粥。父亲闭上眼，本能地张开嘴，接受他厌恶的食物，企图维持生命的食物。中途不知是睡去还是拒绝就范，闭上了嘴。文级大声说，张嘴，张嘴。

去肿瘤医院，找母亲学生朱医生，联系老父住院。我在病房走廊走过，四处肮脏，医生护士昏昏欲睡。决计另觅地方。

去歌乐山第一养老院。沿途荒凉，一座坟山，成百上千墓窟密布，象无边的白癜风。养老院惨不忍睹，窗门都破旧，室内冰冷。老头老太婆从病房中探出头，都矮小衰弱。这是屠场啊。又见到肥胖的院长，满口黄牙，一脸晦气。

终于与外科医院周医生联系上。

哥哥、文级、爱民、慰荣用担架抬父亲到救护车上，我与国联、逢春乘车尾随在后。

行至三角碑，救护车左行而去，我们的车只能绕单行道。父亲第一次昏然不觉地享有了这个国家官僚和警察的特权。

父亲已躺在外科医院住院部三楼。医院护士正吸痰、排尿、输氧，一切按程序进行。

父亲这几天一直指着腹部。文级以为是胃不对，大力按摩。现在才知道，是小便淤积，竟排出大半盆，六、七斤之多。

父亲已长褥疮，两个大脚趾拇血已坏死，污红、僵硬。他躺在那里，任人们观察、折腾。

邀主任医生、保卫干部小彭和护士七、八人午饭。冀其善待老父。

小彭介绍医院抬尸工老婆王姐照料父亲。每月七百元。王姐是农村妇女，五十岁，黑而胖，不失乡下人质朴，但远称不上尽职。她睡老父旁边病床，整日打毛线，时有怨言，老父收到的水果、麦乳精等全部归她，也是如此。

连续两次下病危通知书，主管蔡医生声称，需送父亲入病危病房，后又作罢。事后知道，与王姐有关人士干预，如住病危病房，王姐则丧失这笔护理收入。对老父，两者实无甚区别。老父平生第一次收到三束鲜花，放在旁边小柜上，那些花从未开繁，很快凋萎。花心也知人意否？

蔡医生说，要剧掉父亲两个大脚趾拇，否则会感染；周医生则反对，称老头承受不住手术。我看着两人的眼睛说，不考虑，老父必须完身而去。

父亲更瘦弱。左腿折叠起来，僵硬不复伸直。右腿右手已无知觉。他用左手几次扯去插进鼻孔和尿道的塑料管，遭到训斥，最后王姐用布条把左手捆在铁床上。你们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只要必要，但不能训斥老人，他根本听不见，而且我不允许、不容忍。医生护士王姐看着我，感到眼光中真实的怒火，从此低声说话。

王姐告诉我，几天中，老头不停呼唤“妈妈”，把她当成自己妈妈了，真好笑。她那肥胖健康的脸开心得稀烂。我瞪了她一眼。

父亲在呼唤母亲啊，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主要是后者。他是在问我，妈妈在哪里，怎么不来？为什么？她好吗？

我给母亲电话，母亲声音更微弱了。她总先问父亲。还好，稳起的，一切都好。母亲又从上海去了北京。后来母亲隐讳地说，她无法在重庆住下去了，非要到上海去。蓓蓓也是她的孙女，她要给这个最缺少爱护的孙女补习。

母亲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小施那里条件更简陋。小施对母亲甚好，关照甚微，但母亲还是走了。她要把最后的时间认真地分配，她的亲生女儿也盼着她去。也许还有其它原因，母亲对自己的隐痛从来是彻底的含蓄。

终于要到春节了。本世纪最后一个春节。

大年三十，父亲回到家中，这又是我作的主。一定要让父亲回家过年。文级把母亲那间小屋腾了出来，父亲头朝窗躺着，全然不知身在何处。墙上挂有家人像片，其中有他母亲、我奶奶的像片。

那是 1957 年，父亲刚从监狱放回。他于 1950 年初入狱，罪名似乎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父亲 1937 年入四川大学物理系，与母亲认识后转入化学系。一名流亡大学生，一家四口天各一方。父亲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所谓“跟踪”，纯属乌有。1982 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

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这是父亲一生冤难的唯一说明。

从此，父亲丧失了作为父亲、丈夫和一家之主的地位，作为另类实际上被时代一笔勾销。除了亲人，几乎从无人给他写信，给他电话，或有任何聚会，孤独成了父亲的挚友。父亲走在街上，总是两眼前视，若有所思，头微微后仰，大步缓行，从不与人招呼，也从无人招呼他，犹如荒野旅人。

1957年那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的一位华侨学生为全家照相。小脚的奶奶坐着，我靠在旁边，哥哥、宁姐、彬彬分立两侧，父亲、母亲、五爸爸站在后排。父亲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躯，精神尚好，似无牢犯的痕迹。那时他37岁。

那是奶奶唯一的像片。父亲事实上无力供养他的母亲。现在，他那在六零年饿死的母亲从墙上凝视着濒死的儿子，儿子已八十一岁之老了。

医院的程序转移到家中，区人民医院邱院长是母亲学生。医院胡医生来为父亲接通排尿管，气息奄奄的父亲痛得发抖。

大年三十晚，育仁一家过来。议论说，父亲可能瘫痪若干年，学校某人已大小便失禁地活了七、八年；也可能慢慢成为植物人，云云。

老父亲不会走这两种路，我知道。

三月四日（初五），为父亲洗了一个热水澡。父亲赤条条躺在浴缸里，左腿弯曲着，两个大脚趾头已完全坏死，污红坚硬，背上髋部有几大片褥疮，两只耳朵都睡烂，凝成血块。父亲居然在澡盆中睡着了。

伊壁鸠鲁临终前也在浴缸里睡着了，认为死亡是生命的节日。婴儿出世，必受沐浴。父亲已复归婴儿，澡盆犹如子宫，一切圆满、吉祥。

晚上十时许，我推门进去，父亲背光而卧。他突然睁开眼，抬起右手，用他深不可测的目光无限怅惘地望着。他无力转向我，但那余光分明照耀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父亲。我握住父亲抬起的手，那手突然攥紧，持续了好一阵，才颓然松开。

我每次回去，父亲都会以他的眼光说，你回来了，好啊。他的目光又会立即黯淡。父亲比谁都清楚，儿子不会呆得太久，他被破碎的世界网住，儿子会用父亲并不全懂但完全体谅的方式耗散生命。他和儿子一样，都是宿命论者。

父亲已有五天不进食，仅吞咽了几滴水。父亲已决定，拒绝存活，拒绝生命。这

符合他的哲学，他的风格。我为父亲痛心，也为父亲自豪。

三月五日，一早电话响起。

这一天终于降临，文级说，老太爷已于清晨去了。

我赶去一中。

我打开蒙在父亲头上的白床单。

这是他，我的父亲。终于走了，以他自己的步伐，永远离开了这个苦难乏味无聊的世界。父亲像所有的远行者一样，宁静，超然，在无限之中长眠。

文级已为他穿好衣裳，他那件灰色中山服上，衣袋上有一滩墨汁，钢笔留下的知识分子的图腾。扣子是完整的，父亲总是整洁、干净、一丝不苟。

文级出去了，我把门反锁上，一人伴着父亲。

1991 年 12 月 2 日,父亲为我写下《我在沉默中度过你的生日》:

沉默是对上帝威严最大的讽刺，

沉默是对撒但最不屑的诅咒，

沉默是心底最强烈的呐喊。

沉默是对人的尊严最虔诚的顶礼，

沉默是对生活和真善美的最热烈的向往，

沉默是天风与海涛最完美的结合。

沉默是对你过去与现在的肯定和对你未来的期许，

沉默是对你的品格与坚强最好的支持，

沉默是绝对相信春暖花开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这样，我在沉默中度过了你的生日。

父亲，我来迟了！尽管一切语言都属多余。惯于沉默的你惯于以沉默面对荒诞的世界，在你的最后关头，没有一个亲人守候一旁，你在无边的寂寞中是否依次念着我们的姓名，你总是牢牢记住所有亲人的生日，在大家全都茫然之际提醒有关的时日。我推迟了和你诀别的唯一时刻，这是永远的大憾。

我坐在父亲遗体旁边。逢春为我借来录放机，我为父亲放起“二、三十年代歌曲”。

是父亲、母亲、五爸爸、幺爸爸在几年前唱的他们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歌曲。

那是多么真率、忧伤、朴素的歌曲！没有被 1949 年以后的时代玷污过的真正的歌谣。

母亲、幺爸爸、五爸爸都唱了好几首，父亲只唱了一首。父亲的声音苍凉、沉郁，有不尽的感喟，是源出心灵的咏叹：

好时候，像水一般不断地流，春来不久，又归去也，谁也不能留。别恨离愁，赋与落花流水空悠悠。想起那年高的慈母，白发萧萧已满头，暮暮朝朝，暮暮朝朝，总是眉儿皱，心儿忧，泪儿流，年华不可留。谁得千年寿，我的老母！花啊！你跟着流水，这样流啊流啊！到我家；水啊！你载着落花，这样流啊流啊！到我家。将花交给我那年迈的妈妈，让她的白发，添上几片残花，笑一个青春的笑吧！花呀，水呀，劳你们的驾吧！

一定有一天，回到我那可爱的家园。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的那边。那边，敌人种下了满地的烽火，敌人给了我们无数的苦难！田园荒芜了，房屋焚烧了，我那白发的爹娘，几次踏进我的梦里边，含着泪儿抚问：流浪的孩儿！你可平安！天知道，天知道，老人家的安康！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一天，野花开遍了我的家园，孩儿回来了，回来了！在数不尽的青山的那边，在飘不断的白云的那边。

白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啊！流水啊！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微风轻轻地飘，飘落了梨花春去了，明月楼高，匆匆秋又到，飘落了红叶愁难消。白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啊！流水啊！梦里的家园路迢迢！

————————

两年前，我写了“咏而归”，表糊好后挂在母亲房间墙上。现在，父亲在他最亲近的人们的歌声中安息。他安静地、会心地、凝神地听着。你在歌声中降生，你在歌声中离去。

我热泪盈眶，前所未有地感受着人生的庄严和悲怆。

————————

我决定不告诉母亲，不告诉重庆之外的任何亲友，不通知父亲单位；不举行任何仪式，不带白花、不缠黑纱，不挂花圈，不穿寿衣，免去一切形式；就在当天火化。

我拨通石桥铺火葬场电话。说是所有火化都在白天，为何要在晚上？

死者希望在黄昏离开。我代父亲回答。对方居然同意，但要加倍收取加班费。

小平、逢春、爱民、慰荣、志钧、国联、二娃一直在客厅；苏敏、育仁、小许、蔼云来了。晚七时，火葬场的长安车准点开抵楼下。我把父亲的绝唱放给满屋的朋友们听。大家都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默。

时辰到了。

大家用木板把父亲遗体抬下楼去。枯瘦的父亲轻如柳絮浮萍。八个强健的肩头格外小心地托着。父亲生命的尽头敞朗而宽阔，就像出门远行，就像荒原散步。

我和逢春陪父亲坐进“灵车”，一辆破旧漏风的长安车。遗体、床单、木板，两辆破旧小车在前面开道。寒碜的车队，隆重的送别。

奶奶、爷爷的骨灰都在石桥铺火葬场，于今早已不知去向。父亲每次经过石桥铺，都要在心里说：你们安息吧。爷爷去世后，父亲、哥哥和我用拖板车把爷爷遗体送到石桥铺火葬场。父亲对十五岁的哥哥和十岁的我说，人生如旅途，都会走到终点。现在，轮到父亲自己了。

夜幕开始降临，火葬场一片寂静。我们把父亲遗体径直抬到焚尸炉旁。焚尸工杨师傅说，从来没有人在天黑以后来，哪怕是无人认领的尸体或枪决犯人，都不在夜晚火化，这是第一例。

大学毕业前夕，我曾来此火葬场“体验生活”。火化全过程我都清楚。当年的黎师傅已经故去，火化设备和建筑都大为改观。

一盏灯泡悬挂在火化炉门前，我在父亲遗体前向父亲鞠躬告别：

父亲，您终于走出了这一步，走到了这一步。多年前，您就说，人生如旅途，我们都是来来去去的旅客。

父亲，您一生饱受迫害，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从未给您任何尊重和温暖。但是，儿女和亲友都爱您敬您，您从无怨尤，您把自己的悲剧看成时代的悲剧，您善良、正直、宽容，超然物外。

您神智尚清时，我从北京赶回，你抓紧我的手，用最后的力量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生为中国人太不幸了！

我知道，这是你绝望至极的言辞，你经历和看到太多的苦难和罪过、邪恶和暴力

绝对占了上风，在你的视野里，没有力量能改变这一切。

父亲，宿命情怀和君子之道让你敏感、苦痛、绝望。普天之下，受难的心灵已经寥若晨星。这是绝对孤寂的受难，无法言说的绝望。

父亲，我用这样简单的形式为你送行，免掉一切世俗的礼仪。我想，这才符合你一生的风格。

父亲，死亡本是一种假定。当世界一团漆黑时，死亡应是通向光明的道路。

父亲，你如此安宁如此自尊如此彻底地走了。你来自尘土，又重归尘土，大地母亲已在迎接又一名失散多年的孤儿。

父亲，安息吧。父亲，再见。

———————

这是春天的黄昏，满天星斗奇迹般地闪烁，多雾的天空第一次如此澄明，有乐声在回环，伴送我父最后的行程。

八时正，父亲遗体被推到焚尸炉口。父亲多年来自己为自己剃头。用剪刀剪成光头。在这最后时刻，父亲花白的、短短的头发被火红的光芒映着，长长的眉毛在热气中微微抖动。我把白床单拉上去，蒙住父亲的头。明亮而沉重的金属门终于缓缓降下，传递带把父亲一寸一寸地送进去。

————————

父亲跨过了那一步。父亲永远与我们分开了。他被接纳进那个世界。

星河何迢迢，笙箫亦渺渺！春风三月初，我父出远郊。高堂自幽闭，尘寰不浮嚣。妻子遥相送，千年方始到。向来幽明处，知谁归期遥。原知死去空，犹为灵祝祷。黄泉无限路，我父在飘渺！

父亲，你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得尊严自由深邃神秘孤独无私。

九时 10 分（70 分钟后），电炉打开。耐火砖床退了出来，父亲遗体已化为一堆白骨。这是生命惊心动魄的变形，复原。

我站在这堆白骨前。

我用铁棍把父亲的白骨捣碎，泪水滴在骨头上，吆吆作响，化成白气飘散。我把骨灰装进骨灰盒，上面嵌着父亲像片，那是某年冬天，全家照的像，白天我用剪刀剪下来的。父亲穿一件黑色大衣，六十来岁，忧郁凝重，他特有的悲天悯人的神情。焚尸工用印有黄色“奠”字的红绸把骨灰盒包住，全部程序从此完毕。

我向焚尸工鞠躬致谢，抱起骨灰盒走出来。我朝天望去，满天星辰，春风拂面，我感到宇宙深不可测的奥秘，感到生命和灵魂的无限。热泪再次夺眶而出。

——————

父亲在我五十岁前去了。少年丧父，人生之大悲剧。然毕竟元气充沛，人生大道刚刚展开，岁月会弥合一切。壮年丧父，生命屏障缺失，人生悲剧已成深渊。孤独的我将要把这个消息面告更加孤独的母亲。

我面前二十来本大大小小的日记本，高高地耸立。这是母亲 1949 年以后写的日记（散失了不少），日记本大都是学生送的，是那些贫穷黑暗年代的日记本，纸页粗糙，封面是劣质塑料或硬纸板。

母亲以什么样的毅力和勇气写下这一百多万字的笔记，又如何穿过恐怖岁月保留下来的啊。我一次又一次痛哭失声，不忍卒读，一次又一次让泪水洒落在母亲的日记，母亲的灵魂上。

母亲漫长的一生，她在孤独中遭逢的一切，她早已破碎的心灵一次又一次绝望，一次又一次挣扎前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母亲无畏地往前进，直到实在不能再走半步。

时代所有想得出的苦难、屈辱、不幸、艰辛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她把这一切扛起，以超凡的意志不让自己有丝毫懈怠，她把这一切内化成沉重无比的十字架，再把它们记载下来，这是她对命运唯一无声的抗议，这种抗议本身可是更深的痛苦！

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

而时代和家庭给予她的是那么残酷无情的回报，包括正在为母亲写回忆文字的不孝的儿子。母亲是被人生和时代折磨而去，但直到化成一堆白骨，母亲仍是无比的刚强、自尊、慈祥！

母亲的日记止于 1999 年 6 月 8 日：星期二，16－25℃，冬冬用自行车，宁儿扶我去看扬大夫，来回两个小时，把他们累惨了，我也单纯为了节约 10 元钱，所见者小。

——————

母亲写字极快，很独特，字呈方型，横竖都直，透出坚毅和焦急。母亲写黑板字

更是飞快，母亲学生告诉我，唐老师每节课都要写几大版板书，飘飘洒洒如雪花飞舞。

最后一本日记用的是重庆印制第七厂印制、重庆百货站经销的 24 开 40 页红梅软抄，文革中的产品。母亲写完了最后一页，打泼了红墨水，浸了一大片，像血迹般刺目。

母亲在最后一页写下两句唐诗：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

1999 年 6 月 20 日，我站到宁姐家门口，摁响电铃，隔了好久，门才慢慢打开，母亲站在门缝里。

母亲又矮了一截，她抬头望着我，嘴嚅动了一下，那眼中含着多少期待和孤苦啊。第一次，母亲没有微笑。或许母亲已预感到父亲已经走了，或许她太累了。我扶母亲缓缓走到沙发坐下，母亲已经枯瘦如柴，我心里痛如刀绞。

走时，有人介绍一位民间医生,花了 800 元买了他四盒“蛇胆液”，据说能治喉癌一类顽疾。我把“蛇胆液”和其他药都拿出，放在茶几上。母亲拿起“蛇胆液”，看了一下说明。母亲的眼睛依然出奇地好。八十一岁的老人，至今从未戴过老花眼镜。按母亲的说法，她是“赖”过来的。她能看清报页中缝的小字和股市数字。母亲的这点“奇迹”也总使我内心酸楚。母亲早已到了连为自己配一幅老花眼镜都觉得奢侈的地步。

母亲用满是皱纹的手指着“蛇胆液”，意思是就服点这个吧。我用白酒兑了少许“蛇胆液”，稍稍摇晃，突然想起母亲千万次地带领学生做实验摇晃试管、烧杯之类器皿的情景，母亲似乎也有所感，她的眼睛一下湿润了，嘴角有察觉不到的笑意。

母亲端起小杯，凝神看了一下，送到嘴边，仰脖坚决地喝下。母亲已是喉癌晚期，吞咽食物非常困难，喉部早已溃疡，脓包肿得几乎堵塞了咽喉。

母亲剧烈地咳嗽、呕吐、抽搐。我这不孝之子，竟如此轻信民间庸医，母亲如此严重的喉疾，怎么承受得起烈性酒。母亲啊母亲，你是为儿受罪，你不想拂儿子的心意，满足他尽孝的心愿，不惜如此苦痛自己。

快到中午，母亲平静下来。

我下了决心，要把父亲丧讯告诉母亲。

母亲无比衰弱地靠在沙发上，茫然地朝前望着。是时候了，必须说出来。母亲听

力已有减退，母亲正在向生命告别，时间不多了。

妈妈，爸爸去世了，他走了，时间是 3 月 5 日。

1978 年 2 月 2 日，大舅在香港去世。苏州二爸爸来信，被我先取回。哥哥、宁姐、培生等正好在重庆，正是春节前夕。最后由我告诉母亲，她最敬爱的长兄已不在人世。

母亲怔怔地坐着，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好久，才放声恸哭，昏厥过去。我们没有想到，母亲会如此难受，我们不了解母亲与她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了解天涯海角的分隔让母亲多少回梦断云山，不了解兄妹同胞之情对母亲一生的意义。

晚饭前，昏睡了大半天的母亲独自出门，直到天黑不见归来。我到学校操场边，见母亲坐在大黄桷树下，陷入无限的哀思中。

母亲沉默着，承受着巨大的哀恸。那天晚上，母亲彻夜伏案备课、出题，拼命工作是母亲摆脱苦难的唯一方式。

1991 年，《唐君毅全集》在台湾出版，母亲怀念大舅的短诗印在第 30 卷第 671 页：

悼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现在，我必须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静静坐着，她在等待最坏的消息。

父亲 3 月 5 日去世后，母亲每周六晚打电话来，询问父亲病况，文级都按我的要求，回答说“稳起的，还好”。

以母亲的敏感，以母亲对苦难的熟悉，她或许早已知晓。

爸爸已在 3 月 5 日走了，他去得很安详。

我没有说，他生前清醒时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

母亲把头靠在沙发上，仰天长叹一口气，泪水立即滚出来，肇年啊，你怎么先走了……

我觉得时光黑暗下来。母亲惨然地流泪，发不出声音。虽不是执手注目地生离死

别,108 天之后才到的噩耗，依然是怎样一股飚风，吹扑着母亲那盏颤抖摇曳的风中之烛啊！

我残忍冷漠地坐着，任由母亲兀自悲伤。

我能再说什么，我能再做什么。

母亲要我扶她走进她那间小屋。母亲永远住在最小的屋里，最角落的屋里，最简单的行囊用具。母亲床头是她的日记本，水杯，药，信札，永远的教材和备课本。

———————

1989 年 6 月 7 日下午三时，公安人员过了 39 年之后第二次光顾我家。母亲正端一碗稀饭，看着身穿制服的恶煞，失手放下饭碗，摔落一地，嗓音也喑哑了。

在中国绝大多数母亲已免于政治恐怖之后，我的母亲却以古稀之年重新承受恐怖。

夜里梦醒 1989 年 6 月 20 日

日里多担忧，梦里闻儿走。

促年（父亲）速同往，心急如锅蚁。

车轮何迟迟，车路一何多！

未得车站名，一一跑各路。

行人见两老，来往何仓猝！

闻得为寻儿，同情复笑痴。

惶惶无所获，怅惘还家里。

室空人已去，心肝俱迸裂。

痛哭失声呼，骤然惊梦醒。

才知在梦里，两颊泪零零。

窗外雨淅淅，似与我同泣。

来日复何如，仰天长叹息！

我搀扶可怜的老母一步一步走到她的床前，看她慢慢侧身躺下，她瘦弱的身躯无声无息地转过身去，才猛然了悟，母亲已是老人！

多年来，我怎么没有想到，母亲早已是一个老人。我从没想到，母亲患有多年的风湿病、胃病、便秘、高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又偏瘫了近十年，因为几十年教书生涯，长期慢性咽炎，早已转为晚期喉癌。

母亲受到所有人的敬爱，却没有一天享受一个老人应该得到的享受。

1969 年冬，母亲曾万里迢迢，转了若干次火车汽车，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奇看望哥哥，为他那清贫的小家缝补浆洗。母亲常引阿婆诗，为自己东奔西走作注：

万里迢迢出蜀都，为儿何暇计征程。

世间只识穷通理，毋怪时人笑我迂。

八十岁生日,是母亲允许的唯一一次做寿。父亲比母亲小十天,一齐做寿。第一次为父母买了鲜花。那天，母亲情绪难得的好，先唱了《女师校歌》。

峨眉秀拔剑关雄，巫山十二峰涌；大江环绕西东，秀毓兮灵钟。巴蜀风，齐鲁同，女校辟蚕丛。伟哉斯校，伟哉斯校。广厦宏阵涛，成人有德小子造；巾帼履英髦，济济霭霭，济济霭霭，民国光耀。

文翁石室周公殿，森森古木参天，半亩方塘涵涵，堤柳带朝烟。衣舍后，映门前，结构本天然。我爱校兮，我爱校兮，四时多逸趣。芙蓉城绕浣花溪，地灵人杰聚。济济莘莘，济济莘莘，岂让须眉。

母亲记忆非凡，不知从哪里记下许多诗词、对联、格言、儿歌，比如：

坐南向北吃西瓜，皮朝东甩

思前想后汉左传，免往右翻

旧岁云除，世短意恒多；读书尚友古人，闲看烟云幻空相。

长江环绕，水流心不竟；学种时师老圃，偶裁桃李荫吾庐。

阿公阿婆对联：

四月八日，十月八日

东方一人，西方一人

四月八日为孔子诞辰

十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诞辰

阿公阿婆题成都奎星楼街寓对联：

三五间小屋即安居，直造上城头，好与儿童数星斗。

八九树梅花作良友，疏枝邀明月，自疑身世到羲皇。

那天，母亲还唱了几首英语歌。在母亲孤苦内心，现实完全不可理喻，人世沧桑不堪回首，惟有有性灵有关爱有温情的事物，才让她留恋。

但母亲心如死灰，为时已久矣！这两年，母亲经常焦急、流泪、叹息。我忙于各

种应酬俗务，竟天良障蔽，多年罔顾垂老母亲的栖惶苦楚！母亲笑容越来越少，偶尔有，也是凄苦惨然的一刹那。母亲晚年的日记，深深地陷进绝大多数中国人似已陌生的政治恐怖和精神深渊。我经常劝母亲开朗超然，认识母亲的人都说，你怎么不象其他老人，出去散散步，打打拳。每当看到那些安享清平、悠闲幸福、不问他人痛痒、更无精神苦难的人们，我就想到生活在另一境界中的母亲。母亲的心只有永远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恐惧，只有她的“债”和“道”。

不知从哪里来，母亲认为，她的一生就是还“债”，她非常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我们都生活在他人的劳作里，生活在他人的善意里，我们欠这个世界太多，只有努力工作，悉数奉献。

母亲践行她的“道”，以她残障的右手，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写出她一生的教学总结《高中化学精要》。该书编辑在“作者简介”中写道：“唐恂季老师近年以偏瘫之身、古稀之年，居陋室，临寒窗，抖索颤悠，以心血碾墨，以脑汁作笔，历尽艰难，将一生教学经验写进此书。”母亲本想待此书出版之后，将所得稿费赠予穷苦学子。熟料中国已入“市场”社会，须先行自垫印刷费用三万余元，母亲东凑西借，方勉强促成。

母亲从无“退休”概念，最后十年间，仍为相识不相识的孙辈曾孙辈学子辅导不缀。一边是白发萧萧嗓音暗哑的老母，一边是天真烂漫的秀发少年，此情此景中，苦难无存，忧愁遁迹。

培生的老师过八十大寿，母亲代为撰写贺诗：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饮水思源，师恩何深。

泰岳不老，松柏长青。

起居咸吉，福寿康宁。

1994 年 7 月 10 日,母亲在日记中感伤地和一些小东西告别：

粉笔、擦布和小黑板

一年来，我和冬冬与你们常相聚首，得你们支持。我宿心愿方能够，显示人生价值，惊喜心头。

高考了，与你们不再团聚即分手，看你们各居一处，伤别离情，油然而生。不禁涕泪纵横，悠悠天地心，物物都有情！

天生我材自有用，尽其在我尽职责，此乃天经地义，以尔等多情拟我们，徒自添感伤，有何意义！惹人笑痴。

母亲一生教学，桃李天下。对青春年少累于寒窗感怀万端：

高考有感（1994.7.9）

中学生累，中学生苦。还在青少年，不似青少年。

学习重，学习累，忘却了春秋佳日，忘却了夏暑冬寒。少有星期日，多是星期七；晨曦不见被叫醒，万籁俱寂还未寝；告别电视与广播，报章杂志也罔顾，更不要说去游乐园。学习复学习，作业永难做完，莘莘学子，失去嬉戏与欢乐，还在青少年，不似青少年！

高考生累，高考生苦。考试场，在十几里外，天雨路更难走，远道考生，天朦胧就得走。雨水加汗水，衣服被湿透。

临考试，缺经验，胆怯意乱，心慌紧张，精神负担重，超负荷写作，发挥少，失误多，卷面比实际，系数远小一。考完后，出考场，如梗在喉，哽咽难已，失落感涌心头，搔首问青天。

问考生：考后何打算？

看世界足球大赛电视。

美美的睡一觉。

考生多如是说。

困了，为沉重的学习负担所压，困极了！

愿天公重抖擞，还美好青春于我青少年！

母亲慢慢把父亲遗像擦干净，端放桌上。我与宁姐、冬冬分别陪伴母亲与父亲遗像合影。如此残缺迟来的合影！

母亲在日记中写道：

康儿上午 10 时来，告我肇年已 3 月 5 日晨六时走了，永远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不禁痛苦……，他怎会先我去了？不久前曾梦中见他来了,能走路,我醒后即有些不祥之感，你竟有灵来呀……

康儿来，他和我都无语凝噎……

人生，人生！肇年此生我竟不能去见他，三个月前他住院，抬上救护车，我未去送，住院期间我亦未去看他一次。一些事未及时做，就再也没机会了。死别吞声，音

容两渺茫……

宁儿几日都在家陪我，她今日去为肇年遗像做镜框。不胜惆怅，泪眼模糊……

想到肇年一生潦倒，有才有德，竟受此待，我亦很不该去上海，他孤独……，竟二次中风不起……

想到康儿总是不快，噙泪。他担子太重，而又不顺。肇年去了，他在重庆如何过的，又担心我，这隐忍苦情好折磨人！

悠悠故人情，我现只有老同学与我信。解放后 50 年没有朋友。友情、亲情、爱情，现只有老同学友情和儿孙们亲情，没有了爱情。肇年去矣，在他生时，我们这五十多年中，爱情被若干次政治运动冲击到荡然无存。现他去矣，这爱情还似乎返回，但他已永不知晓了……

母亲把生命的孤寂愁苦永远埋在心里，永远以古道热肠直面世界。神情始终年轻。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人讲话，眼睛明亮，充满善意；她总是嘉许所有的造访者，给他们鼓励：世界毕竟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去奋斗。

1986 年，母亲从上海乘火车到贵州熄峰某厂子弟校任教。担任高中三个年级 15 节课，为期一学期。走时，母亲用全部薪水为该校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我曾去息峰，母亲置身那荒凉的山景和纯朴的学生之中，忙碌而充实。那位校长对我说，唐老师真像他的老母亲。

母亲八十岁以后，还怀着空前的内心危机，拖着残病之躯，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重庆。几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母亲总在收拾行装，不顾寒暑，只要儿孙需要，只要命运召唤，母亲会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化为盘资立即上路。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去找他的上帝和真理；母亲何尝不是在苦苦寻她的“家”和“道”!

我却始终以为母亲还充满朝气和乐天精神，母亲的病痛、烦恼她自会像以前一样独自承担，以为母亲孱弱的肩头仍像以前一样为我们分担一切。竟不曾想到，内心的苦楚、精神的寂寥和感情的绝望正把母亲推向深渊！

母亲提出要回重庆。她的声音低哑，却分外坚定：要坐飞机。终身节俭的母亲只乘过一次飞机。86 年，我在北京无法呆下去，母亲父亲也在北京住了近两年。父亲始终认为北京更不是他的“家”，度日如年。母亲却怀有明确的任务，辅导外孙冬冬，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北京。她总觉得，再大的劫难，只要她在，情形就会不致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我提出回重庆，母亲立即同意。但母亲已偏瘫七个年头，我主张乘飞机，母亲同意了。

通过安检门时，警告铃声响起，父亲在前面被拦住，只见他突然高举双手，长长的黑大衣裹着高高的个头，像一个宗教徒在向苍天祈祷。母亲说，你爸爸怎么这么倒霉。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多年前，父亲被捕入狱时，新政权强迫他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高举双手。知识分子父亲何须举起双手，父亲一身也不知“武器”为何物！

父亲坐在机窗旁，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定睛看着无边的云层，那壮丽而高远的天穹。无人知晓老头子的想法，他经常赞念自然的伟大，又感叹造物的无常。在他与存在之间，这可是唯一一次再无“历史”、“社会”、“政治”这些猥琐而肮脏的赘物。有几次，我看见父亲在抹泪。

母亲坐在中间，我靠近通道一侧。

临近重庆时，父亲起身上厕所，刚好飞机开始下降，厕所关闭。小解未遂的父亲站在厕所外，空姐走过去对他说什么，迷惑不解的父亲吃惊地俯望空姐，以为自己又触犯了什么禁令。父亲转身回来时，突然举起手，好像向所有乘客表示歉意，他那特有的穿越漫长荒唐岁月的苦笑让我内心发痛。

这次我单独送母亲乘飞机，买了头等舱。到了首都机场，我到问讯处借了轮椅，母亲安静地坐在上面。候机场多是正享受生命和成功的青年男女。我推着母亲到头等舱候机室，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谢拒了服务小姐送上的一切饮料。母亲在等待着她的归程。一切都在消失。

飞机上，碰到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和重庆市一名副市长。母亲对与我握手的这两位中年人无任何表示。

空姐为母亲拿来毛毯，搭在膝盖上，对我说，老太太真像她外婆！母亲对空姐颔首致谢，这是母亲一生最后一次向人向这个世界致谢。

哥哥已在重庆机场等候。太家无言地乘车回到家中。

1996 年 7 月 6 日，母亲曾写下《示康儿》：

痴儿怎识母心思，信奉报喜不报忧。

不识母心自有称，能称忧喜各几分。

人生负债需得还，大忠大孝实一体。

你有奉献苍生志，我怎可不惜余生。

认定事理慎言行，毋速就成戒骄躁。

仁且智自当并重，尽人事还需听天命。

大不孝的儿今天终于把垂垂老母接回家中。任旅途巅沛，老母始终沉默坚毅地走她的归程。

母亲躺在床上，示意我们离开，父亲就在这小木床上去世。老五抽柜上，父亲的遗像和骨灰盒离母亲睡的这张床不到两公尺距离，却已成壤泉之隔！

母亲已是晚期喉癌，且有高血压、胃溃疡、便秘，又有再次中风危险。恐怕不行了；如果调理得好，也许还能稳住。姬教授出门时告诉我，他马上要出差讲学，恐怕不能接受母亲住院了。

7 月 7 日，张德邻秘书小潘突然来电话，称为母亲买了花篮和一点补品。花篮很讲究，补品是燕窝之类，母亲一生从未享用过粗茶淡饭之外的食物。母亲对盛开的花和墨绿色的名贵补品只是淡然一瞥，说，送给别人吧。

母亲要我坐下来，我多少次坐在床边沙发上，听母亲叮嘱，和她争辩，责怪她太悲观，不超然。现在，我望着母亲，心中一片茫然。连为母亲减少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一点点病痛都做不到，我太不孝！

1992 年 8 月,母亲以《去人民医院途中即景》为题写道：

老伴搀我去按摩，天雨路泞行人多。

日复一日行路苦，身罹此病可奈何！

美哉青春少儿郎，悯我二老竟相让，

秉此仁爱之心意，人间终应勿相忘。

母亲望着天花板，眼泪夺眶而出。刚擦干，又流淌出来。好久，好像过了一个世纪，母亲突然说，康儿，我为你唱一首“平安夜”，你把那个日记本拿来。

母亲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她靠在枕头上，用她那只健康的左手扶着打开的日记本，我扶着另一侧，母亲合上本子，又用英文唱了一遍。母亲不是基督徒。母亲的学生骆恩洁的父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曾数次来家，劝说父母皈依基督，认为父母这种人应该蒙受圣恩，永远享福。母亲终身秉受儒家教诲，无法全盘接受基督教教义，

尽管母亲十分尊重真正的教徒。但母亲特别喜欢宗教艺术。我十八岁时曾临摹过拉斐尔的圣母圣子像，母亲保存了很久，终于丢失。母亲能唱许多英文歌曲，其中就有这首《平安夜》。

————————

科学、理性、政治、现代文明对人本身最大的贻害是，人类日益迷失本性，在日益缩小的时空中彼此日益生疏，宗教蜕化，艺术堕落，道德沦丧，再无同情的了解，再无亲切的体验，再无虔诚的信仰，生命花果飘零，童贞、诗意和神圣隐遁至于无形。

对母亲而言，探究生命之意义，追寻灵魂之家园，尽性尽道，承受苦难，渴望拯救，何尝不是儒耶两家相通之处。面对层层阴冷的世界，除了遥远的启示和有限的抚慰外，它们却是同样的无可如何！

仲夏之夜终于降临，黄昏中母亲抬起手，示意开灯。母亲要我把五抽柜上的电子日历递给她。这十几天，她一直把这个学生送的日历放在枕头边。母亲最后望了我一眼，那眼神出奇地宁静、慈祥。我关上灯，——母亲房间用的是别人早不用的拉线开关。母亲躺在黑暗中，在微光里平静地呼吸。母亲，晚安，我站在门口，在心里第一次无限感慨地对母亲说。

——————————

第二天（7 月 9 日）早晨九时，文级忽来电话。我立即预感到……

赶到家门，哥哥正抱着母亲下楼。母亲已昏迷，脸色如土，奄奄一息。随即送往沙区人民医院。

几名医生护士忙着把母亲安置在一楼抢救室。陈医生（多年前向宏介绍认识过）、刁玉（重大刁潘奇的女儿）都是熟人,心中稍许宽慰。她们为母亲输氧、输液、排尿、量血压。刁医生认为很可能是脑血栓，或脑溢血，今天很难过去。

母亲有一刻清醒过来，清晰地说：我活不成了，我要去了！

母亲的脸与父亲完全一样，下颚凹下去，眉骨颧骨突出，耳轮耳垂都变薄了，双眼紧闭，白发无力地散落。

中午转至六楼。又是新的医生和护士，照例又忙了一通。

与上次父亲去世不同，我立即给小宁、忆聪等打电话。

与香港王清瑞打通电话，安姐正在美国，忙得要命，累得要死，心脏也不好,大舅妈年事已高且显昏聩,清瑞自己老母也不行了，——恐怕不能来渝。

母亲没有一句要安姐回来一趟的话，这个愿望埋在她心中最深的地方，那里也在流血，只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忆聪、忆南两姐弟从上海乘飞机回来。他俩都是奶奶拉扯大的。

某工厂的张阿姨，住在我家，一边照料其读高三的儿子，一边照料一下母亲。中午，我回一中，张阿姨说，唐老师清早起床，要了大口盅盅，又走回房间去了。

我走进母亲住房，文级跟着进来，正说有两版“安定”（100 颗）不知去向,就在地板上发现两颗“便灵通”胶丸。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都分别装着五颗“安定”!

原来是这样。这几天母亲每次都要我早点离去，口气冷静而坚定。原来她要唱《平安夜》，要那个电子日历，决定她告别人世的倒计时，原来她要那个大口盅，以咽吞药片。原来母亲去意已定。

文级又说，张阿姨昨天给母亲洗了澡，母亲还要求为她理发，天太热，汗水把后颈窝都打湿了。

上次父亲走前一天，也洗了澡，理了发。

----

7 月 10 日，育仁、小许看护母亲。一天一夜下来，母亲已形同枯槁。右侧手足已完全失去知觉，左手左脚还能无意识地抽动。

上午沈晓茜突然来电话。告知母情。晓茜认为应告诉她外公外婆邹桢伯伯和张阿姨。中午前，邹、张两位老人即来到医院。张阿姨见到母亲就哭起来。去年，他俩老还到一中看望父母，没想到去年所见者，一人已去，一人已弥留。邹伯伯是舅妈谢廷光表弟，人品高洁，心性良善，与父母一样，饱受时代之累。

----

93 年 10 月 7 日，母亲写了《怀友》:

昔日同窗友，多弃此环宇。

长久失音讯，存者有几许？

卧床，念故情更切。

欲去信探问，又不敢动笔。

年老复患身不遂，病榻常念同窗友。

故人多辞此环宇，存者偷生有几许？

久欲去信一探问，又恐噩耗无情至。

生离死别寻常事，因何懦弱至于此？

1996 年 7 月 31 日,许安本老师去世。母亲打电话要我回来，关上门，母亲神色凄然，说，许老师去了，你下楼去看看，我已去过。

许安本是河南人，北大中文系毕业，抗战来渝，颠沛流离。曾任《益时报》编辑。49 年后打成历史反革命，晚年失聪。文革时，与我们隔壁而居。红卫兵令其退出一室，其所居全当西晒。许母患癌症，完全无力治疗，疼痛而殁，三个儿子天各一方。若干年中偶回探亲，其神色也如罪犯。唯许老师从来不卑不亢，夜深时，一人吹箫，必是《苏武牧羊》、《满江红》一类古曲。

许老一生苦难，以 90 高龄去世。母亲在日记中写诗为其壮行：

一生学问，一生热忱，半生孤寂！

所幸儿媳孙，有德多孝顺，这是人生最感安慰的，又有谁可夺呢！许老，您安息的走了，走完这人生曲折路，吃尽这人生苦涩果，无愧，无悔，无憾，无挂，去到那永无苦难的地方，去到那不再感世态炎凉的地方。我为您庆幸,但总不能免——哭,好人何不幸也!！敬爱的许老，安息吧！

唐恂季率子王康、女思齐、婿文级

敬挽

现在轮到母亲自己了。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下午七时，宁姐从机场赶到医院。见母恸哭，“我知道您知道女儿来了！”

这么多年，宁姐撇开自己的人生重荷，悉心侍候母亲。也是母亲的宁姐，更深知母亲的苦楚和艰辛，更深知母亲的孤独和绝望。

就是 7 月 9 日清晨（六时许），宁姐家电话突然响起，拿起话筒，却寂然无声。这是母亲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啊！母亲吞食 100 来颗“安定”，决意告别生命后，有多少话想说啊！对谁说，说什么？母亲一定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听到女儿的声音后，最后改变了念头，就在这一瞬一念之间，母亲撒手而去了！

母亲是万念俱灰啊。文级告诉我，那天晚上，母亲起身了十来次。为了不惊扰他人，母亲从不开灯。黑暗中，母亲起来干什么？她会慢慢走到阳台上，最后看看她劳动了五十多年的地方？她会慢慢看看这几间简陋的房子，搜寻值得记住的东西？她会慢慢走到父亲小屋（张阿姨在住）窗前，倾听丈夫生前的叹息？她会慢慢走到自己的窗前，仰望苍穹，思索无垠的宇宙和无解的人生？她会慢慢站在老五抽柜前，最后看一眼她的父母、兄长、姐姐、妹妹，看一眼她的子女、孙辈？也许母亲什么也没有想，没有看，心如止水，慢慢躺下去，最后一次闭上眼睛，任凭泪水流出，任凭心血冷凝，任凭无边黑暗弥漫而来，任凭这盏摇曳颤抖了八十一年的红心泪烛随风而去！

----

7 月 12 日，母亲住院第三天。学校领导带话来，称鉴于母亲几十年勤恳工作，“德高望重”，研究同意转院到西南医院或重医（不属学校职工报账单位，共产党发明的等级歧视制度从生到死一以贯之）。我坚决谢绝。 在最高的意义上，母亲已经做出了决定。不麻烦他人，不累及他人，是母亲人生原则的下限，我必须恪守。

沙区医院尽管简陋，但该院邱院长是母亲学生，医生护士也很尽心，至少没有大医院的傲慢和霸道，这就够了。

从下午开始，母亲开始抽搐，体温血压都升高。育仁、忆南用酒精为母亲降温。母亲背部开始出现褥疮，父亲当时也长了几处褥疮，生命怎么如此脆弱？

晚上十一时后，母亲每半小时就出现剧烈痉挛。左手往上往内使劲收缩，手指往里往下捏得紧紧的，嘴大大张开，舌头朝外伸，嘴唇最后变得又小又圆，全身剧烈抖动。这是“安定”的作用，上百颗“安定”没有致母亲于死地，却让母亲承受如此惨痛的折磨。

忆南和冬冬反复说，奶奶已没有知觉，感觉不到痛苦。

我无数次想告诉医生实情，又恐其救急措施（灌肠等）会给母亲带来新的痛苦。母亲最后清醒时那句话“我要去了”，已分明告诉我，不要作任何抢救，生命的终极是痛苦，更是意志和尊严。

护士为母亲吸痰，吸出的是带血的液体。我请求医生不再抢救，值班的张医生说，中国还没有实行安乐死，家属心情他理解，但救死扶伤是其天职。又说，如家属再要求放弃抢救，也可签字。

我把日光灯关掉，把自带的小台灯（母亲用的）打开，不能让母亲在惨白明亮的

灯光下承受痛苦。

母亲白发萧萧，鼻梁高且直，下颚下陷，鼻孔插上氧气管。几次以为母亲过不去了，但母亲却顽强地挣扎过来，神情更高贵、美丽。

每次剧烈抽搐，我都握住母亲的手，抚摸母亲的额头和白发。手还温暖，天底下母亲的手都这样温暖。不时用棉签蘸点水，湿润母亲嘴唇舌头，用酒精擦身降温。

———————

7 月 13 日，母亲入院第四天。午间，五爸爸、陈阿姨、宁姐、文级都在。与文级商量安排后事。

母亲经过一晚折磨，今天较安稳，睡熟的样子。

谦谦忽来电话，十八日到渝，看忆南、冬冬和林深三侄谁更宜于去美。

这是冥冥之中幺爸爸的使者啊！母亲常说，大伯为中国文化和人类精神苦心孤诣，生死以之；二爸爸侍候阿婆，无私无畏；五爸爸聪明博学，一生不幸；唯幺爸爸最苦，她仁厚、善良、含蓄、隐忍，毫无纤尘世俗，一生为人行事都是圣者本色。幺爸爸多年苦病先去，母亲每思之提及，总是无语凝噎。

晚九时许去医院。母亲学生骆恩洁背门而坐，正为母亲唱基督教圣歌。骆恩洁说，唐老师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其人品、学识在一代代学生中留下极深印象。唐老师常穿一件破旧黑大衣，走起路来一阵风，那严肃的神情、简朴的外表和忙碌的身影，都像居里夫人。我因父亲问题高考落榜，无颜见她。八年后我才第一次去看唐老师。她一见我就流泪，为我未能考上大学而流泪。

祷告圣歌，单纯无比，庄严无比。骆恩洁唱完，不断地说，唐老师，说主啊救我，主救我。

基督教如何看待生死？

只要信主，就会得救，永住天堂，永享快乐。

基督教让耶稣为人类苦难和罪恶背负十字架，在尘世之上之外许诺一个永远欢乐光明幸福的天堂，有极高的善意和极深的苦衷；而中国文化之真精神是自尊自重，自强不息，自作主宰，人神不二，物我双忘，尽性知天，不以地狱为悲，不以天堂为喜，出生入死，同于大化流行，同样有极高的善意和极深的苦衷！

十一时许，小宁、育仁同来。请爱民将他们和骆恩洁送回。十二时许，哥哥一人忽来，扶母泣诉，倾其人子之疚之痛。

便道条椅上，与忆南、冬冬交谈。

忆南：爷爷最拿手的是泡盐蛋，先把几百个鸭蛋用刷子刷得白生生的，再一个一个放入大缸，加水，放足量的盐。每当有油从盐蛋流出，十分得意，连声说“养人”。盐蛋大都送了别人。

爷爷最满足的是烫脚，边烫边吆喝。

爷爷常带忆南上茶园，发一角钱让忆南去看小人书，薄者一分一本，厚者二分一本。或者买一饼，总让忆南慢慢吃。

冬冬：爷爷看《红楼梦》，看了若干遍。给他看金庸书，因是横排版，谓其“无档次”；又给竖排版，便欣然接看，称有“古典风格”。

爷爷有次把盛粉蒸肉玻璃缸打碎，便俯地捡拾，后吃时，发现有玻璃碎片，皆不言。爷爷终承认是他闯的祸。

爷爷长得特洋气,绝对是明星,那帅气。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谈吐不凡。

爷爷心里很孤独，所以他只好沉默，越沉默越孤独，越孤独越沉默。爷爷从无怨言，对任何人都挺尊重，从不说人短长，爷爷关心的都是抽象的大问题。爷爷耳聋，其实心里都明白。爷爷一生正派，尤其道德清白，对奶奶从无二心。

奶奶心里老有事，老是别人，爷爷就是正常人，奶奶一生都忙、累、苦，大多数人都会偷闲，奶奶不会，奶奶是特殊人，是圣人。

爷爷奶奶都是正常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人类，正直、善良、克己，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们回忆爷爷奶奶，虽一知半解，却是孩童时的记忆，甚为真率。所谓精神长在人间，其实是说亲人后人之不忘先人前人，无论尊卑贵贱，都只存音容笑貌和寻常日用琐事，其中含藏折射出的道德智慧性灵则非言辞所能概括，惟幽明相通，往来匆睽耳！

但这世道变异甚速至于面目全非，数千年人类累积之文明（ 多是血泪悲歌）已难孑遗，此也母亲之一大悲情。

----

7 月 15 日,母亲更形枯瘦，但容颜逐渐开朗，再无抽搐挣扎。母亲已穿越苦海，正遥登彼岸，我心悲苦而欣慰。

1989 年，我受当局通缉，流亡在外。母亲说，望门投止思张俭，自己多珍重。同学朋友没有拒纳者，母亲写道：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

庆儿有斯友，大慰乃母心。

母亲内心仍是无法排遣的凄惶和忧惧，她无法理喻，却须再次承受中国政治漫长的恐怖。旁人永远无法体验一位风烛残年的母亲的孤独无告：

无绪 1989.10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狂风乍起，风云骤变。

区区事小心翼翼，绵绵情惶惶无绪。

12 月 2 日，我 40 岁生日，几位新朋老友为我贺生，享受人生的庸常乐趣。

我家从无做生习俗，母亲在日记中写道，所谓生日，即是母亲受难日，为何要庆贺？应当当成一种感恩和责任。

就在这一天，母亲在日记中写下《你、我、他——为康儿 40 生日而作》

你为他（大迟，11 月 10 日生日）刚做过生日，百里外送去蛋糕、图画和书包，我为你做生日，没有吃的和用的，千里迢迢寄来一纸签。

近在咫尺难相聚，远在天边见更难。

岂为无暇日，非为隔山川！家国事，披肝沥胆牢心间。

你、我、他一脉一血，脉血相连，互祝平安。

意绵绵，情何恨！待来年春暖花开，共登缙云山。

又为冬冬 15 岁生日写了贺文：

志于学的年纪，当在学上下功夫，勤学复善问，融会更贯通。

耳、手、口、脑并用，准确敏捷灵聪，三 C 精神勉汝：

ClearHead,CleanHabits,CleverHands.

1990 年元旦，母亲在爱子不归之中，无比怅惘，又过一年。这是“苏东波”改变世界政治地图，人类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母亲对于末世浮嚣全然罔顾，只觉得人生之路更加艰难，生活意趣中平添更多忧郁：

窗前腊梅蓓蕾多，无人怜爱花自落。阵阵幽香，频频唤我，抬望眼，玉满枝头。朵朵明珠，亭亭玉立，冒严寒把春报晓，羞煞那嫣红姹紫，牡丹芙蓉，只会浓装艳抹，

随风婆娑。

腊梅、牡丹、芙蓉：我等秉天地心，逢四时之造化，桩点孤寂世界，美化苦涩人生，尔等骚人慕容，何苦妄加褒贬。既损万物生意，徒增自家烦恼，曷不哺糟啐泥，开怀畅饮加餐，苦短秉烛夜游，乐天命复奚疑！

春节时至，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十数亿中国人在渐已稀释的血泊中重燃爆竹，好一派华夏团圆美景。母亲在残破的家中，照例行中国人春节老规矩，包汤元以盼骨肉团圆：

年年逢春节，天涯共此时。

洗手搓汤元，行行排盘里。

个个似碧玉，珍珠差可拟。

劝君多嗜此，香甜难可比。

念天地之悠悠，感山川之破碎，

叹人生之艰辛，恨苍天之何亟！

细雨悄无声，幽然润田畴。

恁此生生意，敢不惜余生！

中秋又到了。母亲盼望又恐惧这些佳节吉日。那年忆聪从上海给奶奶寄去一盒月饼，母亲竟感怀至于零涕。那是那噩梦般漫长岁月中母亲收到的最好礼物之一。

《中秋喜得毛毛寄来月饼，92.9.11》

迢迢千里寄月饼，见者无不笑称傻。

傻中才见情意深，孙知我心才此傻。

饼香且甜韵无穷，欲告玉宇抬望空。

只憾斯须已忘言，秉香祝愿普天下。

年年岁岁中秋夜，花好月圆人难全。

今年更胜于往年，更多分离更多难。

1996 年 12 月 2 日,母亲在日记本中为我和冬冬贺生：

今天为康儿及冬孙生日，去年今日都在此，今天二人均不在家，不胜唏嘘。

叮咛叮咛再叮咛，

唠叨唠叨复唠叨。

我是黔驴技穷，

你是技穷黔驴。

作母亲的就这样，

不这样不成母亲。

就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母亲还保持着对人生的信念。1997 年 4 月 21 日，母亲读了肖复兴《关于莫扎特》后写道：

读肖复兴《关于于莫扎特》有感

莫扎特的中国知音——傅雷称莫扎特是：“一个天使，一个天籁。”

太多太深的苦难，面对苦难和艰辛，

不是回避和超度，咀碎它化为肥沃，

重新撒播进土壤，让美丽鲜花开放，

展现天使般的温柔，轻轻抚慰被伤害的心。

音乐非刻意做出，融合做人的气质，

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清泉。

美妙香甜，清新自然，

让人们陶然淌漾，自由遨翔，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是天籁式的声音。

傅雷对莫扎特的评语至深至切！

肖君佳作，斯人斯文。与读者共鸣，道出读者心声，感慨感谢！

（注：肖复兴《关于莫扎特》一文载于 1997《随笔》一期）

恂季

1997.4.21 于北京

1997 年中秋，已近八十的母亲再次写下她的祈愿：

祈阿爸阿母及哥哥、姊姊、妹儿、成惠灵魂安宁。

愿国泰民安，华夏子孙多德多能。

愿儿辈个个身心健康，苦尽甘来，能贡献才智，为人造福。

愿孙辈修身明德，待人宽厚，惩恶扬善，勤奋学习，吃苦耐劳，淡薄名利。

我辈心平气和，慈祥恺悌，多运动祛病魔。

恂季敬祝愿

1997 中秋

1997 年 12 月 2 日，我满 48 岁。母亲最后一次为我写下生日祝词。

《寄语康》四十八岁生日

七年前的今天，寄你的《你、我、他》中有句：

家国事披肝沥胆牢心间，今天想改为：

阿婆寄语伯伯部分诗句来勉你：

…老身差健可无忧，放怀家国事，

开展皱眉头，宇内忘形能有几？

委心随意远欢游，渊明味道恰相投，

蝶周同一梦，栩栩欲何求？

本文作者王康的阿婆陈卓仙（1887-1964）女士是位诗人，常与当时文化名流熊十力、梁漱溟以诗唱和往来

胡菊人先生挽伯伯《大情与一信》文中道：

…凡事知其不可亦必奋力以求，正是不善“善生”的人物。

冬冬曾在电话中说：舅舅，您要成就您的事业，您要注意搞好您的身体。虽似大人告诫孩子的口吻，对您来说是为至要，冬冬先得我心耳。留得“青山”，又有何愁，何患“无柴”!

妈妈 1997.12.2

1999 年 7 月 15 日,母亲入院第六日。除了注入几瓶维持生命的液体外，母亲已与这个物质世界远远隔开。母亲的前额更加突出，脸上再无痛苦愁烦，是彻底的释然，恬静高洁。

1938 年，20 岁的母亲在峨眉山川大分校写下两首诗：

《悼同学》

峨山兮峥嵘，清秋兮萋萋。民生久涂炭兮，国事日已非！人情多变化，事多与愿违。生死各异域兮，相见永无期。

《咏红叶》

君生非南国，君有红豆意。

将君寄阿谁，柏树溪边去。

柏树溪是母亲宜宾老家地名。1996 年召开“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我曾与安姐前往。那里背倚群峰,南临长江,气宇萧森，天地开阔。“柏树溪”是母亲一家的圣地家园。

1998 年元旦除夕，母亲在日记里给所有的亲人写了一封信。直面漫漫长夜般的人生苦海，母亲本性中坚如石的勇毅和乐观，极富诗情画意地流露在笔端：

元旦快乐。还有一年，21 世纪就要开始了，祝你们在这非同寻常的新旧交替中平静而满怀信心地度过新年。

辞旧迎新，古往今来，形式相同，而各人心情则不同。你们一定能深深地体味到真正的新年并不在于外表的浮华，中国字“元旦”真好，一切从头开始，一切都是新生日，顽强得不可阴挡。英文 NewYear 也好，所谓“日新，日新，又日新”，也该是这个意思吧。寒凝大地，就必有春华夏荣。拜伦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几百年为人传颂，就是悟到了自然循环不已这个根本的也极平常的道理。

所买烤火炉可用起来，除夕之夜有火通红并不算浪费奢侈，煮沸（非壶）开水，时光就在徐徐冒出的蒸汽中过去了，据说在这种情景中所想的事物将不会忘记的。

我们的日子不会更难的，未来总比现在要好，虽然过去不堪回忆。

我们下一辈都衷心希望我们好好将息，不让那些人幸灾乐祸。我们一定能在人类第三个千年第一个年头中团聚一堂的，那时我们也才八十二、三岁，你们也不过五十多岁，那小娃儿们才二十几岁，应当为这一天而好好的生活下去。

好了，不写了。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元旦除夕

1998 年 12 月 29 日

这一天终于来到，这一刻终于降临。

1999 年 7 月 16 日晚 11 时 35 分,母亲与世长辞了。宁姐和我，忆南、冬冬守候在母亲两侧，母亲缓慢地呼吸，坚毅的头微微侧垂。护士俯身作最后的检测，量血压，听心跳……

母亲毫无声息、毫无痛苦、毫无迟疑地停止了呼吸，溘然长逝。

是时，苍穹静谧，星河灿烂；万籁寂寥，灵台浩荡。

东去江声流汩汩，

南来山色莽苍苍。

若识素心无寸土，

越明渡幽归大荒。

初春寅熹送我父，

仲夏子夜送我母；

慈晖皎洁无纤尘，

无限江山无限路。

文级联系好冰棺。12 时 30 分，逢春、慰荣、国联、爱民和我用担架将母亲遗体乘电梯抬下，送回学校。

经过近两小时交涉，学校有关方面终于同意把冰棺停放退休教师休息室。

休息室约一百平方米，在体育馆一侧楼下。母亲躺在冰棺里，身上仍穿平日衣裳。我坚持不让母亲穿那种色泽晦暗的寿衣。

忆聪、忆南、冬冬在冰棺前点上油灯，纸钱和香烛。

小平、长庆等先后来到，朋友们共同守夜至天明。

----

7 月 17 日。

太阳照常升起。五爸爸所写对联已贴墙上：

孝女慈母良师贤惠有加，立德立功立言无怨无愧。

我将其改为：

慈母贤妻孝女良师充实光辉，立人立德立功立言淡泊高尚。

横联：无愧人生

我更愿用大伯在《思复堂遗诗》中的词句献于母亲灵前：

德音如闻慈晖宛在

同意学校安排，遗体在 19 日星期日上午出殡火化。

不断有人前来吊唁，送葬礼，花圈林立。

肖经纶老师送来挽联：

上联：风雨中去来操劳桃李盈门几辈叹学界于今丧巨子

下联：寒暖里沐浴执着信念满室同伦慰名校自古留遗风

父亲凌晨辞世，当天黄昏火化，免去一切仪式。母亲设有灵堂，亲友同事学生吊唁者数百，有讣告登于《重庆晚报》，重庆一中校友会京津分会、成都分会、昆明分会皆有唁电。

父母于我，一体无间，怎能厚此而薄彼。

父亲一生孤寂，被褫一切人权，无所牵挂，无碍于人，也无涉于人。其去如河之入海，静穆容与，合于一生风格。

母亲一生劳瘁，奔波道途，大部生命奉于学子，晚年慈祥恺悌更遍及子孙婿媳远亲近戚，其归如霁月清辉、落红春泥，合于一生风格。

----

7 月 19 日,太阳升起之际，母亲灵柩运至石桥铺火葬场。哥哥手扶母亲遗像站在卡车车厢前沿，我用摄像机拍下沿途情景，以母之眼光作最后一瞥。

九时正，母亲追悼会开始。

先由一中校长致悼词，接着由我代表亲属致悼词。

二十分钟前，我在灵堂外条椅上已写好悼词：

母亲，今天是 1999 年 7 月 19 日,我们来为你送行。母亲，您走过了漫长的一生。现在我们可以对您说，你无愧人生，无论这人生充满多少艰辛、苦难和黑暗。

在无尽的坎坷折磨中，你总是坚守着人生的尊严、精神的高洁、道德的纯粹；您以超凡的毅力，常常独自一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从不躲避，从不推诿，从不惧怕。在父亲身陷囹圄、长期蒙受迫害的困窘中，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无懈怠，从无迟疑，从无怨尤，我们这个在暴政和贫穷中早该破碎的家庭，才能维持到今天，您是我们最亲爱最伟大的母亲！

在您近六十年教书生涯中，您完全无私地把自己交了出去，您对所有学生，无论尊卑贵贱贤愚都一视同仁，绝无差等地倾尽心血，您不愧为“教师”这一人世间最干净最高尚的称号！

您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常常忧心如焚，您对专制肆虐、人伦道丧的社会痛心疾首。直到最后一刻，您都以最大的耐性和最后的善意，以悲天悯人的不忍之心，为苍生祝福，为民族祈祷。在这个普遍堕落、麻木的时代，您把一切与您有关无关的不幸

和苦难都内化为生命的沉重，凡是和您一样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知道，要做到这一切，是何等艰难。您是真正的以道德良知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

您一生清贫淡泊，秉持“报恩”、“还债”的夙愿，尽管忧郁、伤感、惶恐、苦难笼罩了您一生，但您英勇坚强，决不屈服，从不灰心，您用善心和热泪洗涤人世的苍凉，您是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最终获得自由、在灵魂上获得超越的顶天立地的人！

母亲，世界不会止于火葬场，死亡原是一种休止，生命将以更加神奇的步伐向前向上！

母亲，您最有资格说：生命最终是美好的！

母亲，您与父亲一样，来自尘土，重归尘土；您与父亲一样，将会在新世界复活、重逢！

母亲，我们将永远与您同在。母亲，走好！

还是那座焚尸炉，还是那位杨师傅，还是那堆皑皑白骨。

像对父亲遗骨一样，这次由哥哥、宁姐和我亲手把母亲遗骸捣碎碾细，装进骨灰盒。焚化炉外石刻门联映入眼中：

屏山幽幽翠幛落英地织锦绣长相守，

瑶池潺潺广厦琉璃方丈归化永安息。

与父亲一样，母亲重归尘土了。

张鲁忽来电话。告知母已西归。张鲁默然片刻说，今晚即为老人家诵经超渡。张鲁 87 年罹祸后彻悟大觉。母亲曾多次欲往探问，又不忍见其状，终于作罢。1981 年，张鲁曾与黄云开来家，与母亲摆谈，又有长信寄母亲，其肫挚真诚，令母亲深为感念。

今天，1999 年 12 月 2 日,我已到五十岁，该知天命了。我不知天命何在、何意。我只知父母皆已离我而去,永诀如在昨日,这种感受不会消失，直到最后。

在父母亲漫长的痛苦人生中，最深浓的是我的存在，我与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抗衡而加诸父母身上的恐惧和绝望。对于父母，这是无辜、额外、特别残酷的精神凌迟。即使是国破家亡的时代，即使是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们绝对想不到人生竟是如此令人窒息，儿子竟是如此不可寄望，周遭竟是如此颠倒阴冷，世界竟是如此苍凉荒诞！

96 年，安姐曾在北京与父母一见，父亲大慰，在日记中写道，此生足矣！母亲却

反添更多哀伤。98 年，李欣带大迟回国，也与父母一见，同样的短暂，同样的遥远，执手又将远去的游子，父亲感慨万端，母亲惨然微笑。于父母，这是迟来五十多年的团聚，更是生离死别的活剧。人生对于母亲，是如此生疏无情；母亲于万般无奈中只剩下永远的隐痛，无尽的牵挂，万难释怀的思念。

父母最大的悲情，在于他们原本善良仁爱的本性，却难有些许寄托，难有些许回应，而他们坚信人最终可信、可爱、可救，也竟是如此渺茫，如此黯淡。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这是我们共同的宿命。母亲日记本里，有一页没有日期，是她的非正式的遗嘱。按推算，应是 1998 年 8 月下旬。

恐一旦昏迷，留下几句：

一、人都要走，既来总是要走的，不必哀痛，当为我去而为我高兴。人生累，人生苦，久病更苦，解脱了不是好吗？

二、现在走了，也走得适时，我总是放心了！

三、仍对康儿想说几句：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尽人事，知天命；乐天命，复奚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对人要慢慢好，对人对己才都好。对这个社会不要期望太大。

四、骨灰全洒在嘉陵江水中。

大舅曾写下《人生之体验》，其中有一章是《母亲的隐居》。

人生在他自然的母亲的怀抱中，已过了五年了。因为他的早慧，在二年前他已能了解他母亲同他说的一切言语。他不认识他人，终朝只同母亲接触。在温暖的母爱之下，一切都是安稳而平静。但在他五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正在玩弄母亲给他的玩具，忽然他母亲叫他来，对他说：

“人生，你现在已渐渐长大，我为养育你同其他的子女动物植物，使我精神渐衰，我将要离开你了。你不要悲伤，我是不会死的。我只是将要隐居，隐居到你父亲那里去。你生下尚不曾见你父亲，但你一定会同他相见。——因为他在等待我。他同我约，待你长大到此时，家务便归你管，我不能不走去隐居。但是我去隐居，只是我精神去。我的躯壳，将化为天上的日月星，他们永远照着你以后的生命行程。你的摇篮及一切玩具，将化为山河大地。所以你可不感到你的母亲是不在了，母亲给你的玩具，不会被你母亲携起走的。一切都是与从前一样，只是你以后要想到你是一家主人，是世界

之主人。你要有独立自尊的精神，你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你要自己寻找食物衣服，你将要吃苦，比你的兄姊还要多呢。我生育你的兄姊与其他动物植物的时候，我都给他们一定的居处，使他们身体的构造，适于取一定的食物；或给他们一定之本能，使他们有一种天生的工具，帮助他们生存。但我发现，他们因先有了较适于生存的工具，他们便只知赖母亲给他们的工具来谋生，他们都成了不上进者。所以我同你父亲商议，对于我们在此世界最后的儿子之你，决定不与你任何固定的本能。把你在胎中本可有的固定本能，都逐渐取掉，你愈长成，你的本能对你愈莫有用。你全要靠你自己，去培养你自己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有意剥除你与生俱生的一定本能，是因为你有一定的本能，便只有这一定的本能。而且这一定的本能，只是对于你之生存本身，有一方面的价值。你莫有一定的本能，你将成为无所不能：你将发现生存以上的价值。只要你努力，你的前途是无限量的，我现在要离开你了。好孩子，你好好的创造前途吧。"说时迟，那时快，人生的母亲便不见了，一切摇篮玩具都不知那儿去。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独坐在一山岩的旁边，望着前面无尽的旷野，纵横的河流，经过旷野无声息的流。青天是一望无际。他痴痴的坐在岩边，从早晨到午刻，看望日月星不息的轮转。他记起，这就是他母亲的躯壳；沐浴在它们和煦的光辉之下，他知道她的慈爱，还照临着他。但他已不能再投到她的怀里，他已不能听见她的话语。他知道她已走去隐居，在望不见的地方，她已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许到目的地了。他现在已是一无父母的孤儿，独自对着苍茫的宇宙。"

真正的隐者，原来是母亲！

母亲在这世上走了八十余年的长路，现已渐行渐远，母亲的使命乃是隐者的使命。山川风物之思，家国世道之感，父母兄弟姐妹之念，夫妇子女师生之情，柴米油盐日用之虑，母亲无不牵肠挂肚；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鳏寡孤独残弱穷苦无告者，乃至牛马羊犬花草虫鱼都是母亲的难友。善良仁慈悲悯敏感如母亲者，生此末世，能不辛苦难艰乎！

母亲竟是隐者，在她灵魂核心，从无何物奢求于外，尽其职尽其心尽其道而已矣。一旦无益于人，无补于世，母亲即慨然撒手尘环，斩断尘缘，决不滞留，决不回头。

母亲，紧闭的双眼内里您已将全部恩怨收敛，紧闭的嘴唇后面您已把所有的爱恨消融。每一根白发、每一条皱纹都不沾丝毫纤尘，质本洁来还洁去，母亲，您原来是

无愧人生的隐者啊！

父亲去世 132 天之后，母亲也走了，世界更空虚。

我如何才能领会母意，如何才能走好我自己的路？

母亲曾说我是她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我不懂得母亲的所指。如今母亲去了，我只觉得没有了精神支柱。

那天中午前，哥哥、姐姐、我、育仁等把母亲骨灰盒与父亲骨灰盒并排放在老五抽柜上，点上一炷香时，我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咏而归”条幅挂在一旁，他们当年唱的老歌又响了起来。

两天后，亲人各自散去，走自己那条路。

我把父母结婚照和抱着安安（两岁）、哥哥（一岁）的照片挂在父母骨灰盒上方墙上。

他们现在又在一起，这样的形式让我热泪盈眶，我这五十年的泪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竭止地流淌，我感到双亲无处不在，我再次感到生命的庄严神圣。

父亲、母亲：

今天已是二 000 年元月二十日，再过半个月，春节又要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又要到了。这简单的回忆就作为对你们最初的纪念（季年）吧。

再过 178 天（七月十六日），你们的儿女将把你们的骨灰洒进嘉陵江，流入长江，汇进东海……

你们没有活到二十一世纪，你们自愿在它的门前停住。让新生命朝前走吧，你们把一切托付给他，用那稚嫩的小腿在大地上重新行走，哪怕坎坷依旧，颠沛依旧；用那牛犊般的眼睛去领略万象更新的天地，那怕风暴不住，阴霾不散！

亲爱的父亲、母亲，山河家园不就是这样生生不息，春夏秋冬不就是这样循环不已，日月星辰不就是这样周行不殆，神人世界不就是这样无始无终、天长地久吗？

归去来兮，父亲、母亲！

1999 年 12 月 2 日重庆

此文于 2006 年 05 月 15 日做了修改

返本開新：新儒家

余英时的意义：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王康、陈奎德访谈录(注 1)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时间：2007 年 1 月 26 日

地点：中国大陆抗战陪都重庆/美国首都华盛顿

采访人：北明獨立撰稿人

被采访人：王康重庆民间学人、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领衔人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大陆中国文化精神邃衰剧歇中睽违已久的好消息

北明：

王康先生，作为中国独立的民间学人，也作为儒学大师唐君毅的后人（外甥），请您先谈一谈，当听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您脑子里都出现些什么想法？

王康：

虽然余先生获克鲁格大奖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但是至今我还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欣慰。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我们睽违已久的、盼望多时的、姗姗迟来但是正是时候的重大的好消息。可以说是 1919 年以来，尤其是 1949 年以来，1957 年、1966 年、1989 年以来，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攸关中国精神文化和历史命运的重大消息。对余先生个人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卓越评论家、也作为中国社会政治演变的忠诚的观察家的国际性的认可。无论就学术成就，还是道德人品，他都当之无愧，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对于中国思想界、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大好消息。

北明：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消息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研究如此重要。

王康：

尽管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大国，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趋势、可能性都存在，都在表演、互相竞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化一下：对中

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 1949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同时，整个中国民族，尤其民间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复活，正在汇聚成一股股湍急的潮流。这两种倾向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余先生获得人文和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意识的重建，也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鼓励、认同。

北明：奎德先生，你的看法？

陈奎德：

刚才王康先生说得很好。他从中国国内的视角来观察余先生的得奖，看到余先生得奖在国史上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非常重要。

当然余先生是受到两方面影响的。特别是在 1950 年，从中国大陆出走，那时他 20 岁。1950 年到香港，拜钱穆先生为师，受到很深的熏陶，然后又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受业于极有学品的杨联陞教授，并获得广泛的西方学术训练与熏陶。所以说他获奖具有多重意义。刚才王先生说了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另外，从国际学术界的观点来看，像美国所谓的中国学，就是所谓 Chinese

Study，还有缘自欧洲的“汉学”传统，

Sinology，这样一个传统，还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国学”，余先生可以说在这三个学界中都是完全打通的。余先生作为能够打通三界，而且远远超越这三个传统的学者，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他得到美国国会这么一个大奖，刚才王康先生已经说了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说明他已经得到了西方的、美国的史学界、人文学界的相当高的尊重和重视，比过去更大的尊重和重视。大家知道，中国学者过去在西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有很多成就。但是，一般来说，客观上是被学界主流认可为是所谓地域研究。“中国学”，就是所谓地域研究的学科，而不是西方主流核心的人文学术传统。而现在，我们刚说了，他打通三界，更进一步，得到了主流的西方史学界、人文学界这

样高的荣誉，就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这样一位卓越学者，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界相当高的认同，进入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它是在这样广阔的学术视野范围内提升了中国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国历史的地位，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提升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在中国文明连绵不断，但现在处于深刻危机的情况下，余先生这个得奖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从国际学术的视野来看，他的得奖也说明了，“东亚研究”也好，“中国研究”也好，“汉学”也好，“国学”也好，都正式地进入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世界意义：关于“轴心时代”，关于文明前景

北明：

好。王康先生，我想把二位的话题继续展开一下，谈得具体一点。先请王康先生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在 49 年之后的断层现象，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研读余先生著作，也研究他学术发展脉络和个人成长背景，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王康：

我还是继续接着奎德先生的观点说几句。国际背景、自由主义传统对余先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想继续借用余先生一个概念，他有篇文章叫做《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余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希腊的所谓理性精神、科学思想和希伯来的信仰和启示性，构成西方内部一种紧张和冲突。那么，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之后到 18、19 世纪，在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里，又发生了几乎不可避免的深刻的变异。这种内在冲突和紧张关系在时空演变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和非西方国家的帝国传统、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结合成新的变种。到了二十世纪，又与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强化和权力相互渗透、激荡，演变成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种极权轴心，一度成为具有压倒力量的世界性思潮——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余先生指出，近代西方文化在两、三百年当中，基本上主宰了世界，其他的文化包括完成了轴心突破的印度、中国和近东，都淹没在它的洪流之下。而 19 世纪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更是宗教与科学的矛盾混合体，它们特别有吸引力，也可以说是现代方案中最后一个版本。非西方地区的知识人有的为它的宗教狂热，所谓“革命”所吸引，有的为它的科学预断，所谓“历史决定论”所吸引，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直到苏联解体，这个现代方案才真正引起不少人的反思。

我想接着余先生这个概念来说，现在整个世界是否正走向所谓第三个轴心时代？冷战终结之后，整个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文明整合。基本结构应该是世界几大文明的主流价值，正面的遇合和交融。其中非常有希望的趋势，是儒家为主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明之间的对话。但是，我们现在很不幸地止步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虽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苏联 74 年血流成河的历史过去了，但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最大的一个变种、第二个轴心时代最邪恶最怪异、也最强悍的版本——毛泽东主义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僵尸，“冷战”、甚至“内战”，从思维到制度在中国都还有很深的土壤。所谓第二个轴心时代，由西方传来的文明内在冲突所导致的中国现代悲剧的巨大惯性依然存在。前苏联的一些先知们，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分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物理奖、和平奖。西方这些授奖当然有其价值取向，但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人类命运的感通性。它表明，人类命运、苦难、光荣、史命是不可分割的。前苏联的存在不仅是苏联人民要承受的灾难，也是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的共同负担。中国同样如此。虽然余先生早就是美国籍的学者，但他毕生致力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演变，也早已成为他的主要观察对象。对他的评价、敬意，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人类精神统一性的一种表达。余先生获奖的国际性启示，除了与前述前苏联先知们的世界性意义相同、以精神和学术的力量解释和消解中国现代极权主义的特殊危害和特殊苦难外，还因为他所研究并抱以极大同情和希望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更具正面意义。正如他在受奖辞的结尾所申言的：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他今天更相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主流之“道”，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想再补充这一点。

陈奎德：

我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重叠特性就是：二者都赋有普世主义的性格。它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同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绝对“不可通约”是大异其趣的。这是我们对这两大文明寄予信心的基点。

王康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大的概念，就是关于第二次或第三次轴心时代（北明：第三次轴心时代）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要进行仔细的考究。因为从古代“轴心突

破”跳到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西方文明弥漫全球的“现代化”，后者是否可称为“第二个轴心时代”，各方尚有争议。毕竟所谓“第二个轴心时代”仍然是第一次“轴心突破”的两个文化（希腊与希伯来）相互混合、冲突的结果，即它们仍是第一轴心突破的派生产物，其原创性远不及第一轴心时代。西方文明的所谓“两希”（希腊和希伯来）因素的内在张力，确实是西方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推力，同时也是现代某些重大灾难的源泉。二者之间内在的紧张、竞争，二者皆拥有的“外向超越”特征，使得西方文化有种极强大的往前滚动的内在动力，这个内在动力把文明不断地往前推进。这种内在的紧张，好也罢，坏也罢，现实就是这样，它确实推动了文化的不断更新，同时也导致了不少的灾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耶非耶，我们很难作价值评判。不过，马列毛的乌托邦想像只是近代西方文明弥漫全球的这一历史时期中间的一段插曲，很快就将成过眼云烟，难于把它与“轴心时代”相提并论。所以，在共产主义退潮后是否正在走向“第三次轴心时代”，目前下判断恐怕还为时过早。

但无可怀疑的，我们现在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代，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整个共产主义在主体方面崩解以后，确实面临一个文明走向的问题。但据我看来，所谓全球性的现代化，现正处于中程，还有相当长的路可走；而其歧路——马列毛体制，它的旗帜还在中国飘扬，在亚洲也还残存着共产主义残余，而且它还不完全是一个纯粹从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残余，它还包括了一些过去中国传统中阴暗面的残余，所以改变起来就相当困难。

余先生在相当早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点，而且非常努力地在发掘中国文化正面的价值。他的文化认同，如王康先生说的，余先生虽是美国籍，但是他一直反反复复强调，他说：我的文化认同当然是中国文化认同，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至死都是这样。他在发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包括他在整个的史学研究中，对中国历史进行非常清晰的梳理，在中国文化的道统上，在世界文化的演进和国际学术演进中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我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不揣冒昧地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三位可以并提的杰出学者，即三方文化重镇：胡适先生、陈寅恪先生和比他们晚一辈的余英时先生，他们确实在二十世纪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遭受如此重大的摧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主体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中国文化成了一个游魂！这样一种情况下，有这三位学者在，文化命脉就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且这三位学者还

不光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道统中生长出来的，（这当然是基本的方面）同时也和主流的世界文明、西方文明有相当深的交流，所以说他们包容了两种主要的文化要素。你说的轴心时代，两三千年演变至今，在现在，无庸讳言，全球占主流的虽然仍是希腊与希伯来混融互动流变出来的西方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同时也开始复兴、崛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位学者在二十世纪的艰难时世，“文起数代之衰”，振衰起弊，存亡继绝，抵抗滔滔浊浪，非凡地凸显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由于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互相交融，这就有可能熔融形塑成一种更新的更有魅力的文化形态，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呈现。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余英时先生正是中西交汇的典范。有鉴于此，人们称余先生为“儒家自由主义”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内在理据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关头，余先生得到这个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表明中国文明恐怕不是像我们过去想像的那么悲观，不会逐渐淹没在尘土之中，不会在和其他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被掩埋、熄灭，逐渐地丧失其自身形态。事实上，一个复兴和再创的历史机会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确实没有理由过度悲观了，新的契机已经升起。

本土意义

1，继绝存亡，接续“新亚精神”

北明：

王康先生，您对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以及余英时和他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在西方获奖的意义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回应？还是说您允许我提个问题？

王康：

我完全赞成奎德兄的高见，我是真心实意的，这种看法，出于奎德兄之口尤其令人振奋。就余英时先生来说，我觉得他的学术研究和他的真正人生理想起点，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方死方生的年代，就在被扫庭除穴同时又在很微妙的绝境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个刹那间——1949 年。

我们都知道，广义来说，余先生也是一个流亡者（陈奎德：他自己也这样说），他的父亲也一样，是两代人。新亚书院（后来新亚研究所）应该是余先生最早的一个学术起点。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因为余先生的学术发展，除了杨联陞先生，钱宾四先生是更早的一位。而钱穆先生在香港，所谓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文化绝境之中，和

几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办起新亚书院，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奇迹。这些书生们！每当看到钱穆先生写的歌，我都无限感慨，歌词是：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在乱离中，在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骨，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锈，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进，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注 2）(北明插：不光是您感慨。前两礼拜的时候，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一批朋友在林培瑞家为余先生祝贺他得奖，唱的这支歌，曲子正好没有这第三段，没法唱。余先生听了之后，特别提到这第三段，他还背了两句："手空空，无一物……"。您接着讲）新亚书院虽然非常穷困，教授们没有工薪，学生们也缴不起学费，但是有一批有中国文化理想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传统的冬烘先生，很多人都是西方留学回来的，包括余先生父亲余协中，张丕介是德国的经济学博士，杨汝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孙祁寿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赵冰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除了我的大舅唐君毅和钱穆先生没有留过洋，绝大多数都是在欧美、日本留过学的。新亚书院的校训是：上溯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的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唐君毅先生曾在第一届毕业会上（余先生当时也可能在场），在《新亚书院的原始精神》的演讲中说道，新亚书院是钱宾四先生和几位手无寸的书生们合力创办的，只是中国大陆沉沦以后，炎黄子孙流亡海外者，想对中国文化尽一点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的责任。刚才奎德兄所说，我是赞成的。余先生五十多年筚路褴褛的治学和人生过程，就是从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命运发生大的断裂、大的悲剧之中孕育出来的。补充一点，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旨趣"中指出：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斗争之下，希望中国青年以发扬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与和平思想为己任，达到救己救世之目标，既知祖国之可爱，亦知世界大同之可贵。余先生正是在新亚书院求学期间写了《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和《〈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余先生称那是自己"年少好事"之作，但已经显示出其治学基本风范，独立观察，厌恶"攘窃"，重考据，重史家风骨。也正是经新亚研究所推荐，余先生于 1955 年来到哈佛燕京学社，六十年代余先生又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2000 年，余先生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文化既悠久又博大，在它遇到空前危机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孤臣孽子"拍案而起，为它的存亡继续作奋不顾身的努力。钱、唐诸先生结合在新亚书

院这一独特的旗帜之下是历史的偶然，但是 1949 年前后不甘随波逐流的学人挺身而出，为中国文化作护法，则是久已潜在的必然。我们这些学生自然够不上中国文化的“孤臣孽子”，但我们至少也懂得文化与暴力不能并存的道理，否则便不至于流亡了。50 年前钱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曾根据毕生的读书心得，发挥了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深识卓论。怎样在他们的辉煌业绩的启示之下，面对着 21 世纪的新问题，继续他们的未竟之功，这正是新亚人无可推卸的一种责任。今天看来，新亚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精神，五十多年后，终于由它的第一届毕业生余英时先生带到了西方，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存亡继绝、返本开新”的艰难文化使命，终于取得了一次历史性、世界性的突破。这真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贞下起元”!

陈奎德：

余先生本人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我之所以不是那么悲观，正如刚才王康先生所言，而那天晚上余先生也专门谈到，当年钱穆先生主持的新亚书院根本就没有钱，一处喧闹的市区的一幢旧屋的三、四层楼上，街上的喧闹声和楼上的读书声相映成趣，有点像中国过去所谓“大隐隐于市”的场景。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没有钱，只有几间屋子，房屋又破旧，而余先生与钱先生胼手胝足在教室里随时而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恰恰出了大学问家，点起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火苗。从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粒火种，在大陆沉陷以后，流落到了香港，后来再慢慢薪传到海外。这样的书院，有其丰富的文化蕴涵。这使我想到现代教育制度和形式，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特别是宋明的书院制度未必都应当被放进博物馆，它也许还有其生命力，它的形态和功能恐怕也值得仔细研究。在中国大陆目前大学被官方完全掌控的形势下，某些方面某些区域某些学者与社团创建或恢复一些书院，部分复兴这一教育形态，我觉得恐怕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自有它的特色，它的传承方式是不是就要完全照现代的西方大学模式传承（当然这是现代最重要的传承方式），而按照新亚书院的传承方式发扬的中国文化，恐怕更富于其原汁原味的韵味。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在当年香港的一段生活，不光是学问上，而且在文化精神的传承上，火种开始蔓延，开始扩展开来，在中国文化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在它几乎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这样起来了，那确实是一幅非常动人的文化景观！

本土意义

2，返本开新，彰显儒教优势

（涉猎话题：八十年代文化热、道统与正统、政治儒家与精神儒家、秦始皇—毛泽东专制传统和孔夫子—余英时精神谱系、基督教历史与儒教历史比较、谁应当对中国极权命运负责？余英时学术思想潜流）

北明：

我想，我的听众，普通的听众、知识分子听众，希望对余先生的贡献学术有更具体的了解，所以我想提一个重要问题。八十年代时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热”，后来又有了《河殇》这部政论片。我们知道，“文化热”主旨是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海洋文明。《河殇》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败主要是孔子和儒学的影响，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接受西方的人文传统，摈弃中国传统的封闭型文化。这次余先生获奖，我们知道，他的学术方向主要是中国思想史，他非常强调儒家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之间的默契，他仔细地梳理儒学中人权观念和自由意识，多有文章问世。所以史学界很多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余先生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首次通过严格的史学方向，向中国思想界论证了为什么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造成现代中国衰微的基本原因；而且他指出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可以帮助中国完成文化和精神上的转型，他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未来的一种重要资源。请二位对这样一种说法作一个评价。

陈奎德：王康先生，请你先发表看法。

王康：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有一种基本的冲突和矛盾，或者一种基本分野，即世俗的专制权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即是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所代表的世俗专制权力，和孔子到现在一直延续到余英时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冲突。余先生可以说是这个精神谱系最新一名托命人，这个谱系无疑是从孔孟老庄开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维护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代表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他们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虽然李殴梵先生说余先生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而是一位逍遥派人士。但是我觉得余先生怀抱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中国世俗权力与精神谱系的冲突一直都存在，就在余先生获奖不久，就在同一个美国，在纽约，张艺谋和谭盾这两位所谓的艺术家，还在公开地颂扬秦始皇，据说还要闹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一点都

不奇怪，秦始皇从来没有变成博物馆的藏品，毛泽东的幽灵更在中国游荡。同样，孔子到余英时的精神谱系同样也顽强地存在于中国。在此意义上，余先生所继承的，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英勇的精神救世的传统。

陈奎德：这就是余先生生平时谈到的，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紧张关系。所谓道统，在余先生受奖词里所讲的“道”是广义的，它涵括了儒家、道家等等所论述的“道”，可以作为先秦诸子乃至中国文化的共同基地。而就儒家简括来讲，孔子象征的“道统”，它也有一条基本线索：尧传舜，舜传禹，至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经过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一以贯之，而在当代，就是胡适、陈寅恪和余英时三重镇了。当然，他们三位所继承的，已经不纯然是儒家道统了，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中国文化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后发展出来的现代道统。虽然这一条线索从古至今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和摧残，但屡仆屡起，一直绵延下来成为精神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道统，这是源远流长的。余先生在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就专门谈到道统问题，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特别谈到“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认为目前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己道统力量，对政统有相当制衡作用的时代。

这点，我要特别谈一下，中国历史中，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里，正如余先生所言，确实不像西方文化，最后慢慢自然演变出来一种非常严密而制度化的制衡方式，比如从英国等地发展起来的，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直到三权分立的制衡关系，也包括社会舆论所谓“第四种权力”的监督。当然，也可追溯中世纪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制衡关系。中国的政治体系确实没有这样明显的、形式化的制度化的制衡关系，但中国传统中确实有一种比较抽象的、特殊的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方式，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制衡关系。虽然道统常常是被政统、被皇权和世俗权力打压、摧残，（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事情很多，从汉代太学生到后来明代东林党人），但中国历史上道统对政统的制衡力量、批判力量还是一直存在，虽然它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抽象，不是形式化的，不是法治化的，而是道义上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余先在挖掘这个传统中，特别把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对比，认为中国的“士”有非常典型的、包括现代西方也包括俄罗斯从十七、十八世纪中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传统，（其实西方还比较晚些）。余先生认为，“士”这个概念、这个传统，这种精神制

衡的作用，在中国已相当久远。他指出，西方学人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与中国的“士”极其相似。而西方学人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是十八世纪才开始的，但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且中国的士人更强调内省的力量和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这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学术文化界都有相当大的震撼力量和影响。我想，余先生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后来还有好几部著作，例如他讨论儒家近代商业精神的发展和中国现在的经济改制之间，存在紧密的精神上的关联。这些著作进入大陆后，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方面，我想王康先生有非常深切的感受。

北明：

奎德先生，我打断一下。你说关于“士”的概念，道统对政统的影响，余先生在他著作中作了很多论述。可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实际上看不到这种影响。这导致不少独立知识分子对儒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例如八九年至今被当局剥夺了发言权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包遵信先生，至今看法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代表了至少八十年前后很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恰恰是政治儒学（即道统）支持了当今社会的政统，导致了这种政统在中国横行霸道，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你对此怎么看？

陈奎德：包先生代表当时极端反传统一派的意见。大家知道，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到九十年代后，或到了海外后，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海外各方面接触后，大家对传统的看法确实不像当年那样简单化了。无疑，中国的政治传统，更广泛地说，中国的政治文化，儒学是有相当的影响，这说起来话相当长，我只能简单地说一句。包括余先生和其他中国学者，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皇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操作方式里，是否有儒学的支撑？不能说没有，在我看，主要在缔造和维护等级秩序（三纲五常为重要特征）方面，以及忠君观念上有支撑。但是儒学更重要的方面，大家以前很少发掘的，基本没有谈到的，它是作为社会文化、社会精神现象，对帝王应该如何行事、政府应该如何行事，它有一个“应然”的标准。这个“应然”的标准对帝王有时具有潜在的、有时是相当明显的制衡作用，这一点过去没有谈到。所以，余先生特别谈到，（包括钱穆先生，他研究中国政治文化非常有成就，有相当多的专著），这方面有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作为精神层面的道统，对政统确实有制衡作用；但是对建构帝王政治体系，也有作用。就像西方，包括宗教、包括西方基督教，它和政治体系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教会体系和政权体系之间完全的对立就能解释的。二者之间有渗透或者有互相支援的部分，但确实也有

相当大的对峙和制衡部份。过去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中间，只看到一面而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只看到儒家对皇权政治系统的建构作用方面，没有看到其制衡作用的这一方面。这一面在现代表现得特别明显，余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包括钱穆先生，也包括 1958 年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的王康先生的舅舅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张君劢先生、徐复观先生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就认为中国文化对政治的影响，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有的学者（我们同不同意且不说），提出要把政治化的儒家和精神化的心性化的具有制衡力量的儒家区分开来，而且把儒学内容进行清理和剥离。我想王康先生你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研究，因为你对儒学的研究也很多，你当有你的看法。

王

康：我想稍微联系一下基督教来比较，基督教也有漫长的一千年的中世纪，那是政教合一啊！它在历史上的政治纪录不光彩的地方多得很，甚至超过了中国儒家道统和政统的关系，那可是整个一千年的黑暗时代。关于中世纪，现代学者即使有了新的研究，但是政教合一这一基本特点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基督教走向现实权力的过程中，肯定是不光彩的。而儒家再怎么说，从孔子、孟子到康、梁，他们只是想用其人文主义和他们的人道、王道的思想来影响帝王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无原则地变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始终坚持的是道统的精神这一层面，始终想用它来制衡、影响和超越政统，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思想史上已经是一个很独特的、甚至很了不起的现象。

至于 49 年以后，“文革”以后，一帮知识分子，包括某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始终在《河殇》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最根本的方面视而不见，那是因为在史无前例的文化专制统治下，或许从来就没有见过，或者受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影响太深，坚持所谓“存在决定精神”的思维，不能直面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最大变局、不能直面被外来激进哲学征服的宿命性悲剧，不敢直面世界近现代重大事件对中国发生的重大的恶性的影响，甚至于上升为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的严峻现实。

陈奎德：

说到中国儒家和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这中间还需要非常仔细的辨析。为什么毛泽东到文革后期要提所谓的“儒法斗争”？所谓“儒法之争”，实际上

涉及到中国古代帝王行事方式，表面上以儒家为正统，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大家知道，是“霸王道杂之”，他们实际行事主要都是以法家的权术为基本统治方式，而不是以儒家、以王道为主的统治方式。这是大家仔细梳理历史时看得很清楚的。帝王行为方式基本上不是儒家主张的一套，和儒家的主张离得很远。但是表面上，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儒家在精神上公开提倡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帝王之术中，并没有呈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法家，起了什么作用？中国历史上，汉代以后，帝王术和儒家的复杂关系，我觉得过去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理解或者处理得太简单化了，对整个的历史图景看得并不细致清楚。这一点钱穆先生、余先生都有非常清晰、非常深入的研究，有很多专著梳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钱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余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等多部著作中作了客观公允的评析。大家如果仔细梳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恐怕和过去八十年代“文化热”时得出的结论，会有相当重要的修正。

北明：王康先生？

王康：毛泽东这个人有时非常坦率（尤其在大权在握时），他曾不断提到（尤其在文革时期，在他晚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们谁都知道，他其实只能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两重身份，他是合二而一的混合物。中国近、现代以来，尤其四九年以来巨大的悲剧，中国传统不是负不负责任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法负责任的问题。在现在信息化时代，这个道理应该说非常简单。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日本入侵中国，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有后来那些变异。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端也许还存在，但是会逐渐地在与现代西方主流正脉文化相融合的过程里自行升华和超越。中国现代的不幸，就在于东方和西方最黑暗最专制的力量合流了，它们成了“集大成者”，而东西方的主流文化，照我看来，就是孔子代表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始终失之交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见面……

陈奎德：余先生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特别发掘了近代以来的儒家人物在向西方取经所做出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特别向西方主流文明学习的人物，提倡西方主流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在中国承担桥梁作用的，其实都是儒家学者。他举了很多的学者为例，对个案进行研究，如对王韬等人的研究。所有这些亲近和拥抱西方文化现代基本价值的人，都是儒家学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他认为，这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所谓严重的文化冲突，而是一种颇为亲近的关系。后来中国知识界主体对西方主流价值有这么亲近的感觉，实际上是与部分儒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其中存在一个基本趋向，这个基本趋向是余先生代表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是不是占主流。我还很难判断，因为我不在国内，我出来到美国已经十七、八年了。不过，因为我出中国后有十三年一直在普林斯顿，在学社这里负责一些工作。据我自己的亲身接触的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很多国内的学者，比较优秀的学者，特别是民间有一定声望的学者，绝大多我的新老朋友的中国学者们，访美期间几乎都向我表达了和余先生交流和问学的意愿，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与余先生交流。我有机会接触大量学者，陪了很多人去见余先生，谈到各方面情况。我感到一股潜流，或者叫基本的潮流，余先生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他的文化影响、他的精神影响、他的学术影响，还是绵绵不断地在二十年间对中国大陆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将来会不会结出果子来，我相信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至于这果子会发展到什么形状，当然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就我亲身经历而言，我接待了这么多朋友，很多人都去和余先生交谈、交流学术、交换观点，共鸣处非常多，不同意见相当少，这非常令人惊讶。所以，余先生影响不是今天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我想他的影响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流变中会发酵，会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对此毫不怀疑。

中国情怀、独立人格

北明：

我们再谈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请你俩评价。就我知道，中国自由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界有一种意向，希望能够借助余先生获奖，请他回中国大陆，在大学里巡回讲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发挥一些影响。我作为委托传话人，把这些话很详细地传达给余先生了。余先生的反应我归纳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点，第一，他八九年后就有话在先，大致意思是，如果八九六四得不到正名，他绝对不回到中国大陆去；第二，他不愿意马上回到中国，他认为，学术和思想跟“热潮”没有关系，他不想成为某一个“文化热”或某种“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个人历来保持低调，这次也不例外。他还说，他同样谢绝了台湾一年多来的多次邀请，是因为同样的理由；第三，他回去一定要自由发言。但是发言之后，官方无论在他发言之前和之后，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干预。那么，在他走后，他担心给这些好心的朋友造成麻烦。请二位对余先生这个态度发表评

论。王先生先说吧。

王康：

余先生的精神，他的学术成就，他毕生的愿望，已经深深地降落在他的祖国。我和我的朋友们看了余先生的书都非常激动，不是作为一般的学术和历史书，而是有血有肉的思想。他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探讨，我们完全感受到余先生心中跳动的那些愤怒，那些痛苦，那些忧伤，完全不亚于我们。王蒙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无礼的话，说你们这些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人民尽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你们有资格谈中国问题吗？你们这些芝加哥和纽约和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加在一起，你们能够理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吗？，余先生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样说的，他说，像这样义正词严的话，我这样的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于死？”“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么多的美籍华人？王蒙文中那些美籍华人，显然都是 1949 年以后才出现的。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 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北明：王先生请您说一下余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

王康：就在“我的中国情怀”……

北明：不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王康：《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他说，尽管二十几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廓如故人民非”，他说“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反而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敢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是，说一些于己无益而又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诫而终不能绝”。北明，我想到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我想简单比较一下。

北明：您请。

王康：1922 年，由列宁直接下令，把一大批第一流的大知识分子驱逐出去，包括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和余先生都同样处于一种流亡状态，他说：每次想起俄国，我心里就渗出血来，我常常想念俄国，关于俄国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历史的断裂。在俄罗斯命运中，确实存在某种苦涩、特殊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于我只有在最后时候才能消解，我将在这种俄罗斯式的痛苦中死去。余先生当然比别尔嘉耶夫幸运，也许，我瞎猜，同样的痛苦。他们都是

在祖国文化沦丧的历史关口（中国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俄国是一千年文明的末世），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天生负载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作为祖国文化的托命人，他们怎么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国呢？当然愿意回来！

陈奎德：

刚才北明谈到余先生的三个原则，的确，余先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们要清楚地看到，现代共产主义政权对文明的摧毁，那是历史上各种专制主义、各种专制统治远远无法企及的。现代极权主义对文化的摧毁是与历史上的政权相当不同的。因此，如果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确实，余先生作为文化人、学者，他是无法回去的，包括像“六•四”这类血腥的杀人事件没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审判，或者说假装不知道，不谈及，回避这件事，像他这种学人是不能忍受的。跟历史上一般的专制统治不一样，现代极权主义对基本文化的摧毁，是历史上难以想像的。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根本没有想像到后来会成这样。所以留在大陆的很多人都后悔了，很人都扭曲了灵魂，当然不能怪他们。这种残酷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这种所谓“洗脑”，每个人要变换头脑，来适应政权，在所有历史上都难于见到。特别在中国像毛泽东那样的统治方式几乎见不到。所以，余先生要保持他的尊严，保持他自己的基本原则，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不反对别人，其他学者要做自己的事，愿意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原则，他有为公为私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我就不想多讲了。刚才北明所讲余先生的基本原则，还和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底气、这与他的基本道统的坚守是分不开的，这没有疑问，我个人是很理解的。在中国，倘若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恐怕是很难回去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一直和中国大陆知识界、文化界和一般大众在精神上有联系，这恐怕比国内一般人还要紧密和广泛得多。

史家优势：历史可为个人精神资源

北明：那天在聚会上，我记得他说，我们在认定了自己的价值之后就要坚持这个价值，在各位发表余教授获奖感怀之后，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谦虚。但是这也证明，他把认定的价值贯穿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当中，这是很多从事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很难做到的……

陈奎德：那当然。而且大家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中国的学者在中共毛泽东时代的高压下绝大多数没有能抵抗住。因为公有制的政权掌握了国民的全部饭

碗。倘不服从，基本就是剥夺你的生存的权利，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剥夺，它逼迫你在生命与尊严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一严酷的生死关口，多数人选择了生命，从而就丧失了尊严。对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其中不少人在 1949 之前蒋政权时期还是铮铮铁骨，敢于批判政治权势的，但那时并不涉及生死的抉择。因此，在生命与尊严不可兼得的毛时代，我们无权要求别人（选择尊严）做烈士。

但是，这种普遍被压服的情势确实也和中国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信念有关系，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中国在 1949 年以后，知识界对毛泽东施与他们的残酷迫害与侮辱，其反应是惨不忍睹的。多数的人格尊严纷纷地倒地，不堪回首。他们写了很多检讨，有些发表到了报章上。很多人在 1949 年之前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影响、有造诣的知识分子，不少在西方受过训练的著作等身者，几乎全部倒下，包括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贺麟、周谷城、周一良…...等等一大批人，都没办法，倒下去了，在精神上倒下去了。我说的是，除了有信仰支撑的基督徒等宗教界人士外，中国当年的那些文史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者大都倒下去了。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知识界确实也有极少数，特别是几位史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作为硕果仅存的大师，他撑住了。大家经常说，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确实历史这东西很奇怪，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很多其他学科的人包括很多哲学家、很多文学家、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学者、过去很有成就的人都被压下去了，卑微地跪下了，但是却有一两位历史学家却撑起来了，站住了。为什么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其他什么家撑起来了？这个历史感对人格的支撑起什么作用？它何以能透视古今不为权势所屈所惑，为什么？的确，透视古今的人会有一个对历史现象和现实的比较、一种博古通今之后的一种内在观照，一种感应，对当下的现实它可以拉开距离来看，可以知道当下的现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历史事件可作参照，它是和历史上有些时期相类似的。他知道这些不合理的状况不是永世长存的，而一定会在历史中淹没的。而其他学科学术训练出来的学者，其历史感觉就会相对薄弱一些、迟钝一些，容易把一些变故看作开天辟地的神圣事件，战战兢兢，顶礼膜拜。包括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或者诸如此类的这样一批人，容易因为 1949 年那种翻天覆地的感觉而被迷惑，加以整个三四十年代左倾思潮的泛滥，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毛泽东意识形态及其军队铺天盖地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而且那套意识形态，所谓马克思主义那套，在当时看起来，真是堂堂皇皇地象一个不可撼动的理论大厦似的，

不少人一是出于恐惧，一是出于叹服，努力自我说服，自我贬抑，结果完全被它征服了。他们中有不少人反躬自问，共产党这场胜利是如此辉煌，如此开天辟地，我过去所学所思所想确实是不是有问题了？而历史学家，起码有些少数的贯通古今、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没有受此迷惑，这中间恐怕有很深的道理。我想我将来会写一篇很长的研究论文来看看这中间是不是可以发掘出一些东西来。总之，我想讲的是，确实有些历史学家在这样重大的、恶浪滔天的情况下罕见地撑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精神现象。

北明：王先生，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味。而且奎德先生所指出的这个现象也确实是个独特现象，您身在大陆，有什么高见？

王康：

我补充一点点，还是余先生的思路。余先生历史研究中有两类人物，对于我们有永远的启示性。一类是文明集大成者，如孔子、朱熹，胡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上，也是一个集大成者。另一类就是所谓文化遗民，顾亭林、黄宗羲、方以智，以至柳如是，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历史悲剧和文化殉道精神的现代文化遗民陈寅恪先生。余先生曾经把相当大的感情和研究的重心放在陈寅恪身上。49 年之后陈寅恪先生不离开大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至少也曾经报着一种观望态度，甚至在观望之中还不免有几分期待。但是，余先生特别强调，他由史学训练而得来的批判精神，毕竟不允许他在任何政治力量面前放弃平生所坚持的原则。这句话刚才奎德兄说了，我们可以深长思之，为什么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有这种批判精神？他又提到，后来吴宓在 61 年在广州见到陈寅恪之后，说他思想和主张都“毫未改变”，与同一时代其他思想家比较，陈寅恪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地“固执”，连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两位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信仰和原则的大儒，都有一种方便、一种妥协，梁先生至少在最初两年内，曾经公开检讨“错误”，并且有限地承认中共领导的“正确”。熊十力还曾经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里把古代“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陈寅恪连这么一点“包涵”都没有。这三位都是特别有风骨的学者，比起来，陈寅恪作为史学家，他的理智眼光和批判精神，能够从更长程的眼光来看当下他所处的阶段，来路和去向看得更分明、更透彻。因比他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变、思想和主张绝不轻易改变。我们与其说陈寅恪先生比熊、梁更顽固、更保守，不如说是看惯了兴亡的史学家，毕竟不像一般哲学家、或者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容易流于乐观。从这一点来

看，余先生强调，陈先生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陈寅恪先生的史家遗产，不仅是道德方面的，所谓“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且拥有极冷静极深邃的理智力量，即一种“在历史中求历史教训”的精神和方法。

余先生曾特别指证，陈寅恪从 1949 年起始，便沉痛预感到，毛泽东一批中国历史的不肖子孙，必然以压倒思想、摧残文化为能事，且也必会异常酷烈，但陈先生“固熟读史乘之人”，文化专制纵可奏效于一时，却绝不能行之于久远。因为陈寅恪先生早已“家国兴亡衰痛之情感，能融化贯彻”，而能殉身以凭吊兴亡，独对虎狼，余先生指出，陈寅恪这位“老史学家之信念之坚为何如也”，质言之，他深信，最后的法则逃不过杜少陵的不朽诗句：余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陈奎德：

这一点我想，历史学家的这种通感非常重要。这个通感引导他的理智，所以人说读史使人明智。这一点看起来，特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有相当典型意义的。因为遍览中国文明史，多次战乱，朝代转换，家国兴亡。包括元朝人对宋文明的摧毁，包括清兵入关……，山河变色,人世沧桑，在各种各样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史家对这些变局都烂熟于心，不免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非常深远的透视，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这种情况下各种人会怎样表现，他们看遍了历史关头人们的种种表演，更知道未来人们会对各类人做何评价、审判，从而对自己行为及其后果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这一点，就不像只会在书斋里对形而上体系殚精竭虑穷究天人之际这样一些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历史通感，其抗拒暴虐的精神力量的大小是很不相同的，他们深知这一切暴虐的热病终将是会过去的。

北明：

你可以把它叫做力量来源，也可以把它叫做通感。我觉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而做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种局限（陈奎德插：当下的现实环境）。这种资源，也可以说是精神资源，虽然源自历史，但是经过史学家与当今的比较，那些通古而达今的认知可以凝聚成一种心理方式，变成史家的一种精神资源。这种资源会源源不断地给他力量，使他超越现在的孤独、直面最悲惨的现实，导致他借助历史的杠杆，抵挡对眼前的悲惨结局作出人所共有的直观的反应，比方说软弱、屈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们的资源力量非

常强大，他不仅有西方的资源，更重要的有历史见证和历史教训。他们脚站在当下，但是凭借历史知识，他们精神连通过去，眼睛于是看得见未来，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哪怕是最孤独的选择，他们知道那是人类历史的主流正脉的选择。所以历史学家的这个资源和标准，与哲学家不同。哲学家在黑暗中，点燃的自己的手臂，照亮的是自己的周围，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不免仍然彷徨；史学家在黑暗中，用他的历史知识点燃的是通古而达今的灯火，看见的是深身后的凭籍，前方的曙光。他不大会再彷徨。不肯去国的陈寅恪就是这样。离乱中出国的余英时也一样。

王康：

当然，陈寅恪也有他强烈的个体特性。陈家一门忠烈，三世报国，陈寅恪从来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应该说他是有很深遂的中国历史意识、很深遂的中国形而上的尤其是在道德上怎么固守所谓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的意识。他不仅仅是一个通常的历史学家，尤其不是一个学问家的历史学家，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道德加上西方主流文明精髓（他在西方长期留学），这样综合起来的结果。他不去邦国，留在大陆，所受的苦难和民族文化的悲剧，太多的原因共同促成陈寅恪先生文化悲剧英雄的命运，他的道路不一定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具有久远的典范象征。陈寅恪不是普通的文化遗民，不是改姓换代附着强烈政治色素的遗老，而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伟大文化护法者。奎德兄刚才说，历史研究给人更宽广的视野，使人在历史颠簸当中、天翻地覆的时候，站稳自己的脚跟，确实有独特的作用，陈寅恪先生的存在，实在是我们时代之大幸，千载以后，典型犹存。

陈奎德：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和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有些基本本性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将来可以有另外的专述来讲吧。

比较俄罗斯

北明：关于余英时获奖，您二位还什么重要的话题补充？

陈奎德：王康先生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俄国的思想史、俄国近代的思想史？这方面你有些体会，我想就是关于俄国的近代思想史，俄国知识分子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俄国知识分子确实在有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他们有很多也是流亡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的包括和现在余先生的获奖恐怕中间也有些启示意义。

王康：刚才提到别尔嘉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被驱

逐或者主动流亡到了西方，在柏林、在巴黎，他们共同推动了重新复兴俄罗斯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事业。现在看起来，也是俄罗斯文化和人类文化思想上的奇观。苏联解体之后，九十多岁的苏联历史大家利哈乔夫，他提请世界注意一种事象，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没有给人类带来不能承受的灾难！他的前提是，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恶帝国的解体，肯定会引起世界性的震荡。它不仅没有引起震荡，在世界整体文明进程中，俄罗斯总体上起到了十分负责、十分正面的作用，一个新生的俄罗斯，也正在复兴。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俄国的复兴和世界的希望，都受惠于俄罗斯这帮知识分子，他们在海外所推动和建立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确实，苏联解体之后，别尔嘉耶夫、洛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大量地在俄国出版，虽然七十年间，俄国几代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别尔嘉耶夫曾说，我名气非常大，我在欧洲、美洲甚至在亚洲和澳州都很有名气，但是只有一个国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国——俄国。但这位俄国二十世纪的赫尔岑，还是深信，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日子将会到来，因为俄罗斯人民的普世主义和弥塞亚主义，最后必将抛弃一切导致奴役和异化的客体化的诱惑和强迫。他虽然炽烈地爱俄国，但他绝不能接受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接受俄罗斯共产极权主义和帝国意识。他认为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用爱对抗恨，以自由对抗暴政。74 年之后，能够让俄国在分崩离析的过程里没有危害世界，而且在精神上、在灵魂上能够站住脚的，现在看起来，这些知识分子确实起了特殊的作用。这和香港那个小小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以及海外知识分子更宽广的存在，有同工异曲之妙。

北明：王康先生您刚才说到推动复兴，复兴俄国的宗教、文化、哲学。您说是复兴，我觉得用发展更合适些。因为这帮知识分子出去以后，实际是把东正教的传统带出去，而且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自由精神结合起来，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为坐标，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反思，包括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的分析、反思 1917 年革命产生的思想来路，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去向。同时，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西方先进思想成果，某种程度上创立了俄国新精神宗教哲学。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尔嘉耶夫，这个家伙对俄罗斯东正教影响下的民族性格看分析的非常透彻。他指出俄罗斯民族注重精神生活、不倦地探索上帝和真理的天性，救赎意识，拥抱苦难的特征，但是他同时看到这种性格的另一方面，就是消极怠惰于现实，人权意

识淡漠，在现实层面逆来顺受。他指出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二重性格，他深刻地总结说：斯拉夫主义者们把宗教良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留给俄罗斯人民，而把余下的全部生活，现实生活，都放手留给俄罗斯的暴君去主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接受了基督教积极入世的精神，引进了人权思想，平等观念和抗争意识。他们并没有放弃天国的理想和精神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时将爱扩展到现实扩展到个人，扩展到对人性,人权的尊重。弗兰克就指出，在基督教里，真理与人生旅途是一致的，真理就活在生命的最深处，他说人只有自愿踏上自己选择的的道路时，真理才能实现。真理就是爱，爱就是自由。这样，俄罗斯的东正教就从放弃现实回到了正视现实，干预改造现实和关注现实人生层面。这一新的资源，既可以保证俄罗斯在深重的苦难中巍然屹立，也足以抵挡他们那些“多余的人”在现实中的软弱。这是他们受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熏陶之后，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的一场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的反省，同时深入到这种干预现实的手段是否合乎人性。而且正是因为有了人这个现实的坐标，他们有能力反省以人民福祉的名义牺牲个体生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普遍的虚无主义。这批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识人在东正教救世主义基础上，嫁接西方基督教精神和民主人权思想以及自由主义传统，创建了俄罗斯新宗教哲学。这种精神资源，在苏联社会主义倒台之后，立即接续到那片土地，成为那个民族重新建构新社会的巨大的思想能源。这是西方人文精神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典型。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早先的俄罗斯哲学史，如俄罗斯的哲学家洛斯基，他的哲学史里面申明的，白银时代这一批宗教哲学家在当时并无太大建树。抽象思辩能力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特长。在白银时代之前，罗斯哲学不很发达。而二十世纪一批知识人流亡之后，直接接触西方哲学和宗教，他们在巴黎、布拉格等地建立了俄国东正教神学院，几名重要知识分子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都是在那里任神学教授。认识论上，他们发展了直觉主义，这是斯拉夫人的本土特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思想与西方文化的直接接壤，是他们能够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复兴——或者我宁愿说——发展俄国传统的前提。

王康：

上接奥加辽夫、赫尔岑、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乔民文化的传统，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从此就接触了西方大量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还是俄国东正教，在此基础上了发展出俄国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这个

哲学不纯粹是西方思辩哲学和抽象哲学，它始终是一个有浓厚东政教宗教背景、和俄罗斯命运休戚相关的那种意义上又高度唯心主义、高度内在化、内在体验的哲学体系。别尔嘉耶夫 1947 年获得剑桥大学给他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这个神学学位在法学和科学之上，授奖仪式非常隆重（我想跟余先生都差不多了），在非常隆重的中世纪风格里进行，穿着红色礼服，戴上天鹅绒的帽子，获得法学荣誉博士的英国外交大臣和印度总督都站在后边；同时他接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他成为了候选人。回到我最初提到的，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在命运上有某种通感性，别尔嘉耶夫他们流亡到西方，被西方接纳，然后接受了很多西方资源，但他们要解决的仍然是俄罗斯的命运问题、仍然是俄罗斯精神和灵魂的出路问题。

北明：是，这一点我完全认同。

陈奎德：

这点，恐怕俄国出亡的一批知识分子，确实是和俄国历史上的所谓的贵族传统有很深的精神联系，这方面中国是比较匮乏的。贵族精英，俄国确实有一批文化贵族和整个西方实际上打成一片。刚才说到的屠格涅夫也好，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虽然都不一定都出国，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是整个欧洲上流社会的一部分。除了和俄国的东正教的紧密的精神联系外，俄国的贵族传统从十二月党以来，又滋生了民粹主义精神，深入大下层民众中，从而大量吸取了俄罗斯的”地气“，于是该贵族色彩获得了某种道德上光环，使之能义无反顾的投身于他们认定为正确的精神活动中。

王康：

还可以比较的是，他们（余先生和别尔嘉耶夫）都是真正透识人类本性的先知，包括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人性。别尔嘉耶夫曾经是西欧主要文化、艺术和宗教中心的座上客，享有盛名，他却多次强调，他决不能也决不想感觉自己是“有威望和受景仰的人”，他不是生活的教师，不是青少年的偶像，更不是祖国的精神之父。他们都远离现实政治，崇尚个人自由，藐视任何强权，同时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又远比一切权势人物，更真切而深刻地关注人的命运。余先生获奖后仍然强调，他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他还引用匹夫匹妇都耳熟能详的古话，概括他一生的理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他说，这一向往于今更为迫切。所谓“有自由的秩序，或曰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

不必讳言，余先生这次获奖，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和发展趋势），以及对西方的态度，有某种关系。前苏联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俄罗斯精神和文化的命运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二十世纪俄国知识界实际上承担了比十九世纪的前辈们更艰难更沉重也更有希望的使命，从而获得西方的关注和敬意。余先生这次获奖，来自同样的关切和寄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奖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而是攸关现世存在命运和精神演变的重要信号，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雨果曾说，世界历史上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享有以人物命名时代的特权。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国家统治者来命名时代的先例。其实，中国曾在两代人时间里，被称“毛泽东时代”，现在，我们可以呼应那位伟大的法国人，称我们的时代为“余英时时代”。

余英时先生身体、精神、创造力都处于一名学人的巅峰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余先生将以其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洞察力和一以贯之的济世理想，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的遇合融通、尤其为中华文化的悲壮复兴，取得新成就，止于至善，臻于至境。

北明：谢谢二位。

注 1，本采访已经受访人过目并略作修改和充实；文内大、小标题为北明所加。

注 2，新亚校歌歌词：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一元初透，魂兮归来

——写在唐君毅哲学著述反哺中国之际

1959 年 12 月 26 日，大舅唐君毅五十初度。阿婆客居姑苏，与最怜爱最挂念的长子分别已近十年。母子情笃孺慕，灵心款通。百感交集中，阿婆写下四言长句二首。

《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

融融冬日，暖如春画。漠漠大地，孕育灵秀。吾儿降生，一元初透。东君与立，旧岁告休。恭元春喜，贺粥米酒。煌煌华堂，宴集亲友。敬献鲜花，旋奉佛手。烛燃龙凤，香喷金兽。爆竹于庭，磬鼓三奏。肃肃威仪，依次荐羞。童稚欢腾，玩狮舞虬。儿生逢辰，因缘巧遘。纷其内美，得天独厚。名儿曰毅，坚尔信受。浴儿芳香，衣儿文绣。重以修能，人天共佑。勤斯敏斯，匪伊邂逅。三岁免怀，忘其美丑。喜弄文墨，凡百好求。趋庭问字，意义必究。憨态孜孜，恐落人后。阿舅笑曰，此儿似猴。

爰及于今，五十春秋。际此初度，莫负良由。欢携稚子，偕同佳偶。幸得英才，便邀朋俦。相与挈壶，载越层邱。太平山顶，碧草油油。海湾环抱，跨海东头。席地闲谈，弦管悠悠。生生之意，绿通平畴。勉哉吾儿，厥德允攸。儿虽五十，面容尚幼。再过五十，母为儿寿。

《代至恂慈宁诸儿祝长兄寿》

一树五枝，一枝独秀。花叶纷披，掩映长流。长流伊始，发源亚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长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无咎。

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巍巍五岳，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责在华胄。温温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实宇宙。敬斯良辰，祝兄万寿。①

唐氏一千数百万言哲学著述，始终有三个母题贯注其中：人生，中国，世界。唐氏式“三位一体”思想也可以其三句互为因缘的话语另表：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在唐氏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中，“中国”既是连结“人生”与“世界”的脐带，更是其全部精神生命和思想创造须臾不可离弃的血肉文本和心灵故园。唐氏不止一次申言：“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在《怀乡记》篇末，唐氏以老境的苍凉和少年的赤诚写道：

处此大难之世，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

不断的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港来，亦写下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昂，有时也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人心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那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亲宗们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之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尽管一如所有哲慧深植者一样，唐氏天性肫挚，禀赋颖悟，对天地、人生灵心善感，且转移多师，幸得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贤传道授德，遍阅中西古今典籍，"但是若非八年前中国遭遇此空前的大变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笔者引）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起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②

近世人类最深巨的危机与奇变（世界大战、热核武器、极权主义、现代迷狂……），其历史动源与思想流变皆出自西方，而最深巨的忧患与悲情却降于东土。唐氏生逢其中最荒唐最黯澹最诡异的时空，栖栖遑遑，不避困苦，不惧寂寥，立心至为纯粹，效命至为坚贞，不仅自觉承受起斩伐历史葛藤、内化时代病痛的命运，而且以儒家人文主义独有的悲愿与担当，疏导西方文化的狂涛巨浪，凝聚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融摄一切文化的价值理想，以大肯定而非大否定的精神，以万物皆可调适而上遂、转化而升华的生命意识和终级关怀，以对人类文化和前途的绝对信心，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份前所未有的思想遗产和精神启示。

又有半世淹忽而去，天下苍黄翻覆，又有多少因缘聚散，又有多少悲欣交集。天道好还，世间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枯萎歇绝半世之后，终于如一元初透，生机重现了。唐君毅哲学著作在他魂牵梦绕的祖国母邦堂而皇之出版，不仅是其个人"灵根自植"、历经千种艰辛后，终于如所誓约"返哺故土"，而且是中华文化否极泰来、贞下起元的祥朕吉兆。

唐氏于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他宏富精微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人格，与亿万国人坎陷已久、且将继续身置其中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艰厄命运，以及从中化育

而出的民族复兴与精神重建的伟大使命，正相契合："这全人类 1/4 的人口的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③

唐氏著作在大陆的出版，是当代儒家"魂兮归来"奇迹般的重大文化事件，又如种子与大地，儿子与母亲，游子与故乡一样，朴素而自然。

1990 年，《唐君毅全集》（三十卷）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我以晚辈身份写了一篇纪念短文，刊于全集最后。十五年后，我再次以晚辈身份写下此文，却可载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批唐氏著作，我由此而生的感慨非常语所可道出。

1978 年，牟宗三先生以下述话语表述了唐氏文化思想的意义，我愿以牟先生的话作结：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谓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

注：

①陈卓仙：《思复堂遗诗》。

②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③同上。

2005 年 6 月 30 日

存亡繼絕：先賢往圣

苍黄不易圣贤心——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轲

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西方推崇天才，东方敬重圣贤。

因为西方要永远感戴耶酥的牺牲，赞美天父的慈爱，祈祷神恩的降临，咏叹天国的美妙。生命的不朽与灵魂的永恒，尘世的最后审判和真理的全幅实现，西方都谦卑而虔诚地委托给了上帝。

因为无限时空和永恒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断，自由意志与绝对理念的王国一旦失序，精神创新和历史征服的极限一旦到来，西方文明将颓然终结。

因为从《自由大宪章》（英国，1215 年）、《独立宣言》（美国，1776 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法国，1789 年）、《人权和自由宣言》（俄国，1991 年）之后，从奥斯威辛到纽伦堡之后，从古拉格群岛到天鹅绒革命之后，西方和半西方俄罗斯－东欧的使徒、先知和圣者已经渐次退出尘世。

因为东方的救赎、灵性、德慧、勇气甚至苦难、不幸、绝望、罪孽总是以集大成的形态弥纶八荒，亘带九地。

因为东方的人间悲剧至今远未收场，忤逆天理人情的奸恶邪僻俨然建制成列，草芥般微贱广布的黎民百姓依旧只能随风偃仰，救赎的十字架还需由人子负荷。

因为强悍狂妄与贫弱卑陬一样，同是中国的悲哀；早该升华为东方旭日的中国，却终朝梦魇不散。

因为中国的安危祸福已经攸关世界前途，而此五分之一人类的最大生命共同体究竟何去何从，尘埃潇潇，至今尚未落定。

因为苦命无助的中国至今虚缺着自己的先贤祠，至今无法为自己最新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庄严送行；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

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孤独而壮丽的死亡面前，中国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因为中国正临近它那漫衍宿命的最后一道栅栏。李慎之先生们虽然依旧生前落寞，死后寂寥，但已超越绝对孤独。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的瞩托、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瞩托和夙愿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上升为全球进步的东方祭礼，永远地充实、丰富和荣耀了人类自由本性的古老隐喻和伟大象征，汇入了这颗在浩瀚寰宇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闪烁了亿万年的性灵之光。

因为历史和世界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良知和中国智慧身上，一切加于他们的精神酷刑，一切超乎言说的痛苦和绝望，包括死亡，都不再是枉然，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启迪、以力量、以希望。

上篇

一

先生是革命的宠儿，钦定的异端，寂寞的觉悟者；是专制主义死敌，自由主义领军，再启蒙运动先驱；是来世的公民课教员，全球化引渡者，中国道路警示人，中国文艺复兴追梦人；是最后一名士大夫，文明冲突吉凶未卜时代遽然撒手的遁世者，从我们中间飞逝而去的又一名先知；——是以自由压倒奴役，以悲情连接世纪，以忧思点燃自己烛照寰宇的圣者。

先生之于中国，是继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时代“苍茫叙事”后，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伯夷、叔齐、伊尹等古代圣贤开启，由孔子、孟子集大成，由历代仁人志士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中华圣贤救赎之道的现代继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中国一路东倒西歪下来，重新收拾、重新上路的历史托命。

先生之于世界，是以悲天悯人的浩茫心事对世运人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三个文明千年启幕的中国第一人。

二

先生对于中国的首要意义和特殊贡献在于，在中国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以布衣之位、匹夫之力、耄耋之年、废残之躯，蹈厉锋发，孤怀独往，高擎新世纪新理想主义火炬，使徒般地践履着一项神圣的志业：为中国道路作证，为中国命运祈祷，为中

国使命奋斗。

先生患大教训、生大疑惑、得大觉解，不忍须臾睽违的，是 1840、1898、1911、1919、1937、1949、1957、1966、1976、1989、1999 直到先生溘然辞世的 2003 年间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的善恶是非，中国的吉凶祸福，中国的新命复兴。

1949 年以后，这项志业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凶险、最敏感、最森严、最需防范、钳控、惩治、镇压的最高禁忌和头号死罪，成为包括先生在内无量正直高洁之士肝脑涂地、骨骸相籍的骷髅之野，成为最高当局生杀予夺、秘不示人的统治重器。

于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荒唐笼罩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机密”，中国人常常多年后才从西方著述中与闻。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知晓关注的天赋人权，则长期被褫夺，以至中国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日益冷漠、麻木、隔膜甚至厌倦、恐惧。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历史意识的民族的胜利，是人类精神历程中一件难以理喻的异象。而从牛津到哈佛，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的“汉学家”、“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国情披露人、国策发布人和国运预告人。若非 1989 年那场血腥事变，那两名德国人、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格鲁吉亚人（历史曾以他们的名义，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这四名西方和半西方人，未必比西方主流文明代表人物更了解中国，更尊重中国）的巨幅画像，可能至今还堂而皇之地供奉于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一百多年前的著述，至今还是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石，十数亿中国人必须尊奉的“圣经”。

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托尔斯泰到杜威、罗素、泰戈尔、爱因斯坦、萧伯纳，从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到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从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金尼阁到马尔罗、费正清、李约瑟、萨特，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普京，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小布什到蓬皮杜、科尔、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小泉纯一郎，从铁托、陶里亚蒂、卡达尔、哈维尔到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从斯诺、斯特朗、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到法拉契、索尔兹伯里、华莱士、托夫勒……所有关注、造访、影响过中国的西方的哲人、征服者、传教士、新闻记者、政治家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资本主义辩护士，无论友善还是恶毒、高尚还是卑鄙，都是中国的因缘，中国无以回避的挑战。

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尽失自强不息、自作主宰的民族立场和历史姿

态，对世界的文明主流和历史的选择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偏偏实行代价最大、挫折最深、最短视、最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一边倒”，不仅断送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正面历史遗产，而且将秦始皇和斯大林东、西方两大专制极权独裁制度全面结合，投中国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浩劫。

当先生与整个民族历经磨难面对废墟般的中国社会时，已年近花甲。而先生最后十年再次面对的，是在斯大林－毛泽东式恐怖血腥乌托邦终于收场后，在苏俄、东欧诸国艰难而坚定地重归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文明主流同时，中国却大幅坠入权钱联盟、犬儒主义和乡愿哲学的历史泥淖；面对的，是畸型膨胀的物质巨身与粗鄙、虚骄、狂妄、浮嚣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联手拒斥、贬抑、敌视和魔化世界主流文明的大荒诞、大悖谬、大诡吊、大危局；先生立宏誓发大愿欲以担当的，正是以集大成的圣贤心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关乎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天地志业。

三

先生八十人生，早年生逢外患日亟，国运日蹙，“不能不参加革命”，中岁遭遇苍黄翻覆、腥风血雨，“不能不当右派”，晚境茕茕孑立，冷眼热肠，“不能不做自由主义者”。

先生有足够的资格，重出江湖作帝王师；先生有足够的本钱安享清平，颐养天年；先生有足够的权利寄寓山水，忘情江海；先生有足够的理由近鬼神，远中国。

先生却义无反顾地择定了一条苍茫人生路，其中无量数的颠沛、艰危、创伤、磨难、苦情、隐痛、寂寥，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微吟、颙望；几多长夜独坐、几多仰天长叹、几多壮怀激烈、几多热泪夺眶、几多悲从中来……

有形之压力，以慎公大无畏气慨，足以抵抗而有余。无形之风雨，误解、猜忌、疏离、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 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坚挺，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象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

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朱学勤：《危城别慎公》

先生对命运垂顾的领受始于最后十年，始于四顾寂寥、一无凭籍的历史荒原，始于抉心自食，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光明觉悟，始于为中国，为中国知识人再立人极、再立中国圣贤人格的苍茫暮年。

1989 年“六•四”之后，先生在一片肃杀凛冽中作河东狮吼：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若见性时，轮刀上阵也得见之”，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霄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视一切高位强势富贵功名若浮云过太虚，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

惟斯语，先生已顿成人杰，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见，当天地色变，狂飚骤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于恐惧，出于困窘，囿于偏私，出于无奈，聪明、世故、练达、识时务的中国刹时重归于无声。先生一语既出，即若金声玉振，振聋发聩，闻者莫不动容，莫不醍醐灌顶，如遭电击，如受棒喝。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君不闻，“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

惟斯语，中国一切心性、才情、灵感，抱负方有所持载，有所寄托，有所欣赏，有所成全，“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

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旨在斯言，大哉先生。

四

先生气象宏大，既葆有中国古风，又兼俱西方精神。“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其为人也，平日总是愉愉如、坦荡荡、蔼蔼然，天趣真纯，一片肫挚；其为人也，仪表堂堂，豪放爽朗，声若洪钟，运思如潮；其为人也，“神气扬扬，貌与常异”，“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生风”；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才体会到的。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绝没有拘谨，绝没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谆教诲”，好看他“指点江山”。

——亚非：《永别了，所长!》

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嫣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拄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刘志琴：《不是谢幕，是序幕》

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己更老。

——余世存：《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中间，先生自己停下了谈话。转身在小茶几上摸起药瓶，倒出了药片，就着水吞了下去，不像是服什么常用的保健药。我们有些担心，生怕是老人身体不好，被我们打搅了，硬撑着谈话。他似乎看出了什么，立刻解释说自己经常头痛，痛了就一定要吃药，没关系。话语间反倒是带着几分歉意。

北方的冬日，天早早地暗了下来，客厅里没有开灯，先生的位置又是背着光的，

脸上的神情只依稀可见，细节却不易捕捉了。我忽然有点儿“心不在焉”，莫名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亥年生人，和眼前的慎之先生应该是同庚了？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因为自己头疼脑热折腾着小辈来照顾而不安的老人，有了许许多多“得意”的想法总要说给后生小辈听听才满足的老人。

——罗建：《招魂》

这是一位难得还保留着童心的老人，从不掩饰要顽强表达的心情，张口总是“听我讲呐！”就像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时，总有没完没了的故事，恨不能抢先一口气倒给别人那样。他生活非常简单、集中，成天都在看材料、想问题、写文章。思想丰富，遏止不住。每次见面，他从不问我生活之类的事，没有寒暄一说，也不倒茶。请注意，我这里特别用了孩子的比喻，因为，孩子之间，永远是简单的、平等的、什么都不讲究。他甚至时不时会萌发某种天真，幻想某某人接受某种意见，简直就跟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常犯的毛病一样。他非常非常讲良心，对那些有恩于他的人，他一辈子记在心里，即使明知其人有所不善，也是嘴下留情。他也认错，如对自己的违心检讨等，认得很干脆，不拐弯，不解释，完全出自内心，绝不做作。不！他对做作是深恶痛绝的。他看到某些文人缺少功力却爱好装腔作势，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也许，正是他的痛苦经历和做人原则，使他待人特别地宽容、直率、真诚，而且特别能发现别人的优秀之处。

——华贻芳：《痛悼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生惊讶，这位名驰中华思想界的非凡人物，家中之简陋，近于寒碜，几乎同于引车卖浆者流。而先生胸前一近一远两副眼镜，一身有若干烟灰小洞的老式咔叽布中山装，左胸口袋里两支老式钢笔，恰是“孔颜乐处”，“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君子仪型，正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国圣贤式知识人充实而光辉的淑世典范。

那一天，李郁带我走进他简朴的书房，他的神情比我想象的更亲切更有吸引力。我一眼就发现，他的旧式咔叽布山装上有许多被烟灰烧破的小洞。

——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

到他家给我一个意外的是：他的家简单得比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的家庭还要简单。时值北京盛夏，他家连空调都没有。客厅也很小，简陋的沙发和座椅，开着电扇，屋里也闷热得有点让人喘不上气来。

——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先生无论担任什么高级职务，从不在社会上摆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来沪开会，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总是自费乘坐计程车来回，总是便衣一件，旧鞋一双。平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而先生老夫妇俩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已不便），手头相当拮据。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经常啃啃麻花而已。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九零年秋。“六•四”的阴影渐渐淡去，我又来到北京，少不了去看望一下慎之。但见客厅新添了一副对联：

已知诸相皆非相

欲待无情还有情

上联典出《金刚经》“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既然如此，本应六根清净，无情无欲，但下联偏偏说“还有情”。这正好反映慎之当时的矛盾心态。无论如何，众生哀乐、天下安危的情结是永远无法消除的。

慎之才高自负，这是朋友们都公认的。他家中还有另一幅字，恐怕很少人见到过，悬于书斋之内，入门处之上端的横匾：“无声无臭独识时”。我看后说了一声：“好大的口气!”接着半开玩笑地文绉绉吟道：“夫识时者，能上窥天乎道之运行，下察人间之风云际会，试问世上能有几人？”逗得他哈哈大乐。

——林孟熹：《自许高材老更刚——忆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发感慨，只要道问学论中国，先生可与各类素昧平生者慷慨激昂，直到暮色四围；忘情时间的老人会突然起身，蹒跚趔趄，以“不良于行”之步，内外奔走，上下搜寻，总要拿出若干复印文字，或为己作或为他文，分赠来者。其间多少麻烦、拜托、奔波、检拾、分发，以先生微薄近于贫困的工薪，以二度中风的危险、行将就木的残躯，其苦心孤诣，惟苍天可鉴。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

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李先生称赞某一篇文章写得好，或是称赞某人在为实现宪政制度做着认真的工作，从来不是泛泛地说几句而已，而且每次都托人将这些文章复印多份，见面的时候给我们人手一份，并且仔细告诉我们他认为的要点所在，哪些地方还有深入的必要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前只能从传记文字中，遥想胡适那种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胸襟及其广育贤才、奖掖后进，但是后来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都最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风范。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李先生年老多病，两次中风，但谈到国家命运时仍激动不已。他谈到袁伟时先生论述孙中山的文章，要拿给我们看，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取。他迈一步，左臂向上划一下，以保持身体平衡，行走已困难。他突然站住，转身对我们说：“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觉得先生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体制，早已做好粉身碎骨的准备。

——蓝英年：《几件小事》

凡他觉得有些新意的文字，不论是谁写的，他都保存起来。我常听他说某地的某个小青年写了一篇好文章。他的书房里摆着许多纸口袋，里面按人名装着他们的文章和剪报。在许多人中，有的是相熟或相识的，有的则根本素未谋面。他的朋友，真可说是“五湖四海”。他行年八十，精神永远年轻、永远开朗、永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陈乐民：《山高水远望斯人——送别李慎之》

我从与先生不多的交往以及他的文章中得到这样一种粗浅的印象：慎之先生的做人理念既包含中国士大夫的“仁和恕”，又包含英国绅士风度，或曰伏尔泰精神。其信条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以生命来维护你表达这个观点的权利。

——奚瑞森：《良知和道义的勇气》

与先生交道者，都常收到或长或短的信函。那散落在域中海外的千百页信纸，那上面用钢笔、圆珠笔、铅笔书写，加贴了各色纸条的文字，以鸿雁传书的古老方式传递着中国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和信息。先生至死无一专著问世，他是以生命为书号，以灵魂为印机，以思想为笔墨，蘸脑汁吸心血，以最人性最简直最光明正大的风格，

在中国大地出版了自己的等身著述，在中国的脑海心田立下不朽文字。真理本在人心，思想为天下公器，先生无私无偏，躬行推己及人之道，以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放怀欢迎全球信息时代而不改早已过时的传统交流方式，先生之迂，先生之幽默，先生之无奈，惟苍天可鉴。

1 月 23 日他给我写了一封 10 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

——许良英：《痛掉挚友、同志李慎之》

这部书稿他已审阅了两遍，上面满是各种记号和批语，中间很多地方贴上了写满了字的黄色不干胶纸。李先生对书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看得十分仔细，打字打错的地方、个别用词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妥之处，都做了标记。

——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说学术大方向》

与先生交道者，常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感受。博闻强记、聪明深察超过先生者，中国另有人在；由词汇而术语而概念而推理而学术而系统者，中国更大有人在。而先生气象之大，道性之高，思想之深，参天地，关盛衰，含英咀华，渊博综摄，云行雨施，大明始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面对为中国而存、为中国而亡的大脑，面对忧思无涯、悲悯无边、希望无限的心灵，面对不知大限将至而以全幅精神牵系中国与世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旬生命，人们由衷所生“高山仰止”的赞叹，惟苍天可鉴。

听李先生的教诲是一种享受。

他讲话时中气很足，“喷口”很大，有板有眼，显得很自信。我总觉得他的心无遮无掩，是透明发亮的。有一回他对我笑说：“我现在 80 岁了，仍每年在进步。”

——张怀远：《哭李慎之先生》

跟先生聊天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他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像老朋友似地跟你推心置腹、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地纵论开来。他的思想总是跟着问题走，不断地以设问的形式提出历史上一个个疑点，然后告诉你他的解答。尽管他的观点，你并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你无论如何拒绝不了，甚至他独特的犀利语言，都会让你荡气回肠，久品不厌。

——冷眉：《面对慎之先生的愧疚》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笔者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反右”以后，90 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 50 年代初，尤其是 80 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走了，带着他对“苦命中国”深深的眷恋，带着他对“一个自由的中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无限憧憬，带着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带着他早年没有实现的“大学校长的理想”，带着他晚年“下辈子作公民课教员”的感叹。这位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人的尊重。以一个人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史识和一生对“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慎之前辈才于耄耋之年义无反顾地举起自由主义这面大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敢地“创旧”，追求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李慎之的原创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他不是赶时髦去“创新”，而是“创旧”，追求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本土经验的完美结合。当我问及处于他那个层面的同辈人有多少人是同道时，慎之前辈以拇指对胸，半是自豪、半是叹息地作答：“余一人也”。

——冯崇义：《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

我坐在他斜对面看着他，感受着那些奔涌的思想和热力，不断地想：这是一个伟大的老人，他活着，思想着，体验着，他的思想是他的生命结晶出来的，而从他这个历经坎坷的生命中结晶出来的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何其宝贵！你读着他，读他生命－思想的历程，你就会解读我们的时代；这些思想同那些从书本、文件、统计数字、宣传材料、外交家的外交词令中研究出来的冷硬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这个老人不同凡响的价值。

——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边汇聚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界）朋友，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一个大约六十到七十的人，另一个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此外，他还和四十岁上下、三十岁上下的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可以说，李慎之是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化剂。……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何家栋：《20 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他要求我们做的，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气、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他个人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有作好出航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卜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种博爱、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学所，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陈小雅：《生命的结晶——忆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对于如我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李先生好似暗夜行路时一盏遥远的灯，你不会奢望把它提在手里，你只需不时抬头望望——只要它在那里就成。

——李静：《年青的羞愧》

五

先生为中国再立人极的卓绝之处，是以庄严中正之道，至诚恻怛之情，超越忘我之心，涵盖持载之理，贯通现实世界与人文历史，在分清善恶是非基础上发展出一切皆可宽恕、同情、转化、成全、升华的大智慧、大悲悯，大心愿。

先生指出，邓小平“调动部队镇压学生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护”，同时肯定，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肯定“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先生深心否弃、厌恶、鄙夷，必予诛责万难宽恕的只有一个人：扼杀无数中国人自由与生命的“专制者和独裁者”，即毛泽东。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毛泽东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泽东又如何？，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就毛泽东而言，即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于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你看看毛泽东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

乎一模一样？就是他归天之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所谓“反自由化”，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是一句老实话。

——戴煌：《永念慎之兄》

毛泽东统治中国近三十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泽东最终成为秦始皇与斯大林两大专制主义合流的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宿命，更是中国灾难性的变异。毛泽东虽然与中国历史有着特别深刻紧密的联系{包括他的相貌、文章诗词、政治伎俩直至生活习惯}，但这个人极其中国化的表象后面，有一种与中国精神极端分离、对立、陌生和属于异族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以其敏锐多疑的政治嗅觉、无限的个人虚荣心、低级庸俗的审美、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绝对的自我中心可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由于这个人的恣睢暴戾而死于非命的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良知以及普通的中国人，永远无法估算，永远是中国最深的国耻和国痛；这个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毁灭性败坏，是中国最大的国殇和国难。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交融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留下的难以卒睹的坟场和废墟，留下的无比沉重的人口负担和更加沉重的精神负担，将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实现其现代复兴最沉重的历史枷锁。这个人的罪恶与贻患，已远远超逾任何统治者可以、可能犯下的历史过错的底线。无论按中国传统、共产主义还是人类文明的任何标准，这个人的残暴和罪愆都是难以理喻和不可宽恕的。

毛泽东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确实无愧为秦始皇的孝子贤孙，他甚至超过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万倍。

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则是天大的无耻和不敬。

马克思出身世代犹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鲁士贵族姑娘为妻，接受过欧洲第一流的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养和足够的珍重。马克思自愿终身遭受放逐、通缉、贫困和孤独，对人类未来却充满了历史的、哲学的、高尚的和真正诗意的美好预言：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

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东方暴君将其“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说成对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并且自称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个他，不知会作何感想。而马克思众多名言，毛泽东或许从未听说，或许原本听不懂，或许压根就不赞成：

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性的全面复归。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

诚如马克思所言，他是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人。对他死后以他的名义在全世界进行的激进主义革命，马克思负有精神和历史的关联责任；同时，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马克思也产生过特殊的警示意义。

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大都对马克思个人保持着敬意和同情。

有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代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马克思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人，他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从不满足于虚假的表面现象；他是大无畏的、刚正不阿的；他深切地关心着人和人的命运；他毫无自私之心，毫无虚荣感和权力欲；他始终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并且把生命的活力带进每一个他所涉猎的领域；他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坚信理信和人的进步。实际上，他正体现了作为他的思想核心的人的概念。

——埃里希•弗洛姆

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了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

物，……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人的自由传统，它不仅指人获得自由，而且指人能够自由发挥他自己的潜在才能，这是人类的尊严和友爱的传统。

——马尔库塞

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他的社会理想在一些自命为“人民民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国家里成为荒唐可怕的漫画，他无疑要把自己称为另一种人。他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抗议语义上的凌辱，也是要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目前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划清一道极其明显的界线，按他的社会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目前共产主义的实际却是，具有人类尊严的价值感的个人，特别是持批评态度的个人，要遭到无情的摧残。

——悉尼•胡克

二十世纪，有一种恐怖的“历史逻辑”曾经将一半人类驱赶到“奴役之路”：人类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历史之迹已被破译到最后一刻，万古长夜即将破晓，天国之门即将开启，这一切都将神意地降临在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阶段、某一党派的命运之中，最终由一个“超人”的奋斗来完成。他是真理，是正义，是自由，是太阳，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领袖中的领袖，他摆脱了人类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恶、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诸如仁爱、慈悲、怛恻、怜悯、敬畏、谦卑、同情、善良、宽容、忏悔、隐忍、多愁善感、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的束缚；他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新人”，具有花冈石般的心灵、铁铁般的意志、不可动摇的权威、统驭万物的智慧；因为目标神圣，他被特许可以使用任何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经过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花果无边凋零；在山呼海啸、暴风骤雨、周天寒彻的激荡翻覆后，他将重新为世界奠定，为万世立法。

按照这套逻辑，二十世纪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谴责，没有一个应该审判，没有一个不仅不是恶人和罪犯，而是鞭挞人类前行的大英雄。

从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场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国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麦宰相以来德意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贝尼托•墨索里尼不正是现代意大利之父、自马志尼、加里波的以来意大利统一运动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被压迫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标准看，浪流汉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铁匠出生的墨索里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汉吗？

按照这套逻辑，一个人只要垄断了权力并且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在消灭了全部“阶级敌人”后，就有权镇压数量相同甚或更多的无辜人民，因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正是伟大事业分外复杂艰巨的证明！

按照这套逻辑，被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通缉和驱逐了大半生的马克思、被沙皇俄国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宁都称不上伟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鲜血汇聚的河流中去把握历史的航向，更无胆量对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同志大开杀戒，却絮絮叨叨地空谈“异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权”！

按照这套逻辑，历史天秤竟然可以一边堆积反动派的头颅，一边盛满革命者的心脏，并且这架天秤依然是公平而伟大的，摆弄这架天秤的竟然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

按照这套逻辑，如果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没有被饿死、苦死、累死，中国反而会遭逢更大的灭顶之灾；如果数以百万计的革命者没有被整肃、斗争至残、至疯、至死，中国社会主义反而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人没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楼、上吊，中国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反而会黯淡寂灭！

按照这套逻辑，离开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式的“元首”、“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还须一律冠以“伟大”、“光荣”、“正确”的修饰词），人类就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许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壮丽的日出和每一个婴儿的诞生就毫无意义！

按照这套逻辑，以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异化成监控、告密、逮捕、流放、苦役、酷刑和屠戮的血腥恐怖之途，必然蜕化成“伟人”和“领袖”独领“风骚”，而亿万人民要么沦丧为盲目无情的群氓暴民、要么变形为驯服沉默的牛马羔羊、要么物化为“历史巨轮”下的群蚁众豸。

除非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除非无数幽怨亡灵除了让我们心烦之外丝毫不让我们感觉不安，除非我们甘心让天安门城楼和大额纸币上的毛泽东永远污染和干扰中国的视野，除非中国继续与西方为敌，与现代精神为敌，与自己的使命为敌，除非中国任由甚至期待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老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再次借尸还魂、东山再起，再次为祸中国与世界，否则，中国必

须否决、摒弃毛泽东。

先生个人早已在精神上跨过了毛泽东的僵尸，但整个中国还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毛泽东及其遗产还拥有大量信徒，中国还远远没有从这一最深最污浊的历史坎陷中脱身，中国还可能为这个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即便对毛泽东这名对中国现代苦难负有头等罪责的人物，先生还呼吁江泽民顺应历史潮流，“为历史，也为保住自己、毛泽东和共产党”做一个“明白人”。先生一代人都与毛泽东有不解之缘，他们“回首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常常发现其间最难走的路大都与那个叫做毛泽东的人有关”。（单少杰：《纪念李慎之》）毛泽东“用极端的专制手段，确实把中国人（说好听点）是团结起来了，（说不好听一点）把一半人搞成奴才了。也许他的出现是中国人回避不了的历史命运。也许再过一百年对他倒有所肯定，这是非常深的问题。”（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先生甚至不改旧习，沿称“毛主席”，不加侮蔑，不以毛泽东之道还治其身。“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倾身倾顾税吏和罪人。”（马克斯•舍勤：《价值的颠覆》）

在 2000 年 7 月 5 日为庆祝于光远先生八十五华诞上，慎之先生的不屈精神更是让人不胜敬佩！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光远先生在作“寿星”发言时谈到，自己今年已经八十又五了，过去自认为年龄小，不敢对毛泽东进行批判；现在比毛泽东大了二年了，也就可以有资格对毛进行批评了。慎之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光远先生的这种思想有“问题”。他的发言大概的意思是：不能以年龄大小作为一种对人能否批判的“框框”。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说，我今年还不到七十七，但我早就对毛泽东进行过批判了。慎之先生的这一发言获得了与会者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王维：《悼李慎之先生》

先生晚年一个未及深入展开的精神突破，是重新审视鲁迅。对那位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的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历史视野和人生彻悟投去的匆匆一瞥，已经意味深长。

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已经根本认同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

民主、人权、宪政精神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唯一正道前后，鲁迅的最高理想，只是“个性解放”，而如何“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鲁迅并无预见。

在他死后三十年，知识界不分男女老少鳏寡孤独全部身陷“文革”的深渊，鲁迅成为“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他的那些“晦涩冗杂、佶屈聱牙”的杂文，成为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和全体中国人之间相互批斗厮杀的“匕首”、“投枪”，他本人则从被三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和左翼文人推尊的“民族魂”上升为被六十年代的无道暴君册封的中华民族的“圣人”。

鲁迅醉心于“痛打落水狗”，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誓“一个都不宽恕”，根本“缺乏现代民主原理和全球伦理准则”，没有资格称为“中国的伏尔泰”。

“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伊里奇和约瑟夫，……自认为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甚至直接为斯大林血腥暴政辩护，直接介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还未曾与闻的对托洛茨基的讨伐。“我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无疑是最大的个人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如果就他的批判精神来讲，也可以说是最深刻的自由主义者。但是鲁迅 toocommithimself，他太相信瞿秋白、冯雪峰，也太相信红军和苏联（当然有些事实还没有弄清）。如果他再活二十年，看到苏共二十大，看到反胡风和反右，如果他在自由环境下，我认为他极大可能会忏悔，就像胡适一样。如果他在中国大陆上，他极大可能要自杀。他不会当右派，因为毛主席不会让他当右派。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有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共产主义影响。”(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

即便如此，先生还是宁愿同意“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最大侮辱”，“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鲁迅死后被利用的命运“当然不能由他自己负责”，先生还是承认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步千古”，先生还搜索胡适等人的文字，竭力为鲁迅留下“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一名“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糟蹋、贬斥、丑化和诅咒中国传统的愤世文人，一名声称要“灭掉”中国文字，要“取缔”中医，不看中文书，不听中国戏，指控中国数千年文明无非“吃人”二字的不肖之徒，一名与对中国包藏祸心并空前加害了中国的

日本和苏俄有说不清、道不白关系的可疑分子，一名道德行状难称正派高尚的庸碌之辈，一名生性刻薄、心胸狭窄、行文诡异的刀笔吏，竟被捧为中国“民族魂”和“一等圣人”，这不啻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莫大悲哀和绝世反讽。

与苏格拉底之于希腊、弥尔顿之于英吉利、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意志、雨果之于法兰西、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泰戈尔之于印度相较，与他们对所属民族和所属时代的伟大挚爱和卓越贡献相较，鲁迅之于中国，最多代表了那个黑暗、阴冷、愚昧、怨恨和“铁屋”中国的毒素和鬼气。鲁迅从来没有在正面意义上消解中国的苦难，燃烧中国的光明，提升中国的自尊，缔造中国的幸福。读鲁迅长大的几代人，自私、冷漠、麻木、愚昧一应既往，一样奴性十足，一样地仇视高贵、鄙薄幸福、厌恶自由、蔑视民主、轻贱人权，却平添了狂妄、残忍、贪婪、无耻、暴戾、粗鄙。中华固有的仁爱、忠恕、诚信、礼让、宽容、慎独、怛恻、悲悯以及天人合一、乐天知命、尽性知天、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怀与高明智慧，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滥施暴力、崇尚权势、贪赃枉法，挥霍无度、腐败堕落的社会。这一切，当然不应由鲁迅来承担，但与他也并非毫无干系。毛泽东不是再三表示，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吗？希特勒就绝对无法在康德和歌德那里找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资源，即使德意志神秘命运的讴歌者瓦格纳和鼓吹“超人意志”的尼采，希特勒也只是私淑心仪而已；同样，斯大林也想不到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变成摧毁俄罗斯精神和镇压政敌的“刀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阳光和时间下面，真理和正义将涤荡万物，历史是不断解蔽祛魅、不断豁然开朗的过程。先生弃世前，“费厄泼赖”地抹了一下涂在鲁迅身上的厚红的油彩，抖了一下蒙在鲁迅头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先生自由本性势所必至的一步，也是中国人解除重重精神枷锁不能绕开的一步。

六

1949 年后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及其臧否褒贬，是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悬问。先生以罕有的澄明心香和深广的历史胸襟，为同辈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大智大仁者知人论世的懿范。

大陆学人 1949 年以后的遭遇，是中国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式的精神炼狱。中国知识人迎头撞上的，是中外文明从未见教过的异常残酷而成体系的精神暴政，历经变法、维新、革命和入侵而日渐复兴的中国文化，竟在一群中国人手里，凋零残破到了空前

的绝境。“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先生身为地狱底层中的一员，有割脉剜心之痛；“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李慎之：五十岁生日）“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李慎之：《五十四岁生日》）一旦噩梦暂销，还身返尘寰，先生即披寻残卷封册，为前贤往哲拂拭扫尘，独行大悲咒式的祭祀，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觉今是而昨非”的峻急心结，为续通中国文化命脉殚精竭虑。

哲学家冯友兰因在文革中参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海内外学界侧目，被讥为“肆应取容、挣扎迎合、曲学阿‘势’”的“四大无耻”之首。冯氏九十多岁参加檀香山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竟落到无人搭理的田地。先生特立独行，以“晚辈”、“后学”、“私淑诸人”身份，为冯友兰辟词辩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血气已衰的八十老翁！……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我宁愿把先生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是过来人，谁又能说不是呢？”

先生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更从社会制度上为中国知识人的不幸申辩道：“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致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迄今还没有对专制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在一个长期信奉“批判”、“斗争”、“你死我活”、“墙倒众人推”哲学的国度里，在一个多年来缺少忏悔和宽容精神的民族中，在千百万早已失掉“自我”、伤痕累累的知识人里，在一个充溢着冤屈、怨恨、愤懑和厌世情绪的时代，身受专制主义煎迫之苦的先生，却要为曾经痛失本色的逝者搜寻历史与人性的因由和无奈，这是对一切专制最严正的抗议，最深刻的控诉，最彻底的胜利，对不幸而悲哀的亡灵最亲切的俯就和抚慰。先生以独具的眼力指认冯友兰“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又以孔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和“观过知仁”

的教诲，对冯友兰及其生后事作了大开大阖的结评："冯先生在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如果说，这个转变如我们现在假设的那样，要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话，那么冯先生所经历的大概刚好是中间最艰难最复杂的一段。就思想经历而言，也许不会有比冯先生阅历更丰富的人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勤于著述的冯先生留下的不仅是他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还是历史的记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中国人都可以从冯先生的遗书中知所取则，知所取镜。……照横渠'生，吾顺事，没，吾宁也'的说法，冯先生劳碌一生，著书满架，现在已得到了永远的休息。……后死者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先圣先贤所不断创造继承的哲学传下去，并且使之不断得到净化与充实，发展和光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先生慧根深植，灵府阔拓，幼承庭训，转移多师，"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又于人生盛年饱经忧患，终于玉成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大参悟、大会通、大圆融。在解读冯友兰关于"天地境界"的学说时，先生有极深邃、极超拔的文字：

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维习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的前进步伐，不在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众前进的。……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以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是相通的。

天地境界中人正因为觉解更高，其所为也应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命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梦觉而且勘破了生命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深人知善的能力与行善的意志。……我以为最接近于天地境中人之所为的，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一个"穷"字，一个"尽"字，一个"以至于"，都不是"大段着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的，要如孔子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为如此，才着得一个"命"字。这个命字，无论解作生命、命运、还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赋予者。我认为，只有如此认识才能说透天地境界的意蕴。

——李慎之：《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方家可证，先生此番觉解参悟，已达中国哲思何等境界，寻常寻章摘句泥古不变食洋不化者，奚足望其项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在北京学术界纪念冯友兰诞辰一百周年集上呼吁中国知识界：

一、“接着讲”。“‘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其哲学都是经过百代千秋演化而来，而且还要演化下去。这个过程必然是承先启后的，绝不能把传统一脚踢开，另起炉灶。那样的哲学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长不到哪儿去，也流不到哪儿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普遍流行于中国人的口头到心头，中华民族一定会大不同于今天，而将大放异彩于世界。中国这些古训是值得我们‘愿书万本颂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的真知灼见，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

二、“借着讲”。“冯先生在融会贯通中外哲学方面的建树，事实上为几乎所有在他之后企图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的老师宿儒打开了一条新路。如唐君毅之以黑格尔哲学、牟宗三之以康德哲学、方东美之以圣多马哲学等中西互释与中西结合，走的都是中国哲学今后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通着讲”。“要在这个世界价值大混乱的时代而能卓然有以自立，而且确实有补于世道人心、有助于确立世界秩序，恐怕只有接着往圣先贤而会通古今，融贯东西，而能有助于提高全体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哲学，才有永恒的生命力。”

四、“‘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这正是全球化之所以可能实现与必然实现的原因。而鉴于现在各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往往都在致力于立异而非求同，这个任务之艰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确实值得每一个好学深思之士努力去做的工作，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关系到全球化走的是一条祥和的道路、还是一条严酷的道路的问题。这是一项‘圣贤事业’。”

冯友兰先生天灵有知，谅会老泪纵横，悲欣不已吧。

胡绳身为官方史学最后二十年的泰斗，论者虽也有胡绳“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之说，但胡绳一生为时流和权变所困，其晚年身位显贵，却远未达到理应达到的人生境界和历史觉悟，而为学界不取。先生慧眼独具，看出胡绳一类人折射出的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特殊侧面。先生披露道：“1989 年 5 月底，他在

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胡绳地下有知，若知先生是以何种心情将其一生最堪自慰的片断公诸于后世，亦当心有戚戚焉。

先生常有传神之笔，每每兴会所至，化腐朽为神奇，转愁惨之悲为解颐之愉。先生为胡绳“说项”后，紧接着写道：“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精神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

三折肱然后为良医。先生由衷首肯冯友兰晚年“不依傍别人”的大觉悟，赞叹“这才不愧是‘男儿到此是英雄’！”先生别开一境为冯、胡“说项”：“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从头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之。”

一个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可以采菊东篱，濯足清流；他可以醉卧明月，目送归鸿；一个追随甘地的印度人可能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日本武士会在天皇宣读完投降“诏书”后在塞班岛剖腹自杀，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会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那些苦闷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约，那些忠诚和爱心都有对象和源头。而先生向孤苦的亡灵脱帽，在破败的人生中提炼道德的光芒和精神的崇高，这大概只有二十世纪末不仅参透了生死穷通，而且洞悉了历史底蕴如先生者，才能做到。

七

也许与青年时期主持新华社国际评论有关，先生品评人事，总能即兴发抒，一时一得之见，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民初“老新党”杨荫杭，先生称其“放言高论，敢怒，敢笑，敢骂，大抵类此”。先生盛赞这位“深通日文、英文与西方语言，精研中国南北各种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兼通朝鲜、越南、缅甸、泰国、马来、印度、锡兰语言，甚至中亚、西亚许多已经死掉的语言”的老式大学问家，却是一个对“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国耻“不但表示愤慨、而且主张中国人首先要自己争气”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先生庚即追问：“中国现在开放了，拿了博士头衔回来的不知有多少，尽管牛仔裤与汉堡包遍于中国，中国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似乎还不如戊戌与五四前后的

年代。我总以为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或曰中国文化自性（Culturalidentity）失落的结果。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的人是很难了解外族文化的精髓的。”

先生与杂文家王小波素昧平生，只因后者对“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给予了犀利的挖苦，并“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阴冷、迷信、卑污”，先生即在心里对这名文学晚辈“谬托知己”，认为王小波的文字，包含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先生指出，中国文革中的残忍和愚昧“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要持续反思的原因”。先生对这名青年文学家的夭折“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是因为“这样的人中国本来就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

匡亚明以大耄之龄，出版了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本《孔子评传》，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先生拜晤匡亚明，两位老共产党人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们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很长时间只讲斗争，不讲道德建设，斗来斗去把社会风气斗得这样坏”（匡亚明语），在中国大地充斥着“欺师灭祖、卖友求荣、吹牛拍马、吠影吠声，落井下石、临难苟免”，充斥着“浮躁、虚夸、轻薄、诈伪”。先生顿生感慨，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成功，“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他们才能前仆后继。”

匡亚明的一生“是许多革命者共有的经历”：幼读孔孟之书，后投身革命，决裂传统，晚年又推崇孔子。先生在指出“匡老一贯强调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中国学问的精髓就是做人学，做学问就是‘做人’”后强调：匡亚明“真正继承了中国古来‘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大事——‘正人心，淳风俗’。中国要振兴，世界真要得救，是离不开这一条路的”。

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先生对“与童冠而俱迈，作时世之前驱”的“老派共产党员”温济泽，对这位为王实味洗却冤狱，为瞿秋白恢复名誉默默努力的“这种血性、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的现实，悲憾莫名：“‘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温老这句话，大概是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

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说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真精神。沧桑易变，这点真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

小注：海外有人讥嘲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由一名至死未退出共产党的人（指先生）来领军，是对自由主义的滥用与贬低，云云。近日，何家栋先生告诉笔者，他并不自称自由主义者，而坚持自己是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把这两个称号让给中国的老左派、新左派们。笔者聆教且终身以为楷模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周辅成、许安本、曹慕樊、秦效侃、高尔泰诸先生以及无数善良、正直、有名无名的中国人，都不是共产党人；同时也聆教且终身引为良师的刘宾雁、王若水、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吴祖光、邵燕祥、谭优学、朱厚泽、袁庚诸先生，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人。君子固然不党，党者未必不君子，不党者未必君子，这早已是中国社会常识中的常识。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知识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邪行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有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粹诗人更为纯正、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先生以杜诗作挽词，为谊属世交、义兼师友的钱钟书送行。洋洋数千文字，几无哀悼伤痛之辞，亦无盖棺论定之意，通篇“东拉西扯”，一位“才气无两、睥睨一世、少年高名”的大才子，一位“胆识惊人”，“口没遮拦”常发“奇谈怪论”又深谙“天机不可泄漏之道”的高人，一位“无恃于内，无待于外”，“学贯中西”的文化昆仑，一位清高孤傲，“凋疏亲故添情重，落莫声名免谤增”而心系天下的达人，却在先生纤尘不染的文字背后，“望之俨然”。

先生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文字拙直”的旧诗别在一盆白菊花花篮，挽别至交：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为亡友的英魂起证，先生擅将钱钟书未必愿意面世的诗作，悄然公诸于世，以让后人管窥钱钟书心系黎民忧世伤时的古道热肠，留下一段刻石般的文字：“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默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的《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

九

先生一生最重大最幸运的际遇，是拜陈寅恪为师，直到暮年，仍对这位“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执弟子礼。陈寅恪对先生的影响，最终远甚于曾影响和牵累了他一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及先生晚年开始警觉的鲁迅。

先生对其先师陈寅恪补天抚地式的追忆、敬仰、评价，是半世以来中国大陆学人对前贤往哲举行的一次涵泳特殊历史意蕴和生命关怀的隆重祭奠，其中透露的若干重大消息，将以世人尚难逆料的形式彰显于世。

先生不仅在人生寿命上接近陈寅恪（两人都奇迹般地享寿七十又九），更在人生境界上走进陈寅恪。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69）年蒙受的苦难，绝非一位“文化遗民”或旧式文人身处社会嬗演无法避免的不幸，而是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悲剧性地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旷世宿命，是一位有深邃的历史忧患痛感和崇高的文化殉道理想的先知，自觉选择、自行践履的特别使命。“他一生所完成的悲剧是高风亮节的壮美的悲剧，而其他成百上千学者的悲剧却是卑躬屈节自辱人格的悲剧。这个教训是值得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永远记取的。”（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先生在为陈寅恪当年未远走海外辩护时，引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文字道：“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泰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以数十载苦痛经历，以素心自许的高远心迹，以无限悲慨的文字，道破他与其先师共同遵奉的人生宗旨：

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先生与其先师同为中华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共命而同尽”之人，同样深知并身历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华文化的“衰落”乃至“歇绝”难以挽回。而陈寅恪不离父母邦国，乃是身殉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徒悲怀、中国士大夫特有的使命意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如？”但陈寅恪的悲绝惨极的殒灭，决不是通常的死寂。中国陈寅恪式的文化托命人大规模地死于非命，那至今无人勘破的“死因”还在中华滞留。先生独立于陈寅恪至今不能瞑目的亡灵前，发出惊天叩问：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陈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而置陈先生于死地！陈氏一门忠义，三世忧国，陈先生一定断断没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却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这到底仅仅是陈先生个人的不幸呢，还是整个中国的悲剧？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早已以先知的睿智谆谆告诫来者：“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中国文化命运的正途，“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指出，陈寅恪这一文化理想，“不但已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1949 年前后，陈寅恪曾反复向中国社会、中国学人和中国统治者明白无误地宣告：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致中国科学院书》

陈寅恪暮年孤绝，惟余“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叹，几乎断了“后世相知或有缘”的希冀。然而，天下事物极必返，剥极必复，陈寅恪既已走到“极”点，其“返”之道亦将不远，那颠扑不破、万古不易的“宗旨”则势将惊示来者，震慑天地而终将大行于来世。先生以罕见的乐观告慰其先师、瞩望于国人：

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在 1929 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中国因为缺少基督教、佛教式的天国与涅槃、彼岸与超渡，所以极重历史传统的谱系，人文精神的统绪，极重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传承拓展。这是中国安身立命的本源，卓然立于天地不可移易的根基。历经现代专制和现代狂妄荼毒摧残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痛彻地领教了斫断传统、篡伪历史、绝灭文化的弥天祸患，都应深彻地意识到陈寅恪的生命绝境和文化悲情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民族精神的血肉文本，都应从先生与其先师之艰苦卓绝、筚路褴褛的伟大生命历程中，领略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命运巨劫奇变和中国文化先贤道德文章的惨云与壮彩，从而面临任何危局与乱世，“知所矜式”，从而开创中国文化万象更新的大纪元。

先生行年八十年间，正逢中华最动荡最黑暗阶段，身历见闻中，礼崩乐坏，河山粉碎，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已远不能概括世道浇漓、人情险恶。而先生从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拒绝认同专制制度对人的污蔑、侮辱和奴役，更不以审判者自

居。正因为洞察了人间的苦难与罪恶，先生对人皆有之、中国尤甚的有限与无奈，人的孤独无助，人在精神上的坎陷与病痛，一一加以正视、同情、理解、宽恕，一一加以修正、转化、成全、升华、超越，所谓至诚恻怛，所谓推己及人，所谓圣贤情怀，即是不忍，即是悲悯，即是我，即是人，即是性，即是情，即是内，即是外，即是良知，即是天理。其易知便行，“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蕴涵无限的深邃、广大、高明。

当今之世，先生所继承所弘扬的中华人伦大道，所贯通所体证的东方天地境界，不仅对中国道德重建和精神复活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意义，而且对消弭世界冲突祸乱，缔造人类文明秩序，亦将发挥非同寻常的影响。

十

至若为中国的苦难、不幸、悲哀担戴蒙难，为中国的光明、自由、民主、人权和现代进步而战斗的仁人志士，先生更是衷肠翻覆，心向往之。

2002 年 1 月 8 日，中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骁将王若水在纽约病逝，“这个一生不倦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人”终于在异国他乡“搁下自己的笔”，先生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表达自己的丧友之痛。在怀念王若水的文章末尾，先生几乎一字一血，满怀痛失知交的悲绝，呼天抢地：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着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爱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撒下你命途多舛的国家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毋久留兮！魂兮归来，反故居兮！

生死亦大。死非其时，死非其土，死非其人，先生之痛已超逾寻常生死，为挚友，为己身，为“邦国”，为造化之寡情与无常，先生是痛不欲生了。

心系亿兆生民，不忘天下大任，如先生，如胡耀邦、千家驹、王若水、曹慕樊、吴祖光诸公，是中国一百年间内忧外患灾连祸结轮番剿灭后，尚能见证历史、传递火种的时代遗存；无论党内党外，都是苦难中国最后的记忆，悲剧中国最后一代传人，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悲怆合唱队，一只在汹涌大海上牵引几度失去航向的中国巨轮的小舢板，它的船员个个是遍体鳞伤的老水手，他们已绝无希望看到巨轮驶达彼岸的壮丽景观。这是走一个少一个，比罗马元老院、法国科学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尊荣显赫的团体更无法增补成员的孤独群体。中国的苦难、罪孽、英勇、高尚都将随他们的离去，永远消殒于虚无之中；而中国的凶兆、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兴亡，又有谁去警示，谁去应对，谁去担负呢？

陈寅恪曾推誉庚子山《哀江南赋》为六朝“第一”骈文，除词藻“优美”外，“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先生生前也尝吟诵此文，兹再略加征引，以辅先生丧友忧国之悲：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檝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

十一

先生与顾准之间的幽明契阔，是现代中国两位道德君子与思想巨人之间凄美、艰辛、神圣的感通和托付：

我已经形成一个概念：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一个客观原因是他是从毛泽东的绞肉机里滚过来的人，因此眼界更宽、体会更深。……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人们在追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

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先生通过顾准，为中国弥合和重创了惨被斫断而又亟需绵延的统绪，即何家栋先生再三强调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新道统。

肇端于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全球化，在最后抵达东方时，出现了世界史上大面积的文明冲突和历史分化。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明与最庞大的人类群体的统一性第一次全面破裂，西方文明内部异端、挑战者、无产阶级与其主流文明的对抗与这种破裂相互激荡，产生了完全改变中国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历史异数和文明畸变。十九世纪西欧激进主义思潮竟然“入主”了一个最遥远最神秘的非西方文明古国，并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上升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学说，用它异质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这个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所有显学；在一度满足了这个国家的现代主权和民族的现代独立两大诉求后，它却迅速蜕化为阻遏中国真正实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它的伟大使命的障碍，中断了中国现代化必须依托的传统文明，且不允许这个文明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称文化大革命为“封建法西斯”，可谓一语道破它集东、西方专制邪恶于一身的邪恶性质，尽管“封建”一词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有重要的歧见）。

外部现代文明被处处设防、步步为营地阻截而迟迟不能到来，内部传统文明代表力量又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命运为中国安排的，必将是一名（一群）上接中华传统大道、外通世界现代通衢的天纵之圣。由于三统合流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力量长期实行思想钳制、精神迫害和文化专制，担当中国文明起死回生大任的，必然是从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内部历经磨难而有勇气和力量置疑、抗议与批判这个历史异数和文明畸变的人物，他（们）还必须有幸在险恶的生存境遇中达到历史和时代所期许的高度，秉承民族传统的慧命与精粹，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来路与去向。而囿于地缘和种族藩篱的阻隔和东方专制主义高度极权的本性，身处亿万国民一次又一次被驱赶投入到意识形态的绞肉机所砍伐所燎原的全民族的精神荒野，他（们）必然只能在危境厄运和孤苦潦倒中踽踽独行。

正是在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苍黄激变中，先生天才地看到顾准对中国的巨大意义：“顾准有一点是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的，他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完全被扼杀三十多年后、继往开来的第二代的鼻祖。他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

光明，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我所以主张推崇他，不但为钦佩他个人，而且在于中国亟需建立一个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谱系。……保存下中国民主思想‘死灰复燃’火种的，就是顾准。”（林牧：《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预见到，除了当局的褊狭浅陋恐惧，民族的惰性和历史的“狡黠”会假借各种因由，“淡化”或“解构”顾准。先生在辞世一年前，庄重地自行承诺：“我保证在手头的工作完成以后再好好地读他的著作，研究他的生平。1995 年，我们曾经在北京举行过一次顾准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当时会上曾有一种声音，说‘我们虽然敬仰他的人格，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过时’。然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顾准的思想的深刻与正确。我现在建议，到 2005 年在北京再开一次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深更广。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必须重新认识顾准，深入研究顾准，大力宣传顾准，才能使这股思潮重新燃起熊熊大火。”

先生早已盼望把顾准这样的中国脊梁，介绍给普天下人。然而，当我在先生第二通大札中读到以下文字，却一时难以自已：“我现在特别要宣传顾准思想，尤其是对和我一样的八十老人，他们都是好人，是开明派，但是思想开放不够，学力与才力不足，我要用顾准的思想使他们能不断向前进。现在先汇上 350 元，希望你能陆续寄给我十本《顾准全传》，给你添不少麻烦，先向你致歉，道谢。”

当我捏着慎之先生寄来的三百五十元汇款单时，着实有些不知所措了。以先生的名望，愿意代我赠书于各方，堪称我莫大的荣幸，他只需吩咐一句，我便会把书寄去。而以先生社科系统（出名的清水衙门）离退休干部的收入来看，三百五十元是患病养疴期间不小的数字，我怎么能用老人汇款去买我的著作？琢磨再三，踌躇连连，却又觉得先生这么做，首先是体恤我等著书人的不易，其次也许是想以自费购买、赠送的形式，表示对顾准的一片真诚心意。恭敬不如从命。我便决定完全照先生嘱咐来办，以后再作适当补偿。这样，老人也许会高兴些吧。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感慨系之，“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是我更希望什么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

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儿女的智慧和良心!”

无论如何，从顾准到先生，从先生到可以预想的将来，中国仍将处于自己“时穷节乃见”的悲壮的英雄时代，甚至还处于自己“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圣贤时代。这是中国之幸，不幸，请问苍天，请叩大地。

十二

《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经问世，便已青史传载。

中国自《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以来，便有天人合德、敬天保民的道统，有心系黎元、致君尧舜的热肠，有讽喻时政、劝刺当朝的义责，有“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自顾炎武、梁启超、胡适之、陈寅恪、顾准以来，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有顺应世界潮流的觉醒，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秉持，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统。

先生此文，承继三千年不绝如缕的统绪，写于过于沉重的人生境遇、过于特殊的历史时刻，垂空落笔，率性而出，发世道沧桑之叹，抒遗世独立之感。八千文字，通篇衷音促节至性动人，心事浩茫苍凉，寄寓深广精微。先生那份君子情怀，那份史家胸襟，那份圣贤心曲，以国人久违的浩气、真诚、高贵和忧郁直入眼帘，直入心宅。

有先生此文，中国半世的不幸与苦涩，终算不致全部枉然，磬南山之竹难以道其万一的悲剧，有了一次代言，无数尚未瞑目的亡灵，可以发一声浩叹。

有先生此文，国人开始回收言说自身命运的权利，开始重新寻思身处的时代和世界，一种庄严而真实的国家史观开始浮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命运苍茫融合而生的庄严意义开始穿越时空。

有先生此文，微茫的希望和近乎畏怯的祈祷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年轻一代将以其天然的热血和理想分享分担先辈的一切，“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神州大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曾经集体合唱式地选择了趋时或沉默，而一个叫李慎之的长者死不改悔地选择了呐喊与孤独。是他那微弱而清晰的声音组成了另一道天问，感动无数血性之驱用心灵去敲问智慧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求索华夏儿女新的生机”(郭世佑:《迟来的申谢——致李慎之先生》)。而同龄一代已经感领到历史的慰籍：“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待。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从“时间开始了!”的开天辟地般的政权鼎盈、旭日方东般的青年胸次到危机四

伏的末世、秋肃之夜的孤灯野老，先生沉郁顿挫，赞叹复悲慨，欣喜转沉吟，以如椽大笔浓缩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风雨苍黄、天地翻覆的历史，锋芒所向，首指毛泽东。

先生深以为忧的是，“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体制实质上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仅仅在二十五年以前，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于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而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

先生极为沉痛而严正地谴责对“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十年漫漫，已从古稀之年增至耄耋之寿的先生依然悲愤难禁，绝望莫名：

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极权专政，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

从禹、汤起，中国贤明政治即有“罪己，其兴也勃焉”的传统，有“罪己以收人

心”的智慧。无论现代西式民主制度如何发展，执政者的“罪己”精神（略类基督教忏悔意识）将长期是中国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伦理约束。先生以中国人的良知良能，诉诸同为中国人的执政当局的一己天良与历史自觉，并不要求实行“罪己诏”式危及其合法性的历史性忏悔，而是以现代人“向前看”的宽容精神，以“为当局计”的容涵心胸，希望当政者顺应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提高人权的世界潮流，做“明白人”为中国“建功立业”。

足见先生天真迂阔甚而贻人所谓“谏士心态”者，是先生对最高执政当局的规劝和呼吁：“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平反“六•四”，大赦天下，抚恤受难者；不仅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实行民主政治；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向宪政政府和平交班，达致“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

1999 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敢于向当权者公开进谏，既是一种做人的勇气也是一种公民的权力，进谏总比不进谏好，李慎之不向掌握公共权力的江泽民进谏，难道要向远在纽约的曹长青进谏不成？！

——张耀杰：《李慎之的败笔和曹长青的圈套》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都是中国丧失已久的圣人之道；孔子集大成的“圣之时者”，更是中国现代道德重建的最高人格范式。

中国盛产市侩和庸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先生天然真纯，拔乎流俗，超逾狂狷，破解我执，以“不忍忘天下”的大雄风范，以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儒者胸怀，以“上天入地，舍我其谁”的菩萨心肠，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精神，为中国精神生命的昂藏和人格世界的充拓，再立典范。

昔“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称誉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所谓“东方谲谏”是也。中国在未建立宪政国家前，知识界以天下大义和人间正道开导教诲执政者，乃其圣贤志业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人性、民情、神意通过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洞察世道人心且深孚众望的人士公开表达的时代的律令和人民的愿望，是历史铁则仁慈善意而明白无误的忠告，是缓解和防犯暴力风暴、非理性灾变和玉石俱焚的恐怖结局最后的底线，也是一切专制社会充耳不闻，直蹈倾覆而追悔莫及的历史正声。

1881 年，实行过一系现代化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却始终拒绝根本放弃沙皇专制制度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革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传单《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政治犯实行大赦；二、由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和劝诫，对五名谋刺分子（包括一名妇女）判处绞刑。

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致信新沙皇，指出俄国面临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的道路；自由主义的纵容的道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宽恕）的道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年后，托尔斯泰再次致信沙皇，措辞已不再谦卑而虔诚，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尖锐的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历史条件下，

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在俄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真理与权力、良心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漫长对峙与较量并导致了举世皆知的历史结局后，由中国的真理、良知、自由代言人发出的末世天问。

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名历史代言人，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风格，贯注其中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沧桑老人特有的心境、意绪、感通和祈愿，“几若无涯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已永远以天鹅绝唱的姿态，闪耀着绝世的辉光，融入我们民族的灵魂。

1999 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朱学勤：《危城别慎之》

1999 年秋，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令时人反复吟诵的伟大文章——《风雨仓黄五十年》，严严正正、浩浩荡荡，而且满怀悲悯，要求其顺应民主潮流，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大陆一直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建设性的民间力量的威严，通过先生的笔力，得到了有张有弛、强劲含蓄的表达。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媒体告诉我们，十几亿人都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就是在

那样的日子里，确切地说，在那样一个夜晚，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文字《风雨苍黄五十年》。最美好的创世，当然其人生也有着钧天大乐吧。但我知道，最美丽的最哀伤，一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

匪夷所思。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居然在文字世界里直指人心而让我们目瞪口呆。假如说慎之先生的言行以前是面对着人群，他以孤傲掩饰了他对于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掩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那么这一次他背转身去面对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无望地诉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漫长岁月所感受到的希望、欢乐和伤痛。这是真正的大情怀，是中国传统的不忍之心，是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马克思敏感世界有违人的良心而作出的反应……。我似乎明白了慎之先生何以忘情，孤傲，白眼于世。横战，横战，……那里有着嵇康，阮籍，鲁迅……的身影。

这是请求，呼吁。“我呼吁”“我请求”，是如伟大的冰心先生那样纯良至善人性的体现。

这是抗议，控诉。“我抗议”“我控诉”，如左拉所说，人民忍受了太多太长久的苦难，人民有权利要求个人的幸福。

这是教训，呵斥。“你改悔罢”，如托尔斯泰所写。

这是审判。任何人世间的荣耀和威权，必须经过人心的审判。李慎之先生教训了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统治阶层。因为本来官学、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是须受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实在之源来裁决的。其实在之源外化为学术共同体，当一个迈向新生的险恶之旅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迟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共同体时，当其知识学术受雇于官于商，仰息于洋于书本之时，实在之源就直接降临世间，那就是活生生的人，脱去任何伪装的人。是的，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不错，在一个婴儿的泪水里，上帝的名誉都打折扣。所有那些世间的核心、中心、集体、主权，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很少有人回到根本，我们的实在之源，“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这是慎之先生对当代汉语知识的有效性和知识含量所作的贡献。

——余世存：《慎之赋》

《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上发表后，只有院纪委和中央纪委同我各说过一些话。不过都还客气，连明确的批评都没有。我也立定主意，低调应付，不伤和气。

我不愿意说这是时代进步，我只能说这是极权主义“腐败”了，要凶也凶不起来

了。有些四五十岁的朋友，初看到我的文章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以为会发生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后来看到没有什么大事，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以为共产党文明了。我本来也以为在我开了道以后，大家的胆子可以大一点，结果也并没有，倒是网上的匿名文章从那以后越来越大胆了。总之中国人的奴性，根子实在太深，毛泽东的统治也实在“严厉”，实在“有效”，中国人人权和民主的觉悟，到现在也赶不上清末民初，更不要说三四十年代了。

——黄伟经：《最后一封信》

我是 49 年 5 月 3 月日南京解放后一周参军入伍的。五十年后，我带着自己亲历的欢欣与激动、磨难与痛苦、迷茫与探寻、希望与失望、震惊与省悟，饱含热泪诵读《风雨苍黄五十年》。读到最后“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和幸福，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慎之先生这没有答案的发问令我再也忍不住失声恸哭！……这一夜，通宵达旦，我不曾阖眼。第二天，我以缩小的六号字三页五面篇幅复印了全文四十份，向京畿内外东南西北中的朋友们寄发……”

——许医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领受过“现代狂妄＋极权主义＋绝对真理”的苦难和荒诞的人们，都不难认同一个常识：真理表现于这个星球上所有成员合于自然与人性之道的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所有时代有益于拯救人、提升人、成全人的使命的所有奋斗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作为一份人生独白和历史文献，作为对地球上最老最庞大最有生命力的专制主义的世纪性审讯，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精神履历，已经融进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将长久地被中国和关注、同情中国的民族收藏，解读。

1973 年 9 月 5 日，索尔仁尼琴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对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同中国的战争、文明的绝境、俄国的东北部、内政外交、意识形态以及俄国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阿马利里克等对这封公开信作出了批评性评价，却都肯定了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历史地位：

索尔仁尼琴的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一次对原则性问题的自由讨论。

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

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争取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安•萨哈罗夫

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先生坚决主张中国走和平渐近的道路，“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革命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同时，先生正告道：天之示警，亦已至矣！中国能否避免一场社会造反或暴力革命，以良知、理性、宽容、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博爱……走先生希望的道路，主要取决于执政当局。在这个意义上，此文将是继俄国先贤之后，长久回荡中华大地的历史沉钟。

二十世纪是全球大悖论和最极端的时代。大死亡、大发展，大黑暗、大光明，大危机、大希望……一切都以极端的哲学和主义为之张目。中国是其中一道最湍急的漩流。即使在 1949 年以后的五十年间，在高度一元化的制度中，这道漩流也曾掀起过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狂涛巨浪。《风雨苍黄五十年》不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让历史来审判》、《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学巨著和历史实录，而是接近《这是我的立场》、《为英国人民辩护》、《我控诉》、《我有一个梦想》那样纯然源出性灵、良知、道义、勇气和智慧的肺腑呼唤和衷心祈祷，更是东方世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苍凉而激越、寂寥而热烈的圣哲情怀，是一颗穿透半世风雨的“中国心”、一支孤独而无畏地投向新世纪的精神嚆矢。

（下篇）

十三

历史上任何伟大文明的出现，都始于先知的预言；任何伟大文明要避免最终覆亡命运，则必得圣贤出世，予以警诫。一切历史的不公和人生的寂寞总是最先降落在先知和圣贤身上，这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现象，正是他们贵为历史前驱的明证。一声长啸，一道警钟，一座十字架吸引了无数觉醒者，正是他们向历史索回的报酬。在流

放途中，在绞刑架下，在月黑风高的末世之夜，在大限将至的最后时分，他们如同历史候鸟高翔于旧世界的的极地通向新纪元的绿洲上空……

先生于世纪之交对中国社会的告诫和预示，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棰暮鼓，二十一世纪第一声晨钟。

世纪之交的中国，在世界急剧变形和展开的格局和秩序中，日益居于特殊的处境和地位，关于中国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中国在历史选择和世界精神归属上已经接近俄罗斯曾经面临了三百年的历史性两难：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专制还是自由，战争还是和平，复活还是绝灭。

自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以降，西方从成吉思汗蒙古铁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蛮规模中一再感受到"黄祸"的恐惧；西方的哲人则怀着更深的忧虑望着东方，望着亚细亚，望着中国：

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

——亚里士多德

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

——孟德斯鸠

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

——黑格尔

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理查德•琼斯

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

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卡尔•马克思

只有恩格斯天才地预见到，继英、法联军“部分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封闭传统后，历史将通过中国的亚洲近邻日本，以战争之手“彻底结束”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并更加天才地预言，破产了的中国将有“大批苦力”流入西方世界，加剧那里的总危机，从而产生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也将促使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拿破仑还是马克思，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都源于西方的逻辑和利益，未必能悉数道出中国的奥秘和命运。

中国在东方的崛起，中国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重新定位，中国国家哲学和民族精神的重新确立以及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都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改变中国、东方和世界的面貌，中国再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先生正是在中国最终何去何从之际，以中国古老的圣贤智慧和现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向中国发声，向世界发声。

一位八旬老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心境是苍凉的，他有杞人忧天的焦虑，有唐吉诃德式的天真，有人皆有之的局限、惘惑和谬误，他只能对中国最基本、最重大、最紧迫、最让他难以释怀、难以瞑目的路数和去向，“尽心焉尔矣”。

不，先生至死也声若洪钟，目光如炬；先生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乃是西方未曾有过、东方睽违已久的“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金声而玉振”的当代集大成“圣之时者”的思想“巨资”。

十四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专制主义制度，两者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临近终点。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中国的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中国专制主义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的可能。

先生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国”一词，但已预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

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而“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作为数量上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

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先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李慎之：《和平奋斗兴中国》）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是中国人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就是这股“虚骄之气”几致中国于死地。二十年过去，中国人口袋里的钱稍稍比过去多了一点，但这股虚骄之气又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本着国家主义的实质开始冒起来。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感觉和大提防，这是植根于巨大的历史异数和剧烈的文明创痛的忧患和预感。中国专制主义如果重新复活，它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纯属虚幻的景象，却是曾经笼罩了中国二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中央之国”转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再转到“大中华红色帝国”，并不只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的梦呓。

中国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幅员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弭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高耸而立”的大帝国的历史资源。一言以蔽之，中国步武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泽东之后尘，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

君不见，无论“极左”还是“极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家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会在高唱“大中华”时热血沸腾，都会为“巨龙腾飞”的远景热泪盈眶；

君不见，中国国家主流传媒决不与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权、信仰领域，更不在国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价值、全球伦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开严肃的对话；

君不见，中国一些狂热分子的激进主张（《中国可以说不》、《超限战》、《为中国声辩》等）几度走红，广有市场；中国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时的“自由”而“独立”的狂欢表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国家电视台通过直播，通过中国的“天之骄子”——北大、清华男女学生——对美、英国家元首的挑衅性（当然是经过安排的）质问所表露的骄狂、轻蔑和敌意，乃是向数亿中国青少年暗示和引导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见，无论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无论伊拉克战争还是巴以冲突，中国都从来不站在西方一边，官方军事评论权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电视上教诲萨达姆卫队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烧死美英联军，而对美、英联军的任何伤亡、失误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

一言以蔽之，中国拒绝与西方握手，拒绝与西方对视。——除了满清王朝式的颟顸虚骄外，中国统治当局还另有一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另有一套世界观和世界战略。

如果以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纯正社会主义”、“超大国时代”、“大亚细亚主义”、发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权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开集会支持希特勒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主义”运动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海森堡、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经济学大师沙赫特、艺术史家平德尔等纳粹知识名流；如果以先生为祭酒的中国知识精英公开宣扬“国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国高于一切”、“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以先生为矜式的中国学人公开拒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开对抗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开颂扬绝对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爱国主义、奴性集体主义、工具英雄主义，那么，中国离帝国之途，也就一步之遥了。

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最危险最有害最凶险的误

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包括近二十年的物质成就）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极其反动、极其无耻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启示录式的威胁。

当这种东方、亚细亚和中国式的专制主义还没有溢出它的边界、还没有尝试它的世界形式时，先生与无数国人已经从内部饱受过它的残酷刻毒了（中国红卫兵一代和“群众专政”犯下的罪孽难道不比希特勒德国的党卫队、冲锋队和斯大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吗!）。皈依专制，拥戴独裁，效命帝国，意味着对中国和人类一切正面价值和理想的蔑视和背叛，对现代文明的反动和对人类本性的进攻，也是对一己生命不可宽赦的犯罪。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条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忠诚和挚爱的大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先生为中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与权力当局和弥漫全中国的物质崇拜、权力崇拜、国家崇拜、专制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之间最后的分野，就在这条大限。先生晚年全部圣贤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这条大限，守住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守住中国的生机与希望。

让我们再次回到苏俄（整个二十世纪，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最深，中国至今没有正视），借几名先知之笔对这个曾让东、西方同时发抖的大帝国最后的崩溃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预见到苏联帝国崩溃的，是一名西方剧作家。

1949 年，东、西方冷战铁幕垂下，苏联已牢牢控制着东欧，斯大林几乎成为人类“救星”时，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发表了四幕历史喜剧《罗慕路斯大帝》。这位自阿里斯托芬、易卜生、萧伯纳和布莱希特以来最出色的西方戏剧大师，借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一历史戏剧主人公，天才地预示了四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名苏联末代总书记的出现。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运用“老良知”和“新思维”，让历史上最强大也最不义的帝国寿终正寝。

当女儿和女婿愿为罗马牺牲，妻子谴责他背叛了帝国缔造者，帝国元帅、财政部长和骑兵队长都发誓与日尔曼人血战到底，宫廷侍从深信“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根本就不会完全崩溃”时，那位唯一领悟到历史真谛的先知说道：

几百年以来，我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现在，该是国家为我们作出牺

牲的时候了。

罗马早已死亡了，你们在为一个死人作出牺牲，为一个幽灵而战斗，为一堆倾圮的坟墓而生存！

几百年以来，大罗马帝国之所以还存在着，就因为它有一个皇帝。因此对我来说除了自己当皇帝，以便有条件消灭帝国以外，别无它法。

不，爱祖国不应该超过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忠诚比对国家忠诚要伟大得多，也困难得多。

我们的爱没有使罗马变得善良。如果祖国变成杀人犯的巢穴和刽子手的屠场，就把它弃如敝履吧，你对它的爱已经苍白无力。

背叛了我的帝国的不是我。罗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却选择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却选择了暴政。罗马历代皇帝的宝座由层层头盖骨堆砌，建基在无数牺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债务还没有偿还，罪孽还没有清算。一夜工夫时代已经破晓，牺牲者的咒语已经应验。

我一生都算计着罗马帝国崩溃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当罗马法官的权利。我牺牲罗马，通过牺牲我自己。

无所畏惧地观察世界，无所畏惧地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学会战胜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必须掌握的唯一本领。

1969 年，正当苏俄帝国处于其鼎盛时期（刚刚严厉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准备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一劳永逸”地削弱中国，解除中国的威胁），犹太裔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就在《苏联能生存到 1984 年吗》一文中预言：“这个由日耳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东斯拉夫大帝国已进入了自由生存的最后数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经延缓了罗马帝国的覆灭，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灭亡；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推迟了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的崩溃，但无力阻止它的崩溃。”

四年以后，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忠告俄国：“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1994 年，索氏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苏俄解体，分崩离析，“俄罗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状况”，索氏的告诫一语成谶。索氏再次对祖国发出呼吁：“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应当指出，在没有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条件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帝国几乎

自行解体，乃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对于解除冷战和热核战争的毁灭性威胁，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对于世界的缓和与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复兴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而对于俄罗斯人民，却是在经过了 74 年的漫长苦难、付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价后，才看到了那个专制帝国寿终正寝的一天。

“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制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9•11’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中国不能重复苏俄的老路，中国并非没有重蹈苏俄覆辙的可能，中国如果走上苏俄帝国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结局将不堪设想。

十五

先生已经站到中国和世界历史交汇的时空高处，他的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是拦截和阻断中国专制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牌号的专制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流，尤其要警惕这种合流泛滥成“绝对”和“极端”的大帝国祸洪；同时，推助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价值融汇，再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潮流中的庄严复兴，为东西方文明的伟大遇合，开出新路。

这就是先生圣贤视域中的中国救赎之道，先生全球视域中的中国复兴之道，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后四十年间，长期面对一个大困惑：中国专制主义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全面复辟且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样才能最终消灭专制主义？

在生命最后几年，先生单枪匹马对中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一次严正的审判。

先生绕过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里查德•琼斯到马克思、列宁、魏特夫等西方人关于“亚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诸理论大厦，撇开中国官方学术界仰人鼻息奉为圭臬的“五阶段论”的历史笑柄，“截断众流”，独自闯进中国二十世纪的昏暗堂奥，擒住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头“东方利维坦怪兽”的“总角”。

先生“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论”，首先直接将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专制主义“老祖宗”秦始皇，将公元前 221 年秦嬴政自称“始皇帝”“立定”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元年”，指认王夫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为秦政”以及毛泽东“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谓，“实在千真万确”。“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 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

先生明言，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国第一个“大成至上”的专制帝国，是“中国停滞论”真正的历史起点。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灾难性的断裂、变异和倒退。它“车同轨，书同文字”，“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结束了天下共主、列国并立的封建制度，“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铮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

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军事官僚专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传统，将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国的头颅和心脏，它是比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严酷千百倍、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阴森、最封闭的专制帝国，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共和国；“五•四”运动引进了“民主”与“科学”；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四强之列；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了，而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高峰”，而毛泽东竟公然标榜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最当红、其父辈没有少在 1949 年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尝够专制滋味的电影导演，竟也为秦始皇招魂，将“英雄”的桂冠套在这位专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头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为什么“整个二十世纪，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什么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正脉”？毛泽东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正脉”？专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正脉”？

先生拨开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层思想迷雾，“以其历经世变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傅国涌语）洞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过军事战争夺取政权，建立起“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其次，创立一套旨在维系、阐释、强化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正流”已转向为“一

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几乎受到中国古代所有学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学和形而上的终级意义。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共荣共损，缺一不可，且共存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数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躯体之中”，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躯”不仅无情而有效地统驭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肉身和内心，而且“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一切外来的现代化因素。

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直没有断绝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而且，由于其社会基础迄今仍然存在，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单靠西方理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尤其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精神，因为几乎不存在地缘、空间、事实和经验的联系和交流；而欲观察近现代中国，则必须具备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历史文化贯通解读的眼界和器识，先生正是以其丰富的中国经历，以其对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交互历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对中国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历史环境、资源、动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思考。

先生强调，“‘五•四’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序》）

但历史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那样壮观而持续的时空舞台。相反，历史以其诸多“意外事件”、以其诡秘不宣的“偶然性”几度搅乱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步伐。

由西方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纵容的“二十一条”、半西方人的俄国人发

动的十月革命、俄国人声称的《加拉罕宣言》、《越飞－孙文宣言》以及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这些本来与中国无关、至少不由中国负责、更不由中国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国极少数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现代认识和现代设计，而大幅偏离、最终背弃“五•四”启蒙运动，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严重断裂和错位，乃是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

先生以过来人和觉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从 1919 到 1949，开头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真正使“五•四”运动发生变形、转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迹更有压倒性力量的是“源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即源于“从俄国革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源于“要求达到社会运动根本解决的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史观”一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崭新的历史理论和世界观；源于“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艾思奇、李达、邓初民、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沈志远、钱亦石、潘梓年、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以及陈豹隐、王亚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和左翼知识人为骨干（这个“理论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换成同样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写作班子”），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奉斯大林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百科全书’”、实则充斥着谎言和谬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编写的《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新政治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作为普及读物‘启蒙’了一代共产党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由于二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苏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特殊贡献、二战后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胜利以及东西方冷战的降临等一系列国际事变，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 1949 年的胜利”，“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且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此，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于是，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中国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士终于读到这样一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于是，中国人终于从“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极度概括、极端坦率的表白里，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从毛到邓，他们这一代讲的专政，同三权分立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的苦头就够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实际上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从中国继承了秦始皇，从国外继承了斯

大林。”（李锐语）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于是，中国人也终于等来了历史开始复归正道的启机：中国现代集大成的专制主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结局遭到“全盘否定”而丧失了在中国的公开“支持”；又因为苏俄、东欧的和平“易帜”而丧失了来自世界的公开“支持”，专制主义终于临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承认，他是经历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练和艰难思索，才正式与中国新老专制主义集大成者决裂，势不两立。

先生仍然忧心忡忡，“五•四”民主启蒙被“新启蒙”取代，而无论“旧启蒙”还是“新启蒙”，都一概成为了专制主义的牺牲或奴仆。

“‘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的陈独秀，当他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的时候，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他的话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一贯倡导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适和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生，在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的揭露和鞭挞其力度无可比拟的鲁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剧左转，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而中国“新启蒙”的左派们（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员）在领到“黄金世界的预约券”、进入由“新启蒙”催生的“新中国”后，所受的磨难和意外，更远胜

于“旧启蒙”的先贤。

真正的、唯一的胜利者，仍然是“几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态，深深地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都有反复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罗网是何等困难”。“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地换一种‘活法’，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专制主义的毒素不仅远未从中国的社会机体内排除干净，而且在特定环境下，还可能引导和促使民族主义的“恶魔”成分突然转化为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对阳光下的份额”、“权力意志”和“生存空间”的觉醒和渴望，极大地增进了财富和文明积累，同时催生了欧洲十九世纪两股最强大的思潮：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一旦与被伤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规模庞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运动相汇合，就会焕发空前强大的盲目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与某种邪恶有毒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就会产生二十世纪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式的恐怖帝国。

曾把欧洲和世界以及德国自身拖进深渊的“第三帝国”，其精神内核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后者在十余年时间里迅速演变成“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演变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始力量，演变成“人民性——民族性——兽性”的法西斯历程。

先生曾再三总结他所属一代中国人的铭心刻骨的迷误和觉醒，以作中国年轻一代和全体国民的倾覆之鉴。“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斯大林）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程度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在审视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时指出，“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号召‘解放全人类’。中国的红卫兵也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岿然不动。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为削弱，从根本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成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方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十六

先生常说，他是以长远的乐观来掩盖眼前的悲观，但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眼前的悲观而放弃当下的责任。

先生最早最坚定向国人呼吁：回到“五•四”，“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呼吁中国修改宪法。他希望中国参考美国制订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经验，“早早修订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无须作重大修正的宪法，这正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主张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他告诫说，“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控一样，造成惨剧”。

先生个人念念不忘、身体力行的，是在中国、首先是青少年中间，推行公民教育。

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都是公民课最起码的内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

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它不但为四个现代化提供前提，也是为四个现代化设立目标。

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 12 册（备 6 年 12 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 6 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 6 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 21 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先生置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禁锢于不顾，兀自召开会议，作出规划、分工。除了何家栋先生几位清贫志士“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外，整个社会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切，都丝毫无损先生践行这一宏大而朴实的“志愿”的古道热肠。无数后来者是否会从一个八旬老翁的夙愿中再次倾听到中国古代圣贤的不朽誓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当中国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公民社会时，亿万男女公民也许早已记不起曾有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他们的公民尊严、权利、责任、义务而流尽最后一滴心血。先生当不会为此悲哀。

无论西方哲人抑或东方圣贤，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传播真理、绵延文

明。苏格拉底不惜生命代价而为“青年的导师”，托尔斯泰以誉满全球的声誉却不惜花费精力为孩子们编写“初级课本”；中国自“万世师表”孔夫子以来更有两千五百多年“师道”传统，近代仁人志士无不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新民”的精神致力于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复兴。

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卓越奠基人晏阳初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外，提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睁开眼睛，识字读书，扩大心胸，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壮体力、组织力，为中国新民”奋斗了八十年，而千古传颂；

梁漱溟、卢作孚、张伯苓、罗家伦、陶行知、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等先生都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呕心沥血，卓然成家。据称，就连没有接受过现代完整教育的毛泽东，晚年也厌倦于“领袖”、“统帅”、“舵手”一类缺少雅望的称号，只希望保留“导师”一项，称其晚年的愿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员。

先生“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的心愿，最与陈独秀晚年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略同。陈独秀晚年患高血压，不顾“左边耳聋、右边脑子时时作痛”，将生命最后三年全部用于“下一代儿童能循此学习，当省却许多脑力”的识字教本上。“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陈独秀只好独自辛苦，当写至下篇《合体字》“抛”字时，还未作解释，便成绝笔，连《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对稿也没有看到，这名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新文化运动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穷乡僻壤一户简陋的瓦房里抛弃尘寰，撒手西归。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优秀的小学公民课教员，青年时代自己做了深受欢迎的中学公民课教师，从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发心，致力中国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时时都在为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老师！”

大概是 1999 年 8 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

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始终保持谨慎而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得到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以及历史事变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大势的"支持"。

先生最后的信念和支持，则是源于他与现代专制主义长期对峙、从生命意识最深处喷涌而出的现代中国集大成的圣贤世界的支持。

十七

当代中国，孤独、悲观如先生者，可谓寥若辰星；通达、乐观如先生者，也可谓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国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最宽广的谱系之间，展示着一个圣贤生命的光彩。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前途持长远的乐观，因为：

"真理在我们一边"，

人性在我们一边，

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一边；

天命、上帝在我们一边。

先生对中国最终寄于乐观希望，是因为他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复兴自由主义，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维尔，推崇他在"后极权社会"中呼吁人们凭良心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离奇实则真实可靠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应当永远谦卑。"

先生是 1949 年以后最早反思和警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他曾为此向毛泽

东提出实行“大民主”，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并主编过中国唯一一本《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他隆重推介哈维尔，因为这名捷克剧作家不仅也是从斯大林绞肉机里“滚”出来而继续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是东欧“天鹅绒革命”一面胜利的旗帜，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战胜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典范，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先生从哈维尔身上发现了铲除专制主义的最寻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从每一个人内心一点一滴地剔除专制主义的存在基础，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话”的权利消解、挑战以至最终终结专制主义。这与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一样，都是直指本心、诉诸人性的大智慧。

历史没有以苏俄（它的巨变太艰难太复杂）、而是以一个东欧小国的自由之光来显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锐的眼中，它已经足以让中国欣喜、振奋、向往了。

先生几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维尔的貌似简单的话，想必也可作为他所希望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最终胜利的借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良心的声音，甚至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责任。

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

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先生诸多愿望之一，是为中国人编撰一本苏俄、东欧二十世纪史。先生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深刻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巨著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译者之一，对二十世纪为祸世界的极权主义有极深刻的研究。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先生更有切肤之痛。完全可以设想，由先生主其事编撰的与“第三帝国”孪生的“第三罗马”的兴亡史，一定会使中国从极权主义浓黑的阴霾中再次惊觉。“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自由不仅出自人类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间最基本最普遍最无须强制和阐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离不开自由。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历史运动，莫不高举自由的火炬。对自由有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也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甚至在骨子里从不理解自由为何物、视自由如寇雠的造反派头目毛泽东在掌权以前，也没有少以自由相标榜。

使将来的历史学家难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一度成为洪水猛兽式的异端，成为国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为修辞学上的一大避讳。

西方经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大反自由帝国的兴亡，自由主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现代西方自我约束、矫正的天然武器。中国虽然不必从头开支构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却必须践行自由主义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也未必能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权威，而是 1949 年、1989 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两度中断之后起死回生的“破题人”、自由主义实践的领头者、自由主义目标的预告家。

先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抱有罕见的乐观，他的理由未必赅备、深刻，却以其特有的“宏大叙事”风格，为中国自由主义展示了历史－逻辑的趋势：

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

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

十八

公元耶酥 1840 年或孔子 2391 年或略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向，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第一次与世界结为一体。对于中国，这是开天辟地未有的大变局；对于世界，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无论有多少迷误、悖谬、悲剧以及惊觉、抗争、成就，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现代复兴，都只能在与世界潮流的际会和融汇中，才可能求取。

无论中国如何惊涛骇浪、经纬万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趋势、方向引进中国，以中国古代伟大德慧把中国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终摆脱厄运、晦气和异变，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性触媒，是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中国现代转型风雨如晦之际，为中国另辟路径、为中国历史贞下起元式的现代悖兴而英勇前驱的精神摩西。

1991 年，“六•四”血痕还淤积在中国人心底，尚未结痂，吾尔开希一类专制主义“类人孩”（余世存语）还在自由世界上演权力争斗和阴谋政治令人恶心的丑剧，国内思想界正以“识时务为俊杰”、“现实即合理”的东西“哲训”自行瓦解、自弃理想，随波逐浪，中国重归于无声。

“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万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助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开阔、气象之宏伟，当今世界，无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从书斋式学术的角度，也不以某种“历史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名义，甚至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命运出发，而是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本性”、“人类的宿命”以及人类文明与世界全球化的历程，以一己生命的体证和整个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经验，面对全球化。正是通过对全球化“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反复运思，先生终于为中国觅见到从危途转向正道的历史契机。

先生在回首中国二十世纪的苍黄风雨时，极近杜翁当年心迹：“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国，放怀天下，思接寰宇，虽一样是满目苍茫，满腔悲悯，却别有无限渺远、高旷、超然的心事，有豁然开朗的大会通、大参悟、大希望，对世界、宇宙满心感戴、赞叹，对人类诗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果

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先生在中国设坛开讲全球化，正是“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后五百年，先生称之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开端，其间经过“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和文化的渗透”以及“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先生称之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 年先生先后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太平洋学会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 500 年纪念会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国，可能是我，最早在 1991 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识》和《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与全球价值》），并定该年为当代全球化的“元年”。

先生指证，当代全球化发轫于二十世纪末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期间若干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和文明领域同时或相续出现的重大变化。“从 1989 年柏林墙的坍塌到 1991 年苏联的瓦解，到 1993 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 1994 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先生深切了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历史的多变，他在倡导全球化一开始，就对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国发出告诫，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良辰美景，

“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磨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

有人类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创造转化的现代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又将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各种文明、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带到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在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机已经扩张为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缪塞尔•亨廷顿眼中的全球危机。

先生是长期高度关注全球危机的中国人。

先生知道，中国的危机是世界危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大危机存在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战争，人类几度濒临共同毁灭的绝境。

1955 年 4 月 1 日，爱因斯坦与罗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鲍威尔（英）、约里奥•居里（法）、英费耳德（波）、汤川秀树（日）等东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来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人类应再次庆幸，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冷战嘎然而止，核战威胁急剧减轻。这最终应归功于有一千多年东正教传统和近八十年极权主义痛苦经历的俄罗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这个高尚而伟大的民族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永远值得人类铭记。

现在该轮到中国来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与一个世纪的磨难，同样可以转化为救赎与复兴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为神意般地降临于中国的天命。

十九

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到西壁。

而今收拾归来，依然水涟天碧。

先生有幸越过二十世纪，他的经验和智慧得以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采。作为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断，中国决不能再次自外于世界潮流，决不可再次对立于西方主流文明。中国二十世纪悲剧性、灾难性的历史抉择（或被抉择）是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纪录已经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的本来面貌逐渐浮现，当无数冤魂要求历史的公正审判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精神重轭和道德责任，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留给世界的仅仅是一堆堆历史的废墟时，先生率先站到了当代全球化的入口处。

先生以抑郁、忧伤的笔调描绘了全球化的危机。除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基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化的问题”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机”。

我们宁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种讨论，它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需要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价值观（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使人类能过上比较合理、和谐、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先生特别告诫国人：“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它们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有山连山！’”

两千余年间，中国尽管战乱频仍，封闭停滞，但始终没有贯通西方历史的宗教“圣战”，儒释道从未出现不共戴天的仇杀征伐；但现代专制主义强加于几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灾难，却远胜于西方世界。中国人至今远未摆脱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和禁锢。先生曾深受意识形态之累，深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祸之烈，先生是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第一个呼吁及早“确立”全球价值的中国人。

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向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虽然没有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全球化（这种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但他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避免再次误入荆棘之途，为中国顺利走进全球化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历史前提，为中国可望对世界全球化发挥正面影响并做出特殊贡献而作的总构想，却极富原创性。在漫长的迷茫和黑暗之后，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以中国独有的圣贤心地、圣贤德慧、圣贤胸襟和圣贤气象，对中国与世界之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观照和综摄。

中国要自信、从容、尊严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复兴和光大中国文化，首先应自觉扫除二十世纪的历史残渣和思想迷障。

必须批判和反对东方的、亚细亚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必须辩识和剔除专制主义孕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

必须警觉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必须全面改革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

必须及早进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会、公民国家；

必须彻底摒弃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专制主义灌输和强化的世界观、历史意识、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重新开始“新民”、“新人”和现代启蒙运动。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和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李慎之语）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全球化时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厉害，洞若观火。……对外国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

文化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世界对中国的“疑惧”，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国自己去实现。

先生曾再三辩析、再三证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其称谓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创造，却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来的文明历程和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它们是源于人类本性、符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应以真正“泱泱大国”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摒弃已彻底破产、对中国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地与西方主流文明合流。——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对中国殷切的期待。“二 000 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确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正脉的儒家学说，最积极入世，最谙沧桑变易之道，并以“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国悠久丰富的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不难认同和践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积累如此丰富。我可以说，无论什么现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资源。……现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于中国古来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转语’，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李慎之、杜维明先生对话录》）

亚洲文化中本来就有趋向民主的传统，亚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已具备发展民主并且使之超过西方水平的条件。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哲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民本政治”，亚洲的民主哲学思想并不亚于西方。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中国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

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大西洋宪章》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自称，“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民主的底线在于防止"人行不义"，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则在于"人行正义"。"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种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英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在先生看来，西方主流文明宣扬和推行的现代普世价值，不仅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西方的阴谋，也不是高深难懂的天条，而是真正有益于中国、值得中国认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够实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础规则：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毛泽东曾在腥风血雨的文革中期说了一句至今令老辈国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种把"封建法西斯"发挥到"顶峰"的"慨而慷"的"万丈豪情"，已行将被代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时代精神彻底埋葬。先生已经无限欣慰地道出了历史的真谛：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实行民主，行吗？

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俄国为此付出过 6,600 万条生命。"索氏

呼吁苏俄领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给他们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他们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去负起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个古巴一天就需要 100 万，更何况还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陆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历史已反复表明，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尘封在一种纯粹外来的、僵化的、绝对而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王国里。只有最狂妄、最冥顽不化的疯子和白痴，才拒绝认同数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样数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对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汇融合缺乏起码的谦卑和热情。

先生与所有中、西往哲时贤一样，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现代"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文明所独具，而是植根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同源"、"地球是圆的"、"只有一个地球"以及全球伦理的惊人趋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物质－精神结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恶、私欲、本我……），由于地缘、种族、信仰、文明特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普世价值"充满了各种内在和彼此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未必能单独支撑人类文明的殿堂、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评价西方有识之士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深刻洞察，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为解除这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衷心欢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请教的新姿态，同时，先生以"君子求诸己"的东方风范号召国人："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参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矫正中国命运的必需，而中国真正的使命却在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古来的圣贤，都是东方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也无不怀有深邃的“天命”意识。中国的真精神、真生命向来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远人，其亘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关注国家命运，一面沉潜于“天命”的无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灵的境界与世界的悠久无疆，与人类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终点达到一种圆满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诋中国文化传统为专制主义恶魔，同时坚信，一旦解除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无比丰富的价值将彰显于世。而一经放怀全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立即全幅呈现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绝大多数传统主义者都不曾看到的壮观景象。冥冥之中，中国古老、伟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时空，在一位八旬老者身上凝伫、韬光、辐射、辉煌。

先生以“返身而诚，善莫大焉”的中国君子之道，诚心“折服”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和尖锐的批评：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CRISIS），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A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国的“自信”、“中国性”，“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艰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后重新收拾旧山河、重新上路的伟大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国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励，重新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领袖群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中的大国风范，真正以“泱泱大国”的标准约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深刻反省极左思潮，恢复人的尊严，继承并且发掘中国的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精神，来一个再启蒙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而哲学在唤醒人的觉悟方面所必须依赖的历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却决

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办法是“开发”我们本来的“中国心”。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如何摆脱目前这种“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状态，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

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中国人历来还认为知识的东西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点真精神。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目前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和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天将降大任于中国，此其时也。中国古代长期被人（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诟笑的“大而不当”的“空疏无用的学问”（诸如人极、皇极、太极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伦理哲思），在先生眼里，正是中国所独有、当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现代性文明资源，二十一世纪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价值。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汤因比等西方贤哲也早已承认，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对于当今世界的分裂冲突是一种“绝对需要”。

西方曾经过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一场回溯希腊、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复活了基督教的内在信仰精神，而且为西方乃至全球提供了近代和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普适价值。中国为何不能经过两千余年专制统治后，通过一场先生梦绕魂牵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且有效地矫正和补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现代危机，为人类的共处和全球价值的确立、丰富和升华开出新路。

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后，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

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现代文明，都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以个人为中心，直到“人权高于主权”。先生明确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神本主义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神本主义而发现和确立了“大写的人”，中国则可能在全球化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怀中，将自己两千多年囿于专制统治而压抑变形的人文主义的辉光普照于世：

当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并不因其过去的缺陷而丧失当前的意义。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寒儒尊官，也不论他一生的遭际是荣华富贵还是艰难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从中感到一种乐，总是能以微笑来面对惨淡的人生。

在今天这个充满紧张焦躁、危疑忧惧、孤独感、疏离感的世界上，难道不正是中国哲学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时候了吗？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给人伟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为它把个人的价值源头归之于生命源头的宇宙。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 21 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

——李慎之

“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实际上作过‘全盘西化’的绝大努力。即使全盘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两个‘决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李慎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式的“全盘西化”（全盘俄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值得总结和记取的历史性教训。也许那是历史的宿命，但绝不能再将这一惨痛的教训带到二十一世纪，因为它完全有悖于堂堂中华的古老智慧和大国风范，也有悖于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能再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更不能与任何其他反对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趋。中国曾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征战杀伐，但中国先哲崇尚和平、宽恕，反对暴力和仇杀的恻隐仁慈之心，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当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恶”的消极和平祈愿更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相处的基本伦理：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尽管秦始皇不惜“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可悲结局，蒋介石不惜花园口决堤以阻日军而酿成为祸中原的黄泛区，毛泽东更不惜发动大炼钢铁运动、几乎砍遍神州赤县以逞一己之私，尽管中国从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国几千年来，从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农耕文明启示于中国的东方信仰：“参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谐”。一袭“天地君亲师”，道尽中国价值系统的妙谛。

作为中国文化之本的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出发，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神话与迷信的哲学，一种完全与当代的广义进化论相契合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引起西方科学家

的惊叹，被认为是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的先人是通过冥想、参悟、亲证而达到这样的“极高明”的境界的。中间并没有经过足够细密的验证与推理的过程。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中国哲学的本原是忧患意识（以区别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识）”（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历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国者，苦难、悲剧、忧患如中国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顾天命，背离使命，沦落到物类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显于中国，命运终于开始垂怜多灾多难而孤苦无助的中国，天命终于开始垂顾饱经忧患而自强不息的中国。先生集一生的磨砺、才华、德行、忧思和聪慧，以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气势和胸怀，已经遥望并描述了中国的伟大使命：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２０世纪到２１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这样一来，讨论了 100 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说，人是秉承着神圣的使命而出现在宇宙中的，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不过是过眼烟云，创造今后万代继起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缘”。从上个世纪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中国争得个不不亦乐乎。其实从中国哲学来看，只有全人类的共性、全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体”。把这样的观点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贡献。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只要我们能直探中国哲学之本源，而综观各家各派之会通，就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以宇宙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总系统的思想是一种最少武断、最少迷信而完全能与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发明的哲学。按照人类进化的原理来推测，人类必将逐步发展出对宇宙、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一系列共同观念，中国哲学将是世界各种哲学中最能与之相包容的哲学。

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提高、物欲横流所造成的危机以后，人类必然要进入一个在精神上自我调整的时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复兴将是一个大趋势，而至少在中国和中华文化圈内，在十亿人的范围内，中国哲学将在百年陵夷之后重新展现其价值。人们将在其中得到寻根究底的智力上满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道德上的满足。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国先知留给世界的遗嘱。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份没有个人私心、民族偏见和时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类之子的钧天祝祷：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

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国使命，也是中国文化不断慎独、不断反省、不断调适而上达的过程。先生敢于为中国向世界许下如此崇高、伟大、神明的诚诺，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东方的谦和与自知，谨守着人类的本真和良能，透识着世界精神发展的辩证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困境和危机怀抱着的深沉的警惕：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们要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己做出榜样来。

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虽然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二十

由先生这样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东西且经历了现代中国的苍黄风雨，对中国道路

和世界趋势有深广而清晰的视野和坚定而慎重的判断的思想大家来为中国的全球化抉择奠定一个总原则和大方向，由先生这样一位“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现代圣贤来为中华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安顿和命运与使命的归宗立开山之功，避免中国在二十世纪几度误入歧途的历史悲剧，推助中国与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国与世界，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

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当代中国对世界无何估量的份量和意义，以先生对中国与世界安危祸福无与伦比的集大成的体证与思考，先生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现代诸先贤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熊十力、梁漱溟、顾准……，而与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让•加尔文之于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之于文艺复兴，哥白尼、伽俐略、牛顿之于科学革命，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之于启蒙运动，歌德、席勒、赫尔德之于狂飚突进，弥尔顿、雨果、左拉之于社会正义，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德、托克维尔之于自由精神，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之于白银时代，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之于非暴力主义，吉拉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昂山素季之于反抗极权主义……为伍，进入了人类文明创新和自由先驱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托命、一个世纪的整体经验、教训献给世界的东方之礼，昭示中国文化复兴和伟大使命的时代先知。

先生抵达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时，已届暮色苍茫的八十高龄。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结果不是只成为一个笑柄了吗？”多次申言，“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多次申言，他是被吓破了胆的人，“战战兢兢、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个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是有罪的，看到年轻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弯路，我的经历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当过二十二年右派，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损失的时间无法弥补”；多次申言“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先生只是 55 万右派人士之一，十数亿中国人之一，芸芸

众生之一，“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一。但他在古稀之年开始觉悟，自行精神变法而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达不可限量之境，遥承中国圣贤人格而充实光大。他在中华三千年变局与西方五百年全球化之间，在一世纪的风雨之后，“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为中国思想的创化精进、为中国精神的复兴光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中国二十世纪守墓人、二十一世纪敲钟人。

当你目击末世苍黄黯澹之时

便是你驻足新纪元曙色微茫之日

当人们正在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和预料之中的人祸相结合而深陷苦难的时候，为人们的自由而不避个人祸福，奔走呼号，充满智慧而又极具勇敢精神的慎之走了。

慎之永远的走了，不会再回到这最需要自由呼吸的人们中间。

但是慎之的呼声却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争取自由的呼唤将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

——朱厚泽：《另眼看世界——念慎之》

这十来天，天天向他家中探听病情，总存一线希望。昨天上午噩耗终于传来，痛心之极。暂写这几句话，并吟得一绝、一律，向你告别。慎之，你放心，我们会永远向前！

痛感始皇难绝缘，

晚年拼命讲人权。

曾经一语当今劝，

思想领军永向前。

君有奇才未遇时，

晚年方得展雄姿。

学兼中外多新解，

思贯古今少旧辞。

敢逆潮流培气骨，

岂依权贵弄胭脂！

天公不假斯人寿，

春雨滂沱哭慎之。

2003年4月23日

——李锐：《哭慎之》

上联：上下五千年，唯通达者振臂疾呼，重扬五四精神，速开民主!

下联：纵横全世界，有明智士运筹帷幄，立足人本思想，强我中华。

横批：真理在战斗中永生

——黄鼐：《痛失英才》

去年年初，王若望、王若水先生相继辞世。今年四月，吴祖光、李慎之先生又离开了我们。老成凋谢，哲人其萎！我的悲痛是难以言宣的。

——林牧：《悼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远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这些天来，我虽无伯牙碎琴之意，但却有丧魂落魄之感。

——何方《悼慎之》

或许，从此不再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再有声情激越的危言谠论，不再有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不再有暮鼓晨钟的警世之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感受到因为他们的辞世而带来的空虚与缺失。那就好像莎翁的戏剧中没有了哈姆莱特。

——王焱：《最后的士大夫》

绝望几乎击倒了我们，世界似乎步入了末日黄昏。就在人类最需要精神领袖在旷野呼喊前行之际，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精神领袖李慎之先生又离开了我们……

李慎之先生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追求自由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而他的去世也可能意味着这种追求最后还是“失败”了——SARS恐怖为中国自由主义举行了一个悲壮的葬礼：当中国还没有进入自由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历史似乎快要终结了。

——任不寐：《自由主义的黄昏——悼李慎之先生》

李老的声音永存，李老的理想追求永继，由先生一人所持的思想火炬现在已由众人高举了！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先生安息吧！

——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

明知道义与失败为伍，仍要选择道义而凛然向强权挑战；明知是空谷回音，仍要宣告人的尊严。以匹夫之力与命运抗争。绝壁而立，逆水行舟。勇者大无畏的气概、仁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智者洞穿历史黑洞的眼光，备于一身。

这就是英雄。这就是圣人。李慎之就是这样的英雄，就是这样的圣人。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病躯，以弱管，孤独的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强大机器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却并非没有意义。强权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在一夕之间冰消瓦解，但至少有所畏惧，知所忌惮。无权者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一夕奋起，至少可以反思自己浑噩的灵魂和浑噩的生活。一盏孤灯怎么可能普照天下？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黑暗是可以刺破的，长夜是有尽头的——无论它怎么长！

我们所在的俗世没有神，但是有神之光。真英雄、真圣人就是神之光，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神之光。他燃烧自己以烛照俗世，温暖俗世，直到最后一刻。

——笑蜀：《祭慎公》

纵天不悯病斯人，纵地湿卑蚀我形。

纵缄微吟余鼻息，不移孤耿一书生。

刺刀冠挂丈夫气，棘路骨然赤子情。

铁屋最堪囚大吕，能禁云外啸龙声？

先生原诗

四十九岁生日一九七一年在干校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吊形。

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大诗：《再挽慎之先生用先生无花无酒韵》

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天佑中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这个先知就是——李慎之。

我要像但丁那样歌唱：天堂里添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旦它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和未来。因为，先知的路，就是这个民族的路。值得庆幸啊——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你终于有了走出迷途的路标！值得欢呼啊——我沉沦了两千多年的民族，你终于有了在当代复活的明确信号！

——朱•鲁子：《夭折的先知——李慎之：一个活且仅仅活到秋季的人》

要是说顾准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的话，李慎之是层峦叠翠的高山。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过二十年，当你百年冥寿到来时，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满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现代公民！

——袁伟时：《从顾准到李慎之》

他从一个狭隘的阶级论者过度到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世界主义者，是他衰年“变法”的一个飞跃和最大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慎之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思想界极其重大的损失！我们后死者誓将慎之先生为这个多难的国家民族进行的探索进行到底，对遭受斗争哲学、极左思潮污染毒害的数以亿计的愚懵心灵进行重新启蒙，不遗余力地阐扬自由主义的价值，为促成宪政的实现而尽言尽责！

——程巢父：《程朝富致李慎之先生家属挽电》

先生走后的世界落寞无际。我经常独自问自己一个尼采式的问题，先生为什么如此聪慧？

我觉得，先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高度紧张的大脑，有一种超群绝俗的个性，尤其是早年教育形成的自由品质，这些因素都是先生晚年大放光辉的原因。我还有一个隐约的发现，先生对于高高在上的独断者有一种发自性情的蔑视与不断挑战的渴望。这可能是他的政治生涯屡受磨难的根源。

——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

他作为一个参与革命的革命者，对这个革命第一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我衷心希望李慎之先生的精神遗产能在中国有更多的追随者。

——程晓农

他倒下了，倒在门槛旁边。门槛内外都有着纪念他的人。外面的人更多，而且会愈来愈多。

——林贤治：《纪念李慎之先生》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就此飘向了天国。然而，先生给这个民族留下的思想和文字将永驻！

——韩钢：《他的思想和遗文将永驻——悼李慎之先生》

你在中国知识界中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具有社会责任感。

——朱光烈：《书祭》

慎之不能死！他国学基础厚、读过不少中国古书，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调动的资源多，这些都比我们强。所以他眼界宽阔，看问题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总之，他不能死，否则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中国人民大家的这位卓越的公民教师过早地走了！我们留他不住！他的女儿正在编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够在国内出版吗？希望现在就能！

——李普：《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

但现在，这颗博大的爱心已归到了永生的名下。在我看来，随着这爱心倒下的是一位本时代最杰出的自由歌手，使一个本来就平庸的思想界，现在变得更加平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死是思想界的广陵散绝。

——王洁：《送慎公远行》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泊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今天，这个人逝去了。然而，他的情怀、他的良知、他的梦想将继续萦绕荡漾，被珍惜引申。他用他生命中晚晴的夕阳，为一生写毕了完美的篇章。他怀三户之志，发九章之辞，以良知立德，以自由立命，虽然风雨如晦，但仍鸣放不已，守玉不渝；他不怕颠沛，敢于造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称人杰豪雄。此人便是刚刚离去的李慎之先生。

——刘军宁：《李慎之先生——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

虽然从年龄上讲，李慎之先生是我们爷爷辈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地是：他同样是我们这些渴望继承思想使命的青年的巨大的光明之源和力量之源，他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思想史上一段闪烁着夺目光环的澎湃乐章！

——黎学文：《先生已逝，我已痛悔》

一个月前，我的一本关于文化与传播教材刚刚发到学生的手中，我把您的许多思考许多呼唤奉入其里——关于自由的权力，关于民主的追求，关于正义的秩序，关于文明的对话。并且以您的预言和信念作为结束语，昭示青年人走向普世价值观中的理想王国。

昨天，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一起轻诵着您的训导。然后，我告诉他们，向我们

讲诉的这位老人走了，他的名字叫——李慎之。

先生，您还记得吗？记得您故乡的民风，这份对灵魂的召唤吗？先生，请别就这么匆忙地远去，我们知道您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还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叮嘱……

到“五七”那天，我会在江南的夜晚，独自守候，一炷清香，为您招魂，听您最后的托付，送您最后的远行……

先生，您会回来吗？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罗建：《招魂》

所以，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民。他在公民社会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拿出了勇气，行使了公民的权利，获得了良知的自由。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农夫。他不曾播种五谷，但他想播种自由。他为自由改良土壤，以自己的示范将这一技艺传给年轻一代。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更夫。他在黑暗中为沉睡的人工作。他仰望星空，在人们该劳作的时候提醒他们起来。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儿童。他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利害”，他只知道皇帝一丝不挂，于是大声地说出来。

——王天成：《东方的土地曾走过这样一位哲人》

慎之先生离开我们还是太突然了。他最后在报恩楼做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的演讲还余音绕梁。他是那样充满活力，使人认为他至少还有 10 年 20 年的时间。当他在时，我们习以为常；当他离开我们时，我们怅然若失。

——盛洪：《最后一个士大夫》

慎之先生在古稀之年还在为中国的出路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大学生的失望让我不寒而栗!)。

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巨大损失，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仍然活跃着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他的去世如果能够唤醒更多尚在梦寐中的人们，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沈伟：《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在一个不太遥远的时代，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现代士大夫。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境界，但那种境界总是让我辈后生碌碌的心有回家的温暖感觉。如今，慎

公西去，我们又在何处寻找这种境界？

——秋风：《悼慎公》

李慎之迈出大门出走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近期挺身而出的中青年学者）走上了跟随他的道路，他们从李慎之的头颅中看到金子般闪光的思想宝藏。这些宝藏散落在杂志、书信和录言之中，需要后来人整理、开掘、汇集。

李慎之的魂灵等待的不是对他赞美之词，而是他大声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回音和由这种思想指引的行动。我还相信，李先生更为迫切期待的，是后来人对他的思想的超越。

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仍然生活着“沉默的大多数”。从那里发生的每一个真言都是微弱和难能可贵的，而李慎之在生命黄昏发出的洪钟般声响将久久回荡在这片“黄土地”上。

——丘岳首：《思想者李慎之》

他在二000年五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生纵再活十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

同年六月十日给我的信中重申，“我则一息尚存，终当反专制，争自由而努力耳。”

——苏绍智：《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悼念李慎之先生》

安息吧，慎之先生。星火燎原的时刻，将有正式的史书传载您的英名。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终身追寻光明的李慎之先生，在晚年唱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美的天鹅之歌。

——肖雪慧：《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李慎之先生》

在电话中。李老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你，我想的办法是，先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从现在的五个扩大到九个或十一个，取消一票否决权，实行多数票决定制，你看怎么样？”

我也笑笑。没想到，几天以后，李老就永远告别了我们。这是我接到他的最后一个电话。

——马立诚：《最后一个电话》

他走了，这位大声喊出并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正是我们此刻想对他说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

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戴晴：《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

在慎之同志去世后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深深感到他在这十几年中所思考的在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制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力排众议、独抒己见，有如黄钟大吕，读之令人振奋。

——张宣三：《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既然追忆慎之先生，我们就千万不要忘却了他所追索的自由的真义。真的自由，是务必要落实在言论自由上的。

——汪丁丁：《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言论——追忆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将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何清涟：《剔骨还父，唯大智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不能面聆先生的教益，我感到很遗憾。但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能“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光”，有先生的文章在，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

——刘小磊：《回忆“李慎之研究”》

可以说，在世纪之交，我们幸而有李慎之，中国幸而有李慎之，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共识和一个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甚至一群经历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李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陈璧生：《李慎之先生的意义》

历史正在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转折机会，时代需要像慎之这样的民族精英。他这几年写的文章所起的作用，别人是很难取代的。他在思维能力最为旺盛、对自由主义已入佳境的时刻离开了我们。这使我感到分外悲痛。

——杜光：《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悼慎之》

景明把李慎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卡玛，这位不畏“非典”，专程从美国赶来，带有京腔的 1966 年北京 101 中学的高中生，沉默无语，说好本来还想再去看望李慎之的。

——高华：《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作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李慎之先生走了，一座思想和知识的宝库轰然毁于一旦。这个损失是无法估价的。

我不由得想，他怎么能死呢？他的知识、他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非常珍贵的财富。可以死一万个我们这样知识贫乏的人，也不能死一个这样的大学者、大思想家。

——解聘如：《为李慎之先生送行》

李慎之走了。夕阳已经落山。霞光并未散去。他用生命、智慧和勇气垒起的座座山峰永远令我景仰。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

在谈及他的安全和健康时，我说“您现在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希望你注意自我保护”，他给我留下句永远难忘的话：“我问心无愧”、“我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从这以后，我不时打听先生的近况，但是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黄安年：《痛悼只唯实“不唯上”的李慎之先生》

由于“非典”的不可抗力，李慎之老师身后没有召开追悼会，他的离去也少了鲜花和挽联的簇拥。我想，先生九泉若有知，对此一定不会在意，因为大智大勇的他，看重的只是思想的方向。

——王逸舟：《思想不死——忆李慎之老师》

李慎之走出了一个旧式政权体制的门框，走进了光明，也走进了一个超凡凡脱俗的境界，成为一个与真理同在的“圣徒”。

这是一个终身飘泊寻找精神寓所的“圣徒”；

这是一个到老都保有“希腊人的知与学热情”的“圣徒”；

这是一个拆下肋骨点燃真理之火的“圣徒”；

正是在李慎之倒下的地方已经萌生起了一种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对恃的全新的知识与精神。在这种知识和精神的召引下，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圣徒”。

——丘岳首：《戳瞎双眼而后见光明——李慎之现象沉思之二》

我理解朱学勤们的苦心，非典飞来横祸，正是国难当头，加上变异的冠状病毒肆虐，不便聚会。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或逻辑被自然而然化解了，聚会就是有事，有事就可能生事，生事就可能酿成事件。所以有要个追思会，来表达对慎之先生低调而温情的敬意。惟有此，似乎才能符合慎之先生“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才能安慰那颗备受磨难不失激情地追求民主、自由的魂？我分明看见慎之先生的灵魂在天空自由飞

翔。我写了首短诗《哀李慎之先生》：

你把哀愁留给了我们

你把困惑留给了我们

你把痛苦留给了我们

你此时已经飞翔

你正沐浴着自由的风

——卢跃刚《不能告别的聚会》

楚辞《九歌•国殇》中有句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李慎之也是"国殇"，他是在理论思想战场上，为了挽救中国不在专制主义的泥潭中继续沉沦而英勇战死的。他的精神威灵显赫，魂魄刚毅不屈。他生作人杰，死为鬼雄。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启示着中国，引导着中国。

——李冰封：《国殇——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我曾长期不解为什么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总是不能容情，越是出色的知识分子往往越难有好的遭遇，李慎之就是一个。因此，我吊慎之，也为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一哭。

——陈鲁直：《一代精英知识分子》

先生，自从有幸结识了您之后，我就一直把您当成我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我年近六十的时候，上帝赐给我您这样一位老师。您是我的一位特殊的老师，是给我榜样、给我力量、给我鞭策的老师。您是我的精神导师。

——朱光烈：《先生，我有话要对您说》

他那浓黑上扬的剑眉，蔼然如春风的微笑，以及略带无锡口音的语声，都似乎仍在面前，我难以相信他就此弃世人而去。今年正当传统所谓红羊劫难的年份，无数生灵被 SARS 病毒夺去了生命，不过李先生的逝世，其损失远远超过 SARS 灾难。

——徐晋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忆李慎之先生》

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他消失在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即将崩塌、自由思想将登上历史主演舞台的前夜，尤其令人痛惜。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当一种学说还在被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候，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李慎之不但自己挣脱了习惯性的"挟裹"的锁链，他还要带领一批知识分子乃至

整个中华民族“出埃及”。

一国没有可书的英雄，则这个国家很难成为世界楷模。

李慎之的牺牲使许多人想到先知，想到神，他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借用犹太文明中的词汇，我将李慎之称为中华民族的义人。

李慎之没有渲染仇恨，更没有渲染暴力，却遭到个别人很深的误解，失准的攻击。李慎之自称士大夫，却有人中伤他是美国人的走狗。李慎之不会在乎这些：在天上的父啊，饶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李慎之站在人心之颠，是真理、道路和光。他没有遭到围攻，因为围剿他就像焚烧教堂、取消礼拜一样荒诞。

李慎之就是一个自由魂。在充满谎言和欺骗尤其是“挟裹”的当代，我要拥抱李慎之。

李慎之八十而殁，在他身上我很少感到暮气，也许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悄然开始，他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本体论，成为绝对精神。

但愿李慎之之死，能让从来缺乏罪感和耻感文化的中华民族觉醒，

——杜兆勇：《自由是最好的统治》

先生之躯已经化为尘土，继续与逆风抗衡；先生之魂依旧踩在一堆活着的死人的头上，仿佛一座凝重的灯塔，照耀着每个朝圣自由与光明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争鸣青年社：《失言的唁言——怀念李慎之先生》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们正身处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时代潮流，毕竟浩浩荡荡，正在无情地冲垮着那些损人误国、掩耳盗铃式的所谓“封杀”行为。也正是值此之故，李慎之先生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发人深省的智慧，现今正借助威力无边、魅力无穷的互联网，如虎添翼，大放异彩，引无数学界同人、后生学子竞折腰。

——杨玉圣：《人文情怀君子风范》

对我来说，他是恩师，是前辈，又更像是父亲。

——赵梅：《细节中的教诲》

我将像以往做您的“部下”那样，以“临考”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我将像您那样，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有自信、爱人类的人。

——胡亚非：《永别了，所长!》

得知慎公过世的消息，不禁失声呼叫，悲从中来。

——高文谦：《追念慎公》

从友人发自北京的电子邮件中获知，慎之先生于今日（2003 年 4 月 22 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信未读毕，泪已潸然。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一位大德贤者逝去，应该给世界和人心留下这样的创伤，这是我们良心未泯的证据，追求自由之志未泯的证据。

——吴思：《我们欠李慎之先生一笔债》

先生经常对我谈到他一生的使命或追求，即人的思想自由和社会的政治民主。他说自己肯定不能见到全人类都实现这些价值观的那一天了，但你们年轻人应该是有希望见到那一天的；如果真地盼到了那一天，你们可以为我作个见证，即我李慎之是有历史良知的！这是我所听到过的一个血气渐衰的老人的狮子吼，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狮子吼。

——单纯：《怀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先生处毋望之世，又事毋望之主，虽未有毋望之福，却有毋望之祸，但却成就了他成为毋望之人！

——王维：《悼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悄悄地离去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旗手。对于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的伟大复兴，李慎之先生功不可没，善莫大焉。

——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谈“学术大方向”》

说不定你的好友黎澍、钱钟书、罗荣渠等又要来找你聊启蒙了。如果你还想多找几个，那就不妨把治近世国史的陈旭麓、李时岳、丁日初也一起叫上。

——郭世佑：《迟来的申谢》

终于见到慎之先生的样子了，没想到是在“世纪沙龙”里一位网友给李先生开设的灵堂上。急急点开地址，缓缓地、缓缓地，自上而下，出现一张李先生的照片。不错目地凝视，久之。

——邵建：《李老，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纪念》

人生是“被抛”的存在，人生常常是无奈的。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

不过，在可悲的人生中，我们是否应该像先生那样，有一种可贵的自拔与自省精神呢？

——王东成：《李慎之先生的“解放脚”》

据说，一段时间以来，慎之先生是被不让说话的，只允许思想。也许，他的那种直率、肯切、洞察现实而犀利的见解，让一些人不舒服。

——杨建国：《向慎之先生讨教记》

再后来，就是先生的“搬家通启”。这已是二〇〇二年六月份。通启写得很详细，令我看了很感动，当即回了一封信：

今天一上班

收到你的信

一张小小的迁移通知

邮编

电话

公交车站

还有附近的建筑标志

将我唤出夜的梦境

带我拜访了你的新居

于是，那些过去的日子

那些《书屋》里的日子

那些张扬思辨的日子

又一一浮现在我心里

使我心里充满感激

真的，感激，非常感激，慎之先生，慎之先生！

——周实：《慎之先生与〈书屋〉》

慎之先生出入后极权的犬儒世风，顶住专制主义的压力，不仅没有在乌托邦幻灭之后却步，相反，他正是在这时奋起，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深入到对其对应物——奴隶主义的检讨，跨越后极权，从一个理想走向另一个理想！他深知中国的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又深信启蒙必须从教育国民作起。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冲破这种黑暗而又犬儒的时代？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走到今天？他是以自己的肝肠来喂养后代的鹓鹏，是呼唤东风的啼血子规。

——陈彦：《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中国之所以历经各种内忧外患而不灭，是因为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畏权势，不畏流言，执着地追求和传播真理。他们是民族的眼睛，是民族的耳朵，是民族的口舌，更是民族的大脑。李慎之先生便是这群大无畏的求真者中卓然而立的一位。

——文贯中：《哀哉！中国又坠落一颗巨星》

“继承慎公思想，进行公民行动，推动民主进程，实现世界和平”，这是新民人对慎公英灵的最好的纪念。

——周鸿陵：《慎公与新民》

凡是追念先生的后辈，不管出于怎样的外在约束和内在苦衷，如果我们这代人已经决意只研究书斋中的自由主义，而把践行自由的行动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至多谨言慎行地等待着明主开恩，那么，这等待也许就是无限期的，直等到了此一生之时，还只能发出“遥远的自由，多么渺茫!”的悲叹。

——刘晓波：《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

一个自由的灵魂脱离了尘世的羁绊，遨游于天，俯瞰着尘世羁绊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不曾让他充分享受自由，死亡给予了补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限制他思想的腾飞。李慎之的灵魂是高悬天际的一面硕大的镜子，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

——陈放：《李慎之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

但是他后半生的非党文化的文化，可以说是功盖天下。超越了党文化的疆域而垂青于世了。

——刘自立：《对慎之先生的点滴反思》

慎之不可赋，赋则背负百年千年忧。

——余世存：《慎之赋》

在极度简约的背景中，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位老人高贵的反抗。他的绝不回头的背影，他的倾其所有的神情，他的高傲，他的尖利，他的超越一己私利的普世情怀，与他的年纪一起，照见了如我这样的年青者的羞惭。

——李静：《年青者的羞惭》

文章名世更何疑天问无灵却跷蹊

斥咤喑呜轻帝子风流儒雅亦吾师

千星黯寂斗朝北九派横流水向西

雪夜关门展书读雷声郁怒雨声低

运交华盖复何求风雨苍黄五十秋

今是昨非陶令觉云翻雨覆圣贤愁

待更封建称专制终信黔黎有自由

天上倘然逢顾准启颜一笑抚吾头

——黄苗子：《敬悼谨斋先生二首步友人韵》

我不相信有上帝，但是又想，不妨安排出一个上帝吧，他当然会和良知在一起。呜呼，永别了，慎之兄！愿上帝与你同在！

——苏仲湘：《一个显映着民族良知的人走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撤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会逐步实现的。

——戴煌：《永念慎之兄》

他就现代化、全球化、我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等问题发表的众多新见解，可称为李慎之思想。

——高放：《我所了解的李慎之》

他没有研究员、博导之类头衔，也没有正式收过研究生，但老中青几代学子中都有人自认为其门下弟子，称他为自己的“导师”。

——资中筠：《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慎之。

——茅于轼：《改变我命运的人》

在天津的时候，内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李先生去世了，一阵悲痛涌上心头，中国又少了一位呼唤民主的勇士。

——蓝英年：《几件小事》

他就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李慎之”，他就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的思想家李慎之。

——汤一介：《忘不了的李慎之》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徐友渔：《悼念李慎之先生》

告别了“最后的士大夫”，华夏社会的政治生活无疑只剩下了两条出路：或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实施，走向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相配合的现代政治；或是既不能开创新局，又不能光复旧物，任政道衰朽，治道鱼烂。

——王焱：《“最后的士大夫”之死》

就在先生逝世前不久，一个颇有来头的“中国教育网”（www.edu.cn）在门面版块“焦点在线”上刊出一篇署名“左日科维奇”的文章《批判李慎之》，通篇用文革式的语言对先生进行谩骂，末了又说：“但是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党，那样只会让他……增加更多的光环而已”。“反正他也耗不了几年了”。如此歹毒的文痞却也明白：他们的构陷只是增加了慎之先生的“光环”！真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能让文痞们这般怀恨，犹如能让自由思想者们如此景仰，这都是慎之先生的思想之锋芒所在，也是他人格之光荣所在。一生而能如此，慎之先生也应含笑于九泉了。

——秦晖：《怀念慎之先生》

因了时代的特殊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并不彰显，但他在民间的影响却超出了许多重要学者。他没有什么大部头的专著，但他以人格和思想建造起来的影响，为人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去向。

——谢泳：《人去思想在——闻李慎之先生去世》

对他的去世，人们的痛惜甚于纪念，因为这位八十岁的老人正大有用、有益于今天的中国。先生越老却焕发出越强的生命力、焕发出思想的活力，犹如一株遒劲苍老的大树，不仅老而弥坚，而且突然新枝怒发、浓荫再现，蓬蓬勃勃……

——雷颐：《风雨苍黄八十年李园柳老更吹绵》

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八十岁的高龄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那么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的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这样庞大强悍的机器怎么可能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如此丑恶不堪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抛弃呢？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使我们受益终身；先生之担当履践，使我们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风亮节，使我们倍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们背负重责。这一切将永远砥砺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精神和道义将在我们的文明传统中延续发扬。我们将努力，将逝者传来的精神传播开来，传递下去。

签名：

吴思刘晓波张祖桦王怡余杰任不寐刘霞

余世存杜导斌张耀杰余樟法（东海一枭）梁晓燕

徐晓赵达功浦志强王东成杨支柱朱学勤崔卫平

廖亦武

——《我们欠李慎之先生一笔债——沉痛悼念李慎之先生》

如果我们不能在李先生去世的时候留下应有的声音，而是像顾准那样留给后人去重新发现，那将会给当代中国知识界留下新的耻辱。当然，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本书虽系内部交流，但作者却汇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代精英，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可谓群贤毕至。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由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他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觉悟和人心所向，李慎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点燃的启蒙火炬，在中国大地上是不会熄灭的！

——丁东：《〈怀念李慎之〉编后记》

二十一

二百余年来，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国专制帝国的残旧面纱；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最终经由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向中国输出的激进主义，却造就了一个反西方的专制帝国，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地缘文明最罕见的孤例。

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依然充满茫然、疑惧和期待。无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国。西方依然没有发现真正理解、同情、接纳、善待、欣赏、推崇中国的理由，西方对中国的命运和使命依然一无所知。

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形象依然严重失真、严重扭曲。中国闻名于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长城、兵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帐汗帝国，只是大清天朝帝国及其义和团，只是鲁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只是拒斥“和平演变”、煽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及其“六•四”血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传统，只是古董、武术、气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为止，中国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偏远地区，中文只是世界少数民族方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望而生畏的国家，甚至如马克思所称，依然是先进、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封闭在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里，实行“普遍奴隶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总体保守”、“总体反动”的顽固堡垒。

西方不可能真正体察中国的困境、积怨、焦虑和危机，也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的气质、抱负和理想。中国拥有东、西方两百年间遭遇、冲突、激荡的复杂经验和深重教训，中国经历了东、西方集大成专制主义最野蛮、最残暴、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中国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隐而不显。

“9•11”事件极其恐怖极具象征意义的末世图景，已经直观地将人类文明的危机呈现于世人，由西方文明单独导引的现代人类已经继冷战之后，再次面临共同毁灭的“极”点，“生”还是“死”的终极追问再次怵目地高悬在世界上空。

如果继续固执于上个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激进主义，中国将再次步入歧路，不仅无补于世界范围内的乱象，而且将因为再次背离中国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谴”式的惩罚。

苍天有眼，中国的时辰正在升起。

一旦挣脱专制经济制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完全可以预期，一旦突破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禁锢，中国将以不逊于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规模，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从二十世纪的巨大阴影中脱身，中国正在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三千年来，中国在“上帝缺席”的苍茫时空中，独自发展出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两千年来，中国“充实光辉”、“大而化之”的圣贤人格，在征战杀伐的无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来，中国在漫长窒息的专制王朝之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肆悲愿；一百年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

厄运交错，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空前分裂；五十年来，中国的祸患和灾难几乎达到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中国几乎沦胥到了精神灭绝乃至民族衰飒的境地；直到毛泽东死后，直到现代极权主义的原始淫威滥施殆尽，直到所有中国人从史无前例的浩劫里挣扎还世，直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直到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华传统精神先后初照神州赤县，中国才终于开始驻足于历史的分水岭，终于可望且能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齐治平的成人成贤成圣之道、“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诚、自信、尊严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价值，实现中国现代复兴，造福人类，毕其功于一役。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的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这一切，已由先生“独立苍茫”、“独对斜阳”之际楚咻微吟，已渐成黄钟大吕，即将洋溢乎中国了。

尽管中国人已经厌透了伟大、崇高、神圣的字眼，尽管先生再次重复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的东方悲剧，尽管先生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甘地、萨哈罗夫、马丁•路德•金等伟大显赫的遁世者曾经享有的哀荣，尽管先生不曾发出“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临终喟叹，尽管先生对于中国和世界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中国依然笼罩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深水热火之中，但因特网上数百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中国自由和良知思想界的齐声祭悼，已经堪称“东方的隆重葬礼”。

被非典阻断的所有事务中，最令历史痛惜的，是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子以及一切有血性有天良的中国人无法为自己“思想上的王者”庄严送行，这是历史的无情。历史将以百倍的补偿告慰先生英灵，也许就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五周年，也许还需十年、二十年。任时光流逝，历史既托付先生透露了它的秘密，复活了它的新命，它将不会食言。历史最终是有情的，甚至是多情的。

未来的人们是幸运的，困扰先生和我们一代的种种禁忌和桎梏，在他们那里将还原为历史的故事、文明的素材，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已不必以生命去交换，而是不言自明的常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救赎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悟和对于使命的践履，在他们那里将日益稀缺；自愿负荷十字架而甘之如饴的伟大圣者，将隐迹于大化流行而为万世之木铎，而我们曾直接领受和分享过他的教诲、爱心、悲情和光辉。

历史的无情与有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都将与世界永远同在，正如我们与先生永远同在。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于其家，余衹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至于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正是有了先生们过渡，中国二十世纪上、下半叶才得以贯通，“五•四”前后诸先贤与 1949 以后全体中国性灵良知的苦难与悲愿才得以见证与续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可望从专制主义的穷途末路转向自由民主的坦途，三千年中华文明才出现了与第三个西式文明千年的全球化潮流主动、自信、正面遇合的天机。

昔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谓。先生平生未有一本专著问世，只与何家栋先生合有一本（还是有心人背着李、何二先生擅自设法出版），取名《中国的道路》。这是一桩奇事，冥冥之中应了那句古语。

再有几天，就是先生八十诞辰，谨以中国古代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孟子对中国集大成的“过渡人物”——“圣之时者”——孔子的祭奠之辞，为先生祝寿：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后记：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写完这篇长文，开始逐渐明白这句古语的含义了。

三年前，曾当面邀请先生与何家栋先生“西游”，到四川、到重庆“回顾一下人生的旧路”。先生应充了，我却终于食言。

何家栋先生和余世存兄先后在电话中吩咐“写一点怀念慎之的……”，又承友人寄来《怀念李慎之》（上、下册）一书。都是沐于先生的光芒，故不经权授，囫囵采撷诸贤纪念文字，连缀成篇。谢甚。

《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凡此所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于“本诸身，征诸庶民”为始，“温故知新，敦厚崇礼”为终之旨，尤三致意焉。

先生是一大奇迹，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才孕育了这个奇迹，我们对这个奇迹的领悟才刚刚开始。

王康 2003 年 8 月 10 日

正声何微茫——追悼李慎之先生

1992年初冬，华林京畿还一片肃刹。我参与电视政论片《大道》拍摄，一口气采访了夏衍、冰心、费孝通、季羡林、张岱年、盛成、于光远、于浩成、廖盖隆、高放、吴敬琏、王蒙、厉以宁等人后，记不清是夏衍还是费孝通（或者两人一齐）推荐说，要论中国与世界“大道”，非向李慎之请教不可。

先生的书房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一样，是思考、阅读、写作和会客的地方，书架上有几排中、英文工具书，其余全是人文社科类书籍，没有闲杂书籍。墙上一副对联：

无法与人说将心为汝安

书桌上堆放着各种复印件，先生不时从某一叠材料中抽出一份，迅速翻检，停下，读上一段，放到一边。又从另一堆纸字中找出一叠。

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先生一直“独白”到暮色四合。准备的录相带早已用完，摄像机早已关闭。先生声若洪种，毫无喑哑，他那江南官话圆润而中气十足，那音量足够一、二百人享用，对我们小小的摄制组，先生是太用力了。

一种强烈的感觉至始至终冲击着我：共产党里竟有这等人物！一刹那间，如果摘下眼镜，他颇有晚年周恩来的神情，凝重、专注，极为敏锐，浓黑的剑眉，仰天大笑。事实上，他确实与周恩来共过事，有与众不同的观察和评判，但周恩来决没有先生似乎与生俱来的形而上的忧思。真正打动我的正是笼罩在先生四周的忧郁和悲观。

我曾拜见过熊十力、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人，他们自有一种圣贤气象。先生也是有气象的人。二十多年的挫折，还是那么气宇轩昂，管你斯文扫地，他兀自高谈阔论，哪怕举世犬儒乡愿，他依然真正道貌岸然。这种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台，专门的频道，可叫“思想”或“精神”，李慎之只要主讲一个月，中国一定不但改变面貌，而且改变气质。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北大、清华一类大学，为何不请先生去开一讲座。那将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景象，先生是最适宜于作青年学子的导师，是天生的宣教者。

第三个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散，如果中国国家元首由李慎之先生担任，就靠这一点，就足以带来希望，足以改变国家形象，罗斯福当年的炉边讲话由李慎之来担

任，也许更精彩。

将近六个小时，先生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说起，从一战凡尔赛体系到二战雅尔塔体系，再到大西洋宪章、布雷顿体系和联合国，再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

他在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上发挥了足有一小时：物极必返。他很忧虑，西方从尼采开始，包括达尔文、赫胥黎，更有后起的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人，都不承认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的基本价值。他甚至对哥白尼以后的全部科学也有强烈的质疑，西方在强调人是目的、中心同时，又把人推向边缘和虚无。有一刹那，他为自己的忧虑陷于沉默，紧锁眉头，似乎藏着人类的危机。中国有这等人！

我知道他创建了美国研究所，是中共少有的国际问题大家，先后作过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秘书、顾问，也是中国有数的大右派。

但我还是很难把这些显赫的背景与眼前这个人物联系起来。

俄苏文学史家斯洛宁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作过比较，认为后者代表了一个优雅而没落的俄国，前者则是强劳营中活过来的苦役犯，顽强而充满理想，是俄国命运的真正代言人。

我有同感。梁、熊诸先生，包括巴金、冰心，毕竟代表那个已被摧毁和忘却的中国，他们对这个“新中国”是彻底的局外人。

先生具有索尔仁尼琴的经历和资格，但先生更有极为传统的一面，先生也许才是中国历史的托命人。

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某种受挫的感受。你几乎无法参与先生的宏论，整个过程，全是先生滔滔不绝，你甚至没有提问的机会，这种“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的感受，令人既压抑又兴奋。

中途，他自己停下来，突然发问：你读过《哀江南赋》吧？紧接着开始背诵。

后来我明白了。先生的“独白”，一是因为他的学问太大、道性太高、经历太多；二是他有强烈的紧迫感，“时不我与”对他是如同性命一样逼人。还有一点，中国实在无人了。正声何微茫！

用了近一个小时谈论苏联解体，又突然发问：怎样看全球化？政论片《大道》中只引用了先生最平正的一段话：

一个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民族，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找到正确的结合点，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

现代化的根据，那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百多年来苦难的历程不过是一个显例而已。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市场全球化的过程将辐射全世界，至高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在成为各方面全球化的第一动力的同时，将把人类带到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人文主义是防止盲目力量无限膨胀的清净剂和矫正器，人文知识界任重而道远！

古来的圣贤、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耶稣的“上帝之国”，从康德的“世界政府”到马克思的“英特纳雄耐尔”……它们迄今都未实现。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都远远没有走到一个定数，有的要接着走，有的要重新选择……

第二次造访，三年后的 1995 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以电视片（《抗战陪都》）的名义。

先生像老朋友一样，要我们“自理”茶水。书房还是那样简陋，书桌上还是堆着各种材料，墙上的书法变成：

无声无臭独识时

跟上次一样，先生思路大开大阖，与时下所有陈腐观点迥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近现代变化日亟，令人眼花缭乱，更重要的是世界事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中国抗战乃至二战都是世界全球化的战争形态，真正由中国人做主或者担纲的并不多。不论抗战的胜利导致中国向另一种方向发展，还是大西洋宪章、冷战，其中的主要原则和一套规则，都不是中国人制定的，背后的历史观和哲学也全然不是中国固有的，“历史无法预测”，就这是先生的结论。

先生明显地有一种“大历史”的思维形式，对历史的飘浮不定似乎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着迷，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他的这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使他不会停止在某一种理论中，他是发自内心地陶醉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我期许中，而他真正感兴趣的，正是他为此罹祸的“大政治”。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大家的通爱，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甘地、罗素无不如此。他们永远是在思想王国里操心人类的命运，不是没有勇气（他们的天下关怀首先来自内心的道德基础），而是对尘世的具体政治，如权力、谋略、党派等，实在缺乏耐心和兴趣。先生虽然声称对世道人心“无能为力”，但他对自己体证和冥思的真相和道理，却无比认真、自信。事实上，先生在人生某个时刻（“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已经内在地完成了对天地世道、人生人心的体认，直接呈显于当下的世界表象和深藏不露的生命真谛，已经在内心合流了。

1999 年春，先生突然打来电话。他已收到《俄罗斯的启示》，询问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致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具体日期和主要内容。然后大声说，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不能算反对派公开信，1881 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致新沙皇的传单“也许是俄国反对派公开信的‘老祖宗’”。

1999 年夏，我向余世存建议，何不邀约李慎之与何家栋两位先生一晤。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晤。

两位先生都是革命志士、受罚的异端、寂寞的觉悟者，都在晚年、尤其“六•四”以后锋发蹈厉，尽显人生光彩。

何先生从河北农村走出，坐过日本人、国家民党和共产党的牢，右派，几乎没有受过像样教育，属于“共产党扫除文盲而有了一点文化”的后进人士。却写过最正统最本色的红色传记小说，到了晚年，竟能撰写长文批判中国最洋派的“后主”和“文化不自觉”的伪保守主义。但直到与李慎之对坐京城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何先生还是一幅河北老农的憨态。

李先生也是一身布衣中山服，手扶拐杖，却有天生的贵族派头和江南才子的仪表，望之俨然。

两位先生相互“慕名”已久，同往京城，竟然从未谋面。我和世存静候一旁，几乎不插话。我心中暗自高兴，看他们一土一洋、一北一南地海阔天空。

谈话仍然是“独角戏”，何先生本来就含蓄，宽厚，正好让李先生的话语“霸权”尽情挥洒。话题不外两个字：中国。里面少不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鲁迅、胡适、陈独秀，少不了 1957 年、1966 年、1989 年，少不了共产党，更少不了自由、民主。

我在一旁恭听，又萌生几年前老念头：如果中国有一家电视台，请两位先生主持（或对讲），让半个世纪累积下来的智慧，以如此直朴真率的语言道来，中国会天下大乱？

另一个念头也在那时油然而生。两位先生的晤谈太短，何不如时下流行字眼“安排”到外地、比如四川，有十天半月，游历峨嵋、乐山大佛、三峡之余，两位先生只要有精力、兴致，即可开讲，全程录相录音。

与世存商量，认为不错。何先生完全没有意见，“悉听尊变”，我们与何先生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先生另有一种威仪，非得正式面邀，说出具体思路，马虎不得的。不

料先生没听完具体安排，便一口答应，只是说，需带上女儿，以便照料。

肯定不是世存与我的缘故，而是两位先生之间的那份他们决不会启齿的“服气”，一种我们这代人很难体会的“情义”。先生抗战期间曾在四川、重庆工作过，何先生谈起乌江之美，竟如孩子一样神往。

这是终身的愧悔。种种原因，竟一再拖，直到先生遽然撒手。

无法深想。如果当时二位先生能如期“西游”，稍微放松一下他们几十年来高度紧张疲惫的身心，也许……！

2002 年，我将发表于《书屋》的《沉潜磨洗六十年》寄给先生，他很快作了回复。信不长。但先生字迹迅速潦乱，——他太累了！那是 2002 年 8 月 10 日。

2003 年 3 月，我将为《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作者系大学同学，邀我作序），托世存转交先生。书太厚（近 50 万字），先生不可能详看，但那题目，先生是一眼便知其意的。

中途还陪秦晖、也夫诸兄看望李先生。秦晖嗓门特大，讲了近半小时，我实在忍不住：可否小声点？先生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我的嗓门已够大了，谁知还有比我大的！

附一：1995 年夏采访先生文字记录

附二：2002 年 8 月 10 日先生来信

爱因斯坦有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了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

谨以爱氏此言追悼先生。

－－－－－－－－－－－－－－－－－－－－－－－－－－－－－

附二：

王康同志：

《沉潜磨洗六十年》早已收到并已拜读。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确实值得大大歌颂。你这篇文章做得很有气势，有魄力。抗战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之大事。抗战胜利曾经燃起无数国人的希望，即冯友兰所谓“贞下起元”之际。但是国共谈判失败竟成为国民党彻底失败之转折点，亦为中华民族堕入苦难深渊半个世纪之转折点。我当时是一个狂热的左派青年，只知道听上面的招呼把一切归罪于对方，但现在想来“毛公智计，殊绝于人”，造成谈判失败与内战重起的，我方恐怕也有很大责任，也许完全有

意为之。因此我觉得你中之性不够，皮里阳秋不够。另外，全民“转进”后方，实在是我民族惊天动地的一页。你开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但显然十分偏颇，我觉得不如不开，要我来开，我也不知为何才能公平合理，因为我的左派成见太深，目有所蔽故也。你当然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左派，但其实已被左的思潮浸染已深，并没有公正全面的知识。这是我要为你遗憾的。

总之，我对这篇文章是叫好的，但是又觉得他缺少一点《哀江南赋》所说：“……芟夷杀伐，如草本焉”的感怀。（我自己也背不全了。因为搬家，书不知压在什么地方了。）

就提这么一点意见，供你参考。

暑安

李慎之

2002．8．10

慎之先生：

谨将《沉潜磨洗六十年》一文寄上。

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孔子到孙中山，一个是秦始皇到毛泽东。后一个传统取代了前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

何以至此，恐怕抗日战争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重庆曾是中国战时首都，也是那个转折点的主要舞台，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九五年曾因拍摄《抗战陪都》采访过您，您本人抗战胜利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你当然深知这段历史被尘封和扭曲到了什么地步。

“西游”一事，令我汗颜。但愿还有机会践诺。上次在您府上，所提为您庆贺八十诞辰事，一定要举办。不仅是为您个人，而是时代的要求。

您与何先生的会晤，小余会整理出来。

又是夏天，敬请

保重

晚王康敬上

二00二年七月十日

刘宾雁的遗产

（编者按：此文系作者王康先生应邀为最近出版的《刘宾雁纪念文集》而作。篇幅所限，在文集中发表时有所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分三部分连载。）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苏联、中国等国生活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亿万男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开始投身一场攸关人类安危祸福的自由解放运动。这是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另一半球上无数生灵穿越另一种中世纪黑暗，复活自己本性与尊严并转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进军。

这一次世界性的启蒙与复兴运动，继承着五百年前欧洲精神革新的伟大传统，同样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惊天地泣鬼神，却不是它异时异地的简单重复。这次同样求取人类生命目的的历史进程，面临的处境更为诡异复杂，它要实现的理想更为高远。如果共产极权社会里自由迟迟不能实现，以至人们宁愿忍受专制，放弃对神圣理想的追求，甚至觉得专制奴役只要不太严酷，也许比把一切委托给个人的自由选择，更符合天道与人情，那么，世界将永远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后者固然可悲，前者未必真正幸福。——人类的伟大本性已再次得到印证：自由和幸福必须是普世性的，救赎和福音必须及于每一个人。昊天垂降于在浩瀚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这个高级物种以最善的恩典、最高的启示：人类命运不可分割。

从世界精神的总体时空结构看，苏联、中国出现的现代极权国家制度，其精神源头之一正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起的巨大觉醒和希望里分孽出来的近代世界两大思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东方各国，欧洲近代文明的精华——自由、平等、独立、博爱以建基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设计，几乎必然蜕化为某种整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演变成一项鄙俗粗野却拥有巨

大历史正义的普遍权利，凝固成马基雅维里式的暴民社会和成吉思汗式的暴君统治，最后泛滥成一种新的千禧福音，声称唯有它才真正解决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终结了“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从而标志着人类从自私渺小堕落孤绝的“史前时代”走向“人性全面复归”和“所有人自由”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崩溃、冷战和西方内部的文明危机，适时而有力地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作为非西方国家道路选择和世界战略定位的某种历史宿命。事实上，整整两代人时间中，东、西方之间，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界性逐鹿，胜负兴亡的优势并不总在后者一边。

人类在核浩劫的梦魇笼罩中，面对集体毁灭启示录般的清晰图景，颤栗觳觫，本能滋生出空前恐怖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感。它们大幅消解着千百年来被遵奉被践行的基本信条，人性和文明本身遭到倾覆性毁谤。曾经维系并改善了世界的传统价值体系几乎土崩瓦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全球性礼崩乐坏时代，一切关于理想、殉道和救赎的言行，所有曾经支撑和激励人们走向永恒自由和无限光明的奋斗精神，似乎都只剩下已经逝去的微茫回音，露出吉凶难卜的黯澹前景。

人类现代命运一度系于已获自由国家对文明的坚守和承诺，更深刻、更重大的转机，则始于共产主义国家中缓慢而坚定、苦难而英勇的自由进程。与曾经点燃了近代人类自由火炬的但丁、哥白尼、路德、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康德、雨果、潘恩、杰佛逊等西方先驱遥相呼应，共产主义世界也为现代人类贡献了自己的精神英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马利里克、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吉拉斯、柯拉科夫斯基、瓦文萨、哈维尔、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刘宾雁。

上篇

如果圣徒们呼唤我：

“你丢下俄罗斯，到天堂里来生活！”

我就说：“我不要天堂，

我只要我的祖国。”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

由于东正教传统、地缘关系和大批使徒、先知的奋斗，俄国经过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难历程，终于挣脱了共产主义的锁链和尸衣。专制主义开始在这个前欧亚帝国退潮，与苍天同色的自由正在复活饱受折磨的俄罗斯灵魂。尽管还有无数变数，自由在俄罗斯的悲壮降临，使地球上最辽阔的土地进入了历史破晓时分，自由、光明和希望已开始把俄罗斯与西方连成一片。

现在轮到中国了。世界救赎的路标明显地指向了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共同体，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因为历史传统和文明的独特，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各种固有矛盾和外来思潮无出其右的“共时性”，因为中国专制暴政特殊的历史成因，因为若干内外偶然事变，因为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沦丧，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困厄纷至。中国始终没有来到那个历史豁口：一场现代精神洗礼造就普遍的现代觉醒和现代意识，不仅文化界精英、而且民众和统治者们都超越出专制主义的樊篱。中国仍然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门槛内，无数人的苦难和拯救，还须以十字架的形式由个别殉道者来背负。虽然被人们在内心赞叹、仰慕，但他们常常是在充满苦难、孤独、叹息和失望的绝境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以悲剧的目光和孤绝的姿态，背负中国的十字架。

刘宾雁在这一历程中，起身最早，走得最远，留下了沉重而珍稀的遗产。

一

即使我们被无形的锁链

永远禁锢在异地的海岸，

我们仍应戴着锁链独自

完成神灵所描绘的循环。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耶夫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既是中国近、现代各种历史力量错综影响、急剧变异的结果，又是世界现代历史、尤其苏俄十月革命在东亚延伸撞击的直接产物。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思潮经由严寒而专制的苏俄传输并入主中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也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异象。

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被从两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其精神先驱是罗伯斯庇尔、梅特涅、魏特林、布朗基、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激进派和涅恰耶夫、巴枯宁、特卡切夫、拉甫洛夫等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暴力恐怖主义）那里引入的历史

哲学和世界意识所征服，建立起一个与自身数千年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苏俄式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这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风尚、道德、生活方式，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命运和使命，新的苦难和罪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变得如此政治化，具有如此热狂的天下关怀，成为举世罕见的意识形态物种。但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重大历史现象和事件，却是中国人最陌生最隔膜的国家机密，独裁者秘不示人的统治法器。中国人对自身命运和家国天下知悉干预的天赋人权，长期被褫夺。历史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优良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胜利，并非某种历史精神官能症（集体失忆等），而是贯穿几代中国人、藐似隐秘无言实则虑心积累精心安排的结果。

中国的特殊劫难在于，动辄数以万计的性命无端消失后，幸存者、目击者、亲历者通常要煎熬多年后，才从各种偶然机缘中窥见当年巨大惨剧之一角。而从哈佛到牛津，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和苏俄政客、外交官、汉学家和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揭秘者，中国命运的预告人。

历史的严峻在于，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漫长的磨难和巨量的冤苦，体验令人窒息的无边寂寞，任何纯正的同情心和客观理性，任何外来学说、主义、正教，都难以真正洞悉中国，都不可能导引中国走上大道。严酷的历史逻辑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独立完成自我认识和审判的工作，不能正视自己的惨痛教训，不能把自己的罪恶和荒诞记录在档，不能完成必须的清算和审判，不能产生应有的忏悔和宽恕，不能对自己的危机和凶兆敲响最后的警钟，这个民族就必定要坠入完全失控彻底崩溃的深渊，并祸及全世界。中国最诡谲的反讽是，中国最亟需最可贵的“认识你自己”的任务，却是中国最敏感、最危殆、最充满风险因而最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业，其难度其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对日心说、哥伦布对新大陆、爱因斯坦对质能互变、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发现。

刘宾雁八十年生命的支点，六十余年文学创作的唯一母题，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的渊源和希望，八年“为人民写作”的激情，以及十八年流亡岁月的心灵旨归，都可一言以蔽之：发现 1949 年以后的中国。

与欧洲、俄罗斯一样，二十世纪中国的自我审问，主要由知识界发动。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王国维、鲁迅（其地位、身份、影响正日益受到

置疑）不仅推动了现代启蒙和新文化运动，而且成为时代危机和社会潮流的警示者，甚至民族魄魂和国家兴亡的托命人。他们关心和研究的是重大而峻急的国族大事：列强环伺、不平等条约、国民性、民族、民生、民权、党争、割据、宪政、军队国家化、乡村建设、劳工保障、阶级对立和协调，文字改革、普及教育……。从晚清政权到民国初建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政客、官僚、军阀、党棍们不一定接受并推行知识界的主张，但后者的言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从来没有遭到严重的挑战。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军事强权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也对知识界尊重有加。史量才、沈钧儒、马寅初、闻一多等受到权势当局羞辱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举国景仰的英髦节士。

1949 年后，这一切迅速成为历史陈迹。从孔子以来，“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变得不合时宜；“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几乎成为头等国事罪。除了流寓台、港和海外的胡适之、张君励、钱穆、唐君毅等人外，迎候新政权和滞留大陆的整个知识界，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拥有任何优越感和发言权，而且迅速沦为中国历史上最卑贱最悲惨的末代学人。传统中国世代传袭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范式已经无人能够遵从，家国天下诸事再也不容他们置喙。

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与那个赐予他们生命、人格、学养和尊严又使他们困惑、忧虑、割舍不去的旧中国划清界线；与他们安身立命不可离弃的书生本色、君子之道和臧否时政、抗议流弊的权利，以及清高、孤傲乃至隐居山林、行吟江湖的人生退路示目暗别。除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极个别“最后的士大夫”敢于且能够不惮孤寂甚至不畏强暴而以身殉道外，全部知识界只剩下一种身份、一条活路，即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残余象征，接受改造、凌辱、围剿和死亡，以证明新政权新制度的必然、先进和神圣。郭沫若、冯友兰、老舍等人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不知文字尚有其他功能。胡乔木、邓力群、张春桥、姚文元一类文化鹰犬则遥承申不害、李斯、侯览、魏忠贤和托玛斯•阿奎那、加尔文、戈培尔、维辛斯基、日丹诺夫“宗教大法官”遗风，以戕害同类为能事，极尽卑劣残忍以维护专制，为虎作伥而无耻丧德，留下中国自有“文人”以来不曾有过的劣行恶状，千载之下，犹为人不齿。

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文汇报》批判和胡风批判后，毛泽东们在 1957 年开始对知识界大开杀戒。在全部知识界遭逢灭顶之灾，六亿中国人开始次第进入精神焚尸炉的 1957 年，刘宾雁站到了蒙难队伍的最前列。

二

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我从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

身为逃亡关外的山东人后裔，刘宾雁敏于世道人心；家道中落，少年辍学而寄人篱下，刘宾雁灵心善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叛逆精神遂成气质；刚直厚道的父亲、慈爱坚韧的母亲立下的人生矜式是他一生的恩荣；张学良治下的“自由主义”和“亡国奴”的民族忧患带给刘宾雁厌恶一切压抑和禁忌的脾性；反日地下工作锤炼了他献身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初恋般的纯情志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俄罗斯文学的早期阅读和旧中国触目可及的贫穷与积弊，使刘宾雁倾向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打着毛泽东们烙印的中共武装革命派在二十多年间掀起的腥风雨血，从中滋长蔓延尔后定型为中共本性和风范的暴力哲学、权术谋略、偶像崇拜和历史自大狂，都从未毒害过刘宾雁的头脑。相反，刘宾雁与从井冈山和延安沿袭的专横、不近人情和暴力倾向格格不入。“解放区”个人生活和人道主义的萎缩，某种政治神秘化和官僚特权的萌芽，都在刘宾雁心里产生第一轮惊讶和反感。他曾生平第一次目睹拷打地主，瓜分“浮财”，领教了革命者一旦掌权后的狂妄和虚伪。两次遭到隔离审察，更使他对这场革命及其胜利开始保持一丝独立、清醒的怀疑。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绝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竟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俯仰一般自然、合乎人情天道，——他已在年轻的心胸兀自预构了一个新中国：自由，平等，民主，富强……，尤其要有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践履并兑现革命许下的全部庄严承诺。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同属一个革命营垒，同是共产党人，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至少在 1957 年，他们对新中国拥有迥然各异的感情和认识。在刘宾雁心中，新中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完全、永远地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成为一

个历史共同体。毛泽东们要复杂得多。民族、人民与国家合三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新天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那“最高纲领”、实现“最高理想”的工具。

1949 年的全面军事胜利，其后三年对旧中国残余势力（士绅、地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社会基础以及所有民间自治团体）的全国性镇压，以及同期开始对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掠夺，1956 年对全体资产所有者的超法律超经济劫持等国内“成就”，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去世、国民党对台湾的固守以及赫鲁晓夫局部非斯大林化等域外事变一起，共同促进了毛泽东们崭新的建国理念和世界战略：把中国建设成斯大林曾经建立而远非完善的现代极权主义大国，最终取代斯大林和苏俄，把毛式中国革命推广到全世界。

欲达此目的，必须坚持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虽然产自西方、却是唯一能表明其历史合法性的世界性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欲达此目的，必须建立起高度垄断、半军事化的统制经济；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核工业、重工业；必须扫荡与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关的一切历史遗存、象征、符号、内心记忆；必须建立起一个领袖至上，顺从权威，崇拜偶像，泯灭了任何私欲、私利、私念、私心的现代兵营—奴隶社会；监狱、告密、控制、惩罚、恐怖必须上升为社会制度并进入日常生活；一切个人财产、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须悉数剥夺；一切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思想都必须严加防范；一切犹豫、怀疑、动摇和反叛都必须无情镇压。

从最高的历史善意和最客观的中国处境出发，毛泽东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狂人疯子不可理喻的怪诞表演。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它们确实源自一百多年来迭遭侵凌、历经挫折、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特殊感受和特殊要求。正如希特勒一度代表了德国民族的挫败感和这个民族因受刺激受伤害而激发的巨大精力一样，毛泽东们几乎同样难于抵御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弥漫全球的社会极权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暴政而非自由，独裁而非民主，战争而非和平地获取个人、政党、民族和国家在地球上的最大份额，由此而诱使和强制中国人为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在亚洲，惟日本曾梦想建立一个由天皇领导、大和民族统治的“黄种人罗马帝国”，蒙古鞑靼军事专制铁蹄横扫欧亚后又一轮血腥

“黄祸”)。

在毛泽东们眼中，既然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中国，也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世界。中国如此之大，他们据此舞台，就一定要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活剧。它的序幕是：砸碎旧世界，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高潮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不二道具是：暴力、专制、谎言，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死敌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终场是：赤色世界升起一轮红太阳。

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实含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之“精”，“射”中国革命之“卵”，从而一举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们对中国命运的特殊领悟。

毫无疑问，毛泽东们极其真诚而坚定地相信，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凡是效忠于这种理想和使命的，就是历史进步的“选民”，合符最高的历史道德；凡是反对它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叛逆和罪犯，而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无情地消灭。

毛泽东们特有的豪迈、气魄、乐观、坚韧，他们特有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方针、战略、政策，盖源于这一理想和使命。他们是代表历史和人民来履行古今中外一切大独裁者、征服者都未曾实现的伟大梦想。这是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未尽的事业，比他们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从 1949 到 1976 年间毛泽东们的所言所行，何以那般血腥残暴无法无天而无所节制无所忏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危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亢奋，“扫除一切害人虫”、“环球同此凉热”的凶恶狂妄，都不仅仅是一名妄想狂浪漫诗人的恐怖谵符。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何以在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馑，哀鸿遍野的惨憟年代，毛泽东们仍然不计工本地向古巴、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朝鲜等邪恶政权输出民脂民膏、武器和毛式革命；何以不顾人民死活和国际核裁军呼声，以举国之力研制原子弹、氢弹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到今天，“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是中国亿万人民仰慕不已的“民族英雄”。萨哈罗夫式的良知和智慧，至今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何以在全体中国人奴隶式地匍匐爬行了几十年后，还需再来一次登峰造极

的现代造神—奴化运动，直到其全部邪恶和狂妄恣意喷发完毕而天怒人怨后，才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颓然坠地。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毛泽东们何故如敬考妣似地祭重秦始皇而如视寇雠似地贬斥孔夫子；何故在军事占领和经济垄断外，还以其毕生的精力改造、统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灵魂；何故在百废待兴、亟需知识界鼎力参予的一九五七年，蓄谋发动一场对知识界的政治围剿和精神凌迟。

三

要想实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原则（人可以为所欲为）和“自己亲手”建造巴比伦塔的理想，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就必须压制一切现实的自由，必须否定人的存在的一切精神本原和基础。社会主义是人类伟大造反行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它完全筋疲力尽的结果——撇家失业、世代漂泊的浪子精神完全空虚的结果。

——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

1957 年，从旧中国过来的社会名流和学界领袖们虽然没有像刘宾雁那样，实地感受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果，直接经历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政治地震，但从二十年代初直到四十年代末，俄国革命的暴力纪录和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一直是中国独立新闻界和知识界可以公开报导和讨论的话题，他们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全面；绝非一片天真、迂阔，不谙时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不敢忘天下”的本性实在难以违抗，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形与他们预期的目标已出现严重的背反，当局的“鸣放”呼吁和“双百”方针，实在教他们难于想像竟是一个噩梦般的“阳谋”。他们发表了至今切用于中国的高见和谠论，表现了纯正的士大夫本色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孔孟、尤其民国以来知识界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躬行直道、关怀天下的悲壮试法。

事实上，在毛泽东们看来，1957 年大右派们的言论之所以必须予以彻底禁绝（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就是因为它们纯粹属于旧中国被推翻阶级的挣扎和反扑，本来就在取缔之列。章伯钧所提“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何以实施”，章乃器所提“马克思议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陈新桂所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储安平所提“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党委制”，葛佩琦所提“共

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在毛泽东们眼中，这些言论不是荒诞不经，不识时务，而是反动至极，必须把它们与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彻底隔绝。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曾经用更为严厉的措辞喝斥国民党、蒋中正，批评美国和苏俄，作为旧中国国是派和清流派的著名代表而名扬四海。1957年，他们完全错制了形势，误读了毛泽东们的动机，高估了毛泽东们的“雅量”。他们不到半年时间的“鸣放”，换来的是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整个知识界几代人的沉默（他们即使缄默如石，竭尽归顺效忠，也断无任何其他结局）。毛泽东为反右运动作出的定性结论，虽然肯定不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却真实地道出了新中国统治者与旧中国统治者全然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道出了毛泽东们异常明晰、确切的预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

历史潮流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国家性质变了，民族使命变了。无辜、正直、满腹经纶的老右派们确实难以理喻、甚至难于与闻，究竟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什么样的“历史的铁扫帚”把他们如此绝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1957年的较量，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抑或阴阳两谋俱用，无论多么无耻卑鄙，毛泽东们是大获全胜了。毛泽东告诫他的同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应当承认，1957年中国知识界的惨败、毛泽东们的完胜，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来临。旧中国最负盛望的知识界名流、权威的遽然消失，为新中国新理想新使命扫开了最后一个障碍。1940年夏，巴黎陷落，法国投降，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1957年秋，当全体右派被开始“批判”、“围剿”、“劳改”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每周一次数舞会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们无与伦比的政治首创，奠定了毛式共产党中国最富独

创性的特征：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军事－经济垄断—＋大规模、长时间群众性政治动＋意识形态至上。没有最后两项，再强悍再庞大的物质与制度力量，都可能毁于一旦。

1957 年，旧中国知识界滑铁卢式的败出，标志着孔孟以来两千年多年士大夫关怀天下传统的终结，毛泽东们似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逻辑和愿望，把中国引向他们安排的道路。

四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不是狼！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曼杰施塔姆

刘宾雁的出场，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从童年起，父亲就把一个思想“深深植入”刘宾雁的头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人类的理想。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通过它对俄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好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都“助长了我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崇拜”。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山、张闻天、张国焘、王明军中共早期领袖一样，在青少年时代的刘宾雁眼中，莫斯科就是社会主义的麦加，俄罗斯就是自己的精神祖国。与鲁迅、茅盾、耿济之、陈启珍、郁达夫、曹靖华、汝龙、成仿吾、郑超龄、田汉等左翼文人一样，刘宾雁也有一腔“盗火者”豪情。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俄国文学表达的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而高贵、坚毅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象，在刘宾雁

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永远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朽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尤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唤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极言之，在本民族本文明中，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失望、愤怒：专制、禁锢、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不懂爱情，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支撑他反抗专制极权、追求自由真理的道德源泉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他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里，永远居于第二位。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所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中国东北，曾发生严重抢掠奸淫。刘宾雁在沈阳和哈尔滨第一次感受到“苏联老大哥”以征服者、解放者自居流露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1956 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之际。他对十月革命、苏联道路的圣洁情感蒙开始上浓黑的阴影。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苏联帝国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尤其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那份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刘宾雁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愤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眼泪，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1956 年，《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称：“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年后，反右运动开始）；1963 年，《人民日报》再次祭起斯大林的亡灵：“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三年后，文革爆发）。毛泽东们为斯大林开脱，辩护，歌功颂德，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鼓吹强者、“成功者”杀人有理的“三七开”，刘宾雁“始终不以为然”。

中国广播机构报导苏共处置斯大林分子的新闻时，刘宾雁所在的《中国青年报》

的党员干部“大都反对赫鲁晓夫”，同情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这种“一致性”，使刘宾雁“一惊”。他当然知道，关于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毛泽东们肯定比他了解得更详细；但是他不知道，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清算，毛泽东们得出了与他完全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在苏俄的所作所为（“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国正要完全忠实地做一遍，斯大林没有完成的工作（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全球共产主义……），毛泽东们要继承下去并坚持到底。

由于时空统一性，由于“先验综合范畴”，由于人性在冥冥之中惊人的内在命运感通力，圣徒、先知和殉道者体现的高尚精神会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素昧平生的无数善男信女，而恶人、奸佞和暴君之间，也会建立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秦始皇和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们，比起自己的祖宗和同代同胞，更如同父母和手足。善恶之间泾渭分明，如同白昼黑夜。1957 年前夕，中国命运是以批判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为主题，呈现出判然分明的历史分野。

历史无情，无数善良和平凡的人们衔冤而殁；历史也有情，牺牲者的血总会测红刽子手的手脸。历史异常顽强，一旦真相（重大苦难和罪行）浮露于世，就会在不可能彻底泯灭的人性和良知世界激起巨大的正义和愤怒。世上暴君最大的噩梦是，他们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灭绝所有人的天良，永远无法销毁所有罪证。1957 年发生在刘宾雁身上的，便是这种永恒法则的一个显例：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等苏俄老布尔什维克的冤死会激起刘宾雁感同身受的伤痛和义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也会搅得毛泽东寝食难安。奴役与自由、暴力与正义、谎言与真相，不可能兼容于同一时空。

刘宾雁更不会知道，毛泽东一类极端虚荣阴险的暴君，都患有一种“鞭尸”恐惧症，他们最惧怕最忧虑的是死后鞭尸。伍子胥两千五百年前把杀父仇人楚平王的遗骸掘出，鞭之三百，留下遗言：“抉吾眼悬呈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虽然有违天道，但对于东方式的暴君，“鞭尸”不啻为一种有效的震慑手段。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是，他要汲取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用中国酷吏“除恶务尽”的信条，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任何可能。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们的导师和兄长们的罪行如此骇人听闻，牺牲如此巨大，“走俄国人的路”，还是不容质疑、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和普通真理吗？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过程和危害，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代人类的重

大历史现象。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主义曾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的最大禁忌之一，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自身苦难的这个血腥源头仍然懵然无知。

无论如何，1957 年前的刘宾雁对中共和毛泽东们依然一片赤诚，“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对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史实加以澄清，没有对日本入侵和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共夺取中国的决定性意义有所洞察（甚至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来得及对类似重大历史真相重新辨认），他也不可能了解中共三十多年间权力斗争的血腥内幕，更不可能预见到毛泽东们在中国推行的共产革命，将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恐怖，全体人民和革命儿女们将要一步步陷入空前的浩劫，一只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残暴怪兽将要吞噬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但是，刘宾雁在内心已经悄悄与这只尚未完全露出其狰狞面具的怪兽拉开了距离，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已经如同天际的乌云，在他心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五

被迫沉默或低声交流并不停环顾四周是否有人窃听的人，经常为房间板壁太薄而担心的人，不自由的人，没有权利大声表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能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选举他们所希望的人，在制定国内外政策上没有表达权的人，不可能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

——波•戈洛夫

1957 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这片乌云、这道阴影，将要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无意间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在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哥穆尔卡、达卡尔、贝林格（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注重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尽力把自由解放的伟大理想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体现于全部社会环节和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无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

僵硬立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人性的丰富和创造性乃至信仰世界，保持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底线。它的所有成员，无一不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狂热牺牲和无限仇恨的洪水中，人类常情、理性和人道的本性，不可避免地要施予必需的节制和抚慰，使革命固有的正义和崇高不至于完全荡然无存，并在浩劫的荒原上给后人留下文明和人性的种子。刘宾雁在经历、道德、气质和人格结构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

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欧洲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不绝如缕。正是“革命的良心”焕发出的激情和献身精神，一度创造了使西方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另一种世界性文明；也正是这份“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绌，放逐，批斗，逮捕，处决，并且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人类历史上都无出其右。

1957 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一柄巨大的十字架正在中国大地竖起，刘宾雁注定将成为中国十字架背负大军中最艰辛最强壮最忠实的一员。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 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

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 1957 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远远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任何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 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广远最持久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与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噩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1957 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尽管还有些模糊，不彻底，没有理论体系，但刘宾雁已经无意间卷进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六

在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政治生活甚至投入监狱的国家里，……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上留下了几乎擦洗不掉的污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57 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

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美感。就在 1957 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 1957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关于“左”、“右”政治派别，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已经聚讼纷纭。作为一种睥睨文明和历史、试图重建世界的学说和运动，罗伯斯庇尔、斯大林和毛泽东们确实属于激进的左派；而作为珍视传统和人性基本价值，对世界采取总体同情和不忍之心的哲学，雨果、托尔斯泰、刘宾雁们应该划归保守右派。刘宾雁希望用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来取代造反、革命和战争，正是自古而今保守主义的共同立场）。

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前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后者拥有整个帝国，前者永远是孤身一人），后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击败前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前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后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 1957 年的结缘，当然不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生命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理性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强加的恶谥，亲身领教经崩溃本是体现生命尊严的简便形式，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他的使命未尽啊。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 1957 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2004 年 2 月 27 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时，还感谢 1957 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要么不知深浅，混到文革，老帐新帐一起算，“非死不可”；要么象魏巍、刘伯羽一类御用文人一样，在谎言和虚伪中度过一生，“并不值得羡慕”；要么与张春桥、姚文元一样“成为四人帮的帮凶”。刘宾雁在 1957 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死亡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资本。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1957 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

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索尔仁尼琴曾详细地描述过他被“特料人员”押解，从明斯克月台到莫斯科地铁的情况。他一直默不做声的潜伏原因是：“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正是在那些失去全部幸福和正常生活的黑暗日子里，刘宾雁与索尔仁尼琴被捕时一样，向自己、人民和整个专制帝国发誓：必须活下去，除了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和爱以外，“有朝一日，我仍然能获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还会写出比 1956 年那些东西更高的作品！”

七

真理的精神，爱的精神，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若要拯救俄国，就需要这些精神的吹拂！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从 1949 年到 1957 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并无重大分歧。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震惊和思考，还是间接、直觉、初步和道德主义的，他对新社会新制度中主观主义、官僚作风和特权的置疑，基本出自“革命中人”和“体制内”的担忧。就像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和列宁的东方信徒（不能、也无必要怀疑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徒的虔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中国专制暴君和农民造反加诸其身的历史印记一样，刘宾雁作为中国“革命的良心”，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先驱们，也有明显的地缘和时代差异。

远在斯大林暴政出台前，1918 年，普烈汉诺夫就在其遗嘱中预言布尔什维克将按如下规律演变：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然后演变成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初是阶级恐怖，接着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立刻就会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威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被破坏的将不是旧世界，而是祖国俄罗斯。这位“俄国共产主义之父”“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而痛哭”，同时“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罗曼•罗兰一直公开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立宪党和孟什维克的镇压，使他极为失望。他发表公开信，对苏俄“军事共产主义”表示抗议：“新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和真理。”这位十月革命为

数不多的欧洲拥护者公开告诫列宁，“暴力政权、特别是歌颂这类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人物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信仰是以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在苏共垮台后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苏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长达一千页的巨著《让历史来审判》中最后写道：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所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卑鄙无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但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纯洁的。在这旗帜上写着：‘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旗帜旁边站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人。关于他们可以用马克思所喜爱的谚语来形容：‘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并列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玷污我们的旗帜。”

同属纪实性文献，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专制、暴力、苦难和罪恶的作证，其立场的彻底，道德抗议的纯粹和历史洞察力，与同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苏俄作家们相比，明显带有半中国历史环境的印记。在同样险恶的环境中，俄国的良心写作一直

保持着“男低音和女高音”天作之合的纪念碑式的完美。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刀刃之上》、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无愧于俄国苦难，坚持救赎的传世之作。

应该承认，既是以俄为师的革命，与毛泽东们至死只能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一样，包括刘宾雁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的良心人物，都不可能达到俄国先驱们曾经达到的境界和高度。同理，中国所有现代自由、民主派（包括艺术先锋派们）也无法摆脱邯郸学步的无奈和尴尬。也许，只有当西方和俄国的经验与教训在全世界成为常识并与摹仿效法者的经验融为一体时，中国和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宿命，才可能解除，人类才可能告别支配了世界几百年的野蛮、愚昧、冲突，战争和浩劫。

无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属于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中国的劣势和落后一目了然。然而，中国在照抄、照搬西方和苏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人类历史不断演化、进步的伟大法则：精神对权力的抗衡，自由与暴政的对峙，人类最柔弱、最无形的心灵力量必须在不幸和罪恶面前表达自己，从而使自由、真理和幸福成为世界性事业。正如毛泽东竭尽所能要“天才地”把马克思发展到“顶峰”一样，刘宾雁也听从良知和命运的召唤，在毛泽东生前死后坚持对重大善恶是非的追究，不容忍历史真相与暴君同入坟墓。

刘宾雁后来在中国发出的声音，明显带有俄罗斯历史沉钟的回音，但却有独创的节律、色彩、气韵、旋律，人类救赎精神在东方的伟大心跳，风断云续、垂天而降的天籁之音。

八

呵，俄罗斯！

你遭受了多么可怕而沉重的罪孽！

恶毒的谎言使你在审判的深渊里显得抑郁沉重，

你被刻上了奴役枷锁的印记！

——霍米亚科夫

1958 年，刘宾雁和全体右派堕入地狱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刚刚摆脱政治苦役犯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苦难，对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分子被逐出权力王国、却以“退休金领养者”身份逍遥于法律和道德的清算之外，深以为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

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点的基石。

这正是刘宾雁在二十二年间逐渐成形的思想。

刘宾雁和上百万右派人士二十二年间承受的苦难和罪恶，首先是一桩严重的道德犯罪和历史犯罪。如果任其在中国社会里埋藏发酵，对罪魁祸首毛泽东不予道德清算和历史审判，就不仅对不起蒙受了无数冤屈痛苦的人们，而且保留着继续镇压思想的恐怖权力，预示着中国的噩梦还在继续。

1986 年底，刘宾雁与许良英、方励之向几十名著名右派发出一份“1957 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三十年前那场政治屠杀展开严肃调查和讨论。由于邓小平的直接干预和钱伟长的告密，会议没有开成。刘宾雁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与史学界、理论界、文学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进行了上百次座谈。偌大中国，千古奇冤，几乎剩下刘宾雁一人奔波道途，形单影只，成为 1957 年反右运动孤单而英勇的公诉人。

1986 年 9 月 13 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请问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对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对那些不在场却时刻监听着他的人们问道：

1981 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

1986 年 11 月 21 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说，得出与当局截然不同的结论：

1957 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反右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 120 万、200 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1986 年 11 月 27 日，刘宾雁在南京大学要求大学生们关注国事，记住 1957 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大学生在任何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希望所在！

对 1957 年反右运动的评价，使刘宾雁与邓小平们发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们看来，反右运动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平反（留下“扩大化”的余地），即使不需再高呼“圣主英明，皇恩浩荡”，也应当知足了。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人们，任何历史现象都无需进行道德评判，无论多么惨痛的悲剧和不可宽恕的暴行，都是可以撇开不顾，可以进行交易的政治筹码。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目的永存。他们并不想、也不能否定毛泽东们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使命，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的下台经历获取新的统治权，而把毛泽东们由于历史条件、个性、风格、手法失当而没有办好办成的事情办下去。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何以至今充斥着对苏联和中国人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幽灵；毛泽东还继续窃据着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使世界瞩目的位置，窃据着成亿中国人拥有的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纸面空间；何以毛泽东在精神上有如此强盛的繁殖力，中国社会至今对毛泽东们厌恶和否定过、中国人最亟需的自由、民主、人道仍然怀着如此令人绝望的无知、鄙夷、诋毁和仇视！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人性本善，对人类永恒的善性怀抱着感动、赞叹和敬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生命及其自由、尊严、高贵和神圣是不可动摇不可背逆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这类人对专横、暴力、阴谋、杀戮、欺骗、奴役本能地反感、厌恶，并且不可让渡，不可推诿，不可避免地起而反抗，即使需要把一切典押给苦难、孤独和死亡。另一类人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

刘宾雁与毛泽东、邓小平们不仅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甚至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右后者看来，1957 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即使含冤蒙耻，伟大的战略目标本身也是不可谴责的。即使从历史功利出发，刘宾雁也与 1957 年反右运动始作俑者们有着大不一样的结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从此，知识分子和干部将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党组织腐败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将畅行无阻。党内与社会民主将不是逐步扩大而是不断缩小，直到实行法西斯专政。继 1958、1960 年人为的经济大灾害而来的 1966—1976 年人为的政治浩劫，将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并在 1976 年以后漫长的时间里继续咀嚼苦果，为每一步缓缓的前进，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源于 1957—1958 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7 年反右运动奠定了共产党一党独大、毛泽东一人独裁的局面，塑造了中国半

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这一年，也成为刘宾雁在中国大难来临之际，独自呐喊独自悲歌的苦难开篇。从此，刘宾雁的“革命的良心”破碎支离，毛式共产裁判所把他判定为永远的异端。

1956—57 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然而，即使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 1957 年和 1958 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中篇

一

我用沉重的门闩

插上门，不让革命之风

吹乱我的神圣的稿纸。

——弗拉基斯拉夫•费利安刘诺维奇•霍达谢维奇

1979 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 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 年，刘宾雁 55 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

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 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 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

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党和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疏离?它曾开除过我，又纠正了错误使我回到党内，但几乎从我回到党内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视着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党内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类”。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礴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出自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

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 1953 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 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 1957 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1957 到 1979 年二十二年间，中国社会公开鼓吹仇恨，实行一部分中国人对另一部分中国人的歧视和暴力统治，斯大林主义的两个主要砝码“全盘集体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在中国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身上都打下它们恶名昭著的印记。整个社

会融奴隶制、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和僭主独裁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不仅自由、平等、民主、公义和真理惨遭禁绝，连人性、人道、母爱、同情、忏悔甚至孤独、出神、沉默、幻想、梦境、回忆等人类最基本最无害的个体生命形态，甚至连绝望、自暴自弃、精神崩溃和死亡，都同样惨遭荼毒践踏。作为舶来品的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赫然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信奉遵从的天条。

1973 年 9 月，毛泽东正写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并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索尔仁尼琴致信苏共领导人，愤怒指控“上个世纪末从西风刮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巨人般的俄国”为此付出了 6,600 万生命的代价。索氏声明，他并“不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但既然中共领袖非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就把这种先进思想给他们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并负担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十世纪独有的“异族意识形态统治”对中国的征服，其怪异、荒诞、血腥、强悍，更超逾了苏俄。1959—61 年间，1966—68 年间，因毛泽东们毫不克制和恻隐的倒行逆施，中国先后出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和政治迷狂，先后出现大规模人吃人的恐怖世象。一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见到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末世景象，三百年前，顾亭林同样阴朔的预言，竟变成了公开、确凿的国家行为和社会事实：“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文革对中国是彻头彻尾的浩劫，文革结束却没有成为中国的福音。历史之手不是经由人民、而是通过与毛泽东、“四人帮”过从甚密、几十年间对中国人民同样罪恶深重的人物，通过一场类似政变的权力转移，完成了独裁向专制的回归。邓小平上台后，实行“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实用主义，为饱受毛泽东们折磨、动荡翻覆不已的中国带来表面稳定，知识界告别了长达三十年被无端凌辱、打击的不堪之痛。但毛泽东缔造的国家基本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体系，被悉心维护下来。中国结束了文革，却留下了文革之源。1979 年，在一系列权力、利益交易完成后，新的权力格局和国家统治方略得以确立。

当代中国这次最大的历史错位，使人民付出的代价之高，将在此后近四十年时间中，一次又一次展现出来。

1949 年，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历史的特殊环境中，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还是天意人心所在，起码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宿命。如同刘宾雁、李慎之、顾准、何家栋、李

锐、朱厚泽等人所论，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有可能出现较为开明、温和、人道、甚至有限自由和民主的局面，从而走上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尤其是《共同纲领》中阐述和承诺过的道路。从 1976 年到 1979 年中国道路的抉择，决不是人民意志的实现，王申酉的牺牲、魏京生的入狱和“民主墙”的封闭表明，中共新当权者同样没有基本的现代意识，他们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下，力图超越赫鲁晓夫，直接采用勃烈日涅夫主义，在“安定”和“团结”幌子下继续实行专制。

1949 年毛泽东登基，刘宾雁就没有感到“高兴和激动”，他那时就预感到，共产党可能给老百姓温饱，但是“不会给人民快乐和自由”，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这个制度”。1979 年，刘宾雁与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士一样，再次认识到，历史并没有走上正道，人民被出卖了，中国前途堪忧。

摆在他个人面前的，仍然有两条路，一条是与新的胜利者合作，而这与他的天性和命运早已南辕北辙；另一条是继续 1957 年以后的人生选择。

二

在集中营疲惫的漫长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9 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

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象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劫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了。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 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 1949 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 1957 年中国万马齐鸣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妖之间》第一次发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异化开始，对中国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林、吉拉斯、卢卡奇、葛朗西、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象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性灵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

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枷锁，钳制对手，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卓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事实上，从 1949 年、1957 年、1966 年、1989 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

三

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之中出现了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安德烈•萨哈罗夫

鲁迅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两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在鲁迅那里，中国人愚昧、自私、冷漠，

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 1949 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毛泽东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文革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当年的狂人、阿 Q 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奴隶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从 1936 年鲁迅去世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 40 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 Q 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共产党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刘宾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

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刘宾雁借助外语优势达到的理论高度，在中国作家极为罕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消失，又因为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而厌恶透了”。他却因此悟出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中共当局不可与言，又由于理论界普遍缺乏道德担当和理论勇气，因此，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论争，既不可能又无价值。而中国社会的演变和人民的真实状态，则是比理论问题、包括上层政治重要得多，真正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大问题。

“二十二年与世隔绝，得天之助，一是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养成点平民意识；同时不受官场沾染，保持了感觉的‘童真’。因而，1979 年初一旦‘改正’，仍用三十岁时的眼睛看现实，遂觉得不可容忍，写出《人妖之间》。于是，重演一遍二十三年前的故事，一举成名”。安徒生的天才之作《皇帝的新装》在二百年后的中国找到了知音。刘宾雁撕裂了新中国冠冕堂皇的面具：这个国家一天也没有属于人民，正相反，名义上、法律上的国家主人——人民，已经异化为被欺骗、被利用的群氓，沦落为被蹂躏、被驱使的奴仆，被剥夺、被出卖的草菅鲸首。

一个新的统治集团、新的特权阶级，已经凌驾于人民之上。中国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共产党与人民之间，人与妖之间，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分化和组合，完成了一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位与复辟。《人妖之间》发行了 140 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

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和独立精神的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右’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视野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 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朋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

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冥辰高悬在我们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挣扎；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些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代替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阿赫玛托娃

1985 年 1 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中共上层里“革命良心”对独裁者的一次罕见的谲谏，后来演变成残酷的政治陷害。在此之外，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刘宾雁将两封“万言书”公诸于众，直截了当地拷问毛泽东亡灵和当政的邓小平。

1881 年 3 月，亚历山大二世被谋刺后，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把一封致亚历山大三世的公开信印在“富有光泽的羊皮纸上”，投进涅瓦大街邮筒里。同时有一万三千份复印件在俄国各地散发。民意党人指出，现在俄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质来说只应当表达人民的愿望，只应当实现人民的意志。”然而，在俄国，“政府已堕落为清一色的奸党，并且比起执行委员会来更加适合于称之为一帮篡位的匪徒。”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大赦政治犯；二、由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

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对五名谋刺人士（其中一名是著名女革命家索菲亚）判处绞刑。

奉行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致信亚历山大三世，指出俄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之路；自由主义的纵容之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的宽恕之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同时给沙皇写信的还有二十余名"俄罗斯的良知"，他们也都遭到拒绝）。二十年后，托氏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措辞已不再是恳求，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坦率、也最有价值的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情况下，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向暴君和独裁者公开或私下致书，提出劝讽和告诫，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刘宾雁本人就曾经以信函方式提醒毛泽东"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党内占优势的是权条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内高级干部存在'变色龙'，党群关系恶遍恶化……"，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就是中国最大的特权人物和变色龙。

在《第二种忠诚里》，刘宾雁公布的两封"万言书"，均出自普通士兵。它们的公诸于世，像两把利斧劈开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世袭领地和政治黑箱，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以真正的人民名义和个人的良知高度指控和质问毛泽东：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 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毫无疑问，这是对共产极权的最高权威的挑战，意味着一个被掩盖的历史进程早已存在于表面铁板一块式的中国社会中。“万言书”作者之一陈世忠明确拒绝充当雷锋式的工具，“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他预先就断定了你（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帮助你们纠正呢？”

雷锋作为毛泽东精心培养的奴隶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于王守信。它作为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权力狂的必要陪衬，作为公然变人为齿轮、螺丝钉、耳目、鹰犬的标本，在道德和伦理上发生过异常虚伪和卑劣的影响。雷锋式共产主义道德楷模的无耻和可怕，使中国历史的伪君子和宦阉之徒都会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 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富于独立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的作品必须首先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他认为刘宾雁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上的重大现象，“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

《第二种忠诚》是在历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领域与毛泽东的决裂，其颠覆性的意义至今犹存：极权主义和暴君政治的弥天大谎——“为人民服务”——像舞台上纸糊的布景开始翻转出它满是灰尘和蛛网的背面。

在此之前，从华沙到布拉格，东欧人民在匈牙利起义被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再次走上挣脱斯大林主义锁链的“光荣荆棘路”。知识界、工人、教会和党内改革派正式结成联盟。瓦丘利克的《2000 字宣言》、希克教授和里赫塔博士的《行动纲领》、瓦文萨们的《21 条要求》以及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们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独立”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的天空，东欧大地的自由解放运动已不可逆转。

《第二种忠诚》虽然还停留在对历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历史精神上与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浪潮却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须用真理、正义、人道战胜专制、邪恶和暴力。

五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象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帕斯捷尔纳克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 年 11 月 21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 78 或者 77 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大概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

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1949 年之后的中国，一反人性常态和文明成法，歌功颂德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唯一表达。秦始皇以来专制传统发明的感恩载德之辞已难敷大用。大小新式御用文人铸造了无数新词，将全中国连同每个大脑的任何角落统通打造成谀词之海，颂歌之邦。刘宾雁一百多万文字中，竟然没有一个句式、一个单词、一个字曾经让专制和既得利益者们赏心悦目。刘宾雁之所以不去写可以证明他的创作才华、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小说，“明知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工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还有一个他屡次公开直言的目的：“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无法发挥的作用，它能直接地对生活进程发生一点影响，能造成一点震撼，——有时候，你简直觉得那是一种能摸得着的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坏人多少起一点威慑作用，不然，他们的日子也未免过于舒适了。”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为中国写作”的八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连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 1987 年 1 月 24 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

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刘宾雁始终据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六

创作欢乐之杯

充盈溢满，

一切都已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

与世界的联系牢牢确立。

——亚历山大•亚山山大罗维奇•勃洛克

当代中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象是，十数亿人像逃避“萨斯”和海啸一样，惧怕与自己的历史照面。无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友善与援助，苏俄对中国的算计伤害，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都是一团乱麻。中国自己的“家史”更是一篇造假作弊的大作。国民党、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推翻满清、结束帝制、两次北伐打倒军阀、领导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晋身反法西斯四强、缔造联合国、在台湾完成不流血土地改革、实行宪政……）至今被抹黑，通盘否定。共产党自己的党史更是一片谎言，“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中国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个体经验的集合，然而在中国，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1949年以后，由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绝对统治，中国人的同质化和齐整化已经使任何个人的独特权利与完整性不复存在。不承认中国人在当代的共同命运，试图用西方现代理论（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符号学、逻辑实证主义等）诠释中国现代命运，乃是典型的"与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中国高尚精神的严重消散、专制主义和腐败堕落的空前扩散，加上理论界自身的颓废，都证明了任何回避中国历史与现实重大事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出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

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 1979 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和人物。

1983 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毛泽东、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

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七

划船的渡工，

年轻的小伙子，

请你送我到对岸，

我要回家去。

——亚历山大•特里方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热烈而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

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在严肃且正常的史学家眼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应当在五十年以后才能开始。需要留出时间发现、消化档案，并降低当事人的狭隘和偏见，历史自身有一个成熟期，等等。而当代中国是一个靠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历史学是共产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石之一。由于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由于恐怖心理仍然社会的基本现象，中国当代历史的所有领域都面临“紧急抢救”的困境，苦难和悲剧需要述说，罪恶和阴谋需要查证。专制主义的本性之一，就是销毁和篡改历史，历史研究在中国因此成为需要勇气的风险事业。此外，由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特殊处境和内在逻辑，公正的历史研究成为防范更大灾变的重要减压器。最后，即使为将来纯粹而客观的历史学着想，跟踪和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的足迹，也具备基础和工具的意义。

刘宾雁在其报告文学中展示出来的，大都是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个别事例，同时保持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宏观思索。在刘宾雁身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具有比克罗齐本人所赋予的内容更直接、更丰富、更经典的含义。

1986 年 11 月 7 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

1986 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

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 1944 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 1926 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 年 11 月 7 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但历史从来不会滞留在一种状态中。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八

我们仍然同心同德……

并将再度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奥加辽夫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

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1.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 2.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 3.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 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 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

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爱因斯坦、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怀特海、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卡那普、维特根斯坦、马尔塞勒杜威、汤因比、蒂里希、拉康、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普、海森堡、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上面括号中的西方智者还可以罗列开去，其中像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人都来过中国，他们的印象和分析基本不离谱。道理很简单，旧中国是一个虽然积弊丛生但并不封闭、风雨飘摇却从不拒绝自由与人道的社会。而萨特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倾倒于毛式极权狂欢表演，至今令人恶心。另一名法国人、法兰克福派领袖列菲弗尔，尽管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批判，但对毛泽东的理解，实在乏善可陈。他认为，毛泽东一系列政治运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革命）“表现了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一种融合”。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和“丰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节日”，“应该列于世界性的经验之中”。西方在认识新中国上，至今停留在隔靴搔痒、纸上谈兵的水平上，——探讨中国命运，本来不是西方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 1919 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当代中国人正继续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九

我爱我一无际涯的绝望

最后一滴总令我们意酣心醉。

此刻，唯有一事我永志不忘：

不论斟满的是什么，都要——干杯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比乌斯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 1957 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 1987 年 1 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 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 年 1 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 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 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

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 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将以什么形式应验？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对于仍然生活在共产极权社会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普适价值，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于对异端审判这一欧洲中世纪野蛮制度的唾弃，转而强调个人在天地之间不可以任何名义加以剥夺和奴役的现代原则。无疑，对于同属一个星球、一个时代的中国，这既是一种目标，又是一个实现广泛自由的前提。

自司马迁、稽康、李贽以来，中国敢言直谏的异端之途，充满屈辱、杀伐、自戕，其悲绝舛惨，更甚于欧洲中世纪，也甚于俄国。——至少，伽俐略可以公开挑战罗马教庭的精神偶像托勒密和理论权威亚里士多德；布鲁诺可以在宗教裁判所里当着教皇使节和主审官“庄严宣告，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至少，托尔斯泰可以公开指斥俄国的沙皇“不是白痴就是疯子”，而当这名沙皇专制不倦的谴责者逝世时，沙皇的代表就站在他的灵柩前鞠躬。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专制势力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 1957 年、1966 年、1983 年、1987 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 年 6 月 2 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笔者 1989 年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十八年过去，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

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水、胡耀邦、李慎之、赵紫阳……。

俄国十九世纪的精神流程是，贵族的反叛气概被平民知识分子继承；在二十世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从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演变成整个俄罗斯实现自由的浩大进军。中国仍然晚了一个时代，但是在刘宾雁离开世界前后，李慎之、何家栋、刘晓波、余世存、廖亦武、余杰、焦国标、卢跃刚、王怡、綦彦臣、张林、胡杰、摩洛以及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已在“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了。

刘宾雁的见解和批判方式，未必为他们全部认同，但作为付出一生代价的批判者，刘宾雁是他们良师益友般的先驱。

此文于 2007 年 01 月 14 日做了修改

下篇

1986 就年年底，安德烈•萨哈罗夫接受戈尔巴乔夫邀请，返回莫斯科。到 1989 年，苏联权威的《论据与事实》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萨哈罗夫是比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更孚众望的人物。这年年底，萨哈罗夫猝然去世，戈尔巴乔夫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向被安德罗波夫称为“苏联最大的人民公敌”的棺柩脱帽致敬。戈尔巴乔夫称死者是“俄国历史上关键时刻总会出现的圣者，他留给俄罗斯的遗产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理解的”。

在此之间，刘宾雁先被第二次开除中共党籍，后被当局取缔公民权，这名“中国的良心”从此被禁止回国。

与 1956—57 年、1979 年一样，中国与苏俄各自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时代节奏，在 1989 年前后再次分道扬镳。

十月革命作为俄国道路的恶性转折，把俄罗斯带进 74 年的血腥泥淖。历史以罕见的清晰和完整的图景留下了它的兴亡历程。根据拿破仑、希特勒在俄罗斯的失败可知，面对苏俄强大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西方主要国家联手发动一场侵苏战争（当然不可能），苏俄国内所有反苏反共力量同时起事反抗，也不可能摧毁这个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强大的赤色帝国。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根本原因出自一种异乎寻常而又极为普通的力量。与十月革命爆发一样，源自苏俄历史、社会和人民。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沿袭了沙皇帝国的老路，始终拒绝源于道德和救赎精神的自由、民主、真理，而无力将暴政与人民的虚假一致维持到底。苏俄的全部危机乃是传

统专制帝国固有的危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旦良知和智慧在苏共上层占据优势，整个专制帝国就难以为继，而人民天然站在他们一边，没有一个支部、甚至一个人愿意为处于生死关头的苏俄红色帝国流一滴血的事实，证明了那个伟大的铁则：得人心者得天下，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1989 年，这道铁则在中国失灵了。

胡耀邦的良知高度和人道情怀并不低于赫鲁晓夫，赵紫阳的政治见解和国家危机意识也不逊色于戈尔巴乔夫，更勿需说中国还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新当局都亲身领教过毛泽东的残暴和虚伪。但是，中国没有按照道德、良知、理智和真理的指引，而是按照另一种逻辑，走上另一条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指出：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外，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无论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具有何等深厚的土壤，犯下何等不可宽恕的滔天大罪，苏俄有何等强大的军事力量、警察统治和意识形态垄断，但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一旦知道历史真相，俄国人民就会产生何等令人震惊和钦佩的道德勇气，弃若敝履般地弃绝这个曾令世界眩目胆寒、令苏联人民“无比自豪”的暴政。其中的奥秘既深刻又朴实：上帝委托拉吉舍夫、莫尔德维诺夫、陀思妥耶夫、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圣徒、天才们植下的信仰、希望和爱，从来没有被斯大林们“改造”过来，苏俄人民和大地从来没有被镰刀、斧头彻底征服。一个依然淳朴、善良、高尚的人民与一个充满血腥、邪恶和谎言的残暴帝国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七十四年），而绝无可能持续到永远。

中国没有东正教（中国并不拒斥任何宗教），没有天堂的企盼和地狱的惩罚，但中国绝不会变成上帝的弃地。数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能孕育刘宾雁，就表明它与俄国一样，同在上帝注目中。

著名作家郑义说动刘宾雁在 1989 年 4 月回国。如果这一动议成为现实，天安门广场群龙无首的民主运动出现刘宾雁魁梧的身影，以他在亿万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外）、尤其青年和大学生中的巨大声望，历史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前景。这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当社会置身巨大变革状态时，历史偶然性和突发事件常常会显示重要的力量；当一个民族茫然失措、举步维艰而又必须作出抉择时，杰出人物的出现或缺

席，会使历史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君士坦丁把自己的身份由“护教者”，改为教会“改宗者”，无论对于基督教还是罗马帝国都是意外而重大的事件。如果罗伯斯庇尔没有说出“共和国对于它的敌人什么也不欠，只欠贷以一死”，千百万法国人未必会染上恐怖狂想，而拿破仑未必那样轻易地把政权篡夺过来。

如果希特勒被施道芬堡的炸弹送到地狱，欧洲战场的硝烟很可能提前两年散去。

与这一动议最切近的事例是，如果列宁没有在四月份从瑞士赶回彼得堡，如果他没用用只有他才具有的革命直觉和雄辩（“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这两三天的战斗！”“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不动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和平，土地，面包！”），如果列宁没有一个一个地说服他的同事们，如果德国没有履行与列宁的口头契约，那么当时支配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很可能与临时政府和克伦茨基合作，起义就会被消灭在血泊中，德国的军队就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宁本人和他的同志们就会遭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遭受的命运。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刘宾雁去世前承认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过于天真和乐观了”。其实，正是在美国，在从天安门广场易地到自由新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刘宾雁关于人民发生变异的天才洞见，再次得到证实。

刘宾雁在自由之邦，有了新的发现，——他从 1957 年到 1979 年到 1988 年春天离开祖国前对中国的发现的延伸。他发现，中国人已在自己身上和内心染上毛泽东的毒素，对权力、欲望、野心和斗争的兴趣和热情，远远大过对自由、民主、人道的坚守和追求。在极度失望之余，刘宾雁像耶酥一样，对那些赢得了自由却依旧权欲熏心的人们喊问：你们讲一点良心吧？！

1949 年以来，两三代人在毛式极权统治下，道德破败残缺，精神和人格结构充斥着奴性（奴隶和奴隶主）和物化，灵魂世界苍白空洞，无所信奉。任何外在自由、民主、平等都不可能轻易在这种精神结构和心灵秩序中完成脱胎换骨的置换。人性的启蒙和道德的排毒，仍然是中国的最大难题。刘宾雁关于中国社会人妖颠倒、人性蜕化的发现，至今是中国历史、制度、社会等领域中的“经典力学”。

“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问题仍然在人、人民身上。刘宾雁太天真，但决不简

单，不浮浅，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像他一样，如此天才而深刻、痛苦而本质地发现了中国，洞察并预言了中国的命运。

失去祖国的刘宾雁在花甲之年后，走上自己悲凉而苍茫、孤独而辉煌的人生末路。在孤绝、疾病、死亡和流亡者固有的所有艰辛困苦中，刘宾雁一如继往地心系祖国，挂念人民，直到最后时刻，还坚信“我们真正是在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在近代以来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当中，刘宾雁的道德、人格、精神、思想和灵魂，堪称一流。他“从我们中间飞逝而去”不到一年，他留下的遗产，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变革中，逐渐为后世所感领、所继承。

一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时25分，刘宾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是时天降大雪。

五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凌晨零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邻近一个小镇的特伦顿教堂火化。

爱因斯坦的挚友，用两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诗句为他送行，同样的诗句，在中国内地刘宾雁的灵堂前响起：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导；

那仅属于他个人的一切，

早已传遍芸芸众生。

像转瞬即逝的彗星，华光四射，

他把自己与无限永恒的光芒，永相连结。

爱因斯坦不仅因为“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郎之万：《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245页)，因为“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性”(《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卷第10页)，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事和道德领域中最伟大的品质，他的仁

慈和英勇，他的灵魂的高贵”(粒肯:《爱因斯坦七十岁寿辰贺词》,《现代物理学理论》（ReviewsofModernPhysics），1949 年第 2 卷)而获得不朽。

按其所属民族、时代、信仰、职业、性格，刘宾雁属于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他一生对中国真相和尘世真理的探究及其达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偿付的人生代价所显示的英勇庄严，同样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属人类抵御虚无与荒诞，坚守希望和救赎的不朽典型。

爱因斯坦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Einstein:Philosopher-Scientist)，纽约 Tudor 公司出版，1949 年)他耗费了数倍于建立相对论的心血，试图完成宇宙统一引力场理论体系，重构全部物理学，从而一劳永逸地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这位科学天才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四十年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仍然只是一个杳渺的梦想。

刘宾雁以八十高龄客死异乡。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中国，自由始终没有降临，民主始终遥远，始终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释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归去的朕兆。中共当局对他的回国要求不予答复，他“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的夙愿被冷酷地拒绝了。

没有谁能穷尽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奥秘，没有谁能彻底洞悉并根本改变我们时代特有的复杂情势和特殊劫难。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单独预告并影响他亿兆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祸福。即便如此，严肃地思索并生死与之的人们，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领悟到绝对真理和终极启示，他们也信守了个体生命与永恒神明之间无论先验还是尘世的神圣契约，从而在人类显现其苦难而光荣的伟大历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在当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浮嚣茫然的世界，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战和威胁的时代，刘宾雁在自己祖国被蓄意遗忘，在异国他乡寂寞遁世之际，却获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复活，为自己和中国赢取了一次久违的特别赞誉：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棒，这么完美，这么壮丽。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刘宾雁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

就人民所广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实际是一次国丧。

——郑义（中国著名作家）

潘恩抗议专制与贫穷，正如宾雁反对专制与不公。像潘恩一样，宾雁对整个世界充满热情。托玛斯•潘恩这句话，是对刘宾雁恰如其分的写照：“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应该因为刘宾雁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Southerland，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这中间有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宾雁。现在他不在了。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虚空。没有人像刘宾雁那样了解中国。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国。

——林培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享誉国际的作家和记者的声音，一个不论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气和爱心从不妥协于迫害、威胁或利诱的声音，终于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的尊严和诚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民主原则和实践是要人人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人类共同财富——将继续在世界上回荡，响亮而清晰。

——伊尔利•格鲁沙（国际笔会主席）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国际笔会秘书长）

卡琳•克拉克（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

二

你！我即使失去自己的这只手，——

哪怕是两只手！我也一定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签署：使我心碎肠断的土地——

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祖国！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百科全书派的忠实盟友，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那超群绝伦的横溢才华，他那异常清晰、令人振奋的风格，捍卫了新的原则，表达了欧洲变革时代深受欢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亚、狄德罗这些后起的文学

和思想巨子，都以最华美的辞藻盛赞这位为人类建立自由与理性的王国作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觉、伟大、热情、有魅力，富于创造性、令人着迷……”但他们一致认为，伏尔泰之伟大既在于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于他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颠沛流离生涯中，达到了思想和人格浑然一体的光辉极限。而最为后世景仰的，是伏尔泰为《百科全书》辩护，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凯拉斯、西尔文、拉巴尔、蒙拜依、拉里等案件），因此享有“欧洲的良心”这一不朽的封号。

在此之前，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此前此后，卡斯特里奥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为塞维特斯辩护，左拉则挺身与法国总参谋部对抗，为德雷弗斯鸣冤。

茨威格认为伏尔泰和左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欧洲永远的骄傲，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和亲王们的庇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无论弥尔顿、伏尔泰、左拉还是卡斯特里奥，都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的不朽典范，但他们为之奋斗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高贵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同这些西方先驱一样，用笔为一个时代的正义而战斗，同时也用更艰难、充满更大风险的“东方风格”，为无计其数的老百姓鸣冤叫屈。刘宾雁的家，客厅，书房，办公室，曾经堆满数以万计的申抗诉材料，刘宾雁曾在他的斗室接待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上访者”，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写信，转寄材料，打电话，外出采访式开会时当面转告）为他们抗辩。在这些不幸的弱者和刘宾雁本人面前，则是比整个欧洲中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图路易十四时代远为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他两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贱民经历，后有永远不能解除的异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这类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外，一无所有。

刘宾雁 1979 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

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反对自由、拒绝民主的“共产反动派”，为时已晚地意识到，刘宾雁是他们权力王国中最难改造、不可归化的异端和叛逆。他并不是唐吉诃德在中国的再现，他身边没有任何桑丘式的随从，但不仅真相、正义和未来站在他这边，而且人民辨认出了，刘宾雁是他们真正的辩护士和代言人。“背后推动我前进的人们已宣示他们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因而我便有恃无恐了”。

刘宾雁因此成为“中国的良心”。

三

多么寂静！周围是多么空旷！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像大家一样，你也会消逝，我的朋友，可怜的朋友。

为什么心中大海又波涛翻滚？

——安德列•别雷

西方由荷马、奥维德、但丁领头，东方由屈原、苏东坡、顾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母题，成为世界通过苦难和孤独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彼此认识、彼此接近的特殊桥梁，成为人类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庄严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岛”。

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十八世纪历史风景的中心，开创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学的主流，并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海涅、拜伦、雨果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文学天才，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史诗的序幕。

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暴政和帝国，促成了俄国、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亡，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夫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侨民文学之后，俄国的大师和天才，几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刘宾雁在二十世纪末跻身世界性流亡文学的行列，在他身后是中国共产革命腥红而浓黑的历史，是改变了中国、苏联、欧洲和世界历史版图的“六•四运动”。

由于胡耀邦被废绌，在赵紫阳安排下，刘宾雁在“禁阻”多年后获准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出国。又由于“六•四运动”突然爆发，“中共反动派”取缔了他回国的权利，

从此，正式成为跨世纪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刘宾雁的八十人生，是现代中国命运神喻式的投射，像一个缩影，一次结晶，一线穿透乌云的闪电，使沉默的中国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复出现的历史退潮中，成为礁石和航标灯。把刘宾雁与西方和苏俄的精神巨人作简单比较，决不是对后者的辱没，——一道神圣使命垂降在他们共同的天空：使人类不朽，使自由永存。

伏尔泰先后开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专制君王，在伦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学》、《恺撒之死》、《哲学辞典》等巨量著述，并在 83 岁高龄时“神灵般”地荣归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岁月，带给雨果持续不已的创作灵感，仅仅一部“非人工所为”的《悲惨世界》、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般的评论专著《莎士比亚论》、一部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已经足以使这位文豪的光辉因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龄回到巴黎时，受到凯旋式的欢呼，足以使他留下让后世所有自由灵魂闻而永铭的名句：当我归来时，自由也将降临，足以让他享受二百万法国人组成的“东方式的豪华葬礼”，足以让他在先贤祠永远面对法语世界最堂皇的赞辞：伟大的人物——祖国的谢忱。

同样的十八年，在美国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镇俄罗斯式的乡间小屋（祖国的缩影，故乡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再现整个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史诗巨著《红轮》，成为“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后，激动不已，“这是俄罗斯的《圣经》，能够和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心灵对话的不朽作品”。索尔仁尼琴认为，《红轮》超过了《古拉格群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给了我进行工作的全部条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个俄罗斯作家像我这样生活过。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都向我开放（那里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我有责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真实画面，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创造出来了……”

1992 年，叶利钦总统访美，“代表俄国、人民和良心”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1994 年夏，索尔仁尼琴乘专门车厢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一万公里充满鲜花、眼泪、亲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末“归返祖国的伟大流亡者”。

四

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莫测、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入整个人类之树，他

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刘宾雁与这一切都似乎很遥远。

同样的十八年，祖国始终没有出现他日夜企望的“有利于人民的演变”，浩瀚的太平洋把他与祖国从地理空间和内心距离上永远地隔开了。由于他“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同样流亡到美国的一位“著名激进派评论家”公开指责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决定在纽约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声称与他划清界线。“六•四”流亡者之间的“内斗”使刘宾雁“深感不安”，致使他违背初衷，“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场，竟一如在专制之下！”

在刘宾雁去世后，他当年的一名追随者立即公开声称“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不仅指责他反西方、反自由，而且揭发他在国内的作品充满主观情绪和个人好恶，其实是仗恃共产党特权的产物。这名作者显然对刘宾雁积怨已深，他那些烂污手法，让了解刘宾雁的正直良善之士难以卒读。刘宾雁曾是这名犹大的恩师，遭人出卖、背叛，已数次在刘宾雁生活中出现。天上有知，他大概会以其特有的宽厚，轻轻一笑。

————————————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制政权都需要歌功颂德，奴隶时代的精神遗产就是阿谀奉承。除了对上帝和自然的感恩赞叹外，自由民主社会都容忍和鼓励独立判断。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重要精神性格，就是保护异端，把人的任何秉性，包括偏执、极端、绝对，批判和抗议的自由，以及最神圣、最隐秘、最高尚、最怪诞、最荒唐的倾向和爱好，上升和降低为常识。一切都可以质疑、否弃、表达。在热核武器和恐怖主义可能毁灭人类、航天器已飞向宇宙深处的今天，就连残存的专制主义者都不愿公然挑战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了。

从世界秩序的某种静态平衡看，极权国家追求自由的奋斗，绝不仅仅是享有西方社会人人不言自明且早已成为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现代文明，而是以自己的苦难和教训充实、丰富它们。而从现代世界史看，发生在苏俄、东欧和中国的悲剧，西方作为相关的一方，负有特殊的责任。，更直白地说，西方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普遍自

由、富裕与社会进步，与共产国家中坚持人道、宽容、批判，反抗专制、独裁，反对穷兵黩武和激进民族主义一类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的英勇奋斗，不可分割。

因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实现了自由，共产国家里向往自由的人们，只能把西方的价值和成就作为借鉴和榜样，但他们决不是简单地要使自己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同样神圣传大的本性。只有浅薄和别有所图的人，才在自由的国度里吹嘘自由。

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寓了十八年，享受着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却从不颂扬这个自由人类的福国。他承认“美国帮助欧洲和亚洲”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同时认为西方的“种种时髦理论”不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也决定不了俄国的前途。他在哈佛大学抨击美国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谴责西方的物质成就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称美国不能作为改造俄国的理想。他特别强调，“我们经受了精神上的历炼，这种历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宝贵得多。艰难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难以企及的。”

刘宾雁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在中国空间和精神上的彼岸，他“得到了天空、既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很少恭维西方。也许在他心里，如同保持着节约的美德一样（那是他那一代从贫穷和艰难中过来的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之一），他也不滥用自由。事实上，刘宾雁天然地保持着西方从苏格拉底以来的批判立场，对美国社会的危机，外交政策和世界战略不断发表批评和告诫。

不能说刘宾雁由此从“中国的良心”变成了“世界的良心”，至少可以说，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良心”。

刘宾雁虽然把自己早早放到中国沉重的历史天秤上，但他始终不是“政治中人”，他甚至没有明晰完整的意识形态。天真、单纯、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精神，足以支撑他面对混沌、龌龊、污秽不堪而扑朔迷离的中国政治旋涡。在任何意义上，惋惜或指责刘宾雁至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死还在“寻找共产党”，至死不愿否定革命云云，都是被功利和劣等政治俘获而与刘宾雁相距何以道里计的好事者们，在这位精神巨人身后，搅起的浮泛泡沫。

八十年流亡生涯里，刘宾雁“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 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为‘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刘宾雁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不是没有个人雄心，他也有自负和高傲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这个巨大无比的“存在”和“命运”，更能满足他天性中那种宏伟壮丽的史诗倾向。他那些藐视平白通俗的文字和话语背后，跳动着豪杰、哲学家、斗士和诗人的“英雄颂”和“欢乐颂”。

刘宾雁不是一个卖弄哲理和名言的人，但他那些发自内心、泥土般朴拙的表白，胜过无数豪言壮语：“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两千多年前，一个生命降在污秽的圈栏里，他一生被权势者耻笑、迫害，最终被钉上十字架。就在那个时刻，尘世的罪孽和苦难被担当了，一道大爱之光掠过天空。四百六十年前，马丁•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中战栗，不再求告圣亚拿，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面对雷鸣电闪，坦然地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刘宾雁“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于简单和浮浅了。”一名以中国、以人民为念的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早已抵御了创作不朽作品的诱惑，他就很难在自由而陌生的他乡异国重新开始文学性的创作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履行的责任，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局限、遗憾都被他带走了。像所有人一样，刘宾雁给这个世界，他的祖国、人民、家人和每一个记得住他的人，留下了只有他才能创造并且乐于与人们分享的遗产。

几乎成为一条铁则，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和先知，道德和精神王国中的杰出人物，都是伟大的叛逆者，历届宗教裁判所和劳改集中营里置身黑暗面向光明的异端。一切人间的现时恶运和精神酷刑都会首先降落在他们头上，都是他们献身人类苦难与希望的明证。悲剧之所以诞生并且永远催人泪下，就是因为他们在茫茫大荒和漫漫长夜中，自愿为没有墓碑的死者举行祭礼，不让暴君和恶人“太舒服了”；因为他们虽然忧端

无限，壮怀激烈，却随时准备俯就和抚慰每一个孤苦无告的灵魂，为每一个婴儿的啼哭欣喜莫名。

刘宾雁是中国又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先驱，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把“良心”像圣餐一样慷慨祭献的殉道者；他是我们这个洪水时代中的晃荡方舟上，一名不曾挪动脚步的水手；中国十字架上一只永远守望的历史候鸟，永远高翔于中国苦难与救赎天空的大雁。

刘宾雁“不是孔子的信徒”，对中国文化传统没有系统、精深的思考。中国圣贤气象和君子风骨，从来反对偶像崇拜和教条至上。孔子“述《六经》，犹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赞叹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遗风，明显钟注在刘宾雁一生中：“成仁取义”、“士志于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刘宾雁确实不是道德本体式的中国圣人，不是恪守道统的东方士大夫，他在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上，更接近俄罗斯十九世纪以来的精神贵族、殉道者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异端和理想主义者。

由于斯大林俄国和毛泽东中国对于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特殊影响，由于先后洞悉和体验了这两个暴力帝国的起源和影响，刘宾雁的精神和生命本身，具有特殊的世界性，并进入了人类共同书写的启示：生命是为更高的目的而出现的，人类不会因为仇恨和受苦、而是为了救赎和爱而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比俄国历史包袱更沉重、仇恨和暴力更可能演变为真正《启示录》式的浩劫的国家，刘宾雁的奋斗对于世界的意义，也许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完全被世界认识到。

——————————————

梅烈日科夫斯基写完《但丁传》时感叹说，基督教的希望只在“道成肉身”。他称《神曲》作者一生“非为静观，而以行动”，对世界具有“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通过静观内省把真理启示于大地，惟有但丁“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行动中把它显示出来了。”但丁以其伟大的“心跳”——和平、面包、自由——取代战争、饥饿和奴役，这是但丁以后世界的新的“三位一体”。七百年后，但丁的“心跳”被刘宾雁听到了。

让我们再次引述与刘宾雁在同一片自由天空下呼吸过同样洁净的自由空气的爱

因斯坦的名言，为他送行：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

后记

宾雁走后，一直没有回过神来。曾为他设下百日灵堂，来者无不焚香祭拜，我也常孤立于他遗像前，心中始终一片空茫。

写这些文字，重庆连续数日“红火大太阳”，成为全球气候恶化的一个显例，三峡工程祸贻当代、患及千秋的一个明证。

楼下巨大工地上，几十个民工头顶烈日，为他们离开后才会耸然而立、永远与他们无干的大楼挖掘地基。我在十一楼临窗而坐，像中学生一样引用俄罗斯的先哲和诗人，为宾雁送行。我相信他和他们在一起，我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他们用我所不懂的语言交谈。

很难把楼下的场景跟手中的稿纸连系起来，而那曾经是宾雁多年间的专长。诚如郑义先生言，即使没有那些文学成就，刘宾雁本人也是一个奇迹。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接下来的几句话，好像是专为刘宾雁和我们写的：“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决无为宾雁论定之意。铺排这么些宏句大词，本不宜用在他身上。写时又发现，宾雁其实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他自带一种大尺度，一派大气象，不尽是东方的，很接近俄国，源头极远，也很近。

几乎在写完最后一行的同时，窗外云雾纵横，一场豪雨垂天倾泻，酷暑倏忽消逝，天地顿成清凉世界，宣告又一个秋季来临。一袭天际线凌空巡行，晦盲幽昧间光影眩耀，其中可有他们目光、他的灵气？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代序与导言）

编者 2006 年 4 月 20 日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王康用了一周时间率心落笔写下了这篇近九万字的长文，全面评价当时“倒下整整一年”，被全社会迅速遗忘的中国苦难代言人刘宾雁。明知“其实没有人需要，更不可能发表”，他和几个朋友连续四个昼夜打字、校对、印刷，然后他带着文章一刻不停地冲出门去，搭乘十四日当天北上列车，赶往北京。漫天风沙中，当他敲响刘家门时，发现刘宾雁已人去楼空。那天是三月十六日（十五日？），他转身乘车急驰到机场，航班已雁没青天：在国内被剥夺发言权的刘宾雁冲破重重阻碍，赴美国讲学了。不知当年的犬儒之乡内，为刘宾雁送行的有几人。曾受刘宾雁邀请到“人民日报”工作却婉言坚辞的王康，送人未见。瀚海百丈冰，愁云万里凝，他穿过满城黄沙，相伴高天寒月，一路呕吐着返回，大病一场，还因此遭到北京某学者名人的冷嘲。刘宾雁此一去十七年，直至去岁年终抱病客死他乡。王康的这篇长文写就束之高阁，一放十八年，连刘宾雁本人也是十五年之后才读到。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努力“使纯粹的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他说：“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么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p.53）情况在中国刚好相反。刘宾雁一生的坎坷以及王康此文的命运乃是证明。“大迟”是王康此文收墨时落定的笔名，岁月沧桑中定眼望去，谶语一般。时置刘宾雁去世数月的清明之际，征得作者同意，文章一字不改登载于此，见证历史，怅惘千秋，飨于读者，但愿不太迟。

————————————————————————————

目录

代序

导言

一中国的发现—兼评《人妖之间》

二转向广场——兼评刘宾雁的当代史观

三新人道主义——兼评《第二种忠诚》的人道主义内涵
四“极左”阶级的公诉人
五尚未了结的公案：１９５７年
六新闻与自由——兼论刘宾雁的新闻观
七批判的权力和代价
后记

代序
作者：甘兰
谨以此献给作者
在我看来，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塑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ｏｘι：意思是“不”。
〔意大利〕奥林埃娜•法拉奇
1987 年 1 月 24 日，中国的执政党宣告同一位作家决裂。作家的名字叫刘宾雁。真理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到它引出了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简单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面对身边发生的不义，刘宾雁竟说了“不”!
在我们只会唯诺称是的几代人中，有多少神圣的生命被任意剥夺，劳改营吞噬了多少自由的人身，波尔布特式的大驱赶，又使多少无辜的人被下掉“户口”，葬身在中国农村的饥寒交迫之中。这些人血，这些人肉，不是什么哲学和理论，也不是什么路线，左、右倾问题，它仅仅是活生生的罪恶，不管以什么名义，都是罪大恶极。这罪恶与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固然有关，但直接制造罪恶的是人，是刘宾雁孤身奋战扭住不放的那一个个、一群群有名有姓的坏蛋，掌握了权力的杀人犯。
“不”——是一个否定判断，与“是”这一肯定判断形成对称的两极，这是人类思维的根本模式。思维过程的本质就是从“是”或“否”这两极中任选一极，进行判断、推理和形成概念。是人都会说“不”。人是从什么时候起会说不的呢？大约从娘胎里生下来十八个月之后。令人惊异的是，中国人居然演化为人类中的一个新变种，思维过程竟呈单极模式。反观自然，连动、植物都是具有完美对称性，可以断言我们根本违逆了宇宙意志。
这新品种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人，他对身边发生的罪恶和不义站出来作证了。他

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罪恶，把理论上学术上纠缠不清的问题还原为生命和杀害生命，把人民和它的“先锋队”还原成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这一声“不”，把地狱撕开了一条缝，这条缝就是刘宾雁同执政党的裂痕所在。

单极思维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也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不幸。当刘宾雁单枪匹马，十载寒署，用一百多万字字句句去紧叩地狱之门时，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知识精英们，正全力以赴同罪恶展开了教条上的诡辩。一个自诩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掩埋好同志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文化热。刘宾雁就是在热到顶点时倒下的。

刘宾雁倒下整整一年了，中国社会好象遗忘了他，歌舞升平恭喜发财。这绝不是夸大其辞，君不见老年迪斯科热，霹雳舞热，热烈的人们风风火火，狂涌向一个海南岛，据说那里能发洋财。要知道，刘宾雁为之请命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女生的弱者、小人物构成的人民。人们啊，你这样冷漠，是因为你们彻底丧失了说“不”的功能，由此你们也从文人雅士那里得到了一个封号——下里巴人。

面对刘宾雁的厄运，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的反应又怎样呢？同下里巴人毫无二致——拒绝反应。他们在“四个坚持”的高墙内勤劳勇敢地耕耘、创作、切磋、研讨、引进、寻根、出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寒碜刘宾雁：显出他的落伍，他是过时的西绪福斯，他写的东西人人都要看，他肯定是一个十足的大傻冒；用那些貌似稀奇实则陈旧的东方式人文成果，取悦外部世界，暗示当局自己与刘宾雁的区别。凡此种种，其状之可恶，尤胜于下里巴人。

一切从高级雅兴出发，玄谈理论和成果，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身法手段，绝无助于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人性命攸关的现实苦难。狡猾的狐狸什么时候战胜过狮子？不过是从单极思维派生出的聪明，不过是毫无责任心和正义感的暴露。一个民族聪明多了，智慧就少。对别人的厄运和灾难的冷漠，对不义和邪恶的姑息的视而不见，必将使自己成为“下一个”而身受其害。（其实，中国的下里巴人——人民倒是爱戴和关心刘宾雁的，他们不过被迫失去了讲坛和舞台，难以表达而已。刘宾雁被开除出党后，大量的信件、电报寄往他的寓所，无日无之，全是些素不相识的人向他表达一个心愿：我们敬爱你，我们支持你。）推而广之，唇亡齿寒的道理，正确到也适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厄运和灾难采取视而不见和逃避责任的态度，不但最终使自己身受其害，而且整个人类亦不得安宁。因为人

类注定了是一个整体。这种不幸的结果，不是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证明了吗？由于东西方的对峙，西方世界有多少巨额的美元被用在军费开支上，而不能用来解决失业、生态环境和发展新技术。

我们既然演化为人类的一个新变种，那么，人类一切既有的知识体系——对称思维的产物，对我们还是适用的吗？在一切确切的知识技穷的时候，中国是自化脓血，还是走向宗教？对一个五千多岁的老人的归宿，历史恐怕多半会判为前者。

中国人还能得救么？

王康 1988 年著述《刘宾雁与当代中国》打印稿孤本

刘宾雁贴近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却疏远了他。面对刘宾雁的厄运，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顶上了刘宾雁的位置。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他就像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头脑充满了活力，追求着发展和自由。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叫《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作者生于 1949 年，按中国的说法，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 1982 年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属于下农村当知青的那一代大学生。职业教师，在中国绝对只是个小人物，但其一颗硕大的脑袋和苏格拉底似的前额也是够得上绝对的。已婚，有一个长着同样绝对的大脑袋的儿子。

他初通英语，已有译著问世，二十岁前，就通读过了欧洲古典哲学，功力匪浅，精通西方现代哲学；喜画油画，技法中等，但对西方现代派绘画理论的熟知和研究，却令专业画家倾倒；至于国粹传统文化，他亦有相当造诣，尤工于新儒学；还会拉一点小提琴。用他中学（一所有名的学校）时班主任的话说：他是班主席，当时提倡德、智、体、音、美全面发展，除了不会唱歌以外，样样都是全班第一。考进大学后，未经校方许可，自己组织了文学社，领导过校内的“民主选举”运动，差一点做了魏京生的同道。

以他的才具，本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弄个青年什么家当当，取得知名度。可是他顺从了自己的良知，从自己和人民的苦难中，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问题。学术成就安息不了他痛苦的灵魂，况且，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真正的学术可言。他既然思考当代中国问题，良心使他不能回避“刘宾雁现象”，于是写出了《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它是从五千年历史因袭下来的，在当代又与西

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按我们中国人组班子写作的习惯，也是难以胜任的；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认识过程，驾御这种系统工程，简直难以想象。他必须具备通晓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独到的真知灼见，罕见的归纳、演绎能力，一句话，他必须与御用理论和一切伪理论不同，找到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主观上具备了这些条件，仍碰到信息阻塞、资料封闭、“尽皆机密”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和素材都消失在官方的掌握之中。英雄与英雄为伍，智慧与智慧相通。他就像刘宾雁一样，一扫考证遗风，杜绝学究恶习，直面人生，把握住当代中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注意了研究重大社会事件，在不到七天之内，废寝忘食，昼夜匪解，写下《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一文，从而完成了这一使命。

读了《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它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对于现实的沉思多于对历史的反思，对每个中国人至关重要的个体存在的方式和发展条件的关注，多于为人而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关注，从而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玄妙深奥。刘宾雁对中国当代社会天才般的发现，在他这里完成了推导过程和理性总结。他以独到的见解，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种种关系后面的精神本质，超越了唯物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率先完成了对刘宾雁的反现，堪称中国第一。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之后，为刘著书立说，哪怕只写了一页，也将永垂中国历史。

现实的黑暗没能蒙蔽他敏锐的眼睛，时髦的幻觉没能诱惑他的大脑，他天才般地洞悉到刘宾雁同执政党的裂痕，就是地狱的出口。中国值得庆幸。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他那观念部分高度发达的大脑，《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的思辨意味浓了些，理念的成份多了些，稍稍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中善恶是非的评断，削弱了道德的批判。

说到此，本该署上年月日了，突然想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会不会使作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还没有出名，死了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会降低安全系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世俗政权有权裁判个人纯精神方面的事务时，将导致人和人的互相仇恨和残杀，因为在消灭异己信条和思想的同时，必须消灭生命本身，这已为一部人类历史所证明，在中国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何世俗力量无权裁决个人纯精神方面的事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终于被文明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接受下来。拥有这种权力，唯有神，神在每个人心中，神与人的精神统一。然而，人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并未被当代中国人所记取，面对这颗不屈的灵魂，它将何以处之？中国人总不该忘记张志新之死吧，她不乏真诚，也具有罕见的勇气，但

她生就一个奴隶的灵魂，仅仅要求改换奴役方式，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被共产党割断喉管。请注意这两颗灵魂的区别，在异端裁判所的眼里，谁比谁更可怕？

唯物主义不承认良知与灵魂，它却是可以证明的。人的行为方式在一般意义上证明人的目的动机，在最高意义上却显现出良知与灵魂。灵魂的本质是人的精神，良知的内涵是人的真诚。当作者用他精神生命的冲动和内心的真诚，统一起自己的“知”和“行”，从十亿人中站出来迈向真理的时候，他就像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异端人物卡斯特利奥一样，是在用生命作代价。热爱真理胜于热爱生命，这是唯物主义者难以理喻的现象和不可企及的境界。

当然，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中国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少到不到半打，庸众哲学泛滥，均平主义横流，使我们的民族背上了没有悲剧、没有英雄、没有史诗的恶名。不要再像冷漠刘宾雁那样冷漠他了，难道我们民族只配五百年出一个邪恶的天才。在作者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问过他：“你想拯救谁？”他回答道：“我永远不对人失去信心。古今中外一切专制极权者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对人本身失去信心，你不要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要对人本身失去信心。”

人们啊，一定要认清我们所处的历史存在，大型画册上的八十老叟和在天安门上的头像，标志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君臣父子的时代，唯其如此，你们更要认清：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

1988 年 3 月 10 日

重庆

导言

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

〔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当代中国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正在走向什么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发现并阻止新的大规模的荒唐的灾难突然来临？离开中国现实去发展文学艺术、去实现个人终极目标可能吗？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将在多大程度上步入现代化？那将是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切，留给人们思索和选择的余地有多大？人们选择的内在力量和外在标准是什么？

无论如何，一切中国人从灵魂到肉身的一致性远未消失，我们又一次处于一个迅速变异的时代，共同选择（或不选择）的结果将肯定大大改变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然而，我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史诗中的幸运儿，我们只是几千年中外历史事变之一的角色——是最重要的事变之一，如果我们真正达成一次正确的选择。

一切真正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都有与其巨大规模相匹配的具有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的人物出现。近代如莱辛之于十八世纪德国民族精神的诞生，雨果之于法国大革命，海明威、雷马克之于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主义的崩溃，帕斯捷尔纳克之于俄国革命，索尔仁尼琴之于斯大林主义，鲁迅之于清末民初……。此等人物，不仅是他们所处时代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参予者，而且是记录者、仲裁者，他是“历史的必然律令为了使其祖国复兴起来所召唤来的活动家中的第一代的主要人物”，他们体现出了人类精神和道德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纵无那些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技和一般文化领域内留下历史印记的人物的显赫，他们却常常更能持久地有益地影响人类进程，他们身上体现的博爱、智慧、尊严、永远虔信等品质将越来越成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精神基础，成为一代代人和睦共存的基础，进入一切人的灵魂和语言，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在那些文明萎缩、道义泯灭，愚昧、专制占优势的地方，在伊朗、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柬埔寨等国，精神发展仍然处于非常恶劣的状态，世界历史的尺度在这些国家将大大放慢。

人们还不应当忽视，在纳粹德国、利比亚、霍梅尼原教旨主义狂热中的伊朗国、斯大林与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科学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综合效应（如海森堡所期望的那样，现代物理学的进步会带来普遍的政治开放），反而出现了相反的后果，现代文明并不具备先验的历史统一性。其中有极复杂的种族、传统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更有一种共同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被宣传为狭隘的或抽象的纯功利主义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被直接宣称为阶级、集团和某个个人的利益，现代化的真正革命性精髓——人自身的确认和解放，只在为数不多的国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独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超越于民族、国家意识之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罗素、卡尔•波普、索尔、贝委、索尔仁尼等），都对人类及其现代文明的分裂忧虑。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他们

不断发出的忠告和警诫，他们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强烈关注，他们对善恶是非的敏感和清晰的判断，他们强烈的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是这个时代中促使人类从隔阂、冲突走向理解、亲善，减小人类普遍苦难，推迟或永远取消最终大限的最有价值的思想财富。而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那些乌托邦大图式的设计师、神学大师、暴力煽动者以及阴谋家们，已不能为人类提供任何有益思想。

这是一个人类面对自身状态、问题、本质、命运的时代，不妨称之为“史前时代”的最后阶段。它也是一个极其困惑、充满危机、吉凶难卜的时代。这个亟需想象力、勇气，牺牲精神和宽容的时代，同时又是庸人哲学和享乐主义泛滥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呈现着精神衰颓的情势：理想主义、自由精神、严肃神圣化的人生态度成为讥嘲目标，道德均平主义、虚幻谵迷、相对主义和各种小市民哲学与现代物质形式相互渗透，在大幅度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性的素质。

无论如何，我们业已面临又一次严峻的选择。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面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最重要、最紧迫、又最复杂难办的情况；我们既然已经身受了那么多苦难、缴付了那样高昂的代价，拥有那么多远比《百年孤独》作者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感觉更为深刻浩茫的历史积淀，最重要的是十亿生灵所共同面对的巨大的历史之迷对我们的永恒的魅力，我们就必须在绝对的意义上思考和认识当代中国，使它拥有真正的成功和失败，出现真正的喜剧和悲剧，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所有中国人的天职；十亿中国人的命运得不到安顿，人类的大灵魂将永难安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年以来，那些与中国社会有着本质联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异和艰难困苦的探索中保持了心智健全和人性之美的人物，理应受到普遍的关注。

因为，历史反复表明，正是他们，在人类进步的旷野上高扬批判的旗帜，先驱于荆棘丛生之地；历史还每每表明，他们对旧世界、旧秩序的批判总是逃不出代价高昂的结局。一切历史的不公正总是最先加在他们身上；历史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他们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不义，反对邪恶，决不会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他们个人的悲剧本身就是旧时代消亡的明证，一个十字架吸引了千百万警醒者，而他们个人的不幸，必然要升华为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受和表达的，已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我们首先选择了刘宾雁。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一中国的发现）

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及其全部社会活动，不仅是文学领域中的“重大现象”（注 1），而且是当代中国历史和社会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大现象”，这种现象集中地透露了当代中国的若干本质特征；由于一九八七年元月所开展的引起中国和世界普遍关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它不仅与当代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有关，而且预示了纷繁芜杂的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危机和希望而变得日益重要。

一九四九年结束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既是传统中国自由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区域性结果。毫无疑问，这次革命空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带着自身的强大传统力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理论，加上强烈的工业化道路——民族振兴的民族情结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这对全世界和中国，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变。试图对它作任何研究，作任何哪怕是局部和期间性的分析，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如果不对这场巨大历史事变作出正确描述，它就极有可能走上危险的难于控制的境地。这一任务由谁来完成，以何种方式进行，这决不是一个先验哲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经验问题，它的答案在相当程度上必须由经历了它的主要过程并且始终保持了正确判断的中国人来作出。历史本身表明，从历史反思、历史文化、历史理论进行研究，不可能取代对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历史就是它自身，必须回到历史现实，离开它也就离开了真理。

但是中国当代问题的演化与对它进行概括的条件二者并不构成正常的比例关系，以至研究本身越益成为一个十分敏感、充满风险的问题。只是因为一连串反历史、反人性、也是反人民的事件（其顶峰是反右和文革）的发生，对当代中国本质特征进行概括，才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对当代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真正严肃的考察，出现在刘宾雁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人妖之间》上。

今天，人们都清楚的历史事实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付出巨大牺牲的一场革命最后演变成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症候，女皇乱政，宦官擅权，国政凋弊，革命初期纯洁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成功后的普遍热忱丧失殆尽，整个社会融奴隶制、封建法西斯制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道德价值空前崩坏，善恶是非长期颠倒，文学艺术和一切精神发展已无可能，民族生机已历史性地萎缩。这段历史，由于它不加节制地滥施暴力，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己的本质，已是任何力量也无法篡改或矫饰了。然而它的历史教益，它的恶性影响，却远远

没有得到揭示和防范。今天，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股并非起于清萍之末的空穴来风、这股尚未斩断截止的历史浊流，将吹向何方，流向何处？事实上，在一批几十年来对那大荒唐推波助澜、身受其益，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经济利益甚至私人关系上与林彪、“四人帮”有不解之缘的实力人物的控制下，中国人民求取新生与变革的努力困厄纷至。“四人帮”倒台的方式，一方面固然结束了丧尽人心的十年文革之乱，另一方面又以回避和掩盖十年文革得以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作为代价，换取了当时必须的安定局面。人们结束了荒唐，却保留了荒唐之源。这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在尔后的又一个十年当中，许多人开始感受到所付代价的惨重了。正是在那段形势极不明朗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精神、道德和政治智慧上遭到严重创伤而能以健全的理智和激情直面社会与人生的人还属罕见的非常时期，刘宾雁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保持了清醒的现实精神。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刘宾雁披露了他写《人妖之间》的过程和宗旨：“我离开了这个场地（指‘中国的官场’），我受不到它的感染，于是，当我一九七九年从大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对这一切就保持了新鲜感……，二十几年不动笔了，为什么偏偏由一个我这样的人去写一篇《人妖之间》呢？我要感谢那种新鲜感。……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告诉我的同胞，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回顾起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断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唤起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注意中国面临的某种危机，或者某潜在的危机”。

《人妖之间》的发表，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发现。刘宾雁凭借他那离开中国官场的新鲜感（五、六、七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神圣感觉!），首次揭示了中国社会三十年历史中一个最惊心动魄的缓慢演化成的事实：人民权力正处于历史性的异化之中。

《人妖之间》的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沆瀣一气，在几年当中，由一个前土匪姘头，煤建公司收款员成为黑龙江宾县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她的发迹史，其实异常简单，不过是凭本能（当然是一种社会产物）不教自会地用煤炭为武器，靠权力和权力的特殊功能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贪污犯。刘宾雁在她身上发现了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权势人物）身上的社会和人性特点，在她身上考察了

在黑龙江省一个县城中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它的后果。“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她，刘宾雁发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掩饰得很好的本质特征：“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又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事隔九年之后，刘宾雁关于“权力结构及其功能”的发现，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一九七九年刘宾雁虽然不是看到中国这一根本弊端的唯一的作家，却是唯一敢于公布这个发现的作家。这在当时，是需要远见卓识，也是需要勇气的。不止如此，刘宾雁把“王守信效应”放在更大的背景上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种权力交换，多年来不断发生在王守信和县委、县革委以及地区和省级的几十、上百名干部之间”。而在“翻阅一九七二年以来县委常委会议的记录”时，刘宾雁“感慨无量！那里讨论了一切问题——征兵、计划生育、刑事犯的量刑，播种计划……唯独很少讨论党本身的问题”。

这里，当时所有的读者都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再一般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钩沉猎奇地评价毛泽东个人的是非功过，究竟还有多大意义？越过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对共产党本身进行思考，究竟是否违背了人民的历史和意志？这样，刘宾雁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提出对“权力”的质疑，对无论是“四人帮”也好，毛泽东的晚年罪恶也好，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的质疑，这就势必破天荒地提出了必须重新审查一九四九年以来所有重大问题的要求。正如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一样，刘宾雁从权力着眼，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重新发现。关于权力的形成、集中、交换、异化的发现，是卢卡奇、葛朗希、马尔库塞、麦德维杰夫等东、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现存社会主义运动的制度的研究的中心问题。刘宾雁与众不同的贡献，表现在他把这种复杂抽象的历史概念“还原”到了中国历史的具体现实和真实人物身上。它已经由一个一般的、理念的、纯粹思辨

和经院哲学的概念“还原”为客观存在，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真实，它由一些现实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实践和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展开来艺术地揭示这个笼罩在所有中国人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迷。

正因为刘宾雁在《人妖之间》中，从当代中国内部演变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社会，它也就不仅是具体的、直接的、生动的、变化着的现实，而且是整体的、本质的和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卷幅。以“权力”为中心，刘宾雁作了一系列的探索，获得了特殊的解释权。

权力异化的前提，是人的关系的“大颠倒”。权力是社会自身发展的最高形态，刘宾雁称之为“大颠倒”，他写道：“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这种颠倒，决不是通常的历史偶然性和个别人物的沉浮或某个特殊时期的混乱，不是社会辩证发展的合符历史理性的常态，它是一种根本性的，一经形成就异常强固稳定的颠倒，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大颠倒后的宾县社会精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一个男性，支左人员杨政委，“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扬，但他披着一件黄大衣，倾刻之间就成了叱咤风云、左右宾县五十万人民命运的大人物”。他有枪，“枪弹可以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杨政委在宾县的权威也就大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女性，主人公王守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谁知道它唤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种情欲，沉睡多年的政治积极性忽然迸发出来了。……‘造反’以后，跟杨政委东奔西跑，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掌权的滋味——那么多人都听一个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实利又光荣！这比她当年的最高理想——给伪警官或地主当老婆，要尊贵多少倍呀！”

我们不必搬用佛洛伊德或荣格理论来解释杨政委和王守信两人参加社会奋斗的动物性或神秘主义基础，刘宾雁用十分简洁的笔法廓清了若干年来被理论界有毫无意弄得复杂万分的中国实情，这种简洁和直截了当，只能来自那种神圣的“新鲜感”。社会是那么触目，人们只要不乏真诚，稍有眼光，都不难发现问题的端倪。

刘宾雁所说的“大颠倒”，始于中国的执政党。权力垄断、权力异化只能从那里开始，这种颠倒又必然伴随着激烈血腥的斗争。它已不再只是党史上发生的不同派别和山头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整个社会在一段漫长的畸型发展的历史时期通过执政党内部的深刻变化开始的。刘宾雁在任何意义上也没有把杨政委、王守信的崛起看成他们个人仕途的发迹史，他写道：“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这同一个月，中

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志新同志在辽宁省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政机关的逮捕。一个进来了，一个出去了。田凤山（原县委书记，正派共产党人）倒下，杨政委崛起；张志新出党，王守信入党，这对于中国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吗？”（注 2）这是历史的大颠倒，它的逻辑结果就是权力的异化。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还是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最好的实例。不同的是，在中国，代替“绝对观念”、“上帝本质”、“劳动”等一般观念范畴的，是作为历史最高形态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它是一切异化现象的综合，它的异化一经完成，就必然反过来按照权力异化的本质规定和制约一切事物的发展，把权力及其结果所蕴蓄的全部异化了的功能和效应实施到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和每一环节上，权力异化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一切方面的全面垄断，否则它就一天也不能维持。

在《人妖之间》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权力异化在文革十年内的典型特征作了独具慧眼的剖析。

在宾县，权力异化广泛地“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物的交换”。以王守信为中心，县委书记、常委、黄棉袄的“军人”，组织部、管人事、财政、劳动的人、粮食局长、工商科长、财政科长、农业办主任……，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予了“把权力作为交易投入市场”的活动，在理论家、意识形态专家那里被严格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被经院式学术讨论弄得玄妙难解的异化现象，在刘宾雁笔下，竟如此简明，如此一目了然。那些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偏偏闭目不视中国现实社会比比皆是的异化现象，其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本人就是制造权力异化同时充分享受其好处的杨政委、王守信式的人物。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随处可以找到对“理论权威”不利的理论条款，而刘宾雁并无兴趣与那些离开意识形态无法过活的“理论家”作没完没了的“论争”，他比谁都清楚，“理论家”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构成一种力量，而权力异化才是真正值得花力气去研究的。

权力异化的垄断特性必然要求排斥一切异己。一位一九四五年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试图在宾县恢复应有的秩序，“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县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却寸步难行”。权力分配已经完成，王守信的大儿媳，一个前打字员，也可以与他分庭抗礼。权力异化在这个青年女性身上的效果十分显著：“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易使产生对自己的幻觉了。这个女人一旦有了这个大权，她便误以为自己有了这个权力所要求的

那个水平，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当之无愧了”。性格坚强的老干部在两年任职之后离开宾县时，“不能不承认：他终于无力改变宾县政治力量的对比”。排斥异己，形成权力异化的垄断局面，其结果往往是被排斥的异己不是在政治舞台上（有的在肉体上）消失，就是成为权力异化新的成分，而权力异化又必然造就自己的“时代英雄”。

权力异化的垄断特性总是由具体的历史内容和历史人物来体现的。体现了这一根本特性的人物本能地会充分运用垄断了的权力，把历史舞台弄得十分狭小，或者干脆就演独角戏。王守信利用手中的煤炭权，给宾县弄鱼、猪、水泥、化肥、拖拉机，为县内外领导干部解决子女升学、就业或回城问题。尽管时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不断寄出的控诉、检举信，“然而，王守信的良心却是平静的。她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公’呀，不然，历届县委书记为什么都赞不绝口呢！”由于权力异化所达到的普遍程度，由于它如此容易使中国人的“强烈的物质贪欲和权势欲搅和到一起，”当代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部权力异化史，历史主角很难在权力异化垄断局面之外去发现。

权力异化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已超出个人欲望和利益而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社会定式。它的集中形式就是文革中充满恐怖、无处不在的“全面专政”。

权力异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也必然是一种非先验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王守信身上，刘宾雁发现了这些权力崇拜狂的一个秘密：权力异化本来是零散的、偶然地发生在某个个人身上，与社会本身对立发展而来的；然而社会既然允许、甚至需要权力在相当范围内异化，它也就会提供相应的社会条件、理论、运动、文件，或者直接就是社会制度、国家机器和经济手段。所以，当王守信遭到抵抗（虽然是微弱的抵抗）、遇到挑战（尽管也是软弱的挑战），她就立即会本能地运用能运用的一切社会条件来作强有力的反击。办“学习班”，（最高指示），学张春桥、姚文元（政治局常委、无产阶级革命指挥部成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学小靳庄，搞“赛诗会”。刘宾雁揭示的这条秘密，是一个聪明的发现，社会在权力异化过程中会相应产生权力异化的方式、人物及其存在的所有条件。当权力异化成为社会主体时，权力人物也就自然成为主体，他们需要借助的社会意识、制度、也同时成为最高规范。刘宾雁并没有写出那个时期“全面专政”的血腥味，他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侧面，一个更可怕的侧面，在“赛诗会”上，污秽语言可以畅行，中伤诋毁不会受到惩罚。形式上绝对神圣、严肃的革命斗争，最终每每成为滑稽、丑陋、庸俗、低劣的人性的相互践踏和公开羞辱，

刘宾雁在王守信式的“全面专政”中留下了下面这段描写，堪称绝妙：“又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得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都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滑稽可笑，黑色幽默，令人捧腹，令人心酸。刘宾雁在这段描述后发现的是一个深刻得多的现实，他几乎是难以抑制地动感情地问道：“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而“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这一页历史，应该用哪种色彩来书写呢？”这种深刻纯正的忧患，这种大智大慧的诘问，没有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没有把个人生命整个抵上去的超越精神，没有发自内心的主体意识，是不可能发生的。

权力异化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刘宾雁称之为“时代病——软骨症”。权力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垄断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有外来的抵抗和挑战，也有自身发展规律中出现的阻碍、变形、补充、派生的各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同样需要理解，需要温和的批评，需要不付出根本代价的共存。在王守信案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那一届县委书记里竟有三个人，人家给他们的评语都是‘滑’和‘奸’”。他们都不乏眼光，有一定水平；他们和气，笑容可掬，倾听意见，广表同情；有的自己立身很正，一尘不染，但他们“缺乏的是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既使在“四人帮”倒台、王守信一案已经破获后，他们“软弱怯懦，依然如故”，刘宾雁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左盼右顾，心慈手软，“其实，根本原因显然在于：‘造反派’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权力异化要求所有与权力有缘的人物服从它的规律。因此，他们“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独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这就叫权力异化的宏观调节，权力异化的自我完善，权力异化的生机与活力。事实上，王守信与那些书记们在其全部政治实践中是难分彼此的。谁作政治寡头，谁作配角，仅仅取决于机缘和适应权力异化的心态和能力。刘宾雁在揭示他们的共同本质时，深入到人类天然的血缘关系——姻亲当中。历届县委书记中的一位特殊人物干脆把自己的女儿作为交换，与王守信结成亲家，而他本人是一位资历和水平都颇高的县委书记，是当地体面的上流人物。在媒妁本人告诫他王守信“年轻的时候可不怎么正道”，称这门婚事为“王八亲”时，他们“夫妇仍然携女

主动上门拜访王家”，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这事连其他几位同样滑头的县委书记都纳闷：这不大般配嘛。

从权力异化，权力交换的“铁的纪律”来看，这十分必要，是最明智的抉择。异化的权力需要组建阵线，还需要用最天然的关系把它世袭化。它需要达到历史与人性的完满统一！

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人民的权力从哪里开始异化呢？按照中国人的惯常做法，或者是追溯几千年封建史，或者是翻阅引证“经典著作”，或者是等候权力人物的有关决定，在一个自称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恰恰就不研究现实，恰恰就是回避和歪曲现实，这只能理解为，权力异化已经发展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对现实的任何考察都势必引起权力异化的危机。

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是对沉默的中国现实开始的，《人妖之间》带给人们的启发之一就在于，刘宾雁发现了，只有回到现实自身，才能“有所发现”。

简洁，永远是一种巨大的才能。刘宾雁一个圈子也不绕，对王守信案件，对权力异化，对中国问题的根源，他只有一个异常简明的回答：在你脚下！

人们耳熟能详的恩格斯那篇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称：“他（指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 3）读《人妖之间》，人们很容易产生同感，请看这段文字：“把王守信案件从宾县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上割离开来看，事情也真就似乎是如此（指人们凭常识和直觉，把王守信的犯罪活动归结到宾县县委领导头上，认为那是根子，是同谋，是王守信的保护层!），然而，如果把王守信及其犯罪活动还原到那个活的、有血有肉的肌体中去，接通原先的血管、经络，通观全体，情况大不一样了”。

刘宾雁在揭示中国最使人困惑的现实问题的原因时，靠着他二十多年与权力断绝一切关系为代价换来的“新鲜感”，深入地进到以权力异化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生活的腐败，得到两个发现：一、“社会风气的败坏，非法活动的逐渐合法化对于道德沦丧现象逐渐习以为常等等，这些现象本身首先掩护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动。”二、“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去观察和研究……‘关系’。……文化大革在人们之间织起的一层新的政治关系。……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

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像触了电，不灵了。”而比上述两条更深更重的原因是：“在哥们儿义气、感恩戴德、亲友情谊等等温情的纱幕之下，掩盖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边投之以桃，是依靠手中之权给以物质实惠或取得物质实惠的条件；那边报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实惠给以偿还。”刘宾雁关于权力集中、交换、异化及其原因的发现是观察、思考中国问题的一次出色的探索（在《人妖之间》后半部分，刘宾雁还有一个发现：权力异化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历史运动，它一开始就受到了警觉和反抗，与权力异化的代表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出现同时，产生了与之对立的新的社会力量、新人。这一发现比关于“权力异化”的发现更为重要，但在《人妖之间》中尚不可能充分展开，——历史本身尚未成熟，所以这一发现留待后面的有关部分去讨论）。中国文学、思想界将一次又一次地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中进行描述和研究，而刘宾雁本人的文学创造活动也因此确立了最稳固的基础，“刘宾雁风格”将长期独立在中国文学界，他本人已成为这个国家最真诚最坦率最深刻也最严厉的“无冕之王”。

刘宾雁并未陶醉或满足于对权力异化的揭露和批判。或许，这种发现不允许停留在一般的结论上，它要求发现者“全神贯注”地继续观察和思考。刘宾雁在《人妖之间》告诫中国人：“王守信贪污案”是被破获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又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个角落继续蛀蚀社会主义，继续腐蚀着党的肌体而又受不到惩罚吗？人们啊，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人妖之间》是刘宾雁“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二十余年之后，决定不再写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他此后在更为深广的范围内对当代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剖析前的一次“匆匆的扫描”。但是，尽管《人妖之间》获得了空前的成就，达到并突破了文学领域内“拨乱反正”的最高水平，但它的真正含义，至今未得到文学理论界的正视，这除了思想认识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差异之外，更主要是一“无言提倡”的结果，（注 4）然而这已不是刘宾雁本人感兴趣的事了。

——一经有了那个重大发现，他就决意继续走下去。作出那种发现和继续新的发现都需要一种“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的胆识，还需要一种健全的、不妥协的、奠定在理性基础上的批判精神。刘宾雁缺乏千百种中国文人的德性、能耐，而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却因此发展到十分健全、十分有力的水平。在当代中国，只有具

备坚韧强大的批判精神才能进入当代中国这座新旧混杂的“古堡”。

——————————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在 1987 年 1 月出版的《〈当代文艺探索〉未来十年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用‘重大’的字眼（来形容巴金和刘宾雁的作品）决不过分。……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鲁迅传统在当代中国的重放光芒，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他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人民的作品首先必须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

他呼吁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中出现的重大现象，应当给予充分地估计，不必屈服于良知以外的任何压力”。

2 在《人妖之间•大颠倒》一节最末一段里，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还要经过整整十个春秋，这个颠倒才能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近二十年后的 1987 年，刘宾雁本人被开除出党；另外一批肯定不同于杨政委、王守信而在精神上与张志新接近的共产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王若望、张显扬、于浩成、刘再复、刘心武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3 恩格斯：《致玛•哈克耐斯（1888 年 4 月初)》。

4 在《人妖之间•附记》中，刘宾雁提到：“《人妖之间》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超出作者意料。……从各个地区寄来的信件，使我看到《人妖之间》触及的问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使我懂得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同志和广大读者相反，认为《人妖之间》严重地干扰了他那里的大好形势，说是那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状况、领导班子和思想路线’都实现了‘根本的好转’。而这篇文章‘把王守信的产生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一大罪状。”对前者，刘宾雁“体验到，这也许是人间最难得的幸福中的一种，足以补偿一个人已经和将要为此付出的一切代价”后者，他“相信今天的读者不需要我作什么辩解了。”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二转向广场•兼论刘宾雁的当代史观）

我的历史观本身就是一段小小的历史；这主要是其他人的历史而不是我的自己的历史；因为一个研究者的毕生事业，就是要把他那一桶水添加到其他学者的无数桶水汇成的日益增涨的知识巨流中去。

〔英〕阿诺尔德•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历史能否回避？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患有一种历史恐惧症？中国近代 1898、1911、1945、1949 年以来，不断地、始终地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历史教训是什么？一个时代或若干个政权构成的历史段落的经验如何才能在民族生命和个人生命内部转化为生存和发展的智慧，而不是相反？某一个历史阶段由于诸多因素迅速而不合历史常态地运动而形成的社会形态，是否具备不容分析的历史豁免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改革，其最根本的历史动因何在？

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漫长过于沉重的概念，穷经致于皓首，不仅愚蠢迂阔，而且常常陷入历史泥潭成为“庐山中人”；但是毫无历史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不健全迹近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无知。

中国当代史与中国当代人的关系，已不是一般历史观念具备与否与现实生活、个人修养、眼光胸襟的微妙关系；直截了当说，它们是存在与本质、与命运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当代史（包括“今天”这种生长着的当代史）成为任务选择的第一前提的意义上，它就是中国人自身。

“开放”给人们的有力触动之一，是西方历史研究中令人惊异的新成就，欧美（包括日本）各国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对他们刚刚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历史是那样兴味盎然、专心致志，对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人的命运始终保持着那样挚着深厚的感情和异常清醒的判断。毫无疑问，出现在史学、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精神是这些国家平衡自身发展的重要武器。有谁不为夏伊勒和一大批西方学者、文学家那对纳粹极权主义真正彻底的否定所表现的历史理性和人道理想所震动呢？有谁不为汤因比、李凯尔特、科林伍德、克罗齐等史学大师那些虽然不免有穿凿附会之虞、主观臆断之嫌，却洋洋大观、警思妙语横生的“大部头”所撼动呢？又有谁不为波普、萨特这些我们的精神同代人对所有重大现实问题的独特分析所启发呢？对于中国人，如斯诺、索尔兹伯里、费正清、梁厚甫一类“中国通”融靴搔痒、隔岸观火式的专著、专文又有何真实性呢？

可以绝对武断地说，中国当代史尽管拥有无比丰富的对象，但它的研究尚未开始。不仅如此，中国人正在远离自己身处的历史，这导致了历史真空和反历史两种危机。

在中国当代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原始史料、资料、文件、数据、档案、笔记、书信继续尘封着 1949 年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研究所必须的社会和学术条件大都不具备，其中主要是自由研究、自由撰写并自由进行解释和自由提出理论这一条件。历史真空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专业”历史工作者会出来反驳“历史真空”论，他们会说，历史不是速记，不是新闻，不是纪实，更不是满足一部分人特殊需要的商品，它需要耐心、时间——五十年至一百年，还需要科学、客观、酝酿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们之中与政治权力接近的人物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研究只有一种性质：论证现存制度与其一切表现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一个目标：与上述合理性明显悖离的现象（如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偏离或者背叛了现存制度造成的，而在将来，这一切都会被美好的事件所取代，反历史理论及大量作品由是而生。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历史的一切文字作品由是都有反历史的倾向。

这种反历史趋向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方式的错误判断上。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式，几乎是严格按照卡尔•波普的“可证伪性”原理展开的。我们从 1957 年至 1976 年，总是从错误走向新的错误，前一个错误的解决方式，总是包含着新的错误的萌芽；遵循着“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规则发展。反历史者们恰恰不承认这种历史事实自身发展所显示出来的规则，拒不接受他们从错误走向错误而并非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做出正确选择，确认新的目标，排除矛盾，又走向新的问题，这种不断否定和扬弃的过程本身其实什么问题也不说明，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必然如此这般地开展着的；这个理论的启发性如同一切高级理论一样，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形态，才发生作用。由于本文并不打算专门讨论纯历史研究，这里只指出一点，波普的“证伪”理论原来产生于对科学知识增长过程的分析，把它运用到历史—社会领域中来时，就必须作出新的说明和必要的限定。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证伪”原理在历史—社会领域中运用，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旧错误走向新的错误，同样的错误，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形式可以看着是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不断出现的一个个特殊形式，整个进程最终朝着一个好的目标，呈现出优化循环的规则；另一种则是错误走向错误本身，旧错误不是消失和扬弃在新的错

误中，而是整个不变地进入新错误中，其结局是所有的错误形成一个最终的错误，这时文明衰落、社会解体的时候就到来了。另一个是在历史—社会领域内“证伪”原理必须抛弃科学知识领域的“客观”标准，在历史—社会领域，“客观”标准常常就是错误制造者制造的标准；但缺乏标准的“证伪”，也只能是上述标准。历史本身不断显示的标准，只能从历史的主体和目的——人本身去寻找。在当代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过程，它只能由历史事实自身、人民自身做出。

修昔底德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nonWar》)这部古希腊历史巨著中说：“我经历了战争，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理解事态的发展，同时为了了解其确切的原因，我也注意了当时事态的发展。”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尚未开始，还有一个它本身的原因。可以不予论证地得出结论，中国当代史的复杂、丰富、微妙、神秘，已把一切可能对之思考的大脑远远抛在后头，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史的有成就的研究肯定在下一个世纪以后才能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对自身所处历史的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像重视我们的生存一样重视我们的历史，否则，中断历史的一代人将被历史抛弃，最终被开除“史籍”。

这个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历史任务，是从按其职业论属于作家的刘宾雁开始的。这在中外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一切伟大的文学家都必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他们的伟大正是表现在发现和提出他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方面。

1986 年 11 月 21 日，刘宾雁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在概述当代中国问题前说了两句话：“历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巨变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人们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来”，在于“我们是个很健忘的民族，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引自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的讲话：《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1986 年 9 月 13 日)。刘宾雁的“历史”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的、虚幻的和臆造的历史。“历史”在刘宾雁这里就是当代史，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种历史因素，考虑到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和研究的艰巨性，我们认为刘宾雁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观察和思考中获得的成果是不可低估的。

直接现实性。这是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使用的独特的观察方法。因为，人民的历史经历首先是直接呈露的，历史的全部哲学抽象和艺术升华都来自直接经历的人，历史

就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兴衰，他们自身生命的载体。刘宾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细节语言，无一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现实社会。刘宾雁多次表达了一个观点，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历史事实本身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极少被真实地描述过，而这是任何作家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对这种现实进行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加工能使生活改观，他宁愿服膺生活本身的权威；真正的艺术，其创造活力，其激动人心的能够为人们分享的全部魅力，在当代中国除了现实，没有第二个来源。因此，他拒绝离开现实，尤其拒绝过靠编故事以欺人自娱的文人生活。他警诫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乐于挤进生硬的风险难测的现实环节，在那里去寻找激情和诗。

1986 年 9 月 15 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之后多少年，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在《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中他说：“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不是还在写吗？但是跟那些东西相比，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其内容之丰富、复杂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些已经被我们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作家遗忘了。”）重大社会事件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惊心触目的现实，是“实实在在、铁一般的、物质力的”。（同上）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偶然经验的集合，然而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来，所有这些统一（人类的统一性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地球，宗

教、思维方式、工具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往往都是颇为相似的）就在中国最高度地综合在一起了”（引自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中国人的术语称之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然而，这里有严格的含义：第一，刘宾雁的直接历史关心的重大历史事件显然主要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有必要把“政治事件”与“政治权力史”区分开来。政治事件，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较为捷近的角度；而“政治权力史”的内涵则完全不同。概而言之，“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错误地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列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其中应当包括《历史在这里沉思》及《文革十年史》。它们的出版，仅仅有社会学或出版学上的价值，从消极方面看，它们不但够不上正经严肃的史学著作，而且由于糊涂的历史观，对历史作了十分肤浅的解释和明显的粉饰）。这些书本绝大部分是类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中国汉代的《史记》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绝对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政治事件本身仍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但由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上，这种突出的历史形式本身便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又由于在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决定意义不允许研究者回避，由于当代史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观察分析、解决当前事件和未来事件所必备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把当代史“还原”到若干重大政治事件上去，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任务。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 1979 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下层的存在物。

1983 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这个任务，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揭示中国当代史的实况，试图完成一个个人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以此恢复历史原始朴素的直接样式，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让我们的心灵和情感在历史巡礼中得到净化和成熟，以益于中国人的今天和未来。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亿万人的生活、斗争，亿万人的悲剧却被一种与亿万人的命运并不相干的“上层”人物所代替，这不啻是双重悲剧！不啻是天大的笑话！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

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科技工作者金鑫拼死跟污泥浊水斗争；对《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中那些老实可欺的人，刘宾雁除了同情之外，总是把他们纯粹私人的特殊境遇和不幸与全部庞大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他的语调，他的眼神，明摆着是一个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惯静地方，免得扫别人兴和引起人家误会。”会引起谁的误会呢？引起什么误会呢？只有“回”到那个极端年代，只有从那个极端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才知道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没有对整个时代那种大颠倒、大荒诞、大倒退的铭心刻骨的体验，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如此细小的细节，足可以引起千百种回忆，引起真情的大爆发，你在其中能切切实实读出“命运”两个字。在必要的时候，刘宾雁甩脱文学作品切忌直说的无聊训诫，当整个时代都在一场大的迷误中迟迟难于醒悟时，对悲剧、对命运、对痛苦和荒诞有特别尖刻感觉的刘宾雁发出的“议论”，总是那么振聋发聩，催人深思：“一个直感，是好人不善于充分运用他们手里的权力或权利，而坏人，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则善于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行使权力和动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并且拉帮结伙，因而比好人‘能量’大……人非其位，甚至被颠倒了应有的位置，确是一种不幸，害人的人被放在清查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被害者反倒成了清查对象，二十余年靠整人上来的还占据要津，被整的人却至今得不到平反……就我所知，绝不是个别省里偶然发生的个别情况。”

正是由于把人民命运牢牢地放在文学创作的中心，刘宾雁才可能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一系列追踪，获得那么强烈的反响。

与刘宾雁不同，许多作家也在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创作题材，也在反映人民，却得到另外一种艺术效果和另一种历史结论。其中最典型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阿城的《三王》。两者在反映“下层”小人物命运时，尽管作了不同的处理，然而都是反历史的。《绿化树》的主人公作为“改造”对象，经过若干内在与外在的磨难，结果走向自己本质的反面。我们不会否定历史情形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和刘宾雁那种在最低贱人物的命运上反映巨大的历史悲剧的才华相比，只能归为对当代社会史全然无知上去。《三王》的作者，据称是深得西方文化精髓而又极其中国化的作品。普通中国

人只能在其中看到一些烟笼雾绕的外星人，读了几本佛教经书的人，则可以窥到玄妙机锋和曰空曰无的现代说唱（至于台湾人和西方人的观感又当别论。不同的结论只会来自不同的存在差异，以中国人为重的人是不会以“异族”之见为意的，何况，外边的美誉完全可能与对中国的小脚、束发和“乱搞男女关系”等“东方神秘主义”的惊叹出自一辙），学者高尔泰感叹说：“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核还是语义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为“社会学的”评论一辩》）

《绿化树》、《三王》也有对历史的解释，但前者至多是一个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后者不过是老庄、禅宗的现代解释(刘宾雁在《艰难的起飞•前言》中写道：“认识什么是我们的实际，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我们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同时生活中各种矛盾之多、之复杂，也超过了以往。因而，既使是一个思想没有被偏见的所俘虏、感觉和思维尚未迟钝、生活在激流之中而不是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的人，也未必能够经常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刘宾雁也许没有站在任何理论基础上（这可能正是他幸运的地方），但他是独立地从所有新旧陈词滥调的“理论”“还原”到历史真实，并且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和真实的描述，单是这两点，就使他拥有对历史的初步解释权。

我们完全知道关于中国人民命运的刘宾雁描写和解释会受到质问：难道中国人民的当代命运就是这种古维叶（乔治•巴龙•封•古维叶(GeorgesBaronVonCuvien，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试图用灾难学说说明人的命运）式的结论吗？中国当代史就是一团漆黑吗？这个问题在刘宾雁身上是那个典型党八股和权势狂的用语：阴暗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论述到刘宾雁的批判精神时专门讨论，这里只作简要说明。

当代中国人民的命运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历史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

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 1979 年发表《人妖之间》到 1986 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几年来的“改革”与“开放”显然是在既定的历史基础上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根据是彻底地、整体地、历史地从那个阶段的所有重要事件中，还是妥协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地去总结历史教训，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后的一切“改革”、“开放”进程。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可以看出人们对当代史的态度是多么缺乏诚意和科学求实精神。所谓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对某些人员和提法不同的意识形态作了处理和修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尤其是马克思称之为“生存形式、存在限定”的“经济范畴”、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形式，至今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在浓重的历史阴影中何其艰难！人们对当代史的研究和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不是缺乏认识，（1986 年 5 月 2 日，当时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时说，从 1957 年至 1978 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 20 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但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那段时期，农民年均现金收入 60 元，城市职工月均收入 60 元。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按照国际标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我们在总结了从 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这段历史后认识到，非拨乱

反正不可。）而是缺乏勇气，缺乏诚意。设想，如果相信中国人民能够从正面对待几十年的“停留”、“动乱”，相信历史的灾难和不幸本应随着产生它的历史原因一同消灭，尤其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历史审美的主体，他们有权参予对自己历史的清算，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反思与总结，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那就不会容忍几十年灾难和不幸的根源继续存在，至少，不会容忍对灾难和不幸的受害者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巴金老人垂暮之年，念念不忘“文化纪念馆”，希望以此来记住历史，防止悲剧重演。虽则是天真善良的愿望。却无人置理，由此可见一斑）。历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复杂的历史事实中，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成熟得最快。十月革命后，“血腥的尼古拉”在叶卡特琳堡被枪决后，高尔基在《一月九日》中写道：“一个浓黑的可怕的问题终于寻着了答案：虚构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毁坏了。最初，只有少数人才敢承认，这不容易，因为这等于使自己丧失了希望。但人民的神经是健全的，他们不希望一个虚妄的希望来作自己生活的支柱。”

事实上，彻底地进行清算和总结，总是有利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而不利于人民的对立面的。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历史中的灾难和不幸本身还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制造和产生灾难、不幸的社会条件则是难以忍受和理解的。回避历史，搪塞现实，只能造成更多的失望和不可挽回的普遍的不信任，一切要求变革的努力和愿望终将因此而落空。

需要强调的是，开展中国史的研究，其功利实用目的决不是主要的。我们并不认为，不研究历史就一定会重蹈覆辙。为了不重蹈覆辙才研究历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辙。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类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诚同情和尊重，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在历史的回音中，在无数消逝的生灵史中深切感受到普遍、永恒的人性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实现（包括异化），才能逐渐积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断力，也才能对现实采取一种正确而清醒的态度。对于在精神和情感上蒙受巨大创伤的整个民族，历史研究还应当尽量分清历史上的善恶是非，从而重建一个合符正义、合符理性的价值体系。如果说上面两个目的显得过于抽象而不易实现，那么，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答我们所处的历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们自身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个目的，刘宾雁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 年 11 月 7 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

“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宾雁对中国当代史的关注总是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出发的。他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较：“这个民族很奇怪，这个很优秀的民族，出现了那么多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但是这个民族很怪，与我们有几点相似的地方，一个是自负，它的权威思想很大。见个当官的就哈腰，这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认当官的。”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 1985 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确实值得忧虑。一个真正的文明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是能够面对当代、面对现实（戈尔巴乔夫终于打出了“历史不应有空白”的旗号）。尽管历史一再走入荆棘，但历史毕竟不会停顿下来。“历史真正惊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这句名言，刘宾雁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有着相同的理解，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国当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会突然全部醒来，这已经部分地在刘宾雁的作品和言论中出现，它的全面真实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了。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三新人道主义者•兼评《第二种忠诚》的人道主义内核）

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

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

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引言》

人道主义者常常是这样的人：在轻松平和的时代，他们是温和的评论者和克制的歌颂者；在暴力和不幸肆虐的岁月，他们是激烈的抗议者，是不幸与苦难的坚强朋友。

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是产生于深刻的历史悲剧中。有极恶，就有至善，人道主义者必然是在对邪恶与丑行的暴露中去礼赞善与美。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只能诞生在无数人命运攸关难测时“生死与之”的献身中。

刘宾雁走到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在对人的处境、命运和使命的思考和描述中，他发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集中地反映在下面两个问题上：对所有中国人触动最深、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一场伟大的牺牲重大的革命怎样在巨大成功之后走向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国人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承受了什么样的命运？

简要追溯人道主义发展史以及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人们了解刘宾雁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新高度是必要的。

广义而言，世界性现代化始于两个历史过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德国哲学的建立、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包括本世纪被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践踏后仍然深植于西方各国的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等）。它们提供了人类现代历史的精神基础：人的发现、人的复活、人的价值的肯定和人的幸福的“此岸性”，即相对峙于神权及其翻版——专制主义的人道主义。另一个历史过程，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到目前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和科学进步。

前者，固然需要继续做出对人性和人性的历史发展的更深刻、更正确的发现，需要倾注更强烈的关注，后者也必须对人性提出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复杂的要求。现代化最合人性的目的在于它的精神方面，人道内容应当是其中的核心部分。离开人道中心，科学技术将成为最难控制的灾祸，经济繁荣不过是高效率的奴役，哲学及艺术将充满谎言，堕落和退化将成为大趋势。

人们看不出哪种制度、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可以避开人道主义的审判。一部人类史，尤其是人类现代史，就是一部人道主义发展史。无论从生物进化史、自然史，还是社会发展史来看，都是如此。高尔基在未被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弄昏大脑之前对

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人类犯过许多错误，但他身上有一种胜过他的一切过错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深处永远起作用的人道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最臭名昭著、其本质最充分显现的地方，就是对人道主义的空前践踏。林彪，"四人帮"的历史倒车，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用绞灭人性来改变现代化。用人道主义来衡量"文化大革命"，才能得出真正有益的教训，一切不义和苦难才能得到公正的清算，正如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极权制度的审判一样。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本质上不可能出现纯正人道主义，由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还会不断出现反人道主义现象，所以，人道主义不仅是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是衡量和评判当代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尺度之一。

刘再复及一批理论家在与中国极左分子长期的"论争"中，充分地意识到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他在回顾"新时期"（1976－1986）文学的成就时指出：

"新时期文学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其意义不应低估。这种估计仍然要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人文环境。这就是说，不仅要考虑到人道主义的内容本身，而且要考虑到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的不幸的命运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艰难，从而理解作家在这方面的突破所具有的正义性和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离开历史具体性而笼统地否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意义，脱离实际的盲目超前，不可能对昨天做出科学的评价，也不可能对明天有正确的选择。"

人道主义将长期地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争论下去。（这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重文化观念形态，它对社会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要；第二、这种论争本身加深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但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有力，在中国还不只在于它的理想性质和道德魅力，而在于它的历史实践。

当代中国历史上，人道主义理论论争的命运充满了风险。从五六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七、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性"、王若水等对"异化"、"人道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间代价累累，步履维艰。而从人道主义的理论论争进到人道主义的历史实践，则需要更加杰出的智慧和崇高的道德境界。

刘宾雁作为一个新人道主义者，首先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把握和反省上。

1979 年《人妖之间》的发表，标志着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开始出现。《第二种忠诚》（以下简称“二忠”）则是这种新人道主义的高峰。

总的来说，刘宾雁的个人经历和与他同龄而又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人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反抗，渴望民主自由精神，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产生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直接接受俄国、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间接了解的西方自由思想。1944 年入党之前，他已经通过自学的俄语和日语，直接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阅读了中俄大量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那时他十九岁。（1986 年 9 月 2 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日本人投降后，他一直在京、津、沈、哈等北方大城市生活，直接领略到已近尾声的中国革命的深刻意义，同时也直接体察到它那已露端倪的后遗症。

他是以一种真正发自内心、自觉的主人感迎接新中国的。年轻、纯洁、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的深厚的文化素养促使他永不背弃少年时代的誓言：为一个自由、民主而富强的新中国奋斗。他不会背弃这个誓言，这种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和俄国的理想主义在他身上已成“气质”。

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访问，给了他“很大的触动”。1954 年，他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任翻译。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介绍的列宁关于报纸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 年，他随中国记协主席邓拓到华沙参加国际记者协会理事会。回国时途经莫斯科。这次出访是他后来写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构成了他后期文学活动的历史基础。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已在莫斯科和华沙传开。他恰逢其时，接触了苏联五十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具有独立精神的奥维奇金和各阶层人士，“打破了以往对苏联、对斯大林的迷信”。（在远离莫斯科的奥

维金的别墅里，刘宾雁整整一个星期沉溺在奥维奇金搜集的各种揭露斯大林独裁统治罪行的材料。其中有不少是来自苏联各地的申诉和“上访”材料。三十年后，刘宾雁自己也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类似信件和材料）

这一系列经验与他本人遭遇的结合，根本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1955 年，他被突然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停止记者工作。虽然事后查清，有人模仿他的笔迹写咒骂周恩来、胡耀邦的匿名信，但他的心情始终很压抑。这段时间，正是反右运动前夕，中国政治生活已开始走上一条危险道路。在《中国青年报》从事工业报道的刘宾雁，已“目睹工业管理上严重的浪费现象，干部思想保守，群众积极性未能发挥”。此后，他又对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实践了他的俄国教师提倡的“干预生活”的口号。（奥维奇金的其它主张还有：“写实际问题，写当前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非常紧密地联系生活，而且应该全神贯注地、深思熟虑地和满怀爱情地对待生活”、“不要去逃避矛盾的现象、混乱的看来搞不清的、乱七八糟的复杂的现象，应该有信心地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弄出底细，把矛盾的结解开”、“迎接矛盾迎接困难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作家职业的义务”、“假如生活永远是那样平静，一帆风顺，鸦雀无声，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写了”。显然，这些观点在刘宾雁的作品里，在他的人生实践中，是得到遵循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刘宾雁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和表达，要深刻、广阔得多。）

1957 年 4 月，刘宾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 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出指示，上海有家大纱厂工人罢工，应派人前往报道。刘宾雁立即赶到上海，写了《上海在沉思中》，“赞颂这种思想（敢于在共产党国家内报道工人罢工）的活跃”，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很需要一个当年象鲁迅那样敢于跟周扬同志争斗的人。（与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自四届文代会周扬本人对自己几十年作为作了反省后，刘宾雁也完全放弃了以前对周扬的看法，并对他晚年的彻悟深表赞赏。）更严重的是，他还批评上海市委在鸣放中“没有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反复无常，致使很多人不敢讲话”。这就开创了在报告文学（通讯、特写）中直接点名批评权势人物的先例，为此，刘宾雁付出了不低的代价。他很清楚：“因为点了原上海市某负责人的名，这一下可摸了老虎屁股，不少人总以为我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其实，主要是根据《上海在沉思中》这篇报道定性。”

以后，他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 年－1978 年间，十二年在农村劳动，三年在机

关“牛棚”中劳动，五年做报社资料管理工作。“当‘右派’的 22 年中， 继续思考中国问题，利用管理外文资料的机会研究苏联；林彪死后，恢复了解放后因厌恶教条主义而中断了的理论学习。”（引自《刘宾雁小传》，《钟山》85 年第 4 期）

1979 年 2 月，他的极右问题得到“改正”，便立即写出《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论文；同时，到上海进行 22 年来的第一次采访；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年底，为了保持与中国现实的密切联系，谢绝了“官场”邀请，任《人民日报》记者。八十年代出访美国、法国、西德，外部世界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

刘宾雁的上述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与巴金等不同，他是中国革命内部孕育出来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中国革命（尤其是后期，1949 年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他都经历过，而且是以主人翁和理想主义来参与的。与其他经历类似然而较为幸运的作家不同的是，他正当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年华，受到来自社会大挫折的打击，直接感受到历史激变产生的灾难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1979 年以后，他继续实践着自己的“为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誓言，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历史，他以失而复来的社会地位，以几十年沉重的人生负荷，一次又一次地投身于中国社会，在自己身上实践着人道主义的理想。

1986 年 11 月 21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刘宾雁对几十年生涯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对人们了解一个正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充满困惑和风险的人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我是到去年才真正悟通了一条道理，就是在 1957 年的夏天，我刘宾雁唯一可走的路，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右派。……我在这儿决不是故作惊人之谈。……假如我不是右派的话，我的下场将是什么。第一、假如我当时没有说什么错话，没有做什么错事，没有写什么文章，安安稳稳地过来了，那么，我就会是一个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中国的群众中国的人民距离越来越远的这样一个文化官员。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不是没有，而他们的命运我是不羡慕的。这是一条出路，因为 1957 年我的条件已经不错了，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是不错的，很可能走上这条路，我那年肚子也开始大起来。32 岁，是比较老的右派了。第二条路，就是我有了一些问题，但是还不够给我戴帽子，记在帐上，那么到了 1962 年空气一度松弛的时候，我会继续说话，继续写文章，那么，1962 年没有搞什么大运动，怎么样呢，就再记到帐上，然后

到了 1966 年，必然会新帐老帐一起算，我这条小命就没了，活不到现在。第三条出路呢，就是我会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狂热的拥护者，成为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会跟张春桥挂起勾来，因为我跟他还有一点交情，成为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那么现在我就跟姚文元一样住在秦城监狱，那就更惨了。大家想想看，还有没有另外的道路？没有。即使我是一个很勤恳的人，我还有几分才华，那么这 22 年我能写什么？我能写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不许说真话的年代，无论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作家，我能做什么？……在这 22 年间，我得到了很多东西，相比之下，我丧失的东西，由于刚才说的种种情况，相比之下，我得到的更多一些，其中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我离开了中国的官场。”

这也许不是一篇人道主义者的宣言，却是一篇充满人道主义气息的自白。

1979 年以后，从漫长的一代人以上的人民的巨大苦难中走出来的刘宾雁，从对无数偶然的、零星的、个别的各种形式的命运的观察、同情、怜悯和忧虑中，逐渐“悟”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最大的真实：在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人民的命运如何？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最本质的关系是什么？

从 1979 年发表《人妖之间》到 1986 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刘宾雁终于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人民是不会错的。这是刘宾雁的新人道主义基本结论。

诚然，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的人道主义者都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人为目的，人为尺度；也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如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东、西方作家、反独裁统治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都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也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感性或理性基础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代出发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民的命运；而刘宾雁人道主义仍有两点新的重要的内容：第一，它是在与已往所有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中（它宣称人的命运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往“理想王国”的大门业已打开，等等）重新展示人的命运，它有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内容；第二，更为重要的，刘宾雁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确立了“人民至上”的新的人道主义纲领。这两点中，前一点，使他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存在人的命运这个神话，后一点，使他的人道主义获得了历史的最真实的基础。

匈牙利卓越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契（CTcorgLUkacs，1885－1971），在《左拉诞生百年纪念》（1940 年）中对左拉的评价，对了解刘宾雁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有借鉴意义的。卢卡契在总结左拉一生的时候写道：

“因此，左拉的命运是十九世纪文学上的悲剧之一。左拉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才能和人格注定了他们要干最伟大的事情，但是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不能在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中完成他们的使命和明白他们的职责。”

这个悲剧性的矛盾在左拉毕生的工作中是很明显的，由于资本主义无法征服左拉这个人，这个矛盾就格外显得明显了。他光明正大地、百折不挠地、毫不妥协地沿着他的路一直走到底。青年时期，他曾经为新的文学艺术勇敢战斗过（他是马奈和印象主义者的拥护者），在比较成熟的年代，他在德莱孚斯事件中又扮演了反对教会和法国参谋部的阴谋的战士的角色。（德莱孚斯案，1894 年，发生于法国军方陷害犹太血统军官德莱孚斯冤案。左拉获得有关材料后即投入为德莱孚斯伸冤的斗争，发表一系列演讲、文章，1898 年 1 月发表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著名的公开信，招致反动势力迫害。1898 年 7 月被判一年徒刑和 3000 法郎罚款。左拉在宣判当天逃亡去英国，次年四月回国。）

“左拉为进步事业而作的坚决斗争，将比他的许多风行一时的小说活得更久，而且将使他在历史上与伏尔泰齐名。象左拉维护过德莱孚斯一样，伏尔泰也维护过凯拉斯。”

卢卡契最后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而奥地利进步作家斯•蒋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论及此事时，发有了更有价值的看法。他在论述距今三百多年前受加尔文迫害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人道议献身精神时写道：

“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伏尔泰抗议琼•凯拉斯案、左拉抗议德莱孚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重新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无论是左拉、伏尔泰还是卡斯特利奥，都是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他们为之奋斗，为之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巨大的正义性），而刘宾雁一方面用他的笔同他们一样为一个时代的正义战斗，同时也直接地为具体的不

幸和悲剧辩护。在这两方面，刘宾雁都是怀抱“人民至上”这个最高原则来处理一切问题的。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除了官方渠道外，鸣冤叫屈的另一个渠道就是人民日报社的刘宾雁。1979 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为成百上千桩冤案奔走，成千上万封“上访”材料、信件通过各种方式转到他手里，每天还有许多人辗转找到他。这决不只是一些个人不幸的各种怪事，而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苦难史。刘宾雁的许多报告文学题材都是直接从几万封申抗诉材料中获得的。他只能以他那支笔为无数蒙受了巨大不幸的中国老百姓呼吁。显然，刘宾雁的辩护，具有左拉、伏尔泰、卡斯特利奥一样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感，而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在刘宾雁本人的处境中，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个人牺牲，对于一个被迫中断二十二年写作的有责任感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并非易事。

刘宾雁的“人民至上”观念不限于对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蒙受不幸和苦难的，这就要求他从一般的、笼统的同情转向深刻的历史分析。不“把被掩盖着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觉察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即本质揭示出来”对人民命运的同情就失去了现时意义，“对于人民和对于社会有坚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的，……从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描绘我们的现实，既不会使人高枕无忧、陶然入睡，也不会使人惊慌，沮丧，反而会使他们振奋、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气投身于现实的改造。”（米圭尔•塞维特斯，西班牙人，受加尔义迫害，被斥为“异端”，判火刑。）

之所以称刘宾雁是人道主义者，确认他对当代中国人道主义关注的价值，就在于他始终是以人为对象为中心来研究和描绘、判断一切的，在于在传统人道主义者那里作为永恒和抽象概念存在的人性，在刘宾雁这里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以人民加以取代。

从这种新人道主义出发，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人作了两大方面的深入分析。一方面是中国人人性历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是新的人民性开始出现在中国人身上，这两者都是辩证地通过历史自身发展逐步实现的。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主要通过刘宾雁的若干言论来讨论他关于中国人人性历史性退化的种种忧虑，通过《第二种忠诚》及其续篇《未完成的埋葬》（以下简称《二忠》和《未》）来讨论新的人民性的历史性意义。

从道德、理想、政治素质、个性、经济、身体等几乎人性的一切主要方面，刘宾

雁发表过一系列看法，它们大致可分为个人内在素质、内心生活与社会生活、社会素质两大方面。

前一类，刘宾雁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心情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疑、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用幻想代替现实，尤其是刘宾雁称之为“精神平均主义”的庸众哲学，“咱们这个国民性就不承认优秀的杰出的、天才人物……”，（引自《艰难的起飞、序言》）“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引自 1986 年 11 月 7 日在上海《改革中社会中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这难道是一个小问题吗？”（引自 1986 年 11 月 21 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话）

人的主观意志，个人选择与国家之间的经典理论上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人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不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而永远是一个现实问题。

《二忠》对“雷锋精神”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其全部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丝钉”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在雷锋这个被誉为“伟大的普通一兵”身上感受到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目的这些基本范畴的存在。当人成为另一个存在（无论是上帝、皇帝、还是领袖、伟人）的无数前提之一，成为实现那个存在的意志的手段时，那只能称之为“异华”。一种异华的甘心做“工具”的人格，被抬高到几亿人模仿的偶像高度时，一切伦理道德就无从说起了。这种虚伪至极的道德偶像一旦成为数亿人民的遵奉楷模，人的任何神圣尊严就不复存在了。

《二忠》主人公具有与雷锋一样的遭遇，拥有比雷锋更“公而忘私”的品质，但他在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人的自觉意识、主体精神、人是目的这一点上，与雷锋有本质的差异：

“……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弱点，……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指

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必须句句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已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就准备去照办了。……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出来帮助你们纠正呢？都像雷锋那样，连想都不敢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呢？”

雷锋作为一种伦理人格标准，在理论是荒谬的，在政治实践中则是危险的。刘宾雁在谈到这个人物时，坚持了人是目的这个人道主义原则。他指示：“为了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需要工具，雷锋就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极其有用的典型。”（引自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会上的讲话）

在雷锋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工具或成为工具的工具。这种道德模式有两种荒唐。首先，它是毛泽东个人意志万能和权力至上的一个粗糙的幻影，它所宣扬的一整套人生哲学和社会斗争方式，都是以把自己变为手段为前提才能实现的，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它的任何论理性性质；其次，如果一定要把它作一种社会伦理形态，并且尽量去肯定雷锋个人身上的那些品质，那么至多它不过是这样一种伦理：几千年小生产私有者和精神文化奴仆对世界现代工业文明绝对无知而又疯狂仇恨的一个虚幻的意识。

离开了社会进步，离开发经济发展，离开现代文明大潮，一切道德说教，不论由多么有力的人物和力量加以倡导，都是不可能持久，至多成为研究一个特定时代反常人格模型的材料，绝无可能在人类正常的道德、伦理和精神发展上留下什么痕迹。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不平坦的，人道主义者的命运同样如此，这才使得中国人对人道主义怀抱着十分特殊的感情，人道主义和它的高扬者将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人解除不幸，争取进步的奋斗中，人道主义者将是最英勇最坚定的先锋，这是我们相信的。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四极“左”阶级的公诉人）

——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它的核心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冷酷，对人的蔑视，对人的猜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简单地说，就是不把人当成人。

——刘宾雁《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

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是“极左”力量问题。它长期困扰着中国人

民的任何历史进步，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成为当代中国占优势的力量，是一种十分特殊，十分复杂，因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极左”力量在当代中国的强大存在，固然是多种历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自身的异常罕见的历史禀性却是任何其它历史－社会因素都不具备的。

至今为止，没有一种力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此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又如此反常地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极左”力量仍然渗透和盘距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毫无疑问，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同时，“极左”力量的丧钟已经敲响，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人的自由的每一次扩大，都不利于它们的存在，两者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人曾经在几次与“极左”力量的较量中失败，又有几次错过了战而胜之的机会。本世纪末中国人的一项共同任务，就是彻底击溃“极左”力量，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的重要的历史任务。这样，我们民族的生机才有可能重新焕发，人们心灵上浓厚的阴霾才有可能消散，中国社会中健康、积极、进步的力量才可能出现。

反对“极左”力量，将是一种异常艰难，充满风险的斗争，也是一种特殊的斗争，由于它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的特殊产物，因此，它的解决与它的出现一样，只能用一种中国人自己的特殊方式。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充满各种悖论，充满无数假象——包括“极左”力量倏然消失，中国由此太平的假象，因而也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斗争。总之，对于中国人，与“极左”力量进行对抗即使不是“最后的斗争”，也是一场神圣的斗争。

“极左”力量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它既显示为一条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路线，又是一种非常重要、隐蔽的经济分配制度；它既滥觞于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又与西方哲学、政治思潮有关；它既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最近一次大规模农民革命的现代继续，又是斯大林型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版。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诸如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偏执疯狂、残忍奸诈、拒绝演变、鄙视生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无忏悔之心、决无宽容之度等等，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丑恶。用刘宾雁的话说，“极左路线在中国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漠视，对人的摧残，对人的冷酷。”（引自刘宾雁在南开在的演讲。）“中国那条极左路线，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的轻视，对人的践踏，对人的侮辱和对人的猜疑，它把人不当人！”（引自刘宾雁在安庆“法制

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从人、人性、人的处境和命运出发去研究“极左”力量，在所有研究“极左”问题的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最基本的标准，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把对“极左”问题的批判与党内不同政治理论、历史上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区别开来；把极左问题的全部本质（包括经济和一切社会权益等）与单纯的思想认识，工作方法、风格区别开来；才能拨开重重迷雾，通过“极左”力量对人本身的进攻认识到它的实质，从而对一系列问题得到新的认识。

这也是刘宾雁对中国的一大发现。“极左”路线从备受恩宠、备享殊荣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花招，因为，对它的批判，指责它的一系列“过失”诸如坚持阶级斗争，坚持僵硬的意识形态，决不向任何异端和不同观点妥协，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原则上拚死守旧，不惜冒犯芸芸众生的正常愿望，念念不忘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特别是共产党与历史、人民发生矛盾（他们当然认为这本身就是“恶攻”）时，无条件地站在前者一边其结果常常使“极左”力量不仅更加顽固，而且更加成熟，更加现代化。

现在，刘宾雁把极左力量对人的否定公诸于众，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能够思维的中国人立即懂得了许多东西。第一，这个道貌序然、决不敞开风纪扣（在公开场合）的极左分子（他们的装束都是那样不近人情！）不过是人类历史反复出现过的宦竖、僧侣、巫师、刽子手、迫害狂一类人格严重分裂、人性泯灭的末流，他们的一切行为动机不过是这类人自私虚伪的低劣邪恶的生存需求。第二，既是一些人类的蛀虫和虎狼，所有的好意、诉求、恳请、论辩有何意义呢？第三、同样是人，极左分子借助什么力量、什么方式对人开展进攻呢？第四，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左力量是否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人性中的邪恶方面？

后两个问题，刘宾雁作出了他的回答。我们认为，这一回答与“极左”“不把人当人”这一回答，是目前对极左问题的最深刻的揭露。他说：“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

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这里，他的理论还不具有逻辑的完备和论述的严谨。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以这个纲领为基础去深入研究极左问题的起源、形式、影响，去完成一部“中国当代‘极左’问题”方面的专著。

下面，我们试着从这篇文献提出的几个概念来初步地分析一下极左问题的几个重方面。

中国历史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无论具体社会形态如何，它的基本方面总是能够保留下来。我们常常只有历史，没有时代，只有“一个”，没有“个别”。“一”是全部历史的最高概念。当代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确实与传统社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在文化深层结构，在意识的历史承袭方面，传统中国仍然具有不可置疑的影响。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一般性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而是传统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系的。

研究亚细亚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学者（包括马克思、思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型学者李亚农、王亚南等）对“东方”和“西方”的专制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都有大体一致的结论，只是在所有制形式和国家制度等方面（也是极重要的方面）有分歧。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加以系统区别的学者。在《政治学》中他作了如下说明：

“还有一种君主政体，它在各野蛮民族国家中常常可以看到，并与专制制度极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野蛮民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并不反对专制政府。这样的蛮族王制具有潜政专制制度的性质，因为它的臣民生来就是奴隶，而且它的王族也没有被推翻的危险，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和合法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这里有分析东方“亚细亚”社会的很重要的思想，专政君主既然把臣民视为生来的奴隶，也就合法而世袭地占有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全部自由和能力。中国古代君

主称臣民为“子民”，这显然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奴隶主与奴隶的概念。中国古代专制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还有血缘宗族的更深关系，实际上是人间最高权威——父亲和子女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要否认欧洲型的私有制，东方不存在真正私有制或者不存在合法私有制，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与其它古代东方国家（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形成自己独特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原因，是辽阔的疆域。专制制度是幅员广大的帝国唯一适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鸠曾经在借亚洲专制政府形式攻击他担心出现的法国专制制度时写道：

“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由于要把这些决定送到遥远地区而耽误的时间。必须造成一种畏惧，以使遥远的总督和官吏不致玩忽职守；法律必须由单独人个人做出决定，并必须随着国家之愈来愈扩大而不断增加的偶然事件经常变更。”

还有其他自然（如气候使中国人变得羸弱等等）原因，使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一直保持着一种家族奴隶的专制，既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私有制，又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公有制。这种专制制度第一次完备地体现在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封建——奴隶专制中。这种专制，遗害最烈的，是从民族内部培植、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都只有一个最高目的，即维护大帝国的一统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维护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君主利益、君主意志、君主权威是整个社会的唯一价值和最后标准，政治上成于“统一”，思想上定于“一尊”，这在中国专制君主的始祖——秦始皇和中国古代最“聪明深察”而又最无耻的思想家李斯身上得到完善的体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称始皇帝，发布了臭名昭著的二制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的“万世一系”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建立的君主绝对主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形态。李斯的“焚书奏议”则是东方式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最露骨最邪恶的表现：“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义为名，异趣以为高，章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兴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宋〕元枢：《通鉴纪事本末•秦始皇本纪》）。从此，“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极端的统治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这里的“儒”，实际上就是有条件接受君主统治和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人。在东方，运用专制力量

镇压不同思想，主要来自商鞅、李斯、慎道、申不害等“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奉行的“国家至上”（实际是君主至上）和严刑峻法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现存制度和镇压反对派。由此决定了他们必然实行权力崇拜、偶像崇拜，也必然会从根本上否定人和人性。同时，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又必然要求一切社会努力和思潮按一种规定的方式进行。明代的大异端李贽说：“专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启之，孔子教之。”就其极端性而论，法家是中国古代王权绝对专制社会最基本最典型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在论及东方专制社会时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形态》)极左问题的思想根源完全可以越过两千年历史在秦始皇、李斯身上找到根据。

作为一条政治路线，极左问题与西方近代政治演变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

在西方，一种政治倾向政治派别的“左”，是与政治上的对立面——“右”，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和初期工业发展的产物。“左”和“右”作为政治类别的派别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在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顽固的保皇党人，这样就形成了左和右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一表达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人们并不以此来表示议会自由和保守的君主制独裁主义对立。随着独裁主义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左和右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说明人们对社会演变和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同态度。直至今天，这两个词在一般的语言习惯中仍保持着这种含义；人们同时还以此来划分从维持昨天的原状直至乌托邦式激进主义之间各种不同的政治音阶。”([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导言》)

“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内部正统教义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这种对宗教教义有不同解释的“异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基督教神学为了维护日益萎缩的权威，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塞维斯特、卡斯特利奥等著名“异端”进行的审判和迫害，开创了欧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对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使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型社会革命大多充满强列的对立和冲突。但是，直到 1905 年列宁把俄国波格丹诺夫集团称为“左派”时止，欧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种广义的模糊的政治分类标准。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嘲弄托洛

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时，才赋予“左”以狭义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此，尽管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发展过程中，“左”与“右”的确切含义混乱交叉、派别林立，但是，从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以及政治态度、政治方式出发， 可以对“左”、“右”作这样的概括：凡是绝对相信人类某一部分人理应且能够拯救全人类，不惜采用任何方式为之奋斗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许任何动摇，主张为其信仰随时可以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绝对拒绝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协的，是其极左派；谨慎地看待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全部历史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容，在革命目标和具体方法发生冲突时，不会无条件地为目标而滥用手段，是这个事业中的“右”派，其中因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失误最后与之决裂，并批判这个运动的，是极右派。

“极左”问题固然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经济制度、政治理论以及中国革命有各种联系，但它的形成过程却自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极左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几乎涉及全部当代史上的一切方面，对它进行历史的、科学的、严肃的彻底批判，应当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所有希望中国进步、所有希望根本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共同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一场真正的改革不能回避的最大历史难题。

对“极左”问题的研究，首先要在弄清它的本质的基础上弄清它的概念。

刘宾雁提出“极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否定。人们只要从人出发，就可以廓清一些基本概念的错误。”

按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的基础永远是经济关系，是物质关系。“极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统治了中国，它的本质，最重要的方面也必然是那个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最重要的本质决定了“极左”的若干其它特征。

人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称谓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它们揭示了极左的某一方面，却忽略或掩盖了它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因而，“极左思潮”、“极左思想”、“极左路线”、“极左现象”、“极左意识”、“极左倾向”、“极左态度”，都是对极左的虚假或走样的表达。它们的共同偏差，都是把“反映”当作“本质”，用意识形态代替经济基础。(刘宾雁 1986 年 11 月 21 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中说:“就在我被打成右派之前(1957 年）的一次党的小组会上，我还提出怀疑，我说到底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我现在搞糊涂了。”）

这个经济基础有些什么特征呢？概而言之，它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和苏联斯大林模式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的工业经济的结合。这种经济，其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面不断萎缩）是工业化这个目的手段和工具。而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也服从于另一个更重大的历史目标：对内扩大和坚持阶段斗争，对外消灭西方国家，称霸世界。这个目标一经被宣传成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必由之路，它就自然派生出两种历史结论，或者两个历史要求：经济范畴内的小农经济由于服务于一个代表历史进程的更宏大的经济目标，因而先验地高于绵延几千年的同样的小农经济；而作为经济目标的工业化则体现了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内的真理，即比西方工业文明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这个基础一旦在事实上依靠国家力量强制推行（1954 年农村中的合作化运动，1956 年全国城市生产资料改造运动），就需要得到解释，更需要得到证明（而且需要不断的、永远地解释和证明）。

没有谁会反对真正的公有制，没有谁会反对国家对经济工作的介入，没有谁会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同样，没有谁会在当时对 1957 年前的经济模式表示完全不同的意见。但是，那个几十年后被证明是一种历史错误的经济模式，它还需要一个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来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做出解释和证明。这种错误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当代中国极左问题的基本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由于经济结构的斯大林模式和小农经济形态的结合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否定中国传统社会为目标，所以作为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然给自己提出两个相应的任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

这是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问题的鲜明的时代、阶级、“意识形态”民族特征。刘宾雁尖锐地指出：“三十年来所以发生这种历史的逆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战略上我们犯了几个错误，或者说我们迷醉于几个幻想：一个社会主义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它只要建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缺点；第二点，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永远不会犯错误；第三个，马列主义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印在书上的东西，永远是真理；第四个，特别重要的，我认为是这第四个，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一根血管、一根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凡是那几百年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予以承认，我们更不能接受。”（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对此有十分相同的论述，他在 1986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同济大

学讲话时，称这种意识形态为“狭隘性”。“虽然我们平常说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但在实际说法里认为只有马克思以来，人类才真正认识真理。或者说更窄，把马克思抛掉，只有在解放以来，我们所有事情才是做得真正好的事情，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把所有提到的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以及现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发展的东西都加以否定。”另，文化大革命中，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那句“千古传颂的话”：“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才出现这样一位天才”，以及现在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大门的墙壁上的巨幅横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同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讨论极左问题的历史实质了。1956 年建立起来的称为“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其历史实质究竟是什么？人们知道，马克思指称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核心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此作为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依据。但里，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对工人的剥削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的原因。马克思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本属于资产阶段思想范畴的人道主义，他曾经明确指出，他并不偏爱无产阶段。马克思使用的是一个属人的标准——但不是精神、道德范畴内的标准，而是人的自然能力对象化为物质方面的历史标准即生产标准，来描述并否定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也即中学生都背得很熟的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论断。第二，所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一个历史概念，正如古代希腊、罗马和亚洲古代社会中，奴隶制、封建制等不同社会形态中，在人们的生产关系里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各异一样，在马克思时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一目了然，资产阶段经济学家也不否认。马克思不可能对这种占有方式的各种形态做出全部预测，但是，他提出的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分析和预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历史不合理的基本理论，却有一个较为正确而深刻的思想。那么，中国 1956 到 1976 年建立的经济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彼岸呢？稍懂世界经济史和政治史的人们都不会天真地把经济制度按照意识形态或国家政治制度来做简单的划分。人们对中国那一时期的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可以而且只有两条原则：一条是坚持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检验经济制度的最后标准。在可以进行各种分析（包括数量分析），比较（与相同或相对的国家或社会）的范围内，先进的经济制度与落后的经济制度之间，总是可以做出清楚的判断。一条是对经济制度作深入的具体研究。其中应

当包括：整个国家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分配关系中，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的人是如何参加全部经济活动的。制定计划、支配生产、进行分配是由哪些人担当的？国内经济理论界已有人著文探讨了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并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生产者在全部生产活动中从未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国家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蜕变为少数政治、行政官员的“集团”支配制。经济活动的停滞、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不断证明，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私有制。应当承认，这种通过政治权力支配生产资料的特殊私有制，在道德上似乎比生产资料直接占有的私有制优越。占有者本人不必拥有生产资料，不必像资本家那样赤裸裸地展示着私人占有的种种私欲；(就是这个问题，也有再讨论的必要。这种间接支配制必然向直接占有制发展或过渡。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索贿，循私舞弊等等“不正之风”与资本家的贪婪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还应进一步探讨一下，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私人经济，即使是亿万富翁，稍有不慎，也会在一夜之间破产，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深深地卷入经济活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中的一部份。而间接支配者免除了一切私人占有者的问题，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没有？可以预期，由间接占有制向直接占有本属全体劳动的财富过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却合法（叫合符政策）地享受着经济生产所能提供的最优质的服务。这还不是他们作为特殊私有制代表的根本特征。其根本特征仍然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注脚：生产力标准。可以假设他们全部廉洁奉公，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但是由他们支配（也叫“领导”、“管理”）下的整个经济经过二十年后竟然“发展”到崩溃的边缘，这个经济历史事实所能证明的，除了一种特殊的私人所有制在二十年历史中的实践后证明自己的无能和不合法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刘宾雁问道:“试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主义?如果说那一个真的（指 1953－1976），那么 1979－1986 年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如今天这个是真的，那么那个就恐怕不太真，至少，或者说它是假的。假如那个是真的，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这个就成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上的问题。”显然，刘宾雁所提的真假社会主义，决不是一个概念问题[方励之教授也曾就“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和多种解释，他列举了瑞典等北欧国家和奥地利，分析了历史上社会主义不同流派（如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差异和发展方向]，而是涉及到在我国具体存在的社会主义（它的核心是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关系）的重

要变化以及对现实改革的关系问题。

既然极左问题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的核心是具体的人们结成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极左”问题，实质上就是构成这些所有制关系的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反映。因此，“极左”问题不能再解释为某种谁也不具体处于特定经济关系、谁也不负任何具体责任、谁也不能监督与审计的黑格尔式的“理念”，再也不能解释为一首由一些天真的、好心的、赤诚纯洁、喜欢一点极端的、头脑僵化的，自身也是受害者的“同志们”一时心血来潮演出的即兴曲。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全部当代不幸的总根源，它渗透进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它直接表现为压倒一切的物质形式。

历史上由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由于由此派生的不同的政治观和人生观，而出现了不同的阶段、集团、政党。这个理论启发我们把极左问题提高到人与人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考察，把长期谦虚地隐匿在“极左”问题背后的人们称为“阶级”，大概是比较公允的吧。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级。它的经济占有方式比较特殊，它的政治态度异常鲜明，它还具有其它若干特征，都是不容易归类的。

刘宾雁在他第二次被开除前的最后一篇报告文学《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国人分为两类，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在黑龙江大学演讲时他也提到这种分类：“我……领悟到一个真理，就是有点良心的，讲点科学的，有点人道主义感情的人，一贯地不吃香；没有良心，搞虚夸，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时又非常善于搞虚夸的，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一贯地吃香。”

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已经很近似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极左阶级了。

刘宾雁对两类人的划分可能不太精确，但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却是清晰的：“这两类中国人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都可以这样分，比如干事的和不干事的，整人的和挨整的，爱国和汉奸……。这个较量，这个斗争，现在还是很激烈的，出于某种需要我们也可以不去强调它，但是你不能够消灭，也不能够抹煞客观上存在的这场斗争。有的人跟有的人就是势不两立的，那是毫不含糊的。就拿我个人来说吧，我没有得罪过的人，他就在那里一再盼望着我得癌症，因为我是他的政敌……”

刘宾雁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史时，已经勇敢地揭开了这个秘密（这正是他再次遭到惩罚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被开除不到一个月之前，他就指出：“……，一方面

高喊我们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我们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慷慨激昂，不晓得说了多少好听的废话，落实下来，对不起：让让步，还是给当官的优惠。这可能是一种集团意识，首先要满足我那些‘哥们’，我手底下的，首先要给这些人较好的安置，……这种集团意识决不可轻视。……我们中国人是不承认这种利益集团的，理论上不承认。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一个利益集团就有他的集团意识。我的作品之所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并不是我批评了那么多人，而是一种兔死狐悲的集团意识。”

如果说“极左”阶级对经济的占有由于与私人直接占有方式不同，其经济特征不甚鲜明的话，那么，也正是由于同一原因，它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却惊人的突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今天人们前进的绊脚石。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相当一些同志已经醒悟过来了，但毕竟是那样一支力量，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成长起来。”这里，刘宾雁指出了“极左”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制造和促进政治运动，并在其中发展起来。

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是中国极左阶级的一个大发明，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创造了对人进攻的范型。

经济垄断、权力垄断提供了“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费时耗资的大运动是体现这种经济——政治结构的本质力量的最佳形式。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游戏，而是一种生存在和发展的必须的过程。极左阶级从中国封建专制君主那里继承来一整套政治理论。其中特别是韩非所设计的理想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引自《韩非子•杨权》)。他发明的相应的治世手段“法”、“术”、“势”三者结合，尤其是“势”，在当代中国极左阶级手中得到充量的发挥。韩非赋予“术”的功能是：胜众之资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发展为以众胜敌之资也。阶级之所以发达者，群众运动也。从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阶级使用了三个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目标，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的本质。

首先，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祖国、正义和真理的代身。“用最革命的口号，用最高尚、最圣洁的词句”领导、组织、暗示、教唆无知群众“站出来”。尤其是借助和利用青年学生的热情、天真、易于冲动、过激的性情进行前期进攻。这一发明还有着

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上的考虑。第一、青年学生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读书不谈书的经济含义都一样（许多“极左”分子都是靠“学生运动”起家的）；第二、青年学生年轻、纯洁、没有经济利益瓜葛，给人以圣洁的形象；第三、青年学生、尤其是浪漫型和理想型的学生，易于接受“革命理论”；第四、“极左”阶级假想的（也是真实的）反对派，主要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首先争取青年学生使反对派不战而溃；第五、最重要的，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是极左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这种人才，关系到这个阶级千伙万代的江山。应该注意的是，被“借重”的“小青年”和广大群众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报答。道理很简单，发动他们“起来”，并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观（绝无这种可能，政治运动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摧毁）。因此，群众运动虽然不断，但参加者，其中的主角又是不断变化的，以防止“受骗上当”的一部分人觉悟过来而降低政治运动的高度。政治斗争、政治运动造成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的失悔、懊恼、沉浮。最致命的打击则是通过这一切代价落在那同样是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反对派”头上。

第二、在残酷惩处无辜的“反对派”同时，巩固政治成果（已无经济成果可言）。这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增强新鲜血液，强化意识形态。回想一下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想一想“两个凡是”理论以及后来的“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常常会困惑不解：“极左”分子为什么如此酷受“理论”，这些自诩是“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何以对“世界第二性”的“意识形态”有着永恒的嗜好？道理并不复杂，剥开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外衣，极左阶级简接占有制就昭然若揭了。这些“理论”，为什么总是把“反对派”称为“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分子”，其根本原因也只能在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的“狭隘性”中去找。

第三、政治运动的成果总是用冠冕堂皇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宪法、党章、中央文件、决议、教科书、社论、文献汇编以及一切舆论宣传手段的运用。其结果是要纠正任何一个极左阶级的问题。都碰到宪法、党纲之类神圣不可移易的东西，国家法律制度和党纲在许多方面已经与极左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很难分清了。又由于文化的贫穷和教育的单一，由于语言、尤其是暴力语言的强大滞留性和诱导性，极左阶级心态将长期占据人们的心灵和大脑。新意识、新观念很难挤进中国的精神空间。

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政治学习、定期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慢性的恐怖

气氛，造成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机制，同时使人们在长期的精神紧张中，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失去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也失去反抗和任何选择的可能，这和政治运动本身共同完成着一项任务：培养人性逐渐退化，兽性逐渐发展的新品种，即刘宾雁所指称的“非人”和“兽”。

与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互为补充（也互为因果）的，是在两次运动的间隙中对人进行的多种相对温和的静悄悄的进攻。它们不能一一枚举，大致有以下几种：

“……人不是人，人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上学，不需要旅行，不需要思考问题，……人只有一个肚子，而这个肚子也无需填得太饱。只需要在阶级斗争的会场上喊口号，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去锄地，去赶一头牛犁地。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这在我们的指导思想里是有的，而且说过这个话，人的生活不要提得太高，饿不死人就可以了。”

人的各种素质，包括自然能力、性爱能力的丧失，提倡僧侣主义、禁欲主义，直接影响到民族生机。

灌输奴隶主义，施加抑制影响，“这个教育把人压抑得太厉害了。这个也不许做，那个也不许说，那个也不许想，于是在政治运动中，一下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一个东西，再爆发出来，就显得那样疯狂，那样野蛮。……这不单指性压抑，而是各种合理的欲望，各种合理的需要的压抑，造成那种精神上的病态，一有机会就爆发出来……”等等。

人们还可以举出极左阶级的若干特征以及造成的种种后果。

大规模政治运动无休止地开展（两次运动之间的间隔只是为了蓄积力量与选择时机），正是中国“极左”阶级经济——政治本质的必然要求。隐蔽的经济独占制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保护。政治运动是“极左”阶级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防线，只要这种间接占有制没有消亡，政治运动就不会停止。经济垄断必然导致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的间接性质决定了政治垄断的直接性质。这就是我们对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在中国发生且愈演愈烈的解释。

不仅如此，政治运动还有使隐蔽的经济制度得以调节、获得活力的功能。由于在名义上人民做主的国家，经济独占一般不可能以个人终生直接占有和世代占有，它主要是依靠改变内部结构、成员来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运动把不能使这种占有性质存在下去的成员淘汰出来，代之以希望参加这种占有的成员，这是政治运动尽管对大多人而言常常是一场闹剧或悲剧，对于一批批野心家却总是具有那么强烈的诱惑

“铁一般的、物质的”原因。刘宾雁 1986 年 10 月 8 日在安庆谈到“极左”时说：“但是结果很奇怪，恰好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真正坏的人倒还上来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反了几十年个人主义，但是最有害最危险的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反而没有遭到打击。风派人物，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反而生存下来，而且生活得很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总之，政治运动变换口号，启用一批“新”人，或激烈、或温和、或隐蔽、或公开、或长（“反自由化斗争”据说要搞几十年），或短（反精神污染据说只有 28 天），或文艺或教育，或理论或新闻，万变不离其宗：维护和维持一个名实分裂的经济制度。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靠在政治运动中不断改变结构、成员而存在的阶级间接占有经济制度。

因此，中国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根本经济制度，政治领域内的每一种进步，都会造成“极左”阶级真正的危机；反之亦然。显然，经济变革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要越过这道几十年经营起来的意识形态的“马奇诺”防线，直接改变那个隐蔽得很稳固的经济制度，希望是不大的。因此，我们预言，未来中国的真正变革，其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最伟大的领域将是“意识形态战线”。可喜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和外围，我国的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尤其是翻译界正在进行着意义深远的艰苦而有益的工作。可叹的是，公开地、冷静地、不气馁地与“极左”阶级的“护身符”——保守僵化、气数不长的意识形态作持久的较量，还没有成为我国知识界的自觉行动。但我们已看到两者的历史性统一的曙光了。长期为“极左”分子们控制的历史审判权，它的合法化已经受到挑战了。这就是希望。

刘宾雁于当代中国（五尚未了结的公案：一九五七年）

在廿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份人可以惩治另一部份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是单单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对于引文作者，“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我们不全理解和赞同他的宗教观点，但是在抗议暴行、绝不忘记苦难这一点上，我们对

他怀着崇高的敬意。索尔仁尼琴那坚强的人道主义，是二十世纪继托尔斯泰后俄国文化给我们的最可贵的启示。

1986 年年底，三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向几十名知名人士、前右派发出一份“1957 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该通知全文如下：“先生：1957 年的反右活动，即将满 30 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甸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2.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3.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4.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5.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6.反右之后，“左”及右派的运动轨迹；7.反右与今天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你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一九八七年二月三至五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特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为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你是否能够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政中关村 812 楼 704 许良英

发起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呼吁对 30 年前那场政治运动展开严肃的讨论。

1986 年，是中国文化和学术会热年。“1957 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却终未开成。这次会议留下的一份通知却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提示人们：“1957 年并未过去。

1986 年 11 月 21 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对年轻大学生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

演说。对中国当代社会，他列举了十个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对 1957 年反右运动，他作了特殊的说明：

“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 120 万、200 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同年 9 月 13 日，他在黑龙江大学发表演说，恳请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啊。绝不是什么思潮、什么风。而是实实在在的、铁一般的、物质力的。”他问道：

“请问在座的同学，你们对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没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禁区。1981 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最近写的很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无可厚非的吧！马马虎虎，还可以；无需追究责任，还可以。但是今后哪，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

研究刘宾雁、研究当代中国，自然要研究 1957 年反右运动。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总能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表，把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公诸后世。

历史一再误入荆棘，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历史的参照。丰富可贵，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总是不能转化为教训和智慧。一个民族开始成熟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居安思危”，能“见微知著”，能将前事为师。充满坎坷的中国当代史，能否迎来一个持久稳定的新阶段，这绝不会因为一连串灾难已经发生了，历史会怜悯中国人：苦尽甘来，放心过好日子吧！灾难恰恰偏爱对它冷漠的民族。

1986 年以前，我们曾以多大的热情幻想着知识分子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上历史舞台，以未曾有过的风姿扮演现代化建设最先进、最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角色。我们真诚相信，现代化赋予我们崇高的使命，我们可以一扫晦气，跟所有的耻辱和冤屈告别。

历史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错了。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严峻得多。许多人最后醒悟过来，只要不再重温噩梦，不再作“臭老九”，也就知足了。

但是，这种命定论比理想主义更加可悲。知识分子的软弱，首先是在自身实现的。

我们只要一天不收回评判自身、评判与我们有关历史的权利，我们就一天不能得到起码的尊重。1957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灾年”，我们不能奢望把那些知识分子视为“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浴之所轻”的“改造”、“使用”对象的人，会把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冤案洗雪。知识分子只有自己去做，才有希望可言。

1957 年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至今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政治、文化、科学、法律、艺术、道德等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域，有力地束缚着我们。它是横亘在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块磐石，一道历史的紧箍咒。

如果说，三十年来，因为一系列更为紧迫的重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反右问题并不特别令人不安，因而可以容忍的话；当中国决意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借重知识分子的今天，对这场旷古悲剧依旧保持沉默，甚至维持原判（在根本是非意义上），那就是不能接受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我们既已无端付出了那样高昂的代价，既然已经宣布抛弃那条从反右运动发展起来的“极左”路线（这个问题已在第二部分“极左”问题的实质中分析过），我们就应当得到公正的判决。

反右运动，它之所以形成一次巨大的政治运动，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1949 年之后，中国社会在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的统一（台湾情况此不及），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出现了。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定性，由于中国人对西方严重的对立、疏远情结，中国当时似乎只能走苏联斯大林式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唯一方式，就是国家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经济控制，以便发展工业、强化政权。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是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其影响甚为重要，此不论）。

从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社会制度反观五十年代中叶，不难发现，酿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因素几乎都已具备，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的垄断和思想的全面控制。

对经济实行国家控制，连小手工业都不能允许存在，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包括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具有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尚未显示它的致命特点，新社会带来的乐观情绪还不可能对其产生理性的分析，对中国未

来发展举足轻重的经济制度的变更，就在欢呼声和微弱的牢骚声中完成了。

军事和经济本身永远是盲目的力量，要建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还必须实行与军事、经济的本质一致的思想统一。这在某种意义，比前两者更为重要。事实上，毛泽东以后的注意力，主要地就在思想领域。这意味着，当时占全国人口相当少数的知识分子必然历史地成为革命对象。这是中国历史为中国知识分子安排的劫数。（越是客观地分析历史，越是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的深刻的历史非理性，越令人感叹万端，越催促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宿命！）

但是，思想、精神、灵魂、意志，毕竟不是物质资产，知识分子在空前的劫难面前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抗议，呼吁公道，期望新社会总不会比被推翻的旧社会更无望。

历史还远远没有成熟到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福音的程度。

1957 年前，征服知识分子，统一思想的背景是什么呢？

1.在长期以政权为目标，以土地为中心，以严酷的军事战争为主要方式的斗争中，形成一种高度集权、崇尚权力、整齐划一、以服从为最高美德的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

2.浓厚的小农铲平主义与狭隘的阶级权益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支配意识；

3.毛泽东本人存在着强烈至于病态的蔑视知识分子的性格；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更为毛泽东反感；他本人却以中国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家、大学问家、大文章家、大诗人、大书法家的姿态出现；因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不仅因此受党内同僚和工农兵的赞赏，而且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一个已经改造成无产阶级领袖的旧知识分子）在精神和人格上高居于所有知识分子之上；

4.1956 年的波、匈事件冲击中国，使政治空气格外紧张，尤其是团体、组织、党派随时可能作为斗争重点；

5.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揭露斯大林暴行和“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已有的对立局面，并从反面给毛泽东一个重要启示：要防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国重演，必须在继承斯大林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机制，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

6.世界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铁幕”拉下，中国实质上长期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意识形态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战线”）；

7.二战以后，以日本、南韩、台湾及东盟国家在地理上构成的所谓“反华反共包围圈”，特别是台湾国民党人偏据一隅的现实成为国内政治关系日益紧张的最主要的

理由；

8.执政党本身对如何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意见出现分歧，等等。

上述八种情况构成的国内外背景显然对知识分子不利，但是如果没有其它历史和社会原因，还不至于促成反右运动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状况以及与新制度的内在冲突。

1957 年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直接产物，信仰混乱、政见分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对知识分子作最一般的分析，确实如同刘宾雁后来所说："历史的事情就是这样，非要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发生之后带来消极影响，同时也会有积极的东西。1957 年反右运动，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假如非发生不可的话，我宁愿它早发生一点，那样历史可以前进快一点。"对于中国 1976 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 1957 年反右运动，这一论断是有深刻历史根据的。

我们大致可以从七个方面简略分析 1957 年反右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

一、1957 年前，虽然经受了肃反、三反五反、清匪反霸、思想改造等政治、思想斗争，接受了初步的斯大林－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摆脱几千年以来历史铸造的性格。这就是儒家世界观、人生观、"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人格清高和精神上的优越意识，促使他们错误地把毛泽东和共产党比附为孔、孟称许的封建"明君"，能"察纳雅言"，他们则可以为"王者师"，把共产主义理论等同于"大同"理想的儒家人文主义，甚至天真地自居为当代鲁仲连、触之武，希图在新制度中"进言"、"直谏"，施展抱负。这种儒家型知识分子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作者去年看望梁漱溟老人时，他就自豪地提到：56 年初，他和章士钊是两个仅有的不事先招呼就直接去见毛泽东主席的知识分子。53 年以后，就没有请他去过中南海了，直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梁漱溟也没有和他见过一面。而 1919 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授、与毛泽东未来岳父杨开济为同事时，毛泽东还是北大图书馆阅览室（梁漱溟特别强调是图书馆外面的翻阅杂志报章的阅览室，强调当年的毛泽东地位低微）管理员。抗战时期，他们又在延安第二次见面时，已任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见面就称他"老前辈"，梁说"其实我们是平辈，都是 1893 年生的，毛泽东比我小几个月，在北大像师生关系，但不是两辈人"。1953 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两人发生尖锐口角，从此反目，这段史实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二、文化观念上是儒家的底子，欧美思想的外衣。这类知识分子以少数欧、美、日留学生为代表。他们都怀着一片赤子之情回来为新制度服务，比单纯的儒家知识分子更不了解新制度，极不现实地用西方“三权分立”、“民主”、“自由”来要求中国新的政治结构，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在中国的代理人。大学生以青年学生的热情和偏激介入反右前夕的“鸣放”运动，加强了知识分子与现实对立的异端色彩，使反右运动带上了更为严重和长期的性质，使高等教育和整个知识界的未来都处在相当困苦的情形中。由于学生介入造成的震荡性，反右运动的火药味加浓，事态迅趋恶化，最终导致右派处理的极端方式（当然这只是借口）。

（三、四、五、六类知识分子分析文字缺失）

七、党内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评，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逐渐缩小的不满，使反右运动与党内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混杂起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同伙和后台。

以上七类知识分子的划分，不可能很准确。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立场本来千差万别，但是一律都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前称）。这种共同遭遇，对背景各不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荒唐的、不合常理的；但对于中国当代史最重要的本质——“极左”力量的崛起，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前提：在 1957 年，凡是不完全接受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家长制（尽管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个人独裁的雏形）的言论和人物，都是异己分子，都是敌对力量。我们只有把“反党反社会主义”中的“党”和“社会主义”“还原”到本来的、具体的历史形态，才有可能明白，为何那么多在今天看来，实在够不上格的“好心人”也成为了十恶不赦的右派。

对于中国“极左”分子们，“党”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永远有非常严格和实在的内涵。一个几十年无可怀疑、不容思索、更不容分析和批判的概念，完全可能、而且绝对蕴含着许多不同的意义。例如：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规定：“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的”，划为右派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就是按照这一规定，由于发表了对向苏联“一边倒”的不同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只是因为对“苏联专家”态度傲慢或者提了“不尊重中国女同志”的意见而成为右派）。然而，四年之后，毛泽东对即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身份访苏的邓小平说：对他们（指苏联）不要客气；不久，又发表了宣告中苏关系破

裂的《九评》；到文化大革命，吹捧、美化"苏修"反过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状。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无论知识分子鸣不鸣、放不放，结局都不会差得太远。劫难的根源本来就不在知识分子身上。（由于这里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只能笼统地下个结论：1957 年反右运动，当然不是右派分子"有纲领有组织"地向共产党进攻，从根本意义上说，也不是毛泽东及他的同志有预谋地镇压知识分子，而是新制度的本质所规定的，特别是"极左"势力得以形成、发展的一个历史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57 年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数。）

1986 年 9 月 13 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评价中国文学的"遗忘症"时说："有多少人是五七年起家，到六六年继续走红，到七七年仍然执掌清查工作，到现在仍然吃香。"对许多人来说，1957 年反右运动明明是一场可耻的镇压，却非要坚持它的"必要性"，死不认错，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刘宾雁所说的那种"从五七年起家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天底下最大的真理。"

作为"极左"力量崛起的代价，是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丧失本质。儒家的、西方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而又无法获得任何可以发展的新本质。

刘宾雁谈到这种情况——"极左"的崛起和知识分子的沦落时说：

"1957 年以后，中国青年人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路，就变得十分狭窄……，你如果想在政治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必定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点才能，喜欢科学，或者喜欢技术，你想在这方面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么很快'白专'帽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就会落到你头上来，于是这条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剩下的道路，基本上就是一条，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轻松的、万无一失的道路，就是做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或者叫'风派'。道路就狭窄到这个程度。果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我们今天前进的绊脚石。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一些同志已经醒悟过来了。但是毕竟是那样一支力量，从 1957 年开始开成长起来了。"

一代知识分子的衰亡，一个"极左"阶级的兴起，这就是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

刘宾雁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摆脱了历史研究空谈理论，远离实际，因而无法解

决任何问题的陋习，是研究反右运动及其当代意义的一个切实而深刻的思路。

刘宾雁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明反右运动实质，得力于几十年来（主要是他本人被打为极右分子以后）对整个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和思索（在《中国的发现》、《"极左"阶级的公诉人》和《新人道主义》等部分有较详细的阐述）。只有把反右运动置于全部当代史（有的还须追溯到"党史"、"国际共运史"、"民国史"、"民主党派史"等）当中，尤其是与尔后的"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内部联系中，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看法。

二、反右运动过程概述

1957 年作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具有若干灾难性的特征，树立了人类历史上用暴力和诈术镇压思想自由的一个极坏的样板。

反右运动的后期，对几十万右派分子的盖棺定论是：

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

这句三十字的判词，是诱骗、捉弄、压制知识分子的无耻后果，它极为残酷、血腥、草率地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悲惨的困境，许多人受屈辱，不堪而殁。

反右运动，严重地背离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基本准则。

第一、政治上极不负责，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有案可查，知识分子大规模参加"鸣放"，是再三号召、劝导、启发、鼓励的结果。尤其是 1957 年 4 月 27 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激励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帮助共产党开门整风"，"向共产党提意见"，各级党委书记层层开动员会，再三申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十六字令"，他们一时都成了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谦谦君子。

知识分子经过六年多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已经心怀恐惧、人格扭曲、精神压抑。费孝通 1957 年 3 月 24 日撰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形容许多学者觉得新社会没有自己的一份，恰似"笑渐不同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只求"一房、二书"，不敢多想，即使波匈事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反映甚微，可谓古井无波。

事后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因人因地因事而千差万别，绝大部分不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影响较大，较为集中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考虑民族和国情特点，主张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苏联模式）而画地为牢，自吊一棵树；

2.对党和国家机关既已出现的种种弊端表示忧虑，希望能解决与知识界、工商界的实际关系；

3.希望逐渐完善法制，建立一种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制度。

最“激进”的观点，具体表现在对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偶像崇拜、独行专断、向苏联“一边倒”所提的善意而中肯的意见。知识分子们言辞婉切、态度诚恳，这些自发、零散、公开的意见，是经毛泽东等人屡次提倡、号召后提出的，其中最“反动”的思想，经过 30 多年折腾去看，恰恰是切中要害，很有眼光，很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意见被压倒，中国人才付出了那样沉重的代价。它们主要包括：关于等级制度和偶像崇拜（如章乃器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所提“马克思主义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如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关于共产党领导权以及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如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在机关中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重大问题讨论”；储安平所提“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实施等问题）；关于政治运动（如林希翎所提“‘肃反’、‘三反’等政治运动会造成人们精神状态不正常”）；关于民主党派、政协、人大的职能问题（如章伯钧所提“非党人士‘有职有权’”、“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如陈新桂所提“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斯大林的错误”）；关于党群关系（如葛佩琦所提“党群关系比解放前差十万八千里，1949 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衣壶浆以迎‘王师’，现在是‘敬鬼神而远之’”，“‘朕即国家’是不允许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等等。八十年代正在经济、政治“改革”中的中国人都可以公正地评价这些“极反动的极右派言论”，将它们与中国 30 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目前一切问题的根源联系起来，自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刘宾雁曾经痛心指出：当时所有优秀的青年，正派、有责任感的青年，几乎都成了右派。反右运动 30 年前夕，他在中国南方与许多当事人会晤，深有感触地说：右派，其实是一个很高尚的称号，很难做到的一个标准。同年 11 月 21 日，他在南开大学再次指出：1957 年，我被打成极右派之前一次党小组会上，我还提出质疑，到底什

么是“左”，什么是“右”，我当时并不清楚。30 年过去，现在人们都清楚了，要求民主，要求改革，要求整顿党风，要求反对保守，要求加快中国前进的速度，这不是“左派”吗？1957 年的右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

在未掌握一些关键材料前，我们不愿蠡测毛泽东关于“阴谋”与“阳谋”的论辩——人类政治史上最无耻最肮脏的一次表演——究竟出自什么动机（是因为他倡导“鸣放”，导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遭到党内同僚反对而被迫为之，还是早有预谋，确系“引蛇出洞”呢，抑或“此一时”、“彼一时”，并不存在什么逻辑上的关系，“放”也真、也对，“收”也真、也对等等），然而对右派分子——知识分子精英——的定性的处置方式，却那样令人寒心。那种以甘言诱人说话，然后以暴力相向的手段，还可能出自人类任何正常心理吗？

整个“反击”极为简单：唆使“工、农、兵”起来发言；培养“积极分子”搞中间爆破、四面开花；全力开动整个舆论宣传工具，最后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处置。

轰轰烈烈的“鸣放”嘎然而止，“反右”运动在四十天时间内大获全胜。

1957 年 7 月，毛泽东原形毕露了。他在《1957 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给反右运动定下性质，拉开了持续 20 年之久的以人为斗争目标的政治动的序幕：“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在二十多年的非人境遇中，只是在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当中，右派分子才得到过同情和安慰——作者），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 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预言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当然不是说十年十五年之久，阶级斗争就消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什么是文革中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这段文字之外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对于右派分子的命运，整段文字等于判了极刑或无期徒刑。而其中“十年十五年”之说，恐怕还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问题。要根本解决右派问题，应当说，光有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还不够——很不够，

还必须有一个“物质上、肉体上”的斗争。不必动用武器（实际上曾经不断动用武器），只要按照“政策”，让这些“精神贵族”去开荒、挖煤、钻隧道、点雷管、牧羊、割草、烧石灰、挖铁矿、搬运货物……、让盐水、碱水、酸水来“改造”；让他们的亲朋好友、门生弟子唾弃他们、断绝关系；让“工、农、兵”监督、斗争他们;让“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彻底征服他们； 让他们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呻吟、痛哭、求饶、忏悔；……不是更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吗？无产阶级的“仁政”、“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要的，右派分子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希望并没有堵死，只要他们认罪伏法，不再翻案。

刘宾雁本人，连他这样具有独立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的年轻共产党员，也几乎为那空前的大颠倒所征服：“1957 年把那样一些优秀的人物打成右派，并不是人人心里都同意，我被一下子打下来时，当然已经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了。据我的直感，反右派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是想不通、出来辩护的人也有，一些老同志出来坚决保护一些人。但很快一下子就都转过来了。包括我也转过来了，认了错，因为除非是他（毛泽东）错了，我才可能是不错。而他是不会错的！结果，1957 年过去了，接下来是灾难的 1958 年！那个荒谬，那种疯狂，在人类历史上有几起？！”

反右运动临近尾声，进入“动手”阶段。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发出信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

接下来是定性处置。毛泽东本人直接使用了“围剿”、“法办”、“劳改”、“剥夺政治权”等词，最后给右派分子留下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声称：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内）在你们手里。

四十多年前，巴黎攻陷、法国沦落，希特勒听到这个胜利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他为德国二十多年“耻辱”的结束而粗俗无耻地自我欣赏，这是可以理解的，德法两大民族的宿仇太深了。但是，人们永远无法解释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那样蔑视、那样残忍的心理究竟从何而来。论出身，他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老师、第一任岳父、许多朋友，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一天不在受罪、受罚、受辱！仁义高蹈的中国

古代知识分子，竟然出了如此乖戾的后代！

在对束手无策的右派分子们嘲笑够了后，他挖苦他们说，你有那么多知识，为什么还犯错误呀？毛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他提到章伯钧不能当部长，丁玲不能当人民代表，钱伟长不能当副校长；对其他几十万右派，他似乎已没有多大兴趣去过问，他说："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这（指处理右派）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对"资产阶级死硬派"，他主张："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看来，本来还有更极端的政策。

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反右派运动宣告结束，结束了的是半年的演戏，开始了的，是一场 22 年的恶梦。

三、反右运动的后果及影响

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有"党锢"之祸， 明有"东林"之悲。但是无论从道义、天理，还是从规模的巨大、时间的久长，无论从冤屈的深广，还是罪恶的重大看，1957 年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的苦难都是罄竹难书的。

下面，仅就一时想到的方面，极为初步地分析一下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历史遗产"。这一"历史遗产"，也就是刘宾雁概括的"对整个民族生机的一次致命的摧残"。

1.将一切意识形态、文化、艺术、教育，一切人类精神、思想、灵魂、感情，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世界统统纳入国家权力和个人独裁；

2.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于现存理论、政策的意见存在，否则格杀勿论；

3.知识分子是新制度中最落后、最保守、最危险的因素，阶级斗争将长期以他们为对象；

4.开创了镇压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先例，发明了几条重要方法：⑴以口号号召诱人以饵，制人以言，出尔反尔，无信无义；⑵发动群众围剿，采用"恶谥"政策，用于治人，迹近精神"凌迟"；⑶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⑷直接运用国家机器处理思想问题，对政治问题处以刑罚，纵容国家本身犯法；⑸为上者毫无诚意，上下相欺，人心丧尽；⑹产生了中国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极左"路线，产生了一批虐待狂、野心家；⑺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顶紧箍咒，一

根条棍，一座刑架；⑻践踏人性，侮辱生命；⑼仇视知识，仇视真理，仇视理性，仇视自由；⑽制造冤狱，推行恐怖政策、愚民主义；⑾拆散家庭，离间人伦（妻子检举丈夫，儿女揭发父母，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亲人残害誉为“政治觉悟”!）；⑿摧毁知识分子独立性，毁坏其文化科学成果，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毛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骂道：“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最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丢尽中国人脸皮，与毛的教唆无关吗？）；⒀株连制度的形成，血统奴役成为“政策”、“路线”；⒁仇视世界进步文明，自外人类；⒂人性普遍堕落，小报告、诬陷栽赃、盯梢告密、检举揭发（每个单位都有检举箱）、谎言流行、狼性滋漫、人心惟危、六亲不认、人心腐败！⒃偶像、权力崇拜，排斥异己、党同伐异、“诛讨”成风；⒄奴隶哲学、庸人哲学、铲平主义、玩世不恭，一切历史污泥浊水都死灰复燃；⒅鄙视富裕、忌恨幸福、忌贤妒能；⒆虚夸、矫饰、八股垄断；⒇摧残个性、诋毁英雄、不许越雷池一步；（21）从人心内部阻止了一切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可能。

在许多方面，1957 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都为 1966 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行吗？

三十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1957 年正在迅速地退到历史的阴影中去，这场旷古公案正在湮灭。

1957 年反右运动 30 年“大庆”（大祭）前，刘宾雁在半年时间内，在南中国、在知识分子中、在大学生中，在理论界、新闻界、法律界、文艺界，在与老友新交的上百次演讲、座谈、采访、会面、书信、文章中，呼吁中国人民正视这段不幸历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57 年正在消失，这对中国人是很危险的。我们有责任把这个研究工作承担起来，告诉下一代，让悲剧永远不重演。”

1986 年 11 月 7 日，刘宾雁在上海揭露了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事件：“因为六〇、六一、六二年出现了这种思潮（指有人开始思考问题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需要，再来一个反右派运动，规模限制在大学里，最危险的地方，我甚至说过一句话，大学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希望之所在。”

1986 年 12 月 30 日晚，刘宾雁正在与夫人准备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中国作协等单位

举办的“我们，你们”晚会前，一个陌生青年人走进来，下面是刘宾雁与他的对话：

“你是——”

“我是晚会秘书处派来的司机。”

“请问贵姓？”

“姓刘。”

“嗬，咱们同姓！——请问今年多大？”

“32 岁！”

“朱洪，瞧！多么年轻的年龄！1957 年，我就这个年龄！”

“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几十万右派分子的苦难将不会被遗忘。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将在他们的同志和战友、已两鬓飞霜的刘宾雁们的奋斗中复活。

人还在，心不死！中国当代最大沉冤、所有中国人的公案，决不会永远沉默。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又多情。

附：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前言约去。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

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叛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对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指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性质，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回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明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六新闻与自由•兼论刘宾雁的新闻观）

我知道我的退休将不会影响办报的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和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鼓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层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失去对贫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发表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做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干的，还是贪婪的穷人干的。——〔美〕约瑟夫•普利策

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新闻，是不可思议的。当代中国有没有新闻？这个命题好像很荒诞，让我们来细究一下。

首先应搞清楚，新闻是什么？

有人会说，新闻是有阶级性的，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不也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喉舌吗？我们很愿意对此展开讨论，深入分析一下新闻与政治、与国家、与阶级斗争、与人民的关系。

为了澄清事实，让我们回到新闻和它作为传播手段的初始状态去。人类第一张报纸起源于 1609 年的德国。在它出现之前，人们已经有交流新闻的习惯了。直到中世纪的所谓新闻，不过是人们在乡村集市上互相交换感兴趣的消息而已。一直到 1500 年左右，一般都用消息（Tydings）一词来形容有关时事的报道。新闻（News）一词是后来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对有意识传播的消息与有意识收集和加工的消息加以区别。是新闻创造了报纸，而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尽管有区别，仍然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定义是很准确的。关于新闻定义的本质，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刘宾雁曾经作过这样的探讨：“现在一谈就是党性、人民性，那报纸当时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呢，不但没有共产党，任何政党都没有。有人民的地方，几百年前就出现了报纸，可见报纸并不从来都是党报。”请注意“有人民的地方就有了报纸”，它的确产生于民间，服务于公众，与国家无涉，倒是可以告诉你，第一个颁发“许可证”制度的是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他发布公告，规定印刷商在开张营业之前必须获得皇家的许可。都铎王朝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不懂得用工具和喉舌维护他的封建专制。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确实把报刊作为它的工具和喉舌，不过是用它来抨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感召和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参加革命、推翻专制。永远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新闻媒介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武器时，那个阶级并不是掌权的阶级。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新闻进入政治领域，与政治发生关系后，它的根本属性是批判和斗争的武器，而不是维护利益的工具（那时，资产阶级还未上升到统治阶级）。从新闻的根本属性入手，我们立即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物质特征，新闻作为批判和斗争的武器，它的锋芒始终是指向国家和政府，指向官员和富人。世界上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报纸总是把矛头对准民间、对准穷人、对准平民、对准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总结：新闻与国家、与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不管如何千头万绪，最基本的关系是一种批判和反抗的关系，而不是宣传和维护的关系。这种批判和反抗的意识，是新闻本质的必然要求。人类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人类的道德价值是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识达到了与自由的同一，从而使新闻出版业在终极意义上符合人类的精神本质，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基础，因而是合理的、合人性的、有道德的。诚如汉密尔顿所说："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世界新闻史就是这样高举真理的旗帜，声张正义，反抗专制，尊敬自由，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进步、走向文明。

新闻一但丧失或被剥夺了这种本质，便立即异化为人的异己力量。成为一个集团、一个政党的工具和喉舌，失落了自由本质的新闻媒介，不合人性、没有理性、道德沦丧，成为压迫人、残害人的急先锋，败坏人、退化人的教唆者，成为一切偏见和歪理的鼓吹手。这个事实，不是昭明昭著的吗？在人类步入现代的过程中，在人类中真正优秀的那部分——知识分子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思想意识成为文明主体的过程中，新闻自由为增进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有力和彻底；而一但新闻丧失其自由的本质，反过来对加强奴役、剥夺人的自由所起的作用，也会同样有力而彻底。

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杰斐逊致卡林顿那封著名的信指出："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1965 年，《纽约时报》披露了一部美国国防部档案材料，使美国大量国防机密公诸于众。为此，国防部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纽约时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决的结果出人预料：《纽约时报》无罪。理由是，新闻自由高于国家利益（包括国防机密）。“水门事件”更是新闻的自由本质充分体现的范例，新闻记者率先秉笔控告美国政府侵犯人权，把矛头直指总统。最终的结局是，不管在道德的法庭上还是在世俗的法庭上，一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总统败诉了，被判有罪！

同志，这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吗？其实这个提法本身还大可商榷，那个社会实际掌权、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不过是些农民、推销员、律师、演员或职业的行列，如果一定要把他们称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也绝不是资产阶级选择的结果，而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不是说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民是多数吗？如果这个多数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话，又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几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完美组合的最高典范。在那里，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知识阶级，最强大的力量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利益需要维护。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只是思想、智力和知识；他们最珍视的是自由表达权；没有自由，他们的财富连同他们自身价值将会荡然无存。本能告诉他们，新闻自由是精神发展的最大保证，是自身权力不受掌权者和富有者侵犯的最大保证。他们的主导地位，使新闻自由成为一种健康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天然地要约束强者，保护弱者，导致社会的平衡；这种机制，弥补了人与人的社会差异，使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从而弥合了长期纠缠人类的社会冲突，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已成为历史。

细究一番，结论很明确：新闻的本质是自由，新闻的功能是大众传播媒介。

中国有没有新闻？从上述定义看：中国没有新闻。这里的报纸、电台、电视等等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大众传播媒介。执政党从来都把它定义为党的喉舌、国家宣传工具，的确也是如此。刘宾雁以其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作了现身说法：“新闻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应该以它特殊的方式来为社会作特殊的效劳。报纸究竟应该是什么？应不应该要求把报纸办成像政府的公报一样，要求社论像文件一样、要求记者像宣传干事一样……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报纸在中国没有成为真正的报纸。我们的报纸不应是官办、官定、官看的‘办公室读物’”。刘宾雁对中国“新闻”的概括，应该说是天公地道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性质和地位，“首先在于咱们这个地位，我国把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咱们也不要求做无冕之王，我说咱们只要不做三孙子行不行？这个玩艺儿能不能报道，首先是请示，不但请示报社，还得请

示地方党委。说可以，好，能报道。……天天在那送审，就这种精神境界。……这种地位决定这种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决定他的思维方式，他连想都不想，他连观察都不观察，还能说什么？都习惯说一种语言、一种调子、一个声音。”

不要认为新闻的问题对我们不重要，不要认为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就能活着。没有新闻，或者只有办公室读物式的新闻，我们不看就是了，那你太小看了它。它一旦失去大众传播媒介的属性，失去自由的本质，成为某个集团的工具，随时会吃了你。想一想反右，人民公社会化、公私合营、文革等政治、经济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十亿人的头脑是怎么发昏的？“两报一刊”可以凶恶到点（名）到谁死谁不得不死、评（论）到谁，谁不得不亡的地步。

在新闻具备了“大众传媒介”属性的国家，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很难反驳刘宾雁的看法：“报纸不是万能的……报纸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但它为什么会被称为第三势力，仅次于政府和议会；或者叫做第四势力，仅次于政府、议会和法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社会能自动调整，使矛盾得到自行复现、自行涌现、自行通过正常的程序得到调整，得到解决。这是现代社会，也可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没有这个，而在这种机制里面，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新闻、报纸，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是怎样在那种机制中起到这种作用的？很简单：新闻自由、自由传播。

让我们再来简单讨论一下新闻和自由的关系。“总统早晨把报纸打开一看，昨天的事就清楚了。读者把电视机一打开，对全国的情况就有所了解了。那些问题一暴露，有关部门就要来处理，律师就来了。顺便说一下，报纸不是万能的，但是，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你们想想看，律师他靠什么东西，他依仗什么东西来为一个被告辩护？假如这种辩护是合理的，他不是要靠舆论作后盾吗？”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你律师算什么，不许你发言，就带上铐子了。说抓就抓，说游街就游街。去年鞍山就发生过这类事情，三个律师被抓起来，其中一个五花大绑、游街，这个丑闻对中国太不体面了。”新闻和自由的关系太明白不过，太紧密不过了。自由就是新闻的生命，没有自由新闻就死了，新闻死了，舆论就会消失。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息和思想的传播。舆论是一切正义、公正的坚强后盾，是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没有舆论，真理、正义、人权都会不堪一击。如果有人或单位打劫了你的财产，如果当官的奸污了你的

女儿，你只能去找掌权的，如果这个掌权的刚好是个坏蛋，或者懒惰得不想搭理你，你怎么办呢？这时，你就会想起舆论的可贵了。刘宾雁进一步总结道："假定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权，要对人民负责，当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的后盾是谁呀？也是舆论呀。……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冤案在报纸上登一登有何不可呢？追究一些贪官污吏，那些渎职的，那些败类，替老百姓疏口气，党报、人民日报销路不是可以增多一点吗？党和政府的法令不是有更多的人会知道吗？共产党的威信不是可以提高吗？结果你把什么都堵住，然后他就在人民日报社面前自焚，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保护谁了呢？……你把自由给得多一点，记者也不会造反，只能使这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好一点。"

任何一个领域中自由的丧失，都将导致对人的直接损害，新闻也不例外。新闻记者应该头脑优秀、目光敏锐、精力充沛、勇猛好斗、欲望强烈，可是一旦丧失了自由，其形象立即退化萎缩。刘宾雁真实地描述了这种可悲的现象，"尤其是新闻记者和作用，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种分工到今天为止，没有得到我们承认，至少没有被充分的承认，以至于现在的记者，一看那样就不像个记者。我这绝不是挖苦记者，我是挖苦那条路线，那条路线把人塑造得简直就没法说了，有的是呆头呆脑，有的是滑头滑脑，走在路上我开玩笑，说中国找滑头最好找，虽然鸡蛋掉在油缸里不好捞，但是相当多。……记者为什么变得呆头呆脑的呢？就是一天到晚不要他出去跑，也不需要他思考，他也得不到什么信息。他唯一的工作方式是把他的耳朵搞得灵敏一点，听上边的声音就行了，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叫他写啥他就写啥。"一个国家的记者变成了这付样子，那么一般社会成员的状况，更可想而知。让我们重温一下美国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艾赛亚•托马斯的名言："一旦新闻自由被消灭，那些残存的珍贵的权利与特权也将与我们永别！可以想象，下一步便是双唇挂上铁锁，双腿套上脚镣，只剩下双手是自由的，不是去为那些比埃及工头还要凶恶的人当奴隶，就是——为实现立宪自由杀出一条血路来。"

新闻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标志，更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垄断新闻，就是垄断自由。垄断意味着剥夺，剥夺自由正是一切专制政府的标志，也是一切专制、独裁和极权存在的基础。

可以断言，一个具有了新闻自由的社会，与任何个人一样，其尊严与力量同它打破孤陋寡闻的程度相一致。梦想进入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从骨子里渴求力量，却忽视

了尊严，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或国家，是不会有力量的。作为记者的刘宾雁，长期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疾心呼吁了整整十年，他说道："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从消极方面看的，从积极方面看，它跟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事情，如政治问题人们不敢去想，不要你发言，不要你管，你去想它干什么？久而久之，就会把整个民族变为庸人，变成庸人民族。"当代中国的现实，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刚刚成为过去，隐患并未得到消除。文革结束后，新闻自由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甚至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各种冲突的暗流——有的已经高度明朗化——随时可能酿成灾祸，如果灾祸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能够制止它的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最后的、决定性的力量。在人民和反人民的较量中，新闻自由肯定有利于人民，因此，反人民的力量直到今天仍在坚决否定这个自由，不仅用千万种歪理和谎言否定它，而且动用国家权力取缔它。不过，这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启示了新闻自由和人民性的关系，它是人民性最直截了当的体现，可以这么定义，新闻自由就是人民性。刘宾雁对新闻与人民性作过这样的表达："究竟谁永恒？共产党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吗？真正永恒的是人民！党性和人民性会发生矛盾吗？要是发生了的话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那是人民的问题还是党的问题？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无独有偶，人类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美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杰斐逊也曾写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将永远是最尖锐的大军。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人类注定了是一个整体、不管文化、种族的差异有多大，人类的意识深处是相通的，不管东方、西方，历史的进程将不可抗拒。

自由——人类永恒的追求。新闻——当代人类不可或缺的自由前提！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七批判的权利和代价后记）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列奥教士

我们大概已经临近了这样一个历史分界处：对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来一次总的批判。它的主要根据是：一、核战争的可能性逼使人类学会放弃区域性和阶级性的狭隘，明白一个最无庸争论的事实：与核战争相比，我们的一切争执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我们必须摒弃继续造成人的对抗和

疏远的思想方式，学会共同存在和发展的艺术。

我们没有闭眼不看世界上仍然靠诉诸武力或暴力维持生存的事实。要制止一切暴力和杀戮，对人类还是一个太高的求；但是，那是一种趋于消亡的生存手段，它不可能因为被讨论而减少，要是依靠武力再次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最终将导致浩劫，那就更无讨论的理由存在了。我们应当转向对新的存在方式的思考，通过有耐心的持续不断地努力，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新的社会准则，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与镇压，给思想和舆论以足够充分的自由，容忍和鼓励异端见解，保护批判的权利。

批判哲学的奠基人伊曼努尔•康德在评价启蒙运动思想时说：启蒙运动是使人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并不是由于缺乏才智， 而是由于缺乏在没有领导帮助的情况下运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Sapere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战斗号召。

下面，我们将先把本节的主要观点写出来，再加以必要的论证。上面所说的历史分界，对中国人来说，应当包括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自身应否批判？或者换句话说，能否再像以前那样，在人民和共产党之间，要么是“自愿接受”监护，要么是对抗；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是否就不允许出现思想领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知识、文化、理性、正义、真理等精神力量应否代替专政机构、意识形态、官僚和政治斗争、政治运动？

之所以需要明确地提出上述问题，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历史地存在于中国人之中，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其二，诚如索尔仁尼琴对苏共中央领袖们所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毕竟同属一个民族。还有一个遥远的中国人遗忘已久的古代智慧，也可算作一个次要的因素，即《易经》所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

事实上，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在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实践，已经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它的全部诺言兑现；相反，它面临的问题，和传统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它始终不承认这点、坚持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社会这一点外，在有些方面，问题和麻烦更多，更难解决。正因为它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已经成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早已不是一批职业革命家和直接参予者的事。所以人们有权力、有责任从根本上反思（从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参予者而

言）这场革命和它带来的所有后果。进一步说，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叫“领导”、“管理”、“公仆”都一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实质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必须接受人民的认可，并且不断地经受监督和批判。否则，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灾难就难于避免重新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因此，我们主张，根本改变中国人的处境，最好采取文化的、理性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批判逐步取得共同生存的不可逆转的结果。不仅如此，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我们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批判有两个主要前提，独立性和自由表达权。前者包含在批判者内在精神里，也即康德所称的自主原则，这是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判别一个命令是否合符道德，最终必须由每个人决定，不经过个人决定服从的命令不是命令。自主性原则——自决权，这是人性中禀受的最高权威，一切文明、理论、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后者，是人的独立性必然要求的社会权利，自由表达权乃是内在独立性的逻辑外延。说独立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内容，自由表达权就是社会结构中最美好的形式。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我们不用费时去驳斥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无聊而可耻的“大批判”，我们应当集中精神在真正体现人和历史精神的事物上来。

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要描述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的全部过程，目前尚难做到。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有

关这位“争议性”最大的作家的详细的评介文章，没有读到有关的传记和自传；另一个原因，是批判者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严重曲解的形象（刘本人就被可笑地斥为“三种人”、“造反派”、“震派”、“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等等），刘宾雁这样的批判者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危险人物，由于陈腐僵硬的政治思维永远使用难以名之的特殊眼光看取他，讨论刘宾雁还是一种触犯禁忌的风险；最根本的原因，是刘宾雁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格和批判质量还在发展中（这是他的幸运，多少抱有与他同样的批判精神的人还在思索和表达的初始阶段，就过早地死去或者垮掉了）因为批判的本质是实现自由，我们无法预言刘宾雁的批判将走多远。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代的成熟、人民的成熟，刘宾雁的批判将更加逼近我们时代的真理，谁也不能阻止这种可能性，除非他本人做出相反的选择。

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毕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现实去思考。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独立性必然是面对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体现出来的。刘宾雁的独立性体现在对当代中国那些最重大的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够像样的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1.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 2.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 3.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 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萨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

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渗透，其中又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意识和危机拯救了它；但是经过 1919 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基本上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种过程十分漫长，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精神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我们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实际上这是企图完成衰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有人认为马克思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骨子里是一回事。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此不赘）。所以中国人实际上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这就在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内部分理解的基础上造成民族和文化自身的分裂。这双重的分裂（当然是一个极粗疏的说法），又与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立人的基础——大一统的一国家形态（其中包括思想上定于一尊、政治上成于一统）相冲突。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

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锐观察和紧张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 1957 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我们可以说，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从批判与人的精神发展的关系看，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见，这种错误并不限于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言论意见未能采纳，而在于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权利，蛮横拒绝任何批判。无论怎样坦率、真诚、无私的批判，都不等于真理，也不能保证发现真理；批判作为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选择思路。批判本质上不作判断，而是在承认对方拥有相等批判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讨论、让步和变通，保留双方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出现思想多元发展的机会。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尊重批判的权利呢？在一个自称以辩证哲学（其精髓被解释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理性批判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于利益、观念、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分歧、争论、批判、抉择是不断发生的社会常态。从全社会进步的机制和功能看，批判性思维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应当具有契约和法律的意义，不受党派、集团、任何个人的操纵或者取缔。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才可能结束以暴力镇压思想的悲剧。

因此，批判不怀有对抗和征服的目的，它绝对不是如刘宾雁批判中国极左势力时所说的那种“总是把人想得很坏，总是不相信人”的阴暗哲学，而是从信任开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的交往原则。霍布斯所称的“人对人是狼”，在批判者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批判的时代目标是共同生存，人与人必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需要与唯我独尊和排斥异己全然不同的新观念。批判者总是无权无势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能接近真理，又常常遭到迫害。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权力本身永远首先是监督、批判的中心对象。权力做了好事值不得半点称颂，这是份内之事；权力干了坏事，则应受到加倍的批判。几十年来，批判和批判的对象像所有事物一样颠倒了过来，这

是使得正常批判如此艰难的唯一原因。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完善得什么也不缺，就缺少对最高权力的管制（刘宾雁在《人妖之间》中已经揭示出的：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共产党自身），作为互补，中国人也什么都不缺，遍地聪明人，满眼“九头翘”，就是没有真诚者。

然而我们认为，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批判者，而是对批判者的“批判”。

刘宾雁在回顾他的右派生涯时，把他在 1957 年可能走的路分为三条： 1.到 1966 年，新、老帐总算，没命； 2.投靠极左派，关进秦城监狱； 3.成为养尊处优的“文化官僚”。结论：当右派是最好的路。

所谓代价，应放到价值论来讨论，有人爱两袖清风，有人唯恐失去乌纱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门，有人认为一切财富都等同于猪栏。价值也有内外之分，内在价值只能由个人决定，外在价值则反映你与社会的关系。

刘宾雁 1979 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

“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在康德那里抽象（许多中国人不懂康德，主要是因为缺少康德那份对人的爱，再加上中国文字的离间性）的自主性原则，在刘宾雁这里已变得这样单纯。

1987 年 1 月，刘宾雁 30 年后再次被开除出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失去的一切，我并不过分看重；得到的，也许更重要。”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在刘宾雁身上，多年未见的在个人内心实现自由的特别稀少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甚至胜过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会失败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会转化为批判者的内在审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断。

幸运的是，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

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 1987 年 1 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 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57 年，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呼声被无耻扼杀，而导致整个民族的历史大倒退吗？批了马寅初、中国无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孙冶芳，中国疯狂地破坏生产力；批了胡风、邵荃麟、冯雪峰，中国人连母性都要亵渎，到了毛泽东的“大批判”，中国人已没有几分人味了！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我们说，不对，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能为力！

看看世界其它民族吧：德国战后第三届总理、社会党领袖勃兰特在波兰无名死难者碑前颓然下跪，为德国屠杀波兰犹太人的罪愆忏悔；1950 年，美国人民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说：停止大规模调查，哪怕涉及国家安全，自由高于国家！截止 1966 年，在西德已经判处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在忽伦堡法庭上已经几十万次谴责了邪恶（但只判了十几名死刑犯）；梵蒂冈教廷越过三个世纪，向自己的受害者道歉和

表示尊敬；就连我们的“老师”——苏联，也首次向几百万冤魂脱帽致哀……

对那些“德育教授”、伦理学家、心理、生理学家、法学家和一切关心中国人灵魂的人，我们愿意进一言，人不能进行合理的、公正的、自由的批判，人被剥夺了正常的批判权利时，就会发泄恶欲，进行破坏，干下流事——男性尤为如此。取消了批判，也就取消了灵魂存在的必要，向已经没有必要的灵魂说教，无异于让阉人生殖。

1987 年 1 月份开始的对刘宾雁等三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暂时终止了，其影响目前尚难于估计。刘宾雁作为人道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几十年来在困境中挣扎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名代表，他对中国的研究和批判，既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精神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

批判刘宾雁付出的代价是无形的、潜在的。我们决不仅仅从 1987 年以来国内外人士的消沉和疑虑来衡量，不一般地从政治后果、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动来衡量，不从刘宾雁等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的个人沉浮荣辱来衡量，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滋生一种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 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 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 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将拭目以待。）

归根结蒂，批判刘宾雁，将延缓历史进程。它的直接结果是，本来大有希望的 1987 年，非但没有成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十年来中国政治合符逻辑、顺应民意的年头，没有在历史地清算 1957 年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向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极左势力发起进攻，反而再次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沮丧和齿冷的一年！二十世纪末期，凡是开始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历程的民族，其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已不大可能是暴力和激荡，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演化过

程，批判意识、批判能力、批判权利应成为维系社会，促进社会成熟的最重要的因素。阻止批判，就是阻止进步。当批判又一次被拒绝在社会生活的门外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1987 年 1 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可以庆幸的是，1987 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成一场新的浩劫。中国人，请回顾一下，作个简单的比较吧。那上百篇社论，那一天同时播放六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的纪录，那些已经公开出现的"专政"、"流血"、"一小撮"、"决不手软"这些中国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 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也不能有这等气派，其势之狂，其速之迅，其时将持续"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长，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国现状，以"文化大革命"积淀下来的无数怨恨，以物欲横行的世道人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如果按照那开端发轫时的规模、速度推进，人们可能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了。毛泽东魔鬼似的咒语：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应验了！

有人会反驳说，刘宾雁的文章言论，已超出正常批判的范围。如果不制止，就会引起动乱。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禁止了刘宾雁的言论，就天下太平吗？按照这种逻辑，不镇压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他们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压制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同主张，就会产生比 1957 年反右运动、1966 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在中国，由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本书，说的几句话，什么时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呢？何况，历史早就证明，思想之间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辩论的方式来处理，任何国家权力在精神自由上没有垄断权力，压制言论，解除对方说话的权利，无一不是惧怕真理的表现。人民的神经的是健全的，强加恶名于对方，然后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除了暴露自身虚弱外，还有什么呢。——对人民理智的蔑视。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在于人民合法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的历史反复显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极左分子们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 1957 年、1966 年、1983 年、1987 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 年 6 月 2 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一个持批判态度的人，常常是一个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兼而有之的人。

有人说，中国文坛有了刘宾雁，才不寂寞。这话只有一小半对。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说过，刘宾雁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重大现象"，这一现象最值得研究的，是其持久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大的批判成就。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研究刘宾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成为国家制度以来所开始的自我审判这一历史过程中，继斯大林、毛泽东去世以后，必然出现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种方式重新使我们回到人类发展的正常轨道。刘宾雁对中国现存社会主义的质疑和批判，无论如何不能再次武断粗暴地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或者国民党人

的支使。事实上，这本来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要经受的考验。直到现在为止，与西方社会真正的批判者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来自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者，更只可能是知识分子。又由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奉行的压制和禁锢政策，社会处境的人为差异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所以，愿意并且能够进行批判，同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就成为十分罕见的情形。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一个西方人、非洲人，或者一个古代中国人，甚至一个生活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都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还是不幸，只有历史才知道。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关于“核浩劫”的问题。越出种族和国界，也许更能清楚地思考中国。热核战争的可能，空前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前景(中国也是核大国之一)。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人类最大的现实。人们不用证明，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能够使人类无限期限地推迟和最终地消除热核战争的国家力量、民族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是合理的，都有存在下去的权利；凡是强化人类冲突，加深人类隔阂，敌视人性，制造仇恨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人类的公敌。人类在地球的不同区域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热核战争这片最大的阴影下完成的一种共同使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人们无论如何看不出，被称为中国人“立国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能促使人类走向和睦、走向亲善。我们曾无数次潮笑古人，可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史和自然史已经证明，地球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个人的理论、利益的消亡就停止转动，人类也不会因此就束手无策。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刘宾雁就要启程访问美国。让我们为这位中国人的真正使者，中国的不幸、中国的良心、中国真正忠诚的儿子送行。在这将暖乍寒、终于春风初度的时节，祝他一路平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动笔、十日完稿。

后记

忙着赶写这篇长文，中断了《参考消息》天天读。朋友们插进话来说，西藏又起动乱，外刊又传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云云。

与这个制度一起长大的我这一代人，恐怕算中国最后一批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我愿再次引用刘宾雁一句话：

当然，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的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隔壁房间，几位朋友正打印、校对最后几页，满屋油墨味；熬了四个夜的小伙子弓腰在床头睡过去，令人不忍心给他搭条毯子。他妈要是知道，会心痛的，几天都来不及欣赏的月亮又临寒窗，皎洁而神秘。突然生个念头：何时，中国人才不再辜负如此月色来干这号事呢？曙色似乎熹微，看表，五点不到，又是错觉。

还好，还能有错觉……

1988 年 3 月 13 日凌晨

重庆歌乐山麓

此文未论宾雁老师艺术成就，并非疏忽。其实，是否艺术家，对刘宾雁并不要紧。不过，真要读懂他的作品，心里得有光、有恨、还有爱，——爱是最终的。

—————————————————————

（全文完）

俯仰天地

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附萨哈洛夫纪念诺贝尔演说）

王康 2009 年 11 月 3 日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 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 1955 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 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 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交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

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 FBI 分子脑筋太死。当代“乾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 年 7 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 1945 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 12 月 10 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

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 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予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 14 天而已，他那 800 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予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

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 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 年 1 月 12 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 1957 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三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 1949 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

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 年 6 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分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拼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1950 年 1 月 31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制造氢弹。罗斯福夫人埃诺•罗斯福特别组织系列电视辩论，爱因斯坦应邀于 1950 年 2 月 13 日发表现电视讲话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的努力果然成功，那么大气层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再次敦促美、苏两国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仅废弃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还要郑重宣告放弃武力政治，同时建立起“超超国家的裁判和执行机构，哪怕只有一些国家宣告他们愿为实行这种‘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紧迫的战争危险”。

这种声音在钱学森所服务的新中国，没有出现的可能。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内忧外患，从下到上有一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拥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种民族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个体生命大规模倾覆（尤其 1949 年以后）是这个国家同样不幸而亟待终结的悲惨状况。作为研制攸关亿万中国人生命的毁灭性武器的主要负责人，钱氏可曾真正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向最高当局陈述现状，分析后果，而不是无条件效忠于毛泽东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论。

“意大利科学协进会”于 1950 年 10 月在卢加举行第 42 次会议，爱因斯坦在贺信中郑重阐述了“现代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痛心地指出，他的许多同行“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善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这是 20 世纪科学界真正悲惨的命运，科学家“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不得不噤若寒蝉”。

毛泽东丧心病狂而又荒诞愚蠢的暴行之一，是大办人民公社。这一举措导致了他的政权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的基础——中国农民——的空前灭绝。毛的科学依据之一是作为物理学家的钱学森关于粮食亩产超过十万斤的宏论。

海德格尔因为出任柏林大学校长、为纳粹声辩而永远难洗其道德污秽。从 2009 年 10 月 31 日起，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有数以千万计的饿殍亡灵会盯着这位“新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眼睛问：三百六十行，何必多管闲事？

爱因斯坦在同一封贺信中，对曾产生了伽里略、布鲁诺、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科学巨匠和艺术天才的意大利同行表示敬意。他问道：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他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和严重变形而惨遭暴君利用的民族精神，导致许多人不仅自甘工具，而且“创造性”地为专制独裁服务。爱因斯坦的回答对他们不啻是神话。——能与暴君同席，受其恩诲，是多少天生奴性和卑贱者的莫大幸事。

1952 年 9 月 15 日，日本《改造》杂志主编向爱因斯坦提出如下问题：1、您看到那些显示原子弹毁灭性后果的照片时，作何感想？2、对于作为一种人类毁灭工具的原子弹，你如何评价？3、大家都预料，下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原子战争，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吗？4、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可怕的破坏力，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原子弹的制造？

爱因斯坦坦率承认了日本人指控性的质询，同时也为自己做了必要的辩护。与 13 年前（1939 年）他给罗斯福总统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一样，“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进行工作，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尽管我始

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最后他再次推崇“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他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

如果钱学森读过自己的女性同胞（也是他岳父最敬重的伟大中国女性）宋美龄女士 1945 年 8 月 14 日庆祝抗战胜利时在抗战陪都重庆发表的谈话，他也许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角色，产生某种不安的心绪：“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众多科学家所明白的道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将造成大部份人类的毁灭。”毛泽东生前虐害了无数中国人，这与他不顾一切发展核武器的疯狂计划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为这种无法无天之徒制造能毁灭人类的武器，与爱因斯坦和甘地的和平与非暴力主义者之间，何止霄壤之别。

1953 年 7 月，一名瑞士老太太向爱因斯坦提出两个问题：1、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出现极恶劣的天气，是不是由于原子爆炸的缘故？2、由于企图要把原子弹造得更有威力，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保护我们这个行星的大气层免遭破坏的危险呢？爱因斯坦在简短的加复中相信，人类已经有力量或者不久就会有力量，用放射性物质来彻底毒化大气层，使陆地上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同归于尽。但他“还是十分乐观地相信，人类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大概早晚会避免这种毁灭”。

建立世界联邦及其政府，是但丁、格劳秀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卢梭、伏尔泰、康德五百年间欧洲思想家的高尚理念，也是 2500 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梦想。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对为祸欧洲既久且烈的民族国家心存戒惧，天生怀有某种世界主义和人类情怀。他多次呼吁建立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性政府，虽然直到去世为止，这一理想都遥遥无期。但除非人类在国家神圣和民族至上必然导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相互忌恨与仇杀中走向毁灭，否则爱因斯坦“天下一家”的伟大向往一定会刻在未来人类共同体的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世界主义，他多半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毛泽东时代是注定要遭受迫害的。即使在今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也断难容忍将联合国一类国际组织实质性地扩大。不久前奥巴马总统首次提议，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彻底销毁地球所有核武器，中国军方人士在国家电视台上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在不久前结束的阅兵式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各种新式武器，其中包括战略核导弹。

1954 年 11 月 18 日，爱因斯坦在回答《记者》杂志关于美国科学家处境问题时，说了一句轰动美国社会的话：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老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美国"管子业工会"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钱学森拥有众多头衔，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这种际遇当然不会厌恶自己的选择，赌气去作一个管子工。这是又一种区别。美国接纳爱因斯坦和众多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爱因斯坦在美国受到了他在德国不可能享有的尊荣、礼遇和研究条件。他个人拥有的自由权利、独立性和言论空间，比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和中国毛泽东三大极权主义所有知识分子这三类权利的总和还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很少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更从不表彰美国政府。相反，他不变的风格是永远批判现存制度，抨击资本主义美国，尤其不吝词汇指斥美国政要。这种爱因斯坦式的不合作与批判意识，正是现代世界始终不能被各种型号的专制力量欺骗、恫吓和奴役的精神防火墙。

而钱学森先生，从 1955 年 44 岁到 2009 年 98 岁高龄辞世半个多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天文数字般罹难殒灭的悲剧，似乎完全与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毫无干系。像 1957 年"反右运动"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大惨剧和历史浩劫，人们从来不知道钱学森命运如何，这位似乎享有特别豁免权的神秘人物，奇迹般地置身于两代中国知识界宿命般的苦难之外，这一事实，也当成为考据派的题材。

也许钱先生自有其人生观，有其不轻易示人的人生履历。但我对所有在上世纪毛时代免于贬抑的人士，皆作存疑。当然，以钱的特殊地位、影响和身份，他事实上一开始就不属于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更不是如一般社会人文类知识分子，他是毛式红色帝国统治集团中的特殊成员，整个统治制度和战争机器中的特殊角色。明乎此，便可断定，爱因斯坦的"失落感"决不会降到钱学森身上。当然，前者摩西般的先知地位和圣徒形象，也为后者望尘莫及。

1955 年，冯•劳厄从西德去信，讯问原子弹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不断提出类似问题。爱因斯坦于该年 3 月 19 日回复好友，最后一次答复"关于建议制造原子弹的动机"问题："鉴于希特勒可能首先拥有原子弹的危险，我签署了一封由西拉德起草的给美国总统的信。要是我知道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指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当

初我就不会插手去打开这只潘朵拉盒子。因为我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不仅限于对德国政府。”在逝世前不到一个月前，爱因斯坦确实流露出十分黯澹的心绪：“很遗憾，我没有参与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警告。这一荣誉应当归于詹姆斯•弗朗克，要是他们听了他的话，那就好了!”弗朗克也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物理学家。1945年6月1日，由杜鲁门总统指定的研究原子弹使用问题的“临时委员会”（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贝纳斯和物理学家K.T.康普顿等）一致建议尽速并且不作事先警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美国原子弹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弗朗克和西拉德坚决反对这项建议。他们与五个同事联名对史汀生发出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给建立原子能的国际管理造成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必然会引起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该备忘录是以“芝加哥社会政治影响委员会”名义草拟的，有七名科学家答名，并在194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公开发表。早在1945年3月，西拉德就起草了一个文件，预言原子军备竞赛和洲际导弹的危险。他请爱因斯坦介绍他去跟罗斯福总统见面呈述这个备忘录主旨。爱因斯坦于3月25日为他写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但当时罗斯福已经病危，不久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把爱因斯坦的信交与贝纳斯处理。5月28日，贝纳斯约西拉德谈话，西拉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异常坚决，6月初他与弗朗克给史汀生发了一个备忘录后，7月间又写了一封得到六十多名科学家签名的“紧急请愿书”，于7月17日送达白宫。但杜鲁门出于战争和政治考虑，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原子弹。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人们不能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科学家，对于如使用原子弹这样重大的战争决策，从来没有众口一辞的附议。与爱因斯坦一样，良心、理智和道义感，始终是西方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故事，情节，内幕永远不可能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社会出现。如果中国也面临因为战争需要而使用原子弹的情势，如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最高当局已经作出的战略决策会作出什么反应，只有天知道。象西拉德、弗朗克和爱因斯坦那种言行，恐怕不可能出现。

当“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人们有理由质问：这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徒关于世界大战、核大战的思想也将“万岁”吗？

钱学森已经作古，他的崇拜者们要求为他们的又一尊偶像举行“国葬”。

罗素本希望在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前，美国通过原子武器的垄断迫使斯大林接受国

际秩序，确保世界自由与和平。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素意识到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热核武器，并且拥有完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建立世界政府以维护全和平不再可能。1954 年 3 月 1 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岛上成功爆炸第一枚氢弹。罗素立即得出结论，核时代的战争根本修改了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宣称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种陈旧理论。原子弹、氢弹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前此一切战争哲学和历史理性，它只有一种结局：人类集体自杀，同归于尽。1954 年 12 月 23 日，罗素以 82 岁高龄在英国广播公司以“人之祸”（Man’sPeril）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浩劫危险，引起世界范围内（除苏联、东欧、中国、北韩等共产国家外）强烈震撼。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建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致有关国家的公开信，并召开一次有关核浩劫威胁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向各国公众强调核战争的毁灭实质。

1955 年 4 月 5 日，罗素把一份宣言寄给爱因斯坦。4 月 11 日爱因斯坦在这封被后世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文件上签名，七天后即去世了。

罗素刚参加完“世界议员促进建立世界联盟会议”，正从罗马飞往巴黎途中。当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上空时，机长告诉乘客，他刚刚收到新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去世了。罗素感到“心都碎了。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支持，世界和平进程将被延误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但当他到达巴黎旅店时，爱因斯坦签名的《宣言》已从伦敦转到。爱因斯坦的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人类的文明不要被其愚蠢行为所毁灭”。

由此，爱因斯坦第一个签名的声明（本来叫做《关于热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科学家反对战争》，最后通称《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希望这个文本摒弃任何政治偏向，各国科学家的都将被考虑。后来，加入签名的著名科学家有：玻恩，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理论主要创建人，1954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布里奇曼，美国高压物理学奠基人，1946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英费尔德，波兰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老友兼同事，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创始人之一；约里奥•居里，法国物理学家，核辐射理论创始人，1935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穆勒，美国遗传学家，辐射遗传学创始人，1946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鲍林，美国量子力学/化学合成理论创始人，1954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鲍威尔，英国核物理与宇宙射线理论家，1950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汤川秀树，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创始人，1949 年获诺贝尔；罗特布拉特，

英国物理学家，1949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有几位西方科学家拒绝签名，他们是另外三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玻尔、哈恩和西格班。理由是：一，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更久，科学情报和成果的自由交换只能在西方国家科学界进行；二，任何有共产党人签名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共产党人的目标。

这份不朽的文献的作者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他们告诫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拙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宣言发表后，其副本分别运达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包括中国总理周恩来，我相信这个副本和其他更多中国人完全不知情的西方知识界通过各种方式送达的类似文件，都被密封在北京某个机构中）。英国首相艾登很快表示，同意《宣言》基本精神和原则，“放弃核武器必须成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高兴地赞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八位著名科学家的请愿”。

苏联与中国政府对这份《宣言》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

不难推断，作为《宣言》签名科学家的同行和晚辈，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文件。我无法揣测他知悉这篇不朽文献时的感受。1955 年 7 月 9 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宣读这份历史性宣言时，钱学森正被美国政府驱逐回国，8 月 10 日到达香港，11 月即与钱伟长等建“动力研究所”。当爱因斯坦以生命的最后精力为他所属的这个世界签名留下一份将流传久远的伟大宣言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曾寄予满腔同情和希望的东方，一名他在美国的小字辈同行，会全身心地致力于他和他那些星光四射的科学家一致反对的毁灭性事业。

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影响，1957 年 4 月 12 日，联邦德国十八位原子物理

学家和 11 位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和平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哥根廷宣言》，反对他们的国家国防军装备战术核武器。他们发誓，“无论如何，签名者无人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和使用”。

三个月后，1957 年 5 月 18 日，32 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博登湖联名发表《迈瑙宣言》，向世界呼吁：“我们相信：科学本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科学在向人类提供自杀的手段。贸然发动总体战的国家将加速其本身的灭亡，并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威胁。所有国家都应当自动放弃使用武力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极端手段。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将停止生存。”

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精神鼓舞下，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家塔普契夫院士）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沃什村举行了首次科学家国际会议。到 2005 年 7 月在日本广岛召开以“在广岛和长崎后的六十年”为主题的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家们共举行了 55 届年会。科学家团队从最初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法律领域扩大到病毒学、精神病、政治、军事、历史、战略、社会学、国际关系，议题包括核武器、核裁军、军备控制，世界安全、科学家责任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控制、太空武器控制、教育与人口增长、环境与生态、地区冲突、战争根源、艾滋病、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等领域。

帕格沃什会议对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印巴冲突、中东战争等重大冷战和地区危机发挥了最具理性权威和公正原则的特殊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禁止核实验条约》（1963 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68 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生物武器协定》（1972 年），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核战争和一切战争的主要理性贡献者。

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和他反对战争、尤其对核军备竞赛的深切认识，这个世界的面貌将大不一样。《罗素－爱因斯坦》和《哥根廷宣言》、《迈瑙宣言》以及帕格沃什运动，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浩劫启示录式的毁灭性结局，发挥了任何一个大国政府不可企及的作用。

杀戳、集中营、迫害、流亡，物质世界奥秘，上帝的旨意，天才、良知、智慧、忧患、责任、使命……，无数因缘造就了爱因斯坦。他的科学成就，关于宇宙奥秘的沉思，人格，以及他那犹太先知特有的面容、目光、蓬乱的头发和胡须，都将作为人

类德性与智慧的象征，万古长存。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心血和脑髓，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流亡生涯中，画了爱因斯坦 72 岁时的肖像，挂在我那混迹于水泥丛林中的写字室的墙上。每天上班，我都会与他会面，觉得无论阴霾蔽日还是夕阳无限，都如此神秘而亲切。

1933 年 4 月初，隐居在比利时奥德斯坦附近勒•柯克海滨的爱因斯坦给普鲁士科学院写了两封信，拒绝该院关于他“参与了美国和法国和恶意诽谤宣传活动”的指控。还拒绝该院关于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的要求，并声明辞去其科学院院士职位，放弃普鲁士公民权。爱因斯坦的正式答复如下：

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立场。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进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只是间接的。

在此前一个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实行的是：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爱因斯坦有资格有根据发表这种声明。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的惨剧证实了他对那个曾是他的祖国的厌恶和绝望。希特勒的覆灭、勃兰特和科尔先后在华沙和特拉维夫的下跪以及柏林墙的垮塌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1927 年曾为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萨尔，1938 年逃出纳粹德国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问一位老人，你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毫无所知，为什么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已经不再寂寞

孤单了。

这也是我的感受。

但对我的同胞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 1960 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1955 年 4 月 18 日 1 时 25 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 1931 年的一段评论被刊登在世界主要报纸上：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例。他现在、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与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

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在对人类处境和命运的关怀方面，更是如此。这样的人物，他的葬仪极其简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没有宗教仪式，更没有任何官方参与，除几名亲朋外，下葬时间和地点一概保密。

有人呼吁为钱学森举行国葬。已经设了灵堂，接受各方吊唁。对钱学森，这种后事安排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没有可比性。除了都曾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之外，爱因斯坦与钱学森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在我写作这篇文字不断引用前者的资料时，心里一直有一种亵渎先哲的愧疚。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无奈，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生命共同体中，已经找不到可以让我们从那些僭据了至尊地位实际并无什么文明价值的事像人物中超脱出来，为真正永恒不朽的精神、道德、智慧的楷模而感念长久。

与钱学森有相对比较性的，是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1989 年 6 月 29 日，“六•四”民主运动惨遭镇压 25 天后，钱学森被授以国际技术

与技术交流大会“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全中国都知道，这段时间是血腥、恐怖和黑暗的历史溃退的非常时期。

不到半年，1989 年 12 月 14 日，萨哈罗夫在莫斯科去世。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十几万莫斯科人一起，冒着严寒前往吊唁。我那时在深夜通过勉强清晰的美国之音听到戈氏对逝者的悼词：他是俄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巨大悲剧中离我们最近的圣徒式人物，他的精神将鼓舞我们这些在俄国又一个困难时期艰难摸索的人们而不朽。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萨哈罗夫没有在西方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精神，他是从极权主义的罪恶与苏联社会的危机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

他曾是苏联最年轻、前程无限的科学院院士。1948 年，27 岁的萨哈罗夫便参予了由克格勃首脑贝利亚主持的研制氢弹的“阿扎玛斯 16 号”绝密项目。几件现实事件震撼并改变了他的命运。氢弹试验基地是由政治苦役犯建造的，他们后来被残忍地处决了；1957 年底在乌拉尔核废料处理场发生恶性爆炸，数千人死于非命；1958 年 11 月苏共中央决定恢复核实验，萨哈罗夫第一个发出抗议；1960 年 10 月，为苏美首脑峰会，苏共中央决定向月球发射火箭，造成现场涅杰林元帅和许多火箭技术专家全部丧生。萨哈罗夫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他从此把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freedom,truth）作为自己追求的三个目标。

1964 年，萨哈罗夫联合了 24 名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致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警告”他停止为暴君斯大林恢复名誉。

1968 年，萨哈罗夫“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分子的自由”一文在《纽约时报》发表，被称为继恰达耶夫 1830 年发表《哲学书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漫长历史黑夜中又一声警钟，“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主、多元、人道社会的思想。该文很快传遍全球，复印数达 1800 万份。

正隐身在梁赞市附近一座寒冷农舍里创作长篇小说《1914 年 8 月》的索尔仁尼琴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叹道：萨哈罗夫是唯利是图、绳营狗苟的苏联社会中的“一个奇迹”。

这一年，钱学森正式受命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器。

我不知道苏联发生的变化可曾为钱先生知悉。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至少是钱的苏联同行。促使萨哈罗夫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些不幸而荒谬的悲剧是否也在钱学森的视野中发生。如果也曾发生，那么他的态度难道没有丝毫改变吗？

在苏联这样一个绝对主义社会和极权主义国家里，大俄罗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成一种远远超过历代沙皇不敢奢望的自豪和狂热。1979 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各阶层人民和知识界出现空前狂热的爱国主义浪潮。萨哈罗夫通过国际媒体，率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在爱国者掀起的汪洋大海上，他的抗议几乎被吞没得无影无踪。人们称他为“叛徒”、“犹大”、“藏在苏联社会阴暗角落里的老鼠”。

普希金、恰达耶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宾、肖斯塔科维奇、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们是清醒、诚挚、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大俄罗斯主义始终不能阻挡他们挺身反抗俄国丑陋、野蛮、冥顽不化的专制统治和蒙昧状态。谴责奴役、欺骗和残忍，坚持对自由、慈悲、宽容和精神解放的渴望，两百年来一直是俄罗斯高尚爱国主义的灵魂。萨哈罗夫是二十世纪新斯大林主义统治时期真正爱国主义的英勇代表之一，戈尔巴乔夫的评价绝非过誉。

我从网上下载了钱学森生平简介。在萨哈罗夫与苏联极权主义决裂以后十数年间，钱学森成为中国火箭导弹和热核武器最显赫的领军人物。1970 年 5 月 1 日，钱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那时傅雷、老舍、吴晗和大量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含冤而殁，中国 20 世纪最圣洁的英豪林昭已被残害……。我不知道钱被毛那双沾满中国人鲜血的软手握住时，有何种感受。他当然不会知道，就在那座城楼上，毛泽东与林彪的仇恨已经公开化。

在这段时间，萨哈罗夫公开对苏联内政外交发表了独立而深刻的评论。钱学森没有对中国更加黑暗危殆的社会问题发表只言片语。中国人民和知识界的苦难似乎完全在这位聪明世故的“科学天才”的视野之外。用职业特殊性为其开脱是不能成立的，萨哈罗夫的存在如山一般严峻，在大洋彼岸，人们不会忘记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大科学家。

萨哈罗夫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命运对他的合理回馈。

他被苏联科学院开除，褫夺公职。1980 年，他与妻子被押解到高尔基城，监视居住，与世隔绝。长达六年。其间，萨哈罗夫两次绝食抗议，密秘警察强行灌食。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长达 1000 页的自传复写三遍，前两次都不翼而飞

了。

在高尔基城，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与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搀扶而行，手上提着沉甸甸的布袋，里面装着一经发表就会让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远处，永远跟随着几名克格勃人员。

这是 20 世纪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一名本来可以以其忠顺的服务让世界颤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库掌门人，却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在两千多个日子里只有爱妻相守。

命运并非如此寡情。

1975 年 6 月，萨哈罗夫完成《论国家与世界》一书。

34 年前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写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行，对于我国人民，包括党国领导层，也包括钱学森这样几十年间似乎没有机会更新自己历史常识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鉴于萨哈罗夫的卓识产生于与中国高度同质的社会中，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知识界，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爱因斯坦的睿智更富于启示性。不可能在一篇即兴文字中引用太多——它已经够长了，但是萨哈罗夫的见解实在太深刻，它们似乎是对我们的直接陈述，我必须征引其中若干段落，——这样的段落其实比比皆是：

成千上万生气勃勃和看来是安于天命的人在矗立于莫斯科空际的、漂亮的新阿尔巴特摩天大楼脚下来来往往；但是，在这一堵面墙后边，隐藏着旁观者难以了解的许多事实，隐藏着众多人间的不幸、艰难、凶暴、残忍、极度疲惫和麻木不仁，凡此种种积累了数十年，损害着社会的基础。在国内有许许多多不幸的、命运不济的人：领取微薄退休金的退休老人；生活坎坷者，他们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机会学习，或者没有适当的（甚至是按照我们的低标准而言）住房；不能得到治疗的慢性病患者；无数酗酒、腐化堕落者；150 万永远被抛出正常生活的囚徒，他们是司法机器的牺牲品，这些司法机器是盲目的、经常不公平的、出击灵魂的、投靠当局和地方帮派势力的；一些纯粹因不善于及时行贿而倒霉的人。对于所有这些人实际上无法给与帮助，而且也很少有人打算这样做，因为，总的环境是：大多数居民为糊口而劳碌奔波，少数人脑满肠肥，安于故步自封，社会结构则是装装门面而效果很差。绝望的人们包括高级机关的接待室，其中特别令人嫌忌者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十分喜爱祖国的大自然和文化、以及祖国的人们，我绝对不想当“抹黑者”的角色。可是，现在我认为必

须集中注意那些被苏联宣传和亲苏宣传所掩盖的不良特征，它对于国际关系以及国外对我国情况的了解具有原则性意义。

当前的苏联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它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

全盘的国家垄断，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必将转为不自由和被迫遵从，因为每个人都要完全依从国家。在危机时期，不自由造成恐怖，而在比较安定时期，不自由则造成无能官僚的统治、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

全世界应该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无边苦难，31 年前，他们是罪恶驱逐出境措施的牺牲者，当时有半数的孩子和老人死于冻饿，而现在依旧无权返回那等待着他们热爱劳动的双手去劳动的克里米亚故土。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迈斯赫地区的土耳其人的命运同样如此。

外国客人们有时提问说：如果你们这里确实有这许多缺点，老百姓不设法纠正吗？这个问题三言两语道不清。制度稳定性的因素之一在于物质生活水平毕竟在提高，虽然提得缓慢。每个人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活同远不可及的巴黎作比较，而是和自己贫困的过去相比。但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制度内在的稳固性在于恐惧感和消极感的惯性作用。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没有在一代时间蒙受过如此无比的苦难。我们的工人不是英国的工人，甚至也不是那些贫困了可以上街的波兰码头工人。虽然广播扩音器每天在提醒普通苏联公民，说他是国家的主人。但他十分了解，真正的主人是那些：他们早晨和晚间坐在黑色保险轿车里，沿着寂静的、交通遮断的街道飞驰而过。他没有忘记，他的祖父的土地是怎样被没收的。他知道，今天他个人的命运也完全依靠国家，依靠身旁和远处的领导，依靠房屋管理委员会主席，依靠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可以安排、也可以不安排他的孩子进幼儿园），也可能还依靠在他身旁工作的克格勃告密者。在选举时，他投入票箱的选票上只有一致的姓名。他不能不体会到这种“没有选择的选举”在政治上给他以何等侮辱，不能不感觉到这种庄严的仪式里包含着对健全的理智和人类的嘲弄。人们训练他，他为了生活，也接受训练。他自我欺骗。苏联公民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产物，暂时也是这个社会的支柱。我只能祈求命运，希望在摆脱这种历史性绝境时不要产生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巨大激荡。所以我是一个进化论者，一个改良主义者。

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划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仪式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把事业、健全心智和人类尊严等一切意念都排挤到次要地位。作家、艺术家、演员、教师以及人文学者在如此可怕的思想压制下生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完全消失。

思想一元化、排斥异己，加上冷酷的（虽然不是合乎理性的）政治现实，导致对持不同政见者不断进行迫害。看来，在苏联有 2,000 至 10,000 人可以称为政治犯。这个数字不包括因其宗教信仰而遭殃的人，他们的人数当然更多。也应该预先说明，我们的报导可以说是很不完全的。一切政治犯按现行法典都算是刑事犯，在我们这里不存在政治犯的单独地位，政治犯和其他类犯人（经常也是无辜的犯人）同受生活的苦难和侮辱，其卑劣性质是我们时代所不容的。试图泄露犯人囚禁生活的细节是会遭到残酷迫害的，这也就最好地证明了真相内幕。但毕竟有许多事是为人所知的：繁重的强迫劳动，经常是破坏了安全规章的；吃不饱肚的恶劣伙食，实际上又不能靠邮递和代交食物加以改善，邮递和代交食物是严加限制的（我们看到，甚至在判决前的羁押期间也存在这类限制），严格限制接见、通信和读书；任意施加残酷处罚。政治犯为自身人权而作的斗争（近来人们听到许多英勇的罢工和绝食事件）照例只是造成新的迫害。

索尔仁尼琴、夏拉莫夫、金兹伯格、德耶科夫、奥列茨卡和其他数百名见证者和研究者描述过那灭绝两千多万人的古拉格群岛骇人听闻的制度，苏联监狱制度就带有古拉格群岛制度的许多特征。

苏联政治犯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犯任何罪行（就民主国家对罪行两字的解释而言），没有从事暴力行动，也没有号召从事暴力行动。政治迫害的通常原因之一是阅读、保存和向友人传递一些被认为内容不妥的（虽然经常是实际全然无害的）自发性手抄刊物和书籍。在这类成为被捕和定罪原因的书籍目录（不存在任何禁书“目录”，但每个人应该自己捉摸）里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贝尔加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格罗斯曼的《往事俱逝》、本文作者写的《谈进步……》、阿夫特尔诺夫的《权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德热拉斯的一些书、康克维斯特的《巨

大的恐怖》以及《时事纪事》、《市民议会》、《立陶宛天主教会新闻》和其它许许多多自发性刊物。

在因信仰而受难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信教者。宗教压迫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怕传统，但是，也许除在阿尔巴尼亚以外，很少有其它地方像在苏联一样，达到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早在20至30年代，一些最普通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蒙受打击，遭到重大牺牲。现在，这些宗教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和无权，以至于（至少在表面上）几乎成了国家的附属品。我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教徒的信仰和内心抗争的作用。

特别应该谈谈一些人的遭遇，他们被判刑是由于关心蒙冤者的命运，争取公开审讯和正义。受这类遭遇的人有苏联保卫人权创议会会员列奥尼得•勃留西，他在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精神病院遭受可怕的折磨，近似精神谋杀；有布科夫斯基和格鲁兹曼，他们因揭露精神病疗法的迫害情况而分别被判处七年徒刑；有不久前被捕的安德列•德维尔道赫列波夫和谢尔盖•柯瓦廖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事实上，正是这些人进行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民主运动”的工作，压迫和崇高的信念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决心听从良知和信念的召唤。尽管这些人为数甚少，基本上集中在国内的两三个大城市，并且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他们在板结的苏联社会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道义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我确信，保护苏联政治犯和共他持不同政见者，为争取监狱中人道待遇以及争取人权而进行斗争，这些不仅是全世界正直人士的道义责任，而且是直接保卫了正直人士自己国家里的人权。

我和本文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从来不认识这些人，但他们的遭遇不能不令人震惊，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囚徒的、以及我们时代里的那个不幸的赫斯的遭遇。我提到赫斯，虽然我知道他曾参加与建立罪恶的纳粹制度。但是，终身监禁几乎等同于死刑，我是根本反对死刑的，不管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如何。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思想家——他们中间有贝卡里亚、雨果、托尔斯泰——曾经坚决呼吁废除死刑这种不道德的、不人道的和有害的制度。近年来，死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已被废除，但在苏联，这一步骤被认为是“不适时的”，于是每年都根据多种罪名——从情节严重的凶杀到“大规模盗窃国家资财”、遭禁的外币交换以及其他为西方法律所不熟悉的理由——枪决7000至1,000（按我的粗略估计）。

拯救国家，在于国家和全世界的相互影响，而不拯救全人类，是不可能拯救国家的。必须进行触及一切生活面的民主改革；国家的未来在于转向进步、科学、恢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不能仅仅依靠宗教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或者卢梭精神的某种传统意念来限制这种恢复的途径。谁也不该设想迅速彻底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大家要学会耐心和容忍，但要把耐心、容忍和思想的大胆和坚持不渝结合起来，可不该号召我们的人、我们的青年去牺牲；在我们国家里，人们完全依赖于国家，国家不呛气地吞噬每个人，至于谈到牺牲，为数已经是够多的了。

制度的内在特点在对外政策表现上造成了重大后果。我将在以后各章中谈到此点。现在我只是着重指出若干情况：首先是社会的闭塞和极权主义的、脱离现实的领导作风，领导可以秘密作出决定，事先不经任何公开讨论，他们可以毫无控制地动用资金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活动。还有十分重要的是，我国和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包括秘密和公开的外交、商业、科学、宣传方面的关系，都可以由唯一的计划、唯一的意志任意加以控制。所有这些特点使苏联对外政策带有特别的素质——十分多变、实用主义的无原则性，它们表现在，比如，大量供应苏制武器支持乌干达的阿明、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残暴制度，支持尼日利亚的种族残杀，支持伊拉克的库尔特族人以及利用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政治仇恨以扩大影响。这些特别的素质使苏联政府在必要时就轻易地破坏任何协议，能在其他国家搞秘密破坏活动，包括收买、欺骗、讹诈、组织“第五纵队”。当然，这些特点给全人类、给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书面增添了危险，加剧了挑衅。

我经常不自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几乎是一种羞惭的滋味。我做对了没有？我想到那些不可胜数的人们，他们从事显然直接有效的工作——种麦子和甜菜，建房屋、桥梁和制造汽车，治疗儿童和补牙齿，写诗和在实验室工作——他们自忖对人们是有用的，并且向往着个人的幸福。不，我没有背叛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没有给他们的劳动和幻想抹黑，也没有背叛我自己以及自己的希望（这种自我背叛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也许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才具不足，对于完成命运托付给我的这项任务来说，智慧不足，缺乏概括力、观察力和生活知识。但如果我的内心是诚实的，那么，我就没有必要非难自己，而我的工作，正像任何其他劳动者的工作一样，也定然会是有效的。

也许我已经偏题了。钱学森的去世本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是第一，他老先生的

资料实在太有限，我只知道几代党国要人都曾接见和看望过他。而按我的标准，对无论是中国儒家士大夫或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恩宠和待遇都与他们的道德文章无关；第二，萨哈罗夫的一生拥有古希腊悲剧英雄人物和基督教圣徒的双重灵光，尽管他既不崇拜希腊英雄也不是宗教徒。最后，借题发挥本是一种文体，它们正是我郁积心中早就想吐露的心绪。在此意义上，钱学森之死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我应对此表示感谢。

1975 年 10 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和平奖授于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该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夫人在演说中强调，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和个人，该委员会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方便妥协或其他机会主义的支配。她称，授予“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之一”萨哈罗夫是该奖的一大荣誉。“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地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萨哈罗夫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她介绍说，萨哈罗夫 32 岁就入选苏联科学院，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三次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8 年萨哈罗夫由对苏联当局的失望而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该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宣言”：《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分子与自由》，他意识到地球上的文明毁灭的威胁，那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以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合作才能避免。他相信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为此苏联必需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反官僚主义和社会改革。

1970 年，萨哈罗夫和其他苏联知名人士建立了“人权委员会”，要求当局废除秘密审判，制定新闻法，保障人民获得资讯的自由，改革监狱制度，大赦政治犯，废除死刑，开放边界。1970 年 8 月 1 日 34 个国家（包括苏联）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重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宣布鼓励和促进“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对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家可以任何借口压制和逃避这些条款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义务。那样做的话，就是对人类与和平的背叛。

这些条款精神显然包含和吸收了萨哈罗夫的思想。

丽安丝夫人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这些价值观念，正是赫尔辛基条约的基本原则”。萨哈罗夫为和平、为裁军、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奋斗，是将和平作为最终目的，由于他在唤醒每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上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他 1975 年诺贝尔和平奖来表示敬意”。

应该就诺贝尔和平奖说几句话。

这项奖已经颁发了 109 年。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大战的威胁与危机都没有中断它不屈不挠的历程。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获奖者都名符其实和无可争议，但占相当比重的获奖者，确实是人类文明天空中闪耀的明星，是人类苦难而伟大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推动者和开拓者，是灵性、觉悟、真理、自由、美丽、善良、希望、信仰和爱的托命者，也是世界苦难、不幸、罪恶、暴行、不义的承受者和反抗者。

1949 年产生的这个中国，迄今为止与这个奖项无缘。这与我们 5000 年伟大文明和古老传统，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最大生命群体，与我们巨大的苦难与牺牲，与近三十多年间依靠数以亿计的农民苦力的血汗劳动、5000 万海外华人真实不虚的爱国义举，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尤其苏共极权制度解体、冷战结束（萨哈罗夫有特殊的重大贡献）、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与不久前上演的“建国 60 周年”的宏大叙事是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不相称，不匹配，不平衡。

公允而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对苏联和中国奉行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双重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阻遏苏联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蔓延扩张，是威尔逊、邱吉尔等西方政治家最庄严最重要的世界战略，而戴高乐、尼克松等欧美政客始终执行善待中国的政策。几乎所有西方思想家都厌恶、否定俄国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却对中华文明向来不吝赞许之辞。

据说钱学森去世前曾向温家宝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问题”。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应当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吧。

萨哈罗夫是苏联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从共产党的阶级观看，基本纯正可靠。他却仅仅因为良知、正义感和对真理的信念而遭受厄难。

钱学森是"旧中国"培养的"旧知识分子"，取了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之女为妻。顺便提一句，当年美国当局录用钱，绝不仅仅因为他年轻聪明（这世上聪明的年轻人太多了），而是因为钱是美国政府庚子赔款经费支助的留美学生。更重要的是，美中两国是并肩抗击法西斯的盟国关系。如果钱真有共党嫌疑，在美苏冷战初期最激烈争夺胜负的核武器领域，美国有关机构解除其工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事实上，1946 年，中共安全情报负责人康生就开始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招募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而康生曾长期在苏联受训，一度直接听命于贝利亚。谁都知道，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不是公开宣布在苏美两大世界阵营中，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头，那就是苏联、斯大林，毛泽东不是宣布绝不骑墙，绝不走中间道路，中国共产党只能"一边倒"吗？如果钱是中共党员，在斯大林还有好几年才去世、中苏两党还需要十年时间才反目成仇时，岂不是在美国最重要的军事机构里直接为苏联培养人才吗？

因此，与萨哈罗夫相比，钱学森的国际背景、个人经历和服务宗旨显然更加复杂。至少可以说，钱学森的选择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其实抗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在百废待兴、内战硝烟升腾的窘境中，就把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等青年学生送往美国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深造。他们不是也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了吗？以几千年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经验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中国人确实享有某种优势。我的结论是，没有钱学森，也有其他人会填补上他的位置，那是毛泽东一代中共领袖的国家和世界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耗费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何况，1955 年 11 月二钱（钱学森、钱伟长，后者在 1987 年由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的反右运动 30 周年纪念会议一事中，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领衔组建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时，中苏尚在"蜜月期"。沃尔比约夫、古谢夫、尼古拉耶夫、加夫里洛夫、萨韦利耶夫等苏联专家还在大量培训中国人员。二钱的高升，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招致赫鲁晓夫反感从而开始现出中苏裂隙有关。在毛看来，苏共 20 大以后中苏两国将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因而必须另起炉灶。没有这一背景，在美国呆了二十年的钱学森们不可能被迅速受到青睐，即使他们早已是中共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

1971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 18 周年良日，萨哈罗夫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政治迫害、公开性、信息交换自由、信仰自由、民族问题、边境开

放、国际关系和若干内务外交政策等阐述了看法。最后指出：我国面临的问题与 20 世纪整个世界危机密切相关。这些危机是国际安全危机，社会发展失去稳定、意识形态陷于绝境、对理想感到失望、民族主义和非人道化的危险。萨哈罗夫特别强调，基于苏联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建设性地、谨慎地、灵活而又果断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全人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个月后，在没有得到回复后（在斯大林－毛泽东式国家中，像这样真正富于责任感、建设性和启发意义的信函，几乎没有回复的可能。这种国家的统治者似乎已经忘记了礼尚往来之道。抑或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这类信函根本不能送达。不管怎样，新统治者不提供辩论可能，也拒绝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萨哈罗夫在国外把它作为公开信发表，并追加了一篇“后记”。再次表明自己的心迹：“我在认识到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和大气层试验热核武器的罪恶性质之后，约于 10－12 年前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此后他在苏联发起了一场履行赫尔辛基协议有关系款的人权运动。

关于“运动”，萨哈罗夫特别辨析说，不应该引起关于任何组织或团体、甚至于党派的想法。仅仅是通过某种共同行动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现象。至于他自己，“任何时候也未扮演思想家或者领导者的角色；每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所反映的仅仅是对某些使我激动的问题的个人意见。”

说得多好！没有人会怀疑萨哈罗夫的勇气。对于他而言，道德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理性、逻辑、分析和判断的准确以及现实条件可能达致的限度，对萨哈罗夫这样科学家出身、在世界上最强大最神秘的核武器制造中心机构工作多年的物理学家，极为重要，是他的重大责任和职业荣誉。

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他不仅代表了苏联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良知高度，而且表达了苏联社会自我变革的本质要求；使他不仅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普遍支持与世界和平人士的共同关切，而且对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导人发生了罕见的积极影响。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的政治报告号召准备打核大战。苏联军方鹰派人物制定对华“核外科手术打击”时，萨哈罗夫是最早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与索尔仁尼琴一样，深切同情“处于牢固的，一点也不比我们轻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中国人民。但是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作战，将是一场启示录式的梦魇。俄国在一战中损失了 1500 万人，二战中损失了 3000 万人，如果同中国打仗，将损失 6000 万人，“这

样的战争后，俄国人在宇宙中将不再存亡”。

这里我要引用索尔仁尼琴的有关观点。他在 1973 年 9 月 5 日《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专门谈到“与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如果中苏之间开战，将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荒诞最可怕的一次。交战双方都将举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为了保卫列宁著作中第 533 页上的神圣真理，而不是敌对一方所认为的第 335 页，将有 6000 万俄国人和十倍于此的中国人死去。他称，俄国头脑清楚的人士已经“毫无成见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如果它现在继续吹向东方，那么就让它吹吧！（这并不是说，他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他相信，我们的人民将治愈这种病，而中国人也会如此。——他希望不要太迟，要尽快地挽救我们的国家和保护人类。但是，经受过太多苦难的我们，目前只关心挽救我们的人民就已经足够了。

作为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看得更远。如果开战，苏联强大的核力量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中国还很有限的核武库。苏联核专家们对于它们太熟悉了，所有的基地、准备都曾是他们直接领导的工作对象。但是，后果不堪设想，第一，苏联会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战争罪人；第二，中国可能向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苏联远东城市投放核武器，那将造成东北亚和日本的极大恐慌；第三，核打击造成的放射性毒气将弥漫大气层，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第四，美国会容忍苏联使用核武器以解决政治冲突、哪怕是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吗？

从 1968 年与苏共核工业决裂以来，萨哈罗夫念兹在兹的就是两大问题：每个人的权利、尊严、生命的不受侵害，防止人类坠入共同毁灭。他在与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的谈话中预言，美国决不会坐视苏联与中国之间的核战争。他在精神和价值观上了解美国，“这个伟大的自由新大陆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维护世界和平，遏制任何可能的核冲突。”苏联强硬派有种论调，毕竟苏联与美国都属白种人为主的国度，而且有某种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美国人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何况中共头子毛泽东是那样一个热衷于暴力和战争、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认为，苏联解除中国的核武装，是美国想做而不能做不敢做的一件天大好事，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苏联后贝加尔军区司令扎哈罗夫元帅撰文，称 1945 年发生在远东的两事事件共同导致了日本的投降，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领的苏联远东军对日本关东军的“铁

筒般的围剿与粉碎”，以及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1969 年 8 月 18 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授命正式知会美国高层，征询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萨哈罗夫断然拒绝这些分析，他强调，“一旦开战，只有一种结局：万劫不复。”

1960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 1969 年的中苏核战争危机，是 20 世纪两次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它们最终未能酿成核浩劫，归根结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核阴云笼罩下的人类拒斥共同毁灭的意志占了上风。其中，萨哈罗夫这样与共产极权国家战争政策决裂的物理学家的良心力量，与爱因斯坦等西方物理学界的人道传统，成为最令世人信服和赞许的道义与理性因素。

我希望这两大传统也为中国科学界所认同并作为他们工作的指南。

苏联政府禁止萨哈罗夫前往奥斯陆领奖。丽安丝夫人对此“深感遗憾”，并将此与 1936 年希特勒政权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尔•奥西埃茨基领奖事相提前论。萨哈罗夫的妻子丽娜•波尼代表丈夫出席仪式，并代为致答辞。我把 1975 年 12 月 11 日，萨哈罗夫为纪念诺贝尔而发表的书面演讲附在本文后面，以表示对他的由衷景仰。

萨哈罗夫的人生原则是，绝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一句话，“不做臣民”。

他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不论在俄国还是全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他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也是中国知识界的道德矜式，是中国一切向往自由、尊严与人生及宇宙神圣的人们永远的精神先驱。

1986 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

与爱因斯坦一样，萨哈罗夫把他许多精力和时间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唤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按中国传统，这就是“求仁得仁”。

钱学森也发表了一些与其专业不相干的言论，除 1958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青年报》和《大众哲学》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类无稽之谈外，又对地理、教

育乃至沙、草产业和气功发表了与其“科学泰斗”身份太不相符的议论。

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钱认为将产生一场 21 世纪新科学革命，甚至比 20 世纪量子学和相对论还要伟大。我本人曾接触过严新、张洪堡等“大师”，我的印象是，在他们那些故弄玄虚的表演中毫无神奇，更无伟大可言。

钱学森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我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历史不会忘记，钱学森、何作庥等“科学家”曾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坚决站在专制当局一边。历史不会原谅，在一代青年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文明付出青春、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1989 年，钱学森站在刽子手和屠夫一边的纪录。

1937 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一名德国技术物理学家以扫出任纳粹物理学会主席。他向戈林、希姆莱等纳粹头目证明，物理学及其教学和基础研究，是战争事业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建议说，一切不利于德国最高战略利益的知识分子和理论，都应加以清除和驱逐。

在我们时代，一直站在自由、人道主义和多元共存对立面的科学界人物，钱学森算是他们的代表。应该以某种特殊的人道关怀提请那些丧失独立立场的“科学工作者”，注意和检点自己的选择，慎重思考自己的责任。

现在，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去见他的祖宗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了。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1929 年，恩格斯的弟子和秘书爱德华•伯恩斯坦将其《自然辩证法》手稿送给爱因斯坦过目。一名斯大林主义者霍耳登在为该书英译本所作的导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经典理论具有神奇的功效，他本人曾经用阅读列宁格勒《哲学笔记》的方法治愈了多年胃病（这篇导言因此传遍欧美两大陆，当然引起了嘻笑：俄国人太幽默了!）。

爱因斯坦浏览了恩格斯那本书后对人说，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又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斯特鲁伊克暗示说，爱因斯坦刚刚看了几页《自然辩证法》，就被其重大价值所吸引。1940 年 6 月 17 日，爱因斯坦就此回复说：爱德华•伯恩斯坦把全部手稿交给我使用。我的评语是指整个手稿而言的。我坚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够看到，在这样长的时间后，他所作的谦逊的努力竟被认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

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阿谀奉承都深恶痛绝。一些中国人如毛泽东之流，声称死后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这又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列宁去敲天堂之门，看门的保罗问他找谁，答曰求见马克思，又问是他什么人，再答曰“马克思的利息”。又据悉，马克思在门那边听到了，当着保罗的面转身走了。毛泽东们如果早早知道了这个小故事，他们大概会萌发一点自知之明，不再提“报到”事宜。

认祖归宗，是中国每一个农民和小民无需灌输的信条。伟光大的毛和聪明绝顶的钱活到耄耋之年怎么就非要认一名 19 世纪的德国人为祖宗呢？何况人家并不领情。

赵越胜先生近日有《辅成先生》问世，可字读。

周辅成先生也活了 98 岁，他是“仁者寿”的典型。

我不知道钱学森属于那种类型。我相信，在他死后两天时间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写了这么些拉杂文字，并且把他与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并列，是过于抬举他了。

据悉，党国全部最高领导将前往参加钱学森追悼会，他的最后头衔变成“同志”。谁也不能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祭奠任何人。我要告诫的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一名终身参予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导致世界毁灭的人举行“国葬”。这是极端危险的动向，请当局慎思明断，更愿同胞们洞察警惕。

和平、进步、人权

纪念诺贝尔演说

A·萨哈罗夫

（1975 年 12 月 11 日）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 1968 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

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

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 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 60 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

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

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 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

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 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 5000 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 60 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 30 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

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

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

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完

同年 12 月 10 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他們的悲劇，我們的宿命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匈牙利在哭喊！——1956年匈牙利起义》译序

1989年后，职褫家弃，借助大学参加比赛获奖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时代出版社1965年版），译完此书。是年，个人与国家一起遭逢大变故，视野里筛除了不少捞什子，滤进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苏俄与东欧诸国突然接近了，那里上演的历史悲喜剧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年由英国Butter和Tanner有限公司出版、美国国会出版目录资料丛书收藏的《匈牙利在哭喊!》摄影文集也许是迄今为止那次悲剧最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研究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冷战、尤其东欧诸国半个世纪中历史演变的珍贵史料，应当说，还是20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域外因素，中国1989年悲剧的一个惊人的预兆。

该摄影集由英国作家、记者理格•加德尼编辑，由BBC电视台驻东欧首席撰稿人乔治•麦克思作序，所收摄影作品由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留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所摄；此外，我又从其它渠道觅得有关照片若干，于是归类合并，共计250余幅。

影集以时间为序，从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4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1956年月10月那13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

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11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 年 11 月 4 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0 月底，苏彝士运河危机爆发，法共作家萨特发表《我弹劾》，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演说，法共历史学家罗兰发表《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东西方人士对波匈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纷纷发表看法。从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7 年 1 月 7 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训说，1956 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 20 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到 1957 年 5 月，毛泽东变“引蚂蚁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 1957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考虑到主要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二十世纪中国，本在续行玄奘旧路，往更远的西方取经，只是心情更危迫，经历更艰险，后果迥然大异。正当中国欲与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西方接近时，欧洲却自相残杀起来，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苏俄共产极权祸水，间接截断了中国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终演绎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宿命，——俄国反西方反现代的革命，阻遏并劫持了中国，真理、希望和救

赎之于中国，被限于苏俄帝国的势力范围及其历史经验之内，最终凝固在斯大林主义历史僵尸上。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 500 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 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 1956 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 1956 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1989 年 7 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10 月 26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1993 年、2006 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义责任”。

1958 年 6 月 14 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纳吉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

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 年 11 月 1 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 1956 年匈牙利事变以来 32 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从 1956 年匈牙利事变到 1989 年“六•四”事件，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异己力量手中，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内部异族统治，一直构成当代中国铁一般的最深“潜规则”。

对中国的劫数已经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术题：俄国革命比中国革命早发生 32 年，斯大林比毛泽东早死 23 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门事件早爆发 33 年；苏俄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义，煎熬了 45 年，匈牙利人民为纳吉“平反昭雪”，挣扎了 32 年，……。历史对中国异常苛刻，但并没有完全离谱。我们本来是迟来者，这种身份所固有的全部无奈，我们一分也少不了。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剧连续剧，一条轨迹清晰的地理分界线一直在由西向东延伸，直到最后的高潮出现，或者嘎然中断。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但历史宿命却是可以被戡破、被超逾的。

马扎尔人曾有匈奴的血缘传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埋葬了汉民族的精魂，而且给俄罗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诸国带去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的野蛮奴役，斯大林主义分明染有鞑靼主义的血统，匈牙利悲剧也闪烁着蒙古铁骑的寒光。这个历史联想启示我们，一切悲剧都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1975 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 年后，“中国的纳

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应该承认，从1956年到1989年，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义50周年，中国反右运动5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们开始以“十”为单位来量度自己的命运，已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与对苦难根源的体认之间，还是如此不成比例。苦难和罪行本身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之中，不足为奇。要紧的是，与俄罗斯、匈牙利人同属天地间唯一的高级灵性物种，蒙受了同样性质和更大规模的不幸和悲剧的我们，却始终缺少辩认苦难和罪行的能力，我们也就始终不能学会担戴苦难、战胜罪行的本事。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15年前翻译此书时，未曾想到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开出版的一天，不过冥冥中也不想摆脱一个念头：既是历史上一段真实事件，中国人曾以诡谲的方式卷入然后又深罹其害，中国人自然有义务和权利真实地了解它。在四海为家的岁月里，偶尔翻检一番，每每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受：我们在时间上所受本国传统的影响，日益远去，而在空间上遭逢异域事件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外来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种吊诡的形态进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大难就要临头了。我至今无法理喻其中的宿命意味。

曾托人设法联系原出版机构，都不成功。两名西方记者当年进入布达佩斯，冒险拍摄除了专业习惯外，其动机显然出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对极权主义的厌恶。事实上，这两种高尚品质贯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决定置版权一类正当权益于不顾，让它早一天成为我的中国同胞的正式读物。至于我自己，除了感谢命运的赐予外，无所私利可言。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英文水平，译文错讹不少，尚需专家指正。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北明以其富于感染力的译文，为本书平添了可以触摸的历史感。谨致谢意！

王康2007年3月24日

七八一届，归去来兮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为三十年同窗缘份而作

王康

逝者如斯，三十春秋如烟消散。

茫茫人海，漠漠尘寰，一朝同窗，终身结缘。“大同学”已逾花甲而奔古稀，小同学也辞不惑以赴天命。忽焉有所思，东方须臾高知之：母校无言，任桃李芬菲复凋零，只将当年风景收藏，冥冥中偶叩天籁之问，纵枝冠参天，敢不思井源？抑浪迹天涯，此地为你驿站独留。

缙云萧森风雅颂，嘉陵沉潜元明清。嗟感诸先生，劫波度尽而草心不泯，书生老去还杏坛重登。苦心孤诣，布衣飘拂舌犹在；春风秋雨，诗书漫卷情弥切。辟九畹兰桂齐芳，扫八荒良莠无别。发微钩沉，掘洙泗河润之深广；金声玉振，摇木铎天庭之浩大。有泰山仰行，受夫子真传，莘莘门生何幸。

一号楼前，管弦几度悠扬；桂园旧影，或可幽然一会？林荫匝地，所携尽在先秦诸子；图书馆里，伏案遍寻唐宋八家。萧晨雨昏，默念犹追屈子之悲；青灯黄卷，命笔曾辩托翁之忏。春花秋月无时赏，东篱把酒独凭栏。偌大西师，爝火不见如椽之笔；堂皇大学，传薪终成栋梁之材。寒暑四载，于焉有成，空前绝后，七八一届。

以上半文，以下半白。

无论你时下功成名就还是凄凉落拓，一脸沧桑至于贫病交迫，还是驻颜有术越发雍容华贵；无论你儿孙满堂尽享养怡之福，还是家破人去形影相吊，僻居边陲故园长守，还是远涉重洋乔迁异域，都请暂且放下你的忙碌、闲适、自得、失意，放下你的公务、私事、股票、旅次，带上你的老故事，捎上你的一帘幽梦，揣上你的旧船票。说什么穷达蹶顺，分什么一、二、三班，管什么爱恨情仇，载欣载奔，归去来兮。

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

于抗战陪都重庆

我们的精神坎陷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1933 年 3 月 10 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焚书是一件特别重大的精神暴行，当一个新政权用焚书行为向世界宣战时，它行将带来的，要么是一个千秋帝国，要么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狂妄，由于对犹太民族的过度残忍以至招致战争和道义的失利，第三帝国很可能如其缔造者构想的那样，代表着德国的某种复兴，一直存活到现在。

1946 年，83 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德国的未来应该诞生于重新倾听和诵读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重新欣赏和凝视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当德国重新沉浸在这些灵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时，才会在山河破碎

和历史浩劫之余，“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消殒的力量。”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此乃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将近百万知识精英加以诱害，加以公开践踏。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焚书坑儒”，——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次事件，其用心之险恶阴毒，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景仰道德、服膺气节的国度，其在精神上的沦丧和毒化，不啻抽掉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严重的是，这场以知识界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与精神围剿的恶例，诱迫部分国人——最终几乎全体民众——参与从兹开始长达几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天然母体不复存在，又使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中国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从此开始。

不到十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大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统绪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其为害之烈，恐非鸦片战争以来外族列强加于中国的直接伤害所可比拟。一种内部的异族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李慎之）这些明达之士直接面对的是肉身的凌辱、人格的摧残。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三千年来从未遭受如此深巨惨烈的奇耻大辱。相比之下，当年纳粹德国还有并未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家理查德•斯特劳斯、剧作家霍普特曼、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席之地，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纳粹科学院将爱因斯坦公开“开除”时，可以同样公开为后者辩护而不受任何惩罚：“爱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

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文化大革命”对人本身的进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见绌。中国先哲深谙文明的脆弱，他们坚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乃是“人禽之辨”，因为人与禽兽之间只存“几希”之距。对中国人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文革”就是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亡天下”，彻底的礼崩乐坏。

经历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一名普鲁士哲学家、一名英国工厂主、一名俄罗斯职业革命家和一名格鲁吉亚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还被尊奉为中国人的国家原则，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全部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立于天地之际的风范、衿式、气象和神韵仅仅作为我们精神坎陷的虚饰缀物，继续历史性得外化于民族生命，仅仅从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绝境上升到了可资利用的地位。以至张艺谋一类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导演，在向“焚书坑儒”始作俑者献媚后，又率领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员，在雅典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艺术盛典后，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称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作，我们精神的坎陷可见一斑了。

勿需细论，只要把奥运奖牌的飚升和诺贝尔奖的继续缺失相比较，只要把中国 GDP 总量与死刑总量相比较，当可看出，中国确实更加强大了，甚至太强大了，——在物质上；中国也更加贫困了，也许太贫困了，——在精神上。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

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中国现代精神先贤祠中的旷世才子和悲剧英雄陈寅恪，虽早已深味“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一绝世悲情，虽然曾写下千载之后也必令人唏嘘长叹的绝命挽联：“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但这位中国学术精神“百年来第一人”仍然生死坚称：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坚信：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厦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两名盖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钱钟书、李慎之与当年熊十力、陈寅恪一样，寂寞而通达地撒手尘寰。虽然迭经磨难，他们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迹和赤诚的期盼。前者拒绝一切来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之前早已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后者更以一位“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的“希望与信念”反复寄语国人：“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合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正是中国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赎、自作主宰必经的荆棘之途。令人深心抑郁痛惜的是，尽管他们是中国真正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他们之于中国正如康德、歌德之于德国，他们作为中国良知、勇气和智慧的真正代表一再发出的告诫和预言是中国真正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泣血福音，这个浮嚣、虚骄而危殆的时代对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死亡却置若罔闻，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度，寻常的错乱、混沌、危机皆不足畏，中国在二十世纪历经

的磨难与浩劫，使我们几乎能承载和抵御一切普世困厄。但是，如果中国一味罔顾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继续沉迷于内部异族精神统治，找不到争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凭自己在物质扩张和精神坎陷严重失衡的歧路上渐行渐远，始终不愿或不能迷途知返，那么“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恐怕将在萧墙之内酿成弥天大祸。

西谚道，上帝欲让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9•11”恐怖悲剧中中国年轻一代（我们的精神继承人）令世界震惊、令我们失语的狂欢表演，已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继续任凭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泛滥，任凭我们的精神坎陷日益深巨，从 1957 年到 1976 年的邪恶而荒诞的历史纪录，将被并未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虚空化的年轻一代大大刷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将不过是低调的序幕和无聊的预演。

在爱因斯坦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后十几天，普鲁士科学院公开谴责爱因斯坦“不仅成为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该科学院指出，爱因斯坦本来可以“为德国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对此回答道：“要我去做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放弃我终身信守的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象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念和原则。”历史已证明，是孤独却以复兴祖国历史文化为己任的爱因斯坦，而不是德国内部强悍而狂妄的“异族统治力量”，为德国赢得了新生和未来。

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天，曾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最后一次签名。作为一名对自然奥秘和人性底蕴都有先知般洞察力的世界主义者，爱氏的临终遗言是留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类的：

知道得最多的人，也最忧心忡忡。

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吧。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一錢不值、使我厭惡的東西”

編者按：本文原為李達五著作《文革造神運動史略》一書的序。時逢文革發動四十周年，這書上個月（2006 年 6 月）末在大陸出版發行。上市不到一周，出版社接獲上方查封禁令。除了書本身內容犯禁，勿庸置疑，序言的內容一針見血更位官方不能見容。即使序言論述方法上的保守主義、君子之道（朱熹：“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也不能幸免。現在，除了出版後數日間僥幸流入市面的少量書籍，本書內容一時半會無法面世。於是本篇序言遠走他鄉，流落海外了。此文原載《民主中國》，發表前作者做了少許充實刪改。

——————————————————————————

我們兩人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288—289 頁

不用再作任何詮釋，馬克思對一切“歌功頌德”和“迷信權威”的態度不會使任何人產生任何歧義：厭惡、摒棄、一錢不值。

事實上，馬克思與第一國際之間一直保持著這種帶有私人性質、卻被馬克思當作“前提條件”的“契約”關系。在整個晚年中，誰要對他阿諛奉承，馬克思總會無法克制地“大發雷霆”。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無可爭辯地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袖，但他絲毫沒有一種遲來的滿足感。相反，他認為，人們所給予他的巨大榮譽，是他當之有愧的。整整十年中，每當有人用諂媚奉迎的眼光“玷污”他時，恩格斯就會對他最親近的人說，他“似乎回到了奴隸時代”。

事實上，馬克思這位十九世紀的天才人物及其思想，在對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同時，遭遇了同樣前所未有的曲解和利用。馬克思的追隨者也許不亞於耶穌，然而背叛後者的著名人物只有一個，而前者真正指認的信徒（至少在他生前）卻從來沒有超過一打。

事實上，馬克思本人在世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和運動已經蒙上了某種神聖教義的色彩，“馬克思教區”已經開始覆蓋整個西方，這裡的正統派和衛道士已經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新名教建立起一所無形的宗教裁判所。先後誕生於世的“紅色”主教、僧侶、審判官和異端都將這個中世紀之後最森嚴、最無情的裁判所裡各居其位，領受全然不同的命運。

事實上，馬克思生前就不止一次地、憤怒地與這個教區、這個裁判所劃清界限：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晚年馬克思早已馳名大西洋兩岸，他卻以不勝黯澹的心情借用黑格爾的感慨自況：“我的學生當中只有一個人理解我，可嘆的是，就連這個人也理解得不正確。”弗蘭茨•梅林就此評論道：毫無疑問，拉薩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追隨當中是最有天才的一個，然而他卻從來不曾充分地掌握他們的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

事實上，對於一定要把他那“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歷史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企圖，馬克思用罕見的惱怒和失望明確告誡說，“這會給我帶來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列寧去世後，布爾什維克們中間流傳著一則故事：列寧到了聖彼得把守的天堂門口，敲門求進。“你是什麼人”，聖彼得問，“我是馬克思‘資本’的私息”。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把這則故事作了一點改動：馬克思就在天堂裡，聽到列寧這句話，當著聖彼得的面把天堂大門關上了。這兩則故事都有點凄涼，但還不令人絕望。而面對列寧之後無數西方、東方、白色、黃色“利息的利息”，馬克思多半會把塵世的所有門窗都會關掉，只剩下地獄一道門。很難考證，是誰最先擅自批准自己到馬克思那裡“報到”。不難推測，“報到者”無計其數，獲准簽證者大約寥若晨星，甚至一個也沒有。

歷史再三表明，馬克思關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和滅亡以及工業無產階級歷史命運與使命的觀察和論述，曾經以其獨有的道德批判力和歷史理性，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和世界，盡管他的主要預言沒有一項被完全驗證。而歷史以驚人的顯例和高昂的代價，一再坐實了他對領導這場“解放全人類”的“最後的鬥爭”的人們在道德和心智上能否勝任的深刻憂慮。

事實上，當把眼光轉向俄國和更遙遠的東方時，馬克思的思緒變得更加謹慎、滯重，甚至蒙上陰郁的色彩。

野蠻人比希臘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

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是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亞裡士多德

亞洲總是大帝國的家園，……權力必須總是專制的，這是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這個大陸就會飽受分裂之苦，……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亞洲，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孟德斯鳩

實際上，亞洲普遍是專制主義的舞台，用貶義的說法，是暴政的舞台。規模龐大、聳然而立的專制主義是完全符合歷史破曉地區的政體形式。——黑格爾

為獲得生計而普遍依附於皇權的狀況，正是東方世界牢不可破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基礎，因為這是君主財政收入的基礎，也是社會匍匐在他們腳下的存在形式。——理查德•瓊斯這些西方先驅對東方和亞洲的觀感和評判，無論帶有多少偏見和歧視，卻具有確鑿的地理－自然－經濟－歷史事實。馬克思本人也曾用類似的語言指出，“東方一切現像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中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那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中國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獨立意志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作為“歐洲的直接對立面”，歐洲文明的“反題”，中國代表著世界上“總體反動、總體保守的強大堡壘”，乃是“腐朽世界的總代表”。

巴枯寧等無政府主義者曾反復提醒說，西歐的共產主義一旦被實際推廣到俄國（更不要說亞洲）時，將必然會“一方面產生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帶來奴役”。這時，共產主義將淪為“一種謊言，它的後面隱藏著極少數統治者的專制主義，這種謊言更加危險的是，它看起來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願”。恩格斯私下認為，巴枯寧擊中了要害。他在《關於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歷史》一文中強調，共產主義運動一個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絕一切專制，獨裁則絕對不被認同，“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預感到，有一種“預言家，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者，要求以這種身份取得政治獨裁和軍事獨裁。這樣，除了過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外，又產生了某種伊斯蘭教共產主義”。

列寧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對俄羅斯的亞細亞專制傳統抱有真誠而深刻的厭惡和

警惕。

1902 年他嚴辭批評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部黨綱中把俄國說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絕將普魯士專制主義與俄羅斯專制主義等量齊觀，他認為後者是一種“可詛咒的遺產和可恥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在俄國統治留下的一個“怪物”——歐洲最反動、落後、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隸制”。列寧長期被一種可怖的前景困擾：通過一場革命奪取政權並實行土地國有化，極有可能出現“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他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已經朦朧看到了俄國革命的另一種陰郁前景：“俄國歷史的車輪將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後轉”，他們都明確地拒絕完全亞細亞式的復辟，即使國家成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產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們堅持“俄國王安石式的計劃不會帶來任何東西，除了禍害”。俄國人無論如何不能由半亞細亞倒退到完全亞細亞式的黑暗專制，“我們不要中國制度”。

但是，俄國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狀況，卻是一種遠為強大的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的成功，立即使列寧全副身心投身到維護和鞏固新生政權的緊迫鬥爭中去，一切都必須適用和服從於俄國革命自身規律的鐵則。

雖然列寧在生前已經意識到，與一切人一樣，布爾什維克領袖們都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因而組織了工農檢察院（歷史無情地嘲弄了這種把完全無知的工人、農民拉扯到國家最高權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義和歷史笑柄），並且在其遺囑中逐一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個人品德”（人們不難發現，列寧這些戰友和學生們，沒有一個具有超凡脫俗的美德和天才），並且用極其明確的措辭要求把斯大林“撤下來”，因為這個“半亞洲人”太粗暴，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列寧懷疑他“能否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

1920 年 4 月 22 日，列寧年屆五十，正值俄共第九次代表大會，許多代表提議“以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名義”隆重慶賀，列寧嚴辭拒絕，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胡鬧”。1924 年 1 月，列寧去世，斯大林等人對遺體強作處理，在紅場上修建了列寧墓。孤獨無力的克魯普斯卡婭堅決反對這一違背列寧意願的“偶像崇拜”，指斥“這是拿列寧作交易！”對俄國革命偏見甚深的西方反蘇反共人士都承認，列寧本人私德高尚，絕不是權力狂，理想和獻身精神是列寧身上最動人的地方（在他擔任領袖期間，至少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從來沒有用精神摧殘和肉體消滅來對待不同派別和不同意見，即使對托洛茨基這樣的前孟什維克、對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這類公開“背叛”革命和“分

裂黨”的人物，列寧也尊重他們的歷史地位，繼續保留他們的政治權力）。但是，在巨大的權力與脆弱易變的人性之間，列寧來不及、也不可能設計一套確保革命政權不被篡奪、革命權力不被出賣、革命目標不被背叛的制度（歷史證明，在俄國，根本不存在建立這樣一套制度的條件）。

幾乎與此同時，關於俄國革命歷史命運的論爭開始出現。

雖然馬克思曾經指出，俄國“早已站在變革的門檻前”，預言俄國革命可能成為歐洲革命的“信號”，但在被問到俄國革命的現實可能性時，馬克思使用了相當謹慎的措辭。

馬克思、恩格斯長期關注俄國“半亞細亞社會”的專制主義傳統，深入分析過“東方的普遍奴隸制”，他們對沙俄帝國的反動、野蠻和黑暗及其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存在著深刻的置疑和警惕。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一直反對在俄國這樣一個實行“亞細亞奴役制度”的專制社會中進行西歐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斷言，俄國革命將使沙皇專制制度復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營共產主義”的泥淖裡去。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是第一位為俄國革命歡呼和辯護的歐洲革命家，“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領導俄國革命的聰明人物，列寧和托洛茨基……，決不會自認為他們在事件紛至沓來的情況下出於萬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為，會被國際當作社會主義政治的崇高典範，決不會自認為對這種典範只能毫無批判地頌揚和狂熱地摹仿。”這位被資產階級稱為“嗜血的羅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發出嚴重警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集會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會逐漸滅絕，社會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來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必然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開了。”

1921 年，恩格斯的私人秘書、第二國際領袖卡爾•考茨基發表《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一文，預言俄國革命將“導致一次新的熱月政變”：“他們本來是以平等的普選

權選出的國民大會的堅決擁護者，可是一旦國民大會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就一腳把它踢開。他們原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他們在開始執政時宣稱砸碎舊的國家官僚統治機器是自己的使命，卻以一個新的官僚機器取而代之。他們由於軍隊紀律的松懈而篡奪了政權……卻又建立了一支新的嚴守紀律的龐大軍隊。他們原想鏟除階級差別，卻又制造新的階級差別……。”

近一個世紀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些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最正直最有頭腦的人物的憂慮和告誡，雖然十分刺耳，卻是對俄國革命另一種命運的真實描述，是被後來的恐怖圖景驗明的真實預言。令人深為嘆惋的是，就連列寧那樣一位幾乎沒有偏私、從不貪戀權力、極富人道和民主精神的俄國領袖，也始終沒有接受這種“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針對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蘭西語）。列寧對考茨基的咒罵、對盧森堡的挖苦表明，任何個人都難以逾越俄國革命自身的巨大局限性。

事實上，由於俄國的歷史環境，尤其面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現狀，列寧只能全力以赴地為維護和鞏固革命成果而戰，幾乎不由自主地屈從於革命內部某種專制主義的強大邏輯，並公開主張獨裁：“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是屢見不鮮的。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求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意志，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這種服從可以通過最嚴厲的獨裁形式來實現。”

事實上，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生前已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導師，但他們一天也沒有實際掌握權力，更沒有在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非西方國家掌握過最高權力，他們完全不可能設計一套對革命領袖進行監督、制約、裁決、罷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經驗是典型的烏托邦浪漫主義，關於權力、工資、軍隊、警察的設想完全沒有超過托馬斯•莫爾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們的水平）。

歷史表明，無論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盧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寧本人，他們誰都沒有預見到，關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的取舍，竟然會成為最致命的抉擇。他們誰都沒有想像到，到了斯大林身上，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獨裁會發展到怎樣畸型、病態、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 年 1 月 30 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 1928 年到 1953 年斯大林大權獨攬的 25 年期間，共有 3，778，243 人死於非命；1991 年 6 月 14 日，蘇聯克格勃主

席克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 420 萬人被鎮壓。現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為斯大林鎮壓犧牲品的人數的下限是 2，200 萬（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統計），上限是 6，600 萬（列寧格勒大學教授庫爾干諾夫統計），其中還不包括由於斯大林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死亡的幾百萬人口（蘇聯在不到四年的戰爭中總共損失 3，400 萬人，其中 760 萬是軍人，在世界各國生命損失統計表中高居首位。這固然表明蘇俄人民的重大犧牲和貢獻，同時不也表明作為最高統帥的斯大林不可推諉的重大責任嗎？）。這些數字，比羅曼諾夫王朝三個世紀專制統治消滅的俄國進步人士的總數恐怕還高出幾百倍、甚至幾千倍；比從馬克思到列寧、“科學共產主義”問世以來各國資本家、地主、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人加起來的總數，恐怕還要高出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蘇俄 74 年的歷史，是一部背叛偉大理想的歷史。人類歷史上最人道、最正義、最神聖的主義和事業，在四分之一世紀裡，竟然墮落成歷史上最專制、最虛偽、最暴虐的制度。

俄國近一個世紀的救贖精神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開創、囑托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偉大歷史運動，竟然淪落為一場最徹底的亞細亞全面專制復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風格和味口，把蘇聯共產黨改造成個人獨裁的工具，從此，黨的最高法定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最後連政治局都形同虛設，黨的領導、工農聯盟、人民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些冠冕堂皇的詞語變得毫無任何實際意義。

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完全淩駕於黨、人民和國家頭上。完全違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道德准則和政治遺訓，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偶像崇拜和領袖拜物教，人類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虛偽最無恥的詞語被制造出來，斯大林被稱頌為“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偉大中的最偉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親愛的父親”、“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和導師”、“有史以來一切民族、一切偉人中最偉大的人物”、“共產主義大廈的天才設計師”、“我們星球上最偉大的人物”、“人類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陽”……

1939 年，斯大林親自修訂的《斯大林傳略》出版，到 1949 年斯大林 70 壽辰，該書已經譯成全世界所有文字，總印數達到 5 億冊以上。成百上千座斯大林雕像、紀念碑在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堅立起來，成百上千的城市、街道、廣場、工廠、學校、

幼兒園、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成百上千各小斯大林、中斯大林在各社會主義國家被培養和塑造出來。

勿庸贅述，俄國專制主義傳統、尤其俄國從成吉思汗韃靼軍事專制主義和拜占庭帝國繼承下來的東方專制遺產，要對斯大林主義的出現承擔重大責任。同時，人們不應忽視，東西方先後出現的極權主義和暴君現像，乃是二十世紀人類文明最怵目驚心的歷史性潮流。當代最負盛名的德國歷史主義代言人弗裡德利希•梅尼克在考察希特勒主義時指出，德國歷史中的非理性“惡魔”固然准備了希特勒主義（這位納粹領袖曾公開宣揚“獨裁是最好的統治方式”）的本土資源，但德國極權主義的真正根源卻是十九世紀歐洲兩大浪潮：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更深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負面精神遺產：種族、階級、群眾性的馬基雅維裡主義和暴君崇拜。

二十世紀，一種恐怖的“歷史邏輯”曾經將一半人類驅趕到奴役之路：人類有一個命定的結局，歷史之謎已被破譯到最後一刻，萬古長夜即將破曉，天國之門即將開啟，這一切都將神意地降臨在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階段、某一黨派的命運之中，最終由一個“超人”的奮鬥來完成。他是真理，是正義，是自由，是太陽，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領袖中的領袖，他擺脫了人類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惡、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諸如仁愛、慈悲、怛惻、憐憫、敬畏、謙卑、同情、善良、寬容、懺悔、隱忍、多愁善感、溫情脈脈、溫良恭儉讓的束縛；他是用特殊材料鑄成的“新人”，具有花岡石般的心靈、鐵鐵般的意志、不可動搖的權威、統馭萬物的智慧；因為目標神聖，他被特許可以使用任何殘酷無情的手段，在他經過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長，花果無邊凋零；在山呼海嘯、暴風驟雨、周天寒徹的激蕩翻覆後，他將重新為世界奠基，為萬世立法。

按照這套邏輯，二十世紀的暴君沒有一個可以譴責，沒有一個應該審判，沒有一個不僅不是惡人和罪犯，而是鞭撻人類前行的大英雄。

從國家社會主義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場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國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麥宰相以來德意志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法西斯主義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貝尼托•墨索裡尼不正是現代意大利之父、自馬志尼、加裡波的以來意大利統一運動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嗎？

從被壓迫階級和底層人民的標准看，浪流漢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鐵匠出生的墨索裡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漢嗎？

按照這套邏輯，一個人只要壟斷了權力並且宣稱自己壟斷了真理，在消滅了全部“階級敵人”後，就有權鎮壓數量相同甚或更多的無辜人民，因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正是偉大事業分外復雜艱巨的明證！

按照這套邏輯，被西歐各國資產階級通緝和驅逐了大半生的馬克思、被沙皇俄國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寧都不過是凡夫俗子。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鮮血彙聚的河流中去把握歷史的航向，更無膽量對所有與自己意見不和的同志大開殺戒，卻絮絮叨叨地空談“異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道”、“謙恭”、“禮貌”“溫情”……

按照這套邏輯，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沒有被餓死、苦死、累死，俄國反而會遭逢更大的滅頂之災；如果數以百萬計的革命者沒有被整肅、鬥爭至殘、至瘋、至死，俄國社會主義反而注定要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如果數以百萬計的俄國知識人沒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樓、上吊，俄國曾經燦爛輝煌的文明反而會黯淡寂滅！

按照這套邏輯，離開了斯大林、希特勒式的“元首”、“領袖”、“導師”、“統帥”、“舵手”（還須一律冠以“偉大”、“光榮”、“正確”的修飾詞），人類就將永遠“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許今天還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積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壯麗的日出和每一個嬰兒的誕生就毫無意義！

由於俄國的特殊傳統（沙皇專制、農奴制、第三廳、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黨人、布爾什維克……），斯大林雖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範圍內和有限時空裡發動一般群眾揭發、檢舉、聲討各色“敵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內務部、審判機關、秘密法庭、集中營、強勞營和行刑隊，其風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規模地肉體消滅。蘇俄人民直到 1956 年（斯大林本人死後三年）才從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逐漸知道斯大林對黨內老布爾什維克鎮壓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從索爾仁尼琴那裡窺見了遍布俄羅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歷史。俄國歷史的苦澀和力量在於，正是因為人民長期處於與真相隔絕的境地，一旦發現斯大林主義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質，他們的震驚、幻滅和憤怒，就足以摧毀任何強大的專制帝國；一名欺騙和奴役了幾代俄國人民的暴君，一場完全背叛了俄國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試驗”，一個早已不代表俄國人民的暴政，與兩手始終干淨、內心仍然高尚的俄國人民之間，可能共存於歷史，卻絕對不能持續到永遠。

1961 年，列寧格勒、莫斯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代表團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聯名要求把斯大林水晶棺移出列寧墓。大會作出一項決議，“鑒於斯大林嚴重違背列寧遺矚，濫用職權，對忠誠正直的蘇聯公民進行大規模鎮壓，再將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於列寧墓，將是一種褻瀆”。一個深夜，斯大林遺體被從列寧墓拖出，裝進一個深坑，再澆鑄上幾卡車水泥漿。俄蘇詩人葉甫圖申科在《斯大林的幽靈》一詩中寫道：

大理石不會說話，水晶棺默默閃著光。

筆立的哨兵，臉色曬得又黑又紅。

當他們把他抬出列寧墓大門時，

幾縷青煙在棺木上繚繞，

一絲氣息從裂縫中漏出。

棺材慢慢地升起，擦過了哨兵的刺刀。

他沒有說話，他沒有，他沉默著，長眠著，

緊緊握著他那經過防腐的拳頭。

他只不過是裝死，他在裡面暗中注視著，

他只不過是打個盹兒，他在謀算……

我呼吁我們的政府，我請求你們，

派兩倍、三倍的哨兵來看守這副棺材，

不要讓他東山再起。

1987 年 11 月 7 日，謝•戈爾巴喬夫代表蘇共中央在紀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中指出，斯大林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經濟干部和軍事干部、科學家和文藝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鎮壓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親信們為大規模鎮壓和違法行為對黨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

不用具備多麼高深的歷史思維能力或與聞多少解密檔案，便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造神運動，師承和借鑒的主要是斯大林主義的遺產。斯大林的幽靈借屍還魂，確實在東方找到繼承人，東山再起了。

這一點不意味著，這場“造神運動”與中國歷史傳統無關。如同俄國專制傳統孕育了斯大林主義一樣，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傳統是這場運動無比深厚的土壤。

秦始皇“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統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國第一個“大成至上”的

專制帝國，是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真正的歷史起點。

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災難性的斷裂、變異和倒退。它“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結束了天下共主、列國並立的封建制度，結束了春秋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秦帝國開啟和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絕對皇權專制”、“普遍奴隸制”（它把山東六國人民連同貴族一起重新變成奴隸，並且維持和發展了人殉制度）“軍事官僚專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專制帝國傳統，將絕對主義、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國的頭顱和心髒，它是比地理條件、自然環境嚴酷千百倍、中國兩千余年間所有苦難和罪孽的總根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陰森、最封閉的專制帝國，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之集大成。

自秦一統天下以來，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正脈已轉為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專制主義的文化，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文化，幾乎受到中國古代所有學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學和形而上的終級意義。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制度與其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共榮共損，缺一不可，且共存於一個所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裡，人口數萬萬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大軀體之中。這個龐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軀不僅無情而有效地統馭和禁錮著中國人的肉身和內心，而且還擁有難以理喻的法力防範、拒斥、對抗、篡改、消解一切攸關人類自由、民主、權利、尊嚴的文明基因，同時宿命般地保持著一種本能，幾乎能天才地發現古今中外一切專制同類，對它們的盛衰興亡、經驗教訓具有天然的興趣和強烈的關注，對一切捕風捉影甚或子虛烏有的動向、輿情、篡權、顛覆懷著歇斯底裡的警惕和毫不妥協的敵意，最終把關於權力繼承和獨裁世襲的“理論和實踐”發展到“天才和顛峰”的極限。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共和國：“五四”運動引進了“民主”與“科學”；抗戰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並躋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陣營四強之列；共產黨以“人民解放”、“當家作主”、“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相號召，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權型專制制度本來已經不折不扣地過時而且貨真價實地反動了，但中國的宿命在於，歷史始終沒有為中國提供一個徹底埋葬專制主義的機會。相反，從 1919 到 1949 到 1976 年，開始是“救亡壓倒啟蒙”，接著是“革命壓倒民主”，最終是“專制壓倒革命”。使中國專制主義死灰復燃乃至變本加厲的，正是從西歐起源、經過俄國改造、比所有外部世界重

大事件更有壓倒性力量的“斯大林主義”。

自此，一種全新的世界性意識形態君臨中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按照這種意識形態建立起來，一種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為終極目標的國家“趕超”發展戰略，得以確立；一種按照這一國家戰略制定的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識形態現在成了唯一的、絕對的、決定論和永恆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陽”。在它的籠罩下，中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和“全盤集體化、國有化”，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工業；一切資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須服從這個總目標，一切不同意見和個人自由都必須嚴加控制；最後，最重要、“悠悠萬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須要有一名集最高權力和最高真理於一身的最高權威。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反文明最肆虐的年頭，中國人終於聽到了這樣一種聲音：“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大概是毛澤東特有的坦率和幽默。他確實無愧為秦始皇的孝子賢孫，他甚至超過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萬倍。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則是天大的無恥和不敬。

馬克思出身世代猶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魯士貴族姑娘為妻，接受過歐洲第一流的教育，對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養和足夠的敬重。馬克思自願終身遭受放逐、通緝、貧困和孤獨，對人類未來卻充滿了歷史的、哲學的、高尚的和真正詩意的美好預言：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像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共產主義是人性的全面復歸。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自願聯合體。

馬克思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聽說在他去世十年後出生的中國湖南一名農民把他的學說概括為“造反有理”，看到這名東方暴君將其

“無法無天”的彌天大罪說成對他的學說的“最高發展”、並且自稱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

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再三指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不是從學理，而是從最基本的人類感情和文明底線上，馬克思對專制制度充滿難以掩飾的厭惡：“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難道還需用任何說辭否定文革對中國人的獸性的輕視和作賤嗎？難道文革和毛澤東自己一手導演的“造神運動”不正是馬克思所深惡痛絕的專制獸性的狂歡表演嗎？！

於是，中國人終於領悟到了什麼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終於經歷了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的中斷、變形和倒退。中國傳統專制終於發展成了現代極權主義。

於是，中國人終於看清了一個歷史怪獸的真面目：如果說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則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與半西方俄國專制主義雜交的集大成者；終於明白，只有這種現代專制主義集大成者才具有將中華文化幾乎摧毀殆盡，將中華民族幾乎推到絕境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毀滅性力量。

毛澤東曾備受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擁護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揭露，參予對斯大林的“鞭屍”，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訓，完全有可能在中國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但中國專制主義對毛澤東的毒害實在太深，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吸引力實在太大，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斯大林那樣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這正是毛澤東晚年追求的目標。

毛澤東超過斯大林的地方，在於他敢於且能夠公開地（當然有長期的秘密籌謀與策動）、廣泛地（當然經過精心組織和周密安排）、反復地（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可以作為不同目的工具）發動人民群眾、尤其青年學生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調動一切宣傳工具和意識形態武器維護並強化絕對權力，把斯大林主義的秘密性質發展到毛澤東思想“無法無天”的高度和廣度。

應當承認，這是毛澤東留給歷史的最“天才”的發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獨特的遺產。

斯大林的追隨者、幫凶和黨羽是俄國歷史傳統提供的類型：官僚、黨徒、投機家

（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洛維奇、優羅希洛夫、什基利亞托夫、麥赫利斯、日丹諾夫……），秘密警察、劊手子、屠夫（維辛斯基、雅戈達、葉若夫、烏爾裡希、貝利亞……），而毛澤東的助手除了這兩類人（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還有另一類人：文痞，筆杆子、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秦始皇+斯大林+長時間、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的"神聖三位一體"，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極端"厭惡"、必欲棄若敝履的"一錢不值的東西"，這就是"跳蚤"長成"龍卵"的變形方程式。

毛澤東超過斯大林的另一點是，在後者去馬克思那裡報到（肯定會被拒絕）的年紀上（73 歲，中國民諺：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前者竟然發動了為期十年的"造神"運動。

順便說一句，即使毛澤東對從 1949 到 1966 年"十七年"間的社會制度持否定立場（這套制度不是主要由他締造的嗎？），即使這個制度充斥著新的不平等、官僚專橫，即使這個制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時期內已經使中國社會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痛史實已經使這個制度難以為繼（這筆代價和教訓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澤東本人嗎？），毛澤東用"造神運動"和絕對個人獨裁方式來"砸碎"它，也是更嚴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專制、更反動的倒退。個人獨裁和暴君統治肯定是比任何官僚主義和等級社會更傷天害理、更不合時宜的統治方式。尤其以"民主"、"自由"、"人民"的名義，以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名義實行個人獨裁時，它就不僅不仁不義，無法無天，而且虛偽荒唐，在道德、精神和政治品性上的禍患就更為肆虐，遺害更為深廣了。

毛澤東不滿足於把自己當作馬克思的學生之一，而自稱東方馬克思，實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顏無恥外，還暴露出毛澤東的一個隱憂，斯大林太臭名昭著，與之為伍實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兩點是毛澤東永遠望塵莫及的：他領導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東方的蔓延；蘇聯用三十余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間才完成的工業化，——哪怕代價極高。毛澤東除了"內戰內行"外，對中國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毫無任何建樹，——除了折騰和破壞。還有一點，妻子娜佳自殺身亡後，斯大林一直鰥居，而毛澤東的私生活一直靡亂不堪。毛澤東的一生、尤其登上權力頂峰的二十七年間，與斯大林何其相似乃爾！斯大林是毛澤東的恩師和資本，毛澤東是

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

對於發誓要“風流”到死的毛澤東，有這種歷史地位，應該知足了。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所有的“過來人”都有難以言表的感慨，整整兩代人已經成長起來。隨著時光流逝，與所有的重大歷史現像一樣，文革的輪廓日益清晰，但中國人對那場惡性改變了全體中國人命運的“浩劫”，卻得出了大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幾乎所有階層（包括當年被“打倒在地”的人們）都有為數不在少數的人對毛澤東、尤其他的“神位”、“神靈”開始重新膜拜，這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不僅是最匪夷所思的精神現像，而且是最凶險危殆的歷史現實。

不妨再次引用馬克思的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於統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很遺憾，也很令人驚詫，四十年以來，我們關於自身命運的認識，實在乏善可陳。

歷史虛無主義已經彌漫多年，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在“上帝缺席”和“歷史虛懸”的時空中已經奇跡般地度過了近六十年光陰。“造神運動”曾經作為“歷史”和“上帝”的替代，以肉身和人格方式讓我們領教了史無前例的教訓。在更廣的意義上，正如斯賓格勒、湯因比一類西方智者先後道出的現代人類共同的危機ー奧秘所反復啟示的那樣，包括現代“造神運動”在內的中國全部巨劫大患，都是人類命運因緣際會的過程和後果（在此意義上，斯大林、毛澤東都只是不自覺地做了歷史的工具，也正是在此意義上，作為工具的暴君們可以多少得到後世的寬恕）。不幸的是，一個世紀來，在這片土地上，東西方主流正脈文明幾度擦肩而過，專制主義和暴君哲學卻宿命般地結成歷史上空前的“神聖同盟”。我們和後代所能做的仍然是：保持批判的勇氣和道義的擔當，堅守追問歷史真相的權力和責任，在苦難中堅持救贖，在荒原和廢墟上去尋求正義、真理和尊嚴。

惟有太息，惟有沉吟，惟有祈祷

——序陈铭道教授《与上帝摔跤——犹太人及其音乐》

现代中国人至少有双重因缘敬畏犹太民族。

仅仅数十名犹太人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就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将在宇宙深处沉寂了数百亿年的基本物质力量释放于人世，不仅避免了一百万盟军士兵和两千万日本平民的生命伤亡，提前结束了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处境、思维和命运。

由于犹太姓氏所占比例过大，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 年生于德国乌尔姆城）、马科斯•玻恩（MaxBorn，1882 年生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尼尔斯•玻尔（NielsBohr，1885 年生于丹麦哥本哈根）、恩利克•费密（EnriceFermi，1891 年生于意大利都灵）、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 年生于美国纽约）等犹太科学家主导的现代物理学，曾一度被称为“犹太物理学”。

令中国人无比骄傲的“核大国”地位和全部宇航成就，都受惠于犹太科学家的天才和劳作。

同样，由于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 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市）纯正的犹太血统，由于俄国革命浓重的犹太背景：俄国革命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夫人罗莎莉（Rosalie）是虔诚的犹太妇女，俄国革命无可争辩的领袖列宁拥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苏联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著名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由于罗莎•卢森堡、梅叶勒夫娜•海尔夫曼、安娜•库莉赫芙、贝拉•库恩、库特•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二十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进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一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

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派驻中国的代表和顾问，也流淌着浓度甚高的犹太血统。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宪法和一切社会生活的意识

形态基础。

犹太人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性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哪个民族曾经遭受过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从亚述人、马其顿人、巴比伦人、埃及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到十字军东征、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Ages）、黑死病、腺鼠疫；从意大利梵蒂冈教廷的“隔都”、沙皇俄国的“栅栏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法国“德雷福斯案”到斯大林的民族放逐和“犹太医生案”、纳粹德国的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毒气室，直到四次中东战争以及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环伺与敌视……；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合谋排斥、驱逐、迫害、虐待、屠杀和灭绝犹太人，这个“上帝的选民”向世界各地流散迁徙的经历，几乎就是数千年里人间灾祸的路线图，以至犹太人发明了四个恐怖的词汇，以音译形式直接进入各国语言：pogrom（排犹）、genocide（灭犹）、holocaust（屠犹）、ghetto（隔都）。这个从荆棘之途、骷髅之地泣血而来的古老民族，至今还在为自己的故土和圣城流血。（写作本文时，“伟大东方伊斯兰突击阵线”刚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制造了“和平绿洲”犹太会堂和“以色列之家”连环爆炸案，二百四十多名正在举行安息日仪式的犹太教徒正倒在血泊中呻吟。）

从 1938 年 4 月到 1940 年 5 月，当圣•路易斯号作为犹太人悲剧和欧美国家耻辱的双重象征在大西洋的“诅咒之航”来回漂行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却向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签发了成千上万份前往中国的签证。六十年后的 2001 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义士”称号，以表彰他签发那些“生命的签证”的勇气和人道关怀。

在这二十余万充满辛酸、悲戚、绝望乃至窒息的文字中，这是极少令人释怀的片断之一。这使我作为中国人，多年来为自己所属的民族第一次感到由衷的自豪和荣耀：中国没有参予对犹太人的合围，何凤山表现了古老的东方人道精神。陈铭道教授以如此简洁的叙述和那帧朴素的照片，给我们留下了这位中国绅士的动人故事和清朗笑容。

正是这个人口从来不到人类四百分之一的弱小族群，这个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都成为厌恶、忌恨、诅咒、仇视和杀戮对象的生命－信仰共同体，这个惟一纵贯五千年、散居五大洲的世界民族，却恰似浩瀚星空中最孤绝、最炫目的彗星，屡屡划破人类文明的漫漫历史长夜。

如果没有法兰西民族，欧洲将缺少大部分浪漫和热情；如果没有德意志民族，人

类的严谨和理性将大打折扣；如果没有英吉利民族，全球商业、航海和法律的成熟将推迟若干时日；而如果没有犹太民族，没有《圣经》、《摩西十诫》、《妥拉》、《塔木德》和《阿伯特》，甚至如果没有犹太民族的苦难和流散，——

整个人类文明的天穹就会变形，历史进程的轨迹将零乱不堪，世界将是另一番景象，——更多的陌生、隔绝、冲突、恐怖、血腥和黑暗。

现代人类赖以安身立命、不可移易的时间与空间、世界与宇宙将不是我们从双眼到内心观察和感受到的这种状态；维系现代文明的基本范式和普世价值将无从确立；各个民族将被迫以支离破碎的方式孤独地面对冷漠无垠的苍穹，人类的世界性感受将长久停留于物候循环的蒙昧时代，人类的彼此接近和天下一家的伟大理想将在更漫长曲折的黑暗中摸索；——犹太人是上帝和人类的选民。

推动近代世界文明巨大进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社会演变将失去源头和方向；高倡“自由、平等、博爱”和“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失去它们的精神蓝本，失去塑造明天的内在冲动，失去它们的历史合法性；——犹太人是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

“人人生而平等”的古老箴言催生的将不是履行“四海一家”伟大天命的美利坚合众国，而是又一个贪婪、血腥的专制帝国；短暂、渺小的个体生命将不仅失去永恒王国的意义可能，而且失去现实世界的存在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人权运动（女权主义、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环保主义、争取言论和思想自由、废除死刑等）都将沦为民族、宗教、国家、阶级、政党和个人的工具；——犹太人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现代医学、化学、物理学、经济学、文学与和平诺贝尔奖，将失去成十上百名最天才、最优秀的人选；世界救济与慈善事业的慷慨大度之士将大幅锐减；宣扬人类之爱、国际合作和非暴力主义的仁人志士将因道德和宗教背景的涣散而更加孤寂；而现代人类习焉不察的理念和词汇，将变得贫乏苍白；今天，它们却已经永远地印入人类脑海，亦为中国人所熟悉：信仰、希望、正义；时间、历史、未来；永恒、无限、不朽；自由、解放、精神；天堂、地狱、审判；天命、权利、个人；创新、激进、探索；契约、平等、公义；——犹太人是天生的进步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人类自我精神分析和人性自我解剖的利刃永远闪现不出“犀利”和“深刻”的辉光；全球幽默总量的损失怎么也会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最后，令中国和全世界的

善男信女欣喜若狂的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让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中小学生永远伫候的“周末”和“双休”日，都将在时光流逝中黯澹无光。

犹太民族贡献于世界的是一幅遮天蔽日的（民族）生命受难图，一座古老而簇新的精神圣殿，一群又一群冲破黑暗朝向黄金时代、穿越地狱走往天堂的圣徒和先知，一首又一首由全体成年男性低声吟唱的哀歌－雅歌－颂歌－圣歌。

《与上帝摔跤》以其悲怆的诗体语言和极度浓缩的散文笔法“平静地叙述”了犹太人及其音乐的特殊命运。作为第一位撰写犹太音乐的中国学者，陈铭道教授撇开“令人望而生畏的音乐技术分析”，将犹太音乐归汇到犹太民族充满苦难和奇迹的历史和风俗中去，将犹太民族长长的先知、圣徒、祭司、卜者、国王、英雄和诗人谱系，将一则则令人心碎的犹太悲剧案例，人而神性地笼罩在挽歌－牧歌的悲欣复调氛围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如梦幻泡影，如霹雳闪电。白骨因之散化成月色，鲜血因之分解成晚霞，绵延不尽的生命的消殒，纷然慰帖成天国洞开的黎明之光。学术从谱例中退隐，专业在叙述中升华，惟余性灵在追逐犹太历史和犹太生命潮汐的涨落，惟余太息，惟余沉吟，唯余祈祷……

这是一位年逾“知天命”之年的男子，为天下的“青年才俊”，为从未谋面、永不相识的“后人”，为那些对这个世界百思不得其解却依然能承受、会感动、相信奇迹、渴望救赎的人们而写的灵智之书。掩卷之余，心灵不震撼，清泪不盈洒，不怅然若失，不仰天长叹者，不是本书的知音，——你已患下精神的白内障和心灵的老年痴呆症。

音乐的单纯与神奇，竟可以记录、表达和承载一个民族几千年的生命历程。陈铭道教授以其轻度中风微微颤动的手指，为中国人第一次拨动了进入犹太历史和心灵堂奥的琴弦，倾泻出感人肺腑的人类之爱，奔淌着对犹太人的深沉而纯粹的同情、倾心、敬重和祝福。

一名俄国人的一段名言，完全适宜于全世界每一位犹太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战友。”（列宁：《欧仁•鲍狄埃》）犹太民族在历史和精神意义上，一直在谱写和传唱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国际歌》，在这个吉凶难卜、忧患丛生的世界上，阅读《与上帝摔跤——犹太人及其音乐》这样的书，既痛苦，又幸福，——它为犹太

人而写，也为我们所有人而写：“心中想说的话将肯定不只是有关犹太人的音乐”。

我与陈铭道教授同属一代，可谓“多灾多难的一代”。命运几乎没有对我们微笑过，——我们却由此获得一项不菲的人生回报：永远不对人失去信心、希望和爱，永远为不幸和苦难掬泪，永远向英勇和崇高致敬，永远站在应该站立的那一边。

对犹太民族的受难和牺牲，同情还是冷漠；对犹太民族的奋斗和成就，敬佩还是抹煞，几乎成为衡量善良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天然尺度。陈铭道教授在完成《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一书后，在患脑血栓偏瘫后，又为自己的同胞写出了另一则人类自由本性的感人乐章，并再次出色地证明：真正的艺术永远源于苦难，指向拯救。

世界通常是一个逐渐解蔽的过程，偶尔有一次豁然开朗的爆发。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心境走出自己的国度。这个边界分明的小小的星球，既不是这样花花哨哨、五彩斑斓，也更非看上去那样单调、枯燥，那样“不过如此”。真正激动人心的旅游，是关于人类精神生命的巡礼，真正不朽的世界指南，永远导向一切生命的死而复生，永远展望着所有的民族都在由真理和正义、旋律和乐音主宰的世界里复活，——正如本书开篇第一段和结尾一段文字所寄望的那样：“有一天，每一个犹太人终将意识到：没有犹太民间音乐的复活，就没有犹太民族的复兴，正如一个人没有心脏不能活，一个民族没有民间音乐也不能活；到了这一天，犹太民族的复兴才会成为一种现实。”

最让我心生感动的，是漾溢全书的某种类似宗教情怀的谦卑、忧伤和神秘的心迹，以及对人类受难和牺牲的宿命般的庄严、肃穆，这使我不断想到爱因斯坦以及许多犹太人所特有的目光和文字：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爱因斯坦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45 页）

中国人有特殊的原因关注犹太人，感受犹太人，祝福犹太人。我的朋友、社会学

家周孝正教授曾经不顾民族学、辞源学和外交政策的约束，建议将“犹太”改为“优太”，以表明对这个弱小而伟大的民族的敬意。

我、陈铭道教授、本书全体读者以及无数相识不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我们多年没有高举过的双手，附议。

二00三年十二月十日重庆

心中的苍穹

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毛喻源的绘画

一颗敬神的心灵，决不会承认现实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不会承认现实世界的污秽和邪恶有权自称永恒，也不会承认一个美丽的本真世界纯系子虚乌有。在这样一颗心灵中，对浊世的绝望，恰是转向壮丽苍穹的甬道。

与《永恒的孤岛》一开始就不属寻常文字一样，毛喻源的“绘画”从来也不是一般的造型艺术，而是对绝望之物漫长凝视、谛听和冥思后，形而上一劳永逸地斥弃后，返身仰望的终极性顿悟。绝望之物则不断褪为真理光源深不可测的遥远背景，大千世界在神的光芒下，一一复活。

毛喻源繪畫：天堂之門

难察起于何时，也许在混沌之初，抑或始于神话传说的苍茫时代，东方这片土地就分孽出某种渎神的毒性，从此再无光明、永恒和圣爱，也再无童话和天国的色彩、光影、韵律和大美，仅仅循环着下坠、闭锁、腐朽而冷寂的尘业。它的唯一意义，似乎仅仅为了映衬地中海、大西洋四周蒙受施洗仰承神恩的彼岸的荣耀。在毛喻源自己的时代，他的同胞则全幅沦陷于无边无期无妄无助的梦魇之狱。他们对已知世界的颠倒之功，反用之法，轻薄之罪，已经堕落到远离人类常情的地步，以致无论仰观庄严寰宇辉煌日出，还是俯察荷叶摇曳杏蕊绽放，他们连动物皆有的惊讶、欢悦、感动和陶醉都一应阙如，更旷昧于未知世界的美妙与神奥。

苍穹之下，世界上最高级物类中最大的分枝，其最珍贵的性灵生命萎缩塌陷到如斯田地，这是毛喻源从几乎刚刚告别少年时代起就独自震惊独自伤心的绝望发现。

毛喻源繪畫：嚮往的地方

于是，在国人只顾打桩围墙反复自我囹圄，惟恐掘地不深、继缧不牢之际，毛喻源已开始兀自流浪，像一位富甲天下的君王四海为家；更于宅心灵台颠沛造次，终于无限感激无限狂喜无限幸福地驻足于心中的苍穹之下。那是某个时辰，老家乐山大佛脚下三江汇际烟波袅窕的薄明，滔天洪水漫溢万壑群山的仲夏，沙尘暴偕 SARS 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人间四月天，或是世界末日般的蘑菇云在纽约世贸中心上空升

腾造型的一刹那，至高的唯一者目睹一切，天启般的垂顾半空降临，于是，择定了毛喻源这最绝望者和最仰望者，将沉睡之物唤醒，将微贱之物托举，将亡灵超渡，将羔羊抚慰，将一切造物升华，美化。

毛喻源繪畫：夢中湖

于是，身临“危绝之景”、“恐怖之镜”，毛喻源自造了一个世界。在这里，飞鸟与儿童喃喃对语，每一颗树都珍藏着无尽的珍宝，黄昏的歌剧引来海洋和群山的欢颂，万里云翳羞涩地化为一只眸子的柔软睫毛，大道尽头，一树婆娑，十字架在无边阴霾中坚定、峻峭，月亮是“爱”的第一道光芒……；在这里，最苦最累最无告的心灵终于可以憨憩；在这里，最恶俗最怪僻最无救的心灵可以苏醒；在这里，奇迹变成常识，真、善、美就像大地、空气、阳光，不可阻挡地浑然天成，信、望、爱连结起所有的山峰、河流和心灵。这里有犹太先知的《旧约》、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帕斯卡尔的《沉思录》、雨果的《悲惨世界》、弥尔顿的《复乐园》，有蒂里希的“凡事谢恩”，托尔斯泰的绿枝，莫奈的泪泉，高更的日葵，以及梵•高的行吟之由：

毛喻源繪畫：天光

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是爱无量事物，爱你所爱；带着高尚、庄严和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量和智性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通向矢志不渝的信仰之路。

救赎——人类永恒的母题。精神救赎是最后的救赎。一切罪恶谬误都可以宽宥，惟有拒绝救赎者除外。

中国迅猛膨胀的物质身躯已使世界瞠目，一场历史绝境中的精神突围，中国二十一世纪“出埃及记”式的精神突围，正在启动。孤独如毛喻源，绝望如毛喻源，英勇如毛喻源者，我们的大卫和摩西们，正在起程。

在你走向彼岸的途中，有童话世界的天真无邪，有神话时代的灿烂黎明，在行将崩溃的洪水世界岸边，新的方舟已扬起风帆。无数与毛喻源同样绝望、也同样仰望苍穹的相识不相识的人们，正在先后进发，去领略转瞬即逝的胜景，去逡目万象更新的天地。

毛喻源繪畫：自然的女兒

现代艺术曾驱使一代又一代现实世界的异端和叛逆各自流浪，标新立异，独出心裁，艺术家们一直遥遥引领着时流。同时，现代艺术又是各种社会演变和思潮激荡奔腾最眩目的浪花。毛喻源就是一名告别丛林、跻身湍流的孤独伐木者，一名与现实决

裂但拒绝绝望的精神骑士，一名从未游离于人类命运之外的隐修士，一名以自己的方式救世的使徒，诚如北京现代汉语研究所授予毛喻源第三届“当代汉语贡献奖”授奖辞所言：

毛喻源先生孤独写作的悲剧性，毛喻源先生为中国文化引入宗教、神性等实在之源的个人努力的伟大，已构成汉语近百年来作为工具的情形下最成功的一次反叛。

至于选择诗、哲言、沉思、神谕还是绘画，则纯系偶然。尽管经历了那么多颠覆与革命，现代艺术抵达到毛喻源时，仍然践履着它那睽违已久而日久弥新的神圣天职：让眼睛湿润，让心感动。于是，我们发现，毛喻源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只是在低声提醒：看吧，听吧，领受吧，赞美吧。

毛喻源繪畫：鲜花與石頭

作为年过半百的中国人和毛喻源的老友，我为《天堂之门》中华文明符号的完全缺席，深感遗憾。也许，中国文化必须经历各种形式的“他化”之后，眼看自己真正纯粹的儿子各奔异域之后，才能迎来魂兮归来的时辰。倾心欢览《天堂之门》，你也许会发现，这里不仅有一位不惮孤独远行的精神朝圣者，一名在漫漫跋涉中苦苦追忆中超越时空的寂寞先知，这里还有一颗并未绝望的中国心灵，一个东方视域中隐而未显的家园。

毛喻源繪畫：奔跑歸來

二 00 三年七月三日

沉思西部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

——[法]托克维尔

一道帏幕正在西部拉开。中国最后一片高蹈隐逸的空间早已遁迹，西去的帝王、使臣、将军、高僧、壮士、商旅、歌者、囚徒和丽人也已永远音尘断绝；即将降临的是另一种哲学、另一套话语，另一派景观、另一类演员。莽苍西部正在迎候一次空前的洗礼。

这种洗礼已经施行了三百多年，“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这种施洗，以物质的名义，挑战了精神；以自由的名义，统一了世界；以人类的名义，掠夺了自然。这种施洗，最终汇聚成人所共知的“世界潮流”，汪洋恣肆，方兴未艾。

土地－空间是民族生命的摇篮，是民族灵性的渊薮。对自己土地－空间的感戴和敬畏、了悟和眷顾，是伟大民族履行天命的永恒前提。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西部是一个古老而簇新的伟大空间。在对亚洲大陆这块腹地规划动手前，稍事沉思毗邻壤接的俄罗斯和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的相关经验，稍事沉思当代中国与世界大局的相关情势，以引起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沉思，当不是余事。

※※※

几乎与西欧殖民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扩张同时，俄罗斯开始建立统一国家并向东推进的历程。在此之前，公元 988 年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1237 年蒙古人的入侵以及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自居为新的“上帝城”等历史事件对俄罗斯命运发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从此与西方正在经历的宗教革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政治启蒙和社会现代化运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俄罗斯人民用了近五个世纪，沿着伏尔加河，翻越乌拉尔山征服了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直到十九世纪末，建立起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庞大的沙俄帝国。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时，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

曙光，——俄罗斯人民征服茫茫草原“瀚海”的史诗壮举，是与西欧全球扩张方向不同性质迥异而同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成吉思汗、拿破仑和希特勒等一度称霸欧洲的征服者最终兵败冰封雪飘而辽阔无垠的俄罗斯，反证出俄罗斯巨人的无穷潜力。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不仅是一种主义的胜利，不仅是源于西方而又异于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对西方世界一统天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挑战，是对西方基督教现代化施洗的历史性整体拒斥。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为了把西伯利亚建成战略大后方以维持国家稳定和安全，以适应“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的需要，苏联开始实施工业东移和重点计划投资政策。近 1,500 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千万居民撤往马拉尔、伏尔加流域和西伯利亚。秋明取代欧洲境内的巴库成为全苏最大石油天燃气中心，苏联石油产量 40 年后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成为苏联第二大煤炭和冶金基地；以伊尔库茨克为中心的安加拉－叶尼塞河地区则成为苏联有色金属、木材加工和化工合成原料的重要生产地。与此同时，苏联每年分配几万名大学毕业生到东部，又把大批东部干部、专家抽调到西部或送往国外培训。1944 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1957 年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修建科学城新西伯利亚等措施也为提高西伯利亚地区整体科学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 年，苏联工农业总产值一度上升到美国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苏联横跨欧亚大陆，在向东西方交替退却和扩张的历史宿命中锤炼出一种普世拯救哲学，并以工业化、热核力量和太空技术的煊赫成就令整个西方惊讶颤抖。

然而，苏联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却戏剧般地坍塌了。

历史表明，苏联领导人始终没有建立起与其伟大目标相称的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不仅高于旧俄国、而且高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物质成就，没有建立起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全球化进程的真正进步的现代文明。

历史表明，列宁痛斥过的“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旧俄毒瘤——沙皇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在革命后七十多年中并未被割除。苏联领导人并未读懂“土地－民族”的血肉文本，他们企图用一种虚假的“联邦制”代替沙俄帝国；用消灭民族特色和民族差异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用俄罗斯语言、文化和历史同化非俄罗斯民族；用“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苏联公民”、“苏联国家”的名义改造各族人民。从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集体化、三十年代的政治大清洗到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战争时

期，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日尔曼人、犹太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等民族先后被以“民族分离主义”、“背叛苏联”、“分裂苏联”、“富农路线”等罪名强制集中、流放、迁徙、驱逐，被取消民族自决自治权、土地权和公民权，各民族大批上层人士和代表人物被监禁或屠杀。革命承诺的各民族的平等与繁荣让位于虚幻的“世界革命”、“国家意志”和“党的路线”，千百年来各民族赖以生存和自豪的民族宗教、文化、语言、生活方式远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而被视为旧时代的象征，成为国家进步的障碍。

从斯大林到勃烈日涅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统治集团对各非俄罗斯民族长期实行政治歧视、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列宁曾痛加斥责的沙皇俄国的反动民族政策，被原封不动甚至变本加厉地继承下来：

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

历史表明，由于全盘拒斥西方文明，总体否定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意义，并因此拒绝给予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苏联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匮乏，最终陷于破产。曾经是欧洲粮仓的俄国竟然在革命几十年后需要每年从西方进口马铃薯、小麦、大豆和黄油。苏联领导人可以凭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联合国敲着皮鞋与西方叫板，可以凭恃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向全世界炫耀；可以凭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霸权向社会主义各国和第三世界挥舞指挥棒；还可以凭恃其“有限主权论”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苏联人民却必须常年为生活必需品排队企候，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苏联国土竟然难以养活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三的苏联人民！

苏联的厄运和悲剧在于，太迷恋于自身独特命运与使命的虚拟神话，太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桎梏，太沉溺于引领和拯救人类的乌托邦狂妄，也太低估和忽视了西方文明的深刻意义和强大影响。在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拥有世界上最大一片土地－空间后，苏联人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自己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建立起不是使人畏惧、而是令人钦佩的人间天堂，没有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壮烈奋斗后实现人类自由繁荣的崇高理想。俄国人民到头来必须共同咽下理想幻灭、偶像涂炭的苦果；必须共同承受分崩离析、民生凋弊的可悲现实；必须从西方和全世界重新学习现代化的步伐，重新沉思自己的命运和使命，重新为个人的生存和国家的尊严而投入艰辛漫长的奋斗。

※※※

美国的幸运和得天独厚已是历史学的常识，历史之手是在欧洲处于全面上升势头并向全世界扩张之时把两大洋之间那片辽阔膏腴之地交到欧洲的冒险家手里，欧洲迅猛发展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有了一个崭新的巨大舞台。美洲的发现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怎样估算其价值，都不过分。而同样重要、甚至更有启示意义的是，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一百余年间，获得独立的北美人民嗣后通过对西部边疆的拓殖，不仅成功地移殖了欧洲先进文明，推进了政治民主，加速了社会民主的出现，而且以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朝气蓬勃的民族精神刷新了旧欧洲的历史纪录，并一举塑造了现代美国的雏型。与俄罗斯人民征服大草原一样，美国西部开发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与俄国命运不同的是，这一奇迹穿越二十世纪，以其独具的生机与活力继续幅射于世界。

勿庸置疑，中国不会正面评价美洲殖民者贩卖非洲黑奴的血腥记录，不会正面评价美洲西部拓殖者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和隔离的野蛮暴行，不会正面评价与西部开发并非无关的美国的帝国意识和霸权主义；但这一切丝毫不应妨碍遵循“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人运用丰厚的民族智慧、时代理性和大国胸襟，客观看取那个望洋而居的年轻大陆的发展历程。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再由此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先知般预言于今尤热的“全球化”浪潮，以为中国西部开发的他山之石，予取予弃，最终求其在我，应当不是心机枉费。

美国西部拓殖的最大背景，是人类活动全球性阶段的来临。地理大发现首次把“全球观念”和“人类意识”引入历史。在此之前互相隔离与封闭的世界逐渐为一个相互联系、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世界图景所取代，整个地球的地理分布首次被勘定和绘成地图。美国的幸运首先在于，作为后来者，他们成功地摆脱了欧洲中世纪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枷锁，成功地继承了欧洲现代化历程中积累的正面经验。美国西部开发是那个时代最富冒险精神和进取意志的文明人群与地球上一片最丰饶广阔的土地的伟大遇合，尽管其中有屠杀印第安人的野蛮暴行和资本主义的血腥纪录，但它仍然无愧为迄今为止人类征服自然的经典作品之一。

迁徙流动是人类的天性和命运，古代蛮族、征服者、探险家、西方十字军和东方蒙古铁骑都曾在地域与空间的变换中扮演过世界舞台的不同角色。但是在美国西部开

发之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迁徙，成千上万的男女一代接一代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往一个既定的方向迁移，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没有号召没有鞭策，不是为了设防或充实边戍，甚至不只是为了发财，而是抱着使徒般的虔诚和朝圣者的坚贞，怀着对自由的神往和实现生命最高价值的冲动，带着《圣经》和斧子汇入西去行列，去履行上苍昭示的天命。

●向西推进，涉及到从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沿岸整个区域，其面积相当于美国最初十三个州的 7.5 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为界，向西推进的领土也超过 1783 年建国初期美国领土的 2.6 倍；西部开拓过程先后创建了 31 个新州，美国国家版图得以基本界定，一个濒临两洋，纵贯南北美洲的国度得以诞生；

●西部拓殖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与生产资料结合成伟大的经济开发运动，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生产力的伟大解放；

●西部开发，不仅实现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美国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速度；加速了美国东海岸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向西转移的进程；

●西部开发促进了“小麦王国”、“棉花王国”、“畜牧王国”和“黄金王国”的兴起，奠定了美国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交互促进发展的雄厚基础，确保了美国基本产业理性分布和均衡发展的框架；

●西部开发带来美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著名的“坎伯雷大道”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部；1830 年建成的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只有 13 英里，半个世纪后(1880 年)，美国已建铁路达 150086 公里，接近整个欧洲铁路总长度；把哈德逊河与伊利湖相连、全长 363 英里的“伊利运河”将东部第一大港纽约同整个东北地区连结起来，又经过五大湖与整个中西部连为一体；

●西部开发最终促成了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 20 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亚洲还是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其国内需求被刺激到如此令人羡慕的程度；

●西部开发丰富和推进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西部三十几个州作为“平等成员”加入联邦，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形成了一个与南部、东部和北部在利益上不尽相同的区域集团，从而直接改变了美国国家权力中地域力量的对比，并对其立法活动产生了深

远影响(美国众议院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参议院名额则按州权平等原则选派),西部还培育和推举了如托马斯•杰弗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优秀的总统；杰克逊以“多数统治原则”闻名美国政治史，林肯不仅反复重申“人人生而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且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模式，并坚持“劳动高于资本并应当受到无与伦比的最高的尊重”的信条；西部俄亥俄州在 60 年间为美国输送了 8 位总统，3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35 位内阁成员；最早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是西部而不是东部。

……

关于美国西部拓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意大利历史家罗利亚认为，美国从东部向西推进的历史，每一页都能发现社会进化的记载，他断言：“欧洲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光辉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进程”。⑵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高度关注大西洋彼岸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⑶，北美大陆成为“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⑷美国西部开发大功告成后的 1925 年年底，还是苏共领袖之一的托洛茨基用几乎是艳羡的口吻描述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6%，生产的粮食占 21%，其他谷类作物占 32%，棉花占 52%，木材制品占 53%，生铁占 62%,钢占 60%,纸占 57%，铅占 46%，石油占 72%。全世界 38%的水力资源，59%的电报电话线路,40%的铁路和 90%的汽车都属于美国，美国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物质财富。”⑸

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美国本土约 300 万平方英里，可耕地高达 40%，中国领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可耕地仅占 10%，而美国可耕地 80%以上集中于西部；大陆冰块曾六次来回于美国中西部，使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中西部都覆盖有肥沃松软的沃土；美国处于北温带，年平均气温在华氏 40－70 度之间,中西部处于第 100 度子午线以东,年平均降雨量在 20 英寸以上，正是农业生产所适宜的雨量；美国 295 条大小河流中可供航行的水路约 26,410 英里，其中有 145 条河流 20,730 英里可航水路分布于西部，密西西比河遍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洛基山脉之间 21 个州，其流域面积达 125 万平方英里，占美国本土总面积 40%，其总排水量 3 倍于圣劳伦斯河，25 倍于莱茵河，380 倍于泰晤士河；中部大草原堪称世界上最

大最好的“天然牧场”；此外，西部煤、铁、锌、石油、石灰石和黄金、白银等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巨大的资源构成西部开发的巨大物质前提。

同样不应忽略的是，美国西部拓殖确非事先设计规划的产物，但美国联邦政府也绝非可有可无或无所作为，事实上，从《独立宣言》基本原则导引出的以“公共土地”和“宅地法”为核心的西部政策系统（《土地先购权法》，1785 年、《土地法》，1800 年、《新土地法》，1804 年、《地价速减法》，1854 年、《宅地法》，1862 年、《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1847 年、《沙漠土地法》，1877 年等）对于美国人民开发西部时的“历史首创精神”发挥了重要的鼓励和推动作用。

十九世纪末，联邦政府组织美国陆军工程师团会同有关高等学院、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集团进行联合研究，共同制定出密西西比河水利交通发展规划，是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典范事例。美国国会 1933 年通过《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1961 年美国政府颁布《地区再开发法》、1965 年美国政府颁布《公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政府法规，继续对中西部发展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二战前后，美国在中西部优先发展了军工、原子能、电子、通信设备、生物制药以及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对“阳光地带”实行农业财政补贴，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技术和人力继续向中西部移动。

美国西部开发具有人本学意义的成果，是一种新精神的出现和新人的诞生。凡是亲身参与或深入思考过西部开发的美国人，都把美国西部看成一个象征、一个神话、一个充满挑战和奇迹的乌托邦、一个连结“文明”与“野蛮”、“人类”与“自然”的花园帝国。

美国早期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等很早就相信一种“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g)，他们预言说，欧洲的未来寄托在美洲，美国将成为希腊、罗马、西班牙、英吉利之后的世界权力的继承者，从今以后，踏上北美土地的将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流的人民。

杰弗逊的密友、林肯的坚定支持者、西部作家和发言人威廉•吉尔平以一种启示录的方式指出了美国人民的“天命”：

美国人民的无可推让的命运是征服大陆——冲过这片广阔的土地直达太平洋——以激励它的千百万人民，使他们振作起来…——以鼓动这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群众——在人类事务中建立新的秩序…——使老朽的民族获得新生——…惊醒万年的沉

睡——把新的文明传授给古老的民族——确认人类的命运——把人类的事业推向顶峰——使停滞不前的历史重新启动——使科学得到完善——用和平的征服来装饰历史——在人类身上洒上灿烂的新光荣——把全世界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瓦解专制而颂扬慈善——宽恕沉重地压在人类身上的咒语，把幸福之光洒满全世界！⑹

美国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宣称，他将为“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地区、大平原、洛基山脉和太平洋斜坡”而写，为西部“自由健康的生活、简单的膳食、洁净而甜蜜的山泉、轻松而庄严的面容、明澈的眸子和健美的体格”⑺而写。美国诗人用“GOTOTHEWEST”唤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西进先驱者形象：旧世界的人民已经迷失方向，惟有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先驱者越过了高山征服了荒野，通往西部通往太平洋的历程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纪元，一个崭新而光辉的大时代。

美国西部文学之父詹姆士•库珀以《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大草原》几部小说献给美国新的民族英雄：农民、山地人、伐木工、牛仔等，他们充满男子汉英雄气概，不理睬“文明”社会中的一切教条和虚饰，他们通过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而敬畏自然和上帝，他们由此滋生出一种宽广的心境和淳厚的道德，可以发现人类真正伟大可爱的事物，并为之奋斗。

西部开发最终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辉格党人杰索普•司各脱认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的巨大内陆河网和纵深一万英里的铁路以及纵横绵延的森林田野将使全体美国居民休戚相关，品性相通，情同手足，不可分割。道格拉斯和林肯这两位西部政治家曾为捍卫国家统一而感情冲动地指出：

合众国人民所拥有并居住的地球表面的这一部分很适合于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居住的处所，而不宜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国家。

万能的上帝将山河平原作如此的安排以表明这片土地永远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让任何人试图割裂神圣的天意所施于我们的不可分裂的一切！⑻

1893 年，美国近代边疆学派创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边疆假说”，首次对美国西部进行历史学的总结：“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⑼

特纳特别强调西部开发和边疆传统对美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意义：

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实际事务而短于理论、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那种随着自由而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机。⑽

特纳认为，西部开发对东部和旧世界的主要影响是：a.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的形成；b.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c.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d.从边疆生活中产生了新的民族精神和极其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民主诞生于自由土地”，“美国的民主决不是出自哪个理论家的梦想，不是装在苏珊•康斯坦特号船运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由五月花号载到普利茅斯的。民主坚实、强大、富有生命力的姿态来自美国森林和原野，每次接触到新的边疆，它就获得新的力量”⑾，特纳作为美国西部神话最虔诚的信奉者，曾满怀激情地宣称：

在我们这片广漠的草木丛生的大陆上，缓缓流进了第一代欧洲拓居者。欧洲人、欧洲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渗入了美国的原野，这伟大的西部将他们搂入自己的怀抱，教会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命运，训练他们适应新世界的新环境，以及为满足新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制度与机构。……只要有这样一片位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原野向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一切身心健全并愿为自己创造一个落脚之处及谋生之道的人们敞开大门，那么就不会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东部的社会开始失去对民主理想的信仰，一旦社会有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迹象，她，西部，就会开放新的空间，以其丰富的物质宝藏，以其净化灵魂的土地建立起新的民主，使美国重新发展。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⑿

然而，美国的资源和边疆并非无限。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已经开始由于“西部的消失”而陷于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西部神话”逐步让位于各种新兴力量的协作和综合发展。这一认识反映了美国社会新的历史转型，并形成美国进步政治家的新的政治哲学。它成为资源保护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待遇”的“反托拉斯法”的基础；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试图以遏制工业垄断以保证个人拥有经济发展机会的“新自由”；影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制订“新政”，以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过去由边疆这道“安全阀”所提供的安全和机会为“新政”的前提；促成了哈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与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二者都力图经由立法而非扩张的社会秩序下的自由企业未提供优良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中国家对社会各

种需要的关怀。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用如下语言总结美国后边疆时代的哲学：

我们再也不能逃到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地区：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环境的主人。……绝对的必然性已经迫使我们抛掉过于惬意的迷信，不可迷信美国的国土不可思议地幸而具有各种免疫力可以消除经济失调，也不要迷信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大家都单干而不依靠政府的合作——可以经受并抵制各种形式的经济混乱或危机。⑬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美国西部开发已于上世纪初停止，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已永久性地沉淀在美国民族性格和国家制度当中。其最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文明的资源，将发财的冲动、梦想的激情、改变命运的愿望和创新历史的雄心壮志对接于那冥冥之中的"天命"，对接于那虽然最终会消散却已永载青史的"神话"，从而避免愚蠢的失误和难以补救、不可宽恕的悲剧以及低级形态的恶性循环。

※※※

中、俄、美三大国之间，无论有无可比性，但在合理认识和开发上帝分配的土地－空间上，都有各自的历史责任，也有可资相互借鉴、启示的经验教训。

与俄罗斯东部和美国西部不同，中国西部自古不是国家文明重心之外的附属地带，也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它没有西伯利亚辽阔，也没有美国西部肥沃，但它拥有俄罗斯和美利坚所没有的独特景观和位势。

这里不仅有世界的制高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是哺育四分之一人类、滋润亚洲大陆的万古渊源，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长江的万古源头，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天然屏障，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摇篮，而且拥有世界十字路口——古代欧亚轴心文明的交汇处，拥有世界文明遇合交融的历史长廊——丝绸之路，拥有从西周到汉唐中国若干古代王朝的幽灵，拥有东方主要宗教与雪域高原参天化育的神奇史诗，还拥有两千多年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不朽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拥有使中原文明(更遑论东部沿海文明)黯然失色的神秘灿烂的三星堆上古文明，以及可与"出埃及记"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阻断了日本法西斯铁蹄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然而，近五十年来，近五百年来，中国西部毕竟沉寂了，落伍了。它远离海洋，远离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甚至也与东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渐行渐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西部开发作为中国当令主题的讯息一旦由传媒发布，神州大地确也为之

一振。它像一场姗姗来迟的压轴戏，因主角缺席而无法启幕；它像一柄笼统的路标，却向国人发出一个历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们也有一个西部，那也是一个伟大的空间。

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将反复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加以连续并往前推进的努力，也是将中国带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国从上到下获得一个共识：由于入侵、起义、造反、失误、浩劫、动乱，中国对历史挑战屡屡作出错误的判断，多次丧失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必须迅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之需要世界毕竟急于大于世界之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只有攸关全球利益、影响人类文明而又独具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为 21 世纪世界级的大手笔、大思路和大战略。

因此，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理应成为中国西部开发最广阔的时代舞台、最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最严肃的评价系统。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条件下，土地、资源、资金、人口、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目标、模式乃至传统国际法和主权概念都在而且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第一个大局”（东部发展）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性转进，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困境就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础，主要在西部而不在东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最后的依托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东部。西部开发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历史运动大都是一种宏大的天地自然结构与一个大国国民的伟大遇合，是一个伟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并由此创新历史的奋斗历程，它赋予所有的经验和细节、所有的活动和指标以象征和神话的光环，使所有参予者在改变一己境遇的奋斗中领略到人类和民族共同体固有的长久博大的传奇般的命运，从而根本摆脱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异化处境，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复归。

这种象征和神话，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中叶产生于个别领导人大脑的乌托邦迷妄，那种以“革命”和“战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及其哲学，正是今日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摒弃的历史残渣。当代中国的幸运、中国西部的幸运，在于已有整整一代人在相对开放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在于一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缘，让西部开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头戏堂皇排演。

开发中国西部极为丰富的矿产、水利、生物多样性、生命基因和旅游的巨大资源，而又不因各种局限性铸成无法补救的大错，必须广泛借助能够理解且愿意善待中华的国际力量。西部开发应当成为中国与国际先进文明全面对接、中国与世界全面合作的最大特区。根据世界经济分工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诉求，将西部划片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内涵、不同区域的国际合作开发区，不仅符合现代国际合作惯例，有利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国胸襟和长远利益。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直接参予和领导一项巨大的国际合作、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开发运动，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增长中国人民参予世界级开发工程的见识才干，增强中国人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西部之于中国，是在正常和非常情况下可资寄望的主要生存、发展空间。困扰当代中国、关涉中华民族生存前途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人口、粮食、能源、土地、生态、交通等）无不只有通过西部开发才可望得以缓解。而作为历史性运动的西部开发的前提和主轴，是由东向西相当规模的国内殖民运动。

向西殖民，是中华民族在未来岁月中生存、发展并改变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格局，从而改变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相关格局的历史运动；

向西殖民，是中国人由世俗功利性商业命运转向回归自然、创新历史，重新塑造和丰富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的庄严使命；

向西殖民，是中国青年一代超越物质享受型和精神虚空化的现代工商社会人性异化，重建淳朴、健康、高尚和神圣人生的天赐良机；

向西殖民，是中国社会不仅利用“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以强化经济活动能力，更以“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本身”的伟大法则，在雄浑西部的开发中更新现代化理念，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伟大实践。

欲实现西部开发的伟大目标，推进西部殖民的历史运动，必须超越东部发展的既有经验。可为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持久效应的国家政策，是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西部开发的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理念和法则，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仍然占居中国大多数的数亿农民的不言而喻的梦想和要求。俄国十月革命的“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从正反两面证实了土地对于人民和

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美国的“公地出售”和中国的“家庭责任联产制”对二十世纪美国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性意义。

在现存制度条件下，对西部开发、首先是对土地资源开发的殖民先驱提供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将对中国一再推迟又无法绕开的“产权革命”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惟有成千上万具有进取精神和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不只是前往西部洗钱淘金掠夺，而是将其资金、事业和身家性命押给西部，并体面地获得经济和人生的酬报；惟有当他们的先驱地位为全社会所首肯和颂扬，他们作为民族精英和时代候鸟上升为象征和神话而不朽；惟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他们开辟的新边疆成为土地主人并创造出令世界艳羡的新的物质和精神家园时，西部开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肉文本，历史桂冠才会降落在这片奇迹丛生的土地上，中国人才会由此感受到天命眷顾的幸运和荣耀。

美国人正在以他们的哲学和利益重新思考和制定新世界秩序，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正在整合他们的思想和力量，世界正在迷茫和浮嚣中喘息，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中国也许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大国形态。“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西化”和“走自己的路”曾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西部，没有西部开发的时空天地，中国很可能继续执于一端而陷于民族生命的涣散以至分裂，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成本依然会分外高昂。中国在向红色、白色列强求教的艰难历程中，总是创伤多于友谊，教训胜于经验，失败超过成功,中国永远只是一名迟来者、摹仿者和被动者,最多是一名令人侧目的挑战者；殊难成为一名建设者、合作者，甚至一名领导者。

毫无疑问，需要在经济、技术、教育、金融、法律、环保、人才、增长模式、东西部合作诸方面为西部开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系统，需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现状、西部民族关系、区间差异诸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以使所有技术性方案和步骤获取充量的信息、理性的支撑和政策的保障。

而富于形上哲思和天下观念的中国人，不必统通专注于功利性安排。把西部开发仅仅当成又一轮经济热潮（譬如深圳、海南、北海、甚至浦东），是对西部及西部开发最严重的误读和亵渎。

西部幅员辽阔的土地－空间给中国人最大的机遇和惠赐也许在于，对人类既有文

明、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予以一次全新的综合，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社会主义信念和资本主义经验之间、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传统社会和当代社会之间兼收并蓄，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新路。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西部开发也许是人类克服文明异化，重返自然，实现自然性、人性和神性充实完满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中国“天人合一”的伟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不朽训诫将在西部开发中重现其精彩，重放其光芒；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奋斗、尤其是中国以加入WTO为前锋的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努力，正为西部开发开辟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各阶层对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的重新关注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历史动力，都将使西部开发可能具有在世界史上有例可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史无前例的划时代意义。

惟有一场刷新历史纪录、重塑民族精神、创新既有制度并体现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西部开发，才配冠以“西部‘大’开发”的美称。

命运只对真正伟大、高尚的民族微笑。千年易过，中国的时辰正在升起，让它在西部辉耀吧！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2页。

⑵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13页。

⑶、⑷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页。

⑸托洛茨基：《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31-47页。

⑹威廉•吉尔平：《北美洲人民在地理、社会及政治上的使命》（费城，1874年），第130页（引述1846年信件）。

⑺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1860年），第183页。

⑻艾伦•约翰逊：《斯蒂芬•A•道格拉斯：美国政治研究》，（纽约，1908 年），第481页；亚伯拉罕•林肯：《致国会年度咨文，1862年12月1日》（《亚伯拉罕•林肯文集》，纽约，1905-1906年）。

⑼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1893年），第1页。

⑽弗雷德里克•J•特纳：《未来的诗人》（《特纳书信文件集》，威斯康星，《大学报》1883年），第4页。

⑾弗雷德里克•J•特纳：《西部及美国理想》（纽约，1920年），第293页。

⑿弗雷德里克•J•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1893年），第255、267页。

⒀罗斯福：《致国会的咨文——国顾政府的概括目标及其成就，1934年6月8日》（《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页。

通信

中国问题——王康与刘宾雁通信录

刘老师：

小雁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这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这两年我认真思考了一些问题，简要地向您谈谈。

一、中国统一问题可能是今后若干年内最重要的事象。当然这种统一决不再是如秦汉明清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也不简单地是如北伐和抗日那样国共两党的“合作”，而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具有现代社会制度并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的重新建设，这些条件主要有：①大陆十年改革带来和造成的现代民主意识；②大陆东南沿海与内地在经济和社会展上的不平衡；③大陆占总人口不足 4%却占国土 1/6 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潜在冲突；④中央权力历史性的衰落与地方权力不可扼止的增长的矛盾；⑤台湾经济、尤其是民生演变（包括台独运动）对大陆的影响；⑥1997、1999 年港澳回归祖国后对大陆的纵深影响以及对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影响；⑦俄罗斯在若干年后与东北地区的地缘关系；⑧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太国家对中国未来统一问题的关注形式；⑨大陆政治老人对统一问题的心态和能量；⑩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海外知识分子、国内学术界和“第三代”知识分子）对统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参予程度。

也许，与苏俄帝国的解体不可避免，从历史角度看是根本的进步一样，中国恰恰需要以走向新的大统一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这种统一的性质、过程、方式和目标只能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合力选择，但它肯定会大大改变中国的现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恐怕是如何将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与人类进步潮流的正面结合，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分外重要的。

反之，如果中国不走向一种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联邦的和民主的统一，则很可能陷入内战或内乱，中国历史将倒退若干年，并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造成混乱。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人民价值观念的现状，社会震荡将是启示录式地剧烈可怕的。

可以预期，一旦国家统一问题成为公开话题，中国人被压抑多时的历史政治热情将会迸发而出，因而，目前就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大陆知识界现在不可能正面讨论这一问题，但为期也不会太远了。

如能在海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声音，并有一专门研究和讨论中国统一的刊物，则是中国的幸事。

二、和平演变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唯一和最少震荡的方式。尤其是把“现代性”理解成经济发展与人的需求、社会发展理解成人的保障、政治发展理解成人的解放与共处，并考虑到法律体系和社会具体工程的积累性和连续性，那么应当承认，即使在专制社会里，现代性也可以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当然是非暴力、和平递进，改良、嬗变和数量取胜的性质。严格说来，和平演变首先就有利于专制统治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历史责任心的最低程度的检验，和平演变从历史进步的方式上根本结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种以权力为目标、以土地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方式，它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自身的性质之中，同时也是对以往暴力手段的历史性扬弃；在深层观念上，能真正改善一个世纪来，尤其是 1949 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和进步观，缓解中国社会的重大危机，提供一个新的有希望的社会发展的整体哲学。和平演变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人民，您曾经有过许多思考。

三、中国的文学艺术是转向中国人现状和命运的时候了，“文以载道”应当成为新的艺术标准，中国文学艺术家对中国人所负责任是无可脱逃的，这是中国作家的大幸而非大不幸，是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创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西方现代艺术及其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已成枯竭之势，而俄国作家很可能重新成为中国作家的同志和兄弟。中国文学艺术何去何从，这在文艺界内部就从未解决，应当说是有负于中国历史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家确实应当是民族的“马”，十数亿生灵太需要如“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一类大作品了，中国人在内心精神上的虚空和混乱是最令人忧心的情况。我看到在奥斯陆复刊的《今天》，为其丧失中国诗人本质的选择深感失望。

四、历史宿命论、新权威主义和单纯经济决定论以及虚无主义是中国人精神发展上的四大迷误。其中经济决定论因有其相当合理性，但我担心它更会导致权力经济和中国人过早的、畸型的商品意识，在政治结构继续强化的条件下，经济目标会使市侩庸人哲学更为泛滥，而使中国人亟需要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追求更为萎缩，这根本上恐怕更有利于现代权权主义，而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

五、六四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越来越重要。只有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一角度反观中国问题，才可认清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生活在大陆的人可以感觉到经济发展背后当局的新世界观和世界战略眼光，一当中国政治权力以某种方式完成新的变

异，一个第五罗马、亚细亚式的大帝国应运而生，西方和世界将重新面对冷战，甚而比冷战争更危险的危局。

刘老师，生为当代中国人，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您身上早已体现了的品质。刘亚平女士已转达您的意思，我慎重想过后，觉得是否能推迟安排。

近期与二、三朋友商议，先去南方数月（或数年，允洲等也已到海南），以便有一相对安宁稳定的小环境做些实事。这两年多辗转迁徙，难以长久维持，也难以尽责。

此事可能否，盼空时示之。可直接写信到：（略——编者）

好，就写到此，祝您与朱老师

大安！

W.K.

2.8.1992

————————————————

王康：

手稿(指王康 1988 年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编者)传来，先是“乱码”，设法解决以后，由于原稿无页码，印刷中又不慎落地，又由于脚注与本文界限不清，很难整理成序。其间一度辍止，我的“书房”又太乱，现在手头仅有四十余页（目录应是六十余页），但从章节看又似乎全了。总之，很不顺利。但我仍然非常高兴：这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有关我的文章、著作中最深刻的一部,我本人也受到启发，比如于“人妖之间”，我就一直未从权力这个角度看。

今天只能初步写几点想法。待细读全文后，也许还能说得详细一些。

一、这部著作对于今日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当代中国的论述。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而这个主题如你的许多思想，对中国中青年人认识眼前的中国以及 1949 年时的中国何以会蜕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将大有助益。

二、1979 年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在你 1988 年写此书时尚不明显，我却已有察觉。知道林贤治这个人吧？他在《书屋》（2000 年 3 月号）上的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对于作家、特别是五七年右派作家的分化有精辟分析，可供参考。王蒙所代表的那支力量，是从“改正”那个时刻起便决心走另一条路了。我看过几本当代文学史的同一主题的论文，大都态度暧昧，含混其词，唯林这一篇最彻底，

深刻。我认为 89 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放弃责任造成。……(此处略有删节——编者)

三、你写到五七反右时，对于毛的谋略暂时搁置未写。现在，“引蛇出洞”早有预谋一事已成定论。那是他在延安整风中和后来 1959 的庐山会议上都用过的一招。近读几本有关胡风的书，发觉过去我们对 55 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及其后果完全无知。有胡风及其同道在，中国三十年文学就不会是一片沙漠了。我觉得，无论反胡风反右派，毛都另有所图。1955 年，是为了震慑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反对盲目加速农业合作化那派力量；1957 年则因毛已有搞“大跃进”之意，反右是为了扫除这方面的障碍。无论如何，以毛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于胡风一小批文人完全不必采取那样野蛮的和不顾起码信义的手段，右派也完全不必打那么多（1962 年毛反对对右派甄别，就是因为他明知冤枉者太多，一平反他就难堪了）。为的就是做给党内反对派看——果然很灵。

四、1979 后我的行动，端赖人民大众的支持（包括党内同情者），而这又是文革带来的巨变。你本人和你同代人（乃至更年轻的，如何清链，文革时不过十四、五岁）文革中的觉醒，我认为是 1949 年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也不仅是“知青”，我见到不少工人、农民、下层干部，同样摆脱了奴性，有了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苏联、东欧（也许波兰除外）就缺乏这样一支平民反对派，全是知识分子，且是“精英”，远离工农。Sakharov 和他夫人便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劲头很足。我自知从来不是个勇者，也非你这样的智者，79 后坚持走下来，并非由于不怕牺牲，而是“起初心地单纯，不觉得有何危险，而当危险出现时，已发现我背后的力量可以依恃，这才继续走下来”。

五、1985 年很重要，世人只知 1981、1983 和 1987 三次逆流，其实 85 这次反对改革的反攻更强大，只不过未采取运动的形式而已。那年三月（？）胡耀邦被逼得发表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交出了已争得的全部新闻自由。改革派主将项南、雷宇被撤职。从事经济改革的中、下层干部纷纷受审、下台甚至入监，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全面审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三十八年是与非》后，陕北帮大兴问罪之师，逼得胡耀邦一个月不敢开书记处会议（因为一开就必定要讨论我的问题），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说了几句于我不利的违心的话，还要习仲勋出面以违背事实指我有错的方式向陕北帮求和。《第二种忠诚》在那种情况下能问世是很难

得的。1988 年在美国的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刘宾雁到 1985 年还提倡‘忠诚’，保守到什么程度!”刘晓波、陈军拟于 89 年春在 NewYouk 召开“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批我，放出的流言是“刘宾雁是在待价而沽，随时准备投降中共”。他们不懂中国国情，不能理解在那个时候以“二忠”方式反对中共是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中国是索尔忍尼辛无法存在的国度；“打倒中共”连平民反百姓都难以接受。

1985 年，报告文学已难发表。对于文革 20 年，我也只能以写西德的方式提醒大家反思。无计可施，我才在《文汇月刊》上发《我的日记》，因为可以绕开“凡批评稿件必须经被批判者上级审阅，本人过目”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又把有些事情捅出来，或使有些人的处境有所改善（也真起到了这个作用，为鞍山三律师，朝阳文化馆被逼婚的姑娘等）。

六、“二忠”中提倡的那种精神，是我 1952—57 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就极力提倡的。那时是发动青年工人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很多工厂找这类人物，结果只报道了一、二人。原因是国营厂矿青工几乎全是农村来的，生活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精神。“干预生活”口号我是 1954 年从苏联引入的，但我在精神上、心理上亟欲对周围世界有所影响的意愿却早已有之。也许可以说这同胡风 40 年代在文学理论上所提倡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不谋而合。而这恰好是毛泽东所敌视的——他要你出大力、死卖命，但不能自发、独创，尤其不能有怀疑和叛逆精神。1958 年我已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山西农村，人民日报一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我读后心中很不舒服，几日闷闷不乐，觉得那样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文革期中四人帮为什么年年五月都要纪念延安文艺讲话周年？猜想一是由于毛对知识分子的贬损，一是奴录主义吧——从文艺到生活。

七、1983 年（？）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同志出于好心（他也是五七难友）让我采访张海迪，朱伯儒，说“也好改变一下形象——他们老说你只写阴暗面”，我本来对这种先进人物是没有兴趣的，但采访中发现也还有些可贵的东西：我有意强调了张海迪身上那点“异端”色彩，如朱伯儒与雷锋之不同（我特别征求过他本人的意思：你做好事，是在和雷锋不同的时代，有些事分明就出在地方党委门前，本该他们管的，因而——你是否时常是憋着一口气在做好事？他完全同意），那两篇东西是张、朱在写他们事迹的文章中最满意的。我更喜爱的人物还是《孤雁失群记》的主人公及他的同情者，以及其他敢于抗争的人物。最后一位，是我出来后 1988 年 1 月号《人民文

学》上发的“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中所写的王福锦。

听朱洪说你已迁居，E-mail 号码也变了，此次朱先生来证实果然变了。能偶然结识朱君，是一幸事。他常往来于大洋两岸，我可以多听到些你的消息了。此次带来你的又一部 TV 作品，我还要过几日方能欣赏。

顺便问你：关于胡风，我手头有梅志的《胡风传》，万××的《殉道者》和林贤治一文。写他的书有多种，你觉得哪本最好？还有什么其他好书？我可以让女儿买来。

也许已告诉你了：我去年就该完成的一本书，刚刚动笔。是透过我一生经历（不是自传）写 1949 年以来中国、中共何以会以及怎样沦落成今日这个样子的。工程浩大，计划、提纲（思想）多次变动，我一边学电脑汉字输入，一边想一边写，打字速度居然进度不慢，甚是欣喜。

美国历史学家 Habsbawn 的 20 世纪史——“TheAgeofExtremes”，中国译为“极端的年代（世纪 2）”很好，不知你读过否？奉劝一读。

我的 E-mail 地址更变：（略——编者）

新年—春节快乐!

你的信不在手边，写了这些，也不知是否你所需要。有何意见、要求请随时告我。

宾雁

00.12.31

關于作者及其作品

北明：布衣孤筆說老康

按：时常通过电波，听到北明在遥远的异邦发出的声音，但从未想过要探究此人的思想和才华。

在京忝列于一位德高望重长者举办的私人宴会时，见到一位秀美、大气、谦和、文质彬彬的女士，即大惊：如此磊落，蕴满天潢贵胄之气的女子当为何人？

终于，我上前握住她的手：北明女士，我一直是您的忠实听众。

有幸先睹北明女士仅以半天时间为她老友王康先生所写文章，更是拍案：果然当她的才华竟然也如山河大地般地浩然、坦荡，真是文如其人，大气汤汤。

布衣孤筆說老康

在一個不大的餐廳里，毛喻原突然從書包里拿出一大摞稿件，說這是即將出版的王康文集。當然跟《漢箴》一樣，是“內部交流”。沒有什么比在瓦釜雷鳴的時代發掘亙古石經更浪漫的事情了。當時掂著那厚厚的一摞，我就想：無論漢語世界在 49 年王康出生之后有多少出版家，無論毛喻原還開掘了多少讓人瞠目的文化項目，只出版此書一本，毛喻原這個名字就將浮出這個喧囂時代，刻于中國近、當代文化復興的絕壁上。

幾乎在所有方面，王康都是中國的異數。

他此前在文壇不著一字，卻已受人之托，為十數種著述作序——他師出無名，文字和思想本身就是他的通行證。古今中外，世上似乎找不見這樣的先例。

他不屬于任何官方大學或機構，卻學識淵博，令教授學者們私下汗顏——他比麥基·布朗更合適充當知名學者們的談話對手。

他沒有專家頭銜，卻對俄羅斯、抗戰史、中國儒教、西方思想史、古希臘哲學如數家珍。那些關于俄羅斯的電視演說和文章，只是他碩大頭腦里諸多神經中一根神經上的分解符號。如果愿意，他可以在一兩個月甚至數天時間內，超越一個專家終生“吃飯”的那些勞作，成為任何文化學術領域的專家——他是中國的伏爾泰，耕耘在一個文藝沒有復興的絕地。

他曾經述而不作，決意避免為 60 年專制的文化荒漠留下任何可疑的綠洲。但他終于忍不住臨堂拍案，率性落筆，而且每每出華章，讓人耳目一新。比如他那近三萬

字的《科學家的選擇與責任·錢學森之死有感》，動筆前后，他分明焦灼于一幅二戰史詩畫卷的構思，卻在錢學森逝后第三天，一氣呵成——作為思想家，他比以賽亞·柏林更具有詩人氣質和寫意人生。

他是當代極少數通讀過二十四史的讀書人之一，但他絕非象牙塔里的教師爺。大道偏廢，覆巢之下，他“束帶立于朝”，聞雞即起舞，從不按奈入世熱情。他寫過近百個文化、影視、繪畫、歷史、城建、音樂、舞臺藝術“策劃案”，大都轉眼沒為閣樓塵章，少數一旦成品落地，則巨大而沉重。如他組織人馬繪制的八百公尺長的巨幅畫作《浩氣長流》，還原中國抗戰歷史，成為這個時代燙手的山芋，迄今無人敢于接納。——他被迫成為當代的李贄，為這個民族刻下一部又一部等待未來發掘的石經。

易幟六十年，雖然各行各業狀元層出不窮，中國萬里千戶之內已無孔丘，王康卻是中國當代絕無僅有的大氣象之人。生于長江沿岸龍隱路，長于讀書教書人家，他繼承了唐君毅一脈深厚的家學和道德，倚憑從天而落的超群記憶力和分析綜合能力，獨得中國抗戰首都重慶貞下啟元的氣脈和靈運。然而，最令我驚訝的，還是這五百年不遇之才同時具有超世者的良善、圣徒的擔當、殉道者的悲憫、獨往危世的義勇、徹底棄絕周食的原則。

因為拒絕與帝國合作，他的生活充滿傳奇故事。為了良知，他可以夜以繼日地勞作，只要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他就不食人間煙火；為了公義，他曾經為街頭被警察欺凌的農家女孩打出拳腳；為了維護“八九”榮耀，他曾經在洽談時，憤然掀翻了盛宴滿備的餐桌，同時廢棄了翹首以待的 260 萬援助資金；為了保證獨立的民間立場，他曾經于經費極度匱乏中謝絕了重慶財政部門登門資助抗戰大畫一百萬資金的好意；他期待兩岸關系正常化，以便促進中國民主，思想不脛而走傳到官方，他私下被中國高層官員要求赴臺灣考察，言辭懇切。他謝絕了。只要是官方出資，哪怕允諾來去默默不開言，他也敬謝不敏，絕不從命。他可以為中國前途命運出謀劃策，但絕不為此失去民間立場和獨立身份。他還謝絕過出任重慶市政協委員的邀請。自從“八九”后被開除教職，他就自覺地站在這個喧嘩帝國的對立面，視這個帝國對他的剝奪為正常、對他的偶爾青睞為異像。他謝絕任何索求合法福利待遇的忠告，用全然獨立的行動，向這個帝國宣告別爾嘉耶夫的自我確證：“我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我是這個國家的囚徒”。他知行合一，就像德國的朋霍費爾、內莫勒、巴特，波蘭的艾仁娜·辛德勒，匈牙利的閔德森蒂和羅馬的若望·保羅，恪守心中信念，腳下寸毫不讓。

自從劉賓雁、李慎之、何家棟等老輩人過世，他日益將“繼絕存亡”當作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生命樂章。他獨自踏上了俄羅斯貴族們走過的道路。那是一條殉道之路，荒野接著荒野，陰霾連著陰霾，荊棘貫穿荊棘。他“布滿血絲的眼睛充滿痛苦、迷茫，但是仍然放射光芒”（王康《我的精神麥加》）。

三年前，老康一次跟我談起他的寫作計劃。一口氣，他列出了長而又長的書單，其中有劇本《萬象師表——孔子》、《幽靈的聚會・馬克思與他的弟子們》；專著《俄羅斯啟示》、《中國的宿命・中國近現代思潮與歷史》、《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統一》、《人類的黎明》；傳記《劉賓雁傳》，長篇小說三部曲《詠而歸》等。這個集子匯聚的篇章都是計劃之外的邊角料，率性潑墨之作。不過，這些文字，幾乎每一篇，從思想到信息，從語言到思維，從立意和境界，從情感到知識，足以令當代漢字汗顏。

還記得我第一次讀到這個署名“王康”的人寫的《俄羅斯啟示》的文字，如同寒夜中的赤身裸體突然裹上了赫爾岑那件“農民的老羊皮襖”，溫暖的不僅是精神，重要的是恢復了體能：冰冷的肌膚開始溫暖，脈管凝結的血栓開始融化，僵硬的肌肉開始恢復彈性，活力突然注滿軀體。我看見前方出現道路，行進中的背影都是我丟失的兄弟姐妹的背影。那是我多年徘徊于精神荒漠中的一次洗禮。陰暗地上纏繞的毒蛇，黑暗原野上世襲的嘲笑、兩手空空、一無憑籍的孤獨統統在閱讀中被消解了。我曾經懷疑這是一篇譯作，因為這等血色心聲，中國的鹽堿地生長不出來。老康說，“八九”流亡中，他從美國之音聽到薩哈羅夫的去世，深受震撼。我猜想，在后來漫長孤獨的逃亡中，他從薩哈羅夫身邊看見了更多的圣徒和先知、哲人和戰士、詩人和作家。他克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第一次拿起了筆，把這種感受，準確地傳達給了他的讀者。篳路藍縷有大道。從那時起，在我們流浪的荒原上，就有了自己的弗拉基米爾大道，我們跰手骶足，扛起了自己的十字架，追尋著往聖先賢的足跡。

“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宋朝和尚這則偈語是王康的自我認同。他母親因為戰亂不肯將他生下來，吞服大量奎寧卻不得墮胎要領，他不受歡迎地降生。此后靠廉價米湯喂大。大學期間因為辦文學社引起官方嚴重關注，畢業后不久趕上“八九”學潮，并未刻意叛逆，卻被開除了语文教員教職。這偈語，是高爾泰先生書写的字幅，多年來掛在他自我放逐之后經營的“抗戰陪都文化公司”辦公室墻上。不知道是否命運作祟，也許注定大器晚成，自從他從墻上摘下這幅字聯裝進心底，他的文字思想和人格精神就開始通過互聯網迅速在中文

世界傳播。越來越多的讀者讀罷一篇愛重頓至，聞風而動，四處搜尋他的文字，放在自己的博客上、網站上、文集里，深受震撼的讀后感從四面八方匯聚成為動人的陣勢。這個時代無論如何墮落和愚昧，仍然期待啟蒙和拯救。我們的時代不缺少天才，老康這個天才可以改變我們關于天才的概念；我們的時代多產物質貴族，耿介拔俗的布衣老康，作為典型的精神貴族，讓玩味形下器物的"貴族"落入極為寒酸的境地；我們的時代，哪怕最知識的精英，都難免把自己的利益擺放在人權的公約數中，老康代表另一種精英，在讀書人魚貫而入的迦南地，他必定高陽道德與精神的旗幟，因為正是在那里，這個民族穿上了華麗的行頭、倒在了污穢的陰溝；我們的時代厚今薄古，老康總是回溯历史，振弊起廢，讓今天無地自容；我們的時代正從物質主義、民族主義走向帝國主義，而老康已經走出個人苦難，奮力抗起四分之一人類的十字架，前往他的精神麥加。

"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我必須說說老康的文字，雖然比起他的種種異象，這是他最不重要的特征。關于這一點最出色的表述，是他的一位中學同學、插隊同農的老友做的。這位老朋友在給另一位友人寫的信中這樣介紹王康及其文字：

"王康自來天資聰穎，面面出色。但我最想的還是介紹他的文章。八九（1989）年始，他幾乎在西部流亡了十年。十年歸來，其文章已如利劍出鞘。他有詩人般氣質，語言古拙、秀美、坦誠、真誠，其文章之勢，浩蕩起伏、豪邁激越、純出自然，徜徉如白云出岫，奔騰如江河下山。卻又如血如淚，如歌如泣，如皓月蒼涼。以天造地設鬼斧神工褒之不為過，我沒有虛夸"。

這正是我對王康文字的感受。他天然質樸、高古雍容、真力彌漫、氣象萬千的文字，使我不斷懷疑一個多年的體驗：大江涌流，只能是筆墨被迫中斷后的心象；音樂的故鄉，文字永遠不能抵達。讀老康文字，我不斷告訴自己，沒有什么樣式的情感、思想、意念、以及微妙的感受漢語不能完美表達。只要你如老康那樣博古通今，把大部中外經典下載到肌膚，同時具有他那樣敏銳的感知、超強的記憶、非凡的心性。

老康六十年的存在，挑戰我的認知力、道德觀和生存方式。對此人，我一直感覺目不暇接，逮不從心，神秘感始終不能消弭。他今日卻突然要我寫一篇有關文字放在這本野生文集里。他又一次出格了：言微如我，豈是導讀人！何況這是我在幾乎任何方面都只能望其項背的兄長。我多年被綁在自由世界的新聞戰車上，大雅久不作，卻廟堂內外、坊間官場，不經意間閱人無數。不少光環都在近距離接觸或遠距離觀察中，

無可奈何地消失了。老康這個光體，本不在我的色譜內，他的光環不期然奪目之后卻不再消失，我力圖找到原因而不得。今夜，我誠惶誠恐又相當匆忙地寫下這篇短文，依舊只能看見這個人因為過于純粹而魅力非凡，斷非俗世中人。他的文字里外、上下、前后，實在找不到這個時代的絲毫腐朽之氣，或者刻意反抗腐朽之氣，而像是出自另一個陌生而高貴的世界。我希望讀者讀罷文集，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人生極限，一種理性挑戰，一次精神洗禮和一番審美享受。或更進一步，如包括我在內的他那些激動的讀者，開始看見自己腳下的道路。

北明

200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

北明：王康赴美签证经历纪实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九日，王康出现在成都美国领事馆门外等待签证的队伍里。队伍很长，大约四、五百人，不时有大客车将满载的中学生御在门口。

从上午九时到下午近一时，漫长的等待之后，王康终于得以进入那片小小的美国领土。五、六名武警纵深肃立，王康遵照要求掏出手机，关闭存于小箱内。开门穿过一条走廊，进入签证大厅。厅外小房墙上有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照片，显示美国最新行政当局代表的国家权力。

所谓大厅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厅内几排木椅已人满为患。坐椅正面两个窗口，一个专为美国公民服务，一个接收中国公民赴美文件。一位美国中年男人和一位中国中年女性，分别在两个窗口内接待。右侧墙壁另有三个窗口，全是美国雇员，靠近正面墙的第一个窗口是一位白人女性。

王康在末排边缘觅得坐位，掏出《惠特曼诗精选》，待全书 120 页 30 首诗看完，才听到传唤“王康”的声音。与他人一样，王康把早已准备好的装在一个透明塑料夹的有关文件递进第一个窗口。

约两分钟后，美国女人开始发问，语调柔和，流利的中文有明显的美国腔。

“请出示单位供职证明。”

“没有。”

“请出示银行存款证明。”

“没有。”

“请出示房产居住证明！”

“没有！”

美国女雇员抬起眉毛，差点就问出一句话，那你做什么来了。她没这么问，她问的是另一句，等于重复一个她眼前不可思议的事实：

“什么都没有？”她真是够温柔。

她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王康此行并非要考验签证官的耐心，他也没有准备让人家拒签。事实上，他极为重视这次签证之行，以至于无意中把签证日期提前了一天。也就是说，他在此前一天，就出现在成都美领馆签证窗前的长长的队伍里了。那天是十八日，站在非他所属的队

伍里，他浑然不觉。两小时后他在领事馆门外岗亭接受询问，经两处武警查阅，预约的当日名册中并无王康姓名。王康不以为然：

“你们可能错了，我的预约时间是今天，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

“我们不会错。”

“美国人出的错不在一、二!”

“我们不是美国人。”

王康退出。他在众目睽睽下辗转拨通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签证预约中心。几句通话过后，王康恍然：正确时间确是明日此时，六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美国人这次没错，错的是他自己。看看周围人群，这位人称“老康”的民间思想家，为自己不谙世事露出歉疚笑容。

偌大西南，美国只设成都一处领事馆。将近两亿欲往美国的中国人都只能汇聚到这里来办理签证。不会驾驶的王康是请朋友开车，从重庆一道同行而来的。

重庆与美国渊源远胜成都。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司令部、美国大使馆、美军参谋团及新闻机构皆设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1943 年初中美签署新约，中方代表团团长飞赴华府即由重庆出发；同年底蒋中正夫妇远赴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共议世界战局，启程地也是这座云横雾纵的山城启程；日本经年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无差别轰炸”期间，1944 年罗斯福总统赠送中国一幅精美卷轴，盛赞中国为自由而不畏日本恐怖轰炸，赠的是重庆市民，赞的也是重庆市民；1945 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创始国之一，派代表团飞越太平洋，前往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宣言”，启程地仍然是这座世界反法西斯世界名城；几个月后，毛泽东在斯大林压力下应蒋中正之邀走上谈判桌，是在重庆；43 天中，国共两党领袖在此地多次会晤，共商国是，并在那里签署了注定成为一纸空文的“双十协定”，中国从抗战胜利走向内战爆发的历史性转换仪式正是那次著名的“重庆谈判”。

1949 年 12 月 1 日，重庆作为现代中国立于世界之尊的起点，被新政权革除，作为中国抗战首都的殊荣悉遭抹杀。翌日，王康在这座城市江边一条叫做“龙隐路”的山坡出生。“出源便遇打头风，不与寻常逝水同；浩浩狂澜翻到底，更无涓滴肯朝东”。高尔泰先生所书狂草曾经终年悬挂王康心头案前。王康思想寻列世界，但是他作为当代中国民间思想家的情感和精神基点，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一步。中国当年举世闻名的大牌记者刘宾雁曾经邀请他到北京立足，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十年地下辗转，最终

回归首丘。他在这里设立“抗战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结盟于中国近代自由独立精神，多部电视剧、政论片、访谈录和更多被删节的演讲、被枪毙的采访、被搁置的文章、被漠视的绘画、被废弃的草案、策划案……，揭示“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史诗，成为这座历史远去、忠魂飘散、遗迹铲除之际，先被意识形态阉割，后被商业与金钱出卖的城市的唯一知己和灵魂人物。他太知道这座城市与美国的纠葛了。多年拒绝出国之后，这是他第一次下决心登陆美国这片新大陆。他的诸多亲友同学定居美国，连儿子都成了美国人。但这并不是这次他改变既往主意的原因。他正在准备赴美行囊，仅按国内航班规定，就超重将近三倍，两人携带，后来还罚款 1500 元人民币。所带物品全部与中美两国联手抗战历史相关。6 月 18 日成都签证处的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是，即日签证处门外长长的预约签证队伍中，有一个人记错了日子。这种日子一般人不会记错，不过这人确实记错了。

次日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王康再到美领馆时，装在他心里的图景已经改了画面：日前被美领馆排除之后，他与同行的友人利用等候时间，前往都江堰凭吊大地震。两小时车程后，他们穿行于世外桃源般的古城，房屋坍塌，废墟网接，满目疮痍，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无差别大轰炸。行至二郎山都江堰公园大门，已有绿衣武警把守禁入。王康提议继续前行，他心中的画面继续颓败：川西地震嫌隙甚密的紫坪铺水库庞然面陈。这巨大水泥怪物，坝高达 150 余米，库内蓄水所剩无己，正有数十名工人在坝内作业，用长程水泥枪填补裂缝。四处黄衣军警巡逻。当地居民更为他们描述了一幅难以想象的景象：5 月 12 日下午 2 时，水库中心倏然冲起二、三十米高的水柱，将正在垂钓的十余人席卷而去。

鬼使神差中他们折到已闻名于世的“聚源中学”。颓败的画面沉沦到底：穿过路旁围栏，可清楚看见那幢埋藏着几百余师生的教学大楼，如垂死巨兽蜷伏僵卧。立即有黑衣特警猛敲车窗，禁止拍摄并令立即离开。

没有“单位供职证明”、“银行存款证明”和“房产居住证明”的王康，第二次前来排队签证的时候，心中满载着的是那些沉沦的画面。美国女雇员用美国口音传唤他的名字之前，在那不大的大厅里，掺和着大地震的景色，他刚好读完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全部杰作，接下来他就不得不把“没有”这个汉语词汇一连说了三遍。然后在对方的追问之下，又毫不犹豫地确认了一次。

关于没有单位供职证明，情况属实：王康是他于 1994 年流亡期中所办抗战陪都

文化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给自己出示供职证明，很荒诞。标明职务（“董事长”），在王康看来，无异于向这个他从不认同的社会投降，他的名片就从来没有头衔。所以，出发前在证明自己身份并加盖那枚他永远陌生的“公章”时，他像被人耻笑了一把。现在这张验明身份的纸页，不知藏在何处，也许已经扔进废纸篓了。

关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基本属实：行前他早已办好有二十万人民币存款的银行证明，不过那笔钱是亲友凑集的房款，与本案无关。重要的是，看到那个银光闪闪的“招商银行”防伪章，王康就像看到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如此花钱办理的财富证明，现在还夹在一个卷宗里，放在千里之外有几千册书籍的办公室内。

关于没有房产居住证明，完全属实。他寄居的那所大学，将当年的旧房证明书收缴了，而集资兴建的新房房产证明尚未办理下来。

在这三个事实背后，最属实的是，无论语种、格式，填写任何表格并画押签字，王康都有被迫就范之感。他的笔天生不为此着墨。他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信义之辈，一诺千金，与这个契约社会格格不入。勉强开具前两项表格，实在是赴美决心和诚意使然。忘了带它们，则因为潜意识里无法认可任何机构对他的审查——哪怕仅仅是程序，也不认可。至于房产证，正好没有，正中下怀。

签证官当然无心听王康这些具体陈述。她抬起眉毛，以提问的语气重复了眼见的事实之后，就听见了王康清晰的回答：

“你所要的没有。”

王康确认自己属于三无人员之后，用他特有的四川普通话和胸腔共鸣，在那个签证申请人很少说话的大厅里，一口气陈列了诸种事实：

“你所要的我这种人不大可能有。”

“？”

“因为我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同。”

“？”

“在中国，价值观不同，常常会决定你的处境，包括财产、地位，甚至命运”

“？”

“但是我有这个”，王康指着自己的秃头说，“思想。”

女雇员的眉毛一直没有放下来，这时抬得更高了。

“我到美国不是旅游观光，不是做生意，更不会移民。虽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

向往你们这片自由的新大陆。但是现在我已年近六十。我与美国只剩下精神上的联系。我是第一次办理签证，我希望实地看看美国，拍摄一部介绍美国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电视片。”

女雇员眉毛长举不落，好奇心更甚了。王康乘胜追击。

“按照你们的一般规定，你应当拒绝给我签发签证。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我理解并尊重这些规定。但是，万物都有例外。按照另外一种标准，按照美国的自由原则，我比所有这些有财产和住房证明的人，更应获准进入美国。拒绝一个深度理解并认同美国理想的中国人，将是我们共同的遗憾。”

王康最后提出，希望能向更高主管官员再申述一遍。

女雇员终于放平眉毛。却支起两手，捂住了头。

王康盯住她，沉默着。

女雇员思忖半晌，最后放下两手，抬起头说：我接受你的要求。你请等候。

王康重新回到座位。已经签证或被拒签的以及等待签证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大部分去度夏令营，少数去留学。一个胡子八茬的秃顶老头，混迹其中，什么证明也没有，只有伊索式的自白。他和他们之间并不仅为两代人，他们是全然不同的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身后那片巨大的满目疮痍的国土。

疲乏持续凝聚，正等待泄洪。他垂下头，关紧泄洪闸门，再读惠特曼。

将近半小时后，左侧墙壁通道尽头一扇门打开，一位五十岁的美国人径直走到王康面前。“我们到里面谈。”

一间办公室，一面美国国旗。一位大概是副领事的官员。一瓶矿泉水推到王康面前。

二人对视坐下，像一场谈判。

王康清楚，他必须直奔主题，不再发表关于自由、价值观一类宏论。

是陈香梅女士的邀请。

“陈香梅？我跟她认识，飞虎队，陈纳德，驼峰航线……”

“我们正是去拍摄一部电视片，其中包括你刚才所说的内容。”

“你们？”

“我和一位朋友，北京一个出版社编辑、摄影师，也是这次同行的助手。他已在

前天，十七日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通过签证。”

王康掏出一直插在衬衫里的兰色水笔，写下友人的姓名。接着说，“2000 年我的公司曾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五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王康从塑料袋里取出 DVD 光碟，“其中涉及到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作战情况。你知道，中央电视台由政府控制，把关很严。”

“把关？”美国官员的眉毛也抬了起来。

“把关，在关口把守。对，审查。所以，美国空军作战的背景，过程，影响，中国人到现在也很少知道。中国有这么多反美分子，如果他们了解美国，情况会大不一样。”

“那你们这次——”

“我们这次是独立拍摄，实事求是。”

王康脱口说出“Independently”，这个英文单词几十年不曾谋面，不知怎么就冒出来了，美国官员闻声会心一笑。王康再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份名单，上面有七名美国援华老兵，中英文对照，美国的友人联系好的。他把什么都忘了，没忘记这份名单。

好。美国人站起来：请留下这些文件，请到大厅休息，请。

王康拿起矿泉水，边喝边走向大厅。

其实美国女人拒签，不仅有法规理由，而且在人性上也无可指责。人们只愿意了解其灵魂能够接纳的东西，年轻一代远离历史，是世界性现象，美国年轻一代也如此。即使回到历史，也因为那仅仅是历史。没有人会像王康和王康那些同龄朋友一样，非要幽灵们复活，非要让那些由权力和金钱孵化的幸运儿们晓得，他们活得实在无聊而有愧……。

王康继续咀嚼惠特曼那些豪言壮语。

墙上的挂钟指到下午四时。他再度与被浓缩为 120 页的精选惠特曼交流完毕。终于，右侧第一个窗口再次传唤大名。

美国女人笑容可掬地递出全套文件，再附上一张纸片，“凭这纸片，明天下午四点钟来取签证。祝贺你！”

“谢谢，多谢。也祝贺你！”

女人真正笑开了。

王康把纸片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走出大厅。

那位美国外交官已站在过道上等候。两人握手："美国欢迎你。祝旅途愉快。"

"这个能否送给你？"王康又掏出《重庆大轰炸》。

"谢谢，我不能收，这是——"

"规定。"

两人对笑。

重回领事馆当街房间。有人叫他停住，请交出钥匙，取回手机。王康完全忘了钥匙这回事。此刻他上下搜索，钥匙全然不知去处。他折回大厅，窗口、通道、木椅下面……，没有。返回前屋。

很抱歉。但手机是我的，我愿赔偿钥匙和其他损失。

不行。中国武警毫不通融。没有人告诉他们，通融并不意味渎职，即使在美国外交机构里，也是如此。

你明天下午取签证时，再来解决。

王康走出美国领土时，诸方友人已翘首多时。北京同行的友人、美国接待的友人以及其他人都打不进电话来。北京友人后来回忆说，因为准备充分，他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只呆了 5 分钟就获准签证。他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这王康被带走了——要么拒签，要么签下，没有谁会在美国领事馆呆五个小时。他不知道，这王康一辈子没顺过。

这样，踏上新大陆之前一个多月，王康的手机已在美国领土上度过了一个无梦之夜。

几位朋友在附近一家餐馆点了饭菜，已经等待了近五个小时。看到王康神色笃定地走进来，大家清楚，这家伙被美国人修理了半天，但事情办成了。真是大器晚成。谁让他千里迢迢来签证，该有的都没有，该带的都没带。

一行人五六个。他们与王康一道出行不是专门陪他到美国领事馆冒险的。饭后众人驱车再度离开成都。

次日下午四时正，王康再次站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临街窗口前时，心里的景色再度更换了，满目疮痍中的现实再度旋回到历史：宜宾。他和友人日前当夜就驱车往座落在那里的"唐君毅书院"，"五粮液"让整个宜宾在绵绵细雨中飘起酒香。次日上午，王康一行参观了这个以他的大舅名字命名的研究院。然后他们驱车赶到那个被遗忘的古镇，李庄。抗战时期，中国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计一万二千余人先后迁移长江上游这座古镇。傅斯年、李济、董作

宾、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李方桂、童第周等文化教育学术界名人曾云集在此。王康是第二次来此朝拜，这次他只能在烟雨濛濛中匆匆走过，用那里青山秀水，重新装裱了他心中复兴中国传统精神的画卷。

他不能指望那些美国人、甚至周围的朋友能读懂他心中的《圣经》。孤独是他那只叫亮亮的狗，对他忠实不二。虽然如此，为了取到那来之不易的签证，他没忘记下午四时前赶回成都，在川西平原六月的阳光下，再次准时站在美国成都领事馆当街窗口外。

一排赭色护照中，终于拣选出属于他的那一本。

关于手机，王康是在获取签证离开一百多米后，突然想起的。于是他再度返回，照例又一番询问。最后，给武警留下了一份书面文字。他用半文半白的汉语表示歉意、敬意和谢意，分别代表自己的粗心、美领馆中方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领回手机的感戴之情。

打开手机，显示若干信息。哗啦一声，他回到现实世界。

60 个小时连续折腾，疲劳此刻溃堤而出，长奔深涌。这是王康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中坚持践行自我道德意志的代价。他近六十年的生涯中，为此类践行付出的代价太多了。成也宿命，败也宿命。他接受宿命。率性而起，不可为而为，他有这种精神成本。

再见，成都美领馆。他关上手机，握住现实，在心里向那座普通建筑、那个众多国人的伤心和欢欣之地道别。这一次籍着上帝的眷顾，他清楚地知道，他可以继续推动历史之重撞击现实之轻了。

2008 年 9 月 25 日华盛顿

补记：美国无憾，因为王康美国之行，在友人配合下以三部专业摄像机摄影，于陈纳德将军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揭拜了这位援华将领在华盛顿的公墓，举行了纪念仪式；采访了陈香梅女士和数位耄耋之年的援华抗战美国老兵；查阅并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珍藏的中美联手抗战史料；向有关方面展示了他主持创作的近一公里长、两米半高的中国抗战史诗国画的缩印图；分别赠送给陈纳德和“美国中缅印老兵协会”两面大幅手工刺绣锦旗和多幅装裱好的他的毛笔字幅。受赠老兵们为此次造访和来自中国的迟到的感谢，感怀不已，心念口叨。他们的情绪传染到当地的华人社区，感染了当地的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因此他们的暮年生活已经开始融入当地华人社

区，成为聚会中的座上宾，并开始对华人讲述自己抗战的故事。他们还将走入当地大学，演讲自己的经历。中国也不后悔：这位首次美国行的中国民间思想家在美国行程上万英里，踏行十数个州，走过七八个国家公园、参观了包括华人教会在内的美国教堂、老人院、大学、博物馆以及诸多美国历史遗址、纪念地和博物馆。“在美数十日，外观自由天地，内涌故邦余喟，竟日感触慨叹。”（王康与友人书信语）思想是公器，一个知识人的精神财富将通过自己的写作成为公共财产。王康自己也不虚此行，虽然超载的抗战行李和行前超量劳作大量预支了他体力和健康，旧腰伤未愈，一路劳作手臂又添新痛，但他“游于最深专制帝国与最新自由新大陆之间，见闻感怀……将穿越时空而弥久常新”，将成为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融入血脉。记于 2008 年 9 月 26 日

此文于 2008 年 09 月 30 日做了修改

余世存：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

90 年代初，王康离京多日，在重庆隐居赋闲。其情形如同“呐喊”后的鲁迅。一个千万人“呐喊”过的大剧谢幕了，一夜之间，一切变得萧索、沉闷、滞重、无趣，曾经灿烂地展开其热情、良善、智慧、才华的人们仿佛经霜打冰冻，又成为漠然身外而压抑的一群活物。但鲁迅当年只能“荷戟独彷徨”，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历史演绎了太多的内容、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何况王康还深知另一个民族俄罗斯近几百年的历史。无论如何曲折，个人、民族和人类的生命是有自己的起点、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里是极清晰地呈现着，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虽然一切是非现实地存在着。这老大而多灾难的民族，虽然她曾早慧地为人类文明开辟过荣誉和方向，虽然她也很早地与其它民族接触，却迟迟未能进入人类世界的绵延大潮。

一天，王康无所事事地路过街头，经过一家卖书报的地摊，他停了下来，无意地翻开一本叫《花城》的文学杂志。他本来是跟文学有距离的，不仅仅他更多的关怀在民族的现实和价值王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精神涣散上，正像他在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的即兴发言所说，“杜惟明、霍韬晦和萧父诸先生辩讨唐君毅师承的道统问题，在我看来是无意义的。古往今来的大哲都是从一个豁口中走来，他们怀着不忍之心，不相信天生人类，只是要他们穷尽苦难或堕落沦丧，岂有它哉”；而且，他“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当代的中国文学，在他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是“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群领头的大规模的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里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宫飘泊的占星方士，等等。”“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的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其说是一次痛苦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和随意地流失或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他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歧误。他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附高处；他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却轻易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

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人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他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鬼使神差，这一天的王康居然在小摊上翻起了文学杂志。

事情当然有例外。幸运的是，王康这样偶然地遇到了这个例外，他在这期（1990年第6期!）《花城》上看到了一首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首短诗使他积郁已久的思想、情感如火山喷发，《俄罗斯的启示》，一部十四万多字的作品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写就。就像大晴天里骤起的风暴一样蔚为壮观，火山喷发也使时空景象变换，人的生存及其环境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不仅是对90年代初那样平庸的日子而言，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化建设里，《俄罗斯的启示》也是划时代的天地至文。

我在青少年时期读到梁启超谈论自己读龚自珍诗文的感受，说是“如受电击”，后人评说读梁启超的文章，也说是“如受电击”，我那时就一直在想那样的文字该是怎样的奇文，天地间真有那样的文字吗？龚自珍、梁启超的文字我也读到过，但他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远，我们难得那时的同情、会心和彻悟；虽然在岁月坎坷里我们也逐渐读懂并回味起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般的文字，但我总怀着期盼，希望看到文明的思想内容在当代的闪电，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天空。

1995年冬天，何家栋先生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人你可以认识一下，这个人叫王康，现在北京搞一部“大统一”的电视片，没有工作，但这个人有学问，文章写得非常美。我那时正在编辑《战略与管理》杂志，我问能约稿吗？何先生说，怕是不行。我放下电话，犹豫了一下，拨通了王康的电话，并没有说明由谁介绍，只是说我是谁，想来拜访，王康也没问，只是说，来吧。我就这样见到了王康。

我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话语不多，只能一个一个的话题略显郑重地来过，他让我看了他撰稿拍摄却没有公映的专题片《大道》，我也给他看了我的长诗《众生北辰》。这一无目的的称得上“猝然”的相逢却让我很是服气，然而我们分手时却没有什么约定承诺，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两位剑客无意接触后比划了一番分手各奔东西，印证了武功，仍相忘于江湖。虽说我回来后给他寄过杂志也写信叙说过他的才华学识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也给我寄过贺年卡，说是要回重庆。我们很快失去了联系，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听说他的《大统一》已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我找过他，但除了知道他是重庆人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1996年夏天，单正平来北京住在闽西饭店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聊天，还说这里

有一个奇人你不可不识。奇人在他身边，听到我的名字说认识，单正平说人家说见过你。我问此人是谁，他说叫王康，他也刚认识一天，我说王康我当然认识。我们就这样再一次联系上。

随后，王康请我参加了几次文化活动。我也对王康的了解多了一些。他居无定所，总是在重庆北京两地跑，以布衣之身而忧国忧民，希望自己的思考、写作和社会文化活动能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有所助益。王康对我谈论过当今社会的病症，知识分子以及暴富族们的关系，他说暴富族们虽然发展起来了，却不是一个健康的阶层，如果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在 80 年代中期能够理性地对待那些企业家、老板或大款们，而不是向后者献媚，那么这个阶层也许会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民族的历史总是各个人各个阶层自私自利，一到危机关头，他们要么袖手旁观，要么独力抗击暴恶。因此民族虽历经磨难却长进不大。王康还想对本世纪的民族遗产进行总结，他说他想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能把全体中国人吸附过来，集中全体炎黄子孙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这个载体，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大统一。单正平告诉我，他那一代人已很少有王康这样的还在为理想而生活的人了，包括他自己也变得实际多了。我们那时都没有读过王康的文章，我们只是在交往、言谈中感觉到王康是一个真正有气象的人。

到 1996 年 10 月下旬，王康到我处给了我几篇文章，数天后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近 6 万字的长文《俄罗斯的启示》，据说这只是部分，全文则有 14 万之多。我读了不到两页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袭击一样颤抖不已。我停下来，生怕是幻觉，我从头读起。就是这样的文字！她原来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动不已地一口气读完，我确认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王康圆了我的梦，那一夜，我仿佛进入了佛家所谓的钧天大乐的境界里。

第二天，我呼叫王康，在电话里我向王康抱歉说晚了几天才读他的文章，我说很感激，这么好的文章，我再努力十年也写不出来。王康说朋友之间说这话做么事，我说是真的，我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来。

这以后，我就时时翻阅，一次次地体验阅读的欢愉。我已不再有少年时那种遇到美好的东西独享秘不示人的心理，也不再有遇人就推销的习惯，生活苦难的历程已教我们明白人的思维的高深和情感的热度是不具有这种高度、深度和热度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高深和热度。对于没有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我将王康的文

章复印几份给我认为可以看的人看，一些人征求我的意见，问可以自己再拿去复印吗，这是意料中的事，让我略感遗憾的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无动于衷。

过了一段时间，单正平写信来说，他近日去了一趟重庆，有机会跟王康在一起，了解了王康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这个年龄的人已很少佩服人，但他现在视王康为真正的英雄豪杰。他说他在王康那里读到了一篇文章，虽然只有一部分，但他认为已足以改写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这说法儿一点也不过分。他说，你一定得看看那篇文章。读到这样的信很是让人感动，在回信中我不免得意地告诉他，你说的文章肯定是指《俄罗斯的启示》，我已经先睹为快了，我们的看法一样，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安慰给我们营养的事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20世纪最后十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戏如剧又悲苦莫名无助的十年。在这之前，一场运动事件解构了中国各阶层之间松散的结盟，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世物质主义号召和“全民皆商”运动则消解了各阶层内部和职业分工中特有的品格。中国成为“沙聚之国”。“中国”一词对中国人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一种恒定的现实，而是一种经验和现象的奇特结合，是要变易的过渡型态，自然地，中国人也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信仰何为？”“人生何在？”等等无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内容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溃败。

精神的溃败在行为上表现为人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淡化，在思维和写作的层面表现为人们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淡化。中国人的写作，也就成为一门职业写作，在这一写作里，找不到语言和存在的血肉联系，找不到诗和存在的性情关系，找不到写作者个人在语言中的位置，找不到写作在历史延续中的意义。这样指责汉语写作并不全面。因为任何时代的主流写作或说中心写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只有那些在边缘写作中以坚忍的心智辛勤劳作的人才有可能参与语言的生命创造，才可能成就有益于民族现实和未来的写作。所有民族和人类中最重大的声音、呼告，都是在遥远的极地，从这些生命起始传到人们耳际的。这些“精神烈士”，这些先知，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际遇，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荣耀了民族的名。我们唯有对比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实践，我们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精神的溃败是不能以客观现实作为充分借口的。任何个体，置身在生命的精神历程中都在时刻经受着拷问、锻炼，人们可以说今天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龚自珍时代的人们也多在“为稻粱谋”；人们可以说市

场经济、大众文化有助于消解意识形态霸权，然而，东亚一些经济繁荣国家仍没有摆脱封建的阴影（从而也仍没有摆脱政治和经济大滑坡的威胁，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我指的是 1840 年至 1949 年，中国人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中国人牢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命题，即解答外来的国耻和内在的强权，那时巨人辈出，狷介狂放，群葩争艳，性格万千，并出现了孙中山这样天下为公的民族英雄和鲁迅这样凝聚民族灵魂提升民族性格的伟大作家。

因而，精神在精神溃败年代里也在等待人性的闪光，汉语写作也就是这样在文字、信息爆炸般的生产年代里等待着烈士的鲜血。作为一种最悠久的文明语言，作为由孔子、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以血祭过的语言，理应在历史的巨变关头找到新的人格形式，理应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获得新的存在状态。因为被纳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社会，其声音、言语，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非幸运的丰富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人类意义的中国命运的个人承担状态，只不过有人顺应，有人反抗，有人漠然，有人以个人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关联无限的道理和性情。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达出来，从而获得了与历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类写作等量齐观的意义和效果。像单正平一样，我乐意向人们介绍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愿意向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表达一个写作者的敬意。

（原载：思想的境界）

梁珍：让江泽民害怕的凤凰女主持和民间学者

【08 年 3 月 6 日讯】

被称为中央电视台在港分台的凤凰卫视，最近不断传出内部反戈事件。著名凤凰卫视主持人郑沛芳年初在网上，大胆自爆因为拒绝“陪睡”潜规则而差点自杀，引起全民热议，仅仅过了一个多月，香港杂志就再揭另一名美女人气主持曾子墨，因为邀请民间学者王康，主讲一期控诉十月革命的深度访谈节目《世纪大讲堂》，触怒江泽民而被突遭撤换，王康也被禁足该节目。美女和学者被封杀的共同命运，也显示了演艺界在流行牺牲色相的潜规则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潜规则——政治潜规则。

传控诉“十月革命”触怒江泽民

爆出江泽民恼怒换人事件的是香港《前哨》杂志三月号。文中披露，凤凰卫视女主持曾子墨突遭撤换，改由王鲁湘做主持了。其原因是由《世纪大讲堂》去年十一月播出的《俄罗斯的精神和梦想》节目，由曾子墨主持和民间学者王康主讲，因为抨击前苏联共产专制，刚巧被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从头到尾看完了，触动了他的“俄罗斯情结”而大怒。

文中指，王康虽然表面上在论说沙俄历史，但同时谈到十月革命，说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说到更残暴更专权的斯大林主义，列宁的第三国际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论战和决裂，斯大林对布哈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消灭——王康得出结论，在红色专制的折磨下，连这一代的知识份子中的佼佼着索尔辛尼琴，其灵魂和品格都远远比不上沙俄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了，也比不上贵族恰达耶夫、比不上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

文中形容，王康“冷峻地撕开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面纱，裸呈出红色帝国血渊骨岳的真相。他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却无处不在的鞭挞同一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荼毒。”据江办传出的消息指，曾赴苏联深造的江泽民看完后，气呼呼的直喘，在厅堂转了近半个钟头，随即江办打给中宣部，凤凰卫视很快接到指示：第一是禁止王康再踏足《世纪大讲堂》；二是要撤换主持人曾子墨；三是凤凰卫视须派出主管级的负责人到中宣部接受训话。

节目敏感十七大前禁播

《前哨》杂志上周二在香港出版后，正在香港短期交流的王康看到此文。当天他

接受本刊记者查询时表示，也是从杂志才看到这个消息。他说，该节目实际上是取材于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前后共讲了两个半小时，《世纪大讲堂》后来制作了两集："他们不敢在十七大前播出来，而是在十七大过了后，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第二天，他们把这个分为上下集，播了一个星期后，又播了下集。"

据知，曾子墨零五年接手主持《世纪大讲堂》后，王康多次作客该节目。其中零五年六月先作了《俄罗斯的道路》，反响不俗；去年十一月，又播出《俄罗斯的精神和梦想》。

突遭撤换学者不知情

有关自己被禁足《世纪大讲堂》的消息，王康说，自己没有直接接到凤凰卫视的通知。但《世纪大讲堂》后来曾经找他，要他谈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统一问题："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提纲，全球化的中国统一，去年年底就交给他们，没有回音。"而至今王康没有再上过《世纪大讲堂》节目。

王康并说，早前也知道曾子墨离开了《世纪大讲堂》，据说是要主持另一个财经节目，但和这个节目有关，也是看杂志才知道，而他至今也没有收到曾子墨的电话。

批判苏共江泽民没有办法接受

被问到传闻江泽民恼怒该节目，王康认为这有可能。他相信江泽民对苏共的观点和他大相径庭。他坦言："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苏共是中共老师，斯大林是毛泽东的老师，我批评苏联共产党、批评布尔什维克、批判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没有办法接受。"

是否因为节目谈及俄共解体促动中共解体的联想，王康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汉民族占 80%，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中共的共产主义失败，不会带来震荡和前苏联式的分裂，相反中国会走向统一来削弱共产主义。

他非常赞成最近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向胡锦涛写公开信，要求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的遗产没有被中国所扔掉，中国没有摆脱毛的阴影，中国人在灵魂上和精神上永远站不起来，这是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等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的突破口。我完全赞成胡先生的说法。"对于自己的节目被封杀，以后是否还会坚持敢言的风格，王康最后说道："我天生就是宿命的人，很多事情无所谓。"

王康小传—《世界经济导报》发文遭江整肃

生于一九四九年，自称是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担任自一

九五七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他给自己定位为“民间思想家”。

一九八零年代后期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噪一时；一九八九民运期间，曾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过文章，后被查究，从此开始流亡生活；一九九三年，在“流亡”途中，他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电视纪录片《抗战陪都》以及《浩气长流》。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曾子墨小传—最有品味的凤凰女主持

“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有著书卷名字的曾子墨，曾被作家王朔誉为最有品位的凤凰美女，有着令人艳羡的人生经历。

一九九一年她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次年就以六百六十分的托福高分被“常青藤盟校”之一的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录取。毕业后被美国纽约华尔街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一举相中，成为该投资银行最出色的分析师之一，但二零零零年她又放弃高薪厚职，追寻人生另一理想，成为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先后主持《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世纪大讲堂》、《社会能见度》等节目。她还是畅销书作者，出版的自述《墨迹》，创造了一个月内连续加印三次的纪录。

（原載《新紀元》）

（2010/03/31 发表）

余世存：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

一．王康是说不尽的。

2001 年 5 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了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是一个小众范围内的汉语人格，他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

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二．传统文化在转型的当代中国已被割裂。

对大多数生长在大陆中国的同胞来说，他们身受这种割裂而不自知，他们站在生存和一种叫做真理的碎片上，彼此对立、割伤、侮辱或损害。少数先知般的圣贤，几乎是无望地守望着道为天下裂的汉语世界。

1949 年，经过四年内战，兄弟般合作两次、共存了 28 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强弱易势，并修改了自处并共处的依存法则；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成为弱者，弱者几无葬身之地，最后栖身于海岛，强者则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文化信仰的阴阳生成之道、传统中国王朝奉行的忠奸名实对立统一之平衡、传统中国人遵从的因果逻辑，在国共两党争霸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转型年代的中国人信奉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强势的顺势势利思维。

1949 年，王康出生于重庆。王父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因爱情转入化学系，天性超脱，习自然科学，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毕业后做了一个小职员。国共易势之后，前政权的小职员也成为另类。1950 年，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似乎是在

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 年出狱。1982 年，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后，其工龄仅有四年，问题也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新中国成立后，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作为女儿、妹妹、姐姐、妻子、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舅妈、儿媳、弟媳、岳母……，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都拼命地尽她的心，她的力，她的道。”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当她的兄长、中共元帅陈毅的同窗唐君毅拒不回大陆，最后在香港去世时，她为早已名闻中外的大哲学家兄长写下了感人的短诗——

悼兄

一、一树五枝，顶枝摧折，四枝彷徨，何所仰息。

二、天地胡不仁，以人为刍狗，既生我良兄，何忍又夺走。

三、昔日梦里惊，醒来暗庆幸。今日梦里惊，醒来泪湿衾。

落月满屋梁，音容何处寻，追思成往事，不觉泪纵横。

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屈辱和悲情。以至于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王康感慨说：性灵中国、悲情中国、道义中国正在解体，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对这个时代，他们两手干净，两眼清明，灵魂高洁。他们是这个“大时代”最无辜的苦难承受人，罪恶见证人。他们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与这最荒唐的人生诀别时，后来人能体验其中滋味于万一吗？

这样的家庭也给予了王康足够的灵性、道义和才思。大舅唐君毅去世后，王康开始接触港台“新儒家”。1978 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1949 年以来的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外若干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结果，并非中国常态，更非中国终极形态；中国必将再次回到它的传统和大

道去寻找存在的连续性和动源。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虽然一开始他就远离了“第二种忠诚”，无论他的行藏如何，他只是忠诚于人性、历史和中国文化。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颠沛于是，造次于是。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三．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跟陈独秀属于同一个家族，这个神圣家族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为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

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四．历史给予王康成全大命的机遇幸又不幸。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没有提供给他施展的舞台。历史只是给予了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同龄人们自我教养的可能。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社会同样冷漠地对待

王康，这种冷漠跟经济决定论的号召，跟闷声发财、一夜暴富、没事偷着乐的“幸福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参照，反证出社会之恶。英国人萧伯纳认定：“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亚辛斯基的箴言是：“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王康身边有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来了又去了，去了的人悬置理想而务实，很多人做了高官、发了大财，只有王康还在坚持他自己的梦想。然后富贵起来的人们多作壁上观，看王康一人折腾，有人看王康行到水穷处就给他一点儿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年过半百，知天命而望耳顺。但在王康却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他的时间多半在陪客人倾诉了，他是最好的听众，那些野狐禅式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跟他说上五六个钟头，他可以一言不发。但他丝毫不给人安慰，他不吝惜最真实的言辞。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者，相由心生。长期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康甚至获得了相面的能力，“我一看你的长相就不喜欢你！”“不要把知道读书当宝！”

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这个极为高贵的人却有着同样极为谦卑的心。他放浪形骸，却对女性给予最完美的体贴。一个打字员的喜怒哀乐会让他萦怀；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向他倾诉，他事后会再写上一封长信来安慰人家。画家王建称道老康，“有着不可思议的体贴心。”他不

喜欢精英权贵，却跟重庆的普通民众交上了朋友，他当仁不让地教育他们，又极为谦卑、慈悲地布施、担当、同事。刘慰荣，跟王康的朋友做了一年车夫的出租司机，与老康接触了几次，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从前的所有，而做了老康的司机，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席庆生，一个退休的生活得小康的工人，孩子在上海立业，他一人呆在重庆：因为重庆有老康。

王康的生存姿态甚至感动了媒体，凤凰电视台的众多编辑记者们关心他，不少人成为他的粉丝。2005 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仍然把重庆的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王康因此给了他的朋友们最大的人生安慰。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 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 1957 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 50 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 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五.“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续家谱，痛煞后来人。”

这是王康在江津陈独秀旧居留言簿上的即兴之作。他对一切真正的个人、真正的民族之子从来不吝惜热情。

王康熟知唐德刚、黄仁宇们的中国现代史观：在一个二百年的三峡论中，个人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手段；即使按照传统王朝的史观，如果我们生活在大明季世，生活在同治光绪之际，生活在民国，我们能把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带出三峡或埃及吗？如果不能，我们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有何依据呢？

王康身体力行的是唐、黄们忽视的现代转型中的个体价值。他从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中看到了一种远高于历史目的、未来愿景更大的信仰情怀，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人生正义。西人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用王康的朋友毛喻原先生的话：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2006 年底，余英时先生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余英时是钱穆、唐君毅等人合力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王康和余英时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人是不同气象的峰峦、大海。余英时是道问学的，王康是道成肉身、身为度、尊德性的。但才思超迈的王康仍给了严谨的余英时最高的敬意。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 1949 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余世存：王康--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全文完博讯 www.peacehall.com)

（2010/03/31 发表）

崔卫平：距离，距离

总有朋友问我，什么地方能够看到那些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或者剧情片，比如我在文章中曾经提到的那些。在这里我郑重推荐一个去处，那就是位于 798 之内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影像档案馆”。与其他类似展示平台不同的是，它志在成为与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平行的中国独立影像库，除了展映之外，还致力于相关影片的收藏和研究。2009 年 3 月 29 日——4 月 19 日，该档案馆举办了开馆展。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章明先生的两部作品——剧情片《新娘》、纪录片《60》（读作“六十”），分别在开幕式上以及闭幕式的前一天展映，体现了这位导演近期不同寻常的创作活力。

对于独立电影的爱好者来说，章明是一个响亮的名字，1995 年他的第一部影片《巫山云雨》（未公开发行），为最早触及三峡工程淹没库区的影像。片中雾蒙蒙的水面和灰蒙蒙的天空背后，总是闪烁着一种奇怪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光亮。这部影片为章明带来了一大堆来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一般他被归入第六代导演之列。但是他与典型的第六代导演不一样在于，许多第六代导演影片中的主人公过于接近他们自己，作者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几乎是重合的，而章明在影片中却将自己深深藏了起来，观众不会轻易找出影片人物与章明本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否与他学油画的出身有关？拥有那样一种淡淡的古典主义加现代主义？对于这位很少在媒体露面、以偏锋见长的独行侠，人们有理由对他报以持续的期待。

果然，伊比利亚他的两次放映，前来观看来的人众多，借用目前网络上流行语来说，叫做“深度围观”。尤其是纪录片《60》，它长达三个小时、类似“口述史”只有被拍摄对象一个人在那里讲述，没有其他任何图片或影像资料的穿插，却能够吸引人们从头看到尾，场内时不时发出窃笑、大笑、间断的掌声乃至大声鼓掌（多次），气氛热烈。与王兵那部《和凤鸣》略微不同的是，这回口述的主角主要是站着说，随着他脚步的移动、手势摆动以及身体的晃动，镜头也跟着移动，因而造成了镜头内与它的边框之间随之呼吸、随之起舞的奇妙效果。掌机者也是章明本人，他后来说端着机器一连六个小时拍摄，手腕有被折断的感觉。

许多独立纪录片的所拍摄的都是小人物、边缘人物，除了这些人被公开媒体遮蔽之外，还有一个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这些无权无势的人，是比较容易拍到的对象，

而相反拍摄一个大人物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部《60》不然。它所拍摄的是一位大人物（起码从我的标准看），因而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全名，而称他为“老康”。几年前我见过老康，这些年也经常从朋友处得知老康的各种消息，凤凰卫视上不断有他侃侃而谈的风采，口才极好，目光如炬，尤其善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此前我都是听他讲普通话，而片中他却说一口四川方言，听上去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却增添了他的魅力。此前我对留胡须的男子抱有一点点偏见，这回老康帮我消除。老康 1949 年生人，与共和国同龄，这是章明选择拍摄他的理由。

一切像在口述史那样进行：母亲怀着老康的时候，听别人说吃奎宁可以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并照办，结果老康还是呱呱坠地。一个月之后，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便被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牢里。文革武斗时，老康（应该是上高中一年级）班上的同学拥有长短十几、二十来支枪，老康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摸这些杀人武器，但是见到身边有人扑地而倒。78 年恢复高考，老康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但是已经身为教师的他只能进当地西南师范学院，读中文系。进校一个星期之后，他便判定课堂上学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政治学习从来不参加，辅导员也不好喊他，路上偶遇时是老师绕道而行而不是他。这些奇奇怪怪、边缘不整的故事，在老康富有魅力的西部方言之下，统统被纳入了某个起伏有致的韵律之中。

他本来可以走一条纯正的学术道路，却被某一天的敲门声而彻底宣告终结。来人为校友黄老九，此人想参加校园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竞选（1980 年有这个政策），苦于不会舞文弄墨，找上了中文系才子老康。老康自己没有竞选欲望，却将这一活动推向全校，搞得如火如荼，吸引了美术系的“天才少年”章明（即现在的导演），对于政治一无所知的章明将他们的头像画到了校园墙上，“搞得像美国选举似的”（观片之后讨论时章明补充道）。这之后老康写了一个 8、9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普通人》，均没有下文。对于这段历史，老康信手拈来索尔仁尼琴的话作为总结——当你面对困难时，记住你是一个个人，与周围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大意如此）。听老康这么讲时，我感到自己就像被大河托起的一片轻微叶子，是历史的河流将我送到某个地方。

老康后来的经历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难以衔接，东一块、西一块，就像他移居不定的住处，再难拼凑起一个完整的画面。突如其来前往敲他门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在，有时候他不在。他不在是因为他必须在深更半夜的滂沱大雨之中，到朋友那里

寻找一个住处；他在的时候也仅仅是在阅读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潮流》这书，而来人还以为这里是一个赌窝或者其他什么。有一天，医院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还拍了拍他的肩膀。总之，这样的故事离奇古怪极了，但是件件逼真，不容置疑。当老康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以集中，观众的兴趣和注意力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充分和越来越浓郁。十年之后老康被叫去开了一个小会，他指着一袋子档案说，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同名同姓的所长写的，众人惊呆了。

三个小时的影片，没有观众离席，事后更有年轻人说“怎么没有觉得时间一下过去了”。这不难理解。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康，他必须乘坐共和国的列车，与共和国一起经历颠簸。且不说在 1978 年之前经历了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弯路，即使在 1978 之后，在消灭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基础之上，重新确立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这几乎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所有历史的尘埃最终必然要落在个人的肩上、头上，个人必须承受社会巨变带来的痛楚及荒谬。不要说老康这样积极“介入”生活的人，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与共和国一同经历的 60 年，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可以讲述。

章明做这样的纪录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个人的角度，提供关于历史的另外一种叙述，尤其是保存和记录了许多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屏蔽、遮蔽的那些内容。尽管老康本人经常在媒体上出现，但是他的离奇事迹却鲜为人知，一位与他相处多年的“忘年交”朋友也表示此前不知道，现场的年轻人纷纷表示从中受益良多。前来观看的民间思想史、口述史学者丁冬、邢小群夫妇，对于导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有观众提出疑问，这样仅仅由当事人本身的叙述，是否会令观众失去判断的“座标”，这个质疑非常有意义。社科院学者李一白女士也提醒在场的观众，这只是讲述者本人的一种说法，相关历史或许还有其他说法。这也正是我在现场考虑到并担心的。在观后的讨论中，我只是委婉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未及展开。

与一般口述史不同的是，老康的讲述中还有一些设计未来的畅想，而不仅仅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比如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前途命运，关于海峡两岸的和解，关于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表述，就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老康很可能仅仅将国民党视为台湾一方或台湾的代表，而忽视了台湾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还有，他认为比“普世价值”更加重要的是，还有“更高价值”，而这个“更高价值”只能由中国的儒家文化来提供。当然，这是老

康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观众将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他们将如何辨别这些看法的真伪？因为他们刚刚听过老康讲述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他们倾向于相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么他们是不是接着需要听信老康的这些看法？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提交给导演本人的，而不是针对老康。作为纪录片，是否需要与被拍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呢？是否需要造成对于被拍摄对象的一些反思和间离的效果？而不是仅仅以被拍摄对象作为中心，以人物的视角作为纪录片叙事的视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说，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那么经过摄影机的处理，是否所传达出来的东西应该比当事人知道得更多一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他的自身表述上面？？尤其是像老康这样的人，与一个底层人物不一样的是，在镜头面前他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掩饰的能力（我们这些人都如此），如何来戳穿他给自己营造的神话（放在我也一样），祛除他随身携带的魅人光环，将他从他自己营造的"神坛"上请下来，这是否是导演需要同时考虑的？总之，人们希望一部影片让自己知道得更多，而不是止于被拍摄对象想让他人所知道的那些。

这里面当然牵扯许多其它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关摄影机本体。比如，目前的这部片子，它所揭示的许多事实，的确是被长期遮蔽的，这从人们现场的热烈反映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是否在这种条件下，仅仅是说出某些真相就已经足够？就像若干年前西方文学家艳羡苏联作家，说你们国家一个人只要说一点真话就能够当作家了。更进一步，这些有勇气说真话的人们，一方面他们表达出了极大的勇气，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普通人，但另一方面是否因为他们说了某些真话，这些人就自动转正为"一贯正确"，从而获得道德上的豁免权，成为难以批评和不可批评的？老康喜欢提到的索尔仁尼琴，他的确是一个在谎言的制度中说真话的代表，但另一方面，索氏对于他本人在那个环境下养成的局限性和人性的黑暗并无反思，他最后走上民族沙文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参见拙作《为什么是索尔仁尼琴》，《经济观察报》2008 年 8 月 6 日）

章明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讨论时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评判老康的那些比如新儒家说法，他只是照录如此。他说出了若干年来我觉得作为遗憾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小说家、电影导演等，他们对于正在讨论和形成的"社会思想"（徐友渔语）或者是无从了解，或者是无从评判，因而变得与自己没有关系。从他们的作品中，你看不出正在形成的社会思潮的任何脉动，而它们有许多正在构成

我们社会的有力叙事。如何看待一个转型期社会当中正在形成的东西，包括如何与它们对话、造成距离和反思。章明的影片中难能可贵地涉及了正在同步进行的某些东西，但是没有去处理它们。

在这一点上你得真正佩服俄罗斯文学的一位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压制和争取自由的时代，当时也有许多自由的、被压制的社会思想，有许多仁人志士对于国家前途命运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了解它们全部，而且通过作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距离和对话，没有被这些当事人的激情及狂热被动地带着走。这样的作品才是具有超越性的，而不是止步于任何一种现实，包括人们头脑中的现实。

当章明说他无从评判老康的那些畅想时，我也在想，这位导演是否有过那样的自觉要求，即感到需要与被拍摄对象拉开距离，需要对人物本身进行反思，而不是被他们带着走。也许导演会觉得让人物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正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他最好不要打搅他们。尤其是人物的幻想，这正是一个人身上的迷人之处。任何人不仅过他们的现实生活，也过他们想象的生活，而后者往往被忽略掉了。探索人们的幻想，是否也是有意义的？这听上去十分诱人，提供了另外一些讨论空间。而在 3 月 29 日开馆当日下午放映的章明导演的剧情片《新娘》，或许更恰当地用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部影片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在纪录片的框架当中，生长出一个虚构的故事。片中的四位中年男人，是与章明熟识已久的“哥儿们”，章明称他每次回家都要与他们在一起“斗地主”。在 2003 年章明的那部名叫《巫山之春》的纪录片中，他们也是主要的被拍摄对象。从影片里看，这些人的生活比较优裕从容，不愁吃不愁穿，打麻将、找小姐，看上去像是一些不愿离开青春期的中年男人。为这些人量身定做，四人在新片中一如既往地“扮演”他们自己，只是加上了一个虚构情节。

为了骗保，他们从乡下弄来一个女孩，与他们其中的一个结婚，然后想办法把她弄死。整个过程都是四个人在讨论协商，一个也不能少。这期间当事的那位男人不免动了感情，有些舍不得那个女孩，其他男人马上便会冷嘲热讽一通。章明介绍，拍摄这部片子，至少让他的这些朋友高兴了半年。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对于从事某种“害人”的想象，对于在影片中充当一回谋财害命的人，是认可并从中得到乐趣的，没有什么障碍。

有理由指出这种幻想是十分矫情的。就他们这几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永远做

不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不是他们关于自己生活的想象，没有他们自己生活的任何基础。在纪录片《巫山之春》里，这四个男人一起去监狱里看望了一名女子，这女子与剧情片中结婚的那个当事男人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就算此趟探监之行是“猫给老鼠拜年”假惺惺的，但也不至于到了下一部影片里，他们就非得要将一个女孩从地球上抹掉。他们是一些有贼心没有贼胆的人，也就意淫而已。这样的安排因而显得很不真实，与这部影片仍然拥有的纪实框架不相匹配。

这多少也有些离谱。当这些中年男人一旦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运用他们的幻想，一旦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愿景，他们便会觉得弄死一个比他们年龄小一倍的乡下女孩子，是一件最为好玩的事情？难道他们不会想到做一件其他也好玩的事情吗？这个想象产生于怎样的土壤，他们受着怎样的限制和束缚呢？它们的确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吗？

据导演介绍，影片的结尾在三个方案当中进行了选择。第一个方案是，乡下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当中有人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到此为止；第二个方案是，女孩身亡之后，他们四人前往广西，寻找先前被他们淘汰掉的那个妓女，继续玩骗保的游戏。这两个最终都被导演否定掉了，而是采取这样的结尾：四个厚脸皮的中年男人，在女孩的葬礼上有所醒悟，有所遗憾，有所反悔。“鳄鱼眼泪”倒是没有，但是看上去有那么一点低头认错的意思。

这可以看做由导演本人出面，对他的这些“哥们”所做的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出现得有些晚，有些生硬，与前面那样多任性放纵的内容并不自然衔接。“害人”不是他们性格中必然具备，而“忏悔”也不是他们的所长，因而让人看得疑疑惑惑，像从外面加上去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即使对于章明来说，他也不能做到一种彻底的“客观化”，即对于眼前的人或事情，仅仅是任其所为，不做任何评价和反思。不排除有时候以“客观化”的名义所达到的，恰恰是完全的主观化。

电影这种东西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是这个世界和人的倒影。人们希望从这种倒影中，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多，对自己了解得更多，对他人也了解得更多，而不是停留在那些表面的、经过处理的东西上面。往往是，一个人愿意显示给别人的内容，不只是在误导别人，某种东西实际上已经误导了他自己。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种种迷思，并不一定都是有趣的。老康在镜头面前反复提到“这是幻觉，这是幻觉”，而老康本人也恰恰拥有许多类似的幻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我本人也

不例外。这就需要永远提醒“距离，距离”，即对自己与他人时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距离中做到冷眼旁观，而不是照单全收。比起人的肉眼来，镜头或许更加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点。

《经济观察报》2009 年 5 月 2 日

(崔卫平：距离，距离全文完博讯 www.peacehall.com)

此文于 2010 年 03 月 31 日做了修改

马云龙：我读《６０》

这简直是个奇迹。三个多小时的记录片，镜头只是对准一个人，全部内容只是镜头中的这个人在或坐或立地在讲述，没有任何其他场景和背景资料的穿插。可效果却是惊人的：任何一个观者都会被影片吸引住，着魔般地一直看到最后一个镜头。据报道，在放映厅中不时爆发出掌声、笑声和赞叹声……

导演章明冒了一个大险，用最简单——简单到几乎没有任何技巧的使用，最真实——真实到你似乎是在和镜头中的人在对面谈心的方式，拍了一部绝对要进入经典的重要作品。

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所选的对象与众不同——他是老康；也在于他所讲述的题目是个能牵动千万人心思的数字“６０”。

不要把成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老康那超群的个人魅力和罕见的语言表述才能上来（这些都是无人能否认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讲述的内容的真实、重大和历史因子含量的丰富，以及他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光芒和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老康的讲述从他出生说起。他生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日，比这个号称共和国的政权诞生日晚了两个月零一天。他和这个政权今年都要过６０岁的生日。这个开头，再加上影片的片名《６０》，一下子就把观众带进了宏大的历史场景中。

任何历史的宏大叙事是由一个个的个人叙事组成的。每个人的历史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宏大历史的一些片段和影子。区别在于，不同的人，由于在大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对历史进程参与的自觉程度不同（被动地卷入或主动地介入），他的个人史中所包含的大历史的因子的分量及价值也有所不同。

而老康恰恰是个以极大的热情和主动精神自觉参与历史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而他又恰好能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头显身发声于时代漩涡的中心，这就注定了他的讲述必然要具有超出个人叙事的意义，而融入了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从而具有了时代标本的特殊价值。

据说章明先生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片名，共拍了８部纪录片的素材，但经过反复对比、筛选，最后拿出来面世的只有这一部。这就说明了影片成功的关键不应到创作方法、导演技巧等纯技术的方面去寻找。

有一个判断个人和历史的关系的方法：历史的进程可以用一个高低起伏的正弦曲

线来标示，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显示为一个跌宕升沉的曲线，如果这两个曲线能大致吻合，就说明这个人基本是与人民、国家和民族同俯仰共命运的，而如果这两条曲线严重背离，反差巨大，则此人的品格、行为和功过是非就大可怀疑了。比如，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社会黑暗，历史的曲线降到低点时，此人却飞黄腾达，春风得意，那他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就不难判断了。

老康所讲述的６０年个人史，与这个“共和国”的历史高度吻合。从他诞生之日起，这片土地上连绵不断、越演越烈的政治大折腾及其所带来的恶果，几乎都投射到他和他的家庭中。６０年的历史成了一部灾难史，但老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像千百万人一样是这段血腥历史的牺牲者和受害者，而且是个在灾难和逆境中不倦思索，较早彻悟的思想者，还是个将思想付诸实践，以理性和激情投入历史正流的抗争者和行动者。在１０的被通缉后，他近年的思想火山喷发以华丽的光彩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成了中国思想界还存在独立精神和阳刚之气的生动证明。

老康认可的头衔是“民间思想家”。这个似乎并不显赫的头衔，在这个时代却有着特殊的光彩。“民间”二字自豪地宣示着不屑与权贵体制勾连的傲骨，而“思想家”一词则透着对那些御用的文奴和象牙塔中的书蠹的轻蔑。如果你搜索一下老康近年来以各种形式（电视片、访谈录，演讲录以及一大批发在海内外杂志和网络上的文章）所推出的力作，就不能不为他的思考之深刻和宏大而惊讶。

迄今为止，他已经推出了一个“三室一厅”式的辉煌思想构架：

以俄罗斯文学和思想史为切入口的研究为第一室。这一研究从对俄国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历史分析出发，检点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所发生的流变，导出了对列宁—斯大林极权主义制度的形成、演变、衰落和破产的历史总结，最终直指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社会法西斯本质，并雄辩地证明了苏联解体和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以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为切入口的研究为第二室。这一研究一扫笼罩大陆史学界几十年用谎言捏造的伪抗战史，真实地恢复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结束的反侵略战争的原貌，为抗战的真正“中流砥柱”们筑起了高耸的“凌烟阁”，并为支撑抗战直到胜利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传统正了名。更重要的是他以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为二战后在冷战的格局下中国之巨变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图。

对中华民族生存几千年而不灭的精神文化传统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发现，是他研究

的第三室。这是他观察和研究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立足点和终极目标。在《６０》中他说自己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这应是肺腑之言。这位在与极权专制主义斗争中毫不妥协的斗士，在文化上则高揭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索尔仁尼琴。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坚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斩断自己的文化血脉，仅靠从外来的文化中嫁接移植别人的基因而生存。他们应该从自己所立足的大地和所传承的古老文明中找到生命力。从他１９９３年创作的电视政论片《大道》开始，他就正式宣告了自己对新儒学信心，认为从中能找到更高的价值或终极价值。

老康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冬烘学者，他这三个“研究室”都指向一个恢弘的“大厅”——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这里融会贯通，聚为一体，形成了老康独特的思想大厦。对二十世纪俄国共产主义血腥试验追根溯源的拷问，不仅说明了苏联崩溃的原因，也找到了中国陷入旷世灾难的罪恶源头；那些今天在振振有词地批判“全盘西化”的人，其实就是上个世纪搞了场彻底的“全盘俄化”的罪人。在抗战史的真相被重新发现的同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虽屡衰而不绝的伟大精神也被重新发现，并被老康领导的一批仁人志士以空前的８０５米画卷《浩气长流》隆重褒扬。在经历了二十年前的“铁血之夜”后，中国知识界曾一度颓风弥漫，犬儒主义盛行，而在这时，老康以被通缉之身攘臂而起，朗声而呼，又何其壮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士”的风骨，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救世悲情，成了老康最吸引人目光的人格特色。

这样一个人的讲述，能征服众多观众的心，并不奇怪和意外。

我注意到，对《６０》的第一篇评论是崔卫平女士的《距离，距离》。她对影片的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又从电影专业的角度指出，导演似乎没有拉开与讲述者的距离，即没有实现布莱希特所主张的“间离效果”和“第四堵墙”，从而减低了观众对讲述内容的怀疑、思考和判断能力，乃至会令观众失去判断的“座标”，被老康牵着鼻子走。

我对电影理论是门外汉，无权置喙。但关于老康是否有需要剥离的“光环”，是否需要“请下神坛”，则想说几句话。

老康是个平民，是个一生未涉足所谓“体制内”大门的独立的人，是个多年在社会底层靠自我奋斗而生存的微贱者，与众不同的是几十年来，他没有放弃思想的权利，

一直捍卫着主宰自己大脑的天赋人权。从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者”到如今的“民间思想家”，他走了一条与绝大多数学界人士不同的成长道路。应该说，他是当年曾广泛分布于民间，如今大多已被剪除和消磨净尽而“失踪”的“民间思想者”的难得孓遗。对如此人物在当今思想界的异军突起，关注是应该的，尊敬是必然的，欢迎也是真诚的，而用语刻薄则是太轻佻了。

过去只听说老康经常受到打压，声音屡遭封锁，已被权力者视为异类。而“光环”、“神坛”之说则是第一次听说，这大概出自一些出身“正途”的学者对老康这种“行不由径”的“山寨学者”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实，这种来自象牙塔中的优越感倒是值得反思的。

至于文中提到的老康思想的“大可商榷之处”，本是见仁见智，大可各抒己见的。例如老康所主张的新儒学是否可提供“更高价值”或“终极价值”，人们会有长期的争论。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这一讨论应该在“清理场地”的前提下进行。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打到孔老二”，这个在“革命”的名义下已经绵延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奥吉亚斯牛圈”至今还没有人彻底地打扫，否定文革只是在政治上匆匆走了个过场，根本没涉及这个理论问题，几代学人对儒学的一知半解还停留在“评法批儒”的水平上。在这个基础上怎能开展有理论价值的讨论？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老康在世纪大讲堂作了题为《世界图景中的五四》的演讲，开始对这个臭气冲天的大牛圈抡起了扫把。不管你是否能同意他的观点，但这总应该是个值得重视和欢迎的进展。

对老康和他的思想，先不忙筑起“第四堵墙”，还是先听听吧。

（2010/04/01 发表）

野夫:六十年必有王者兴——为王康先生花甲大寿及《王康文杂》付梓而贺

古语曰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盖因三千年中国，王朝轮替，江山鼎革，时商时周时秦，或汉或蒙或满，实非一姓一党所能鸠占长远者。故朝纲败坏，倾覆者仅一家之私庙；道统无害，则国家仍赓续不绝。当代史学家刘刚李冬君伉俪谓——自古即有两个中国，一曰王朝中国，一曰文化中国。唯后者越百世而不亡，默然贯穿千秋江山以始终。

王朝如鼎，乃有形之礼器；文化如谷，乃形上之道法。鼎覆则礼失，子曰求诸野，乃因道藏于野。野有遗贤，传承大道；如燧如薪，烛照长夜。古之巢由夷齐，老庄墨屈，皆负命怀道而不苟合于当世者。若辈或处或奔，髡首跣足于棘野荆谷；日暮途穷而不弃，斧钺加身而无悔；以一生萧条而延吾族千秋道脉，诚万古圣贤耳。

渝州王康，亦当世贤哲也。其人乃民国名门苗裔，托胎于家国板荡之际，诞育于红朝开元之时。身负奇气，天然耿介；面带霸相，近乎狰狞。首如飞蓬，不掩鹰目之犀利；须似秋茅，凸显铁齿之辛辣。拟古则虬髯公复出，譬外则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论相云——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康公两者占尽，确确乎须眉大丈夫也。

公年少磨剑，利器在怀卓尔不群久矣。负笈西师已然学领，为民主自由奔走凡卅余年。其间六月惨祸，公挺身求法于前，亡命江湖于后；草野埋名，望门投止，酸辛悲烈，孰能尽知。后市隐山城，超然物外，私学研究陪都抗战之血史，以刊红朝伪史之污言。还青简以白，雪覆盆之冤，居功厥伟，几人曾堪。年来渐有识者，三顾蜗庐，延公于港地讲筵，几谈俄罗斯，始惊天下客。所谓高天不言，言则动世；冰山露角，必翻江海；其是之谓乎。

仆与康公神交既久，亲聆謦咳亦有年矣。公腹笥之富，思辨之深，记忆之精，立场之正，几可独步当世。陌路相逢，樽酒缔交，每遇必高论恢宏，一席胜读十年耳。公特立孤愤，不轻与人交，白眼讽世，乡愿犬儒望之则匿迹。仆何幸欤，几过桂室，承公茶蔬亲烹，黍酒夜话，彼此壮怀激荡悲心零落，亦尽在杯中矣。

俗语谓当日英雄渐白头。流光如驶，花甲忽度。康公对此沦陷家国似水年华，昨日酒阑竟浩叹——与之同生，愿与之同死。遥想古歌之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此中之艰难肝胆磊落胸怀，岂不令吾辈仰天喷血哉？唯仆所信者，公必寿于恶朝，公之道

必弘于后世，公之文必藏诸名山。杜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谨以此为公人文俱寿。

（2010/04/01 发表）

余世存:剥极复见天地心——为王康六十大寿而作

我们这些终要一死的中国人的当代命运是如此奇特。即使那些最富有反叛精神的同胞，那些在各领域都交好运的投机商，那些敬业或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学者，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政治家，都没能超越当代世界的中国命运。我们注定做了中国命运的材料。尽管更有机会、历史的纵深感，但我们跟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劳苦大众一样，仍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长城”，最新的说法儿，叫“方阵”。

我国家民族的当代命运，是在经历近现代的坎陷之后，终于自觉不自觉地迎来了某种反弹、新生。这新的长城或方阵，一时举世瞩目。最隐逸的诗人、最高蹈的戏子、最具个性的行为艺术、最有真理的道德象征、最能欲望的人格，都无能自外于长城或方阵。在长城或方阵的悲喜剧命运面前，吾人中最狂妄者也低下头来。谦卑者可称，吾辈傻人有傻福，能遇上这样一个空前的时代。乡愿犬儒者则见利惜命，以为过了此村再无此店。志者仁者痛心疾首，人欲横流了，世风日下了，天理不在了。

积贫积弱的国家终于阔起来了，度过短缺经济之后的社会也日益丰满起来了。一百多年来委屈卑服的国家民族终于有了某种底气。以至于站在中国肩头的虚妄者，以为可以较前人更有效地叫板了。直到今天，当巨国规模或帝国的超经济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即不仅该给世界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应该提供价值观念、人格象征时，我们仍局限在跟异域他族相比较相争的思维框架里。（即使唐宋帝国，在和亲或给化外贡献子女玉帛时，仍贡献了宋五子以及欧阳修、苏东坡一流的大家；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人才时，仍贡献了惠能、马祖一类的精神巨子。）说到底，今日吾人仍属于一百多年的文明碰撞格局里的材料。

到目前为止，这种碰撞的三阶段，已经不止于传统的经验。我曾经提及此类经验：我国族与印度文明的碰撞，就经历了秦汉帝国时期的参证、南北朝至大唐帝国的冲突反复、宋明帝国时期的取用自新等阶段，其结果符合中国文明善待天下的意志，“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这种碰撞过程，北京人共识为套瓷、叫板、投桃报李或有来有往，学者则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最难者，是第三阶段的拿来主义或和合现象，何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何谓投桃报李也？吾人幸运的是，在有生之年已经见证并仍将见证中西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司马光王

安石之间、天理人欲之间、鲁迅胡适之间、正义宽恕之间……等等的和合过程。

在这样的冬天为王康先生的六十大寿而说这样的话，因为王康先生是分子原子材料般的中国命运的少数例外。事情当然都有例外，甚至在中西文明碰撞的前两个阶段，仍有可数的中国圣贤、作家诗人们成为了这种例外。虽然这些例外无一例外地谦虚。聂绀弩说过，此六十年无限事，最难诗要自家删！穆旦说，这才知道我的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王康先生同样是一个有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的人。记得九年前，王康先生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当时，他引用马克思的话感慨地说，成为当代汉语贡献奖的首届得主，是给了他更多的荣誉，也给了他更多的耻辱。显然，王康先生和历史上的圣贤志者们一样，有着来此世走一遭的责任感。

这样的人并不是直到五十、六十以后才知天命并耳顺的。自王康离开单位、体制，学习自立以来，他就代表了吾人心中的某种愿景，不仅要成为材料，而且要为我国家民族和个人寻找安身立命的新形式。这种寻找本身成就了形式。在二三十年的寻找中，王康先生为我们示范了造次于是、颠沛于是的中国人格。这种中国人格跟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同样重要。

我们确实“不差钱”了，我们人多，我们有中国制造，我们有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孔孟之道、帝国臣民之心，我们也有世界知识和科学主义。但我们给予当代文明世界的，还有王康先生持自家言说的人生和近乎不朽的人格。

要精准全面介绍王康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是此时切要的任务，因为在王康先生的示范和带动下，我们也开始在深沉和开心之间、在道理和人欲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从容的可能性。王康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安慰，也是我们跟天地、自然联谊的桥梁，是一贯三通达天地人的王者。用爱因斯坦庆祝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话说，王康是留在天地“庙堂”里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确实，我们在不断坎陷盘剥的中国命运里，已经压抑得太久了，剥极必复，我们在王康先生那里见证了天地之心。此时，是我们庄重的时候；此时，是我们王者的时候！此时，是我们喜乐的时候！

我是个人成长年代有幸受益于王康先生的人，尽管我们的言路思路并不相同，甚至在各自独立生存的命运展开里，我和王康先生仍都在经受考验、遭遇危机、经历诱惑，但我相信跟王康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我们今天能相约一起祝贺王康先生的生日，不仅是文化中国的盛事，而且是文明中国的盛事。

由王康先生的六十岁生日展开，不仅可以让人想到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茨威格、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而且也让人想到了朱熹、陈亮和辛弃疾。无论如何，这些不同时空的人物，其争执、其印证、其欣赏，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天地间的温暖。历史往往给予我们某种机遇，让我们创造一种回馈天地的意境。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祝贺王康先生的六十诞辰同样在证明这一点。

今年八月，在临安乡下，我在近乎孤绝的状态下写作《老子犹龙》，一个全世界都不陌生的中国人的传记。那时，我就想到要用这部作品来取悦王康先生的生日，一个我心目中的中国英雄，一个苏东坡、朱熹意义上的中国豪杰。据说陈亮也曾称道朱熹是“人中之龙”。人以龙称，最早则源自孔子，孔子问礼于老子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在王康先生身上，正义、天理、人欲、市井、传统、现代、才人、圣哲，等等，都不足以规范他；套瓷、叫板、拿来、印证，等等，都不足以说明他。这是一个行藏在我的大智慧德人，是一个吾人文化为不同时空贡献的文明的灵馨儿，是一个从风从雨的龙象。

老康，六十大寿，恭贺了！

2009年11月20日夜急就于中华民族园

（2010/04/01发表）

毛喻原：感谢王康

给王康出文集一直是我的宿愿，总觉得不把他的文章汇集成册是我们这个时代莫大的损失，是众多粉丝们耿耿于怀的遗憾。我认为，在这个“集体舞”、“团体操”疯演狂秀的时代，太需要王康式的思索、言说与声音了。之前向他呼吁过多次出书，他都不回应。仿佛他总是那么忙，总是有更火急的事情要做，有更重要的问题要想。

这次恰逢王康六十大寿庆典在京举行之际，黄珂提议给王康出本文集，以表庆贺，以示纪念。我十二万分赞同，并主动承担了有关编务的所有工作（包括木刻封面头像、装帧、版式设计）。尽管任务不轻，时间紧迫，从提议到生日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编得很高兴，很激动，很了然。

书倒是编出来了，但留下了许多不满，王康的好几篇精彩文章（比如写李慎之的，写刘宾雁的，写西师竞选的）都没有来得及录入，就只有等下次再版时补上了。

当有人说“一个像五腥谷这样的地方居然能与文明世界与时俱进，与时共存，马里兰的芬代尔居然能和金口河的黑竹沟共享一个大气层，华盛顿的方尖碑居然能与五腥谷的纪念堂共沐一颗大太阳，真是匪夷所思”时，当有人说：“如果五腥谷存在，那么西方就是个传说；反之，如果五腥谷不存在，那么，也只有在那时，西方才是真正存在的”时，当有人说：“五腥谷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趴着、躬着，很少有蹲势、坐姿，更不要说什么站态了。五腥谷没有站立的想法，没有关于人伸展站立的概念”时，当有人说：“五腥谷好像是个敌占区，沦陷区，是被一个巨大的公共疫情封锁线包围着似的。要么你留在麻风病人的隔离区里，要么你就冲出去，冲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说不定与此同时还试着要把你的病毒传染给别人”时，王康——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是黑暗铁屋的一条缝，万丈深渊的一道光，是无希望时代的一种希望，无存在时代的一个证明。希望什么？证明什么？希望万劫不复中仍存一种救赎的可能，证明七倒八歪的惨状中仍有一种坚持的站立。

王康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是我最尊重的人。他是以“实本”证明，而不仅仅以“文本”书写人生的人。二十年前，我在《永恒的孤岛》种写过一段话：“在一个反义的时代，一个人的德性是由他所得财物的少来衡量的，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所付心血的多来标定的。在这样的时代，真正有福的是那些把身放在最低的地方，把心置于最高所在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并爱戴，因为他们主动使自己处于一种物质

的相对贫困之中，而为了公平与人道，把自己的心灵引向一种纯正的激情。”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由于想到王康，想到像他那样的存在格式、生存意向而写。今年六月李治中到我家做客，向我问起一个问题：“你生活中有没有你非常钦佩与敬重的人？”“有啊，王康。”我脱口而出。“理由？”“既聪明又善良。”我对他说，“咱们中国不乏聪明的人，甚至不乏极端聪明的人，但缺乏既聪明又善良的人。既善良又聪明，少之又少，凤毛麟角，而王康正是两者皆备。”在我看来，王康是两个人本的典型：付多得少的典型，既聪明又善良的典型。

这么多年来，王康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的兄长、师长、榜样。我庆幸我的生活中有像他这样的朋友，因为有了他的在前和示范，我就知道：在这个极易堕落和腐朽的国度里，我的堕落与腐朽就不致于没完没了，不致于没有节制，没有底线，尤其在专制体制下，他的存在无疑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珍贵的参照、无价的启示。我认为，王康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爱，不遗留一涓滴精神于己，却想为其德性的整个精神；他犹如精灵走过桥梁；他爱心灵非常奢费的人，不欲人谢，不为报偿，因其时时赠与，不愿自己有余留；他爱羞于掷骰子中注的人，因为他想失败；他爱在行动以前吐出箴言的人，因其所行优于其所许；他爱诊断来者且救赎往者的人，因为他想在今者之前毁灭；他爱因爱他的上帝而责备上帝的人，因为他必将毁于他的上帝的愤怒；他爱即使在创伤中灵魂也深沉的人，他可因小损伤而毁灭，但却因大损伤而存在；他爱灵魂过于充实而忘其自己的人，万物皆备于其人；他爱自由精神自由心意的人，爱如大雨点降至人类之上的黑云，预言雷电的来临，亦如预言者一样诚然毁灭而永生。”

最后，我想说：我感谢王康。要是没有他的精神给我以鞭策，没有他的生存方式给我以励志，没有他的文章给我壮胆、提神，恐怕我早已癫痫病、忧郁症了，早已丢绝千分之一的信心，早已丧尽万分之一的希翼。

2009 年 11 月 22 日于北京

（2010/04/01 发表）